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Chinese Academic Canon in the 20th Century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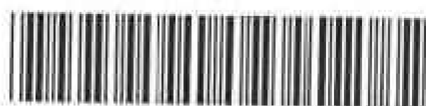
福建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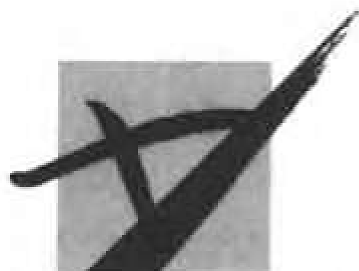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语 言 学

主　　编　林　焘
副主编　刘　坚
　　　　陆俭明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主编：林焘，副主编：刘坚、陆俭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9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ISBN 7-5334-3019-0

Ⅰ．语… Ⅱ．①林…②刘…③陆… Ⅲ．语言学—研究—成就—汇编—中国 Ⅳ．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23542号

责任编辑 林炳泰

索引编制并责编 林春森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语 言 学

主 编 林 焘

副主编 刘 坚 陆俭明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25592 7811283

传真：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南山区南光路1号 邮编：518051）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514千 插页4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5334—3019—0/Z·79 定价：90.00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ISBN 7-5334-3019-0
9 787533 430191 >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元化　著名文学理论家　著名文化学专家

王淦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朝闻　著名美学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叶笃正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嘉锡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程裕淇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师昌绪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丽兰　国家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任继愈　国家图书馆馆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孙俊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正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

宋木文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吴阶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张光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岱年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陈荒煤　文化部原副部长　著名文艺理论家

林兰英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季羡林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周光召　中国科学院士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罗沛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哲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正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水利部原部长

涂光炽　中国科学院院士

雷洁琼　著名社会学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潘家铮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

吴阶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季羡林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主任委员：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师昌绪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丽兰　国家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长

委员人选由各学科主编等担任

各卷学科主编（按学科排列顺序）：

数　学　林　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力　学　郑哲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力学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物理学　冼鼎昌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化　学　胡亚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天文学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测绘学　喻　沧　国家测绘局原局长

地质学　季廷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

大气科学　陶诗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院学大气物理所原所长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运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所长

应用地球物理学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海洋科学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院士

空间科学　刘振兴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理学　吴传钧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

生物学　钱迎倩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原所长

王亚辉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细胞学研究所所长

农业科学　石元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水　利　朱尔明　国家水利部总工程师

医　学　王　镭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杂志社总编辑

电子学　罗沛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动控制与系统科学　许国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矿业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冶金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信息科学与通信工程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副校长

计算机科学技术　王行刚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哲　学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研究员

陈筠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　研究员

宗教学　任继愈　著名学者　国家图书馆馆长

卓新平(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考古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历史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博物馆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文　学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艺术学　郑雪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电影评论家

教育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心理学　张厚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社会学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

民族学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语言学　林　焘　北京大学教授

经济学　宋　涛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法　学　江　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新闻学　丁淦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出版学　方厚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军事科学　马天保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关俊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兰书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朱永康　原福建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宋木文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汪远平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杨牧之　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陈太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爱枝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
金常政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
姚以恩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侯逸民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审　北京现代管理学院教授
郭荣辉　原福建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阙国虬
副 主 任：方建云　黄旭（常务）　王亿钦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亿钦　方建云　孙汉生　陈鹰平　林启仁
林　健　黄　旭　谢从荣　阙国虬

出版说明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是一部以条目形式总结百年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人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各卷以学科体系为框架，分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学术刊物等7类条目。其中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为主体内容，占各卷的主要篇幅。

1994年7月，我社初步提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出版构想，后曾多次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有关专家咨询，并召开多次座谈会，对选题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论证和评估，得到学界权威人士的充分肯定。1996年开始制订编纂计划，完成总体框架设计，并开始向权威专家组稿。同年，新闻出版署将本书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它有别于百科全书、学术史和学术年鉴。本《大典》以百科辞书的体例，构成一部独特的学术"世纪鉴"，实为一种崭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虽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学术总结，但必须保持高尚的学术品位；必须尊重历史，推进科学发展，传播真知，批判伪科学和谬误。为了避免门户之见，本《大典》对涉及各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论，只要有学术创新，均兼收并蓄。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这一跨世纪的大型丛书终于问世。以一家地方专业出版社之力，不畏风险，克服困难，完成如此巨大的出版工程，端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鼎力相助，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金常政先生，对这一大型丛书的总体框架设计提出过许多指导性的建议。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有关国家机关、学术机构和众多作者深表谢忱，并恳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意见，以利修订再版。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

序　一

季羡林

世界文明古国，决不止中华一家，而文明兴旺发达垂五千年而未尝中断者，我中华实系只此一家。这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夜郎自大之私言。

其原因何在呢？

统而言之，原因不出两端：一内因，一外因。常言道，内因是变化的基础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密切联系，互为主次。

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内因呢？我认为，内因表现得最突出之所在就在中国文明的特点上。多少年来，我自己虽不是哲学家，而且还最不敢喜欢哲学，但好胡思乱想，再加上一些个人的观察与体会，我发现：中国或东方文明的根基是综合的思维模式，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分析的思维模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总体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运用得当，则还能起互补作用。天下没有绝对纯的事物，所谓综合与分析，并不是说综合中没有分析，分析中没有综合；但从宏观上来看，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是无法否认的。这个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尽管有人反对，我仍深信不疑。

这只是讲中国文化或文明的根基，具体表现亦有可得而言者。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才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也是颇为值得一提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极为淡薄，正式信教者不多，即使信了某一个宗教，也没有宗教偏执狂，有时甚至儒、释、道三教都信，而实际上是什么都信之不深，不陷入其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极大，它决不阻碍外来文化的输入，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外来文化往往随外来宗教而入，宗教与文化是孪生兄弟。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外来文化输入，都是伴随宗教而来的，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外来文化输入的重大意义了。用不着是真正的科学

家，就是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一个平凡的真理：近亲繁殖，不利于后代的成长。造化小儿好像是有意制订了一条规律，天地间，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生物，大多忌讳近亲繁殖。必须不断有新的基因，新的血液输入，后代才能健康地发展。否则就会退化，就会萎缩。人类兄妹不能结婚，看似伦理，实为生理。这些都属于常识一类，用不着多加阐释。在过去，有些地方，有些人，连同姓结婚都忌讳。“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在起着作用。

人类文化，虽然不是生物，但却与生物有些类似之处，文化也有一个诞生、成长、衰退、消逝的过程。因此，它也受到了上述生物规律的制约。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明确无误地阐明了这个观点。尽管书中有一些细节，我们不一定能完全同意，但是，总体来看，他的理论是能够成立的，原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在他列举的人类从有史以来已有的二十几种文明——他有时候称之为“社会”，有时候称之为“文化”——中，有的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有的仍然存在。其原因汤因比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我无法一一列举。总体来看，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条生物发展的规律在起了或者起着作用。这一点他说得并不明确。明确归纳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我是始作俑者。对了，不敢掠美；错了，不能辞其咎。

画龙点睛，现在我要回答在本文开头时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连绵五千年而未尝中断的原因是，内因是有“有容乃大”的特点，外因是有外来文化，外来的新鲜血液的输入。外来文化的输入，如涓涓细流，随时流入，而规模巨大、延长的时间特别长的输入，在中国共有两次，一次是佛教伴随着印度文化的输入，一次是天主教和耶稣教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这两次外来文化的输入相距一千多年，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辉煌数千年而不少衰，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对于这两次文化的输入，怎样评价也不会是过高的。人们能够想像，如果没有这两次新鲜血液的输入今天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吗？

尼泊尔和印度佛教输入中国，其影响之既深且远，皎如朗月，无人不知。其影响方面之广，实为空前。举凡哲学、宗教、文学、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风俗、习惯，甚至天文、地理、科学、技术，以及鸟、兽、虫、鱼、水果、蔬菜，等等，等等，简直是无孔不入，中国都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当然，中国也有相应的回报，只因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的国家，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至今还多隐而不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挖掘。）一直到今天，中国各名山胜地之琳宫梵宇，古刹宝塔，还能依稀反映出昔日辉煌。中国人民的信仰中至今还杂有印度佛教成分，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本文的重点是想谈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文化大输血，谈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况，佛教影响就不再谈下去了。

我在上面曾提到过，中国历史上两次巨大的外来文化的输入，相距一千多年，我指的是明末清初西方文化随天主教而传入中国的事实。实际上，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早已开始。蒙昧远古，姑且不谈。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已经有历史记载。（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从那以后直至公元17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接触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完全断绝。在这个期间，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输入欧洲，双方互助互利，等于双方彼此相互输入新鲜血液，双方文化得以昌明，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应该大书特书的。

谈欧洲文化输入中国，虽然是本文的重点，但是重点中还有重点，就是20世纪欧洲文化的输入。本《大典》的目的是叙述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为什么离开本题去谈欧洲或西方（后来又加上了美国，美国文化实为欧洲文化的分支或发展）文化的输入呢？其中道理并不深奥，而是有目共睹的。离开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侈谈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其中既包含人文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是不会搔到痒处的。在这里也有一个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内因是中国本土几千年学术的发展，外因就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谈论20世纪中国学本的发展，二者必须兼顾，缺一不可。

今世之谈文化交流者多有这样的看法：一种陌生文化进入本土时，往往要经过四个阶段：进入，碰撞，适应，融合。证之以佛教传入中国之情况，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佛教无父无君，又不能传宗接代，这大大有悖于中国的伦理道德，大碰撞是必然的。佛教方面先做了自我调整或者伪装。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经的翻译者在最初译经时改篡原文，突出强调一个“孝”字。中国方面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也想方设法为之涂饰。这种适应终于得到了报偿，佛教于是逐渐在中国立定了脚跟。这种从适应到融合的过程往往长达几百年。到了唐代，韩愈还在信佛的皇帝面前，大揭佛教的老底，其斗争之激烈可以想见。天主教带着西方的科技知识入华，也有一个同佛教相似的过程。但是，西方的天文、历算等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清初康熙皇帝为之心折。中国钦天监的官员不服气，但是，事实胜雄辩，他对日食计算得不准确，而西方人准确，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低了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碰撞方面，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中国抵抗力极其微弱，从而碰撞也极其微弱，简直是微不足道了。

对于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况应当多说上几句，特别是中、西、日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应说清楚，否则下面的文章就不容易作。此时，西方的工业革命仍在进行，殖民扩张，仍是不遗余力。而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比如魏源、林则徐等等，也痛感有认识世界之必要。于是，西学东渐，两厢情愿。东渐的道路，大体上有以下四途：一、西方传教士；二、西方军事和科技人才，医

生；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四、中国派驻西方的使节。

西方传教士，使用传统的办法，倚仗一技之长，藉以传教。他们编写了一些英华字典，最早的有马礼通（R. Morison）的*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1822)，以后还有几本。我猜想，其目的是供西方人学习华语之用。这些字典在日本都有和刻本，有的甚至再版数次，对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晚清时代，重视军队的建设，努力向西方学习，许多省份的武备学堂或者讲武堂间有聘请西方军官来华任教者。至于科技人才和医生，亦间有见诸记载者，大概人数极少。废科举建学堂以后聘有一些西方的教员。这恐怕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19世纪中叶可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晚清则有王韬等等。他们渴望了解西方。派留学生则是19世纪后期的事，容闳等是大家都熟悉的。

至于中国派遣驻西方使节，也多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其中最有名的有曾纪泽、郭嵩焘、薛福成等等。今天读他们的使外日记或旅行记，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他们对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十分重视。他们更重视西方的工业和科技，有很多参观工厂的纪录，都十分细致、精确。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的外交官还应该认真学习的。

虽有以上四个方面，但是我认为，效果并不显著。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什么良药都失去了作用。但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原来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几乎都患了夜郎自大狂，不承认西方有什么好东西。后来挨了几顿痛打，头脑清醒了一点，却仍然不彻底服输。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一系列的说法应运而生。到了更晚的时期，就产生了“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的说法，聊以自慰，不思上进，迹近阿Q精神了。

现在我就专门来讲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问题。到了此时，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把中国皇帝和官员吓掉了魂，西方殖民主义气焰万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中国毫无还手之力。在学术上和文化上，中国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再用“碰撞”这个词儿，我认为已经十分勉强。一方咄咄逼人，一方节节退让，束手无策，哪里还有什么“碰撞”呢？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才能谈到“碰撞”。据我的估计，在20世纪前几十年大清帝国还在苟延残喘的时候，中西学术对比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方面只有接受而没有什么“碰撞”了。

那么，西方学术是否就快马加鞭长驱直入了呢？也不是的。在这里，我想进行一点细致的分析。

我想从中西文化关系——我不用“碰撞”这个词儿——这个角度上把20世纪

的中国学术的发展分为下列五个阶段：

一　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约为1900年～1917年

二　“五四”运动十几年，约1917年～1930年

三　1930年～1949年

四　1949～1978年改革开放

五　改革开放至世纪末，约有20年

下面我分别来谈一下。

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路线有两条：一直接，一间接，前者微弱，而后者则极强大；前者弱不成军，后者则是一支强大的集团军。二者力量悬殊，根本谈不上势均力敌。前者的源头主要是英国，后者的媒介则是日本。

直接路线的代表人物或者主帅是严复。严复赴英国留学，本来学的是海军。但是，回国以后，清朝廷腐败已极，严复空怀报国之心，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遂退而从事译述工作，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都比较忠实谨严地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天演论》一书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至深且远，大家都承认，鲁迅本人就受其影响。严复还有一个“同志”，就是林纾。林本人不通西方语言，靠与别人合作，别人口译，林执笔为文，就用这种方式，他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不限于英国，美国、法国等都在内。他的译文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不亚于进化论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此外还有极少数介绍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学者，其影响相对地说不可同日而语了。

上面说到间接路线是通过日本。在约有两千年的中日交往中，双方互相学习，受益良多。在中华文化鼎盛时期的唐代，日本大量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然而世事变化的规律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到了清代后叶，中国文化走向衰落，而日本则逐渐走向繁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大力向西方学习，结果是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教育兴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已经大步地走在中国前面，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反而要向日本学习了。

在政治方面，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一方面又庇护反清排满的中国革命。孙中山，虽然主要活动在南方港澳以及美英等国，但也多次到日本，兴中会和同盟会都同日本有联系。黄兴的根据地就在日本。此外还有很多反清的英雄，都在日本住过。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起过很大的作用。没有日本的协助——这一协助当然也是有目的的，辛亥革命怎样成功，实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我的重点是讲学术文化，在这方面要讲得详细一点。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大师，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不大接受西方的影响，因而成就有限。最著名的几位大师，比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等，都是中西兼通的，而西方的学术文化，他们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习到的。王静庵先生也通英文，但是，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必仍以日文为主。太炎先生虽居东瀛，从事革命活动，但仍不忘书生本色，在东京讲授《说文》，弟子中颇有后来有极太影响的学者和文学家，比如鲁迅、黄侃、钱玄同等等。这些人产生影响大多是在第二阶段中，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我想在这里说一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时代划分上不得不尔；然而，学者们发生影响，则决不受这个划分的限制。上述诸大师，其影响至今犹在，有些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将会是永在的。话再回到本题：这些大师之所以有成就，因为他们肯于和善于吸收西方文化，而吸收的途径则是通过日本的媒介。

我再附带说上几句：我在上列大师中没有写上康有为的名字。原因是，我从来不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好了，可以称他为思想家；说不好，只能称他为“政客”。他的那一套学术，等于泡沫，到了今天还有什么人会提到他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贡献呢？这也许是稍有偏见，但是既然这样想，我就只能这样说了。

我在上面谈了在第一阶段中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学术，主要是从几位大师谈起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日本的影响决不止于这一些。从平常我们不大注意的一些地方，背后也隐藏着日木的影响，比如中国现在通用的学科的名称，哲学、物理学、化学等等，连“科学”这个词儿木身也是日木的产物。好多学问，中国古代是有的，但并没有形成体系，中国人不认为它们可以单独成为学科的。这些学科在西方从希腊罗马以来逐渐形成为独立的学术体系，有了专门的名称。日本先学了过去，使用中国的汉字命名，遂成为独立的学科。到了清末，由中国学人从日本传了进来。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北京大学的前身或者北京大学初期课程表中的许多学科的名称和今天通用的名称有同有异，探讨其间的差别和变化，便可以恍然于心了。此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使用的术语中，也有大量的转抄自日本。

我还想说几句看似题外实为题内的话，这就是日本的西化问题同中国的西化问题的比较。中国的西化，时间并不短，中国学人认识世界或者企图认识世界，也早于日本。清代魏源的巨著《海国图志》出版于鸦片战争前后。这一部书参与者之一就是林则徐。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不能不谓之奇迹。然而它在中国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在日本则极大。有人甚至说，这一部书与明治维新也有关联。结果是，日本大规模的西化早于中国，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

有一些日本朋友，我也曾数次访问日本，我的印象是：日本人把西方文化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融合得十分成功。新的学到，旧的没丢，达到了水平相当高的和谐。虽然眼前出了一些“离经叛道”的青年，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在惊诧之余，把他们称之为“新人类”，但似乎并无伤大雅。

最后我还要加上一点“多余的话”。清朝末年，中国学人大量涌入日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学问，大多数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些技术学问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上日本本土的东西。因此，据我个人的揣测，中国人间接学习到的西方文化，不可能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文化。这个问题过去没见有什么人研究过，似乎应当补上这一课。

第二阶段

我的标题为“五四运动十几年”，这只是一个极其笼统的说法。“五四”运动影响深远，什么时候结束，谁也说不清楚。

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这个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情况相当错综复杂，叙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想先从这个运动的两个主要发动人胡适和陈独秀谈起。胡适是留美学生，美国哲学家杜威的高足，带回中国来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与日本是不沾边的。他首先举起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就其学习背景来看，是属于日本派的。众所周知，他的功绩首先在输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大事，在五四运动中当然也是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从产生的根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纯属西方文化的范畴，专就胡陈二人来谈，胡适始终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胡所服膺的美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不能相容。而陈独秀则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至于什么“托陈派”的说法，是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无稽之谈。

“五四”运动所标榜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则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玩意儿。

我现在专门谈一谈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点看法。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他是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但是，我认为，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德国传到中国来的，而是经过了苏联的媒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远早于十月革命。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中国已经有不少的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许多介绍马恩的思想和事迹的文章见诸报刊。这些介绍者大都是国民党早期的创始人，比如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等等。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述诸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来源，就不难发现，其中有

日本的影响。在这些人中，马君武与德国有联系、李石曾后来与法国有联系，其余的人大都是在日本影响下学习和成长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恐怕也多通过日本的媒介。

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是陈望道从日本转译的，虽然也参考了英译本。我不知道，最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读的是什么文字的《共产党宣言》等书，有很大可能就是日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初肯定是通过日文的。稍晚一点，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大概是能阅读俄文译文的。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等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当时称之为“普罗文学”——仍然是间接通过日文译的俄文著作。据说，日本译者俄文水平不够高，对俄文原著了解得马马虎虎，因而日译文佶屈聱牙，鲁迅的译文当然也不会通畅的，结果产生了一场“直译”、“意译”、“硬译”的大辩论，文坛一时闹得纷纷扬扬。我再补上一句后话：到了解放后，中共中央翻译局的一位领导同志还对我说，他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是根据俄文转译的，不是根据德文和英文原文。他义形于色地说：“俄文译文比原文更可靠！”我真是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可见当时“一边倒”究竟“倒”到了什么程度。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来谈我们的“五四”时期。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留学生情况或者留学途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途径颇多，其中留学生占的比重颇高，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稍有涉及。他们是“拿来主义”的主要执行者。他们去学习的国家主要是文化先进科技发达的国家，比如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大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东方的日本。出国途径，除了个别的官僚和富商子女外，主要是两条：一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是留法勤工俭学。前者先在国内招收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入清华学习几年中学课程，主要是英语，毕业后派赴美国，学习科目文理法农工商医都有，在美国大学中获得学位后回国。这个制度延续了二十来年，时间长，人数多，很出了些有名的人物，例如胡适等，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规模不是大大，也不像清华那样正规，当然也出了不少人才。最突出的一点是出了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像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这两条途径，对中国引进西方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我想谈一谈“五四”时期的文学团体。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主要人物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绍钧）、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等人，鲁迅也应该归入这一派，巴金亦然。他们的宗旨是“为人生而文学”，倾向于现实主义。《小说月报》是他们的同仁刊物。可以说是他们的对立面的是创造社，创办人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等，用一个现成的名词来概括，他们接近浪漫主义，特点是主要成员几乎都是留日的学生。以上两个文学团体，莫

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在西方，19世纪德国的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据我个人的理解，在文学创作方面，全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内容可以因民族的不同而异。真讲到世界统一，只能表现在形式方面。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散文形式多样，无从表现，诗歌亦然。仅以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而论，新的小说和戏剧，在形式上都被西方的小说和戏剧所统一。从鲁迅起，一直到茅盾和巴金，他们的小说在形式上同欧洲毫无区别。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的章回体不见了。中国旧小说叙事一般都是原原本本，而西方则不这样，往往从中间插上一杠子，然后再追述或补述。在戏剧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西方的形式。“五四”时期，易卜生的戏剧不但在思想方面有深远影响，在形式上也统一了中国的戏剧创作，一直到今天，始终未变。试问曹禺的剧本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不同？同元剧又有什么相同？西方文学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成了“世界文学”。东方国家进入“世界文学”这个领域，时间有先后的不同。印度和日本都早于中国。

我在这里还必须补述一下《学衡》杂志的情况。这个杂志是清华留美学生吴宓创办的。他在美国师从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白在美国以宣扬人文主义著称，是属于保守派的。吴回国后就邀集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不限于文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白话文，可谓逆当时的潮流而动的，因而遭到了鲁迅等人的严厉的批判。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太大。这个杂志与日本无关，可以说是一个打着白璧德美国招牌，企图在中国复古的一个尝试。按时间顺序，这个杂志主要应归入第三阶段。

再次，我想谈一谈“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人品道德学问都极高的人物，办学极有远见，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至今依然光辉闪耀。特别是他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更令人钦佩不置。世界各国古今学术史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百家争鸣”，才能使学术兴隆发达。蔡元培真正是言行一致的。他聘请教员，不讲资历和学术见解，只要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一律延聘。极端激进的和极端保守的，一视同仁。共产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都能在北大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辜鸿铭这个人物以怪著称，他受的完全是英国式的教育，著作不多，著作中洋味更少，在当时以及后来，他的影响都不大，最近几年又多有人提起。梁漱溟当时年纪不太，他那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影响不小。真正参加发起五四运动的骨干是一批年轻人，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顾颉刚又以《古史辨》一书名震遐迩。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也属于疑古一派。中文系的三马、三沈、二周，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其中周树人（鲁

迅）更为突出。新派人物出版的杂志《新潮》、《语丝》等，影响极大。冯友兰是北大学生，留学美国，后来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在“五四”期间，有几个著名的外国学者被邀请来华讲学，比如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印度的泰戈尔，后者是诗人文学家，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冰心早期就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一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人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不大确切的。研究院建立时，还没有清华大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几年。教师的人数极少，只有有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一个讲师李济，不过五人而已。学生的人数也不多。办学的方式介乎西方的学堂与中国传统的书院之间。入学考试不注重学历而注重学生的学术素质。入学后教师能做到因材施教。结果毕业的学生中很有一些极著名的学者，一般几乎都是大学教授。到了抗战时期就形成了“吾师派”，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我总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验实在很值得总结的。四大导师，梁、王两位，前面已经谈过。陈寅恪留学日、美、欧等地，而以在德国为最久。但是他的学风都无西方影响，毋宁说是更接近乾嘉学派。

从“五四”到卅年代，这第二阶段，十几年中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论战：如“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哲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这些论战中，除了“东西方文化论战”直接涉及中西文化以外，其他论战也多有涉及中西文化矛盾的地方。这些论战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主题所做出的不同理论思考与选择。我以为，今天我们不能仅以政治立场为标的做出判断与批评，而应细心审视他们论战的内容，汲取双方理论思维的教训，才真正有益于今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再重犯历史性错误。

第三阶段

现在来谈第三阶段。我在上面说过，二、三阶段之间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有不少学者在第二阶段已经崭露头角，到了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才真正大展鸿图。

这一阶段，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接着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最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原扫荡，国无宁日，大学内迁，衣冠南渡。这些情况，本来是应该对学术的繁荣不利的；事实上，这些情况也确实制造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这段将近二十年的动荡中，中国学术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有繁荣兴盛的迹象。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第一个文化学术最兴隆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当时正是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然而真正的“百家争鸣”也出现于此时，成为中国空前绝后学术空气最

自由，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到了汉武帝时，天下真正统一了，武功真正显示了，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使学术繁荣。这个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在这个第三阶段中，学术上真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国民党政府想控制而没有力量。许多学术大师，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冯友兰、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王力、朱光潜等等，都不断有新著出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如郭沫若、翦伯赞等等，高举唯物主义的大旗，向他们所认为是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发动攻击，仿佛真是真理在手，义形于色。在文学界也表现出来了差不多类似的现象，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不断有新作问世，充分显示了活力和新意，是他们创作如日中天的高峰期。他们大多数人活到了建国以后，有的还有作品问世，有的则噤若寒蝉。问世的作品也多少含有遵命文学的味道，不复有当年的光彩，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反思的。

在这第三阶段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第四阶段

指的是1949年～1978年，自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

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华侨和华裔，带来了空前的希望；给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爱国思想深入骨髓的老知识分子，带来了无比的欢欣和鼓舞；给中华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赤县神州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里的人民好喜欢，是真真正正的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真觉得是站起来了。引得许多海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文学家，纷纷回国；华侨子弟违背父母之命争先恐后地赶回祖国。文化名人如钱学森、华罗庚、老舍、罗常培、周培源等等都回国来了。他们满以为解放了的中国是人间天堂、有如佛国净土，着着实实地狂欢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转瞬间，中国知识分子就运交华盖，灾难临头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基本上都是指向知识分子。你能逃过一个，但不能逃掉下一个，磕磕碰碰，无人能免。首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跟着是一系列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陈寅恪。接着又来了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1957年，就来了有名的反右斗争，什么“阴谋”、“阳谋”，“引蛇出洞”，总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有些人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今天说起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可有的人就因此弄得家破人亡，中间还间夹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左”风肆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62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彭德怀一封万言书，又扭转了乾坤，大扇反右之风。紧接是四清运动，四清还没有结束，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涉及面之广，行动之荒谬与残酷，为害之大，简直是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人世罕见，成

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个奇耻大辱。“文革”一直搞了十年，没有人能控制局面，文化遗产遭破坏之严重，无法想像。结果是经济濒临破产，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中。

在上述的情况下，哪里还能谈到真正的文化事业，真正的学术研究？虽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是一花不放，或一家独鸣。这一家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学一学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来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接受西方文化。可是我们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文化，可见这种学习是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至于结合的结果如何，有目共睹，我就不再饶舌了。

不过，我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个观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从马恩原著中学习的，而是通过苏联，这种马克思主义难免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我只举一个极小的例子，恩格斯曾说过，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但苏联只讲前者，我们也东施效颦，把后者忘记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一般的情况是，把极端复杂的研究对象，在马列主义旗帜下极端地简单化了。研究哲学的，只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首先把每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贴上了一个标签：唯物或唯心。往往有同一个古代哲学家，被今天的同一个哲学史家，今天贴上了唯心的标签，明天又贴上唯物的标签，任意而行，形同儿戏，好在已死去几千年的哲学家决不会从坟墓中站出来抗议，今天的研究者心安理得，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了。在历史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学者间争论不休，甚至动了意气；可是争论了几十年，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起源时间，相差千年，到今天只好不了了之。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战争。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可历史事实是，农民战争只起破坏作用，胜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依然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压迫者、屠杀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让学术进步，岂非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吗？

第五阶段

我指的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到世纪末的今天。

改革开放，天日重明，挽救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挽救了我们的学术文化。继承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松了一点，那种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了；那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恐惧，也终于消逝了。知识分子们焉得不额手称庆由衷地感到喜悦

呢？

然而，这种喜悦并不是立刻就感觉到的，中间有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是一种特殊的反思。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时，我们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到友谊宾馆去报到时，我遇到了在文革期间被尊为文艺界黑线的头领的一位长久领导文艺工作的高级干部，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他一看到我，就赶过来同我热烈握手，仿佛都是死里逃生一般。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代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却是'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我一时真分辨不清，他是哈哈大笑呢，还是嚎啕大哭？

但是，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灵魂深处的共鸣。我在《牛棚杂忆》中提到，我在"文革"中曾一度想自杀。只是在间不容发的奇迹中，我没有能如愿，厚颜无耻地活了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经常反思这个问题。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幸呢，还是不幸？结论到现在也还下不了。但我仍然倾向于不幸，我觉得，没有自杀是我生平做的一件大错事。那位文艺界的"黑线人物"的想法，以及我自己的反思，我认为，都说明了一件事：根据我的观察和读书，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事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一是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一是硬骨头精神。前者先不谈，专谈硬骨头，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便是。然而，到了十年浩劫，硬骨头一变而为软骨头。自己造神，自己膜拜，受到了千古来有的耻辱，仍能觍颜活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何以能下作到这个程度，我至今不解。

反思归反思，工作归工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振作起来，不顾待遇的菲薄，国家照爱，工作照干，兀兀穷年，刻苦钻研，一时文坛和学坛又充满了活力，沉寂了三十年，又重新活跃起来。文网已疏，思想自由，新思想、新观点，也敢于提出。我在上面再三强调，这是繁荣学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点我必须特别强调：现在敢于同外国同行切磋琢磨了。在文革中谈洋色变，自造囹圄，自我禁锢，现在大大地改变了。在当今地球已成为地球村的时代，如果再自我封闭，中国的学术研究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成果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项：

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出版了几套大书，比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全宋诗》、《全宋文》等等。还有几套丛书，比如海外的中国古籍等。标点本《二十四史》在上一阶段已经出版。

二、将中国古籍输入电脑。我手头没有详细的统计，估计其量极大。全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关，都在兴致勃勃地做这一件工作，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大型的中国古籍，比如《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等等，都已输入电脑，看来这一件工作方兴未艾。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一些大作家，这件工作实在具

有革命的意义。过去，写书写文章，第一步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资料。这件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中国古代的著作往往不知索引为何物，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这对阅读者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电脑，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今后学者的工作重点不再放在搜集资料上，而在使用和阐释资料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很难想像能把所有的典籍都输入电脑，因此，总还会有一些冷僻的典籍需要人工检索。

顺便提一句，现在制作光盘的工作已在进行中。这对利用古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上面我曾提到，在那"闭关锁国"时代，我们不能也不敢去了解外国科学进展的情况，这当然会大大不利科学研究工作。现在有机会同外国的学术界交往了，联系了，从而我们对外国学术进展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外国那些生生灭灭的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不再坐井观天了。但是，这里面也有危机，据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有两个危机，一个是翻译外国学术著作不忠实于原作，一个是只注重输入新名词、新术语，真正涵义则往往忽略。这一点，我们今后必须努力纠正。

四、许多原来空白的学科现在补上了，或者至少是加强了，比如比较文学、敦煌吐鲁番学等等。在过去，我们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引起了外国学者的讥笑。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也逐渐形成了。这情况在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上，表现得更为清楚，过去曾轻视过我们的外国学者，现在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但是，也并不是一好百好，一了百了。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慨叹，国际学坛上没有中国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除了个别学科外，我们真正能处在世界学术前列的确实没有。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入中国，一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到什么碰撞！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

第五阶段写完，时间已经到了世纪末。下一个世纪怎样呢？我不是王铁嘴，不是张半仙，但是，我仍想说一点预言。西方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为世界人类造就了巨大的福利，但是却显露出来了严重的弊端。克服这些弊端，西方文化本身是做不到的，必须济之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人类才能顺利生存下去。中

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将重现辉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在上面用了一万多字，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这个角度上来总结了中国一百年来的学术的发展。我不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专家。真正的专家们从其他角度上大概也能总结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发展规律。如果有的话，我也不敢赞一辞。我现在不过是根据我自己的认识水平，写出了我的看法，期望得到真正专家们的教正，若能够得上一得之愚，则我就感到欢欣鼓舞了。是为序。

1999年1月31日写毕

序　二

路甬祥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成就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理性日益成熟的世纪。人类对自然的观察的视野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扩大了10 万倍以上；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已经从大于10^{-10}米的分子、原子集团深入到小于10^{-18}米的基本粒子内部，而对宇宙的观察眼界则已经从直径10 万光年扩展到150 亿光年的大宇宙范围。一方面，由于各门科学的深入发展，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从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到细胞、细胞核、染色体、DNA 分子、基因片段，到宇宙、天体、地球表面和地壳内部，所有各个层次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大量兴起，各门学科之间的空隙逐渐得到填补，其中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使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的鸿沟开始消失。由此，自然界各方面各个层次及其之间的过渡环节也开始逐一为人们所认识，整个自然科学正在形成不断发展的、多层次的、综合的统一整体。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对科学技术活动认识的哲学眼光、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不断扩展和提升。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对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警觉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对于科技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可能带来的危机的担忧，标志着人类对科学技术反省和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20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科学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自然图景的认识，而且带动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相对论、量子论和信息论的创立，DNA 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夸克模型的发现，系统论与控制论的建立，以及地球板块模型、宇宙爆炸假说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子物质、能量、时空、信息、生命、地球和宇宙认识的新的革命。量子化学、固体能带论、质能转换原理、生物遗传中心法则、受激辐射理论、反馈控制等为技术发展提供了划时代的关键科学原理，开创了信息技术、新材料与制造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等一系列高新技术领域。源于核物理学研究的核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氢弹、核电站以及可控核聚变实验的实现；源于半导体物理学、电子物理学研究的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电子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从电子管到晶体

管再到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猛发展，其软件系统的发展则是以数学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源于量子理论的光发射和吸收理论与固体物理学结合导致了激光器的诞生，不仅发展出半导体激光器和气体激光器等多种激光器，还衍生出基于其他物理原理的自由电子激光器和原子激光器等，导致了激光和光通讯技术的出现；而基因控制技术，包括引起震撼的动物克隆技术，则都是以DNA 的双螺旋结构和遗传中心法则为基础的。快速推进的科学和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成为技术进步的基础和推动力。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不断引发出影响深远的新的产业革命。技术进步也为科学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观察手段。

上述这些20 世纪中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仍然在不断迸发出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力。不仅如此，这些划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既是与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又对其自身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使科学技术在最近100 年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多彩的图景。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创造出了前几千年都不可比拟的物质文明。今天，人类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并已形成以知识为基础与推动力的知识经济构架。科学技术更加彰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走过了它的奠基时期和开拓时期，并在21 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科学一世纪来的孕育、成长、变革与复兴，自然带有中国民族文化与国情的深刻烙印。一百年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肇始在社会主要表现为西方传教士的科学输入以及洋务官员实施的技术引进。进入20 世纪以后，大批海外归来的学子们办学校、建学会、出学报、带学生，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当时，一大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主体。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不仅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一场科学启蒙运动。当时社会上的智士仁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不仅要推翻封建统治、打破闭关锁国和文化禁锢的传统，实现民主革命和思想文化解放，而且必须使科学成为新的认知体系的主体。可以这样说，20 世纪初中国大地上高高扬起的“科学”旗帜，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们把科学当做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文化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科学在中国近代社会上取得的这种地位的过程，虽有曲折，但仍不失为20 世纪整个世纪的主流。

1915 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已自觉地肩负起中国科学的社会责任，而且标志着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的开始。该科学社提出的宗旨

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它提倡的科学活动内容包括：“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以及“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和公益事业的进步”。它的影响所及，曾一度遍布全国。达些科学活动，不仅在中国创建了许多近代新学科，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他们以科学社团的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些专家当中，绝大部分是归国留学生，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等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后来于1927 年按照孙中山先生提议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均承袭了科学社的传统。虽说，当时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从民间模式转变为政府模式之后，其发展不能不受到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但我们亦应看到正是这种把科学组织纳入国家建制化的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全国性科学技术规划的制订，有利于国家科学发展目标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家重大发展目标上来。到30 年代，理、工、农、医各科的学系、学会和研究所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在20 世纪的前50 年，中国科学家不仅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等“本土”科学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而且在国外研修的中国科学家还在科学的诸前沿领域也做出了一些重要贡献。前者如中国地质图的绘制、中国植物图谱的编撰、水杉植物的发现、北京猿人的发现、地质力学的创立，以及传统科学遗产的整理等科学成果不仅对于中国有重要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关于中国资源分布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对于了解全球演化和人类历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后者如数论和示性类的研究、正负电子对湮灭的早期实验、恒星光谱型与温度关系的认证、铀核三裂变的发现、μ 粒子的发现、植物呼吸酶的发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行星波不稳定性概念、水的三相点的测量、联合制碱法等均是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工作。30 年代成为人们常常回顾的中国现代科学开创奠基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科学技术事业获得全新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由于1956 年制定了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诸如分子生物学、核物理学、高能物理学、高分子化学、半导体物理学、计算机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空间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发展了起来。中国科学家在几乎完全被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一批重要科学技术成果，例如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所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勘探和综合研究，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成因、过程、规律及其对东亚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及生态农业研究示范；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在陆相生油的理论指导下发现并开发了大庆油田，提出数学优选法并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大规模地推广，特

别是成功地实现了核弹爆炸实验、导弹发射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们也曾经受了改造的困惑、反右扩大化的伤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终止援助造成的困难以及“十年动乱”的破坏，但仍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民族责任感实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艰难曲折的六七十年代成为开拓者们值得回忆的英勇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以追赶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从1984 年开始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诸多探索，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高产优质杂交水稻的育成与推广，数学机械化证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棉花、油菜、烟草等新品种的培育，人造卫星及卫星应用技术的发展，数千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非线性光学晶体生长，稀土永磁材料、工程塑料，6000 米无缆自治深海水下机器人的研制，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乙肝疫苗、人生长素、干扰素及青霉素酰化酶的研制能力，以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大批科学工程装置的建成等。但到目前为止仍缺乏自主开创新领域和国际领先的独创性研究工作。当代世界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对于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中国，科学技术也必须先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我们正面临一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它为一切有信心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机会。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综合国力的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百余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把中国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创一个中国科学技术的创新时代，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为人类科学文明做出新的重大贡献。历史表明，必要的投入，遵循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的政策和组织管理，加上由爱国奉献、求真唯实、协作创新等鲜明科学文化价值导向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力量，使新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大庆油田的自主勘探与开发等，正是其中最为辉煌的例证。吴文俊院士独创地继承光大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将其数学机械化的思想与现代计算机科学相结合，做出了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开现代中国数学家开创世界数学研究新领域的先河；而袁隆平院士则在着力解决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形成的坚定信念的驱使下，冲破了当时经典理论认为的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遗传学流行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并在超级杂交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成为新世纪伊始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

者，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面向新世纪发展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为迎接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在学习和吸收国际科技发展和先进科技管理的有益经验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可忽视中国科学发展的自身特征与优势。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是借助于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认识客体，并积累、整理、分析、归纳其结果而系统表述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历史继承与创新。科学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性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果。由于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往往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的过程，逐步发展成系统的科学知识。它不但来自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更来源于科学实验。它是严谨的科学观察的记载、严格科学实验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有真理性。但科学没有终极真理，它随时接受新的事实的检验，并伴随着客观事物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有无止境的前沿。

因此，科学的意义在于发展和创新。有新的发现，对已有的知识按新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归纳，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或者用科学知识开发新的应用。进行科学创新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知识所束缚，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勇于开拓新的方向，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新的方法，开拓新的知识应用。科学的发展不但有数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在某一科学领域中，当知识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产生重大突破。这种突破可能使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使一门或几门学科得到迅猛发展。

科学是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研究活动。科学不仅仅是指已被认识的真理和知识，也是指认识真理和获取知识的探索过程。原始的科学活动寓于生产活动，后来被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活动方式也从个别科学家，转变到18 世纪以后学院式研究，到20 世纪已发展成为完全社会化、国家化和全球规模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其主体是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科学活动需要物质条件，同时更需要信息环境、文化氛围、科技人员的主观条件——知识基础、创新思想和正确的科学方法。19 世纪以后，由于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方式，显示出科学对生产力的革命性推动作用。社会对科学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需求。科学活动的规模和空前发展的速度，则表现出对社会越来越大的依赖。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正在迅速发展。现代科学已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事业。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的社会成员也空前增加，科学立法、科研管理部门、科学基金会、国立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究开发部门、科学学会、国际性科学组织……等形式不断发展，已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建

制。它树立了自己的科学目标、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道德规范、科学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它已构成了当代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与政治建制、经济建制、文化和教育建制等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文明进程。

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而认识客观世界的社会价值更在于改造世界，在于为人类带来福利，满足人类的需求。科学之所以发展成如此宏大的事业，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如此关注和重视，正是由于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自然规律的系统知识，还在于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不竭的动力。科学的价值是通过科学活动的内部结构实现的。当代科学认识活动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内部结构——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发展。其发展趋势是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转移更为迅速。基础研究的目的旨在增加新科学知识和新科学领域，而往往并不直接考虑特定的应用目的；战略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概念，系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包括重大定向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和重要公益性研究。基础和战略研究主要依靠国家支持和组织。应用与发展旨在通过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建立新的工艺、系统或服务，并从本质上去改善和更新已经在应用的那些材料、产品、设计和工艺。应用与开发的主体是企业，主要动力是市场与需求。从而科学作为整体体现了其双重的社会价值——真理价值和应用价值，表现了不同的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

进入创新时期的中国科技事业面临三项艰巨的任务：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探索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今天，科学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投入，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科学体制。自19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就已表现为“知识”和“体制”两个方面，后进者缩小差距的主要方法往往是采取了18世纪末以来有效的近代教育制度和研究建制。中国在19世纪中叶接受现代科学时，知识水平的差距近300年，而在引入先进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后，即能在100多年的时间内把知识水平的差距缩小为二三十年。对于开始进入创新时期的中国科学事业，我以为，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科技体制问题，急需建设一个能适应新世纪科技革命和市场与社会需求挑战的国家创新体系。因为创新体系本质上反映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程度，所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发挥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处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有待总结，而技术与经济、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中国与世界这些关系，正是人们普遍关心而又必须恰当解决的问题。

任何国家和科学的发展都必须以其自身的研究和发展能力为基础，只有具备

了研究和发展的基础结构，外援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催化作用。尽管现代科学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具有了较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通常可以四个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一是以投入研发的人力和财力衡量从事科技活动的规模和能力，二是以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衡量科学或知识创新成果，三是以拥有的专利件数和产业转化程度衡量技术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四是有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和有一批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大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它们大体上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化的竞争能力。如用这些指标在世界范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中国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在科学已成为高技术的先导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今天，任何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队伍，构建形成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不仅要充分尊重科学的学术自由权和自主权，激发起科学技术发展的内部动力，还要在社会上普遍提倡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企业自主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化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培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和创新体制和机制。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度重视基础科学本身的发展，为科学技术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自50年代后期以来，经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就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整理科学遗产、发展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号召。已经提前达到第二步战略发展目标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在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在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振兴中华，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速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和教育水平，实施我们已经确立了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由于人口众多而使得自然资源相对不足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开发巨大的人力资源。我们不仅必须在世界上率先实施节约资源并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还必须创造性地发展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

开创创新时代的艰巨任务要求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创造性。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更要求理性的创造思维，哲学的启迪对于科学创新思维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上启蒙哲学之于法国科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于德国科学，提供了科学受惠于哲学的典范；当代科学哲学把物质、能量和信息概括为世界三要素的观点，不仅为建立信息社会概念提供了启迪，而且加深了科学技术对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及其统一性的理解。哲学求索导致科学家们探索诸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认知的本质之类永恒的科

学难题，哲学的概括与综合的观念激励科学家们追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遗传与变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从而把局部认知转换成科学理论。唯物辩证法也是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锐利武器。

科学也不仅仅是纯粹理性的过程，任何科学创造都不能从单纯的推理和思辨中产生，而更需要现象和实验的观察与分析，也需要科学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些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无不具备这样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科学家还要有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尽管科学的进展有无止境的前沿，科学史是可以认识科学发展的轨迹及其规律的。对于科学未来的预测更多地要靠对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诸如下个世纪将会在哪些领域发生新的科学革命，哪些学科将成为未来科学新结构的重心，各个学科前沿领域会有可能发生哪些突破，哪些新的技术革命可能将因科学的新发现而引发？以唯物科学历史观思考过去，审视未未，未来的科学也必定同解决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对物质、生命、信息与认知规律认识的深化，与科学本身的综合和统一等问题相联系。诚然，科学的未来是不能完全准确预测的，但一切科学的预见实际上都是开拓与创造未来的动力。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开拓前进去迎接中国科学创新的时代。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同时也保持了一种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传统和特征，它将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这部学术大典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多维画卷。这么多中国一流科学家，他们的智慧结晶，他们的研究体验，他们的深邃视角，他们的篇篇华章，聚合为一部学术巨著。我们坚信，它将会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迈向科学辉煌的阶石。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阿基米德那句话：

“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

我以为这个支点就是：科学！

凡　例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学术门类）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学术门类）辑成一卷，字数不足一卷的，同其他相关学科（学术门类）合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和学术期刊等类别分类编排，形成系统的分类目录。

3. 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条目按本学科内容体系框架分类编排。

4. 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和学术期刊，均按时间（发生、诞生、出版、成立、创办）次序编排。

5. 各学科卷在条目分类目录之前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中国学人百年来重大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章，如“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

6. 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学术主题在有关学科卷中均设有条目，但释文内容分别按各自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　目

7. 学科（包括子学科）研究从研究综述的角度立目，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专题研究一部分从研究综述角度立目，例如：“《尔雅》研究”，一部分从研究成果的角度立目，例如：“汉语拼音方案”；学术事件以事件在学术史上的通称立目，例如：“白话文运动”；学术人物以人物的常见名字立目，例如：“王国维”、“王力”；学术名著名篇以书名、文题立目，并标注书名号，例如：“《甲骨文字集释》”；学术机构团体以全称立目，例如：“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学术期刊以刊名全称立目，并标注书名号，例如：“《方言》”。

8. 条目标题附有英文，例如：“汉语积极修辞研究（Active rhetoric in Chinese，studies of)”，有些专有名词为汉语所独有，无对应英文词，采取音译，如“《语文建设》”译为“《Yuwen Jianshe》”；学术人物条目标题英文即该人名汉语拼音（音译），例如：“袁家骅（Yuan jiahua)”。

三、释　文

9. 条目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头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10. 较长的条目释文，设置层次标题。

11.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要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排印，例如：“章太炎的《文始》是对汉语语源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所参见的条目标题未见于本条释文的，另用括号

加“参见”二字标出条目标题，例如：“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开创与发展……（参见汉语语法史研究)”。

四、参考文献

12. 在学科研究和部分重要的专题研究条目释文后附有“参考文献”，供读者参考。此文献是指在20 世纪学术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或文章。

五、索　引

13. 本书各学科（学术门类）卷均附有全部条目的汉语拼音索引、汉字笔画索引和外文关键词索引。

六、其　他

14. 本书所用学科专业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5. 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者外，一律用1956 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16. 本书所用量和单位以1994 年7 月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位》为准，个别的从习惯。

17. 本书所用数字，以1996 年6 月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为准。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

(Linguistics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林 焘

中国语言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汉代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和刘熙《释名》可以说是中国语言学的三部开山之作，自此以后，以通经解字为目的的“小学”迅速发展，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大分支，成为历代中国语言学的主流，到18世纪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高峰。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国势的衰微，已经逐步走向衰落。19世纪末，西方文化开始像潮水般涌进中国，这个势头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语言学在这个势头的影响下，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断探索如何把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中国的语言实际相结合，在探索的过程中，视野不断扩大，认识不断深入，研究的重点也逐渐从古代转向现代，从书面转向口语。100年来，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努力，到20世纪末，中国语言学已经成为多学科交错、流派纷呈的新型学科。

酝酿期：1898～1918

19世纪末，中国从惟我独尊的泱泱大国沦为向列强割地赔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纷纷向西方和日本寻求救国富民的办法，不少知识分子到西方和日本去留学，西洋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1898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从政治上动摇了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在这一年，具有维新思想的马建忠在兄长马相伯的协助下用十几年时间写成的《马氏文通》出版，这是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次有力的冲击。《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虽然在引进中不免有生搬硬套的地方，研究的对象也只局限于文言文，但开创了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的风气，并且把汉语语法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中独立出来，这是两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

献，为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开创先河。

在西方拼音文字和日本假名影响下，1892年，卢戆章为厦门音拟定的切音字《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这是第一部切音字方案。此后的20年，有近30种切音字方案陆续出版，早期以拼写东南沿海方言为主，进入20世纪以后，拼写官话音成为主流。切音字方案虽然只流行了20年，但流行范围较广，且切合实际，为注音字母的制定 和国语的推行奠定了基础。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次年民国政府成立后，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定 了汉字国定读音（国音）和注音字母，由于保守力量的反对和政局动荡不安，直到1918年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的制定和国语的推行是中国语言学摆脱传统羁绊，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实际需要的开始。

20世纪初，从日本和欧美涌进中国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日趋激烈。当时维护旧文化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蔑视提倡新文化的人，1905年《国粹学报》的发刊辞把新派学者视为"无识陋儒"，斥责他们"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新文化进入旧文化的重要堡垒"国学"更是十分困难的事。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能够在五四以前比较早地接受新文化的影响，这和注音字母的制定和国语的推行密切相关。1918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文字学音篇》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概论性的音韵学著作，其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讲解注音字母，并且用音标作为标音工具。中国语言学家已经开始走上革新的道路，为五四以后的蓬勃发展起到披荆斩棘的先导作用。中国语言学正在酝酿着新的大转变。

奠基期：1919～193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彻底摧毁了旧文化堡垒，在包括国学在内的各个文化领域，新文化都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中国语言学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崭新面貌。从五四运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将近20年的时间，是中国语言学向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的时期。

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五四以后，国语的推行和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国语运动。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扩大，研究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汉语。1924

年，为适应国语运动的需要，黎锦熙编写了《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白话文语法并形成完整的语法体系的著作，虽然所建立的语法体系基本借鉴于英语语法，但立论严谨，材料丰富，分析详尽，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几十年来，在师范教育系统一直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语法著作。

20年代初，在欧美留学的赵元任、刘复、林语堂等人先后回国，直接把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当时西方语言学的主流正在从19世纪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向结构主义语言学过渡，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实验语音学也已经走出萌芽阶段，这些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传到中国后，大大开阔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视野，中国语言学从此彻底脱离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始运用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

赵元任、刘复、林语堂等人回国后，都积极投身于国语统一运动，他们和当时国内的语言学家钱玄同、黎锦熙、汪怡一起组成“数人会”，研究并创制了国语罗马字，成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1924年，刘复的《四声实验录》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实验方法研究汉语语音的著作。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开展实验语音学研究工作。1928年，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现代的语言调查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著作，用国际音标记录汉语方言，是研究汉语方言的开山之作。中国语言学研究开始走上了科学的、现代化的道路。

1928年，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导下，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任语言组组长，确定以调查汉语方言和建立语音实验室为工作重点。在赵元任的规划和带领下，从1928年到1937年，调查了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约200处方言。赵元任1930年创制了五度制标调法，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最通行的标记声调的方法。1934年，赵元任发表了著名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以汉语、英语等语言为例，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指出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这篇文章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经典著作之一。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J.Karlgren）于1915年至1926年之间完成了四卷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汉语中古音进行了全面的构拟；在此基础上，高氏又进一步对汉语上古音进行构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上古音的著作。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1931年开始把《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成中文，由丁声树校读，于1940年出版，译文对原书作了不少订正和补充，学术价值超过原书。高本汉的论著在中国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中国语言学家在高度评价高氏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和修改的意见，林语

堂、李方桂、罗常培等人在高氏构拟的基础上对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古音构拟方法的引进彻底改变了中国音韵学的面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音韵学研究高潮。在这一高潮的推动下，近代音和等韵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一向晦涩难懂的音韵学术语和图表也都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给予了科学的解释。1936年，王力编写的《中国音韵学》出版（1956年再版时改称《汉语音韵学》），这是一部概论性的著作，扼要概述了1936年以前中国音韵学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对音韵学的普及起过重要的作用。

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出版，以丰富的古代和现代汉语修辞例证为基础，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参考中外修辞理论，对汉语修辞方式作出系统面详尽的分析归纳，创立了崭新的修辞学体系，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甲骨文的出土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98年甲骨文出土后经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整理和考释，到30年代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文字学”，50年代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唐五代写本和刻本的《切韵》类韵书的残卷，是研究《切韵》的珍贵资料，30年代经刘复、罗常培、魏建功整理汇集成《十韵汇编》；敦煌文献中还蕴藏着大量的与近代汉语研究有关的资料，这些文献经敦煌学者几十年的整理汇集编目，才有条件充分运用到近代汉语研究中。

坚持期：1937～1949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学相当顺利地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正在有可能取得更加令人鼓舞的成就的时候，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全民抗日战争开始，中国语言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阻碍，国语运动、方言调查和新建立起的现代化语音实验室工作都因战争陷于停顿。1945年抗战胜利后，紧接着是三年内战，中国语言学家在这十几年的艰苦环境中仍旧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动中国语言学缓慢地向现代化方向前进，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抗战前夕，王力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已经对当时汉语语法研究因袭套用英语语法的风气提出批评，并且初步探讨了汉语语法特点和研究方法。这篇文章的发表，说明汉语语法研究正在酝酿着一次新的飞跃。

到30年代末，陈望道、方光焘等人在上海发起了一场文法革新的讨论，对中国语法研究机械模仿西洋语法的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原则问题。40年代，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先后出版，这几部语法专著都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对汉语语法进行全面分析，形成各自不同的语法体系，汉语语法研究从过去以模仿西洋语法为主开始走上了有理论指导的各家争鸣的新阶段。吕叔湘在40年代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论文，开拓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语言学家随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内迁到抗战的后方中国西南地区，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从1940年起恢复了汉语方言调查工作，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西南地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受到了重视。调查重点转移到四川和云南，这项调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一些语言学家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壮侗、苗瑶、藏缅等语族的语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出版了李方桂《龙州土语》《莫话记略》和罗常培《贡山俅语初探》等专著，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音韵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内容更趋于深入细密，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和陆志韦《古音说略》先后在四川和北平出版，这两部专著都是在高本汉的构拟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董书所列出的上古音表是当时最严整完备的上古音体系，陆书用统计方法分析构拟古音，为音韵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陆志韦在40年代末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论文，大大推动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发展期：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次年就成立了语言研究所，直属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1985年改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将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向现代化方向前进。中国政府制定的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大语文政策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指针，面向社会实际需要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方向。

针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相当普遍存在的语言使用混乱现象，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传播语法知识，指导语言的运用。在社论的号召下，社会上很快就形成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1952年《语法修辞讲话》出版了单行本，

多次再版，成为全国最畅销书之一。各地也纷纷出版普及性的语法读物。为了适应中学语法教学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由张志公主编，于1956年出版了《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这个系统是综合各家语法系统编写成的，因此不可能十分严谨完整，但简练通俗，非常适合中小学语法教学，出版后被广泛采用，对普及汉语语法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紧接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这两个会议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决定以“普通话”的名称代替过去使用的“国语”，并在全国大力推广，确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会议并建议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全面讨论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为了配合普通话的推广，建议在两年时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工作。

两个会议之后，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和试行，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实施。方言普查工作也在同年基本完成，共调查了1849个市县的汉语方言，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培养了专门的方言调查人员参加这项调查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也在大力展开，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举办了语言调查训练班，组成七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到1959年共调查了42个民族的语言。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这10年的时间内，在正确的语文政策指引下，中国语言学和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结合，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普通话的推广都是影响到全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大事，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人才，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料，也大大普及了语言学的知识。这个时期正处在全国都在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中，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50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掀起了学习的热潮；苏联语言学论著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过去在中国流行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则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到5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大辩论，对言语是否有阶级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对西方语言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语言学理论虽然这时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当时只是向苏联学习，没有能正确对待西方

文化以及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因此发展实际上是相当缓慢的。

50年代，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不再采用过去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课程系列，改为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四大类，分设相应的教研室，突出了理论和实际、共时和历时的分野。这个教学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对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方向的分工都产生深远的影响。1954年王力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汉语史”课程，讲义是在当时苏联语言学的影响下编写的，1958年以《汉语史稿》的名称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全面阐述汉语发展历史的著作，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40年代以后，西方语言学处于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在美国盛行的描写语言学派思想和方法到五六十年代传到中国，这个学派倡导的分析语言结构的方法比较严谨客观，受到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早在1948年，赵元任在美国所编写的汉语教材《国语入门》（英文）的“序论”中已经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方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1952年，李荣把“序论”译成汉语，以《北京口语语法》为书名介绍到国内。1952年至1953年，《中国语文》杂志连载了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名义编写的《语法讲话》，也是借鉴结构主义学派的分析方法全面分析汉语语法结构。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语法讲话》经过近10年的修订，于1961年改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正式出版，由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八人署名。这部著作着重在语言事实的分析，例证丰富，分析深入，形成相当严密完整的语法体系，为5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从1953年到1957年，在《中国语文》和《语文学习》等杂志上，共开展过四次全国性的语法专题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和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这几次讨论虽然没有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加深了对汉语语法特性的认识，活跃了学术讨论的自由空气，但有的文章已经受到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出现了乱扣帽子，不以理服人的现象。1955年出版了胡附、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主要从理论角度探讨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具有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方向的作用，受到语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在“左”的思潮日益泛滥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眼光敏锐的语法学家冒着被批判的危险，试着用西方语言学新兴的方法为汉语语法探求新的研究途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朱德熙。从1956年到1962年，朱德熙连续发表了《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论句法结构》三篇论文，结合汉语特点逐步引进结构主义学派和生成语法学派的一些研究方法，引起了语法学界相当大的震动，并由此展开了相当深入的讨论。

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音韵学研究高潮到50年代初仍有所延续，李荣40年代所

写的学位论文《切韵音系》在1952年出版，这部著作以新发现的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为依据，对自高本汉以来各家构拟的《切韵》音值做了相当全面的考察，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修订意见，是对50年代以前《切韵》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在此以后，中国政治运动频仍，极“左”思潮逐渐泛滥，在“厚古薄今”“崇洋媚外”的批判声中，音韵学研究仍在艰难地前进。为了做到“古为今用”，配合汉语方言调查等工作，出版了一些普及性的音韵学著作，研究工作也不再以西方引进的古音构拟为重点。罗常培、周祖谟1958年出版了《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填补了从《诗经》音到《切韵》音之间韵部分合的空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分别展开了《切韵》音系的性质和《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两次专题讨论，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两次讨论活跃了音韵学研究的学术空气，拓宽了研究思路，也加深了对中古音和近古音的认识，尤为难得的是有不少年轻学者参加。这个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不断有新的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出土，大大丰富了古文字的研究内容，对古文字的考释和断代研究都有令人瞩目的进展，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容庚等老一辈文字学家在这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言研究在50年代普查的基础上到60年代有较大的提高，语言研究所在丁声树、李荣的率领下对河北昌黎方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1960年编写成《昌黎方音志》一书出版，该书调查内容丰富、描写分析精细，为方言调查工作树立了样板。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于1962年出版了《汉语方言字汇》，1964年又出版了《汉语方言词汇》，这两部书用表格形式汇集汉语各主要方言读音和词汇的特点，虽然选材和调查还有不够精密之处，但内容全面，便于比较研究，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停顿期：1966～1978

1966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受到空前迫害，学术活动从1966年到1978年的十几年间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而在这时期，西方语言学又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已经让位于新兴的生成语法学派，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实验语音学有了质的飞跃，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也逐渐成熟，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新的交叉学科，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已经大大拓宽。海外新一代研究汉语的语言学家也正在崛起，在新兴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发表了许多思路开阔、见解新颖的论著。“文化大革命”以前，经过两三代中国语言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

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的差距本来已经在逐步缩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又使这个差距迅速扩大，差距之大甚至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繁荣期：1979～1999

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语言学家也开始有了比较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语言学新生力量。经过老、中、青三代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十年。198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语言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语言学会，专科性学会如“音韵学研究会”、“古文字研究会”、“汉语方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等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会一般两三年举行一次学术会议，没有正式成立学会的如语法学和语音学也经常举行类似的专科性会议。语言学方面的期刊杂志80年代以前只有《中国语文》等三四种，80年代以后增加到近10种。20世纪的最后20年成为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一些老一辈语言学家在这20年中先后逝世，他们为本世纪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直到晚年还发挥余热，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他们最后的贡献。我们将永远感谢他们，怀念他们。王力从70年代末开始对《汉语史稿》作全面的修订，分为《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三部书在80年代陆续出版，把他一生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留给后人。吕叔湘晚年写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于1979年出版，以简洁明快的文字对近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作出纲要式的小结，摆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深入，引人深思，为今后语法研究指明了方向；1985年，吕叔湘又把40年代的旧稿《近代汉语指代词》整理补充出版，对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旅居美国的赵元任在1968年出版了《中国话的文法》（英文），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口语语法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材料丰富，见解深刻，对汉语语法研究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吕叔湘以古稀高龄把这部巨著节译成中文，于1979年以《汉语口语语法》的书名出版（1980年另有丁邦新的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在香港出版）。李方桂1971年在台湾出版了《上古音研究》，短短的篇幅概括出近百年国内外上古音研究成果，提出自己新颖而极具启发性的见解，这部著作1982年在大陆出版，在音韵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李方桂于1977年出版的《台语比较手册》（英文）是他一生研究台语的总结性著作，为原始台语构拟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对侗台语族比较研究具有

重大的推动作用。

实验语音学研究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得到了向所未有的大发展，从而使语音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培养出新型的语音学人才。80年代语音研究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用现代语音实验方法分析普通话元音、辅音、声调、轻重音和语调等，为言语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语音特征参量，并且初步研制成功了普通话语音合成系统。1989年出版的吴宗济、林茂灿主编的《实验语音学概要》相当全面地介绍了这个时期国内外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语音研究内容又深人了一步，着重在普通话协同发音和语流音变等方面的实验分析，语音合成技术更有了明显的进步，清晰度和自然度都有很大提高，语料库的建立和标记手段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在此期间，区别特征理论、生成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等西方新兴的音系学理论陆续介绍到中国，一些语音学家把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语音研究，为汉语语音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汉语词汇研究这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各种综合性和专科性词典大量涌现，形成了词典编纂的热潮。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编写，几经波折，直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词典，由吕叔湘、丁声树先后任主编，词典体例严谨，释义精当，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好评。为了适应近年来汉语词汇迅速发展的形势，经过修改补充，1997年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新版《辞源》和新版《辞海》也在80年代陆续出版。此外，还集中了一些语言学家的力量编写出《汉语大辞典》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收词语37万条，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部汉语辞典；《汉语大字典》收字45000个，是收字最完备的汉字字典。80年代以来出版或修订的这几部词典和字典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虽然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不到20年的时间能连续出版这样几部大型词典和字典，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这个时期汉语词义研究正处于新的探索阶段，60年代西方开始流行的义素分析法开始引入汉语词义研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随着社会上新词语不断大量出现，对新词语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成为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语法研究在80年代以后发展最为迅速，也最为活跃。朱德熙1992年逝世前陆续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语法答问》《语法丛稿》四本书，汇集了他一生研究汉语语法的成果。朱德熙几十年不断借鉴西方一些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建立起了崭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方面都作出重要的贡献，对8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有深远影响。胡裕树、张斌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汉语语法研究》对一系列与汉语语法研究方向

有关的根本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的观点受到语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在老一辈语法学家的引导下，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语法学者，他们思想活跃，敢于创新，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新兴各学派的语法理论，探索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新思路，开拓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领域，目前从认知语法、配价语法、功能语法等方面人手研究汉语语法已经蔚然成风，很有可能为汉语语法研究开创出新的局面。在这些中青年语法学者的努力下，对能充分反映汉语语法特点的虚词、动词、句型、复句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高水平的成就；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关系如歧义结构、语义指向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横向的方言语法研究和纵向的古今语法比较研究也开始成为研究的新热点。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局面，成为中国语言学中最活跃、最繁荣的分支。汉语修辞研究在这个时期也对汉语修辞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段落篇章和语体风格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得比较早。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1981年成立了“汉语方言学会”，这两件事对方言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交流作用。方言调查也从一般性的语音描写逐步走向深化，对方言中的文白异读、连读变调、儿化音变等现象都有相当深入的调查分析报告发表。各地方言的调查点大大增加，调查方法也日趋精确细密，主要的大方言区如吴语、闽语、粤语（珠江三角洲）、晋语、赣语等都有相当全面的综合调查报告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把三四十年代在云南、四川和湖南调查的方言资料整理成三部调查报告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中国第一部语言地图集，分区明确，方言层次分明，集中反映了当前汉语方言的研究水平。过去一直是方言研究薄弱环节的方言词汇和语法研究这时期也取得很大发展，各地方言词典陆续出版，有地点方言的，也有大方言区的。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历时八年，到1999年4月，分卷本41种全部出齐，把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时期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取得丰硕的成果，1987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本，共收入59种少数民族语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都作出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新水平。

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语言学这个时期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80年代分别成立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研究队伍大大扩大，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古文字学随着考古发掘中各时期的古文字大量出土，形成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牍帛书在内的相当完整的

古文字研究体系，为汉字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近代汉语研究一向是中国语言学的薄弱环节，80年代以后异军突起，一跃成为研究热点，大量的研究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论著发表，一些文章吸取海外的研究成果，使得研究视野明显扩大。对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整理也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这个时期由于充分利用了敦煌变文、笔记小说和禅宗语录等资料，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的成就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音韵学这时也处于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发表的文章数量超过了前80年的总和，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有新的突破。古音构拟又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在方法上比较重视亲属语言的比较和对音资料的运用，并且已经开始涉及周代以前远古汉语和所谓“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这是古音构拟的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历代诗文用韵研究是这时期音韵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直至宋元的诗文，包括敦煌变文的用韵，都有学者进行钩稽分析归纳，为了解汉魏以后1000年间汉语韵部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同样有很大发展，不少论著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相结合，拓宽了研究思路，对古代虚词和句法的研究水平比过去有显著的提高，除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论文以外，还出版了好几部专著。断代和古典籍专书语法研究也是这时期的一大特点，《诗经》《左传》《楚辞》《吕氏春秋》等书的语法研究都有专书出版，从对专书的语法剖析显现出不同时代的语法特点，使古代语法研究更加细密严谨。

这个时期的国际交流活动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中国的语言学家不断到国外去学习和访问，国外著名语言学家也有不少到中国来讲学和交流经验。国际上重要的语言学会议目前差不多都有中国的语言学家去参加，一些会议还到中国来举行。国外语言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80年代以后也形成了向所未有的高潮，从20年代西方语言学经典著作到现代国外各重要语言学派的论著几乎都有中译本出版，并有专门刊登国外语言学新成就和动态的刊物《国外语言学》（1999年起改名《当代语言学》），这些翻译和介绍工作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向在这个时期也日趋成熟，发表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论著，大大拓宽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国语言学已经置身于国际语言学之中，融入国际语言学的大潮流了。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各国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迅猛增加。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在60年代每年有3000多人，到90年代末猛增到每年5万人左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迅速发展，1987年在中国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这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际性语言学术团体，已有41

个国家的900多位学者参加。研究这方面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的论著日益增多，形成一门新型学科“对外汉语教学”，20年来在人才培养、理论建设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成为中国语言学一支十分有前途的新兴力量。

5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影响到所有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自然也不例外。新兴的言语工程技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语音识别与合成、语言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在研究语言，都迫切需要语言学家共同合作来完成。中国语言学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在言语工程技术专家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下，20年时间也取得了飞跃的进展，汉语语音识别与合成、汉语自然语言理解、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语料库的建设、现代汉语字频统计、现代汉语词频和句型频度统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项目的进行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语言学本身的科学研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言语工程技术专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加入了汉语研究的行列。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兴起和言语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发生在本世纪最后20年，对中国语言学今后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是中国人民饱经忧患的100年，也是中国人民一直充满着希望的100年。这个世纪开始时，现代西方文化已经在中国传播，并且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的冲撞，这个冲撞过程贯穿整个世纪，在这期间，中国人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西方传来的先进思想和方法，并且逐渐吸收甚至融合到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去。中国人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转变之大，为千余年来所未有。回顾这100年发展变化过程，是相当艰难曲折的，战争、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们失去了近半个世纪的宝贵时间，“左”倾思潮在五六十年代以后的泛滥又使我们没有机会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难以分清学术思想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根本扭转。中国语言学在这艰难曲折的中西文化冲撞过程中一直能够站在适应和吸收的前列，早在30年代初就已经彻底摆脱了文字、音韵、训诂只是经学附庸的地位，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学。1937年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几经波折，40年间起起伏伏，艰难前进，直到本世纪的最后20年，才开始有比较民主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经过老、中、青三代语言学家20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的中国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具有许多分支的现代化的语言科学，能够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国际先进语言学接上轨，跻身于国际语言学之林而并无逊色。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彻底改变了2000年来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面貌，为中国语言学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腾飞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目　录

出版说明…………………………………………………………………………（1）
序一………………………………………………………………季羡林（1）
序二………………………………………………………………路甬祥（17）
凡例……………………………………………………………………………（1）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 ……………………………………………………（1）
条目分类目录…………………………………………………………………（1）
正文……………………………………………………………………………（1）
条目汉语拼音索引…………………………………………………………（334）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339）
Keyword Index of Entry（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344）

条目分类目录

说明 1. 语言学分类目录中的学科条目与学术专题条目以语言学学科体系为参照系编排，供查阅一个分支及其有关主题。

2. 为了较为完整地反映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既作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条，又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条；读者欲进一步了解该分支学科的相关专题，请查阅《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民族学》卷。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 …………………（见本目录前专文）

理论语言学研究 ……………………… 1

【学术专题】

历史语言学研究 …………………… 6

社会语言学研究 …………………… 10

文化语言学研究 …………………… 11

心理语言学研究 …………………… 13

语义学研究 ………………………… 15

音系学研究 ………………………… 16

语用学研究 ………………………… 19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 20

“词汇扩散”理论 ………………… 22

汉字认知研究 ……………………… 24

双语研究 …………………………… 25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 27

【学术专题】

普通话语音规范研究 ……………… 32

普通话音位系统研究 ……………… 34

汉语语音实验研究 ………………… 36

汉语轻音和重读研究 ……………… 38

汉语连读变调研究 ………………… 39

儿化韵研究 ………………………… 40

汉语语调研究 ……………………… 41

节奏和韵律研究 …………………… 42

汉语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研究 …… 43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 44

【学术专题】

汉语构词法研究 …………………… 49

汉语词义研究 ……………………… 51

汉语词汇规范研究 ………………… 53

汉语词典编纂 ……………………… 54

汉语简称和缩略语研究 …………… 55

汉语新词新语研究 ………………… 56

汉语外来词研究 …………………… 57

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 59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59

【学术专题】

汉语词类研究 ……………………… 65

汉语虚词研究 ……………………… 71

汉语复句研究 ……………………… 72

汉语歧义研究 ……………………… 73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发展 ………… 74

汉语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 ………… 76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 77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 79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 ………………… 80

汉语的话语分析 …………………… 80

文法革新的讨论 …………………… 82

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 …………………… 83

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 ………… 84

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 ………… 85

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 …………………… 85

汉语方言研究 ………………………… 86

【学术专题】

汉语方言分区研究 …………………… 89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 92

官话研究 ………………………………… 95

吴方言研究 ……………………………… 96

湘方言研究 ……………………………… 98

赣方言研究 ……………………………… 98

粤方言研究 ……………………………… 99

客家方言研究 ………………………… 100

闽方言研究 …………………………… 102

晋语研究 ……………………………… 103

汉语方言普查 ………………………… 104

现代汉字研究 ………………………… 105

【学术专题】

汉字结构研究 ………………………… 109

汉字整理和汉字规范研究 ………… 111

文字改革和简化汉字 ……………… 113

字量统计研究 ………………………… 114

汉字输入研究 ………………………… 116

注音字母 ……………………………… 117

国语罗马字 …………………………… 119

拉丁化新文字 ………………………… 121

汉语拼音方案 ………………………… 122

汉语拼音正词法 ……………………… 124

汉语修辞研究 ………………………… 126

【学术专题】

汉语辞格研究 ………………………… 129

汉语语境研究 ………………………… 131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 ………………… 133

汉语语体风格研究 ………………… 134

汉语积极修辞研究 ………………… 137

汉语消极修辞研究 ………………… 139

汉语音韵学研究 ……………………… 141

【学术专题】

上古音研究 …………………………… 144

中古音研究 …………………………… 147

《切韵》研究 ………………………… 150

等韵研究 ……………………………… 152

近代音研究 …………………………… 153

《中原音韵》研究 ………………… 155

明清北音研究 ………………………… 156

汉语语音史研究 ……………………… 157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 158

【学术专题】

训诂学研究 …………………………… 163

汉语词汇史研究 ……………………… 165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7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8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 170

古代专书词汇研究 ………………… 171

古代专书词典编纂 ………………… 172

《尔雅》研究 ………………………… 173

《方言》研究 ………………………… 174

《说文解字》研究 ………………… 175

《释名》研究 ………………………… 176

声训研究 ……………………………… 177

反训研究 ……………………………… 178

同源词研究 …………………………… 178

联绵字研究 …………………………… 179

通假字研究 …………………………… 179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 180

【学术专题】

汉语语法史研究 ……………………… 187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 189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 191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 192

古汉语虚词研究 ……………………… 194

古汉语词类研究 ……………………… 195

古汉语句型研究 ……………………… 197

古代专书语法研究…………………… 199
汉语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200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 201
《马氏文通》研究 …………………… 202
古文字学研究……………………… 203
【学术专题】
甲骨文研究…………………………… 207
金文研究……………………………… 211
战国文字研究………………………… 214
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216
文字学史研究………………………… 217
应用语言学研究…………………… 218
【学术专题】
自然语言理解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
…………………………………… 222
汉语字频和词频研究………………… 224
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研究……………… 226
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227
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228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230
汉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 234
中国语文现代化……………………… 23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236

【学术事件】
白话文运动…………………………… 243
国语运动……………………………… 244
大众语运动…………………………… 245
现代汉语规范化……………………… 246
推广普通话…………………………… 248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249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250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250
【学术人物】
劳乃宣………………………………… 251
卢戆章………………………………… 252
王　照………………………………… 252
罗振玉………………………………… 253
章太炎………………………………… 254
王国维………………………………… 255
杨树达………………………………… 255
黄　侃………………………………… 256
钱玄同………………………………… 257
沈兼士………………………………… 257
黎锦熙………………………………… 257
陈望道………………………………… 258
刘　复………………………………… 259
郭沫若………………………………… 260
赵元任………………………………… 260
陆志韦………………………………… 262
容庚…………………………………… 262
董作宾………………………………… 263
于省吾………………………………… 264
方光焘………………………………… 264
罗常培………………………………… 265
王　力………………………………… 266
唐兰…………………………………… 267
魏建功………………………………… 268
李方桂………………………………… 268
商承祚………………………………… 270
张世禄………………………………… 270
岑麒祥………………………………… 271
袁家骅………………………………… 271
吕叔湘………………………………… 272
陆宗达………………………………… 273
丁声树………………………………… 273
陈梦家………………………………… 274
董同龢………………………………… 275
高名凯………………………………… 275
胡厚宣………………………………… 276
周祖谟………………………………… 277
周法高………………………………… 277
蒋礼鸿………………………………… 278
俞敏…………………………………… 278

张志公 ………………………………… 279
朱德熙 ………………………………… 279
【学术名著名篇】
《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 …
………………………………… 280
《殷虚书契考释》 …………………… 280
《辞源》 ……………………………… 281
《中华大字典》 ……………………… 281
《国文法草创》 ……………………… 282
《国文法之研究》 …………………… 282
《国语学草创》 ……………………… 283
《修辞格》 …………………………… 283
《四声实验录》 ……………………… 284
《新著国语文法》 …………………… 284
《金文编》《金文续编》 …………… 285
《现代吴语的研究》 ………………… 285
《词诠》 ……………………………… 285
《高等国文法》 ……………………… 286
《宋元以来俗字谱》 ………………… 286
《厦门音系》 ………………………… 287
《修辞学发凡》 ……………………… 287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288
《十韵汇编》 ………………………… 288
《比较文法》 ………………………… 289
《国音常用字汇》 …………………… 289
《卜辞通纂》 ………………………… 290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 290
《辞通》 ……………………………… 291
《古音系研究》 ……………………… 291
《辞海》 ……………………………… 291
《国语辞典》 ………………………… 292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 292
《临川音系》 ………………………… 293
《中国文法论》 ……………………… 294
《中国文法要略》 …………………… 294
《联绵字典》 ………………………… 295
《中国现代语法》 …………………… 295
《中国语法理论》 …………………… 296
《上古音韵表稿》 …………………… 297
《广韵声系》 ………………………… 298
《古音说略》 ………………………… 29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298
《汉语语法论》 ……………………… 299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 299
《语法修辞讲话》 …………………… 300
《新华字典》 ………………………… 300
《诗词曲语词汇释》 ……………… 301
《汉语史稿》 ………………………… 301
《汉语语法论文集》 ……………… 302
《语法和语法教学》 ……………… 302
《殷虚卜辞综述》 …………………… 303
《切韵音系》 ………………………… 303
《普通语音学纲要》 ……………… 304
《汉语的构词法》 …………………… 304
《等韵源流》 ………………………… 305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 305
《中国古代语法》 …………………… 306
《汉语方言概要》 …………………… 306
《昌黎方言志》 ……………………… 307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 307
《汉语方音字汇》 …………………… 308
《语言论》 …………………………… 308
《普通话发音图谱》 ……………… 309
《现代汉语修辞学》 ……………… 309
《汉语方言词汇》 …………………… 310
《甲骨文字集释》 …………………… 310
《中国话的文法》 …………………… 311
《上古音研究》 ……………………… 311
《现代汉语词典》 …………………… 312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312
《甲骨文字释林》 …………………… 313
《现代汉语八百词》 ……………… 3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314
《马王堆汉墓帛书》 ……………… 315

《语法讲义》 ………………………… 316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 317
《甲骨文合集》 …………………… 317
《唐五代韵书集存》 ……………… 317
《殷周金文集成》 ………………… 318
《近代汉语指代词》 ……………… 318
《动词用法词典》 ………………… 319
《汉语音韵史论文集》 …………… 319
《实验语音学概要》 ……………… 320
《汉语语法研究》 ………………… 320
《中国语言地图集》 ……………… 321
《语音探索集稿》 ………………… 321
《汉语大字典》 …………………… 322
《语法研究和探索》 ……………… 322
《汉语大词典》 …………………… 323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 323
【学术机构团体】
读音统一会……………………………… 324
国语统一筹备会………………………… 32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325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326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326
中国语言学会………………………… 327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327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329
【学术期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29
《中国语文》 ………………………… 329
《文字改革》 ………………………… 330
《语言学论丛》 ……………………… 330
《国外语言学》 ……………………… 330
《方言》 ……………………………… 331
《语言教学与研究》 ………………… 331
《汉语学习》 ………………………… 331
《语文研究》 ………………………… 332
《语言研究》 ………………………… 332
《中国语言学报》 …………………… 332
《语文建设》 ………………………… 332
《世界汉语教学》 …………………… 333
《语言文字应用》 …………………… 333

理论语言学研究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f)

理论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原理和演变规律，亦称普通语言学、一般语言学。

汉语研究有悠久的传统，但多着重于一字一音的研究，关注字义的注疏，而缺乏理论、方法的系统论述。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国人学习西方建立于印欧语研究的现代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才开始进行语言理论的研究。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使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打上了外来的印记。因此，如何使西方的语言理论适合汉语的研究，或如何根据汉语的特点吸收西方语言理论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就成为百年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建立和发展的主线。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求索、转轨、创新。

一、起步　“五四”前后，中国开始了语言理论的研究，不过初始时期只是引进西方的语言理论。初期引进有彼此独立发展的两种倾向：

一种是偏重于西方语言理论的介绍，不大关心汉语具体现象的研究，学界通常把此类介绍称之为理论语言学，代表作是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23)、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1930)、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1)和《语言学概论》(1934)等。其中写得最好的应推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它不仅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而且能联系汉语讨论语言理论问题，像语言的起源、发展，以及方言、共同语、汉语在语言学上的地位等都有具体的论述。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这种中西结合的语言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发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语言理论的论著只偏重于概论性语言学知识的介绍，缺乏真正的研究。

另一种倾向是借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但不直接讨论语言理论问题。这一方面有不少有成效的“结合”成果。如高本汉以及后来的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等人的音韵和方言研究。他们在继承中国小学传统的《切韵》字音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研究汉语的音韵史，在古音拟测、方言描写、历史比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汉语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语法是20世纪以来汉语研究用力最勤的一个领域，虽多仿效西方，但“五四”时期已出现独立探索的萌芽，例如陈承泽的“标语－说明语”（相当于现在的“话题－说明”）的提出，刘复对转换分析的探索等。刘复在《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1920初版，1924四版)中还用数学公式来描写语法结构。这些方法的运用要比西方语言学早好些年，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发展。到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虽是主要根据西方叶斯泊森的“三品说”和马伯乐的思想，但能突出语义的地位，努力揭示汉语“与世界诸族语的相异之点”。如王力提炼出的能愿式、处置式、使成式、递系式等句型，高名凯的“汉语实词无词类”说，吕叔湘对汉语指称范畴“有定/无定”和动相范畴“方事/既事/起事/继事/先事/后事”的研究等都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吕叔湘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中明确提出动词有单系、双系之分（三系没有明说，但已隐含于文中），

比泰尼埃尔出版于1959年的“价理论”著作也要早十余年。可惜的是，中国学者总是视线向“外”去寻找理论，忽略了向“内”的挖掘。上述作者和当时的理论语言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方法在理论上的创新价值，没有使它们成为适用于更多语言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更未能成为新的语言整体理论模型的一部分。这样，这些研究成果也就只能属于汉语音韵、方言、语法等具体领域，难以归属于理论语言学。

从无到有，中国理论语言学在20世纪的前50年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一阶段的理论语言学实际上还未成为独立的领域，但在西方理论启发下汉语研究的成果以及理论上的遗憾却为中国理论语言学以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启迪。

二、求索 1949年以后，引进理论的方向由西方转向苏联。这一时期理论语言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对苏联语言学的大辩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语言理论以此为契机受到普遍的重视。除了翻译出版苏联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等著作之外，我国也相继出版了自己的语言理论专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1954上册，1955下册；1957出版增订本）、朱星的《语言学概论》（1957）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合编的《语言学引论》（1958）。这些著作受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比较大，内容偏多、偏杂、偏难，介绍重于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1962年，高名凯、石安石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加强了基本理论讲授和基础知识学习的内容。尽管今天看来苏联语言学概论课的痕迹还比较明显，但基本达到了介绍基础理论知识和结合汉语事实两方面的均衡。除“概论”外，还出版了一些有关“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语法理论”方面的专著，如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1957）和《语言学史概要》（1958），高名凯的《语法理论》（1960）和《语言论》（1963）。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在语言学的刊物上展开了讨论，如词类问题、语言演变的原因、语言与言语等。语言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领域，到60年代初大体已具雏形。当时的代表人物，北方是北京大学的高名凯和岑麒祥，南方是南京大学的方光焘。他们三人对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建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三人早年都留学法国，都崇尚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理论渊源隶属于所谓“大陆学派”。他们的理论研究各有自己的侧重。高名凯偏重于理论研究，其代表作就是《语言论》。高名凯思路敏捷，敢于提出问题，解放后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论争，如汉语的词类问题、语言与言语问题等，差不多都是他首先发难的。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家。岑麒祥的语言理论研究偏重于语言学史，《语言学史概要》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方光焘自己很少写文章，一些重要的观点大都反映在他的学生黄景欣、施文涛等的论著中。他的研究重点与高、岑有重大的差异，主要是想根据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总结汉语研究的经验。这种总结是语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西方语言理论与汉语研究实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之一，起步时期的遗憾就是因为缺少了这方面的探讨。

50、60年代的语言理论研究是在“一边倒”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弱点。从《马氏文通》以来，从事音韵、语法具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而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历史比较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使

中国的历史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使是争论比较多的语法研究，40 年代的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上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而在 50 年代“一边倒”学习苏联语言学之后，语言理论研究却在这方面倒退了一大步。这一方面说明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由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而出现的两大弊端是阻碍我国理论语言学正常发展的绊脚石，教训至为深刻。

三、转轨　1978 年以后，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渐次消失，和国外语言学的联系也逐步加强，这就为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结合”不是“西方的理论＋汉语的例子”，而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精神，结合汉语的特点，描写和解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结合”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尽量深入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炼相应的理论假设，而从事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能自觉地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实际的语言现象；另外，原来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随着中外语言学联系的加强也有很多人加入语言理论研究的行列。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共同探索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使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逐步摆脱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进入了一个新的转轨时期。

“结合”的第一步体现在总结前辈在“结合”道路上的经验与教训。1978～1981，徐通锵、叶蜚声一起考察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译音对勘和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1980)、《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1980、1981)，求索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他们从这种总结性的研究中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因而成效不理想；一般的语言理论研究还无法摆脱西方语言理论的阴影，前进的道路艰苦而漫长。

总结可以成为前进的出发点，重要的还是需要对汉语进行独立的、具体的研究，提炼出相应的规律。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语言学概论性的著作，计有 20 多部。但由于语言研究重新起步，编写的质量都不是很理想。比较起来，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1) 还算差强人意。这本书以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为纲组织有关的语言材料，使全书有一条清楚的线索，重点结合汉语介绍结构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克服了以往“概论”课教材“拼盘”式的概念堆积的弊端。

进入 80 年代中期，各个方面的语言研究相继展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是：不再在“语言学概论”的编写上兜圈子，重点转向专题性的研究；逐渐摆脱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机械搬用，努力在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设法使“结合”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1991)、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1991) 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1992) 等。

中国是历史语言学的大国，但只研究文

字、音韵、训诂，没有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以及其他一系列论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两点重要的进展。第一，以汉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语言学继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之后又补充了一种新的音变方式，并据此对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提出了一些补正性假设。第二，通过对汉语方言材料的具体分析，发现了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与语音现象的易变性之间相互制约的一些规律。这些发现吸收了当代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关于“社团内横向的共时差异反映有时间长度的纵向历时变化”、“正在进行的音变与历史上已完成的音变在演变机制上相同”等统一共时和历时的理论的精华，但更强调了动态演变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对补正该理论有重要的价值。

词汇语义研究是80年代以后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带头人是刘叔新。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1987）和撰写的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否定汉语构词法的语法性质，认为“复合词的结构无论就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是词汇性的”。他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对以往的语法构词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展开词汇性造词法的研究，总结出结合法、叠连法、改造法、转化法等构词法理论。向传统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荐继刘叔新之后又撰写了《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词汇的研究进行了一次理论性的探索。语义学方面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批论著，比较重要的有徐烈炯的《语义学》（1990）、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1992）、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1992）、石安石的《语义论》（1993）、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1996）、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1997）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研究词汇和语义的问题，使这一原本很薄弱的领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词汇语义研究基本上是步西方语义学的后尘，与我国有悠久传统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没有关系，因而不容易作出有特色的理论突破。在这方面如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还有待于来日的探索。

语法一直是《马氏文通》以后汉语研究的一个重点，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汉语自己的语法理论体系。正如吕叔湘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科学没有国界，理论和方法如果适用于汉语的研究，自然可以“跟着转”，问题是要结合汉语的实际，结合得好，就能挖掘出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如朱德熙根据分布原则从形容词中区分出了一类西方语言没有的状态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和英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我们到80年代才开始“跟着转”，现在还鲜有联系汉语实际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80年代在结合方面取得一些明显进展的当推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这本书除了一部分评述当前语言学的发展之外，主要是用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英语和汉语，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其中《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和《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是两篇代表作，前者着眼于动词，他引进国外语法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术语对汉

语语法中的时间范畴重新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汉语中的时相（phase）、时制（tense）、时态（aspect）各自的形式表现，引发了汉语时间问题的研究。后者着眼于名词，结合语用讨论了“±有指”、“±定指”、“±实指”、“±通指”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方法和语法特点，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汉语的句法和话语。和陈平相似的研究还有沈家煊，他的《“有界”和“无界”》（1995）、《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1997）等论文以及其他有关汉语语篇结构的研究都能较好地运用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来解决汉语的问题。他们都在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这是一部重要的语法理论著作，它从认知的角度对一系列的语法现象进行语义的解释。全书从“连续和离散”、“定量和不定量”两个方面全面梳理汉语的语法结构，找出其间的语义结构规律，开创了一条重解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途径。这种研究思路今后可能很有发展前途。

1978年以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在“结合”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有分量的专题性论著不断涌现，求索时期的那种脱离实际的泛论和空论已经没有市场。这些进展无疑可以成为中国理论语言学向新的目标前进的基础。

四、创新　90年代以后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并与汉语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上继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加强了理论的思考。徐通锵提出了与90年代前学界一般认识完全不同的新见解，他认为，现在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大体上都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多年来难有突破，足以说明这些理论尚不“普遍”。以印欧系语言理论为基础去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是一种方向性的失误。吸取西方理论中于我有用的精神，立足于以汉语自身的结构去提炼理论，才是“结合”的正确途径。《语言论》（1997）是他的代表作。目标是试图建立新的基于汉语实际的“字本位理论”，核心观点是，汉语和印欧语为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汉语属语义型，结构关联是以“小”制“大”：以“字”为本控制大于字的各级单位；印欧语则是以“大”制“小”的语法型（后改为“形态型”）：以句为本控制词的形态变化。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前者关联着概念，后者关联着判断；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只关联着概念。印欧语的两个基本结构单位决定了印欧语语法结构的双轨制：一轨是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一轨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两轨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而词的形态变化则是联系二轨的桥梁，使二轨合一。汉语只有一个基本单位，不受双轨制的制约。字是语言中有理据性的最小结构单位，突出语义。印欧语的有定性范畴关联在谓语动词上：每一个句子的谓语动词必须有特定的时、体、式等有定标记，而（名词性的）主语在语义上可以是无定的，甚至可以出现如it、there之类的虚位主语。一致关系反映出主语由有定动词制约，构成“主—谓”框架。汉语的有定性范畴与谓语动词没有关联，而是关联在句首的结构成分上，所以汉语的句法结构难以纳入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主—谓”框架，宜用“话题—说明”框架来分析。印欧语以有定性的谓语动词为基础，基本句式是“主动—被动”；汉语以句首的有定性话题为基础，基本句式是“自动—使动”。“自动—使动”是把握汉语语法结构规则的一个“纲”，平常称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动补结构”、“连动式”、“兼语式”等等都是汉语在其历史发展

过程中由于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而产生的使动式的历史变异。

历史语言学领域中陈保亚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1996）也反映出同样的“结合”新思路。侗台语和汉语有无亲属关系，这是国际汉藏语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争论的双方各有所据，但都无法驳倒对方的立论。究其原因，就是争论双方所依据的理论都是施莱哈尔的谱系树说，着眼于语音对应和同构来考察语言的系属关系。陈保亚不为传统的理论所束缚，独辟蹊径，深入考察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过程，总结出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语言接触机制和由此形成的语言发展原理。他发现语言接触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即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互协的过程无界而有阶，即语言的任何结构层而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划不出哪些层面能受影响、哪些层而不能受影响的界限，区别只是越是核心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陈保亚以斯瓦迪士语言年代学的200词和100词为基础确定比较的关系词，根据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用“阶”的曲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反映，如果是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多，阶曲线下倾；而接触关系则相反，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少，阶曲线上扬。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由于关系词的阶曲线上扬，因而相互间没有亲属关系，它们的相似性和语音对应是由语言接触造成的一种语言联盟。这是研究语言系属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字本位理论和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理论都还是探索性的，还处于草创阶段，理论形态不是很完善，但这种探索能给人以启迪，将会影响中国理论语言学今后的发展。

参考文献

高名凯：《语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徐通锵：《语言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刘坚主编：《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徐 通 锵）

历史语言学研究（Histor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f）

本世纪中国历史语言研究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中国的传统小学，一是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瑞典学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在这两个传统的结合方面做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高本汉从《切韵》的反切出发，根据中国境内方言和域外方言的音值来构拟中古音。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利用清儒的上古音研究成果，用内部拟测法构拟出上古音系。高氏重建汉语古音的方法是一种语文学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论的背景下，汉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高本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反切和谐声原则考订音类在历史上的分合，一是对方言、对音材料进行充分的描写和比较，以便为古代音类确定最佳音值。在这两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有汪荣宝、曾运乾、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陆志韦、王力、李荣、董同龢等。

高本汉把《切韵》看成是一时一地的音系。认为《切韵》忠实地记录了长安话，是

7到10世纪的汉语共同语。他以“同质论”的观点假定《切韵》是从《诗经》发展下来的，现代方言又是从《切韵》发展下来的。高氏的同质论曾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许多学者不同意高氏的观点。70年代初，张琨、张谢蓓蒂的《原始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对《切韵》的性质作了异质解释。他们认为《切韵》不完全是由《诗经》发展的结果，早在《诗经》以前，原始汉语就分化成为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切韵》既包含了《诗经》的北方汉语系统，也包含了《诗经》以外的南方汉语系统，《切韵》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是综合系统，是一个异质系统。这样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切韵》和《诗经》的复杂关系。

《切韵》异质论尽管充分考虑了南北方言的差异，但由于把《切韵》放在汉语音韵研究的中心，现代活的语言和方言被置于从属地位，因此《切韵》异质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以语文学为参照点的方法。《切韵》尽管考虑了南北方言，但不一定考虑了所有的方言，有些方言中音位的对立就不一定在《切韵》中体现出来。张琨(1972)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但当时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60年代末，美国有一批年轻的汉学家同样也看到了《切韵》的矛盾，但采取的方法与张琨不同。他们主张彻底抛开《切韵》，完全根据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史。这种思路最初开始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称为“普林斯顿假说”。当时在普林斯顿进行研究的学者罗杰瑞(Norman, J.)、梅祖麟、桥本万太郎等主张先依据方言材料对汉语各大方言作历史比较，拟测原始方言母语，如原始吴音、原始粤语、原始闽语、原始湘语、原始北方汉语等，最后比较这些原始语言和《切韵》的关系，进一步确定《切韵》的性质。70年代初，罗杰瑞比较系统地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罗杰瑞《闽方言声调的发展》(1973)发现，中古全浊声母在闽语中有三种读法，从《切韵》系统的韵书中看不出分化的条件，现代读音也看不出分化的条件。根据这一事实，罗杰瑞认为《切韵》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方言，有些方言中的音类对立是《切韵》没有的，所以应该抛弃《切韵》，严格按照历史比较法，直接根据现代闽方言的差异和对应规律构拟原始闽语。

无论是语文学的方法还是纯正的历史比较法，都暗含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文献或方言中对立的音类在原始语言中也必须是对立的。这种原则可以称为差异原则。差异原则是历史比较法给方言材料排列时间顺序、构拟古音的根本原则。差异原则确实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但在文献或方言中对立的音类，原始语言中是否一定要构拟成对立的音类，如果不是，在什么条件下必须构拟成对立的音类？这样的问题必然要引导人们去追问音变规律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种原则的理论基础是音变的规律性。对音变规律性的进一步追问，形成了词汇扩散理论和叠置式音变理论。

词汇扩散是一种重要的音变方式，是王士元于1969年在《相互竞争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中提出来加以阐述的。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默认语音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是在几代人的语言中不知不觉地进行和完成的。对于相同条件下的每一个词来说，这种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即所有包含变化音位的词都会同时产生相同的变化。王士元通过对汉语材料和英语材料的微观分析统计，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离散的、突然的，这种变化在词汇中呈现出连续渐变的面貌。词汇扩散理论从微观变异入手，揭示了音变规律的微观演变机制。从现有的微观调查材料

看，词汇扩散理论所描述的音变方式是更常见的一种。词汇扩散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如果词汇在扩散的过程中，音变突然中断了，那么同一个音就可能在相同的条件下获得不同的读音，造成无条件的语音分化，当我们构拟原始语言时，就不能说，凡是现代对立的音，在原始语言中也一定对立。词汇扩散理论首次说明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对立原则在构拟古音时不具有充分性。

当然语音无条件分化现象还不能完全用词汇扩散说解释。造成音类无条件分化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方言间的接触。历史比较法并不考虑方言间的接触。方言的接触在汉语中显得异常突出，结果形成了层次复杂的文白异读现象。从80年代中期开始，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1986.1）、王洪君《文白异读和叠置式音变》（1986）、徐通锵《历史语言学》（1991）提出了解释方言接触机制的叠置式音变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一个方言可以在同一空间借助汉字的连接，通过对应规律接受另一个方言的影响，形成音类的叠置（即文白异读），文白的竞争以社会因素为条件，文白的叠置则以两音系的字音归类的差异为条件，是方言接触在同一共时系统中的历时体现。因此，现代方言中存在的语音差异不完全是从原始语音中直接承传下来的，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有的是方言接触引起的。叠置音变理论将有助于更好地构拟原始语言，而且对语言变演的规律及其内在原因和目的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汉藏语系的谱系理论研究中。从1930年到1942年，李方桂对中国境内和东南亚近20种侗台语言作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并对藏语也作了研究，于1937年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中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认为汉藏语下分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族。李方桂所依据的标准是这些语言在单音节和声调上的一致性。40年代末，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1947）证实了苗瑶语四大调类和汉语平、上、去、入的一致性。邢公畹《汉语“子”、“儿”和台语语助词luk试释》（1948）、《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1949）、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i》（1949）又进一步从语法的角度论证汉语和藏语同源。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对汉藏语的研究对后来中国境内汉藏语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李方桂所提出的单音节和声调一致性的标准被很多人看成是确定汉藏语系的主要标准。解放后，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又增加了“量词、虚词、缺少形态变化、语序”等标准，进一步断定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我国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广泛依赖语言类型的同构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并且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语言调查、语言和方言的识别与划分，很少专门讨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

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探讨，汉藏语系的发生问题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这首先是因为国内早期有关汉藏语系的假说尚未得到严格的证实，其次是因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苗瑶语和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认为侗台语、苗瑶语和汉语在类型上的相似是借用的结果，这些语言应该归入东南亚的南岛语或南亚语。我国大多数学者的态度是，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很强，少数借用是可能的，各层面广泛的相似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借用，而应该作为同源的重要证据。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展开，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逐渐发现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语言发展的普遍

规律也可能产生深层同构。胡坦《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研究》（1980）以详实的材料证明了藏语拉萨话的声调是韵尾的简化和前缀的脱落引起的。由于藏语是藏缅语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之一，这一结论对类型标准的冲击很大。我国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李方桂在1976年的《汉语和台语》一文中，找出了100多个汉语和傣语之间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汉台同源词。这是李氏转向对应标准的开始。国内学者邢公畹在这方面用力最多，找出了大量汉语和台语之间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力图说明这些词是汉语和台语的同源词，是汉语和台语同源的证据。

但是，如果语言分化的时间相当长，同源词就会保留得很少，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就很难建立起来，因而和语音上相似或对应规律不严格的借词就很难区分开。而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之间长期广泛深入的接触又使这种区分更加困难。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对确定同源词的方法作了一些新探索。严学窘《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1979），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1981），董为光、曹广衢、严学窘《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1984），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分别找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再找出同族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符合语音对应规律的就是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源词。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同族词是同一语言中一组音义相关而又有语源关系的词，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被另一语言借用，因此两个语言中的同族词对应可以用来证明两个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同族词对应并不背离用语音对应确定同源词再确定同源关系的基本原则，而是在这一原则上的特殊对应。这种方法对加深认识古借词和同源词的关系，对加深认识深层语音对应规律有重要价值。

同族词对应从概率上说比一般的对应更能排除偶然对应和借词，但并不能保证可以绝对排除借词。而在语言发生学研究中，只要把一个借词误认为是同源词，就可以把接触关系误认为是同源关系。因此在语言发生学研究中，仅仅根据借用可能性的大小来区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是不充分的。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1996）对傣汉接触的追踪调查和对傣语中的汉语西南官话借词的分析发现，无论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还是核心词，无论是单个的词还是同族词，都可能借用，并且保持了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因而认为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在同源词和借词之间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另一方面，陈保亚发现尽管核心词也可以相互借用，但越是核心的词借用越少。相反，傣语各方言之间越是核心的词同源的越多。这说明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的分布在语言的分化和语言的接触中都是有阶的，并且是对立的，因此可以通过关系词的有阶分析来区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

由于汉语方言长时期以来分化与多层次接触共存、汉语和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有很深的接触史，加上汉字的特殊性；中国历史语言学遇到了印欧历史语言学不曾遇到的许多复杂问题。这虽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为理论创新和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20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Wang, William S-Y,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1969.

张琨、张谢蓓蒂：《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和〈切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

刊）甲种之二十六，1972。

Norman, J.,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 1973.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陈保亚）

社会语言学研究（Socio-linguistics, Studies of）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国已有一些学者从事有关社会语言学内容的调查与研究，代表作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是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

一、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以称为酝酿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除了少数有关社会语言学内容的零散研究之外，主要是介绍、引进国外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发表于《中国语文》编辑部所编印的《语言学资料》。《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5期开始到1982年第3期连续刊载［英国］特鲁杰（Peter Trudgill）著，曹今予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语言学界介绍国外的社会语言学。

二、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中，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起步期　我国学者运用现代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论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80年代在《中国语文》、《方言》、《民族语文》、《语文研究》、《语文建设》、《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刊物上已经刊出了一批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论文或调查研究。而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社会语言学专著，第一本是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接着又出版了他的《社会语言学》（1983）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1992），他还以尘元的笔名出版了《在语词的密林里》（1991）。周有光则出版了《新语文的建设》（1992），这是一本有关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的论文汇编，对应用社会语言学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索。

表明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起步的另一个标志，是陆续出版了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社会语言学的教科书。如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这是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社会语言学教科书；它不但介绍了国外社会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和成果，而且收进了作者本人在中国的汉语社会中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戴书的特点是，对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现象论述、举例较多；反映了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王德杏编著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

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语言、社会、文化》（1991年）内容涉及社会语言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语言规划、语言变异、言语交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突出地表现了我国社会语言学从起步开始就十分重视实践和语言的文化背景的特点。1989年11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言语交际为主要讨论中心；会后也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1993年）。1992年4月在西安外语学院召开全国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

"语言与文化"为中心。这次讨论会后出版的论文集《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1993年)以讨论跨文化的语言现象以及跨文化的语言教学问题的文章较多。

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语言学所属各个领域的研究全面铺开并涌现许多有关专著的时期。先后有刘焕辉《言语交际学》(1986)；陈建民《说话的艺术》(1987)；耿二岭《体态语概论》(1988)；陈原《社会学专题四讲》(1988)；潘肖钰《公关语言艺术》(1989)；陈松岑《礼貌语言初探》(1989)；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邢福义《文化语言学》(1990)；陈保亚《语言文化论》(1993)；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中外语言的文化学透视》(1994)；邵敬敏主编《文化语言学中国潮》(1995)；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1996)；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1996)；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996)等等。王洁则主编了我国第一本《法律语言学教程》(1997)。对双语、双方言等语言接触现象感兴趣的许多学者则在陈恩泉的主持下，由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双语双方言》(已出4期)，刊登了不少调查研究港、澳、台方言以及论述它们的发展趋向的文章。

这个时期，在介绍国外研究方面，已从单篇的零散论文转为比较全面的、系统的专著翻译。祝畹瑾主编的《社会语言学论文集》(1985)选译了英、美、加等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有代表性的文章，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卫志强翻译了苏联什维采尔(А. Д. швейцер)的《现代社会语言学》(1987)，该书的特点在于充分地反映了前苏联等国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以及重视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的态度。刘明霞、刘桓中等人翻译了美国佐依基(A.M.Zwicky)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1989)。卢德平翻译出版了英国郝德森(R.A.Hudson)的《社会语言学》(1989)。1997年出版了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主要是介绍欧美当代社会语言学家成果的《当代社会语言学》。

三、从90年代中期以来，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长期　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语言学的文章有所减少；社会语言学的专题讨论会也多年未曾召开；只在1995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但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学科从初始的快速萌发转入了相对缓慢地茁壮成长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除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在筹划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语文使用情况调查以外，还有不少学者正在埋头从事艰苦的社会语言调查和理论上的探讨。我们期待着经过若干年的奋斗，中国社会语言学将以丰硕的新成果奉献给大家。

参考文献

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收在《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陈章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刘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陈松岑）

文化语言学研究（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n）

文化语言学是中国80年代以后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研究。文化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对于语言的结构和内容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文化语言学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旨趣在于揭示出语言的文化功能以及隐藏的语言结构、词语意义、语言运用和语言变化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具有解释性交叉性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既不是文化学的一支，也不是语言学同文化学的混合物。文化语言学侧重于对语言现象的文化成因的探究，社会语言学侧重于对语言变异的社会分布的描写。由于文化本身具有社会性，二者的研究领域有局部的交合。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语言学家W.V.洪堡特曾在其著名论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详细讨论过语言结构和人类精神的关系。本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F.博厄斯、E.萨丕尔和B.L.沃尔夫的人类语言学著作中，亦有许多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其中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相对论"尤为著名。中国的传统"小学"虽不专门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但在对语言文字分析中亦常涉及社会文化问题。本世纪上半叶，试图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有法国的M.葛兰言和H.马伯乐，美国的B.劳佛，中国的罗香林、刘锡蕃、徐松石等，他们的著作颇富创见，但多欠精审。50年代初出版的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较为全面细致地探讨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希望由此开出中国语言学的"新路"，被推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文化语言学弥补了结构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专注于语言系统内部形式的封闭式研究的不足，以较为丰富扎实的成果使人们获得了关于语言的文化属性的新认识，不仅充实了普通语言学的内容，也为语言教学和语言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直至80年代中后期，文化语言学才在中国兴起。

两种理论主张　文化语言学有"关系论"和"本体论"两派。两派共同之处是认为语言不仅是一套工具性的交际代码，更主要地是一种精神现象、文化现象，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血肉相关，研究民族语言必须与民族的文化构成、思维方式、认知特点、文化历史与文化心理相联系。区别在于，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符号解析法、文化思维认同法、文化背景考察法、文化差异比较法、文化心理揭示法等具体方法，获得对语言中的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本体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的在于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人文性"本体，续上古代语文研究传统，把中国语言学改造成文化语言学。

方言史和语言史研究　"方言与中国文化"既是文化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这一学科首倡者游汝杰与其合作者周振鹤的专著名称。此书对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发动作用。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汉语方言形成、方言地理分布同中国文化史的关系，奠定了文化语言学关系论派的研究模式。同类的研究还有侯精一的平遥方言和民俗研究、林伦伦的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李如龙的福建方言与文化研究、崔荣昌和黄尚军对四川方言与文化的研究等等。周光庆研究了近代汉语和中国近代史的共变关系。在汉语发生学方面，李葆嘉提出上古华夏语一元推移和多元混成相结合的模式，比单纯的一元分化模式论更具解释力。关于语言演化模式问题，陈保亚通过对傣语和汉语的接触的追踪研究，提出了与谱系树理论相对的语言联盟理论，补正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词汇学和词义学研究　词作为认知成果的命名手段，不仅是民族文化史的忠实记录，更是民族的思维特点和价值取向的体现。苏新春着力于汉语词汇中文化意义的分

析。宋永培、黄金贵致力于古代汉语词义系统和中国文化史关系的梳理。史有为全面系统地考证了汉语外来词的源流及其与文化接触的关系。梁晓虹不仅详论了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汉语词汇的构成，而且证明了佛教词汇在推动汉语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陈立中探讨阴阳五行学说与汉语词汇的关系。王建华以汉人命名中文化心理的揭示见长。曲彦斌和王德春以整理民俗词语见称。此外关于数词和颜色词的使用、汉字构成、词义引申和熟语构造中的文化心理的分析亦不乏成果。

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 文化语言学试图摆脱近百年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对西方语法理论的借鉴和模仿，建立符合汉语本身特点的语法理论。在宏观层次上，一些研究者从汉族人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直觉性和感悟性等特点论证汉语语法的意合性、灵活性、借重语境、略于形式等特点，认为汉语语法类型属于话题主语、语义句法。申小龙在对《左传》和当代中篇小说《井》中的句子进行分类研究后，认为汉语句法表达的总方略是“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在微观层次上，有学者认为汉语的单音孤立性以及兼具音义的“字”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言语交际和语言教学 言语交际同文化心理、文化习俗关系密切。称谓语、禁忌语、广告用语、礼貌用语、双语现象、性别语言、隐语行话等方面成果较多。文化语言学在言语交际研究方面的影响，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学。在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尤为明显，教学内容方面普遍增设了中外民族文化课，教学方法方面则有“文化导入法”的提出和应用。

中国文化语言学经过草创宏图的热闹以后，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目前“关系论派”的理论和方法已初步定型，但仍需进一步充实内容、扩大成果。“本体论派”因目标过大、理论和方法上疏漏较多，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否定过当，曾招致不少非议，目前需进行一些清理和调整。两派各有长短，倘能取长补短，融会一体，文化语言学当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1版，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第1版，语文出版社，1996。

（戴昭铭）

心理语言学研究（Psycho-linguistics，Studies of）

心理语言学是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40多年来在国外发展迅速。它主要研究人类个体语言的理解、产生和习得。我国学者曹传咏于1965年就在《心理科学通讯》上著文介绍过这一新兴学科。70年代末以来，心理语言学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语言学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都先后发表文章介绍国外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本心理语言学著作，如桂诗春的《心理语言学》（1985），朱曼殊、缪小春的《心理语言学》（1990）和彭聃龄、谭力海的《语言心理学》（1991）。这些著作不仅介绍国外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而且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部分高校还开设心理语言学课程。

我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语言的知觉理解和儿童的语言习得两个领域。

在语言知觉理解领域，除研究得比较多的汉字识别问题外（见《汉字认知》条），我国学者还研究语言知觉、声调知觉和句子的理解问题。在语言知觉和声调知觉方面，杨玉芳（1987、1988、1989、1991）研究过音位所处的词对音位知觉影响的性质和塞辅音、元音同声调知觉的相互作用问题。方至（1990）也探讨过声调知觉和连读变调问题。在句子理解方面，由于汉语无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因此在理解句子时人们主要依靠句法（如词序）线索还是语义线索就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对此，缪小春等（1982，1984），李平等（1993），江新（1997）都进行过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全相同。关于理解汉语句子时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关系，彭聃龄等（1993）的研究支持弱相互作用理论，而陈煊之等（1995）和江新（1997）的研究结果有利于句法分析自主模式。此外陈永明等（1990）、缪小春等（1992）研究过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缪小春等（1995，1996，1997）研究过各种句法、语义因索对句子中代词加工的影响。陈永明等（1994，1995）探讨过理解和回忆句子时是否存在先提述参与者优势现象。张浩等（1990）考察过不同语境条件对句子理解和回忆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的机制。

在儿童语言习得领域，儿童的发音和语音的发展，词汇的发展，句子的发展，连贯性言语的发展，语用能力的发展和元语言能力的发展等问题近年来在我国都得到研究，其中主要是儿童词汇的发展和句子的发展。在词汇的发展中曾考察儿童的早期词汇和儿童时间词汇的掌握、空间方位词的掌握和动词、代词、形容词、量词以及助词的掌握。关于儿童句子的发展，研究过的问题有儿童言语的句法结构、动词结构、儿童的疑问句、把字句、“给”字结构的发展和儿童对疑问句、否定句、被动句和各种复句的理解，儿童对句子隐含意义的理解以及儿童理解句子的策略等。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我国学者还探讨了儿童语言习得中某些理论问题，其中主要是儿童的认知发展和语言习得的关系，模仿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儿童汉语习得的大致过程和特点，发现儿童习得汉语的规律和其他语言的习得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至于差异的原因是在于语言的特点，还是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或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关汉语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朱曼殊主编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1986），李宇明著的《儿童语言的发展》（1995）和朱曼殊、缪小春撰写的《儿童语言的发展》（1997）都作了概括和总结。

我国的心理语言学学科发展起步较晚，但经过20年来心理学工作者和语言学工作者的努力，已积累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语言活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人类认知的性质和规律等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为语言教学的改进和人工智能的开发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不过我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还局限在某几个课题上，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我们对汉语字词的识别研究较多，对句子的理解研究较少，而对话语和篇章的理解，对个体语言的产生等问题几乎尚未涉足，从交流功能的角度对语言的心理研究，对双语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是空白。就已经研究过的问题而言，研究结果还存在很多分歧，工作还有待深人。而且，除汉语字词识别等少数问题外，如何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课题进行研究也显得不够。

参考文献

朱曼殊、缪小春：《儿童语言的发展》，收在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中国心理科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

江新：《汉语句子和课文的理解》，收在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缪小春）

语义学研究（Semantics, Studies of）

中国有悠久的语义研究传统，以“字”为核心的训诂语义研究在19世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大充实了今天对汉语语义的认识。20世纪汉语语义研究局面纷繁，虽然不乏接续中国传统的精彩研究，但很多人们熟知的课题来自西方语言学，与中国传统研究关系不大，还有许多重要探索附属于语法或文法名目之下。

20世纪上半期的汉语语义研究成就可分两个方面叙述。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高本汉、杨树达、沈兼士等学者的训诂学和语源学研究多涉及语义问题，从现代语文学的角度看，王国维和杨树达的研究最为重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916年）的价值有二：第一，总结出了《尔雅》“释雅以俗，释古以今”的通雅俗古今之名的若干具体条件；第二，建立了一套用以区别俗名的语义特征类别方案，如“地”、“形”、“色”、“味”、“实”等。杨树达的《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1934）论证形声字中声中有义，初步揭示了汉语字义的语义结构。40年代由于普通语言学的影响，出现革新训诂学的呼声，齐佩容撰写《训诂学概论》（1943），论述了语音和语义关系，研究了音训和义训两种训诂方式并提出一套比较完备的语义特征类别方案。王力发表《新训诂学》（1947），主张改造旧训诂学，进行语义学（semantics）的研究，强调了语法和语义的关系，认为语法可以证明语义，“语法的不同影响到语义的不同”。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同出版于40年代，虽然都是研究语法，其中不少内容对今天的语义研究仍有重要启发作用，如王力区分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对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的设立和研究；高名凯区分名词句、动词句（和修订本增设的形容句），进而把句子中词语和词语的结构关系确定为“规定、引导、对注、并列、联络”等五种关系。吕著上卷《词句论》区分了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和有无句，下卷《表达论》则是对汉语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重要尝试，在《表达论》之上先设立“数量、指称（有定）、指称（无定）、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信、传疑、行动·感情”等语义范畴，再论述每个语义范畴的具体表达形式，在《表达论》之下设立“离合·向背、异同·高下、同时·先后、释因·纪效、假设·推论、擒纵·衬托”等关系类别来探讨复句中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用今天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眼光来衡量，王、吕、高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形式、轻意义的思潮的冲击，独立的语义研究很少，高名凯的《语言论》（1963）专辟一章论“语言中语义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提出了一些语义研究基本理论问题和一个语义研究框架，后来的研究表明，“语义单位”、“语义结构”、“语义结构的演变”既是基本的又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西方语义学

理论，独立的语义研究日趋活跃，比较重要的论著有：贾彦德《语义学导论》（1986，1991 增订修改为《汉语语义学》）、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徐烈炯《语义学》（1990，修订本 199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苏新春《汉语语义学》（1992）、石安石《语义论》（1993）和《语义研究》（199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1997）。其中贾著运用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句义的述谓结构分析法和语义格理论分析汉语，取得了初步的结果。蒋著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对古汉语词义作出了比较深人的分析，其中对古汉语名、动、形三类词所做的义素分析和对"义域"的探讨尤具启发性。石著能较好地吸收西方语义学的精神，联系汉语讨论语义单位、语义成分、语义的聚合和组合、歧义、模糊、蕴含、预设和寓义等问题，分析较为精当清楚。

70 年代末期以来，还有许多语义探索附属于语法研究或句法和语义关系研究的名目之下。关于语义特征的研究有朱德熙《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1979）、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1981）和《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1988）、陆俭明《"V来了"试析》（1989）。关于语义格的研究有李临定《宾语使用情况考察》（1983）、孟琮等《动词用法词典》（1987）、鲁川、林杏光《现代汉语语法的格关系》（1989）。关于指称和陈述的研究有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1983）。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1978）还开启了 90 年代的配价研究。

90 年代以来，借鉴功能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线，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1992）和《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1994）提出名词配价语义结构理论和语义激活理论。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1992）用"连续和离散"、"定量和不定量"两对语义范畴的表现来全面解释汉语句法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开辟了汉语语义和句法关系研究的新途径。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1994）提出两条语义角色优先序列，用以表现汉语句子中主题、主语和宾语与各种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并对语义的连续性作出了较好的解说。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1997）主张以"字"为本位以语义为重心的语言研究路线，以建立语义构词和语义句法的理论体系。徐的创见在语言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将对 21 世纪的语义研究产生影响。

总体上看，20 世纪的汉语语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也存在着问题，独立的系统的接续中国传统的有深度的语义研究少见，对中国传统语义研究的总结不足，对语义基本问题钻研不够充分，这影响中西语义理论的结合和语义研究水平的提高。从世界语言学发展潮流看，语义学研究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对语义搭配组合研究的水平要求愈来愈高。预计 21 世纪的中国语义学会顺应潮流，改进不足，对一般语义学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叶文曦）

音系学研究 (Phonology, Studies on)

音系学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它从区别性语音关系模式的角度研究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并力图对世界上各种语言里的语音系统模式做出一般性的说明。

中国传统音韵学对汉语字音进行了声、韵、调，等呼、摄，清浊、唇牙舌齿喉等不

同层级的音类分析，其中对音节结构分层分析的观念，有相当高的理论涵义，但未能从理论上将音类的相互关系与具体音值分离开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未具备对语音系统作一般性说明的意识。

现代音系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他们区分了“音位”和“音位变体”等重要理论范畴，由此音系学真正从传统语音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分立的语言学分支。20年代～60年代的音系学研究始终围绕着音位进行，这一时期的音系学又专称为“音位学(Phonemics)”。

20年代～40年代，中国一些留美、留法学者在国外直接经历了音位学理论由创立到成熟的历程。其中，赵元任在音位学的创立和在汉语中的运用方面贡献卓著。他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结合汉语方言的大量事实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并不是客观惟一的，该文被公认为美国结构主义的经典理论之一。赵元任不仅在汉语的声调、语调、轻声等方面有开创性研究，而且创立了先单字声韵调、再两字、三字声韵调（并区分成词、不成词）、再词汇和语助词、再语篇的汉语方言调查程序（见1923年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该程序能最快速揭示汉语各个韵律层级上的各种关系，理论蕴涵十分深刻。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音位学理论在国内并未有过系统的介绍和讨论，国内学者关注较多、运用于汉语研究并取得多方面实际成果的是西方语音学。

50年代～60年代初，汉语音位学研究主要是结合拼音字母的设立而展开的。其中，对普通话音位及音值问题的讨论较多，对儿化韵、轻声等现象的音位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总体来看，这些讨论反映出当时中国学者对音位理论方法原则不够熟悉，对普通话音位处理的不同意见很少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这个时期，美国音系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生成语法分析批判了音位学的基本工作程序——双向单一性的不合理性，于60年代取代音位学而成为音系学的主流学派。60～70年代中期是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时期。这一时期美籍华裔学者关于声调的研究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王士元的*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1967）提出汉语的声调可以分析为［±高］、［±低］、［±升］、［±降］、［±曲］、［±凸］区别特征，这是将声调纳入生成音系学区别特征体系的第一个认真尝试，在美国音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所设置的升降曲凸等4对特征是动轨性的，很难与其他区别特征的非动轨静态性质合拍，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Woo, N.196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提出将声调分析为静态特征的另一种方案：所有的声调都是静态平调（高、中、低等）的组合，这一观点为70年代以后的美国音系学研究广为采纳。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郑锦全运用生成音系学理论全面分析普通话音系的*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一书（1973）。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音系学进入非线性理论时期。该时期华裔学者的参与较前几期增多，出现了不少有较大影响的博士论文和单篇论文。

这个时期国内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音系学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首先是基于音位学的研究走向深入。如王理嘉的《北京话的中元音音位》（1983）是完全依据结构主义“双向单一性原则”得出的，已直接触及到了音位归纳是否应考虑派生性质的儿化韵等问题。

其次是国外新理论的介绍引入明显加快。70年代末开始出现介绍生成音系学标准理论的文章，如徐烈炯《两种新的音位学理论》（1979），王嘉龄《生成语音学简介》（1980），1984年后各种非线性音系理论，如词汇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特征层级说、CV音系学、节律栅模型、优选论更都是及时得到介绍，撰稿人主要是高校外语系的教员和部分英美留学的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在王嘉龄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研究西方音系学的中心，他们及时收集整理国外音系学的各种动态和汉语音系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国人。

更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发表了相当数量运用音系学新理论研究汉语音系问题的论著。较早期的有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1982），季国清《汉语韵律结构的非线性分析》（1983）。80年代中期以后论著的数量激增，讨论的问题相对集中在几个方面：普通话连上变调方面，如：陆致极《也谈上声三字组的变调规律》（1986），沈炯《北京话上声连读的调型组合和节奏形式》（1994），林华《"调素"论及普通话连读变调》（1998）。吴方言特别是上海话的连续变调方面，如：沈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1985），五台《关于"连续变调"的再认识》（1986），金顺德《上海方言声调音系的生成语法解释初探》（1988），徐云扬《自主音段音韵学与上海声调变读》（1988），朱晓农《上海音系》夏剑钦摘译，1996）。结构主义音位学原则的缺陷方面，如：王洪君《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1994）。汉语合音、分音式语音词方面，如：王洪君《汉语中两种常用的语音构词法》（1994），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199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1996），王志浩《儿化韵的特征架构》（1997）。汉语的节奏方面，如：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1998），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1999）。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三部专著：包智明、侍建国、许德宝《生成音系学理论及其应用》（1997年），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1997年），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1999年）。

以上研究从新的视角考察汉语事实、挖掘出了不少新的规律。如：关于上海音系的几篇文章都指出，吴语粘合式连续变调的本质是首字的最右边的那个底层声调特征的右向扩展；沈炯用三四条规则控制了无限多的表层连上变调可能性；王、石对语音词的研究发现了汉语双音单纯词有两音节一音步"前暗后亮"的跨音节限制；冯、端木对节奏的研究揭示了汉语的基本节奏是两音节的标准音步，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调整为单音节的蜕化音步、三音节的超音步。端木还揭示了汉语音步结构重音居左的特点与复合词的长度、复合词中提宾现象的关联。

在将西方理论运用于汉语研究的同时，不少研究还根据汉语材料对音系理论有所补充或修正。如端木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汉语节奏的研究提出，汉语在mora和韵两个层次上都有重音节奏结构，节律音系学认为有的语言为mora节拍，另一些语言为韵节拍，两者不能共存是错误的。王洪君的系列论文和专著《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则注意汲取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精华，发现汉语的音系无论是共时成分的组合模式、交替模式，还是历史演变，都以单字音为控制枢纽，与多音节重音型语言以词为控制枢纽很不相同。由此提出，语言的普遍韵律层级模式中还应补充"最小句法韵律自由单位"这一普遍参数。

总体来看，中国的音系学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许

多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者绝大多数是海外学者，国内学者涉足很少。海外学者勇于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方法概念"革新"而借鉴不足，真正能与国内学者达成共识的观点很少。二是研究基本限于短语之下（音系词、音节）的层次，对于更高层的韵律及其与句法的关系还很少研究，与实验语音学的结合还注意不够。

参考文献

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1934。

陈丽萍、姜晖：《近年来美国大学汉语音系学博士论文简介》，《国外语言学》1-2，1994。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王洪君）

语用学研究（Pragmatics，Studies of）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是美国哲学家莫里斯于1938年首先提出的。他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并明确指出：语用学是研究"符号和解释者的关系"（在1939年出版的《美学和符号理论》一书中，他将"解释者"改为"使用者"）。

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下来的，以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出版发行为标志。

语用学的研究内容，依据列文森（S. 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归纳，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指示词语；（二）会话含义；（三）预设；（四）言语行为；（五）会话结构。

语用学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它尚不是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

西方语用学的兴起引起了中国语言学者的极大兴趣，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积极引进西方语用学理论。许国璋于1979年摘译了奥斯汀的名著《论言有所为》，此后，重要的译著有：王宗炎译《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1982）；沈家煊译《语用学概观》（1985），《语用学论题》（1986），《语用学理论》（1991）；常宝儒译《言语行为理论：对各流派和倾向的概述》（1987）；袁义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学》（1987）；赵斌译《"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1988）。除译著外，也发表了一些述评文章。胡壮麟于1980年发表了《语用学》一文，介绍了语用学的对象和方法，各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语用学的规则等。此后，重要的述评文章有：程雨民的《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1983）；廖秋忠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探索"介绍》（1985），《语用学的原则》（1989）；花永年的《言语行为模式分析》（1986）；段开诚的《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1988）；杨性义的《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1988）；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1988）；袁毓林的《语用学研究述评》（1989）。1989年广州外国语学院语言所成立了"国际语用学学会学术资料中心"，在引进和传播西方语用学理论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译原著和写述评两种形式，西方语用学理论有成效地被引入中国，并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和深入思考。

1989年11月在广州举行了"语用学首届全国研讨会"。学者们运用引入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来研究解决一些语言运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汉语运用中的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研讨对西方语用学的某些理论提出修

正补充，中国语用学研究进入部分创新阶段。

汉语语法学家开始把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句法、语义、语用）引入汉语语法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裕树、范晓的《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1985）和施关淦的《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1991）等。汉语语法界对三个平面以及各平面间的关系展开过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论文。范晓于1996年出版专著《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汉语语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多有创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撰写的《语用研究论集》（1994），既探讨了语用学理论问题，也研讨了汉语的具体语用课题。

“语用学首届全国研讨会”之后，外语学界和理论语言学界对语用学理论作了深入一步的探讨，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例如，余力的《语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1）；程雨民的《语用分析如何介入语言理解》（1993）；索振羽的《“得体”的语用研究》（1993）；李瑞华的《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1994）；顾日国的《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1994）；杨成凯的《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1994）；徐盛桓的《选择、重建、阐发、应用》（1995）；刘彦峰的《三种信息的统一体与语境》（1995）等。

除了单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两本语用学教材：何自然编著的《语用学概论》（1988）和何兆熊编著的《语用学概要》（1989）。钱冠连的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在创新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但较为坚实的一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用学理论和方法也已被广泛采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语用学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引进——借鉴——部分创新。今后将继续借鉴西方语用学的理论、方法，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使语用学这一尚未完全成熟的新学科在中国走向完全成熟。

参考文献

Levinson, S., *Pragmatics*, Cambridge Vniversity press.1983.

冯炜：《中国语用学研究概观》，《山东大学学报》，1992.1。

（索振羽）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of）

儿童语言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儿童语言研究涉及一切有关儿童的语言活动；狭义的儿童语言研究主要是研究正常儿童第一语言的发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1. 语言系统的发展；2. 语用能力的发展；3. 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大多数儿童语言研究都是在狭义上进行的。

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德国生理学家普莱尔（W.Preyer）的《儿童心理》（1882）问世，德国心理学大师斯特恩（L.W.Stern）的《儿童语言》（1907）和《六岁以前早期儿童心理学》（1914年）出版，使儿童语言真正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后经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美国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N.Chomsky）等人的研究与提倡，儿童语言研究发展成为当今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共同关切的学术热点。

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发轫于本世纪初叶，但是直到1978年之前，一直是以引进

西方和前苏联的成果为主，并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些检验性的研究。能够反映此期儿童语言研究面貌的论著有：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1925)，郭灿然的《儿童语言之发展》，高觉敷的《儿童语法中的并列作用》，黄翼、祝雨人的《儿童语言之功用》和黄翼的《儿童心理学》(1941)等。从总体上来看，此期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1978年至今的20年，我国学术界仍然比较注意引进国外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如桂诗春编著的《心理语言学》(1985)、朱曼殊、缪小春主编的《心理语言学》(1990)、彭聃龄等主编的《语言心理学》(1991)等，但也对中国儿童的语言发展进行了许多扎实、深入的研究。

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1980)和朱智贤、林崇德的《思维发展心理学》(1986)，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并尽量总结、吸收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致勾勒了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轨迹。史慧中的《3～6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1990)，是朱智贤1983～1989年主持的“中国儿童（含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这一重大项目的子项目的成果，有10个省市协作进行，调查样本8000有余。这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学前儿童语音、词汇、词类、句子、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发展面貌，有了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朱曼殊为首的儿童语言研究集体，从1978年开始以儿童对于词语、语法的理解为重点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儿童语言的论文集《儿童语言发展研究》(1986)。这部论文集主要用试验方法研究了儿童掌握量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时间词语、空间词语、形容词和一些句法结构的特点，讨论了影响儿童理解句子和语言获得的若干因素，探索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张仁俊、朱曼殊的《婴儿语音的发展》(1987)发现了婴儿期语音发展的若干规律。

吴天敏、许政援的《初生到三岁儿童言语发展记录的初步分析》(1979)，通过对多个儿童长期的追踪研究，对个案儿童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发展作了仔细研究。许政援、郭小朝的《11～14个月儿童的语言获得——成人的言语教授和儿童的模仿学习》(1992)，用大量的事实对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人有意识的语言教育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心理学界是儿童语言研究的主力军，他们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儿童语言，目的是为了解决儿童心理发展的问题。我国语言学界涉足儿童语言领域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儿童语言学本身的问题及其相关的语言理论问题。

李宇明、唐志东等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1991)和李宇明、陈前瑞的《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1998)，运用个案纵向观察和群案横向试验的研究方法，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汉族儿童理解和使用问句系统的规律，并通过理解和发生的比较研究，获得了儿童语言发展的若干规律。李宇明的《儿童语言的发展》(1995)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专著。该书充分总结了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系统描述了汉族儿童语音系统、词汇-语义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发展的面貌和发展规律，系统梳理了西方各个流派的语言习得理论；并在与西方儿童语言的发展比较中，提出了一些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问题。

周国光、李向农、孔令达等发表了10余篇论文，讨论儿童习得与介词、助词等有关的句式的问题。如《儿童语言中的被动句》(1992)、《1～5岁儿童运用方位句及方位介词情况的调查分析》(1992)和《儿童动态助词“过”习得情况的调查和分析》(1993)，分别考察了儿童被动句、方位句、助词“过”等的发展，并进一步探讨了与之有关的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些问题，多有创见。此外，缑瑞隆等的《2～3岁儿童兼语句发展的实验研究》(1992)、郑厚尧的《影响儿童理解选择问句的若干因素》(1993)、陶红印的《儿童对三种疑问形式的感知》(1989)、王志的《儿童语言中否定的发展》(1990)，也就某一问题对儿童语言的发展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香港李行德、吴杏莲、梁长城等在1991年开始成立研究小组，研究粤语儿童语法能力的发展，并建立了“香港粤语儿童语言资料库”。这是第一个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的语料库，标志着汉族儿童语言研究的新进展。李行德的《语言发展理论和汉族儿童语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1997年第4期)，从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总结了海外(也有大陆的一些研究)对说粤语、普通话的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并特别注意考察儿童语言发展与语言理论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由概述性到深人细致的调查，由事实研究到理论探索，由心理学界的孤军奋战到心理、语言两界联袂，有了较大的收获。对于西方和前苏联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引进，对于汉族儿童的语言发展有了一个粗线条的描绘，对语言的一些子系统的发展或特定的年龄段的语言发展，正在做较为深人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特别是进人9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势头令人鼓舞。

当前我国儿童语言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 研究队伍弱小，不同学科沟通不够，海内外交流不畅；2. 对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事实了解不足，对儿童语用发展的状况知之更少，存在着许多学术空白地带，学科发展还缺乏应有的事实基础；3. 儿童语言的语料共享性极低，儿童语言研究成果的共享性也较低，一些与儿童语言关系密切的学科还没有自觉关注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4. 儿童语言研究的手段还比较落后，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还相当薄弱，语言习得理论还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等。

参考文献

李宇明、汪国胜：《中国儿童语言研究概述》，《语言学通讯》，1988，3～4。

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朱智贤、林崇德：《儿童心理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李宇明)

“词汇扩散”理论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词汇扩散”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美籍华裔学者王士元首先提出的语言演变理论。

1969年，王士元在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相互竞争的变化产生剩余》(*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提出，“音变可以语音的突变和词汇的渐变的方式实现。这类音变可能并不完全实现。如果存在与之竞争的另一音变，就会在词汇中产生剩余。”论文列举一些音变实例论证了这一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词汇扩散”(Lexical diffusion)

的观点。此后，王士元又著有《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Language change-a lexical perspective*）等讨论这一理论的论文，并编有论文集《音位转移中的词汇》（*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收录了很多用“词汇扩散”理论研究历史语音学的论文。

19世纪末，青年语法学派总结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语言研究成果，提出了语音演变的总体规律。他们认为语言是生理的和个人心理的，因此语音演变是机械的，缓慢的，是以说话者不能觉察的渐变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语音的渐变在同一语音系统内相同的语音条件下没有例外的情形，即“语音规律无例外”；同时，由于语言的个人心理属性，类推成为构成新的语音形式的重要力量，是形成语言不规则演变的主要原因。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成为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而“词汇扩散”理论所提出的语音演变方式却与条件式音变迥然不同，如下所示：

	词汇	语音
青年语法学派	突变	渐变
词汇扩散理论	渐变	突变

词汇扩散在共时变异中表现出来，可用下表说明：

词＼阶段	未变	变化中	已变
W1			$\overline{W1}$
W2		W2～$\overline{W2}$	
W3		W3～$\overline{W3}$	
W4	W4		
…			

W代表一个词，$\overline{W}$表示变化完成的词，W～$\overline{W}$表示变化中的词。在音变过程中，总可以把词分成未变、变化中、已变三类。例如，英语中双字母oo表示的元音［u:］在很多方言里已经向［u］转变。比如look读［luk］，已经变了；room有时读［ru:m］，有时读［rum］，两可；而food读［fu:d］，没有变化。这就是“词汇扩散”的一种表现。

词汇扩散理论对音变的研究视角与青年语法学派有很大不同。一方面，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与词汇扩散理论观察音变的着眼点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单个的音，后者关注的是词，注重音变在词汇上的体现，因此，词汇扩散理论被认为是早期“词与物”学派“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精神的复活，所不同的是，“词与物”学派源于方言地理学，关注音变在地区上的扩散，而词汇扩散理论则研究音变在系统内的扩散。另一方面，王士元认为，从历史语言学的时间尺度上讲，以青年语法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是中观语言史（meso-history），共时变异研究可称为微观语言史（micro-history），而词汇扩散理论是希望将微观语言史和中观语言史联系起来。两个原因中后者更带有时代性，同时期以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是把研究视角放在语言的共时变异上，强调变异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价值。

由于词汇扩散理论与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不同，它们所关注的音变类型也不相同。理论上，二者既不能彼此容纳也不能彼此替代。可以肯定的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不能说明所有的音变现象，“词汇扩散”理论是对历史语言学基本理论的重要补充。早期词汇扩散理论在对语音现象的解释中把一些语音叠置的文白异读现象也归入离散式音变。徐通锵等在对叠置式音变的研究中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提出叠置式音变是不同于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的另一种音变方式。

参考文献

William S-Y. Wang,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1969.

王士元：《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语言研究》，1982.2。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李　娟）

汉字认知研究（Cogni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认知指人脑对汉字的信息加工，包括编码、储存和提取。汉字是表意文字，和其他文字有很大区别。因此，我国的学者一直对汉字认知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企图探讨汉字认知不同于其他文字认知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时，大陆的一些学者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70年代末以来，这一问题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汉字认知成为我国语言心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就的一个领域，其中主要是研究汉字识别问题。汉字认知研究对认识语言认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人类认知的性质和规律以及对汉字教学等都有重要意义。

汉字认知的研究表明，汉字字形在信息的储存和提取中起重要作用，汉字识别以字形编码为主，这和英语单词识别中以语音编码为主不同。在字形中，笔画是最小的单位，笔画数是决定汉字知觉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年代，艾伟的实验就曾发现笔画数对汉字辨认有重要影响。1963年曹传咏的研究证实了汉字识别中存在笔画数效应，笔画少的字比笔画多的字容易辨认。以后，谭力海等（1988）、喻柏林等（1992）、张武田等（1992）、彭聃龄（1996）的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个结果。除笔画外汉字的结构形式也对汉字识别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汉字识别中存在左右结构优势，如彭瑞祥（1983）的研究表明左右结构的汉字比上下结构的汉字容易识别，整体字的识别最难。此外汉字的不同部位可能传递不同的信息，在识别中的重要性不同。周先庚在1929年就报告汉字的上半部分对识别的作用大于下半部分。曾性初1965年的研究表明汉字的轮廓框架传递较多的信息，前半部分（左和上）传递的信息比下半部分（右和下）多，表明前半部分对汉字识别的影响较大。彭瑞祥（1983）再次证实汉字的左边和上边的特征比右边、下边的特征重要。

汉字字形知觉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在英语单词识别的研究中存在整体优先还是特征（字母）优先的争论。在汉字的识别中，有人认为汉字的笔画和字形结构都影响汉字识别，那就说明特征分析是汉字识别中一个必经的阶段。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都发现，在汉字字形加工中存在整体优势现象。汉字识别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识别时先进行整体的检测，然后再进行特征的分析。喻柏林等（1990）的研究结果表明汉字整体是知觉的单元，整体知觉对部分知觉产生影响。不过后来张武田等（1992）的研究结果是高频字倾向于整体加工，而低频字倾向于特征分析。彭聃龄等（1996）则认为独体字以笔画为加工单元，而合体字以部件为单元。喻柏林等后来又提出，整体和部分至少是平行加工的，即在整体加工完成以前，特征分析已经开始。

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字形和字音的关系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密切，因此汉字的读音、汉字中形和音的关系问题，也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对于语音在字词识别中的作用，国外有三种不同的假设。一种是语音转

录说，认为词形与意义间有直接联系，形需要通过音才能到达义。第二种是直通假设，认为人们可以从视觉材料直接提取意义，不需要语音的中介。第三种是双通道假设，认为上述两种通道平行和独立地发挥作用。汉字认知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张厚粲等（1989），谭力海等（1990）等都发现汉字识别中有语音自动激活的现象。最近，谭力海等（1995）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表明语音在到达字义之前就被激活，至少对高频词是如此。但这还不能证明语音加工是提取字义的必要条件，语音是从字形到字义的中介。金志成等（1995）认为汉字识别比较符合直通假设。周晓林（1997）认为语音在词义通达中不起重要作用。有些人则认为汉语中字形到字义是双通道的，采取哪一通道取决于字频（对字的熟悉程度）和读者的水平等因素，语音不是提取字义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例如彭聃龄（1985，1986）的研究就表明儿童在汉字识别中可能需经过形音转换，而大学生可能直接从字形提取字义，而且在不同的加工阶段，语音的作用可能不同。

关于汉语字义的提取，张积家（1990）研究过形声字的义符在字义提取中的作用，发现汉字中有无标明词的类属的义符对汉字语义提取有重要影响，义符与语义一致的促进字义的提取，不一致则起干扰作用。舒华等（1995）的研究表明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就意识到形声字的形旁和字义的关系，他们能利用熟悉的义符帮助学习和推测生字的意义。缪小春（1988）的研究则表明汉字中表示意义的偏旁部首对熟悉字词的意义提取不起什么作用，它只是有助于人们确定不认识字词的意义。

关于汉字认知的研究还一致得到这样的结果：字频和语境是影响汉字识别的两个重要因素。郭德俊（1991）的研究再次证实汉字识别中的字频效应，高频字比低频字易于识别。至于语境的作用，60年代曹传咏等（1963）和曾性初等（1965）的研究都涉及这一问题。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彭聃龄（1987）、谭力海等（1988，1989）的研究都说明相关语境促进汉字识别，无关语境干扰汉字识别。不过语境效应和词频因素有关，相关语境对高频词的作用不如对低频词的作用明显。语境因素与笔画数因素也有交互作用，相关语境对笔画数多的汉字影响较大。

对汉字认知问题的认识，我国学者还存在不少分歧，不过研究表明汉字本身的特点，使用频率、语境以及人们头脑中已有的信息都影响汉字的识别，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因此汉字识别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加工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外在单词识别问题上有单词产生器（LOGOGEN）模型，核证模型，搜索模型和双加工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不能完善解释汉字识别的研究结果。因此，根据汉字认知的特点建构汉字识别的认知模型是一项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任务。彭聃龄和谭力海（1987），张必隐和彭聃龄（1992），彭聃龄等（1997）对此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彭聃龄：《汉字的信息加工》，收在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中国心理科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

彭聃龄：《汉字识别中的两种加工》，收在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缪小春）

双语研究（Bilingualism, Studies of）

双语（bilingualism）又称双语现象，多指某一言语社区或某一个人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双语在中国主要指我国境内的两种语言，譬如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或者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某一言语社区或个人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则称为多语（multilingualism）或多语现象。研究者习惯于使用“双语”或“多语”这一名称来涵盖“双语和多语”这两种现象，并且把“双语”进一步区分为“社会双语”和“个人双语”这两大类别。

中国的双语现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对双语进行科学研究则为期不长。20世纪60年代，和志武（1961）和清格尔泰（1964）的论文开始明确提到“双语”的名称或概念。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随着国外社会语言学的传入，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特别是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马学良（1981）、王均（1981）、傅懋勣（1982）和严学宭（1982）等大力提倡并积极从事双语研究，使我国的双语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研究的范围涉及双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双语言文化现象、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双方言（bidialectism）、双语体（diglossia）、双语教育和国外双语研究等等。

1. 中国双语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1994）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描写中国双语和语言状况的专著，全书分别按行政区划和族别，详细列出了全国15个省、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3个自治县以及55个民族63种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其中双语状况占相当大的篇幅。周庆生（1998）系统描述了中国双语人口的民族构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双语人口构成的特点、类型和差异。

2. 中国双语类型 孙宏开（1983）从双语人的语言构成和双语人的语言熟练程度这两个方面，划分中国民族地区的双语类型。马学良、戴庆厦（1984）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划分。周耀文（1985）综合运用双语人的语言构成和人口数量这两项标准，分出5种双语类型。欧阳觉亚等（1994）采用双语人口数据，使得周氏分类更加精确。

3. 语言选择（language choice）和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孙旭东（1994）根据自己的抽样调查研究提出，双语社会中，制约双语人进行语言转换的因素主要是：实效性，场景的确定和替换以及交际双方的语言水平。王国宇（1990）分析了我国水族双语人进行语码转换时，反映出来的心理特征：①流露民族情感，②表示尊重对方，③唤起回忆，旨在叙旧，④显示自己见多识广，⑤表示郑重，⑥表达愤怒，⑦表示隐私。

4. 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和语言消亡（language demise） 周庆生（1993）提出并论证了我国的“一族一语、一族多语和多族一语”现象，指出我国境内的56个民族中，保持一族一语状况的有38个，处于一族多语，语言转用过程中的有8个，处于多族一语，语言濒临消亡的有7个，全部转用汉语的有两个。戴庆夏（1992）主编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一书中，描述了满、回、土家、畲、仡佬、高山等民族转用汉语的情况。

参考文献

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1-5），（1）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2）彩虹出版社，1992；（3～5）深圳：汉学出版社，1994、1996、1998。

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周庆生）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Phonetic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20世纪初，西方近代语音学在中国文化领域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中开始向中国传播。当时中国正处社会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领域中白话文行将代替几千年的文言文传统，口语中“语同音”的问题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连即将消灭的清王朝也不得不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成立后第二年就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了40个国音音标，即注音字母，议定了5600多字的读音，称为“国音”，从此推广国音，学习国语、研究国音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的中心任务。

早期的国音，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这种国音不存在于任何一种具体方言中，人工的成分太多，实际上是没有人说的。1926年，国音改而采用单一的北京音系。从此，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迈上了向标准语发展的道路。

作为全民标准语的国语，它的语音系统体现在注音字母中，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的拼音字母，学习国语、统一读音、识字教育、字典注音等都要使用它。于是，注音字母和国音的介绍和研究形成热潮，中国现代语音学的源头——国音学也就在国语统一运动中萌芽成长起来。当时，各种以“国音学”命名的著作风行一时，其中以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1924）影响较大。这些著作在解释国音字母的发音原理时，难免有牵强附会，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但是为今天的现代汉语语音学奠定了基础，其中也不乏精辟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20年代中期，刘复以浪纹计开辟了汉语声调的实验研究，揭示出声调的决定性特征是语音的基频，廓清了千百年来对汉语声调云山雾罩的解释。他的《四声实验录》（1924）是国内最早出版的实验语音学专著。

这时期对语音研究作出贡献最大的是赵元任，他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对汉语语调的开创性研究：1927年发表了《北平语调的研究》，认为汉语的语调是由声调、轻重音和说话的口气综合在一起形成的，提出了著名的“代数和”的观点，即“字调和语调是一种代数和的关系”。1933年又发表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扩展和深化了他对字调和语调关系的研究。（二）对现代音位理论的杰出贡献：1934年发表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以丰富的语言材料和精辟的分析，对音位的归纳和分析进行论证，结论是，“把一种语言里的音化成音位系统，通常不止一种可能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的音位系统或答案，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可以只看成适合于各种目的的好坏问题。”这篇论文是国际公认的音位学经典之作。（三）对汉语爆发音的语音学研究：1935年发表的《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对汉语方言中各类爆发音在发音方法上做出精细分析，具有永久性的学术价值。

30年代中国语言学家也出版了一些普通语音学的著作，如张世禄的《语音学纲要》（1934），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1939）。在此之前，胡以鲁在1923年出版的《国语学草创》中也已经对人类的语音、发音机制、发音原理以及语音的分类作了介绍。30年代初，刘复还翻译并出版了法国

保尔·巴西的《比较语音学概要》(1930)。

40年代，受厄于八年抗战，语音研究趋于沉寂，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北京音系作了一些更接近于传统语文学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张洵如的《北京音系十三辙》、《北平音系小辙编》(1949)等。《十三辙》有黎锦熙、罗常培、魏建功所作的序，魏序论述了北京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成为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原因，还特别批驳了轻声、儿化来自外族语言的观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语音学掀起了第二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随着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等工作开展起来的。从运动的性质和内容看，这第二个高潮显然是二三十年代第一个高潮的延续和深人。当时发表的文章也以围绕民族共同语和文字改革问题的居多。1955年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文字改革会议除提请公布实行《汉字简化方案》外，还建议早日议定汉语拼音方案。规范化学术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标准语与北京话的关系，确定了普通话的内容，要求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开展有关汉语规范化的各种工作。

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讨论、普通话的推广、汉语规范化和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有关普通话的语音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广泛地开展起来，各种论著明显增多。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并使用，更促使语音研究进一步深人，这一时期的语音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而引发的音位学研究　50年代初发表的傅懋勣的文章《北京话里究竟需要多少拼音字母》和《北京话音位和拼音字母》都是从这个角度撰写的。文章涉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1. 在音位系统中如何处理声调；2. 按元辅音系统还是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3. 在音位系统中如何处理儿化韵。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有人认为声调应该独立于元音音位之久，单独构成一套调位系统，有人则认为声调只是依附于元音的区别性成分，不能独立成为声调单位。讨论持续了两年之久，问题也逐渐明确，音位本是一种抽象体，认为声调在发音上不能脱离元音因而不能成为独立的音位，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这一时期有关音位学的文章大部分是结合语文改革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的，这反映了对音位学的实用价值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二) 为推广普通话而开展起来的语音学研究　这方面专著和教材数量较多，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著作有两本。

《普通语音学纲要》(罗常培、王均)明显有两个特点：一是介绍并吸收了苏联语音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充分利用了国内实地语言调查积累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料。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以普通话、汉语方言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料为主的普通语音学著作。

《语音常识》(董少文，即李荣)是50年代最早系统描写普通话语音的著作，同时兼及现代北京音系的历史渊源以及与汉语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标志着在西方近代语音学和传统汉语音韵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语语音学已趋于成熟和稳定。

围绕着推广普通话发表的重要论著还有《关于北京音系的一些问题》(陆志韦)、《北京话里的土词土音》(徐世荣)、《北京话里面的一字异读问题》(张清常)，等等。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有关普通话的语音研究转向深入，这方面的文章有《北京话韵母的几个问题》(王辅世)、《语音演变规律

的例外》（李荣）、《谈谈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丁声树）、《北京话的连读音变》、《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林焘），等等。

（三）实验语音学研究　50 年代中后期，语音实验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重新开展起来，当时着重对普通话语音进行声学和生理分析，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对语音教学和语音的定性描写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特性》（林茂灿）根据音高显示器把声调分成开始部分的"弯头段"、结束时的"降尾段"以及声调音高信息所寄托的"调型段"的描述，是对声调实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四）语音规范化研究　围绕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很多，如《普通话的正音问题》（周祖谟）、《现代汉语语音规范问题》、《论审音规则》（王力）、《关于北京音异读字的初步探讨》（傅东华）、《关于汉字正音的几点意见》（赵瑞生）、《语音规范化和正音问题》（高名凯、刘正埮），等等。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主要问题是异读词和轻声儿化的规范问题。北京话里的异读字有 300 多个，构成的异读词常用的达 1200 多个，如果不确定规范的读音，对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化和普通话的推广显然不利。1957 年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确定了审音原则并展开了工作，1963 年归结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轻声儿化的语音规范化因为还涉及词汇规范的问题，情形较为复杂，虽然有一些探讨和研究的文章，但还没有可付诸实践的成果。

7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国际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有了长足进步的实验语音学开始传播到中国，给语音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时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现代汉语语音的各个方面先后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和语音研究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比过去七八十年的总和还要多，内容也比过去深广多了，下面将略作分类，扼要介绍。

（一）有关辅音和声母，元音和韵母的研究　40 年代陆志韦就曾经对注音符号"日"母的音值提出意见，认为一般把"日"母的音值定为 [ʐ]，跟 [ʂ] 在发音方法上并不相当；而且使没有全浊声母的音韵系统出现了一对清浊相配的擦音。傅懋勣也曾经提出"日"母是一个舌尖齿龈半元音。到 70 年代末，王力在《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日"无论从听觉上、语音系统性上以及汉语音韵史的角度说都不可能是一个浊擦音，应定为舌尖硬腭闪音 [ɽ]。由此对"日"母的音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廖荣容、石锋根据实验研究认为"日"母的摩擦程度可以分为强摩擦、弱摩擦和无摩擦，从音位范畴来说，定为 [ʒ] 还是恰当的。王力最后认为应该定为无擦通音，用国际音标 [ɹ] 来表示。90 年代，林焘在《日母音值考》一文中根据语音实验测量音长的结果进一步证明"日"母不具备擦音的音长特性，而是典型的无擦通音。

辅音另一个研究较多的问题是爆发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吴宗济实验研究的结论是汉语送气音除阻时立即有气流量，不送气音在除阻时元音立即跟上，其间并无气流量；送气音气流量的长度为相对的不送气清塞音的 8 倍，不送气清塞擦音的 3 倍。关于辅音和声母的研究还有曹剑芬《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和沈炯《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等文章较有影响。

对普通话的元音和韵母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同样不少，鲍怀翘《普通话单元音分类的生理解释》一文认为传统的单元音三维生理分类虽有缺点，但仍有直观、简便、易与发音器官主观感受相联系的优点，还指出生理实验与分析表明，舌高点前后横向移动对元音音色的变化影响不大，在语音的定性描写中应该更注意舌位的高低。曹剑芬、杨顺安《北京话复合元音的实验研究》对北京话复合元音作了新的探讨，语音实验显示复合元音里主要元音的时长只占整个韵母的九分之一，它只是代表了最大的极点，并不是音响的主要体现者。介音和尾音也都是动态成分，尾音对主要元音的影响大于介音，尾音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目标值与时长关系密切。此外，贺宁基《北京话二合元音感知中的时间因素》、史有为《辅位元音和消极元音》、杨玉芳《元音和汉语声调的感知》等文章也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完全从传统语音学角度探讨普通话韵母文章中有王洪君《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和王福堂《üan 韵母主要元音的音值》等文章。王洪君的文章指出现在通行的普通话韵母分类标准内部不统一，不能说明汉语押韵的特点，特别是不能反映音系内部本音和变音的变化规律，建议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应抓住韵尾这一特点，并使之与韵母的四呼分类相配，构成纵横系列的整齐格局。

（二）*声调和变调的研究*　80 年代由于有了更精密的仪器，普通话四声的声学特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考察。例如，发现阳平除了上升型的音高曲拱外，也还有降升型的（但不同于上声的低降升）；调位的变体跟音节的声韵结构也有关；不同的声调其音强曲线也有不同等等。对声调的这些了解都反映了声调研究取得了新进展。

这时期声调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声调的生理、声学分析跟心理语音学，即听觉和感知连接起来了，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文章有：《声调感知问题》（林焘、王士元）、《普通话声调的声学特征和知觉征兆》（林茂灿）、《关于普通话声调知觉中心的初步研究》（杨顺安），等等。

连读变调研究也是语音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对普通话的连读变调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例如，上上相连，前上变阳平不是语音学中的异化现象，而是音系学上的变化；轻声音节前面的上声变调受深层的语义语法条件的制约；三字组以上的连上变调规律随节律层次走而不随语法层次走等等。更为重要的发展是研究范围扩大到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现象，取得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

（三）*轻声和儿化的深入研究*　林焘首次用语音合成手段并通过听辨测试考察音长、音高和音强三要素对听辨轻声所起的作用；林茂灿、颜景助则用语图仪对轻声的声学本质特征作了分析和考察，看法基本相同，认为轻声与时长短这一特点紧密相联；曹剑芬的实验研究看法略有不同，认为自然语言里轻声的音高变化最为显著，而且相当稳定，音长和音高是构成轻声特点的两个主要因素，但前一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大。

与轻声相关的是重音，60 年代徐世荣对词的轻重音模式曾经有过一些探讨，80 年代这方面的文章才逐渐增多，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重音的声学本质特征是音强还是音长，大多数人认为普通话里正常重音的声学表现主要是有较长的长度和较为完整的音高模式。另一个是普通话里究竟有没有"重中"型的双音节词，殷作炎、陆致极等认为"散布"和"散步"能够形成对立，就是"重中"和"中重"的不同，林茂灿、颜景助等通过声学实验和听辨测试认为还难以肯定这一观点。即使有"重中"这个

重音格式，也是非常不稳定，可变性很大。

"儿"的音值、"儿"的历史来源以及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一直不断地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成为80年代语音研究中一个热点。

最先从语音实验和听辨测试入手对北京话儿化韵进行声学分析和考察韵类划分的是王理嘉和贺宁基，其后林焘、沈炯则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对北京话儿化韵的读音分歧作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李思敬在专著《汉语[ɚ]音史研究》中提出一些与传统研究不同的观点，例如，认为儿化韵的发展趋势不是"由繁变简"，而是"由简变繁"，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要从汉语方言共时的比较中去探讨。

这时期儿化韵研究中，对卷舌元音中卷舌成分的性质、儿化韵在普通话中的地位以及儿化韵的音位处理等问题都有过较深入的讨论，但还没有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四）语调研究　自从30年代赵元任开拓了汉语语调研究领域之后，几乎有半个世纪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后才有了新的进展。吴宗济从连读变调入手，通过实验分析，证明普通话语句的一切声调变化都是以单字调和二字连读变调为基础的，这些基本调型就是句调的基本单元。普通话的句调就是在语态影响下受语法制约的基本单元的声调曲拱。沈炯提出了声调音域和语调音域的概念，认为汉语的语调是由一连串声调音域组织起来的音高调节形式，语调通过对音域的上限和下限起调节作用，通常上限的调节变化与语义加强有关，下限的调节变化与节奏单元的完整性有关。后来又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音高载信系统的认识和音高多阶调节的概念。瞿霭堂、劲松从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特点出发，通过声学实验表明北京话的语调是单纯的音高韵律特征，它的载体主要是句子最末一个节奏单元中的重读音节。字调、词调和语调之间通常有替代、借用和融合三种关系，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属于融合关系。胡明扬则从传统语音学的角度对北京话的语调进行考察，认为北京话的句终语调跟音高、音长和音量都有关系，不同的语气都是靠加强重音来表示的。

（五）音位学、现代音系学和汉语语音研究　游汝杰、钱乃荣、高钲夏《论普通话音位系统》一文从方法论上论述了按声韵调体系归纳普通话的优越性，并首次用国际音标归纳出普通话的声位、韵位和调位。文章富有启发性，拓宽了大家对普通话音位分析的思路。这篇文章引起了一次有关普通话音位归纳方法的讨论，加深了对音位学的理解。

80年代后普通话音位研究的另一个新的突破表现在音位分析进入了更小的区别特征层，音位系统由为数更少的更小的区别特征组成。二元对立的区别特征矩阵一目了然地显示了音位之间的全部对立关系。区别特征理论成为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基础。在普通话语音研究由音位层进入特征层方面，吴宗济、叶蜚声、徐通锵、陆致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

这个时期语音学专著也比以前大为增多，如《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语音学教程》（林焘、王理嘉）、《普通话语音知识》（徐世荣）、《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音系学基础》（王理嘉）、《现代汉语语音概要》（吴宗济主编）等等，都有较大影响。

20世纪的中国语音学从开创到成长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最后20年，发表的文章和专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都有了显著的进展，而且跟国际上一样，明显地呈多方位横向结合的趋

势。首先，语音学领域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语音学、音系学、实验语音学在20年代前后分化成不同的学科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独立发展后，最近又逐渐呈趋同的倾向。其次，语音研究同通讯工程、信息处理、言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的关系也日趋密切。80年代起语音研究与以前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科学院的声学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及高校系统的语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教师已经紧密的结合起来，开发了许多共同研究的课题，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新兴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正在逐渐形成。语音学的研究和现代科学、现代工程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将为中国语音学作出更大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语音学也必将对世界作出更多回馈。

参考文献

吴宗济：《普通话声调实验研究四十年》，载刘坚，侯精一主编《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王理嘉：《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载《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王理嘉）

普通话语音规范研究（Normalization of the Speech Sounds in Putonghua，Studies of）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民族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标准音只能是地点方言的语音，而不能是地区方言的语音，一个地区方言往往包含许多地点方言，各个地点方言的语音不完全相同，所以用地区方言的语音为标准实际就是没有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首先因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现在仍旧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在北方话里最具有代表性，北京语音在各方言语音中最具有影响力。民国时期推行国语，1924年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至今已有70多年。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早已得到各方言区民众的认同。

作为标准音的北京语音，指的是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因此我们对北京音系的音位不能随意增删。曾经有人主张，在标准音中增加尖音和团音的分别，以区分同音字；还有人主张，在标准音中取消声调的分别，以方便方言区民众的学习。这些建议都是不妥的，因为都破坏了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不是说每个字每个词的具体读音都要依照北京人的读法。民族共同语并不同于方言，它有超方言的性质，要求全国人民说话都跟北京人一模一样，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北京人的发音中，包含着一部分土音，而土音是不属于普通话的。例如，北京人把“淋雨”的“淋”读lún，把“岗尖儿”的“岗”读gàng。这些都不是普通话的读音。哪个读音属于土音，不属于普通话，这要结合词汇的规范研究来解决。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要落实到普通话词汇的读音上。普通话词汇的读音必须是明确的、一致的，不允许是模糊的、两可的。普通话的审音工作，是汉语规范化工作，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异读词读音的规范。异读词指的是同一个词，在北京音中却有不同的读法，而哪一种读法都有相当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人误读。例如“供给”，有人读gōng jǐ，有人读gòng gěi；“酝酿”有人读yùn niàng，有人读wēnrǎng；“质量”有人读zhì liàng，有人

读 zhī liàng。必须在几个不同的读音中做出选择，确定规范的读音。

1956 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北京话里存在的异读词的读音进行审订。审音委员会在 1957 年 10 月、1959 年 7 月和 1962 年 12 月先后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正编、续编和第三编，1963 年 2 月辑录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简称《初稿》）出版。审音以词为对象，不以字为对象。审音大致根据以下几条原则：（1）一个字的读音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音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音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话里，“危”念 wēi，“期”念 qī，“帆”念 fān，这些音不合一般发展规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2）“开、齐、合、撮”的读法，原则上以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为准。例如，“淋”采用 lín 的音，不采用 lún 或 lún 的音。（3）古代清音入声字在北京话的声调，凡是没有异读的，就采用北京已经通行的读法。凡是有异读的，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阴平调，原则上采用阴平。（4）每个词原则上暂订一个音，但是也有少数词保留了两个音，例如，“血”xiě、xuè。根据上述原则，三次审音共审订了 1800 多条，普通话常用词里的异读词基本审订完毕。《初稿》自公布以来，受到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广泛重视，对现代汉语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汉语语音有了一定发展，《初稿》中审订的有些读音需要重新审定；同时，作为语音规范的标准，《初稿》也需要修订成为定稿。1982 年 6 月重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初稿》进行修订。经过三年的工作，修订完成，于 1985 年 12 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次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订读音的改动，力求慎重，形式改为以字系词，共审订字头 848 字，其中属于古入声的字就有 244 个，占 28%。《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当前异读词读音的规范。第二，轻声的规范。一个词或一句话里的某些音节念得短而弱，失去了原有的声调的叫做轻声。轻声没有固定的调值，大部分轻声字都有自己的本调。语法上的轻声带有较强的规律性，如助词“的、地、得、了、着、过”，语气语“啊、吗、呢、吧”，词缀“子、巴、们”等读轻声，而词汇里的轻声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有的轻声可以区分词义和词性，例如：“蚊子”和“文字”词义不同，“报酬”和“报仇”词性不同。除了这些能辨义的以外，还有些词虽然不能辨义但非读轻声不可，如“月亮、豆腐、芝麻、明白”等。《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里审订的轻声字有 27 个，如“胳膊”的“膊”读 bo，“打点”（收拾、贿赂）的“点”读 dian。史定国发表《普通话中必读的轻声词》（《语文建设》1992 年第 6 期），对规律性不强的那一部分，从常用程度、语音因素、非语音因素和表达效果等方面考察，最后选出“普通话常用必读双音节轻声词 200 条”，如：巴结、巴掌、包袱、本事、荸荠、编辑、扁担，可供参考。第三，儿化词的规范。儿化词在北京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十分生动并充满活力。张洵如著《北平音系小辙编》（1949），汇集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词 3000 多条。贾采珠著《北京话儿化词典》（1990），收儿化词语近 7000 条。从规范化角度看，需要确定北京话中哪些儿化

词语应进入普通话，林宝卿发表《普通话的儿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4期），对《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儿化词做了整理，得到儿化词1350条，其中有区别词义和词性的170多条，口语里必须儿化的词有340多条。作者认为这500多条是广播员、演员、中小学教师必须掌握的，也可供参考。

北京语音在现代汉语各方音语音中占有重要地位。语音学家多年来对北京语音做了大量的研究。1953年傅懋勣发表《北京话究竟需要多少拼音字母》，这是国内第一篇从音位学角度讨论北京话拼音字母的文章。1956年至1957年，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北京话音位的讨论。在这以后的十年间，不断有研究北京语音的论文发表，对北京音的儿化、轻音、连读变调、音节数目等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和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北京话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用现代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北京话语音的论文，对北京话元音、辅音、声调、儿化韵、轻重音、连读变调、语调等都进行过相当深入的实验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些传统语音学无法发现的语音现象，对汉语语音合成与识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促进了北京语音规范的完善。

参考文献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

徐世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苏培成）

普通话音位系统研究（Phonological System in Putonghua，Studies of）

西方早期音位学的理论和方法很早就传入中国，赵元任发表在30年代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后来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之为经典性论文。40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哈忒门和霍凯特先后也曾经对汉语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了音位分析。但本世纪上半叶国内很少有关于音位研究的论文。

普通话的音位研究是50年代随着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开展起来的。最早在这方面发表文章的是傅懋勣，1956年他在《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一文中，把声调作为附着在元音之上的区别成分，不同声调的元音就是不同的元音音位，北京话有6个不卷舌的单元音音位/a ɤ e i u y/，配合四声构成24个元音音位，此外还有28个卷舌元音音位，共计52个元音音位。傅文在音位分析中处理声调的方法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集中在声调究竟是依附于元音的区别性成分，还是独立的音位成分，讨论持续两年多，最后明确了声调是汉语音位系统中独立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可以大大地简化元音音位的总数，还可以突出声调在汉语语音系统中的地位。

60年代，王辅世的《北京话韵母的几个问题》较全面地讨论了北京话韵母的音位问题，全文审音精细，论述严谨，在处理音位的分合上十分注意本音系统（基本韵母）和变音系统（儿化和轻声）的内在联系，对音位分析中的系统性原则的应用有独到之处。

80年代有关普通话的音位研究有两个新的突破：其一表现在音位体系上，其二表现在音位的区别特征上。

欧美各国是以音素制的拼音字母去体现自己的语音系统的，所以他们的语音研究、音位研究总是以音素作为出发点。汉语传统的语音研究是从声母、韵母和调类人手的，

西方语音学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把元辅音分析和声韵调架构相结合的体系，但是，在汉语音位系统的研究中则一向是从音素分析入手归纳出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赵元任早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一文中就曾经提出，就汉语来说，也不妨按照声韵调体系来划分音位。首先采用国际音标（而不是注音字母）来建立普通话声韵调音位体系的是80年代游汝杰、钱乃荣和高钲夏的文章。在《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一文中，他们把普通话语音归纳为22个声位，4个调位，同时指出：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统一使用了音位分析中的不充分分析法；而按元辅音系统归纳音位则是分析辅音采用不充分分析法，分析元音采用过度分析法，在方法上是不一致的，在反映汉语语音结构的精确度方面有高低优劣之分。

这两种音位体系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元音音位和韵母音位方面，游汝杰等所列的韵母系统与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相差甚微，因此没有引起讨论，但对元辅音体系音位归纳法的批评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针锋相对地认为音位归纳必须以语音的最小单位——元音和辅音作为基础，否则就违反了音位分析的基本原理。另一种意见认为音位分析并不要求统一使用一种分析法，通常恰恰是动态辅音往往从合，动态元音往往从分；两种不同分析法各自运用于不同的目的，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普通话音位分析中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元辅音体系，王理嘉《音系学基础》曾比较和讨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大体上说，在辅音的音位归纳中主要有两个问题：1.零声母音节开头的辅音成分［ʔ j w ɥ］等的归属问题。这些辅音成分是应该归纳为一个辅音音位/ø/（零音位），还是分别归入相应的元音音位的变体？从音位总数的多少和音位标音的操作上看，后一种似乎更好一些。2.舌面音与舌根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的多重互补问题。从声母与韵母四呼的配合看，舌面音同时跟其他三套辅音构成了互补关系，它可以跟其中任何一套归并在一起。音位归并上的各种可能曾分别被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国语罗马字等多种汉字拼音方案采用，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所采用的让舌面音自成音位的方案，在音位归并的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

元音音位分析中，一个主要的分歧意见是舌尖元音应该归入/i/音位，还是自成音位。分与合的论据针锋相对，意见的不同反映了音位归并原则本身的局限性，在分布上它们确实是互补的，但语音是否相近则很难有客观标准。合可以减少一个音位，符合总数以少为贵的原则；分则对表现语音系统内部的相关性有价值。意见最为分歧的是，［e ɛ ə o ɤ ʌ ɚ］等中元音的音位归纳。对［ɚ］韵母主要有两种意见：（1）整体处理，即独立成为一个卷舌元音音位，注音字母就是这样处理的，为之单独设计了一个字母“ㄦ”；（2）分解处理，把卷舌成分［-r］分离出来，作为辅音音位/r/的一个变体，剩下的央元音［ə］，则跟其他中元音合在一起处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从减少音位总数和有利于儿化韵的音位处理来说，后一种方案更合理一些。［ɚ］以外的其他中元音在分布上都是互补的，可以全部归并为一个音位/e/，也可以分别归并为两个音位/e/和/ɤ/或三个音位/e/、/ə/和/o/，也有人主张分为4个音位/o/、/ɤ/、/ɛ/和/ə/。由于儿化韵中［ə］和其他三个中元音［o ɤ ɛ］发生对立（如“盆儿”［p'ər］：“婆儿”［p'or］；“根儿”［kər］：“歌儿”［kɤr］；“须儿”［ɕyər］：“靴儿”

[ɤγεɔ])。较理想的办法是把 [ə e ʌ] 和 [o ɤ ε] 分开，分别归并为两个中元音音位。

音位研究的新进展还表现在区别特征理论开始出现在普通话音位研究中，吴宗济为普通话 10 个元音音位拟定了 7 对区别特征，为 24 个辅音音位拟定了 11 对区别特征，为 4 个调类拟定了声调特征系统，主要是根据语音的声学特征界定的。叶蜚声、徐通锵根据发音生理特征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建立了一套区别特征，把区别特征理论引入了高校语言学概论的课程中。陆致极从生成音系的角度拟定了普通话音段音位的区别特征，一共 12 对，但没有为它拟定一套可以从底层音位形式自动生成表层读音的规则。

这一时期新兴的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介绍到国内，以王嘉龄的工作作得最多。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普通话音段音位的研究影响并不大，倒是有不少文章用后 SPE 中的非线性音系理论对汉语的声调、变调、轻声和儿化的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

王洪君在《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一文中，通过梳理普通话语音研究中的种种分歧意见，揭示出结构主义自立音位学在理论上和分析程序上的缺陷，认为必须走出自立音位学的误区，用当代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中国语音学传统的本音和变音的音系模式去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译文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王理嘉）

汉语语音实验研究（Chinese Experimental Phonetics）

二三十年代——辉煌的开端　20 年代，刘复在法国留学时率先用浪纹计研究汉语声调，得到了声调的音高 F0 曲线，1924 年出版了《四声实验录》；他发明的"乙一声调推断尺"和"乙二声调推断尺"，为汉语声调研究提供测量手段。刘复通乐律，他回国后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为我国语音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白涤洲是刘复的学生，写了《关中声调实验录》以及有关北京话声调的论文。王力 1927 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也是用浪纹计记录的。

赵元任几乎与刘复发表《四声实验录》同时，在《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汉语声调就是音高频率的变化，他用简单乐器和渐变音高管来模拟声调的音高，确定声调的调值；1930 年又发表了《一套标调的字母》，创立了标写声调的符号系统，为中国语言的声调研究奠定基础；30 年代，在赵元任担任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期间，建立了一个很完备的语音实验室。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在语音学理论及语音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是处于先进行列的。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了，研究部门和大学西迁，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五六十年代——重新奋起　1950 年 6 月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入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语音实验研究小组。这个小组有成套的丹麦 B.K 声学分析仪器，1963 年添置了美国 Kay 语图仪。为适应当时通讯事业发展的要求，着重对普通话语音进行声学和生理分析，出版了《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8）。这本发音图谱用

X光照相和颚位照相方法，把普通话全部辅音及元音发音部位分别拍摄成照片，再据以绘制成图形，它不仅对语音教学有用，而且对语音发音研究有参考价值。此外，由吴宗济和周殿福主持，到1965年为止，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包括“总论”，“实验方法”，“元音”，“辅音”和“声调”等五卷。这部实验录虽然未能出版，但其主要成果都已先后发表。我国语音学工作者正在奋力工作，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之时，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语音实验研究被迫停了下来。值得庆幸的是，人员未散，仪器保存良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语音实验研究立即得以恢复。

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语音实验小组基础上成立语音研究室。这一年八九月间，中国语音学家出席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这是中国语音学家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会上吴宗济被选为国际语音科学会议常务理事。1979年夏，美国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授“实验语音学”课程，并作“语言的发生”等四次讲座；1981年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以八旬高龄回国作学术讲演，并亲自发音录制国际音标，这些学术活动对我国语音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1979年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用实验方法研究普通话语音，并开设“实验语音学”课程，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86年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音。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大学中文系也相继建立了语音实验室。随后，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也建立了语音实验室。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80年代开始进行汉语语音的实验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也开展了吴语和粤语及普通话语音的实验研究，90年代初香港城市大学正式成立了语音实验室。

80年代以来，我国汉语语音实验研究的特点是积极面向言语工程，许多研究课题是根据言语工程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的，一些研究人员运用语音学和语言学知识参与研究汉语言语识别问题，积极研究汉语语音合成系统。

《北京语音实验录》（林焘、王理嘉等，1985），《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等，1987），《实验语音学纲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国语字调的声学语音学研究》（英文）〔Tseng，Chiu－yu（郑秋豫），1990〕，《普通话韵律学》（英文）〔Shen，Xiao－nan Susan（沈晓楠），1990〕，《语音学教程》（林焘、王理嘉，1992）和《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杨顺安，1994）等著作，部分地反映了我国语音学工作者在国内外运用各种实验手段进行汉语语音研究取得的成果。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从1988年起每隔一年出版一期英文本《语音研究报告》，集中反映了该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对加强国际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的《语言学论丛》第十一辑（1983）刊登了王士元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实验语音学”课程和所作“语言的发生”等四次讲座的讲学内容，对普及现代语音学知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语音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创造性论文，主要涉及汉语语音的声学表现，也探讨其感知和生理问题；不仅研究普通话语音，近年来关于吴语、粤语和闽语（及台湾话）语音的实验研究也日趋活跃。近几年，在“音节间声学过渡”，“轻重音”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今后研究方向 今后在研究音节内语音现象的同时，应大力研究（朗读的和自发说的）语句乃至篇章中的语音现象，在近期内应在汉语语调方面有个大的突破；应研究话语的韵律结构，从而掌握汉语语句乃至篇章是如何由词及短语所组成，以及在这种“组合”过程中，音段和超音段是如何变化的，以大力促进我国言语工程的发展，繁荣我国语言学事业。

参考文献

林焘、王理嘉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实验语音学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刘复：《四声实验录》，上海：群益书社，1924。

（林茂灿）

汉语轻音和重读研究（Stress Pattern in Chinese, Studies of）

汉语轻重音研究始自本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最早提出“轻音”的概念。他在《国语罗马字研究》（1922）中讨论声调符号时说，“轻音字永远轻读的也用去声符号（就是不用符号），偶尔轻读仍照原来的声调写”。后来在《新国语留声片课本》（1934）中正式使用轻声这个名称。张洵如 1947 年写《国语轻重音之比较》，提出了轻重音的说法，1957 年编成《北京话轻声词汇》一书，收集了大量的轻音资料。1958 年，苏联学者扎多延柯用浪纹计对轻声的声学性质作了实验研究，发表了《汉语弱读音节和轻声的实验研究》一文，指出轻声在声学上的决定性特征是时长短。80 年代，对轻声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1980 年，林茂灿、颜景助发表文章《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用声学实验的方法，利用语图仪测量两字组字音的时长、共振峰、基频和幅度大小。得出的结论是轻声时长比相应带调音节时长约缩短一半；读轻声所用能量显著减少；轻声音节里的元音尤其主要元音向央元音方向移动；轻声音节的 F0 曲线跟前面重读音节声调有关。1982 年，林焘用语音合成的办法，对 15 对自然度比较高的重轻型双音节词语，分别变换这些轻声词的音强、音长和音高的参数，通过听辨考察这三个要素对听辨轻声所起的作用，听辨实验结果发现，强度对分辨轻重音的作用很小；时长在听辨轻重音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频在听辨轻音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音高重要，它的作用主要在轻声音节起点的高低，调型的升降对听辨的影响比较小。关于音高与音强在听辨轻声中的作用，曹剑芬做的实验认为一个字只要它的声调是轻声型的中降调或中平调，而不是原来的单字调型，那么，即使字音的长度不缩短，听起来也仍然是轻声。听觉上的轻声的高低度不是从起点音高而是从收尾音高感知到的。

从音位学的角度，赵元任把汉语普通话分为三种重音：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音（1968，1979）。林茂灿等在 1984，1988，1989 年所做的一些实验《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研究》，《北京话三字组重音的声学表现》，《普通话轻声与轻重音》，认为这三种重音的声学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1990 年，林茂灿等进一步做实验，认为轻声音节的 F0 曲线形成，是由于它跟前面重读音节发生声调协同发音所致。

《现代汉语》（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指出，“汉语里轻重音的概念跟西方语言很不相同。西方语言着重在重音的概念，而汉语恰恰相反，着重在轻音的概念。”较概括地指明了汉语轻重音的特点。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林茂灿、颜景助：《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方言》，1980.3。

林焘：《探讨北京话轻声性质的初步实验》，林焘、王理嘉等著，《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陈肖霞）

汉语连读变调研究（Tone Sandhi in Chinese, Studies of）

汉语的每个音节单说时都有一个固定的"单字调"调值，两个或多个音节连着说时，音节的调值可能与单说时不同，这种现象就是"连读变调"，连读中出现的调值叫"连调"。连读变调标志出语流中比音节更大的节奏单元，如音步、音系词、音系短语等。

20世纪前，传统的中国音韵学只重视单音节的"字音"，对多音节的连读变调现象未给予注意，只有个别传教士曾注意并简单描写过方言中的此类现象（如1853年J.Edkins的《上海口语语法》）。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家开始注意连读变调。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最早给出了两字、三字连读变调调查表。虽然因条件限制并未能实施连读变调的调查，但这一表格创立了以单字调为本，以各种单字调类的各种搭配为条件描写变调的"字本位"描写模式。这一模式处理汉语效率极高，在国内一直沿用至今。该表的另一特点是把成词/不成词等语法因素也作为制约变调的条件。此后至40年代末，连读变调得到较多的描写。陶燠民《闽音研究》（1930）、罗常培《厦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41）是以"单字调/变调"模式全面描写一个具体方言的典型代表，分别整理出了福州、厦门、临川变调与单字调对应的一些规律。普通话的"连上变调"现象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描写（如赵元任《汉语的字调与语调》，1933）。

50～60年代是连读变调研究的停滞期，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工作未及涉及连读变调问题。值得注意的有单篇论文《绍兴话记音》（王福堂，1959）和《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郑张尚芳，1964），是国内最早全面系统地记录吴语连读变调的文章。

1978年以后是连读变调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共时描写还是理论探讨，都较以前有了质的提高。

在描写方面，仅在1979年至1985年的《方言》杂志上，就有30余篇有关连读变调的文章，涉及的方言点主要分布在吴语、闽语和官话。其中引起较多注意的有：李荣的《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张盛裕的《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吕叔湘的《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的《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等。普通话连调的描写有了新的进展，林焘的《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1985）指出，一部分北京人除"连上变调"外还有"连去变调"（前字变阳平）的模式，该模式带"土"的风格色彩。此外，这一时期撰写的大量方言志，也大都包括了对连读变调的详尽描写。大量详尽的描写为理论探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a. 变调类型的总结。余霭芹（A.O.Yue - Hashimoto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ts*"，1987）将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总结为三种类型：北部中部吴语的首字定调型，南部吴语的末字定调型和条件定调型。其他

学者提出了潮阳话的颠倒互变型和厦门话的"钟式循环变调型"。其中吴语的"首字/末字定调型"因与自主音段声调学的"声调特征扩展"模式一致而受国外华人学者的关注最多。b. 连调与语法因素的关系。新的研究发现，连调的条件不仅可能与词和词组的分别有关，还可能与词组的语法结构类型有关。在这些新的材料的基础上，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学者（如陈渊泉、沈同、张洪明等）又进一步地探讨了语法层面和音系层面之间是否有直接制约关系等理论问题。c. 单字调与本调的区分。"单字调"和"本调"国内学界在1978年前一般不做区分。后来的研究表明，如果从历时的角度看，有的连调比单字调类别更多、更古老。如山西忻州连调中区分阴平和上声，单字调中合流（温端政，《忻州方言志》，1985）；闽南许多方言中单字调阳高阴低而连调阴高阳低，连调值无疑更古老（余蔼芹，*The Linguistic Mechanism of Flip Flop*，1972）；同时也有大量单字调较连调类别更多、更古老的现象。这些讨论使得不少学者不再使用可能带有历时含义的"本调"来指称单字调。d. 连调与节奏单元。1980年以后在美国韵律音系学"语音词"这一概念的启发下，中国学者开始提出连调是语音词的标记的看法。在吴语的许多方言中，单字调很不稳定，连调则完全合成与单字声调调型相同的轮廓，"词调"的概念更显必要（五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1986）。此外，端木三对连调域与音步和重音的关系多有精彩的讨论。e. 连调与单字调的相互关系，与句调、强调重音、表情语调的相互关系。吴宗济、陈渊泉、沈炯等在这方面多有研究。

1978年以来的研究揭示了连读变调在音系与语法接面问题上的重要理论价值，在句法韵律结构中的重要中介地位。今后的研究可望向综合方向发展：1. 对成片地区连读变调的综合研究，以总结连读变调的类型，变调的语音、语法条件，进一步弄清连读变调的深层机制。2. 继续加强句调、强调重音、表情语调对连读变调再调整的研究，并将这一研究跟连调、句调、表情语调与语法、语用信息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制定在单字调和语法条件制约下自动生成连调域界线和调型的规则。

参考文献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新一版），1956。

陈忠敏：《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语文研究》，1993.2～3。

（王洪君）

儿化韵研究 (Retroflex Suffix - er, Studies of)

30年代国语运动时期，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学者都曾对北京话儿化韵进行研究，钱玄同在黎锦熙、白涤洲编写的《佩文新韵》一书之后附列出北京话九类儿化韵，并对各韵的变化做了说明。1949年张洵如《北平音系小辙编》出版，收集了北京话儿化韵词语3,000多条，并对儿化韵的功用做出较详尽的归纳，这是第一部研究儿化韵的专书。50年代以后的语音学著作都对北京话儿化韵的特点有所描述。60年代以后，学者们纷纷对儿化韵从发音生理、声学特性方面以及对社会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以下举出其中较突出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语音研究室先后用x光摄影和x光录像对"儿"和儿化韵进行了发音生理实验分析。《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指出"儿"发音时，从其最后阶段的x光静片看，"软腭上

升，鼻腔通道关闭。舌前端抬起和硬腭前部相对，比 - i（知）略前，而收紧点比 - i（知）窄，舌横面大部下凹、两边卷起。从舌面前部往后成斜坡形，后声腔和 - i（知）相近"。鲍怀翘、杨力立（1986）把北京话全部儿化韵作了 x 光录像，然后进行了卷舌元音的生理分析。从对 x 光录像的观察中，可以看到卷舌元音有舌尖一开始就上翘，或舌尖上翘动作随后形成的发音方式上的不同。

王理嘉、贺宁基《北京话儿化韵的听辨实验和声学分析》（1983）中指出，"儿化韵的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音素成分，面是贯串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儿化韵韵尾的共振峰模式不是固定的"，"声学元音图中儿化韵的动程走向是有规律地分布的"。

杨顺安《普通话儿化音节规则合成的初步研究》（1991）中经过实验分析，参考以上王、贺的分析结果，提出了一套儿化音节规则合成的指数式动态模型参数。杨顺安为儿化韵尾/r/设定了三组共振峰频率目标值，为指数式动态模型设置主要元音和/r/间的分界时长和过渡速率因子，再利用指数式动态模型计算该儿化韵母的共振峰频率的时变轨迹，为 ng 尾的儿化韵安排有关鼻化参数，从而达到了科学地合成全部儿化音节的结果。

林焘《北京话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1982）以及林焘、沈炯《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1995）中指出儿化韵中有几组韵母在北京人中存在着发音差异。文章通过调查统计指出了这些儿化韵分合的条件，试图从差异的情况说明儿化韵可能的发展变化。

1986 年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一书对儿化韵的历史演变做了详尽的考证。80 年代以后，汉语方言研究对汉语方言中的各种儿化现象也有较细致的调查，大大拓宽了儿化韵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张洵如：《北平音系小辙编》，上海：开明书局，1949。

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周同春）

汉语语调研究（Chinese Intonation，Studies of）

本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已经开始考察汉语语调问题。30 年代初赵元任发表的《中国字调跟语调》（英文）等文为语调研究作出里程碑意义的新贡献，奠定了汉语语调的研究基础。赵元任假设了声调与语调两种音高因素的各种"加法"（addition），后来又果断地把下降尾音和上升尾音处理为表示语气的助词。赵元任在音程加大说上着笔之多远远超过他的代数和说，可是音程加大说几乎是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被人重新认识。从赵元任的音程、调域（the range of pitch between tones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ones）和"橡皮带"效应到现在大家都说的音域、音阈、声调音域、格子、板块、移调等，虽然还有概念差异，但已经相当接近了。

30 年代以后有关语调研究的论著不多，大都是以诠释赵元任早期学说为主，有些学者依据音感提出一些新见解，例如以抑扬说质疑升降说等。学者们长期在广义语调和狭义语调的分野上徘徊。到了 80 年代，语调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汉语语调艰难的现代化探索中，吴宗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起到了先锋和传承作用。吴宗济的基本思路是"多字连读变调在语句的调型构成上承担

着基本单元的任务”。在连读变调之外，吴宗济在1982年就提到了调阈与语调的关系；90年代以后又有一系列论文详细讨论基调和调阈的概念，并且提出了移调的概念，是为合成技术设计的新思想。

80年代初，张家騄与丹麦隆德大学E.Garding合作研究汉语语调，1983年共同提出的格子模型是富有解释力的语调认识工具，具有普遍意义。沈炯1982年完成的学位论文《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中有与上述模型巧合的地方，该论文到1985年才正式发表，这种巧合说明，汉语语调同一种事实被东西方共同确认。沈炯在实验研究中提出，声调和语调是用不同方法切分得到的语言学手段，语调是由一连串声调音域组织起来的音高调节形式，语调对声调音域的上限和下限分别起调节作用。在声调音域认识的基础上，沈炯1992年在《汉语语调模型刍议》一文中为汉语语调模型描述了较为完整的轮廓，1998年又在《汉语语调分类和标记方法试说》一文中进一步描述了汉语语调类型。

1994年，陆亚民、吕士楠和周同春等《疑问句语调模型的研究》一文对疑问语调的调域问题做了深入的实验研究。1995和1996年，吕士楠和初敏为汉语文语转换系统设计了韵律系统，对音域上限和下限受重音、呼吸群和语调的调节做了参数和韵律符号的设计，他们用PSOLA技术实现的这一文语系统相当成功。汉语语调研究在本世纪末已经和汉语文语转换系统密切结合，到下世纪初有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赵元任：《中国字调跟语调》（英文），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本2分，1933。

沈炯：《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林焘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吴宗济：《汉语普通话语调的基本调型》，《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沈　炯）

节奏和韵律研究（Linguistic Rhythm and Prosody, Studies of）

韵律泛指语音信号中除了音素（音段）的音质特征以外的一切语音现象，如音高、音长、和音强以及由这些特征组合而成的声调、重音和语调。韵律能使语句产生高低起伏、节奏快慢和抑扬顿挫的变化，从而表达出各种语义、情感和态度，使语言不仅达意而且生动传神，因此成为语言学（句法学、词法学、语义学）和语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诗词格律研究的对象。合辙押韵中的“合辙”指的就是声调在上下语句中的各种搭配模式。

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声调语言，因此对韵律的研究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汉语的声调不仅具有固定的调型，而且在连读中产生多种变调模式。在多音节词和短语（有成为呼吸群、声调群）中，由于重音的影响，调域、长度和音强都可能得到扩展，产生所谓“牛皮筋”效应。汉语的语调更有一个与声调的关系问题。赵元任形象地比喻为“大浪与小浪”的关系。目前在语调研究上有两种主要看法：其一认为汉语有独立的语调模式，这就是语句中声调的高音线、低音线的走向；其二认为句子中各短语（呼吸群）的平均音高产生位移，正是这种位移构成了语调模式，而短语中的声调和变调格局是不变的。

当前，韵律研究对言语工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能改善合成语音的质量，提高语音识别的效率，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带有韵律标记的语音数据

库。这套标记方法称为“声调和中断（停顿）指数”（Tone and Break Index），简称ToBI。

独立于语音学的音系学也十分重视对韵律的研究，派生出了“韵律音系学”（Metrical Phonology）。这一理论的研究单位是作为一级音系单位的音步（feet）。有两种表示方式：节律树（metrical tree）和节律栅（metrical grid）。根据这一理论将节律结构分成大小不等的单位和层次，每一个层次上用一个或多个星号表示重音的等级。在音系理论中，声调被分解为声调特征（音节的单值音高，如H、L、M）和声调模式（由H、L、M等组合而成的声调形态），然后由一系列的规则去说明声调与音素的关系、连读中声调的变化关系和语句层面的分析方法。但是这种理论一般都是根据西方语言事实提出的，对于汉语这类单音节性的声调语言，尚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鲍怀翘）

汉语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研究（Chinese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Studies of）

语音识别和合成是言语工程技术的核心，是在当今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推动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音识别”被定义为“能对人的言语作出适当反应的计算机程序所完成的任务”。“语音合成”被定义为“运用电子技术产生能让人听得懂的人工言语的过程”。虽然，开始时语音合成是用电子器件完成的，但目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语音合成系统都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目前常常用“文语转换系统”这个名称来取代“语音合成”，它是指利用计算机将文字转变为言语的技术。不管语音识别和合成，都是以计算机为依托的技术，逐渐成为计算机技术的一部分。这些工作都是在语音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人机交互系统，尤其是人机语音对话系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项技术从50年代开始，到这个世纪末，已日臻完善。汉语的识别和合成在国际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形势的推动下，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61年，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完成了汉语10个元音的识别，但汉语识别实质性的进展是在1977年，声学所俞铁城提出了时间归一、二值频谱的图样比较语音识别方法，取得对特定人的、有限词汇的准确识别率达到99%的好成绩。80年代开始，识别方法已从动态规划模式识别方法，过渡到隐马尔科夫模型的统计方法。识别任务从有限词汇到大词汇；从特定人到非特定人；从孤立音段到连续语音。国内从事语音识别的单位越来越多，目前从事此项研究的重要单位有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不少的成绩，在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人机语音通信学术会议上有近100篇论文发表。

汉语语音合成的研究最早是在70年代末由一些中国学者如李子殷、黄泰翼、张家騄等在国外完成的。在国内，语言研究所杨顺安完成了汉语合成方面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了普通话音节的SIFS框架模型，并用共振峰技术成功地合成了汉语所有的音节，对汉语语调控制和文语转换系统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在进行汉语合成研究的还有石波，吕士楠等。80年代末，一种称为基音同步波形叠加（Pitch Synchronous OverLap-Add）的简洁的语音合成方法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方法没有参数提取和波形重建的过程，信号损失少，合成语音的音质好。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初敏首先将它用于汉语合成，同时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韵律控制规

则，使汉语文语转换系统的音质比原来的参数合成提高很多。这个系统合成语音的清晰度已经超过90%，自然度达到3.9（MOS）得分，接近实用化的水平。目前，波形拼接合成已成为汉语合成的主流技术，国内从事语音合成，并取得良好成绩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吕士楠）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Lexical Stu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最早研究到现代汉语词汇现象的，是薛祥绥的《中国言语文字说略》（1919）和黎锦熙的《国语讲坛·词类连书条例》（1921）、《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1923），不过他们的分析距科学地理解词的结构的性质还相当远。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对于词义、成语的零星探索。吕叔湘、王力、高名凯各在其40年代出版的语法著作中，都谈到词如何同字、语素、词组等区分开的问题。

到50年代，受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现代汉语的研究才分出词汇一支。1956年，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在《语文学习》上连载，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出版，首次引起学界认识到汉语词汇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但是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一些问题。50年代后期，先后有高庆赐《同义词和反义词》（1957），崔复爱《现代汉语词义讲话》（1957），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及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1959）出版，同时也涌现了不少探讨词汇问题的大大小小的论文。

如果说，50年代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轫期的话，那么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就是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作为发展的标志是，同义词的确定依据、熟语的类别划分、新旧词语的确定等问题，被提出来展开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有的学者就词汇是否成体系的问题，作了升华到一般理论上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三年，李行健、刘叔新《词语的知识和运用》修订版（1979）以崭新面貌出版。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始恢复了生机，步入新的发展时期。80年代以至90年代，陆续有多部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著作问世。主要的是：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郭良夫《词汇》（1985），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1985），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5），许德楠《实用词汇学》（1990），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也相继出版了多部个人论文集：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1984），郭良夫《词汇和词典》（1990），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1993），周荐《词语的意义和结构》（1994），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1994），卢卓群《语法词汇问题论集》（1994）。还有三部专门研究词义的著作出版，分别是苏新春的《词义学》（1992），黎良军的《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1995）和符淮青的《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其中《汉语描写词汇学》把词汇自身结构组织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汉语词汇研究，构建起探索和反映汉语词汇系统的全面研究体系，扩展和深化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有力地突破了长期落后的研究局面。90年代中期，研究逐渐形成一定的深广度，出版了两本总结性的研究史著作：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刘叔新审订，1995），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1996）。

综观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词位研究　在很长期间为，词汇研究就是研究词，从开始时只试图区分开词与字、词与词组，寻求词的定义，逐渐扩展到研究汉语词位的确定、词的结构方式、造词法、词的意义与内部形式等多方面的问题。

确定现代汉语的词位，这是汉语词汇学的任务。研究词位，须从词，首先是词汇基本单位的性质来着眼。这有重大的意义。以往关于词的定义，大多是语法学者单纯从句法的角度定下来的，不能据以区分开合成词与固定语，也不能据以论断不同语流里出现的、音义相近的单位是否为同一个词。从词的词汇属性看，词是最小的完整定型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既从其音流形式的特点和意义内涵及意义组合上的特性来论断，又依其分离性在单一语流中切分和其同一性而在众多语流中综合来作具体操作。这样，词汇学就对汉语的词作出了一种比较周到合理的说明。不过，从语法角度对词的切分，也能对词汇学确定词位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二、词的构造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词汇学者对这方面的探讨，大率追随语法学的构词法研究，停滞在把汉语的词分为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三类，把复合词分出几种和语法结构一致的基本格式，以及零零星星地论述构造新词的某种途径上。任学良《汉语造词法》（1981）首次在构词上提出造词法的问题，这有助于对于汉语构词法的性质、内涵及其研究分工的进一步探求。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1990）一文，进一步论定复合词内词根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不属于语法性质而属于词汇，词汇学应分别作词式（词的结构方式）与造词法的研究，而语法学研究构词法则是研究词的派生。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对词式作了全面的、层次性的分析。基本词式中的复合式，分出了性质限定格、状态修饰格、支配格、陈说格、补足格、并联格、重述格、统量格、表单位格、杂合格。特殊词式有重派生式、类复合式、多重式、单变式、复合变式、派生变式、复合复变式等7种。随着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及其复杂多样性被明确，就出现了深入揭示词根之间相互选择等种种关系的研究成果。

至于造词法的描写，90年代初也被置于严格的、科学的分类准则的基础上。第一层的大类划分，分出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第二层划分，分出结合法、叠连法、改造法、拟声法、表情法、联绵法等12法；再作第三层的划分，还分出24型。

语法学对于构词法的研究，初期主要集中在对词的构成形式上的分析、分类上。如50年代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1）把汉语双音词的构成大致分为三种：联合式、主从式和动宾式。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1957）以分析复合词的构造为主，区分出向心格、后补格、动宾格、主谓格、并立格、重叠格、并立又重叠格。另有一些学者则从传统的印欧语法学的观念出发，揭示汉语构词法的语法特点或特殊性质。如邢公畹《现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词法》（1956），把构词法置于与构形法相区别、相对待的位置；张寿康《略论汉语构词法》（1957）认为合成词中的词素不像词一样分出名、动、形等语法类别。

复合词构造形式的语法研究，长期停滞在构词格式分类命名上，无法深入。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1990）论证了复合词结构既非句法现象，也与词法无关；明确提出语法学研究构词法应只是研究派生

法、派生词。此后就出现了沈孟璎（1995）等探讨汉语词缀的论文。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1995）一文，提出了确定汉语词缀的三个依据：相对定位，语义上常带范畴性，在构词中有复呈性；又从多个角度对汉语词缀作各种分类。刘叔新《汉语构词法的几个理论问题》（1999）就马文的论点提出改进和补充的意见，认为确定汉语词缀的依据为：粘附于词根的确定位置，含泛化或类化的语法意义成素和词汇意义成素，在构词上有一定的覆盖面，有语法功能和词汇功能的表现。词缀还另可按其语法性和词汇性的强弱情况而分类。

语法学研究汉语构词法的成果，有助于促进词汇学对词式、词的音节韵律及造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形成词汇学的一个分支——构词学。

三、词义研究　除研究到多义现象、本义与转义、引申义与比喻义、概念义与关系义、独立义与结构中义、固定义与临时义（主观客观义）等之外，词义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词义自身的表现形式，以及词义中的一些特殊成分，都有创新性的开掘与研讨。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5）设专章论述合成词词义与其词素义的关系，总结出一些主要的类型。刘叔新《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1985）一文为汉语词内部形式的共时描写开了先河。在义素分析法被引入词义分析的同时，对义素的认识也迅速深化。刘叔新（1980）提出应区分理性义素与感性义素。这使词义研究深入了一步。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1992）揭示出词义的历史性、同族性、概括性、具体性、静止性与运动性。对于汉语词义与文化的关系，苏新春在其文化语言学著作《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1997）中有较深入的发掘。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着重进行了词义表动作行为、表名物、表性状的分类及各类的分析，也深入讨论了词义单位和词义的模糊性问题。

对词义的深入研究，已归属语义学的范围。

四、熟语和固定语研究　50 年代末，熟语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学者把熟语所包括的成语、谚语、格言等等所有单位都列入词汇。有的学者持异议。80 年代初，语言和言语应区分开的观点被引入汉语词汇研究，对熟语才有崭新的审视角度。熟语包含两大类异质的单位：言语性的常语——谚语、名言（包括格言、警句）、套语、俚句（成句子的俚语）；语言性的固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名语、专门用语、准固定语。常语虽也是较稳定的、现成的单位，但有完整的句调，是个言语作品的句子，含义体现一个思想，只具有搬引性而不具复呈性。固定语则与词的功能相当，没有句调（特别是句末语气调），含义体现概念，具有复呈性，一般充作句子成分。另外，俗语（俗话）、俚语在概念上也被明确。俗语即为谚语和俚句，而俚语则是俚句和俚俗的部分成语、惯用语及通用的歇后语。歇后语大多属于方言词汇，不入共同语词汇范围；专名语和专门用语都有广狭之分，只是广泛使用开来的才属于共同语词汇。固定语除去专名语和专门用语之外的主体部分，就是和 idioms 相当的习用语。过去，成语在概念上相当宽泛而模糊。李行健、刘叔新在《怎样使用词语》（1975）里提出，具有意义双层性的固定词组才是成语。此后，《汉语描写词汇学》就这一观点作了深入的分析、论证。基本的结论是：在固定语范围内，成语

不同于其他固定语（尤其惯用语）的区别性特点，就是整体意义上的双层性。这突出了成语的根本性质，能较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语感。目前仍有不少学者对成语的界定及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分依据，持种种不同的见解。熟语的分类也未形成共识。问题将继续深入讨论下去。

五、多种词语类集研究 较早研究到的词语类集是基本词汇。林焘《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1954）一文提出了几种见解：（一）不应混淆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二）汉语并非单音节语，认为汉语基本词汇的大部分成员是单音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三）有构造新词能力的并不限于基本词汇成员；（四）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后一见解虽然引发出反对的意见，却是很有启发性，值得学界深入研讨的。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1964）谈到基本词汇时指出，“不见得基本词汇所有的单位都被用来派生新词，而一般词汇也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筑在基本词汇的基础上”，因而“在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之间，存在着的是它们在历史长短上和使用是否普遍上的差别”。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1987），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苏培成《关于基本词汇的一些思考》（1995）又从历时条件和使用频率统计的角度，深入论证了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中提出的两个确定基本词汇的条件——历史悠久，当代社会普遍常用。

对外来词的研究较为持久而深入。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是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和重要成果。该著作既从理论上科学地论定汉语外来词需有音译成分的性质，又全面地、多角度地把现代汉语外来词作多种分类。以后，就来自日语的外来词的特殊性质展开过讨论。刘正埮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是进一步作细致研究的可贵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新词语大量涌现，语言学界展开了新词语的研究，一时形成热潮。研究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理论上探讨新词语的确定依据。新词语的“新”必须有个时限条件，同时也就需有个考量时限的参考点。（2）港台词语与大陆普通话的差异及其对大陆普通话的渗透。港台词语中大不相同于大陆普通话的单位应如何看待，是问题的焦点。这类词语尽管有的已进入港台的书报读物，基本上都属于方言词语。已被大陆普通话吸收进来的，自当别论。（3）及时确定和搜集近期涌现的新词语。或对其中具体单位加以考察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具备新词语的资格；或先分别解释，汇编成册。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陆续出版了不少新词语辞典。

关于古词语、旧词语、情态词汇、评价词汇等，《汉语描写词汇学》都作出过描写和论析。但是学界加以研讨的不多。

在词语类集问题上，要数对某些词群的研究较有深度。符准青《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1988）、《普通话和方言间的词群对比探讨》（1995）二文，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新颖，挖掘相当深入，给词语类集的研究开拓出一片新境域。

六、结构组织和词汇体系问题 60 年代初，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就词汇如何成体系发表意见，这是在词汇一般理论的探讨中最早触及现代汉语词汇的体系性问题。3 年后，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1964）批评以语法或逻辑为经纬来编织词汇的体系，认为应考察词汇本身词语间的结构关联情况，如果词汇的全部词语能被一些结构组织网罗净尽，那么词汇就成其为体系。当时在词汇内部发现的五种

结构组织，综合起来，未能网罗尽所有词语，所以难下词汇成体系的结论。但是该文要害不在结论如何，而在于提出了词汇性的词语结构组织观念以及循着结构组织的发掘而达至理出词汇体系来的方法。

尔后，《汉语描写词汇学》进一步揭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真实面貌。这些结构组织是同义组、反义组、对比组、分割对象组、单向依赖组、互向依赖组、固定搭配组、特定搭配组、挨连组、级次组、同语素词语族。

关于词语的同义聚合和反义聚合，张志毅（1980）、石安石等（1983）和刘叔新（1980，1982，1988）研讨得较为深入。

七、词汇规范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郑奠《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6）一文首先奠下基石。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9）认为，词汇的规范只能是在北方话基础上对词汇的经常变动加以适当的规范。60年代以来，异形词语、外来词语、缩略词语及词语异读如何规范的问题，研究得多一些，其成果对语言实践及词典的编纂都起到积极作用。与词汇规范密切相关的共同语词汇范围问题，80年代也被提出来而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并不清楚。刘叔新《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问题》（1995）一文，提出词汇规范的标准应与语法的一致。陈章太《普通话词汇的规范问题》（1996）就规范的原则、依据和做法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八、词典的编纂 编纂语文词典，既与词汇规范化工作息息相关，也可说是词汇的一种重要的应用研究。

本世纪最早列入现代汉语词语的词典是1915年出版的《辞源》和1936年出版的《辞海》。可是前者主要收古代书面语的词语；后者古代词语也占相当大一部分，而且兼收百科词语。真正第一部以现代汉语普通词语作为主要条目的词典，是1937～1945年分册出版的《国语辞典》。这部词典首次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依北京语音标音，对于普通话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缺点是收了大量北京方言词语而不作标示。

1953年出版、以后多次修订重版的《新华字典》，事实上以收录常用的单音词和合成词为主，对语文教育、扫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1978年出版、1996年出版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则是第一部带有规范性的、纯粹的普通话语文词典，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一时期，还有体制同它近似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和《新华词典》出版，兼有小百科词典的性质。1986～1993年，《汉语大词典》分卷出版，古今词语兼收，共37万条，4760万字，是迄今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另外，新版《辞源》（1979～1983）和新版《辞海》（1979，1989）也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后者增收不少词语，普通词语达11万多，但仍以百科词语为主。

八九十年代，特殊的语文词典出版甚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汉语反义词词典》（张庆云编著，张志毅审订，1986）、《中国成语大词典》（1987）、《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刘叔新主编，1987）、《新词新语词典》（李行健主编，1989）等。

参考文献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问题研究》，天津人民

出版社，1984。

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舒　辛）

汉语构词法研究 (Chinese Word-formation, Studies of)

我国古代关于词的构造问题只有一些朴素的认识。《马氏文通》说明"名字"有双字同义者（如"规模"），有对待之名（如"古今"），有加字成名者（如"不义""有夏"），"静字""动字"骈列式中也有双字同义、双字对待的，这可以说是合成词结构分析的开端。本世纪上半叶薛福绥、胡以鲁等学者借鉴梵语六合释的分析和西方语言词语结构的分析来说明汉语词语的构造。薛福绥在《中国语言文字说略》（1919）将词语分为复合〔下又分叠语（如"莺莺燕燕）、连语如（"通达""山林"）、限定（如"剑盒""白璧"）、假借（如"秃头"）、带数（如"三坟""五典"）〕等类型，不合于六合释者有译音（如"玻璃"）、虚助之字（如"纷若"）等类型。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1923）中直接用六合释之名说明汉语词的构造。如带数释（"四海"），有财释（"苍头"），限定释（"园丁"），连置释（并立的如"溪谷"，对立的如"尊卑"）等。黎锦熙在这个时期对构词法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写的《复合词构成方式简谱》（1929）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先把复合词的构成分为三大类型：合体的（如"仿佛"）、并列的、相属的。并列项下又分同义、对待、重叠三次类，次类下又分双名（如同义中之"地方"）、双动（如对待中之"呼吸"）、重形（如重叠中之"常常"）等小类。相属项下则细分为两名相属（如"男仆""光线"），动名相属（如"行人""起身"），形名相属（如"青年""橘红"）等多个次类，次类下再分小类。带词尾词头的词（如"桌子""棍儿""阿母""有周"）也归入相属类。黎锦熙的分析以分析构词成分的语法性质（黎氏称为"词品"，即名、形、动）作为整个分析的基础，又具体分析构词成分的意义关系（如两名相属中有上名别下名、下名辅上名的说明），又详细分析了复合词带词头词尾的情况，层次清楚，分类细致，是对汉语构词法相当系统完整的说明。此外，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1947）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1948）中也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汉语的构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语文工作的实际需要使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六十年代，在一般说明现代汉语词汇的著作中都分析汉语的构词法，也有专著论述构词法。由于分析角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侧重点，一是对现代汉语词的构造作静态的描写。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1959）对汉语构词法有具体的分析。1956年完成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对汉语构词法所作的说明，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张寿康的《关于汉语构词法》（1956）对这个说明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个系统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单纯词、合成词。合成词分为不包含辅助成分的和包含辅助成分的两大类。前者包括联合（如"人民""学习"）、偏正（如"国旗""好看""飞跑"）、主谓（如"心疼"）、动宾（如"出席"）等类型。这个系统确定"词素"为构词单位，又把词素分为实词素和虚词素（如"—子""—儿""老—""者""性"等），根据词素的组合情况来划分词的结构。这个系统有相当的概括性、科学性，成为教学语法中说明构词法的一个基础。以后学者一般又区分了合成词的

词根部分和词缀部分，根据其组合来划分词的结构类型。第二个侧重点是探讨如何确定现代汉语的词，在这个基础上描写构词模式。陆志韦等的《汉语构词法》（1960）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本书提出以“扩展法”作为分析确定词的主要方法。把词的构造分为偏正格（如“礼帽”）、后补格（如“击败”）、动宾格（如“注意”）、主谓格（如“口快”）、并列格（如“兄弟”）、带后置成分（如“桌子”“看头儿”）等类型。又根据构词语素的语法类（名、形、动等）、词的结构层次、构成的词的词性分析各类词的构词格式。如“名＋名”成为“名”，包括“文法”、“秋老虎”、“电流表”、“百货公司”等词，它们有不同的结构层次。本书对各种类型的儿化词作了细致的描写。这部著作材料丰富，论述缜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三个侧重点是研究汉语造词法，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7）较早探讨这个问题。他把汉语造词法分为三大类型：1. 语音造词方法（如“鸦”，乌鸦的叫声是〔a－a－〕）。2. 语义造词方法，又分变义造词（如“日”，最初指发光发热的天体，后指一次全程的时间单位），比拟造词（如“螺蛳”原指田螺，后指工业上用的螺旋钉，后写成“螺丝”）。3. 结构造词方法，又分“词汇—结构造词”（如“夏季”“落花生”）、“形态—结构造词”〔如“长（cháng）”→“长（zhǎng）”、“阿叔”“记者”等〕。孙常叙的分析为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1959）所继承，并作了新的说明。他们把造词方法称为构词方法，认为这是创造新词的方法。将构词方法分为四种类型：1. 语音构词类型（如“布谷”“沙沙”）；2. 语义构词类型（如“钟”，原指乐器，后指计时器。认为不能把语义发展都看作语义构词，纠正了孙常叙的偏颇）；3. 形态构词类型（如“～性”“非～”等格式的词）；4. 句法构词类型，包括修饰格（如“正房”）、支配格（如“司令”）、并列格（如“增加”）、因果格（如“推翻”）、注释格（如“韭菜”）、说明格（如“地震”）等。把句法构词列为单独的类型，具体分析这类词的内部关系，是作者吸收当时构词法研究成果对造词法内容所作的重要补充。

80年代以后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学者集中探讨汉语的造词法，这可以以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1981）为代表。任氏对造词法的理论说明深入了一步，分类更加细致系统，并用于众多词语的分析。他说明造词法是研究用什么材料和方法创造新词。传统构词法对许多造词问题不能解释，如“银币”“银耳”同为主从式，“银”的词义不同，构词法不能解释。他把汉语造词法分为下面几种类型：1. 词法学造词，运用词法学中的手段和变化形式创造新词，如“好 hǎo”→“好 hào”，“锁”（名）→“锁”（动）等；2. 句法学造词，运用造句的方法创造新词，又分主谓式（如“霜降”）、谓宾式（如“将军”）、补充式（如“证实”）、并列式（如“朋友”）、主从式（如“铁路”）、承接式（如“查封”）等；3. 修辞学造词，运用修辞手法来创造新词，又分比喻式（如“银耳”）、借代式（如“须眉”）、夸张式（如“千古”）、婉言式（如“后事”）等；4. 语音学造词，又分取声命名式（如“布谷”）、取声表情式（如“啊”）、单纯拟声式（如“吧嗒”）等；5. 综合式，运用两种或更多种造词方式造成新词，如“哈哈镜”属“语音—句法综合式”，“板鸭”属“修辞—句法综合式”等。任氏认为造词法可概括构词法。

有些学者将构词法和造词法分开研究。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中把

词的结构方式称为“词式”，构造新词的方法称为“造词法”。他对“词式”提出了新的分类，先分为两大类型：基本词式和特殊词式。基本词式包括：1. 单项式（如“地”）；2. 复合式（一个结构层次），其内部不存在句法关系，而存在类似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下分为质限格（如“报纸”）、态饰格（如“彩排”）、支配格（如“司机”）、统量格（如“架次”）、杂合格（如“财迷”）等小类；3. 重复合成（两个结构层次，如“联合国”）；4. 派生式（一个结构层次，如“老乡”“奔头”）。特殊词式包括：1. 重派生式（两个结构层次，如“老妈子”）；2. 类复合式（两个结构层次，如“冰棍儿”）；3. 多重式（三个结构层次，如“北回归线”）；4. 单变式（一个结构层次，如“说说”）；5. 复合变式（两个结构层次，如“干干净净”）等。刘氏对“词式”的分类在已有分类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说明，又将词的变化形式纳入其中，有自己的特点。他把造词法限定在共时范围内，是汉语在现代时期内构造新词的方法，从使用语言材料上将造词法分为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混合材料式三大类，下再分小类，贯穿分类一次只用一个准则的主张。葛本仪在《汉语词汇研究》（1985）中也区分造词法和构词法。造词法有音义任意结合法（如“人”“二”）、摹声法（如“蛐蛐”）、音变法〔如“盖”（动）→“盖儿”（名）〕、说明法（如“弹簧”“雨衣”）、比拟法（如“木耳”）、双音法（如“爸爸”）、简缩法（如“土改”）等类型。每个词都可作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分析。如“骨肉”造词法属引申，构词法属联合式等。

在构词法研究中，也有学者专注于合成词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1985）中分析了其中的不同关系类型，在这个基础上分析语素义在构词中的种种变异。黎良军在《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1995）中分析合成词的语义结构，认为合成词的结构一般是凝固的、约定的，在语法上无法分析，只能分析它们的语义结构，包括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词素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明了多种语义结构类型，重要的如同义互限式（如“道路”）、反义概括式（如“男女”）、类义互足式（如“爪牙”）、分别提示式（如“病房”）、因果式（如“打败”）、物动式（如“卷烟”）、短语词化式（如“百姓”）、截取古语式（如“动辄”）等。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词义的理据，有助于说明汉语合成词产生、结构的复杂性。

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次上作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仍有待于扩大视野，在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新的开拓。

参考文献

张寿康：《关于汉语构词法》，见《语法和语法教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陆志韦等：《汉语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符淮青）

汉语词义研究（Chinese Lexical Meaning, Studies of）

词义研究服务于人们理解运用语言的需要，随着对词义认识的深入，发展出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词义研究。

传统训诂学以古代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读古籍为主要目的，对词义的研究重点放在字义和字音、字形的关系，以及

字义本身的发展上。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开始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本世纪初开始的“国语运动”，提出了研究现代语言的课题。在词义研究方面，刘复首先致力于现代语言语词意义的分析，他和胡以鲁、高名凯等都结合汉语实际，介绍西方学者分析词义发展的扩大、紧缩等规律。王力说明词义发展中有“综合”变为“分析”的（如“渔”变为“打鱼”，“汲”变为打水），表现出不同于训诂学的分析词义的新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词汇学建立并有了较大的发展。50年代主要是在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者联系汉语实际，说明词义的本质、词义的内容、词义的发展等问题。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1959）、张世禄《词汇讲话》（1956）、孙常叙《汉语词汇》（1957）都有专节对这些问题作具体的阐述。60年代，较多地讨论了词义和概念的关系。一般认为，词是概念产生和存在的条件，词都有意义，但不一定表示概念（如叹词），词可以有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词义有民族特点等。代表论著有岑麒祥《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1961）、朱林清《关于词义和概念关系的几个问题》（1962）、薄鸣《词义和概念》（1963）等。

同义词分析是词义分析的重要课题，从50年代到90年代，发表了众多的论著。探讨的问题主要有：1. 同义词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同义词是等义词加近义词，有的学者认为同义词不应包括近义词。2. 同义词辨析的内容，一般认为应从词的理性内容、词的附属色彩、词的用法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3. 同义词的分析方法，一般认为应注意在一定的上下文中通过同义词的替换来辨别同异，合成词的语素义在显示词义的同异方面也有作用。同义词研究代表论著有：高庆赐《同义词和反义词》（1957），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1963），张志毅《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1980），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1980），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1991）。词义分析有多方面的内容，有的学者在某些方面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如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1957）中细致分析了比喻义的不同情况。朱星在《汉语词义简析》（1985）中从不同角度划分了词义的类型。

80年代以后，受国外义素分析（也叫构成成分分析）方法的影响，我国有的学者探讨用这种方法分析汉语词义，研究如何使概念义的分析形式化。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1992）说明了义素分析的程序和方法，并用这个方法分析了一定数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义。石安石在《语义论》（1993）及有关论文中，也用这个方法分析亲属词的词义。符淮青有鉴于义素分析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提出“词义成分—模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词的概念义最终只能以扩展性词语表示，词典释义中用多个词语的释义，就是一种形式的扩展性词语。他通过分析归纳各类词的释义模式，建立各类词“词义成分—模式”分析的框架，应用于同义近义词辨析、普通话方言词词义对比、词义发展的说明中。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和《概念义分析的形式化》（1995）等论文阐述了他所作的探讨。

词义单位的性质、确定的原则，词义单位同词典义项的关系问题也是80年代后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语文词典编纂有很大的发展，在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学者对词义单位和词典义项划分形成了各种认识。胡明扬主编的《词

典学概论》（1982）中认为，义项是多义词中相对独立的意义项目，应该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有的学者认为词义的单位是义位，义位不同于词典义项。符淮青在《词义单位和义项》（1995）等论文中探讨了词义单位的性质和影响词义单位划分的语义因素。这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张清源《谈义项的建立与分合》（1980），唐超群《义项·义位·概念》（1985），刍邑《〈汉语大字典〉的义项理论和实践》（1990）。

80年代以后，文化语言学兴起，有的学者着重探讨词的文化义的分析。苏新春的《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是这方面的代表。

参考文献

朱林清：《关于词义和概念关系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2.6。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符淮青）

汉语词汇规范研究（Lexical Normal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of）

词汇规范是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方面。"五四"时期学者在提倡白话文的论述中，30年代学者在提倡大众语的论述中，都包含有词汇规范的内容，但词汇规范作为现代语言规范的重要课题得到普遍足够的重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建国以后，国家提出了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任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把用词错误、词汇规范作为论述的一个重点。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该书第二讲《词汇》中，具体分析了当时报刊中用词不当、词性转换不当、词的配合不当，以及乱用文言词语、简称、随意生造词等问题。罗常培、吕叔湘在1955年10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1956）中对词汇规范问题也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规范标准不明确的情形在词汇方面相当严重。认为同义词繁多，一些词用法不确定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指出"规范化的主要对象是书面语言"，词汇和语法的规范标准是"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般用例"，并提出编纂一部详解的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规范化的重要工作。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论著近百种，其中多篇论述词汇规范问题。郑奠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6）中指出，普通话词汇应以官话区方言为基础，也要不断从非官话方言区、方言、古汉语以及外语中吸收适用的词，并分析了其中的规范标准问题。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9）具体讨论了方言词、古语词、词义规范的不同情况，也认为词汇规范化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应该是一部规范的词典。

为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成《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出版。这部词典词形、注音规范，释义一般准确恰当，也注意说明词的用法，对词汇规范起了很大的作用。

70年代末至90年代，词汇规范工作和学术探讨又有了新的发展。1986年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召开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是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方面。《中国语文》《语文建设》等杂志经常发表语文评述和探讨词汇规范的文章。出现了一批联系规范化工作中产

生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的论文。这些论文重点探讨语言的规范工作，但其论述一般适用于词汇规范。羡闻翰在《有关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几个问题》(1979) 一文中，针对一些人的不正确认识，说明“规范”语言，其对象是汉语发展中非主流的病态的东西，不会使语言“僵化”；语言规范化是一种“约束”，规范化的约束是语言生动的前提，不会限制风格的多样化。吕冀平、戴昭铭《当前汉语规范化工作中的问题》(1985) 一文指出：规范化工作过去了30年，成绩斐然，但不规范的现象仍然令人忧虑；强调语言学家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语言规范提供标准，应分清语言问题和非语言问题，集中研究语言规范的原则标准。戴昭铭的《规范语言学探索》(1994) 对语言规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阐述。他综合古今语言演变的历史和语言规范研究的得失，提出规范的对象是语言的变化，规范化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提出动态规范模式，认为语言规范是一个不断“随俗雅化”的过程。

郭良夫有多篇论文讨论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在《关于词汇规范问题》(1987) 一文中说明词汇规范是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是根据语言事实及其内在规律得出的。他多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重要报刊中寻摘病例，进行评述。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语言规范化提出了新的任务。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要求制定有关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词汇规范方面，有关专家研究在进行大量词频统计的基础上建立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库和词汇分级定量标准，也有的学者从事计算机自动分词研究，探讨自动分词的规范。这些工作都已取得明显的成绩。

1997年12月国家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许嘉璐在代表国家语委所作的报告中，把做好普通话词汇规范工作作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要求组织编制、分批发布有关外来词、异形词、缩略语、新词新语和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等方面的规范标准。报告也要求积极组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参考文献

郑奠：《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吕冀平、戴昭铭：《当前汉语规范化工作中的问题》，《中国语文》，1985。

郭良夫：《关于词汇规范问题》，《中国语文》，1987。

（符淮青）

汉语词典编纂 (Chinese Lexicography)

中国很早就编纂出词典。《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形成的词典编纂传统，与由《说文解字》开创的字典编纂传统并立。字典本身也有单音词词典的因素，其编纂可属于广义理解或一般理解的词典编纂范围。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语言学明确词的概念，新编纂的字典就逐渐增强其词典的性质。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还基本保持字典的体制，50年代初版，以后一再修订重版重印的《新华字典》，就实际上已接近于简明的词典。

1937年，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辞典》出版，是本世纪第一部严格意义的现代汉语语文（一般词语）词典。该书1947年重版，后一再重印，并出版了删节本《汉语词典》。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第一个范式。该词典1996年又出了修订本，发

行量极大。

以一般词语为主、兼收百科条目的词典，1915年出版的《辞源》是第一部。它兼收古今词语，重在溯源，从规模看属大辞典。1947年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是第二部，也属大辞典，较侧重于现代词语，雅俗兼收。1979年，《辞源》《辞海》都以修订版的崭新面貌重版发行。从收的词语看，比前更为丰富。只收现代一般词语而兼及百科的词典，有1978年出版的、近于重新编纂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修订重排本，1980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后者规模比前者大。

1982年，台湾出版了规模宏大的《中文大辞典》，兼收古今的一般词语。从1986年至199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多卷本《汉语大辞典》，着重收现代的一般词语。

从1986年至1990年分八卷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严格按照字典体制编纂，完备而详赡，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字典编纂的顶峰。

从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特殊的语文词典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依出版年份的先后来说是：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张志毅的《简明同义词典》（1981），刘正埮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张庆云编著、张志毅审订的《汉语反义词词典》（1986），刘叔新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198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分类大词典》（1987），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曹聪孙的《中国俗语典》（1991），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1993），李达仁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1993）等。

至于专科词典和双语词典，80年代和90年代涌现更多，也有大型的专名词典（地名辞典、名人辞典）出版。

词典编纂的热潮，推动了对词典编纂的研究。70年代末期，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出现。其后愈益增多，建立起了词典学。80年代出版的胡明扬、谢自立等《词典学概论》，黄建华《词典论》，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辞书研究编辑部编的《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是中国词典学成果的代表。而从1979年起发行的期刊《辞书研究》，则是中国词典学兴起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该期刊组织过词典学重要理论问题的多次讨论，对具体的词典编纂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词典编纂的研究，扩大到对类书、年鉴、大百科全书等的编纂问题的研究。因此以“辞书”来统指词典和其他工具书，相应地，也有人把词典学改称辞书学。

在只以词典及其编纂为研究对象的、严格意义的词典学范围内，目前研究到了“词典”与“辞典”有无区别、词典的体制类型、词典与大百科全书的关系、特殊语文词典的编纂方法、条目的安排与确定、释义的方法原则、义项的确定、词典编纂的中国化等等问题。有的问题得出了共识，大部分问题还须进一步研讨，须要同词汇学、语义学的研究密切连结起来。

参考文献

徐祖友、沈益：《中国工具书大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辞书研究编辑部：《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刘叔新）

汉语简称和缩略语研究（Studies on Chi-

nese abbreviation)

以1946年杜子颈发表的《简缩语论略》为标志，简称缩略语现象逐步为学人所重视，并在简称缩略语的性质、范围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

简称和缩略语的理解，各家不尽一致。部分学者并不把这二者区别开来用以分指不同的对象。郭良夫把汉语的缩略形式视同一般所说的简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简称和缩略语是性质上存在差异的两类。陈建民把简称限定为由动词性词组、名词性词组简化而来的单位，认为词语减缩不同于简称，纯然是音节问题，跟语法无关，诸如“毛衣”“中小学”等。刘叔新认为，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是简称，简称只能是名词或名词性的，而缩略语则是对原形式的简化、紧缩，可以是动词或动词性的，但不认为“三峡”“四公子”等是缩略语。刘叔新认定简称、缩略语所由变化而来的原形式应是固定语。

简称和缩略语的产生方式虽历来受人注意，但各家歧见不多，经常提到的有：取各词语素或音节构成的选取法、用部分代整体的替代法等。各类中还可以分别不同情况分出细类。不过，在是否应该把用数字概括几种具有共同性质的事物或行为的数字概括法当成简称缩略语的产生方式上，存在对立的看法。

50年代，林汉达认为略语不是词儿，但吕叔湘主张把它当作词的一个特殊类型，陈建民认为已经流行的简称具有词的一般性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词，并指出简称的地位不稳定，常向一般的词转化。郭良夫指出，简称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具有复合词的性质，有些则是词组性的。刘叔新认为，缩略的说法若其中具有词与词的组合关联，是缩略语，反之则是缩略词。

80年代后期，马庆株探讨了先前未有涉及的缩略语的语法功能问题，指出缩略语的功能与构成方式有关，认为缩略语大多数是名词，谓词性成分经过缩略，也明显地具有体词化的倾向。

如何规范简称缩略语，这始终为学者所关注。陈建民早在60年代初即对简称的合理产生提出过几方面的考虑因素：能否提出有代表性的简称字、简称的明确性如何、音节数目的约束性、全称的使用频率等。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在深入分析简称缩略语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规范标准。徐耀民主张应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地加以权衡。规范缩略语应考虑：它的民族性（字义及内部构造问题）；使用上的时空性特点；简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等。侯敏主张，缩略语的规范应从两个方面考虑：自身的规范、使用上的规范。对前者，主要看简缩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简缩得是否得当——意义是否明确、尽量避免歧义、注意语言心理习惯；对后者，根据使用上的层级性特点而注意环境、范围、对象等的不同。

参考文献

陈建民：《现代汉语里的简称》，《中国语文》，1963.4。

郭良夫：《论缩略》，《中国语文》，1982.2。

马庆株：《缩略语的性质、语法功能和运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3。

侯敏：《缩略语使用的层级性特点及其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6.6。

（王吉辉）

汉语新词新语研究 (Studies on New Coined Wxpressions and Words in Chinese)

汉语新词新语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初步展开。向超《关于新词和新义》（1952）提出

新词并不单指新造的词，也包括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的旧词，并探讨了新词的构成方式。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一文中有一部分专论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探讨了词汇丰富的表现、构词法的发展等问题。伍民《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1959)也涉及新词的产生和发展。武占坤《谈一种“偶发词”》（1961）提出了“偶发词”的概念。这一阶段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新词语研究的模式：讨论新词语总是从新造词、方言词、外来词、旧词新义、死词复活等方面来入手。

80年代之后，新词新语的研究成果增多，如沈孟璎《新词语词义之概貌》（1986）从新词语的个性方面介绍了新词语意义的一些情况；又在《略论新词语的特征》（1987）一文中讨论了新词语构成的方式。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1988）从词语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角度提出了新词新语规范的三项原则：必要性、明确性、高效率，又从民族心理对词语的制约作用方面讨论了当代人创造新词语并使用它们的倾向；王铁昆《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1989）论述了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之后，又提出了新词新语与生造词语的划界问题。

90年代以来，除了继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外，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用新的理论方法来审视新词新语，如借鉴语言的“空符号”理论从“潜性”和“显性”的角度来考察新词语。这方面的研究有王希杰《论潜词和潜义》（1990）和周洪波《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1994）等文章。有的学者还着眼于语用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讨论新词语问题，如陈建民《口语里的新词新语与社会生活》（1995）；有研究词汇和语法的关联的，如王海芬《汉语新词结构方式试析》（1990）、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1992）则把新词语研究同词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于根元《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1995）论述了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对语言规范的作用，涉及许多语言观的问题。

新词新语研究取得的成果是比较多的，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概括起来主要是：(1) 新词新语的定义还没有一致的说法；(2) 新词语的时限问题；(3) 新词语的规范问题，等等。

新词新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新词新语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除了有利于语文词典、双语词典的编纂，也有利于国际间的信息交流，促进汉语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参考文献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

国怀林：《论新词语的确定》，南开大学《语言学论辑》编委会编《语言学论辑》第二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王泽鹏）

汉语外来词研究（Studies on Loan Words in Chinese）

外来词，也叫借词，指从他种语言吸收的词语。以往的研究中，在外来词的判断、类型构成等方面研讨比较多。孙几伊《论译书方法及译名》（1919）和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23），对译名进行了探究。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中指出，译语有两种，译意的和译音的；译音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人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罗

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50）中将外来词称作“借字”，提出了近代中国语借字的四种方式。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7）把外来语分为借词和译词两种。郑奠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5）中也讨论到外来词的判定问题，主张“借用”一类应为外来词，把日语来源的汉字词列人外来词。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音译或半音译的以及借自日语的汉字词才算外来词，意译的词都不属于外来词。持这种观点的，可以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为代表。外来词判定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来自日语的汉字词上。张世禄《普通话词汇》（1957）把“蜜月”“民主”之类的意译词看作外来词。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认为用汉字书写用音读的日本意译的外来语和本为古汉语词由日本借用又被汉语吸收的词语都是外来词。张应德《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1958）则不同意此说。王立达的《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1958）、郑奠的《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1958）也是这次讨论的成果。80 年代以后又有这方面的讨论，如孙延璋《现代汉语外来词初探》（1984）、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

也有不少学者考证外来词的源流。1949 年前，较为专注的学者有陈垣、冯承钧、冯家升、韩儒林、向达、季羡林、岑仲勉、郭沫若等。1949 年之后，外来词的考证时断时续，又多因史地、博物、民族研究的需要而附带进行，语言学家反倒较少参与，因此，成果不太突出。

外来词是文化交流的产物，通过外来词以认识文化交流的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如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1977 再版）中就大多是通过外来词来研究中西方文化的交往；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通过 12 岁名、12 月名与巴比仑语比较，发现了其中的渊源关系；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通过外来词探讨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民族的迁徙、民族的来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也阐述了外来词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外来词的意义分类来统计说明中外文化交流中输人的情况；吕叔湘的《南北朝人名与佛教》（1988）借音译的人名论证了当时佛教的影响；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等著作则将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外来词对汉语词语的整合模式上产生的影响去观察文化交流情况。

1949 年后，随着汉语规范化的进行，外来词的规范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不少学者对此有所论及。如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林焘的《现代汉语词汇规范》（1963）、史有为的《外来词对接诸问题》（1996），讨论了外来词对接的许多问题，为规范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外来词词典作为外来词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也有出版，如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1922），刘正埮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

史有为《外来词研究的十个方面》（1990）认为外来词研究可以有 10 个方面：考源流、察交流、度资格、明层次、审构成、集众词、计数频、辨用途、定规范、测未来。在过去还远远做不到这许多方面的研究，对整个外来词的研究也还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分层和统计。

参考文献

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语文

建设》，1991.11。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王泽鹏）

汉语词汇学史研究（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logy, Studies of）

汉语词汇学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但对词语、词义的研究，却有久远的历史。

先秦诸子关于“名”“实”关系的论述，包括有词语同词语所指对象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训诂学对古代词语词义研究的丰硕成果成为汉语词汇学建立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凭借。19世纪中晚期后，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的学术思想，说明汉语词语的结构、词汇词义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使研究现代语言成为更加迫切的需要，现代语言词汇的研究得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确定的语文工作的实际需要推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建立。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现代汉语词汇学建立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周祖谟、张世禄、孙常叙写出了第一批现代汉语词汇学专著，这些著作确定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性质、对象、任务。陆志韦等的构词法研究，高名凯等的外来词研究，代表了现代汉语词汇学专题研究的出色成果。

80年代到90年代，是学者从多方面推进现代汉语词汇学发展的时期。武占坤、王勤、马国凡、张志毅、葛本仪、刘叔新、符淮青、苏新春等人的论著各有不同的探讨方向和特色，研究的重点主要有：词汇的单位和体系、词义内容分析、构词法和造词法、熟语的内容和形式、词的文化义等，也有学者开始了服务于信息处理用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古代词汇学建立后也有很大的发展。它同训诂学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古汉语词汇研究因需要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向。一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王力、史存直、潘允中的论著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二是对古汉语词汇的理论研究，蒋绍愚、洪成玉、赵克勤、苏宝荣等的论著各有重点，有新的开拓。探讨语义学和训诂学相结合、词汇词义系统及其发展、词汇和语法的关系等问题引人注目。三是研究某一阶段、某类作品、某部作品中的词语。在这方面近代汉语词语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张相对诗词曲语辞的研究、蒋礼鸿对敦煌变文词语的研究，其成果方法有广泛的影响。我国古籍浩繁，已有学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各种文献语料库，进行各种统计调查和研究。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本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20年代初以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80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一、语法范畴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的确立历史。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未曾遇到的难题。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20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局面。20年代的语法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争议的断语。

3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可以说就是出于不满足于根据意义标准区分语法范畴的做法而兴起的。这次讨论初步得出了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认识，并触及了词类和句法的关系问题。40年代中期出版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两部著作，虽然都还基本上是从意义角度说明词类，却明确地坚持了“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进了“词品说”试图解决词类在句法中的不同功能问题。这两部著作前所未有地挖掘了丰富的汉语事实，在词类范畴的具体分析中揭示出许多新鲜的语法特点，为以后关于词类功能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汉语语法学者集中讨论了区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和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持意义标准的、持形态标准的、持广义形态标准的以及持功能标准的各种主张都得以充分阐述，最终还是看重“结构关系”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4）一文明确提出“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这表明其后产生深远影响的“分布说”此时已具备一定的共识基础。

朱德熙是“分布说”的明确主张者和身体力行者，早在1956年他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一文中就出色地例示了分布原则在区分词类（乃至次类）方面的巨大潜力，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但是根据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语法讲义》，1982）“我们能够根据形态划分词类，是因为形态反映了功能。”（《语法答问》，1985）应该说，这种看法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者在语法理论认识上有了更为清醒的理解，使汉语语法研究真正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把汉语研究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认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从结构角度为语法单位进行分析式的划类，而是努力用一种综合式的观点对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作出深入的解释，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汉语事实的了解。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这两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语法范畴，其实

质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事物和处在时间关系中的事件这二者在语言中的表现，语法系统中各主要词类的种种句法表现都与这种基本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表达动机有关。汉语语法学者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得出了基于原型的词类范畴观，揭示出了一系列关乎词类系统的语法事实。

二、语法关系的研究　在语法关系问题上，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遇到了跟语法范畴方面一样的难题：汉语里的语法关系同样没有外露的标记，故而也不容易确定什么是汉语的主语、宾语等语法成分。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仍然是首先寻求语义途径。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就是把语法中的句子观念简单对应于逻辑命题的结构，用“主语”“述语”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句子结构和词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不仅陷人了语义关系难以精确描述的麻烦中，而且也使句子分析与结构特征脱节，因为它没有全面兼顾形式和语义诸方面的因素。吕叔湘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一文中指出：“格变，语态，位置，这三样都是形式的评准；施事受事的分别，和主语谓语的分别，这两样是意念的评准。印欧系的语言，无论像拉丁那样完全倚赖格变和语态，或是像英语那样一半倚赖格变一半倚赖位置，总之都是倚赖形式的评准。对于这些语言，主语和宾语的意念的内容只是语法学者的论题，只有理论的兴趣，没有实用的价值的。但是国语的情形就不同了，名词和代词没有格变，动词没有语态。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能凭借的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而这两项评准给我们的答案，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50年代汉语语法学界关于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两种观点的一次正面交锋。

较早系统运用位置标准确定主宾语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该书指出：“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句子的格式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在确定了几种基本的句法结构的基础上，该书进而描写了与结构对应的种种语义关系。朱德熙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更彻底地贯彻了这种方法，他指出着眼于位置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是依靠词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区分主宾语这件事的实质……就是确定包含这个成分的结构是主谓结构还是述宾结构的问题。”（《语法答问》）他以不同语义成分所组成的主谓（述宾）结构的句法平行性证明了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一致，并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关系总是同时影响着句子的意义。这样的观点成为80年代汉语研究与教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坚持从语义角度揭示语法关系，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1986）一书完全使用“名施”“名受”等概念描写汉语句型。这是因为，单纯从结构角度或单纯从语义角度出发都难以全面揭示汉语纷繁的句法特点。朱德熙提出的“隐性语法关系”的概念和李临定直接侧重于语义特点的主张都是面对同样的双重难题。侧重语义的观察在句子格式描写和汉语教学中起到了良好作用；而隐性语法关系的观点则直接导致了90年代一批学者对“配价语法”的浓厚兴趣。

早在40年代成书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就在“起词”“止词”之外分析出受事、关切、交与、凭借、方所、时间、原因、目的等与动词相关的语义成分以及相应的若干句法特点。朱德熙则借鉴了7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格语法”方法，运用于汉语的结构分析中。动词语义支配能力的研究成为90年代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者们

试图通过研究动词的不同语义角色跟句法成分的配位关系，说明这些语义成分在句法位置上共现或制约的条件。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是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1994）和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1998）。前者建立了一个反映基本配位关系的抽象句法结构形式“句位”，用空语类的概念辨析各种异常配位现象；后者则是为配位关系本身分出四个层级，给出了从基础句到派生句的推导过程。

本世纪末盛行于国际语言学界的语言类型学方法给观察汉语语法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1999）在讨论汉语的主宾语问题时指出，主宾语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在于把“主语”“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看成是可以用充分必要条件定义的绝对的、离散的范畴，事实上语法范畴都是典型范畴，施事、话题这样的语义、语用范畴也是典型范畴。主语、施事和话题有自然的关联；宾语、受事和焦点有自然关联。典型性的差异是造成各种有标记句法组配现象的根本原因。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1994）具体描述了汉语里主宾语选择和话题选择的两条语义角色优先序列，以期以简驭繁地概括句法配位机制。

三、语法单位的研究　对汉语语法单位的认识也是随着语法研究的进展而深入的。词、词组、句子这些语法单位是所有语法学者都注意到了的，但是，由于个人语法观念不同，导致各家语法中各个语法单位的地位各异。具体而言，有着重于词和句子的，有着重于词组的，也有着重于比词更小的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法单位的。

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简单地模仿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模式，只着眼于词和句子这两级语法单位，认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组词造句的规律。由于汉语的语法特征并不反映在词形变化上，而这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词所组成的千变万化的句子又不是仅靠这两级语法单位足以概括出特征来的，显然，要揭示汉语的语法规律，还需要探索其他语法单位中反映出的特征。本世纪中期是结构主义思潮影响汉语语法研究时期，词组（也称为结构）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赵元任著、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1952）就用几种基本结构阐释汉语口语的造句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汉语的五种基本句法结构，即：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后来，朱德熙从理论上论述了这种做法的根据，他指出：由于汉语词类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式标记，导致汉语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建立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各类词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和功能都足够详细地描写清楚了，那么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描写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语法答问》）这种看法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

在结构以及结构间的层次关系成为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后，其他层级的语法单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并分别得以深入研究，如从结构观点出发的语素研究、复句结构关系的研究（如邢福义《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1986，1992）以及更大的语法单位——篇章的组织关系研究（如廖秋忠《廖秋忠文集》，1992）等。

句式的研究是语法学者们一直给予关注的，但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背景下有不同的认识。早期的语法强调以句子为本位，却没有归纳出概括性的句式特征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则敏锐地观察到汉语中某些特殊格式的重要作用，细致分析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和紧缩式这六种句法结构，摆脱了前人依照印欧语分析观点来对待汉语动词性结构的框架，使得汉语这几种句式的特点显现出来。70 年代和 80 年代，句型研究仍然很受重视。有的学者侧重于描写句子中词语形式的排列（如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有的侧重于语义成分的排列（如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有的则侧重于从句式变换关系中揭示形式和语义的对应关系（如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陆俭明《现代汉语句法论》，1993；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1992）。90 年代后期，认知—功能语法的句式观也开始反映在汉语研究中，它所主张的“句式意义大于组成它的词语意义的总合”的观点带来了系统理解汉语句式的新视角。

四、语法表达功能的研究 一般语法理论把句子内容分为“命题”和“情态”两个部分，前者构成句子的基本结构，指基本的语法关系；后者是句子表义功能的载体，包括疑问、否定、时体、语式等与整个句子相关的部分。汉语语法学者早期对这两部分内容的区分是比较模糊的，随着对汉语事实的挖掘和对语言理论理解的深化，语法学者们日益清醒地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取得很多新的进展。

时体研究 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动词所表现的语法特征也主要集中在时间概念的表达上。早期的语法论著注意到汉语动词也有类似于印欧语的时态表达要求，但由于不表现在词形变化上，所以未能给予系统归纳。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较系统地研究了各种“情貌”成分；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则用“动相”概括相同的事实。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时间观念的语法表现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分别从时间过程结构、时体结构和时制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虚词研究 虚词是汉语语法里语法作用最强的一类词，也是近百年来汉语学者收获最丰的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们对虚词的意义和语法作用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传统训诂学意义上的孤立考释，而是从语法系统着眼，在虚词的分类、相关虚词的用法比较、虚词的语义指向、虚词的统辖范围、虚词与句式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和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1985）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句类研究 对于疑问句、祈使句等含有特殊语气的句类的注意也是由来已久的。早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中特殊的语气词上。后来的学者们有意识地引进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视点来描写这些句类的表达功能，如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1993）和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1996）等。

语序研究 话语分析的方法引入汉语研究以后，语序问题有了理论上的研究支点。陈平用话语表达的信息顺序原则和话题连续性原则探讨了名词性成分语义特征的形式动因和省略问题（《现代语言学研究》，1991）；张伯江、方梅则对口语的信息结构和焦点的语序表现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功能语法研究》，1996）。

语体研究 语体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早期的语法研究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但在选材上还是比较注意

语体的一致性的，并适当给予辨析。50年代以来的语法研究有了混同不同语体材料不加以甄别的倾向。80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呼吁注意语体对语法规律的影响，但真正成规模的、科学分类的语体语法研究至今也没有开展起来，这与现代语言学精神是有距离的。

五、多元化的研究取向　早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面向本族人的语文教学为主要目的，分析方法比较单一，用句子成分分析方法（也称“中心词分析法”）似乎就可以简要说明句中词语之间的关系，达到帮助正确写作和阅读的效果。但这种单一的方法很快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词无定类”的说法不利于说明语法关系这一点受到理论界普遍的批评；同时，中心词分析法无法清楚反映语法结构层次也给教学带来困难。40年代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积极引进国外句法分析方法，或重视组合中的主从关系，或着重描写汉语句型特点，或注意古今、中外、方言的比较，或着眼于结构转换关系，乃至从表达的角度归纳形式类型，都突破了单一的成分分析模式，带来了语法分析的新的角度。60年代以后，语法教学界普遍对语法结构的层次观点取得共识，80年代初期汉语语法学界关于析句方法的讨论使大家明确了“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层次分析……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朱德熙）这样的事实，层次分析法成为语法教学中的基本方法。同时，更多的人在语法教学中尝试了在结构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或辅以语义特征分析，或简化切分层次，或兼顾成分关系等多方面的探索，使语法分析从单线分析走向层次分析，进而走向立体分析。

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两个语法应用方面的挑战。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暴露出我们以往语法研究只重说明而不重周全、只顾例释而不顾严密的缺点，许多对外汉语教学中导致学生错误类推的问题成为语法研究的新的突破点，促使语法个案描写进一步精细化了；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也对以往孤立的、静态的语法分析提出了挑战，要使外国学生准确合理地使用汉语显然必须在静态分析基础上辅以大量的用法分析，这就直接促进了现代汉语的语用分析；第三，对外汉语教学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揭示汉语与学习者母语的异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最为薄弱的环节，汉语教材至多是对一些汉语和英语有明显差异之处做出简单的说明，而很少重视其他语种的特点，这方面的缺憾则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汉语特点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课题。

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更多地暴露了以往形式分析的不足，无论是在同形格式的区分问题、句法歧义的分化问题、词语串的切分问题以及篇章关系的理解问题方面都反映出简单的形式规则不足以控制计算机进行合理的生成和理解，这就使得对人来说并不困难的语义因素如何形式化的问题严峻地摆在语法工作者面前。这个挑战一方面直接推进了语法研究中形式规则的逻辑推导研究，另一方面也促使功能语法学者更深入地探讨形式和语义的一致关系如何从原则实现为规则的问题。

来自应用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多重挑战促使汉语语法学者更为广泛地采纳多种研究方法以面对不同性质的语法事实，形成了汉语语法研究方法上取向多元化的局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摸索，目前，现代汉语语法学者有意识地把一般语言学理论同汉语实际研究结合起来，努力探索有利于揭示汉语语法事实的方法，在语法结构的形式研究、句法语

义特征的分析、语法现象的功能解释、语法认知基础的探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陆俭明、郭锐：《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世界汉语教学》，1998.4。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汉语语法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张伯江）

汉语词类研究（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Studies of）

一、词类框架的形成和发展　词类是整个语法学的基础，要充分说明语法规则，就不能不划分词类。中国语法学中真正的词类划分始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马氏借鉴西方语法学，把文言文的词类分为以下9种：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是第一部有影响的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把现代汉语词类分为5个大类9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其基本类与《马氏文通》相同，只是名称略有改变。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分出语气词（比一般说的语气词范围大，包括语气副词和感叹词）；王力《现代汉语语法》（1943，1944）分出数词、语气词；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讲话》（1952～1953）分出量词、象声词，并指出名词中的特殊类——时间词、处所词、方位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该系统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1984），增加拟声词一类，这个12类的词类体系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出版的标注词类的词典除个别词典从助词中分出语气词外，大多沿用这个体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承担的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现代汉语词类研究”把现代汉语词类分为20个基本类：动词、形容词、状态词（以上谓词），名词、方位词、处所词、时间词、量词（以上体词），区别词、数词、数量词、指示词、副词、拟声词（以上饰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以上虚词），叹词（独立词），代词（分别属于谓词、体词和饰词）。这个系统注重同类词的共性和异类词相互区别的个性，考虑通用性，因而分类较细，便于不同使用者根据需要作或简或繁的调整。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　20世纪的汉语词类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个核心问题是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词类划分的标准。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可归结为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又都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有关。

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问题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划分词类不能利用词的形式，只能利用词的语法功能，而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词可以在词形不变的情况下充任多种句法成分，由此带来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问题：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对应具体说来有三

个方面的问题：1. 词类和句法成分是直接对应的还是间接对应的，2. 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复杂对应的，3. 一个词类可充任哪些句法成分。回答前两方面问题的方法大致可以分成双轴制、一线制和三层制三种。

双轴制指设立词类层面和句法成分层面，但由于汉语词的多功能现象，由此造成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缝隙"，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缝隙"，学者们采取不同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变词性和增功能两种。变词性的方法把词类同句法成分简单地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做谓语、补语，形容词做定语，副词做状语，一旦一个词放在性质不同的位置上则认为词性发生变化。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多采取这种方法，比如《马氏文通》提出字类假借说，一旦一个动词用在主宾语位置上则假借为名词，用在定语位置上则假借为形容词（静字）。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提出词类活用，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提出依句辨品，也都是采取变词性的办法解决词类和句法成分的缝隙问题。"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提出"名物化"理论：在"他的来使大家很高兴、狐狸的狡猾是很出名"等句子中，"来、狡猾"意义"不表示实在的行动或形状，面是把行动或形状当作一种事物"，"失去了动词、形容词的特点(或一部分特点)，取得了名词的一些特点，我们称之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名物化用法"。"名物化"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并不明确指出是词性发生变化，但实质与词类假借、词类活用相同。由于汉语中一个词大多可以不变词形充任多种句法成分，变词性的处理办法虽然使类有定职，但却使汉语词类流动不居，其结果是词无定类，甚至得出"离句无品"的结论。

增功能的方法认为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复杂，词类是多功能的，一个词只要词义不变，放在不同位置上都是同一词类。这种处理虽然使得词有定类，但却使类无定职，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缝隙面不加弥合。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提出以广义形态划分词类，陈望道提出以综合的结构功能划分词类，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1）则明确提出词义不变词类不变的观点。后期朱德熙对词类多功能的范围略有缩小，把直接受名词修饰、做"进行、加以、有"等准谓宾动词宾语的"批评、研究"等看作名动词，认为此时这些词是名词性的，但仍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去是应该的"中的"出版"、"去"是动词性的。

傅东华是明确提出一线制的第一人。由于汉语的词是多功能的，如果要把词类与句法成分简单对应起来，就不得不用到词类假借，他认为，还不如干脆认为词本身没有分类的可能，"认定词不用在句中就不能分类"，因此句子成分和词类可以合二为一。这种说法实际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自然发展。在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讨论中，高名凯也提出汉语无词类论，其主要理由是词类要根据词的形态划分，汉语无形态，因而无词类。后来观点有改变，认为"词的形态变化、词的结合能力和词的句法功能等都是词的词类意义的外部标志"，汉语无形态，只能根据词的用法分词类，但由于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一个词可以同时用作名词、形容词、动词"（指一个实词可以在主语、谓语、定语位置上出现），因此每个实词都是多类的，这就等于没有词类（见高名凯《在北京大学1959年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1960）。徐通锵《"字"和

汉语研究的方法论》（1994）认为，印欧语中词类与句子成分是一对一的，因而有划分词类的必要，汉语既然是一对多的，就意味着根本没有词类。对于汉语无词类论，朱德熙《在北京大学1959年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1960）认为，根据句子成分定词类虽然从功能着眼，但“因为选择的标准太粗疏，方法太简陋，不但不能划分词类，反而得到了词无定类的结论。这种方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假定句子成分和词类之间有一一对当的关系……但事实上词类跟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线制的极端的做法非但不能解决汉语的句法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困难，接受的人并不多。

三层制是在结合了变词性和增功能两种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方法在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增加一个中间层面，以弥合两者间的缝隙，认为一个词在性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其中间层面的性质发生改变，这样维持了词义不变词类不变的观点，又为同一个词类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上找到了解释。采取三层制的学者具体说法很不相同，效果也大有差异。

王力（1943，1944）、吕叔湘（1942，1944）借用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三品说，设立中间层次——词品（吕氏叫词级），词品分为首品（主语、宾语位置上的词）、次品（谓语位置上的词）、末品（定语、状语位置上的词），词类根据词义划出，一个词的词性是不变的，用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变化的是词品。但词品是一个含糊的概念，词品的区分根据的是词在组合中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说是对词作的分类，不如说是对句法成分作的分类。说一个词可以担任不同词品跟说一个词可以做不同句法成分没有实质区别，用三品说来联系词类和句法成分以弥合两者之间的缝隙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

陈爱文《汉语词类分类研究和分类实验》（1985）则设想词类概念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词类概念与思维结构中的分野对当，分别叫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第二种词类概念与客观世界中的分野对当，分别叫名基词、动基词、形基词。第一种词类概念实际是按语法性质分出来的，第二种词类概念实际是按词义分出来的。第一种词类在不同的用法中会变化，第二种词类在不同用法中是不变的，比如“出版”在“同意出版”中是动词性的，在“图书出版”中则变成了名词性的，但都是动基词。陈爱文把两种词类概念分开，目的是要解决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问题，他感觉到坚持词义不变词类不变难以解释一个词在不同位置上发生的性质变化，因而有必要设立两套词类概念，构成词类（X基词）、词性、句法成分的三层制，把词性作为联络词类和句法成分的中间层面。这种处理实际上是按词义先分出词类，然后又根据词出现的位置判断其词性，与双轴制中变词性的说法没有实质区别，只是明确把两套概念分开。

萧国政《现代汉语宾语谓词指称性用法考察》（1991）、项梦冰《论“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对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的再认识》（1991）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有些已经指称化了，即从表述功能角度说明动词、形容词在不同位置上的性质变化。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1999）认为，词类的本质是表述功能，可以根据表述功能的两个层面，把词性也分成词汇层面的词性和句法层面的词性。词汇层面的词性就是词语固有的词性，需在词典中标明；句法层面的词性是词语在使用中产生的，由句法规则控制。前人所说的词类假借、词类活用大多可以看作句法层

面的词性变化。由此形成词汇层面的词性、句法层面的词性、句法成分的三层制。一个词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兼有多种词汇层面的词性，比如“出版”在“出版两本书”中是是动词性的，在“图书出版”中是名词性的；二是句法层面的词性发生变化，比如“出版”在“这本书的出版”中词汇层面的词性仍是动词性的，但在句法层面上是名词性的。

第三方面的问题，一个词类具体与哪些句法成分对应，实际上是最困难的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提出了具体的划类标准。

词类划分标准问题 被用来划分词类的标准主要有词义、词的形态和词的语法功能三种。

根据词义划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根据词义划分词类，40年代初的两部重要语法著作《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中国现代语法》（王力）不约而同地根据词义划分词类。根据词义划分词类有两个致命问题：1. 词义与词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对应，根据词义划出的词类与句法关系不大；2. 词义本身不可明确观察，因而难以操作。另一种是根据词的意义划分出词类，但又根据词在句中的位置判断其转类，如马建忠《马氏文通》、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这样处理，实际上有两个词类系统，一个词类系统根据词义划出，另一个词类系统根据句法成分划出。既然可以根据句法成分划出第二个词类系统，根据词义分出的第一个词类系统也就成了多余，而根据句法成分划出的词类系统由于把词类同句法成分一一对应起来，结果得出词无定类的结论。

在一些形态丰富的西方语言中，可以根据形态来划分词类，但汉语中缺乏形态，不可能根据形态划分词类。50年代初高名凯把形态看作词类的本质，得出汉语无词类的结论。

陈承泽（1922）提出“字类之区分形式上无从判别，是故字类不能从其字定之，而只能从其字所居之文位定之”，金兆梓（1922）提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别的”，即根据语法功能定词类，但并未提出具体的划分标准和操作程序，而且由于把词类同句法成分一一对应起来，不得不采取词类活用的说法，使得词类流动不居。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叙论》（1938）提出有两种结构关系：一、附加的关系：红花（附加者+被附加者）；二、接近的关系：吃饭（接近者+被接近者）。这两种结构关系规定了3种基本词类：占据被附加者或被接近者位置——名词，占据接近者位置——动词，占据附加者位置——形容词。这相当于根据句子成分定词类，由于词的多功能性，若严格贯彻这种方法，势必造成词无定类的局面。在文法革新讨论中，首次明确提出根据词的全面语法功能划分词类：方光焘提出根据广义形态划分词类，广义形态就是词的结合能力；陈望道借鉴索绪尔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理论，提出根据词的配置关系（即组合关系）划分词类。但只是理论上讨论，没有提出一套具体的操作标准。赵元任《国语入门》（1948）首次系统利用语法功能划分词类，提出一套操作标准，比如名词是可以受数量词组修饰的词，动词是可以受“不”修饰、后面带“了”的词。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68）更为全面地根据语法功能给汉语的词类作出了系统的划分。朱德熙（1960，1982，1985）多次强调，划分词类的本质依据是词的分布，不仅汉语如此，别的语言也如此。由于缺乏形态，汉语中只能以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这个认识在50年代的汉

语词类问题讨论后更加统一。但是由于词类同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何根据词的语法功能鉴别词类就成了突出的问题。问题的实质还是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问题：词类同句法成分是简单对应的还是复杂对应的，若是简单对应的，那么名、动、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兼类；若是复杂对应的，复杂到什么状况？一种观点是，只要是同一个概括词，在任何位置上都属同一词类，这样实际上没有词义相同的兼类词。这两种极端的意见现在几乎没有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处在两种极端之间：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既非一一对应的，也非在任何位置上一个概括词的词性都不变。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词类与语法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下来？这个问题一旦解决，词类划分的标准问题也就解决。这个问题是目前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然而80年代以来的汉语词类研究，大多是头脑中有了类的区分，然后找划类标准。由于缺乏明确的论证，在词的分类、归类和兼类问题上各方意见难以取得一致。

为解决词类同语法功能的关系问题，汉语语法学界作出了方法不同的尝试。一种路子是把词类看作原型范畴或模糊范畴，莫彭龄、王志东（1988）提出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史有为（1994）提出汉语词类的柔性处理方法，尝试用计算隶属度的办法来处理词类同语法功能的关系；袁毓林（1995，1998）从原型论观点来处理分布和词类的关系；卢英顺（1998）也尝试通过计算近似度的方法求得一个词的词类归属。这种方法的问题是仍无法对原型的确定加以论证，因而难以操作。另一种路子是通过计算语法功能之间的相容度的办法揭示语法功能同词类之间的关系，郭锐（1999）认为，有些语法功能之间具有相容性，比如能做主语的词也能做宾语，反过来能做宾语的词也能做主语，有较大相容性的语法功能反映了相同词类性质，在与词类的对应关系上是等价的，可以捆在一起，一束等价功能实际上就是一个词类的区别性功能，找出了所有词类的区别性分布，实际上也就基本上把所有的词分成了不同的类。这种方法使得词类划分朝着可论证的方向走了一步。

三、汉语词类研究的其他方面

兼类问题　兼类问题也是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否是兼类词与三方面因素有关：1. 词的同一性，2. 是具有多重词类性质还是词类的多功能现象，3. 采取何种划类策略。

关于词的同一性与兼类词的关系，一般的看法是，一个多义词的不同义项或同一概括词的不同用法属不同词类，都算兼类词，而意义之间无联系的同音同形词属不同词类不算兼类词，是独立的两个词。徐枢《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1991）、陆俭明《关于词的兼类问题》（1994）认为，只有同一个概括词兼属不同词类才能叫兼类词，不同概括词属不同词类根本是两个词。实际上，把兼属不同词类的多义词看作兼类词，还是只把同一概括词看作兼类词，这只是名称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词只有一种词类属性还是具有多种词类属性。郭锐（1999）建议，可以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兼类词”这一术语，为区分两种情况，可以把具有词义同一性的兼类词叫同型兼类词，把分属不同词类的多义词叫异型兼类词；狭义的兼类词指同型兼类词，广义的兼类词包括同型、异型两种兼类词。问题的难点在确定词的同一性本身上。如果不同概括词具有不同词类属性，必须看作不同词类；同一概括词具有多种词类属性则不一定要处理为兼类词，是否处理为兼类词，与采取何种划类策略有关。由于在判断词的同一性上

的分歧，使异型兼类词的范围也产生差异。比如若认为“研究”在“研究问题”和“社会研究”中不同一，就应处理为动词兼名词，若认为“木头”在“木头断了”和“木头桌子”中不同一，就应处理为名词兼区别词（参看杨成凯《词类的划分原则和谓词“名物化”》，1991）。如何确定词的同一性讨论得不多，目前主要是凭语感，缺乏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多数情况下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但一些难点问题仍有较大分歧。

另一个难点是一个词在不同位置上是具有多种词类性质还是词类的多功能现象，这个问题与词类和语法功能的对应关系是相关的。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认为，“社会调查”、“进行调查”中的“调查”与“调查问题”中的“调查”性质有别，后者可以带状语、补语等，是动词性的，而前者只能带定语，是名词性的。胡明扬《兼类问题》（1996）也对类似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郭锐（1999）认为可以根据语法功能的相容性来确定功能与词类的关系，从而确定什么情况下是兼有多种词类性质，什么情况下是词类的多功能现象。

关于采取何种划类策略，朱德熙（1982，《语法答问》1985）、陆俭明（1994）、郭锐（1999）认为，划分词类有相对性，对于兼有 a 和 b 两种词类性质的词，可以采取不同的划类策略：1. 同质策略：处理为 a 类和 b 类的兼类词；2. 同型策略：处理为第三类词；3. 优先同型策略：优先考虑 a 的性质，则处理为 a 类词，优先考虑 b 的性质，则处理为 b 类词。采取何种划类策略，应考虑：（一）词类的简单性：类的总数尽可能少，狭义兼类词总数尽可能少；（二）句法规则的简单性：划归同一词类的不同词的语法功能应尽可能单一。而这两方面常常是冲突的，因此应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因素，使两方面的总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这就要考虑兼属两种词性的词的数量，如果数量大，宜采取优先同型策略，如果数量小，宜采取同质策略。汉语词类问题的不少争论实际上都是由各自所持的划类策略不同引起的。策略只有好与不好之分，没有对与错之分。选择哪一种划类策略最好，要结合具体情况和分类目的作通盘考虑，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目的采取不同的划类策略。

划类操作程序问题　80 年代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不大讨论划分词类的具体操作程序。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注重词类划分的具体操作程序。石安石《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的再探讨》（1980）尝试逐层划分词类，一次只用一个标准，上层采用比下一层更泛一些的标准，这些做法对严格划类标准、提高划类的可操作性都是一个进展。卢甲文《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和层次》（1982）、鲁川《现代汉语信息语法的词类问题》（1991）、陆俭明（1994）、高更生《汉语词分类的设想》（1995）、郭锐（1999）也都提出逐层划分操作程序。逐层划分比过去只有实词和虚词大类划分的做法更详尽地揭示了词类的层级性。

其他研究　除上面谈到的外，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汉语词类作了研究。邢福义《词类辨难》（1981）集中讨论了词的归类问题，提出直接判定、排他、类比等归类方法。莫彭龄、单青（1985）统计了名、动、形三类词在实际语料中的语法功能，提供了有价值的统计数据。陈宁萍《现代汉语名词类的扩大——现代汉语动词和名词分界线的考察》（1987）采用连续统模型分析动词向名词的漂移，李宇明《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1996）、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1996）尝试从名词的空间性和动词的时间性出发，说明区别词的性质、解释词类

活用，沈家煊《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1997）根据 Croft 的标记理论讨论汉语形容词的主要功能，这些运用新理论的研究都富有启发性。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1996）较全面地考察了汉语的词类问题，具有相当参考价值。郭锐（1999）运用统计方法，发现词类的非本职功能随词频下降而显著下降，本职功能则与词频无显著相关。

参考文献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胡明扬：《汉语词类研究综述》，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郭　锐）

汉语虚词研究（Chinese Empty Words, Studies of）

虚词在汉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是汉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00 多年前。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121）中就有了解释虚词的专条，明代出现了第一部虚词专著《助语辞》（卢以纬，1592），清代出现了第一部虚词词典《助字辨略》（刘淇，1711）。这些研究是为读懂经书服务的，因此注重虚词的意义感受及其在句子组织中的表达作用，具有直观性和体验性，属于传统语文学范畴。

20 世纪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语法学，虚词研究也开始成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自觉的研究，如杨树达的《词诠》（1954）。到了 80 年代，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从语义、语法、语用等角度对虚词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在研究理论和方法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虚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对单个虚词的精细描写和某类虚词的综合论述。如陆俭明的《"还"和"更"》（1980）围绕五种句式具体比较分析了"还"和"更"在意义和用法上的不同；《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1984）从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角度，运用比较法验证了现代汉语的疑问语气词只有两个半："吗"、"呢"和半个"吧"；胡明扬的《现代汉语里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根据调查材料具体分析，提出语气和语气词三分的新观点。

二是词典性质的虚词专书陆续出版，如景士俊《现代汉语虚词》（1980）、孟田《关联词语例释》（1981）、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和北大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注释准确，见解独到，把意义、用法和功能结合起来分析虚词，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

三是虚词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主要是在副词研究领域。具体表现在四点：

第一，系统探讨了虚词研究的方法，并加以理论总结。陆俭明、马真在《虚词研究浅论》（《现代汉语虚词散论》，1985）提出了虚词研究的两条线索：一是依据虚词的意义，充分运用比较法；二是考察虚词的用法，可以从八个方面入手：句类、词类、音节、轻重音、肯定和否定、简单和复杂、位置、跟其他词语的配搭。邵敬敏的《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1987）从理论上总结了 80 年代副词研究的突破和特点。

第二，注意研究虚词语法意义的内在联系。如马真的《说"也"》（1982）从把握虚词的基本作用入手，区分了句子格式的语法

意义和虚词本身的语法意义，强调指出“在虚词研究中切忌将含有某个虚词的某种句子格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硬归到格式中所包含的这个虚词身上去。”邵敬敏、饶春红的《说“又”——兼论副词研究的方法》(1985)则提出“更重要的还必须区分副词的基本语法意义和派生语法意义，并找出其内在的联系”。

第三，注意分析虚词语义和句式的依存关系。陆俭明的《“还”和“更”》(1980)、《“更加”和“越发”》(1981)把副词的语法意义和所在句式结合起来，对“还”和“更”、“更加”和“越发”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从而显示出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沈开木的《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1983)从话语语言学角度研究了“也”字句的话语联系，提出了“本句”、“伴随句”，描述了“也”的语义指向。

第四，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化，揭示了更多更深的语法规律。学者们运用了比较、替换、语义指向等方法，从分布范围、语法环境、语义背景、预设等角度来研究虚词，进而研究与之相关的歧义、句式结构等语法现象，揭示了许多新的语法现象和规律。如马真的《说“反而”》(1983)从语义背景出发，重新概括了“反而”的语法意义。马希文在《跟副词“再”有关的几个句式》(1985)中通过预设、意愿等概念，揭示出“再”的意义和用法。

虽然虚词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仍是急需发掘的领域。不仅新产生的虚词需要研究，还有一些常用虚词仍有待研究，如“了、着、过”到底表达什么语法意义，介词都能表示哪些语义格等等。

参考文献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应晨锦）

汉语复句研究 (Chinese Complex Sentenee, Studies of)

我国最早的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1898)没有提出复句的名称。20世纪首先对现代汉语复句进行详细讨论的是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黎氏借鉴英文文法，结合汉语实际，把复句分为三类：包孕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然后根据分句间的关系，对三类复句进行再分类，并一一列举了表示这些关系的连词（关联词语）及其不同功能，分析了一些复句的特殊结构形式，为现代汉语复句研究奠定了基础。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是20世纪中叶以意义为重点、结合结构和意义研究复句的最主要的著作。吕氏认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结（小句）组成的句子是繁句。词结间是“结构的结合”的是狭义的繁句（包孕句），是“关系的结合”的是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在“表达论：关系”一章中，详尽而细致地分析了复句中的种种关系，并注意从事实、心理、认识、行为和推论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几乎与吕氏同时，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也从等立句和主从句两类对现代汉语复句作了独特的分类和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7年展开了复句问题的讨论，不久，黎锦熙、刘世儒出版了《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1962)，专门讨论了复式句问题。他们吸取前苏联语言学家的观点，从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关联词语、意义容量和句子语音标志界定复句，对复句内部的再分类则根据“逻辑·语法”标准，书中对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内部各类复句的结构，意义和关联词语作了详细的描

写。60年代中期以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和“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1956)影响较大，成为当时关于复句的代表性观点。林裕文的《偏正复句》(1962)提出偏正复句内部分类应以语法特征为标准，并从相承与转折、实现与未实现说明了因果句、转折句、条件句和让步句的区别和联合。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特别注意语调和停顿在划分复句和几个独立的句子、划分包孕句和复杂句中的作用，还根据位置和停顿等形式特征，认为副词性小句(从句)同主要小句构成主谓关系，是主语。

1978年以后，现代汉语复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邢福义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对多种类型的复句的结构及使用中的变化和表义功能进行了探讨。在《汉语复句模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1991)中，邢福义认为复句格式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反映主观视点，而且后者起主要作用，因此复句格式可以使实际上没有这种关系的东西具有这种关系。他的研究观察细致，描写精详。例如在《反递句式》(1986)中对这种格式的四要素(预递词、反转词、否定词和对立概念p和g)的分析就是一个例子。邢福义还对复句进行新的分类，即先分为因果复句、并列复句、转折复句，然后进行多级分类。张文熊在《句子的逻辑分析需要用些数理逻辑的方法》(1982)一文中提出用命题演算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复句间逻辑关系的主张，并就几个传统逻辑难于解释的例子作了分析。同年，王维贤在《论“转折”》中引进模态逻辑的概念和方法把“转折句”(虽然A，但是B)的逻辑语义基础解释为$A \rightarrow M_1 \rightarrow B$($M_1$为模态词“较大可能”)，并对相关连词作了分析。在《现代汉语复句新解》(王维贤、张学成、卢曼云、程怀友合著，1994)中，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复句问题。王维贤等立足于语言的符号性、交际性、系统性和开放性，根据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从语言的句法平面、句法语义平面、句法语义语用平面的不同层次，在区分事理关系、认识关系、心理关系的基础上对各类复句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了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该书运用二分法提出了复句的新的层次分类，并注意到单复句的中间地带。书中把“形合句”的“形”不限于关联词语，并对各种类型复句的包孕能力作了全面研究。

(王维贤)

汉语歧义研究 (Ambiguities in Chinese, Studies of)

广义的歧义指一个符号可以有多种理解的性质，狭义的歧义仅指句法歧义。最早提出汉语歧义研究的学者是赵元任。他在1948年的《国语入门》中首次讨论了“他是去年生的小孩”和“他是1948年选举的总统”两个句子的歧义问题，在1959年《汉语中的歧义现象》一文中系统论述了包括词汇歧义和语篇歧义、汉字造成的歧义、同音歧义、由直接成分造成的歧义在内的各种歧义。

国内首先研究句法歧义的学者是朱德熙。在1962年的《论句法结构》一文中，朱德熙系统地运用了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和方法，分化了因结构层次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并第一次运用变换的方法，分化了词形、词序与结构层次都相同的歧义结构。1980年又发表了《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一文，讨论了句法歧义的性质，并提出了根据组成成分的词类、层次构造、显性语法关系、隐性语法关系来分化多义句式，特别指

出了“隐藏在显性语法关系后边的潜在的语法关系”，强调根据词的小类来解释同形歧义现象。除了对歧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外，朱德熙也讨论了一些具体歧义结构的分化问题，如《“的”字结构和判断句》(1978)、《与动词“给”相关的句式》(1979)。

80年代以来研究汉语歧义问题的文章大量出现。首先围绕朱德熙《“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1978)一文展开的热烈讨论，掀起了歧义研究的一个高潮。讨论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有：王还《再说说“在”》(1980)、施关淦(1989)《关于“在+NP+V+N”句式的分化问题》(1980)、邵敬敏《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1982)。这次讨论深化了歧义结构分化理论。另外，马庆株《述宾结构歧义初探》(1985)讨论了述宾结构的歧义问题，把述宾结构所引起的歧义分为外部歧义和内部歧义，提出要对动词和宾语划分小类的观点。在歧义类型描写方面，吕叔湘《歧义类例》(1984)列举了丰富的歧义例句，并为之分类，例句全面，条理清晰。石安石《歧义现象种种》(1987)指出歧义包括词汇歧义和组合歧义，而组合歧义又包括语法歧义和语义结构歧义。

关于歧义的性质，赵元任(1959)就指出歧义“跟模糊和笼统”不同。但在研究中有些学者逐渐忽略了这个问题，把歧义与“模糊”和“笼统”混为一谈。针对这一现象，石安石《说歧义》(1985)进一步在理论上讨论了歧义的性质以及歧义与模糊、笼统的界限。陆俭明、马真《谈句法歧义现象》(1990)则全面讨论了造成句法歧义的因素、歧义格式的分化等问题，指出观察、分析句法歧义现象往往是对某种句法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在歧义分化方法方面，邵敬敏《歧义分化方法探讨》(1991)总结了近10年来分化歧义结构在方法论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语义结构、语义指向、词的次范畴小类、词项语义特征分析以及预设、焦点的变化引起的语境歧义等新的分化手段。

90年代以来，歧义研究进入平稳阶段。人们开始用新的理论重新审视、检验已有的歧义研究理论，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蔺璜《三个不同平面上的歧义现象》(1993)、曹炜《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1993)、张觉《从歧义分析看句子分析法》(1995)等。

参考文献

赵元任：《汉语中的歧义现象》(英文)，1959，中译文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朱德熙：《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2。

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5.5。

石安石：《说歧义》，《中国语言学报(三)》，1985。

陆俭明、马真：《谈句法歧义现象》，《汉语论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李　艳)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ology in Chinese Grammatical Analysis)

随着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语语法分析方法也不断发展。句法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作为代表，其发展顺序大致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语义格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

句子成分分析法是汉语语法研究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句法分析方法，又叫中心词分析

法，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中最早使用这种分析法。它的特点是认定句法分析就是分析一个句子（单句）的句子成分，而一个句子可以有六种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分析时先一举找出全句的两个中心词——名词中心词和动词中心词，以作为主要成分主语和谓语，让其他成分分别依附于它们。其分析步骤是先找出主语和谓语，再看谓语后有无宾语，最后指出所有附加于主语、宾语之前的定语和附加在谓语前后的状语和补语。这一方法曾在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广泛使用，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建立了汉语语法学，普及了汉语语法。但适用范围较窄，而且严重忽视句法构造的层次性，于是层次分析法被引进汉语语法研究中。

层次分析法，又叫直接成分分析法，简称 IC 分析法，二分法，由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提出。中国大陆最早使用层次分析法的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 1952 年至 1953 年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续发表的《语法讲话》，后来以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于 1961 年正式出版。该书运用的层次分析法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借鉴而来，但又加以改造，不但讲切分，还讲定性（即不但指明每一层面上的直接成分，还要指明成分间的结构关系）。层次分析法比句子成分分析法适用范围广，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可以把研究引向深入，不断揭示新的语法规律，在研究和教学中已被普遍采用。

但是层次分析法不能揭示句子内部的语义结构关系，于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又引进了新的分析方法——变换分析法。变换分析法就是考察所分析的句子结构（一般称为原句式）跟与之有内在结构关系的句子结构（一般称为变换式）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达到分化歧义句式的目的。关于"变换"的思想，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里就已存在。目前所用的变换分析法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但已根据汉语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有关变换分析的理论，提出了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朱德熙的《说"的"》（1961）和《论句法结构》（1962）最早使用变换分析手段。变换分析法能更有效地分化歧义句式，可用来给某种句式分类定性，把语法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为了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80 年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开始采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最早见于朱德熙的《"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1981）一文。此后马庆株的《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1981）、陆俭明的《"V 来了"试析》（1989）等相继使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探讨汉语语法规律。语义特征分析法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同一关键位置上的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解释说明这些实例的句式之所以独具某些特点、并将该句式跟与之同形的句式加以分化的原因。这一方法为同形句式的进一步分化、为同一类词划分小类提供了可靠的语法、语义依据。

80 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格"指名词（包括代名词）跟动词（包括形容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其形式标记是介词和语序。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用语义格来研究汉语语法，如孟琮等编的《动词用法词典》（1987）对每个动词所带的宾语都标明了格关系。语义格的引入使汉语语法研究将语法的形式分析和语义分析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描写汉语语法。

格语法理论只能适用于说明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为了研究汉语中复杂多样

的语义关系，中国语法学者提出了“语义指向”的说法。语义指向是指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某个成分发生的直接联系，特别是指间接成分间的语义联系。语义指向分析法是通过分析句中某一成分的语义来揭示、说明、解释某一语法现象。胡树鲜、沈开木、陆俭明、刘宁生、马希文、邵敬敏等对此作了重要的探讨。有些学者还开始研究造成某个成分不同语义指向的内在规律，如沈开木的《“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1984)、张力军的《论“NP1 + A + VP + NP2”格式中A的语义指向》(1990) 等。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还常用到其他分析方法，如分布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替换分析法、扩展法等。从句子成分分析法到语义指向分析法，是一种发展，而非简单的替代。每一种分析法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正是这种局限性使我们不断去探求新的分析法，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结合的方向迈进。研究上的突破往往有赖于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方法的革新。

参考文献

陆俭明：《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嬗变》，《中国语文》1992.6。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应晨锦）

汉语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早期称“转换语法”或“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80年代以后又称“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和“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 and Parameter Theory）”。生成语法的“语法”不但包括句法学，也包括与句法有关的语义学和音系学，实际是一种语言学的理论。狭义的生成语法专指由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创立的、以他的著作为代表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广义的生成语法还包括由该理论衍生或与该理论参照的相关语言学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界，生成语法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一般认为，生成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别代表了现代语言科学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生成语法是在结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发现后者关于“分布”、“替换”等原则的一些局限性，所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方法，并试图实现更高的理论目标。概括地说，一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上，生成语法主要研究人类普遍的获得和识别语言的内在能力，而不仅仅是对具体语言外部现象的一般性描写；二是在语言学研究方法上，生成语法主要建立对语言规则演绎推导的解释程序，而不仅仅是采用对语言材料归纳分类的发现步骤；三是在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上，生成语法主要追求语言分析的形式化和精密化，使语言学成为有充分解释力和演算力的实用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不仅仅把语言分析看作是人文科学范围内社会文化知识的诠释或语言教学的一部分。

生成语法理论近年来对汉语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某些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取得了部分成果。不过国外和国内在研究取向和深度上还存在差异。

国外的汉语生成语法研究以理论建设和专题研究为主。近年一批曾经在或仍在美国

或欧洲学习工作的汉语学者，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写出了一定数量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和论文，对一些语法现象的分析和解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国内的汉语生成语法研究目前还是以理论介绍和尝试性研究为主。介绍方面的主要工作如：①不少语言学刊物登载了介绍生成语法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介绍性著作，除翻译出版了乔姆斯基几本专著以外，重要的有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1988）、《语义学》（1990），赵世开《美国语言学简史》（1989），方立《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1993）等。②多次召开国外语言学研讨会和专题的生成语法学讨论会，交流了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成果。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汉语生成语法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在内部发行。③一些大学开设了介绍和研究生成语法的课程。如华东师范大学1981年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陆孝栋开设《转换生成语法》专题讲座，复旦大学徐烈炯1986年后开设《生成语法理论导论》、《语义学》等专题课程，北京大学沈阳1994年开始开设《汉语生成语法研究专题》课程，解放军外语学院程工和广州外贸大学宁春岩开设《生成语法研究》课程等。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徐烈炯对汉语空语类和语义控制、约束关系的研究（《与空语类有关的汉语语法现象》，1995等）；赵世开对汉语空语类和代词所指关系的研究（《语言结构中的虚范畴》，1986）；沈阳对汉语空语类和句法结构与语义解释对应关系的研究（《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1994；《名词短语的多重移位形式及把字句的构造过程与语义解释》，1997）；程工关于汉语反身代词的研究（《生成语法对汉语“自己”一词的研究》，1994）；邢欣关于汉语递系结构的研究（《汉语递系结构研究》，1990）；徐烈炯和沈阳关于汉语题元结构的研究（《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1998），等等。

总的看，目前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特别是国内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空白点也很多。今后的工作主要有：①理论研究应从单纯介绍转向专题讨论。以汉语为材料验证和发展生成语法建立的原则和方法，积极参与国际上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讨论。②实际研究应从个别问题转向全面考察。对汉语音系、句法、语义的各个方面都应有大规模的数据统计、语料分析。特别是过去很少研究过的问题更应做细致、全面的研究。③应用研究应从满足人文阐释和教学需要转向现代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汉语信息处理、建立汉语句法规则和语义解释的形式化程序以及汉语获得机制的心理和生理基础研究等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提供语言学支持。

参考文献

Huang, C-T.J.&A.Y.-H.Li,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程工：《生成语法中的汉语研究：课题与问题》，《当代语言学》，1998.2。

石定栩：《国外汉语语言学研究现状》，《国外语言学》，1997.1。

徐烈炯：《汉语语义研究的空白地带》，《中国语文》，1996.4。

（沈　阳）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Valent Gramma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价”（valence）最早是指动词跟一定数目的名词性成分（记作NP）之间的依存关系（dependency）；其中，动词是支配成分、NP是从属成分。从属成分又叫配价成分（简称“价”〔valent〕），或配项（dependency constituents）。一般地说，能跟一个NP组合的动词叫一价动词（monovalent verb），如：

（人）走；能跟两个 NP 组合的动词叫二价动词（bivalent verb），如：（他）炒（菜）；能跟三个 NP 组合的动词叫三价动词（trivalent verb），如：（爸爸）给（我）（一本书）。因此，“价”是对动词的支配能力的数量表示，是根据动词的组合能力而聚合成的一种语法范畴。

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首创了配价语法，德国语言学家又大大地发展了配价语法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称动词配价所支配的成分叫补充成分（Erganzungen），不受动词配价支配的成分为自由说明语（Freie Angaben）。补充成分又分为必有的（obligatorisch）和可有的（fakultativ）两种。汉语配价语法主要是从这一系统借鉴和发展而来的。不过，类似配价的观念在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中也有过。如：“一个具体的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动词可分‘双系’与‘单系’……”

朱德熙首先明确地把配价语法的思想引进汉语语法研究。他在 1978 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用动词配价的观点分析动词性成分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等问题，引起了许多语法学者对配价语法进行研究的兴趣。比如，文炼《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1982）讨论了确定动词向的前提和标准。吴为章《单向动词及其句型》（1982）对单向动词进行了次分类，并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单向动词构成的各种句式。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1984）分析了动词的配价成分的省略问题。刘丹青《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1987）讨论了形容词的配价问题。袁毓林《准双向动词研究》（1989）讨论了“辩论、握手”等其中一个从属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导的双向动词及相关句式。

进入 90 年代以后，汉语配价语法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范晓《动词的“价”分类》（1991）提出了确定动词价的四条标准，并据此对动词进行分类。陆俭明《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之管见》（1991）讨论了及物/不及物动词跟单向/双向动词的复杂关系。谭景春《双向和多指形容词及相关的句法关系》（1992）详细讨论了形容词的配价及相关的句式变换等问题。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1992）尝试从配价角度研究“意见”类名词对其他名词的支配关系，讨论了由二价名词构成的有关句式的句法、语义特点。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1993）对价所属的语法范畴的性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沈阳《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1994）尝试用形式语法的方法来确定动词的价。袁毓林《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1994）尝试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一价名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探索语言理解的某种微观机制。沈阳、郑定欧主编了论文集《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1995），收入了 12 篇关于汉语配价语法的专题论文。

目前，跟国外语言学界一样，汉语语法学界在配价这种范畴的性质、确定配价的标准、配价成分的语义角色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配价这种范畴的性质方面，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1）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2）配价是一种句法范畴。（3）配价是一种“句法—语义”范畴。在价的数量的确定方面，主要的争论是：（1）由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要不要计入价的指数？（2）在什么样的句法框架中提取价的指数？（3）怎样来决定哪些 NP 该计入价的指数，哪些 NP 不应算入价的指数？

价反映了动词、形容词和有配价要求的

名词对其他词项的支配能力，通过描写这些词语的价可以对它们的句法组合能力作出简洁的刻画。配价语法注重同一句子中不同成分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成为反映句法和语义之间的映射关系的一种直接而有效的研究途径。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成果对计算机自动理解汉语、对于教外国人学汉语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周国光、张国宪：《汉语配价语法理论研究》，《语文建设》，1994.9。

Tesnière, L., *Elè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结构句法基础），方德义选译，胡明扬校，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袁毓林）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Functional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从交际功能角度分析语法的思想在我国和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的，但作为当代语言学主流之一的功能语法学是在最近20几年内成熟起来的。功能语法的兴起是反思形式语法的局限的结果，它突破了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被结构规则控制的封闭系统的语言观，主张从揭示人类认知方式和分析语言交际功能入手，来回答“语法何以如此”的问题。功能语法的主要门类有：1. 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Typology-Universals）研究；2. 语义认知语法（Semantics and Cognitive Grammar）研究；3.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4.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5. 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在西方的功能语法方法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学者在追求语法形式化描写的同时，已有明显的重视功能因素的倾向。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4）和《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分别就表达功能的形式表现和指代词的篇章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林焘《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1962）、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1980）、《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1985）等论文，都已突破了句法结构的静态分析，把影响语法规律的韵律因素、语体因素引入句法分析，开拓了观察语法现象的新视角。

国外的功能语法方法，较早被介绍到国内的是布拉格学派的句子功能观、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和美国西部的功能语法方法。胡壮麟《语言系统与功能》（1990）、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1994）在介绍系统功能语法的同时尝试进行了汉语现象的分析。80年代中期，廖秋忠和陈平有意识地把话语分析方法引入汉语研究。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1991）、陈平《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1987）、《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1987）为90年代汉语的功能语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后，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一书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汉语的信息结构，揭示了主题、焦点、词序变化等一系列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语法现象，并初步涉及了汉语语法形式的语法化问题以及词类范畴的认知基础和连续性问题。沈家煊《“有界”与“无界”》（1995）通过对数量概念语法表现的分析，使语法范畴的认知理据得到了透彻的揭示。语言类型学的思想传入我国较晚，由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引发的汉语疑问句类型讨论已开始触及一些语言类型分析方法问题，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1993）有明确的类型学意识，用参项和泛时性系统说明不同形

式的疑问句在方言里的分布。综合运用功能语法的认知研究、典型性研究、类型与共性研究等方法的著作是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1998)，该书从标记理论入手，使汉语语法中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解释，预示了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沈家煊：《汉语特点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Language Universals,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Language Sciences* 15.4.1993.

Thompson, Sandra A. "Functional and Typological Approaches to Grammar: History and Overview", *Oxfor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1992.

(张伯江)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 (Cognitive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认知语法研究是从人的认知特点这一角度来考察语法结构，其基本假设是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外部世界，而是由人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中介。语法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受认知规律的制约或支配，这是汉语认知语法研究最感兴趣的问题。由于语义和概念跟认知密不可分，这种研究特别注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意义"不仅仅是事物客观的语义特征，还包括人的主观认识、观察事物的角度、心中形成的意象等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大都认为语法范畴跟人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是"典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即一个范畴的内部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别。与此相关的是承认许多语法现象呈现为一个渐变的连续统，而不是一个个离散的范畴。(参看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1995)

跟描写语法相比，认知语法研究更注重寻找语法结构形成的"理据"。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是语法结构的"像似性"或"临摹性"(iconicity)，即语法结构临摹或像似于人的经验结构。戴浩一关于汉语语序和时间顺序基本一致的论文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戴浩一"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1985)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是"理想认知模型"和语法结构的关系。人在认知上形成的一些"图式"，简单的如"整体—部分关系"、"有界—无界区别"，复杂的如"量小的事物容易消失、量大的事物不易消失"，都对语法结构有直接间接的影响。(参看袁毓林《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1994，沈家煊《"有界"与"无界"》，1995，石毓智《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1992) 隐喻和转喻是人理解和指称事物、形成概念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认知手段，这种手段在语法结构上的体现叫做"语法隐喻"和"语法转喻"，汉语这方面的研究有沈家煊《转指和转喻》(1999)，王伟《"能"的个案：汉语情态研究的认知维度》(1998)。汉语认知语法研究跟汉语的语用学研究和功能语法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人工智能和中文信息处理中语义网络和推理机制的研究也跟认知语法的研究互相促进。

(沈家煊)

汉语的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ese)

话语分析也作"篇章分析"，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观察，探索语言的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的使用者的认知特征方面

来解释语言中的制约因素。研究的课题如：篇章结构、篇章连贯、信息结构、句子的主位结构等。

话语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Z.S.Harris发表的名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这篇文章讨论了如何通过分布和句法变换等手段找出篇章的基本组成单元以及篇章的形式结构与其使用的语境之间的联系，但他的话语分析方法没有产生多少影响。60年代末以后在西方逐渐形成体系的现代话语分析，学术承传来自欧洲注重语言交际功能的布拉格学派，其代表人物V.Mathesius是话语分析奠基人。

国内对西方话语分析的理论背景、研究课题和主要成果的系统评介始于8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平《话语分析说略》(1987)、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1991)、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徐赳赳《话语分析二十年》(1995)。

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汉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中对汉语指称和替代关系的描述，以及最终成书于80年代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但总体上说，80年代以前汉语的话语分析多局限于个别词语的用法分析，或复句、句群内部语义关联的分析，而且往往以修辞、逻辑分析为主。比较深人的研究还是8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一般都是针对那些与语境密不可分、不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就难以解决的问题，分析材料多是从实际使用的书本材料或录音材料中选取的自然素材，把分析的对象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密切联系语句的使用环境。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规律性或倾向性，而不是说一不二的绝对的规则。

目前正展开的汉语话语分析研究课题有：(1) 篇章结构。对大于句子的语言体的结构、语义的分析，突破了传统的章法研究的方法。如：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1983)、《篇章中的论证结构》(1988)，徐赳赳《篇章中的段落分析》(1996)，徐枢《谈谈句群》(1985)。(2) 篇章连贯，研究较多的是篇章中名词性成分的从缺、照应及其与篇章连贯性的关系。如：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支配成分的省略》(1984)、《篇章中的框——棂关系与所指的确定》(1985)、《现代汉语篇章中的指同表达》(1986)，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1987)，徐赳赳《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1990)、《多动词小句中的零形式》(1993)。(3) 信息结构。侧重对信息结构、焦点特征及表达手段的分析。如：徐杰、李英哲《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1993)，方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1995)，刘丹青、徐烈炯《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1998)。(4) 主位结构与话题结构。主要侧重对口语语句结构与表达功能的研究。如：沈家煊《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1989)，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1995)。(5) 词语用法与言语策略。主要研究一些词语的用法在篇章结构、话题结构及语用表达方面的作用。如：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1986)，沈家煊《"判断词语"的语义强度》(1989)，屈承熹《汉语副词的篇章功能》(1991)，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1994)。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有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1996)。

总体说来，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就一些专题作深人的讨论，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汉语作全面描述的专著还不多见。

参考文献

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廖秋忠：《廖秋忠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语用研究论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方　梅）

文法革新的讨论（Discussions on the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3月，汉语语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历时四年多，在汉语语法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为汉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造了舆论，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开始探索如何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来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

这场讨论是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经过30几年的努力，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旧的语法体系也暴露了不少明显的不足和问题，尤其是因为模仿印欧语法、忽视汉语语法特点而造成削足适履的缺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而当时，国际上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特别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传统语法的批判和冲击，为中国的语言学家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到30年代，一批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年轻学者先后回国，他们强烈不满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强烈要求中国文法的革新。这场讨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需求。

这场讨论的性质是：“革新中国文法学机械模仿、机械照抄照搬的风气的讨论”，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当时在上海的语法学家，如方光焘、陈望道、傅东华、张世禄等。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通用于文言和语体的国文法新体系？傅东华认为：“语体文和文言文可用同一架格的文法来处理，决不会遇到窒碍。”方光焘则指出：“许多语言现象，虽然有待于历史的说明，不过建立现代的文法体系却不能不和历史划开，因为现代的文法体系，应该是记叙的（descriptive），而不是历史的（historical）。”第二，究竟实行“一线制”还是“双轴制”？傅东华提出的原则是：“分部依附于析句，析句依附于分部”。换言之，词类和句子成分可以合二为一了。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这就是“一线制”的理论基础。方光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我以为词性都不必一定要在句中才能辨别得出来。从词与词的互相关系上，词与词的结合上（结合不一定是句子），也可以认清词的性质。”陈望道支持方氏的观点，认为“双轴制的存在实在另外有它坚强的根据，不致因形态变化的有无而存废。”第三，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张世禄主张“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这实际上仍然是以句法来鉴别词类，方光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并且对“形态”做了重要的解释：“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陈望道完全支持方氏的观点，只是主张用“功能”来替代“广义形态”。

这场讨论的意义在于：1.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法革新”的口号，对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总结，并且认识到要建立汉语语法新体系的

正确途径应该是："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语）2. 开创了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新风，对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3. 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并且能够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有所突破，例如"广义形态说"、"语法功能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这次讨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开创性的语法著作过分求全责备，不够实事求是。二是没有能够大量地占有汉语材料进行分析，因而影响到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参加讨论的有关论文于 1940 年由汪馥泉汇编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后于 1943 年由陈望道补收八篇文章重新编辑，改名为《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85 年《中国语文》杂志社又增收一篇，共收人 36 篇文章。

（邵敬敏）

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由于汉语的词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词类划分主要根据词义和词的功能。词义与词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对应，而且词义不可明确观察，因而根据词义划分词类不可靠。从 30 年代起，中国的学者们已经提出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但方法过于粗疏，且大多停留在举例说明阶段，没有提出较完整的划类标准。特别是由于把词类和句子成分一一对应起来的观念盛行，不得不采用词类假借、词类活用等概念来弥缝矛盾，不仅使问题复杂化，也不符合汉语事实。在根据词义和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都未能完满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状况下，有人干脆主张汉语实词不能分类，这种苗头在 30 年代傅东华和 40 年代高名凯的论著中已有显现。傅东华主张词本身没有分类的可能，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认为，由于"一个词可以当做各种词品"，"以单独不成句子的词语来说，是无词品之分的，可是若以语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说，则是大有分别的"。到了 50 年代，这种思想发展为明确的汉语无词类的观点。

高名凯 1953 年发表了《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明确提出汉语实词无词类分别的观点，由此引起一场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讨论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语文》上，1955 年汇编为《汉语的词类问题》，1956 年又汇编后来发表的文章为《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高名凯的主要观点是：词类分别根据的是词的形态，而汉语的词没有形态特征，所以汉语没有词类分别。高名凯并非提出汉语无词类的第一人，他的老师法国语言学家马伯乐（H.Maspéro）早有类似观点。高名凯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除个别人赞成高名凯的观点外，反对者居多。批评的观点主要有下面几种：A. 同意划分词类的根据是形态，但认为汉语有形态，因而汉语有词类分别。B. 同意划分词类的根据是形态，形态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可以根据狭义和广义形态划分词类。狭义形态指词缀、重叠等，广义形态指词与词的结合能力。C. 词的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根据，同时结合意义；也有主张意义、形态、句法三结合划分词类的。吕叔湘《关于汉语的词类一些原则性问题》（1955）一文带有总结性，其主要观点是：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分出的类，汉语的词并非在所有语法特点上都相同，因而可以分类，这些用来分类的特点是否属于形态倒无关紧要；结构关系、鉴定字、能否重叠及重叠方式这些语法特点都可

以用来划分词类；结构关系照顾的面最大，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进入句子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

这场以汉语实词有无词类分别以及划分词类的标准为核心问题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语法功能在划分词类中的作用，但由于未开展大规模的划类实践，也未清楚地说明语法功能与词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高名凯观点中的合理因素也未能充分肯定，这场讨论仍未完满解决汉语词类问题。

参考文献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胡明扬：《汉语词类研究综述》，《词类问题考察》，胡明扬主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郭　锐）

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Chinese）

如何确定汉语的主语和宾语，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一个有争议的难题。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标志，从词形变化上分不出主语和宾语来；如果单纯依靠词序来确定，又会跟传统的依靠施事和受事来确定的标准发生矛盾。从1955年7月到1956年3月，在《语文学习》上开展了有关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这是50年代继词类问题讨论之后的第二次语法大讨论，影响深远。

参加讨论的文章几乎都同意要兼顾“形式”和“意义”，但是实际上各人的理解及侧重很不一样。主要表现为两个倾向：一是强调以“意义”（或逻辑）为主要标准，如曹伯韩、徐重人、王宗炎、王力、胡附、文炼、颜景常等；二是强调以“形式”（或词序）为主要标准，如徐仲华、邢公畹、洪心衡、任铭善、肃父、祝孔嘉等。以“台上坐着主席团”（A）和“这件事他不知道”（B）为例，两者的处理是明显不同的：

例句	位置决定	施受决定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动宾谓语句	主语倒装句
B　这件事他不知道	主谓谓语句	宾语提前句

后来又出现第三种意见，试图另寻出路，即主张把宾语改名为补语，最早是吕叔湘建议的，赞成的有陈望道、李人鉴、陈仲选等。

通过这次讨论，大家认识到：1. 动词跟前后名词的语义关系相当复杂，除了施事和受事之外，还有工具、时间、处所、目的、原因、结果、方式等等，所以，只是用施事受事来决定主语宾语会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2. 从结构层次出发，主语是跟谓语相对的，而宾语是跟动词相对的，所以，虽然主语和宾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但是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

这次讨论集中在句法问题上，尽管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但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语法跟传统语法的一场前哨战，提高了对主语宾语问题的认识，也加深了对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认识。讨论比较拘泥于具体的句子分析，在理论上提出新见不多，后来又草草收兵，有虎头蛇尾之感。有关讨论文章汇编成《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于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参考文献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1990。

（邵敬敏）

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imple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Chinese）

50年代，继汉语词类问题和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开展了汉语单句、复句划界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近10篇文章。1957年1月《中国语文》发表孙毓平的一篇短文《复合句和停顿》，认为胡附、文炼否认停顿作为区分单、复句的一项重要标准的说法（见《现代汉语语法探索》1955）不妥。接着郭中平发表《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1957），该文综合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语法小组、张志公等5家的说法，归纳出单、复句划分的6条标准：1. 结构，2. 意义关系，3. 语音停顿，4. 连词，5. 连词以外的关联词语，6. 谓语的多少简繁。并指出"不同的标准难免获得矛盾的结果"。同年5月刘世儒发表《试论单句复句的区分标准》一文，认为句子是结构学研究的对象，单、复句的本质不同在于结构：单句是由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成分构成，复句是由分句（小句或简单句）构成。对当时以逻辑意义和关联词语为复句的主要判别标准，冲击很大。但是，可能是对于成分的认识不同，刘氏的单句范围较大，下面的句子都被划分为单句：他因为下雨不来了｜皇宫前面有一道门，是给皇帝走的｜她一次生下三个孩子，都很健壮。这次讨论中，紧缩句"越…越…｜一…就…｜不…不…｜非…不…｜不…也…｜再…也…｜…就…"等，被认为是以单句的形式表达了复句的内容，是由复句紧缩成的单句。

参考文献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丁勉哉：《谈复句的紧缩》，北京：《中国语文》1957，12。

（萧国政）

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Discussions on the Methodology of Sentence Analysis in Chinese）

20世纪80年代通行的汉语析句方法有两种：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后起的层次分析法。为了配合《暂拟系统》的修订和高等院校的语法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语文》1981年至1982年组织了一场关于现代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发表的20篇论文加上其他6篇文章编为《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1984）。这次讨论大致有三种意见：

1. 维护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以史存直的《句子结构和结构主义的句子分析》为代表。他明确反对层次分析法，认为它"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忽略了词在句中的结构层次，把非线性的东西当作线性的东西处理"，是形式主义的。主张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认为"六个成分自然分为三个层次"，"能保持句子格局"，"兼顾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因此句子成分分析法是最好的，根本不需要与层次分析法结合。

2. 倾向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句子成分分析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作是华萍（邢福义）的《评"暂拟汉语教学系统"》和陆俭明的《分析方法刍议——评句子成分分析法》。持此观点的人较多。华文从科学性、一贯性、实用性三个方面对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出了批评。主要批评它缺乏科学性，即"把有层次的句子结构看作同一平面多成分加合体"，"把整块运用的向心结构拆散成各自分立的造句零件"，"让丰富多彩的语言事

实去迁就由六种成分的搭配排列状况规定下来的句子格局"。同时也批评了改良的析句法即把句子分为"主语部分/谓语部分//宾语部分"三块。陆文认为"这种分析法由于严重忽视句子的语法结构层次性，所以对语言事实的解释无论就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解释能力是比较小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不适用于词法和句法中的复句分析，只适用于对单句的分析，而且仍有局限性。如"汉语中有相当多的句子'主干'离了'枝叶'站不起来"，即"'主-谓'这个'主干'在实际语言中从来不说"或能说但与原意不同甚至相反。接着客观评价了它的可取之处——"重视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句子的语法结构'递归性'的特点"。最后指出需要普及层次分析法，而且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分析方法，拓宽研究思路。

3. 尽可能公正地评价两种析句方法的优缺点，希望寻找第三条路。又有四种观点：一是卞觉非在《汉语语法分析方法初议》中主张采用树形图分析法——"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为基础、用树形图并辅以字母符号来标明直接成分的功能类目"。二是廖序东在《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中提出"基本成分分析法"，即把句子成分分为两组：基本成分"主谓宾"和附加成分"定状补"。具体步骤是"拨开枝叶见主干"，先抓附加成分，再根据剩下的基本成分确定句型。三是陆丙甫在《对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一些看法》中主张采用"核心层次分析法"，即把某些词组作为整体看待，以谓语核心作为切分终点而进行层层切分。四是吕冀平的《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主张语法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语法教学采用成分分析法。

讨论的文章中，有两篇论文观点新颖，富有启示，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一是朱德熙的《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认为"层次分析是语法分析的一部分，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手续之一，不是一种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的方法"；还提出了一个建立在词组基础上描述汉语句法（即"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新设想。二是胡附（胡裕树）、文炼（张斌）的《句子分析漫谈》，提出了要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句子分析的新颖观点。

这次讨论为《暂拟系统》的修订提供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扩大了层次分析法的影响，加深了对汉语的性质和结构的认识，也是对汉语句法分析的一次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但是辩论的气氛不浓，几乎没有相互交锋，因此讨论不够深入；而且大都偏重于对两种析句法优缺点的评价，新的创见不多。但大家认识到，无论是在语法研究还是语法教学中，问题都要想得开一些，路子都要宽一些，方法都要多一些。

参考文献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应晨锦）

汉语方言研究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of)

1918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从事对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言研究作为"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1923）提上了日程。1924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研究会"，发表了宣言书，规定了

调查任务，制订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记音符号，用它标注了14种方言著作，标志着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记录汉语方言的开始。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对方言研究的日的作了明确的论述，从此，汉语方言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对吴语的调查，1928年出版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从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如1928年至1929年赵元任在两广的调查，1933年白涤洲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调查，1934年罗常培在皖南歙县等地的调查，以及随后1935年春江西的调查、1935年秋湖南的调查、1936年春湖北的调查、1940年云南的调查和1941至1946年四川的调查等。这几次调查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湖北方言的材料由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共同整理编写，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为名于1948年出版。白涤洲调查的关中方言材料，则在他去世多年后由喻世长整理，1954年以《关中方言调查报告》为名出版。湖南、云南、四川方言的材料后来由杨时逢在台湾陆续整理，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如《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江西方言材料也由他整理成单篇论文发表。除上述几次综合性调查外，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还分别出版了某一地点方言的著作，如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中山方言》（1948），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临川音系》（1940），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0），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等。其中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可以给人做一个其他方言记录的样本"，对后来同类著作的影响很大。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时期，汉语方言的调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对汉语方言的类别和特点开始有了一个虽属初步但比较明确的认识，汉语方言研究也由此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这一时期的方言论著大多以语音调查为主，审音都比较严格，注意古今语音演变的关系，但对词汇和语法注意得还不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所用调查记录整理归纳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以及为方言调查设计的调查表格和记音工具等，至今仍然为国内外方言工作者所采用，成为汉语方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中期，随着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大语文政策的推行，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迫切需要对全国的汉语方言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1956年3月，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下达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随后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程，培养学生调查方言的知识和能力。这些都为方言普查做了人力上和业务上的准备。从1956年起，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汉语各方言区全面展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一个市、县为一个点，共完成了全国各地2298个方言点中的1849个点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基础上，先后编写出调查报告近1200种，学普通话手册300余种，各省区的方言概况20种，以后公开出版的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等4种，学普通话手册70余种，其中《江苏省和上海

市方言概况》是反映这时期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性著作。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加深了对汉语方言的认识，把汉语方言分成了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七个方言。在方言普查工作的推动下，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很多方言研究的论文，其中也有不少关于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文章。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过去几十年间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地方。这一时期重要的著作还有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音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等。此外，从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学者、海外华裔学者以及欧美日等国的一些语言学家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如赵元任的《台山语料》(1951)、《绩溪岭北音系》(1962)，杨时逢的《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董同龢的《四个闽南方言》(1959)，丁邦新的《如皋方言的音韵》(1966)，易加乐（Søren G. Egerod）的《中山隆都方言》(1956)，罗杰瑞（Jerry Norman）的《福建建阳方言》(1969)，桥本万太郎的《海南文昌方言》(1960)等等。总起来说，五六十年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1979年以后，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和繁荣。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强调方言事实的描写和方言特点的挖掘，注意把方言研究从一般描写逐步引向深入探讨，加深对方言的认识。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由语言研究所负责汉语方言部分。《方言》杂志为配合地图的绘制，组织了一批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有代表性的是李荣的《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和《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前者把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后者把平话和徽语设立为两个与闽粤吴等方言平行的大方言区。李荣的上述主张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中得到体现。《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汉语方言提出“点—小片—片—区—大区”的五个层次区分法，取代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的三级区分；据此再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把官话分为八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这是方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代表了当时汉语研究的水平。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持“汉语方言重点调查”项目，组织方言工作者调查漳平、江永、福清、黎川、嘉定、舟山、洛阳、武汉、博山等方言，出版了一批综合报告，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比较细致的描写。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又主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计划先出版40种分地方言词典，然后再编一部综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这一工程标志着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方言工作者或从本地实际出发，或出于方言研究的需要，写出了数量众多质量较好的论文和专著。其中综合性调查报告主要有：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987，1988，1990)，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陈

章太、李如龙的《闽语研究》(1991)，日本平田昌司主编的《徽州方言研究》(1998)。其他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调查报告还有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词汇》(1997)，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1992)等。单个地点方言的调查研究，近10余年来也出版了不少论著。比较重要的有：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陈刚的《北京方言词典》(1985)，张振兴的《台湾闽南话记略》(1983)，李永明的《临武方言》(1988)，贺巍的《获嘉方言研究》(1989)，曹志耘的《严州方言研究》(1996)，汪平的《苏州方言语音研究》(1996)，钱乃荣的《上海话语法》(1997)，项梦冰的《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1997)，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研究》(1998)，以及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等。一些学者还出版了有关方言的论文集，主要有李荣的《语文论衡》(1985)、《音韵存稿》(1982)，贺巍的《汉语方言文稿集》(1987)，侯精一的《晋语研究》(1989)，李如龙的《方言与音韵论集》(1996)等。

70年代以来，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的方言学者也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主要有丁邦新的《台湾方言源流》(1979)，《儋州村话》(1986)，罗肇锦《客语语法》(1984)，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1996)，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1972)，余蔼芹《粤方言研究》(卷一)(1972)，桥本万太郎《客家方言》(1973)、《客家话基础语汇集》(1972)，辻伸久《广西粤语比较音韵》(1980)、《湖南省南部中国语方言语汇集》(1987)，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词典》(1979)等。

总起来说，1979年后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表现在汉语方言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比以前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研究都在不断取得进展，汉语方言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张振兴：《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北京：《方言》，1997.4。

王福堂：《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王福堂、谢留文)

汉语方言分区研究 (Division of Chinese Dialectal Districts, Studies of)

汉语方言分区是根据方言调查材料比较各地方言的特点，对其异同进行归纳取舍，将汉语方言分类，进面划分分布区域。方言分区的结果可以用地图形式表示。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　章太炎在《訄书》(1900)中第一次将汉语方言分为10种，稍后又在《检论卷五·方言》(1915)中改订为九种，大致如下：①黄河以北以东地区是一种，②河南以南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是一种，③陕西、甘肃是一种，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湖南南部是一种，⑤江淮之间是一种，⑥安徽南部和浙江交界的地方是一种，⑦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是一种，⑧福建和⑨广东各为一种。这个分区主要是凭作者的印象和语感，其结果与现代根据调查材料、有明确的语言学分区标准分出来的方言区大致接近。西洋传教士在《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

1920)》的"中国的语言区域和语言的发展"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官话（MANDARIN）、吴语（WU DIALECTS）、闽语（FUKIEN DIALECTS）、粤语（CANTONESE）、客家话（HAKKA）五区，并第一次绘制了汉语方言区划图。根据调查材料用语言学方法所作的汉语方言分区始于1934年上海申报馆发行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区。1948年的《中国分省新图》根据新的调查材料又把汉语方言分成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11区。1955年，丁声树、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八种：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粤方言。1963年，潘茂鼎、李如龙等在《福建汉语方言略说》中把福建闽语分成闽东、莆仙、闽南、闽中、闽北五区，实际上是把闽语先合二而一，再一分为五。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文化大革命"以后，《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1983）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都将汉语方言由八个区改为七个区。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作了新的分区，共分官话大区、闽语大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湘语区、粤语区、赣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等10个区。官话大区又分成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等八个区。此外，还有一些未分区的官话和非官话。

汉语方言分区的方法　传统的方言分区采用同言线法。同言线是某项语言特征在语言地图上的分布点的连线，依据一条或一束走向相同的同言线可以把不同的方言区域划分开来。由于汉语的历史非常悠久，早期汉语就有方言分歧，加上历代人口频繁迁移，使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变得极其复杂，同言线法很难反映这种复杂局面。中国学者一般是在综合分析各地方言语音特点的基础上，用一至二组《切韵》音系的声母或韵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对应情况作分区标准。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主要就是用"古全浊声母"和"古入声"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对应来分区的。

目前，汉语方言分区基本上只使用语音标准。也有人认为分区标准还应包括词汇和语法项目。语音、词汇、语法都用来分区当然比只用语音标准更全面，但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能否解决目前方言学界在分区问题上的分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而且，如果语音、词汇、语法标准都拿来分区的话，依据不同标准分出来的区可能会各不相同。这种方法恐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学术界在分区问题上碰到的困难。此外，各地方言词汇和语法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不平衡，用词汇和语法作分区标准的条件也还不成熟。

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　同样的语言材料，由于分区者所用的分区标准不同，分区结果往往会出现很大差别。在方言分区中，确定分区标准是极其重要的。方言学界对分区标准的认识有下面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分区标准的多和少。有的学者认为分区标准应该多，多了才能把方言差异的各个方面概括得比较全面。但有的学者认为分区标准应该少，最好只用一条，这样不会出现一些方言可此可彼、难于归属的两可局面。二是分区标准的重与轻。有的学者认为，分区标准应该有比较重要的语言学价值，至少要能尽量多地涵盖各区方言的特点。有的学者则认为，方言分区不过是用一条区别性特征把不

同的方言分开，这条区别性特征是在对汉语方言作全面调查分析后提取出来的，判断其优劣只能看它能否有效地将汉语方言区分开来，与语言学价值无关。三是分区标准的古与今。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比较古老的语音演变条件作大方言区的分区标准，用较晚的语音演变条件作方言区内部分片的条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方言分区就是对现代方言的差别性进行判断和归纳，分区标准必须是也只能是现代方言的差异。此外还有人认为，分区标准应该对内有一致性，对外有排他性。多年来的分区实践和讨论表明，由于汉语方言的演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连续的，加上移民的因素，汉语各方言长期以来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就大方言分区来说，至少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对内有一致性，对外有排他性的分区标准。以古全浊声母的演变为例，吴方言和湘方言部分方言点仍然保持浊音读法，客家话、赣方言和晋语的一些方言点不论平仄今都读送气清音，闽方言、湘方言北片的一些方言点、晋语一些方言点的白读音则大多读成不送气清音，粤方言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和上声送气、去声和入声不送气，官话则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如果严格按照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来分区，结果将与目前方言学界认同的大方言区大不相同。可见，这种提法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方言分区中尚存争议的几个问题

一、晋语 《中国语言地图集》以有入声韵为标准把晋语从官话中分了出来，成为与吴方言和粤方言等南方方言层次相同的方言区。这种观点尚未得到汉语方言学界的一致认同。反对意见主要是：根据有入声的标准，江淮官话与晋语是相同的，分区时应作同样的处理。二者要么都属于官话，要么都可以独立，不应该只将晋语独立成为一区，而把江淮官话仍然放在官话里。目前，这个问题成了学术争鸣的热点。

二、客赣分合 就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来说，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都是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应把这两个方言合在一起，称为“客赣方言”；有的学者则认为客家方言有一些古次浊上字今读阴平调，另外还有很多词语也与赣方言不同，二者还是应该分开。王福堂比较了这两个方言的语音特点后认为，单就分区标准而论，客赣分开的理由并不充分；但客家人和说赣方言的人从来都不认同对方的方言，这种语言心理使二者无法合成一个方言。因此，客家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民系方言而不完全是一种地域方言。

三、徽语 徽语应该独立还是与其他方言合在一起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近年来，平田昌司、曹志耘等人大致摸清了徽语的基本情况。总的说来，这是一种介于吴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之间的混合型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徽语处理成独立的方言区，其他的意见还有：①将其划入吴方言；②将严州片划归吴方言，其他划归赣方言；③将其三分，分别归入吴方言、赣方言和江淮官话。

四、桂南平话的归属 广西的平话具有相同的来源，但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目前已有较大差异。桂南平话的韵母系统比较接近粤方言，桂北平话的一些音韵特点其他方言很少见。因此有人主张把桂南平话划归粤方言。

参考文献

李荣：《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北京：《方言》，1985.2、3。

丁邦新：《汉语方言分区的条件》，台湾：《清华学报》，1982；又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8。

王福堂：《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小凡、李　蓝）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Grammar of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of）

汉语方言语法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汉语方言语法指一个方言中组词造句的所有规则，而不管这些规则跟共同语（普通话）相同与否，狭义的汉语方言语法则指一个方言组词造句的规则中那些跟共同语有差异的部分，习惯上也叫做某方言的“语法特点”。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北京话语法也是方言语法。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可以粗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为“语助词研究时期” 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曾经说过：“中国方言的文法，在句子的结构上差不多是全国一样，像官话跟吴语的‘你到哪里去’跟闽粤的‘你去哪里’这种小小的区别已经是例外的了，所以讲中国方言的文法差不多就是讲语助词。”由于受这种看法的影响，早期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重点就是“语助词”的语法功能。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开篇之作当属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这篇论文用共时比较的方法说明北京、苏州、常州三个方言语助词在用字、读音和用法上的异同。在其后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第六章“语助词”用列表对照的方式，描写了吴语区22个方言点相当于北京话的结构助词“的、地、得、着、了”和语气词“了、呢、吗、啊、吧、罢了、得了”等语助词在读音、用字、用法上的异同。此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进行了8次规模比较大的方言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先后整理、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其中湖北、云南、湖南、四川的调查报告都包含了八个语法功能词的报告，而且体例一致，用具体的句子展示这些语法功能词的作用：“的”（我的书）、“也”（我姓王、你也姓王）、“都”（咱们两个都姓王）、“了”（吃了饭）、“着”（坐着，说着话）、“呢”（老四呢）、“同/跟/和”（他正在同一个朋友说着话呢）、“把”和“替”（把桌子上的书替我拿去）。

在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钟祥方言记》和罗常培《厦门音系》等著作中都有“北风跟太阳”这样用苏州话、钟祥话和厦门话记音的成篇语料。成篇语料是方言语法研究中最全面、最有价值的语言材料，有的语法现象，比如句与句之间的连词，就只有从语段或成篇语料中才能调查出来。理想的方言调查，应该是完全从活的语料中来分析字音、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就是这样努力的，共记了20段成段的语料：13段对话，3段独白，1段祝祷词，1首儿歌，2个故事。从这20段语料中分析出约2600条词语。虽然作者认为这些材料尚不足以归纳语法特点，但客家话的许多语法特点都可以从这些语料观察到。此外，在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罗常培《临川音乐》等著作中，介词、连词、语气词、副词等语法功能词都被单独列为一类进行分类描写。这种对语法功能词进行分类描写的传统也被后来的研究者继承了下来。

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汉语方言

语法研究的第二个时期 由于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阶段总的趋势是语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语法研究的成果比较少。《昌黎方言志》中的语法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昌黎方言志》第三章第三节"昌黎语法的特点"分四个部分描写昌黎方言的语法。一是"没"字作动词（读阳平）和副词（读阳去）时在不同组合中的语法作用、语法意义及在句子中的分布特点。二是相当于普通话"吃了饭了"中的两个"了"的"嘞"和"咧"的用法和在句末作语气词时的区别。三是说明"卷舌化"（儿化）的语法特点与普通话"儿化"的差别。四是昌黎方言的可能补语与普通话的差别。第七章"昌黎话标音示例"用城关音标记了新诗、谚语、儿歌、歇后语、谜语、绕口令、故事和语法例句等大量的语法材料。

在50年代中期进行的汉语方言普查中，也有一些学者对各地的汉语方言语法作了一些研究，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一时期大陆的汉语方言语法论文有70多篇，涉及的汉语方言遍及官话、晋语、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湘方言、赣方言、徽语等主要的方言区。研究的内容包括重叠、儿化和子尾，动词的"体"和后附成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助词，被动式，处置式等领域。研究者大多是根据普通话的语法研究成果来对比，有的研究已能深入到方言内部的语法系统中去。从50年代末开始，台湾学者开始进行台湾闽方言语法的研究，到70年代末，也发表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论文。此外，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有一些汉语方言语法论著发表。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继承并有所发表、对后来者有所启发的过渡时期。

70年代末，大陆的学术活动重新振起，以《方言》季刊1979年创刊为标志，方言语法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时期 1979年到1998年，发表的汉语方言语法论文总数在350篇左右。除单篇论文外，在一些方言调查报告及方言志中，方言语法也占有一定篇幅。近年来，以一个方言或一个方言区为描写对象的方言语法专著也开始不断出现。从研究对象看，吴闽粤客赣湘等传统的南方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平话、徽话、晋语、湘南土话群等这些原来人们所知甚少的方言也有不少方言语法论著问世。从研究方法看，已逐渐从以普通话语法系统为参照物过渡到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为工具、深入描写方言语法系统的阶段。从研究的内容看，现在已大大超出语助词范畴，涉及词法、句法的诸多方面，并正在向完整、深入地描写方言语法系统和进行方言间的语法比较、现代汉语方言语法与汉语历史语法的比较、汉语方言语法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的方向发展。

1. 学术权威的引导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比较大 朱德熙先后发表了《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1991）、《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原题《"的"字的方言比较研究》，《方言》1993第2期）等四篇重要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汉语方言语法，证明方言语法研究与标准语的语法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这些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开拓了方言语法的研究领域，带动汉语方言学界发表了一批同类论文。

2. 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方言语法专著 目前已见到的有：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年)，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研究》(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年)，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年)，邢向东、张永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钱乃荣《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民《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语文出版社，1998年)等方言语法专著。施其生《方言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所收论文也以讨论方言语法为主，但不限于一地方言。单点方言语法专著的难点在于，在系统描写方言语法的同时又要突出方言语法的特殊性。否则，就可能平铺直叙，重点不突出，或者写成一本研究某地方言语法的论文集。同时，在选取一种语法体系来作描写框架时又要注意防止这个体系对方言事实的歪曲和限制。在这两个方面，项梦冰的《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把握得比较好。此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出版社，1996)汇集了已知的全国各地的方言语法资料，对进一步开展方言语法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1987年，《方言》杂志连续三期组织讨论西南官话的重叠式，共刊载了《武汉方言的重叠式》(朱建颂，第1期)等9篇讨论西南官话名词的重叠式和动词叠用的文章 通过这些文章，对西南官话重叠式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差异就有了基本的了解。

4.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组织小型的专题讨论会，然后出专题方言语法论文集 从1993年开始，李如龙和平田昌司、张双庆等人组织了“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专题讨论会，讨论了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湘方言、平话、徽语等东南部方言中“动词的体”(1993年，上海)、“动词谓语句”(1994年，广东韶关)、“代词”(1995年，武汉)、“介词”(1996年，黄山)、“结构助词‘的’和‘得’”(1998年，苏州)等语法问题，现已出版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动词谓语句》(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两本论文集，共收入论文32篇，对所涉及的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此外是胡明扬和郑定欧发起的“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讨会”(1994年，北京)，会后出版《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共收论文15篇，讨论的也都是东南部的汉语方言。目前，汉语方言学界对汉语的“体”“貌”等语法范畴的看法分歧比较大，这种专题讨论对深化人们对现代汉语“体”和“貌”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5. 除了大陆学者以外，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美国也有一些学者进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如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罗肇锦《客语语法》(台湾学生书局，1985)等。近年来，出现了两岸三地及与海外学者进行联合研究的趋势，如上述“东南方言语法研究”就是大陆学者和香港、日本的学者共同发起并组织召开的。美国学者余蔼芹先生也组织了一些年青学者进行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出版了《汉语方言语法比较》(*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1993，Paris)一书。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一直滞后于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这主要跟方言学家的主观认识有关。过去一直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是在语音方面，其次是词汇，语法的差别很小。

随着方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方言间的语法差别也是不小的，但研究的进展仍然较为缓慢。主要是因为方言语法系统本身比较复杂，各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也比较复杂，调查起来比较困难。能进行方言语法调查的人才也比较少。不过，经过这些年来学者的不断努力，方言语法研究滞后于语音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

（项梦冰、李　蓝）

官话研究 (Mandarin Chinese，Studies of)

官话又称北方话，是汉语方言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历史最久的方言，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北和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官话方言的内部一致性很高，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从昆明到哈尔滨，相距几千公里，通话没有困难。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一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官话方言最重要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一般都读清音声母，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官话方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这些调查材料都比较丰富，其中湖北的调查材料 1948 年整理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其他材料有的后来由杨时逢在台湾陆续整理出版，例如《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等。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官话研究著作还有《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白涤洲遗稿，喻世长整理，1954 年在北京出版)，共调查了陕西关中 42 个县 50 个点的方言。这次调查单字只记声韵，声调除入声有专题讨论外，其他只作了简单说明。除上述区域性的著作外，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是一部研究单点方言的重要著作。共分四章，包括语音分析、本地音韵、比较音韵、分类词汇等，其中本地音韵和比较音韵多采用表格形式，简明扼要。本书对助词的描写对方言语法调查具有示范作用。

第二阶段是五六十年代。50 年代中期，随着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汉语方言调查工作得到空前发展，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共完成了全国 1849 个方言点的普查工作，各地陆续编出方言概况一类综合调查报告初稿的有 20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后来正式出版、跟官话有关的有《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安徽方言概况》(1962)等三部著作。五六十年代也有不少研究官话方言的专著和单篇论文问世。这些著作仍以语音调查为重点，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 1960 年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合作编写的《昌黎方言志》。海外比较重要的官话研究著作有丁邦新的《如皋方言的音韵》(1966)。

70 年代末至今是官话方言研究的第三阶段。1979 年，《方言》杂志创刊，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迅速发展，官话方言的研究也随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8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的分区成为热点问题。1985 年李荣在《方言》杂志上发表《官话方言的分区》，以古入声字的今读为分区标准将官话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八区，同时把晋语从官话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吴语等南方方言并列的一大方言，这对官话研究是一次重要推动。随后在《方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官话分区的文章，例如贺巍的《河南

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稿）》（1985）、《东北官话的分区（稿）》（1986），贺巍、钱曾怡、陈淑静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1986），黄雪贞的《西南官话的分区（稿）》（1986），张盛裕的《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稿）》（1986），刘俐李、周磊的《新疆汉语方言的分区（稿）》（1986），林焘的《北京官话区的划分》（1987）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综合研究某一官话方言点的专著，如贺巍的《洛阳方言研究》（1993）、钱曾怡的《博山方言研究》（1993）、朱建颂的《武汉方言研究》（1992）等。90 年代中期，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研究官话方言词汇的词典，如张成材的《西宁方言词典》（1994），汪平的《贵阳方言词典》（1994），朱建颂的《武汉方言词典》（1995），刘丹青的《南京方言词典》（1995），王世华、黄继林的《扬州方言词典》（1996），王军虎的《西安方言词典》（1996），贺巍的《洛阳方言词典》（1996）等。反映了官话方言的研究已经由过去的偏重于语音研究进入了语音、语法、词汇多方面研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7），共收录了汉语北方话地区 93 个方言点的语音材料和 2645 条词汇对照，并附有 63 幅方言地图，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普通话基础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基本面貌，为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外，1997 年在山东青岛举行了第一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官话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北京：《方言》，1985。

丁邦新：《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 本，1987。

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谢留文）

吴方言研究（Wu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吴方言也称吴语，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及其毗连的赣东北、闽北地区，安徽南部也有分布。吴语的北边靠近江淮官话，南边靠近闽语。北部吴语包含较多的官话成分，南部吴语与闽语有共同之处。吴语最重要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与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古帮滂并［p pʻ b］，端透定［t tʻ d］，见溪群［k kʻ g］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

吴语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最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方言之一，在 19 世纪就有了外国传教士描写记录吴语的著作，如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1853）等。1928 年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此后，关于吴语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重要的有：1960 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是 50 年代全国汉语方言普查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吴语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第一部分把江苏省和上海市的方言分为四个区，分别叙述了各区的语音特点，并附有反映方言语音和词汇特点的方言地图 42 幅；第二部分对照排列北京和 20 个调查点的 2601 个单字音，并注出相应的中古音韵地位；第三部分对照排列 21 个调查点的 567 条常用词和词组。本书根据普查材料，提出了江苏省方言分区的标准，一改过去对江苏省方言分区的笼统说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本地区方言提供了重要资料。钱乃荣的

《当代吴语研究》（1992）是《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60年后跟踪研究吴语的一次重要实践，其中对吴语连读变调和语法现象的调查比较全面深入。颜逸明的《吴语概说》（1994）对吴语的边界和次方言分区问题作了深入讨论。关于吴语的代表方言苏州话和上海话，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1988年出版的《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　汤珍珠　游汝杰），是研究上海方言的重要著作。本书对上海市区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和成篇语料的搜集均比较完备。其他还有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苏州方言词典》（1993），许宝华、陶寰的《上海方言词典》（1997），钱乃荣的《上海话语法》（1997），汪平的《苏州方言语音研究》（1996），李小凡的《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等。

在研究吴语的论文中，王福堂《绍兴话记音》（1959），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丁邦新《吴语声调之研究》（1984）以及一些学者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使汉语方言语音研究逐步深入；80年代中期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讨论使方言工作者对吴语的边界和分区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吴语语法的研究一直走在其他汉语方言的前头，1926年赵元任发表《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这篇论文和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创了汉语方言研究、尤其是吴语语法研究的先河，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吴语语法的研究，涉及语法研究的各个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赵元任《吴语的对比特点》（英文，1967），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1978），李小凡《苏州方言的指示代词》（1984），胡明扬《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1987），潘悟云《青田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小称音变》（1988），曹志耘《金华方言的句法特点》（1988），谢自立等《苏州方言里的语缀》（1989），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词与“可VP”问句》（1991），谢自立、刘丹青《苏州方言变形形容词研究》（1995）等等。1996年香港出版的《动词的体》（东南方言比较研究论文集第二辑）收录的论文比较全面讨论了吴语地点方言动词体貌，这些地点是：温州、金华(汤溪)、绍兴、杭州、苏州。1996年出版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收录了讨论海盐、苏州、温州方言体貌特点的论文。1997年出版的《动词谓语句》(暨南大学出版社，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收录了讨论苏州、高淳、金华(汤溪)、温州等吴语跟动词有关的各种句式。关于吴语历史的论文有李新魁《吴语的形成和发展》(1987)，鲍明炜《六朝金陵吴语辨》(1988)，张光宇《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1994)。讨论吴语与闽语关系的重要论文有丁邦新的《吴语中的闽语成分》(1988)，张光宇《吴闽方言关系试论》(1993)，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1994)等。从1979年以来，海内外学者举办过若干次有关吴语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促进了海内外研究吴语的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吴语研究的进步。

参考文献

丁邦新：《吴语声调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本，1984。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4。

李荣：《温岭方言语音分析》，北京：《中国语文》，1966.1。

张琨：《论吴语方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本，1985。

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北京：《清华学报》，3卷2期，1926。

（李小凡、谢留文）

湘方言研究（Xiang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湘方言也称湘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的湘水、资水、沅水流域以及广西的全州、兴安、灌阳和资源。湘语的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今音不论清浊，也不论平仄，均为不送气音。大致地说，北部今读清音，南部今读浊音，西部今平声读浊音，仄声读清音。

早期研究湘语的论著有杨树达的《长沙方言考》，分别载于《民铎杂志》（6卷5期，1925）、《太平洋》（4卷4期，1932）、《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赵元任、黎锦熙的《长沙方音字母》（1936）等。1935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湖南全省方言做过一次大面积的调查，记录了75个县的语音。这些调查成果后来由杨时逢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年在台湾公开发表。这部著作把75个县的方言按语音特点分为五个区，其中的第一、二区和第三区的一部分大致属于今天湘语的范围。1956年在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中，湖南的语言工作者对全省方言作了一次初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湖南省内方言可以分为三个区，其中的第一区包括湘水、资水流域和沅水中游少数县份共35个县（市）属湘方言。1960年，袁家骅等在《汉语方言概要》中根据浊声母的有无将湘语分为新老两派或两层：老湘语保留浊声母，新湘语无浊声母。此后，日本学者辻伸久《湖南诸方言的分类和分布——以全浊声母的变化为基础的初步试验》（1979），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也用不同的方法将湖南方言包括湘语作了分区，其中将湘语分为两片，结论大体相同。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根据古全浊声母今音将湘语分为三片：地处湘北的长益片今读清音，湘南桂北的娄邵片今读浊音，湘西的吉溆片今平声读浊音，仄声读清音。吴启主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将吉溆片改称辰溆片，分布区域也有所缩小。可以说，对湘语的认识是随着语言工作者对湖南省内汉语方言的逐步认识而逐步深入的。

50年代湘方言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湘语的论文、专著和论文集，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杨时逢《湖南方言声调分布》（1957），《长沙音系》（1956），向熹《湖南双峰县方言》（1960），唐作藩《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1960），陈浦清《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1981），张大旗《长沙话"得"字研究》（1985），鲍厚星、颜森《湖南方言的分区》（1986），张琨《湘鄂赣方言中的一些特殊音韵演变》（1979）；专著有李永明《衡阳方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长沙方言词典》（1993）、辻伸久《湖南省南部中国语方言语汇集》（1987），中岛幹起《湘方言调查报告》（上、下）（1987、1990），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和《湖南方言的介词》（1998）等等。

参考文献

鲍厚星、颜森：《湖南方言的分区》，北京：《方言》，1986.4。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六十六，1974。

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北京：《方言》，1985.4。

（谢留文、李小凡）

赣方言研究（Gan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赣方言也称赣语，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

游和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地区。湘东、鄂东南、皖南、闽西北、湘西南也有赣语分布。赣方言的研究始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5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李方桂、杨时逢对江西方言进行了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后来由杨时逢在台湾陆续整理发表，主要有《南昌音系》(1969)、《江西方言声调的调类》(1971)、《江西方言的内部分歧现象》(1982)等。1940年罗常培出版《临川音系》对临川方言的语音系统作了较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外，还讨论了临川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关系，认为它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第一次讨论了赣语和客家方言之间关系。这一时期研究赣语的论文还有严学窘的《分宜方言述略》(1943)、张为纲的《南昌话的声调变化和实验研究》(1943)、《泰和透定二母的两种特别变化之研究》(1943)等。1975年台湾余直夫出版专著《奉新音系》(1975)。

从70年代末开始，赣语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熊正辉的《南昌方言里的声调及其演变》(1979)首次论述了今声母送气与否影响调类分化这一语音现象，《南昌方言里曾摄三等读如一等的字》(1982)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亦有参考价值。颜森的《江西方言的分区(稿)》(1986)在对江西全省方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为江西方言分区分片，介绍了各片的语音特点，使人们对江西省的汉语方言面貌以及与周围省份方言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台湾何大安的《论赣方言》(1987)从方言和历史音韵角度出发，讨论原始赣方言的特点、赣方言和客方言的关系、赣方言的音韵发展及内部差异。法国沙加尔(L.Sagart)的《On Gan－Hakka(赣－客家方言)》(1998)从方言和历史移民的角度讨论赣、客方言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赣方言的专书和方言志，比较重要的有：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1991)是一部赣方言通论性质的著作，书中还收录了几个重要赣方言的同音字汇和词汇对照。颜森的《黎川方言研究》(1993)对黎川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详细的描写。熊正辉的《南昌方言词典》(1995)、颜森的《黎川方言词典》(1995)为进一步研究赣方言提供了丰富的词汇材料。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对湖北大冶赣方言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

一般认为赣方言最主要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逢今塞音塞擦音，一律读送气清音。赣方言的这个特点也是客家方言的重要特点。赣、客方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方言学界引人注目的问题。目前对赣方言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还有赖于今后更加全面深人的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

罗常培：《临川音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第一版。

何大安：《论赣方言》，台湾：《汉学研究》，1978.1。

(项梦冰、谢留文)

粤方言研究 (Yue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粤方言也叫粤语，主要分布在我国广东壮族自治区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广西省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海外华侨和华裔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也很多。粤方言最主要的特点，以广州话为例，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逢阳平阳上送气，逢阳去阳

入不送气。

粤方言的研究开始较早，成果相当丰富。1892年清代著名音韵学家陈澧就写有《广州音说》（《东塾集》27～29页），对自己的家乡话广州方言的语音特征有过细致的描述。从本世纪二3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王力《两粤音说》（英文，1928），岑麒祥《粤语发音实验录》、《广州音系概述》（1946），赵元任《粤语入门》（1947）、《中山方言》（1948）等，黄锡凌《粤音韵汇》（1941）是第一部用国际音标记录、研究广州方音的著作。所收的字按广州音韵母、声母、声调的次序排列，一字多音的都加注解，变调、读书音、口语音、今读、旧读以及少数冷僻字也分别加以注释。其中的《广州标准音之研究》一章详细讨论了广州方言语音的有关问题，揭示语音变化的规律，对声调的复杂变化分析尤有见地。本书曾重印多次，对粤方言语音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五六十年代，粤语研究不仅研究语音的文章增多，还陆续出现了研究词汇和语法的文章，比较重要的论著有：赵元任《台山语料》（1951），黄家教《广州话无介音说》（1964），桥本万太郎《粤语的侧面摩擦音》（1961），黄伯荣《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1958）、《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1959）、《广东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1959）、《阳江话的几种句式》（1966），詹伯慧《粤方言中的虚词"亲、翻、住、埋、添"》（1958）等。七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陆续出现了一批调查研究粤方言有分量的专著，例如余蔼芹《粤方言研究》（1972），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1972），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1980），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饶秉才《广州音字典》（1983），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分字音对照、词汇对照、综述三卷，1987、1988、1990）等。这些著作涉及粤方言调查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其中《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汇集了珠江三角洲31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材料，对全面认识珠江三角洲方言的面貌，全面认识和研究粤方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95年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出版《广州方言研究》，这部书对广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从1987年开始，先后召开了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对粤方言的调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黄锡凌：《粤音韵汇》，上海：中华书局，1941，第一版。

赵元任：《中山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本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字音对照卷，1987第一版；词汇对照卷，1988第一版；综述卷，1990第一版。

（项梦冰、谢留文）

客家方言研究（Kejia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客话、客语，分布于我国的8个省区（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台湾省、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200多个县市。其中以广东省东部、中部地区，福建省西部地区，江西省南部地区的客家人分布最为集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客家人分布。

客家方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朝中叶。清嘉庆初年黄钊所著的《石窟一徵》特辟二

卷叙录客家方言。光绪二十四年温仲和编的《嘉应州志》卷七"方言"也对客家方言有所叙录。光绪三十三年杨恭桓撰《客话本字》，正文包括《客话双字》、《客话叠字》、《客话单字》、《客话补遗》、《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5篇，收"多向所疑上谈有音无字者，共1400余字"，包括单音字、双音字和多音字，先列所谓本字，后引用古籍以作考证。民国初年罗翙云撰《客方言》，全书分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室、释饮食、释服用、释天、释地、释草木、释虫鱼、释鸟兽共12篇，材料丰富，可说是集前二书的大成。此外，章太炎的《新方言》后附有《岭外三州语》，主要是根据温、杨二书里的一些方言材料略加疏补而成。早期这些著作以考释词语为主，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方言和文献资料，但由于受传统语文的局限，考释也有穿凿附会之处。

现代意义上的客家方言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1933年朱希祖、曾运乾发表《审查客方言报告书》。1933年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书中第四章"客家的语言"对兴宁方言音系进行了初步描写。这部书至今还是有关客家研究的权威之作。1935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李方桂、杨时逢对江西方言进行调查，其中很多是江西南部的客家方言。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论著是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这篇论著分前言、标音说明、记音正文和语汇4个部分，其中音系和语汇都是根据记音正文中的成篇语料归纳出来的，跟通行的做法不同。董氏意在尝试一种丢开汉字、成段记录"真的语言"、再进行归纳的方言调查研究方法。从五六十年代至90年代，客家方言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海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成果，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附录，《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1950)，该文利用客家族谱和历史文献材料来讨论历史上客赣方言之间的关系；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台湾美浓客家方言》(1971) 则是对台湾桃园和美浓两地客家方言的详细报告；沙加尔 (Laurent Sagart)《粉岭崇谦堂客家话语音系统》(法文，1982)，记录了香港新界粉岭一个叫崇谦堂的小村的客家方言，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 记录了客赣方言20多个方言的语音和常用词汇材料，并对客、赣方言语音、词汇的异同作了初步比较；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1997) 是第一部对单点客家方言的语法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从70年代末开始，黄雪贞在《方言》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客家方言的论文，如《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1987)、《梅县方言的语音特点》(1992) 等。许多地方成立了研究客家问题的机构和学术团体，出版了一些客家研究刊物和书籍，1993、1995、1998年还先后举办了三次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所有这些对客家方言的研究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客家方言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所有已知客家方言都有的而其他方言都没有的一个特点是有些古次浊上声字今读阴平，古次浊上声与古全浊上声今都读阴平的，才是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点。颜森《客家话的三个标准》(1998) 提出鉴别客家话的三条标准：一是客家人自我意识的标准，即看该言语社团是否认为自己是客家人，自己说的是客家话，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条标准；二是词汇上的标准，如赣语说"吃""是"，客家方言说"食""係"；三是语音的标准，主要看古次浊上字是否有今读阴平的现象。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

的分合问题》（1998）则认为：客家方言古次浊上、古全浊上字归阴平并非本质特点，靠它来跟赣语相区别，至少就方言一级来说，还是不够的；客家方言似乎主要是和客家人，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也许并不能看作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方言。

总起来说，客家方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闽粤吴等方言的研究相比，还是很不充分的，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如客家方言的形成问题，客家方言的特点以及同赣语、闽语、粤语的关系问题等等，还远远没有到了可以说解决的程度，还有一些客家方言至今没有进行调查。

参考文献

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本，1948。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第一版。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兴宁希山书藏，1933第一版。

（项梦冰、谢留文）

闽方言研究（Min Dialect in Chinese，Studies of）

闽方言也称闽语，主要分布在福建省（西南部除外）、台湾省、海南省以及广东省东部沿海地带和雷州半岛，广西浔江两岸也有分布。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区也有一些零散的闽方言居民点。闽方言最主要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塞音塞擦音多数字不送气，少数字送气。闽方言内部差异较大，《中国语言地图集》把闽方言分成闽南、闽东、闽北、闽中、莆仙、琼文、邵将等七个区。

闽方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期研究闽方言的论著比较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主要研究厦门方言的语音。书中声母表的排列，古今语音的对应，文白异读的分析，连读变调的描写以及活的语音材料的记录，是以后的方言工作者的重要参考。另一种是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0），研究福州方言语音，讨论了福州方言的声母类化规律和连读变调规律，对福州方言语音变化特点作了科学的归纳，对后来闽方言研究尤其是闽东方言研究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语音，对词汇语法还没有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六十年代，闽方言研究除语音外也涉及词汇语法方面。有大量的相关论文发表。比较重要的有董同龢的《厦门方言的音韵》（1957）、《四个闽南方言》（1959），詹伯慧的《潮州方言》（1958），李如龙的《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1962）以及潘茂鼎、李如龙、梁玉璋、张盛裕、陈章太的《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1963）等。70年代以来，闽方言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如梅祖麟、罗杰瑞《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母字》（1971年），张贤豹《海口方言》（1976），陈章太、李如龙《论闽方言的一致性》（1982）、《论闽方言内部的重要差异》（1983），李如龙《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S的研究》（1983）、丁邦新《儋州方言》（1980）、《闽语白话音分支时代考》（1983）、黄典诚《闽语的特征》（1984）、张琨《论比较闽方言》（1984）、平田昌司《闽北方言"第九调"的性质》（1988）、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1994）等等。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在闽方言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发表了Tonal development in Min（1973）、The Initials of Proto－Min（1974）、《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1979）、《闽北方言

的第二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1986)等重要论文。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张振兴《台湾闽南话记略》(1983)、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1991)、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集》(1996)、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1996)、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1998)。

闽方言是汉语诸方言中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方言之一，尤其是有关闽南方言的研究成果最多。国际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至1997年已经先后举行了五届，促进了海内外闽方言研究者的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张振兴：《闽语的分区（稿）》，北京：《方言》1985.3。

黄典诚：《闽语的特征》，北京：《方言》1984.3。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王福堂、谢留文）

晋语研究 (Jin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定的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根据有入声这条标准把它和周围的官话分开。晋语分布在山西省（东南部属中原官话），河北省西部邻近山西的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其中孟县属中原官话），黄河以南的个别地点（三门峡市和灵宝县、陕县），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黄河以东地区以及陕西省的北部地区。

把晋语从官话中独立出来的主张，是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一文中提出，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这是近十几年来的一项重要的汉语研究工作。

本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对山西方言进行过调查，其成果反映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1941年刘文炳发表《入声研究与太原盆地人之读入声》。五六十年代，在方言普查的基础上编写成的《山西方言概况》（语音部分，初稿油印本，1961），根据入声的有无和入声是否分阴阳把山西方言分为四区，为后来山西方言以及晋语的分区提供了参考。

对山西方言进行普遍而深入的研究始于80年代。较重要的论文有徐通锵的《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1词”》(1981)、潘家懿的《晋中祁县方言的[m]尾》(1982)、田希诚的《山西和顺方言的子变韵母》(1986)和王洪君的《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1987)等。从1983年开始，山西的方言工作者以县（市）为方言点进行调查，陆续出版了36种方言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省方言志的编写，1993年以《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主编）为名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总论山西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讨论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和历史音韵，并附有山西方言地图50幅。下卷讨论山西方言的分区及各区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列举各方言点音系，并附有山西方言分区地图31幅。该书内容丰富，安排适当，反映了山西方言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研究晋语的重要著作还有贺巍的《获嘉方言研究》(1989)和侯精一的《晋语研究》(1989)。

学术界对晋语是否应当独立成一个与官话及闽语、粤语、吴语等平行的大方言有不同意见。支持晋语独立的学者把晋语的主要特点归纳为有入声，收喉塞尾[ʔ]，部分古崇母平声字今读擦音，鼻音韵尾合流消失，有文白异读和变读现象等九个方面（见温端政《试论晋语的特点和归属》，1997）。不同

意晋语独立的学者认为，晋语的这些特点在官话中并不具备排他性，晋语的独特只是同一系统内部层级关系的不同，而非不同系统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晋语与其他官话方言并无本质的区别，宜放在同一个官话方言之中（见梁金荣、高然、钟奇《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兼论晋语的归属》）。关于晋语的归属问题，还将继续讨论。

参考文献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北京：《方言》，1985.1。

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北京：《方言》，1986.4。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王福堂、谢留文）

汉语方言普查（General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50年代中期，随着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大语文政策的深入贯彻，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迫切需要对全国的汉语方言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1956年3月，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下达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随后中央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有关的领导机构，制订了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计划和步骤。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全国汉语方言的语音情况。为此，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方言调查表格》修订，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1955），还编制了《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方言调查简表》（1956）、《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1958）等，出版了李荣为语音训练班编写的教材《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程，培养学生调查方言的知识和能力。这些都为方言普查做了人力上和业务上的准备。

从1956年起，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汉语方言地区全面展开。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以一个市、县为一个点，共完成了全国各地2298个方言点中的1849个点的普查工作，普查面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在普查基础上，先后编写出近1200种调查报告，300余种学普通话手册，20种各省区的方言概况（计有河北、山东、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后来公开出版的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安徽方言概况》（1962）等四种，学话手册70余种。其中《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质量较高，是反映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性著作。

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增加了人们对汉语方言的全面认识。经过方言普查，人们把汉语分为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七个方言。方言普查还培养了大量具有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方言学界的中坚力量。这次方言普查由于点多面广，人力有限，不可能深入，也没有时间过细审订，此外调查人员水平不一，调查成果水平难免参差不齐。不过总的说来，这次方言普查对于我国以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谢留文、王福堂）

现代汉字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现代汉字指的是现代汉语用字。以现代汉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叫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现代汉字的属性和应用，以促进现代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促进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

用汉字记录的汉语有两类，一类是古代汉语，一类是现代汉语。它们的书面语，分别是文言文和白话文。记录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用的字有许多不同。从现代的立场出发，我们把古代汉语专用字，叫做文言古语用字；把古今通用的字和现代汉语专用字，叫做现代文字。“佾坫圄兕盍衽觚窬筵醯”(都见《论语》)，是文言古语用字；“大反割劳博善喜喻富报寒尊”是古今通用的字，“啤叼掰橱耪甩礅踮乒瓶氰”是现代汉语专用字：后两部分合起来就是现代汉字。把全部汉字分为文言古语用字和现代汉字分别加以研究，是汉字研究的重要发展。

自20世纪初年，随着现代汉语的逐渐形成，现代汉字的研究也开始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简化和整理，其间无不伴随着现代汉字的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汉字的研究。1980年周有光发表了《现代汉字学发凡》明确提出建立现代汉字学的主张。自那时到现在，现代汉字学得到了众多的语言学者的认可，在社会上逐渐站稳了脚跟。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现代汉字研究的通论性著作有：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合著《现代汉字学》(1993)，苏培成著《现代汉字学纲要》(1994)，尹彬庸、John S.Rohsenow(罗圣豪)合著《现代汉字》(英文本，1994)，李禄兴著《现代汉字学要略》(1998)。

现代汉字一共有多少，可以根据统计学的原理，搜集相当数量的白话文著作作为样本进行字频统计，然后把其中的文言古语用字和现代方言用字清除出去，得到的就是现代汉字。现有的字频统计得到的字种数是：《语体文应用字汇》(1928)4261字，《汉字频度表》(1977年)6374字，《汉字频率表》(1986)4574字，《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1992)7754字。把上述字种数加以汇总，去掉重复，去掉文言古语用字和现代方言用字，最后得到的现代汉字，估计接近一万字。这就是现代汉字总字数。

汉字可以分为两类，就是储备状态的字和使用状态的字。储备状态的字是静态的字，指字典里的字；使用状态的字是动态的字，指出现在文章里的字。字频统计的对象是使用状态的字。在字典里每个字构成一个条目，地位是相等的；文章里的字，出现频率不同，有的甚至非常悬殊。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汉字频率表》，“的”出现75306次，频率为4.16489%，而“乾、蔷、薇”等400多字，每个字只出现一次，频率均为0.00011%。按照降频排列，前100个字的累计频率是47.33584%；前2418字的累计频率是99.00023%。

由于每次字频统计所用的语料和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得出的结果也有差异。周有光对各家统计的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抽象出汉字出现频度不平衡规律，也叫汉字效用递减率(《中国语文纵横谈》第156页)：

字种数		增加字数		合计字数	覆盖率	欠缺率
1000				1000	90.000%	10.000%
1000	+	1400	=	2400	99.000%	1.000%
2400	+	1400	=	3800	99.900%	0.100%
3800	+	1400	=	5200	99.990%	0.010%
5200	+	1400	=	6600	99.999%	0.001%

这个规律可以表述为：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欠缺率是10%。以后每增加1400字，欠缺率减少9/10，只有原来的1/10。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知道：(1)常用字非常集中。字频统计中前2400字，覆盖率高达99%。(2)字频统计中序号在6600以后的字，不管有多少字种，总的覆盖率不超过0.001%。根据这个规律，可以实现现代汉字的分级定量：(1)最常用字，也就是小学用字，2400左右。(2)常用字，九年制义务教育用字，3800左右。(3)通用字，出版印刷用字，6600左右。

现代通用汉字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本世纪60年代以来，正式公布的现代通用汉字表有四个：(1)《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收6196字。(2)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1980)收6763字。(3)《标准电码本(修订本)》(1981)收7080字。(4)《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收7000字，其中包括3500个常用字。

现代通用汉字表所收的首先应该是现代汉字。它一方面要排除文言古语用字，另一方面又要排除现代方言用字。其次，通用字又是和罕用字相对待的，它要排除罕用字。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有400多个文言古语用字，如“嗌犴夔邶陴狴鞲”；还有少数方言字，如“俺夼浜爿垡凼”；还有一些罕用字，如“砗莩炅”。这些字都应该去掉，通用汉字的字数还可以减少。

现代汉字字形研究包括字形分解的研究以及构字法的研究，目的是要实现汉字的定形。传统的分析汉字字形的理论是“六书”说，但是它不完全适用于分析现代汉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分解现代汉字字形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叫做部件分析法。它把汉字分为三级：笔画，部件，整字。笔画是汉字构形的基本单位，任何汉字分析到最后得到的都是笔画。部件是汉字的构字单位，它介于笔画和整字之间。整字是汉字的使用单位，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由一个基础部件构成的是独体字，如“人九东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础部件构成的是合体字，如“体合固居”。由整字逐层分解。例如，“想”是上下结构，第一层分为相和心，第二层把相分为木和目，这样就得到了心木目三个基础部件。再把这三个基础部件分解为笔画：心有四画，木有四画，目有五画。

50年代初期，汉字字形存在着混乱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汉字进行了整理，包括整理异体字和整理印刷铅字字形。

狭义的异体字指的是音义相同而形不同的一组字。整理异体字有两种方式，就是分化和取舍。分化就是使异体字的音义产生分别，不再构成异体字。例如《集韵·梗韵》：“磺，或作礦。”可见磺和礦是异体字，后来磺、礦发生了分化。现在磺读 huáng，指硫磺；礦读 kuàng，简化为矿，指矿物、矿藏。取舍就是在一组异体字做出选择，确定一个为规范字，其余为不规范字，加以淘汰。取舍又有不同的类型：取音符表音准确的，如取“裤”舍“袴”，取“痱”舍“疿”；取意符表意准确的，如取“炮”舍“砲礮”、取“襪(袜)”舍“韈韤”；取形声舍会意，如取“膻”舍“羴”、取“奸”舍“姦”；取简舍繁，如取“腮”舍“顋”，取“牦”舍“氂犛”。

195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该表收异体字810组，共1865字。经过整理，保留810字为规范字，淘汰了1055字。在这之后，在淘汰的异体字中又有28字恢复为规范字。

50年代印刷铅字的字形存在着不统一

的问题，手写楷体和印刷宋体有细微差别，如：俞兪、平平。同是印刷体，宋体自身、宋体和其他字体间也存在一些差别，如：言言、争爭，因此有必要对印刷铅字的字形进行整理。1962年3月文化部成立汉字字形整理组，整理印刷铅字字形。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于1964年5月编成《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这个字表收印刷通用宋体字6196个。按照从简从俗、便于学习和使用的原则，给每一个通用汉字规定了标准字形，包括字形结构、笔画数和笔顺。字形表规定的字形一直沿用到现在，它既是印刷用字的字形标准，也是写字教学的字形标准。人们习惯上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的字形叫做新字形，在这以前使用的铅字字形，叫做旧字形。

自古传承下来的汉字有许多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学习使用不便。五四时期兴起了简化字运动，要求承认民间流行的简体字的正字地位。1935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字，受到进步文化界的欢迎。但是由于上层保守势力的反对，这批简体字没有能够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人民政府决定推行简化汉字。1956年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包括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1964年2月，国务院批准扩大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的范围。根据这个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1964年《简化字总表》做了个别调整，共有简化字2235字，简化汉字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减少了笔画，同时也减少了字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当前在汉字简化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有些常用字笔画繁多，可是还没有简化。对这样的字应该设法简化，如“餐繁翻齷藏”。另一个是有个别简化字使用不便，容易混淆，要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对简化得不好的字，可以恢复繁体。

解决现代汉字应用中的字音问题主要是解决异读字的问题。异读字指的是一个字表示的意义相同时却存在着不同的读音。例如“阿谀”的“阿”，有人读ē，有人读ā；“卑鄙”的“鄙”，有人读bǐ，有人读bì。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1月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音委员会在1957年10月和1959年7月先后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正续两编；1962年12月又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三编。1963年把上述三个字表辑录在一起，编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作为异读词读音的依据。《初稿》自公布以来，受到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广泛重视，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初稿》中原审的一些词语的读音需要重新审定；同时，作为语音规范的标准，《初稿》也亟需定稿。因此，在1982年6月重建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委员会，对《初稿》进行修订。这次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订读音的改动，力求慎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产生了修订后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2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公布了这个审音表。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

均以这个审音表为准。《审音表》共审订异读词800多条，确定为“统读”的有586条。

在汉字应用的许多方面，如辞书条目的编排、人名地名的检索等，都需要有科学的字序。实现汉字的定序，就是让每个汉字在序列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而且是惟一的位置。字母文字中的单词，按照字母的顺序来定序，既简明又严密，非常简单。汉字不同于字母文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又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建立科学、合理的字序非常困难，因此字序的研究就成了现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方面。根据《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自1911年到1989年有关字序的论文就多达323篇。

1961年11月，由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了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审核各类查字法方案。1964年6月，工作组提出四种草案推荐给文化、教育和出版界试用。这四种草案是：《拼音字母查字法（草案）》、《部首查字法（草案）》、《四角号码查字法（草案）》和《笔形查字法（草案）》。

拼音字母查字法简称音序法，是按拼音字母顺序检查汉字的方法。《拼音字母查字法（草案）》规定声韵相同的字按照声调阴、阳、上、去、轻的顺序排列，声韵调相同的字按照起笔笔形横、直、撇、点、正折、反折的顺序排列，例如：芭捌八笆粑巴。经过30多年的实践，音序法已经成为查字法的主流。

部首查字法简称部首法。以《康熙字典》部首法为代表的传统部首法设214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设189部。《部首查字法（草案）》对传统的查字法做了改进，确定依据字形定部，设部首250个。《辞海》（1979）采用了这个部首法。1983年6月，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出版局联合召开了统一汉字查字法座谈会，成立统一部首查字法工作组。工作组采用依据字形定部、贯彻“以大包小”、“口径一致”的原则提出了《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设201部。部首法是重要的查字法。目前，在立部和归部上都存在着分歧，给使用带来了不便。当务之急是实现部首法的标准化。

四角号码查字法简称四角号码法，是1925年王云五发明的。在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在70年代以后，使用它来编排的辞书很少，使用的人也不多。

笔形查字法简称笔形法。《笔形查字法（草案）》是查字法整理组提出的新的查字法。这种方法是根据笔形确定阿拉伯数字代码，用代码排序。自公布以来，还没有见到用它来编排的辞书。

中文信息处理就是用电脑来处理汉语汉字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它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汉字信息处理。汉字信息处理要解决许多问题，第一个就是汉字输入。

字母文字进入计算机轻而易举，而汉字则困难重重。经过计算机科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汉字进入计算机有三条途径，就是语音识别，字形识别，键盘输入。在现阶段，主要是靠键盘输入。

键盘输入又有编码输入和拼音输入两种主要类型。自7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编码热，形成了万“码”奔腾的动人局面。编码输入是根据字形确定代码，又分部件码和笔画码，每一类又有许多种不同的设计。为了规范部件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汉字学家和信息工程学家共同研制汉字部件规范，于1987年12月1日发布《信息处理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

(GF3001－1997)，确定560个基础部件。为了规范笔画码有时要用到的笔顺信息，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于1997年4月7日联合公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

拼音输入是无编码输入，输入拼音由机器自动转换为汉字。现有的拼音输入都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

汉字交换码是用于计算机之间汉字信息交换的代码，在计算机网络时代，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的汉字交换码。经过信息工程学家和汉字学家合作开发，制定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由国家标准总局发布，《基本集》收汉字6763字。分为两级：第一级是常用字，有3755字，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第二级是次常用字，有3008字，按部首排列。每个汉字采用两个字节表示，每个字节为七位二进制位。代码表分94区，每个区有94位代码，表中任何一个图形符号的位置，用它所在的区号和位号来表示。例如，“啊”的区号是16，位号是01，它的区位号就是1601。

在这之后，国家标准总局于1987年3月27日发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二辅助集》收汉字7237字，《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四辅助集》收汉字7039字。1993年12月24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BG13000.1－93)，这个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IEC 10646.1－1993。《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收汉字20902字，俗称“大字符集”。

为了解决汉字存储和输出所需点阵标准，国家标准局发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15×16点阵（宋体）字模集及数据集》(GB5199－1985)，《信息交换用汉字24×24点阵（宋体）字模集及数据集》(GB5007－1986)，《信息交换用汉字32×32（宋体）字模集及数据集》(GB6345－1986)。这三个标准的发布及推广应用，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二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苏培成）

汉字结构研究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汉字的结构研究，要区分古汉字的结构研究和现代汉字的结构研究。古汉字指的是隶变以前的汉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现代汉字指的是现代汉语用字，它的印刷体是楷书，手写体多为行草。

中国古代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是“六书”，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应用这种理论分析了9353个小篆的构造，并阐明了字形和字义的关系。六书理论把汉字的构造方式分为六种，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后代很多学者认为，六书中只有前四书是造字的方法，后二书是用字的方法。六书理论是汉字构造的传统理论，影响深远。用它来研究古汉字的构造，基本适用。

现代汉字的字体是楷书。楷书里保留的古汉字的构形理据大大地削弱了，分析现代汉字构造的一种办法是仍旧采用六书的理论，尽量寻找小篆的构形理据。有的字尽管

形音义都发生了变化，只要从溯源上还能分辨它的构造类型，就仍按六书的理论加以分析。例如，楷书“日月”早已不像日月之形了，但是追溯它的古文字的字形，还认为它是象形字。楷书“上下”早已看不出如何指事了。但是根据溯源照样可以说明属于指事。《说文》对“武信”的解释比较勉强，现代学者就旁征博引，努力证实《说文》的解释，认为它确属会意。“江河”早已不读“工可”了，分析时要借助古今字音的变化，证明“江河”属于形声。有的字形变化太大，实在无法再用六书理论去分析，就认为发生了“讹变”，并且尽量指出它的变化途径。这样的分析其实不是对现代汉字字形的分析，而是对汉字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属于历史汉字学的范围。这种方法对识字教学有一定的帮助。

现代汉字学兴起后，特别是为了适应汉字编码的需要，出现了新的汉字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以部件为核心，叫做部件分析，认为汉字的构造有三个层次：整字、部件和笔画。

(1) 整字指的是一个个的方块汉字，是汉字的使用单位，分为为两类：由一个基础部件构成的字叫独体字，如“人为册夷重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构成的字叫合体字，如“作能要想国这”。

(2) 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是汉字的基本构字单位，介于整字和笔画之间，小于整字，大于笔画。最小的部件叫基础部件，基础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如“口二八木日人艹亻 彡饣”。基础部件可以是字，这样的部件叫成字部件，如“口八木日”；也可以不是字，只是构字成分，这样的部件叫不成字部件，如“艹亻 彡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础部件组合在一起成为部件组合，部件组合还可以组成更大的部件组合，如“相音古臬房差”。对部件组合可依层次进行分析。

(3) 笔画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书写时每一次由落笔到提笔间留下的痕迹就是一画。笔画的组合有三种类型，就是相离、相接和相交。①相离指的是笔画和笔画之间没有交点，但是有平行或内聚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构字单位，如“二三六八小刁讠忄”。②相接指的是笔画和笔画之间有接点。依据接点的位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笔画的头和另一个笔画的身相接，如“匕上工正乍丁刀乃”；另一类是一个笔画的头和另一个笔画的头相接，如“厂了口弓已几凸凹”。③相交指的是笔画交叉，如“十力七丈车册夷事”。

对部件组合进行分析时，先根据分隔沟把相离部分分开；其次，根据接点把相接的部分分开。部件拆分的下限是基础部件。相交的笔画组合就是基础部件，不能再分。不同层次上的部件，分别叫做第一级部件、第二级部件等等。例如：

翻 ┬ 番 ┬ 采
　 │　　└ 田
　 └ 羽 ┬ 习
　　　　└ 习

1997年1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信息处理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这个规范包括了对GB13000.1字符集里的20902个汉字进行拆分，得到的560个基础部件。

部件分析是单纯字形分析，不考虑字形和字音、字义的联系，不考虑构字的理据。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的汉字，适合汉字编码，也可以用于汉字教学。

部件分析也可以结合汉字的构字研究。对合体字进行拆分，得到的第一级部件叫做字符。字符根据它和整字的音义联系分为三

类：和整字在意义上有联系的是意符，和整字在读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和整字在意义和读音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例如，“柳”是树名，其中的“木”是意符，“卯”是记号；“铜”是金属名，其中的“钅”是意符，“同”是音符；“特”的意义是特殊、不平常，其中的“牛、寺”和它的音义都没有联系，所以是记号。我们可以用意符、音符和记号来说明现代汉字的构字类型。例如，“尘”是由意符“小”和“土”构成的，所以“尘”是会意字；“饭”是由意符“饣”和音符“反”构成的，所以“饭”是形声字；“江”里的“氵”是意符，“工”是记号，所以“江”是半意符半记号字；“球”里的“求”是音符，“王”是记号，所以“球”是半音符半记号字。这样建立起来的是现代汉字构字体系。

根据上述的理论，可见汉字构造的研究有两个角度，就是溯源的研究和现状的研究。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字不一致。一致的如“从、休、库、吠”，溯源的研究和现状的研究都是会意字；“袠、洲、枫、纨”，溯源的研究和现状的研究都是形声字。不一致的如“日、月、山、水”，溯源的研究是象形字，现状的研究是记号字；“江、河、柳、攀”，溯源的研究是形声字，现状的研究是半意符半记号字。

参考文献

张普：《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北京：《语文研究》，1984.1。

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北京：《语文建设》，1997.10。

苏培成：《汉字的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3。

（苏培成）

汉字整理和汉字规范研究（Regular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汉字源远流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社会交际会向汉字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社会发展也会给汉字提供一些新的条件，促使汉字的字量、字形、字音、字义发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变化。为了使汉字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胜任记录汉语的任务，人们要不定期地整理、规范汉字，使汉字保持“明”和“简”的辩证统一。

由于汉字具有结构复杂、异体众多和容易发生讹变等特点，历代政府对字形的整理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周礼·春官》提到的“外史”之官“掌达书名于四方”应该就是统一全国文字的一项措施。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异形，社会发展强烈要求统一文字，《管子·君臣上》就提出了“书同名”的愿望。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同文字”的工作。南北朝国家分裂，政局动荡，字形异常混乱。唐代十分重视正字工作，如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颁布的《开元文字音义》就对楷书字形的统一起了不小的作用。宋代以后，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和科举考试对文字写法要求的严格化，字形不断趋于稳定。进入本世纪以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跟新文化运动、汉字改革运动、普及教育紧密结合，意识更自觉，规模也更大。综观汉字发展的全过程，几乎历代都曾进行过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其差别仅在于规模的大小和意识上的自觉自发而已。目前，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整个民族进一步开发智力和培养人才的迫切要求、利用电脑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飞速发展和科教兴国的坚实步伐，把促进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促进语言

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作为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主要内容。

当前，字形整理和汉字规范工作的对象是现行汉字，其目标就是要逐步实现“字有定量、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字有定序”。

1. 现行汉字的定量　实现现行汉字的定量可以提高字典词典收字的科学性；可以帮助各级教育用字确定科学的数量和字种；可以促进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电脑化、自动化。汉字的字量向来没有准确的数字。记录现代汉语，大约至少需要六七千字，依据是：1965 年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录 6196 字，1981 年发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表·基本集》收录 6763 字，198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录 7000 字。据估计，掌握了 5200 个比较常用的汉字就能识读一般书刊用字的 99.99%。

为了实现现行汉字的定量，首先必须根据记录对象，区分古代汉语用字和现代汉语用字；再根据使用范围，区分现代汉语通用字和现代汉语专业用字；然后根据使用频率，区分现代汉语常用字和现代汉语罕用字。通过以上的区分、选择，就可以把现行汉字分成几个层次，科学地确定各个层次汉字的数量和具体的字种，进而制订出逐步完善的“现代汉语用字全表”。

2. 现行汉字的定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汉字的定形做了大量工作。如确定了规范的简化字形，整理淘汰了部分异体字形，等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又用了 10 来年时间进行印刷字形的整理、统一工作。在这以前，出版物上的字形混乱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字体、笔画、部件或者整字结构的不一致，造成一字异形甚至多形，既有印刷宋体与楷体的分歧，也有宋体内部的不一致，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5 年提出进行汉字印刷字模标准化工作，根据“从简、从俗”的原则，消除印刷宋体字形的不一致，并使印刷宋体向楷体靠拢。1956 年拟订了《标准字形方案（草案)》。1957 年拟出修订草案，改名为《汉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1959 年 12 月，文化部召开关于革新铅字字体座谈会，并委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组成汉字字形整理组。经过深入的研究、对比，对选取的 6000 多字的笔画形状、笔画数目、笔画顺序和结构方式作出规定，编成《通用汉字字形表（草案)》，向全国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经过多次修订，于 1964 年 5 月拟定《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 6196 个通用汉字规定了规范的印刷字形，包括笔画数目（如：印刷宋体字形的折笔，由原来的断笔改为连笔，作一笔处理，于是“牙”由五笔改为四笔、“印”由六笔改为五笔等）、笔画形状（如：把印刷宋体的长方点、斜方点、横点、竖点、撇点合并为侧点）、笔画顺序（如：“象”先写扁框，再写第六笔“撇”）和间架结构（如：“鼯”由原来的左下包围结构改为左右并列结构，“惑”由原来的上右包围结构改为上下结构)。1965 年 1 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经过多年的推行，基本上消除了出版物上字形混乱的现象。

3. 现行汉字的定音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表音功能原本就弱，再加上古音、异读音、读书音、口语音以及方言读音的存在，加大了正确掌握汉字字音的难度。现行汉字的定音工作就是要减少汉字的异读，减轻学习和使用汉字的难度。1956 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表总表初稿》(1963)，审订了 1800 多个异读词的读音。

1985年又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并成为国家标准，以此作为普通话异读词读音、标音的依据。

4. 现行汉字的定序　字数的众多使汉字的科学排序显得分外重要。但汉字的复杂性和使用汉字人员的广泛性又决定了汉字的排序法不可能单一化。比如，普通话说得比较正确又掌握汉语拼音的人，使用音序法比较顺手；说不好普通话或是没掌握汉语拼音的人，使用部首法、笔画笔形法或四角号码法比较方便；小型字典，按音序排列字头比较适用；大型字典，生僻字多，就不便按读音查字。1961年，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曾联合组成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审核各类查字法方案，并在1964年4月提出“拼音字母查字法”、“部首查字法”、“四角号码查字法”和“笔形查字法”四种草案，推荐给文化、教育和出版界试用，以促进汉字查字法趋向统一。1983年6月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五个单位组成工作组，拟订统一的部首排检法方案，并于同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发布了“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共立201个部首。

目前，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整个民族进一步开发智力和培养人才的迫切要求、利用电脑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飞速发展和科教兴国的坚实步伐，把促进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作为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主要内容。学习和使用汉字的现状，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工作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行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工作依然滞后。无论是汉字的字形整理，还是整个汉字规范工作都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陈原主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费锦昌）

文字改革和简化汉字（The Reform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文字改革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泛指各国的使文字有计划发展的工作，狭义的理解是特指我国的汉字改革。就我国的汉字改革而言，也有广狭二义。狭义只局限于汉字的有计划的发展。广义则指语文改革，过去叫语文运动。1958年以后才明确“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汉字始终是我国文字改革的一项首要任务，这主要是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跟日本不同，我国简化汉字的重点不是放在字数的精简上，而是放在笔画的简省上。虽然早在1955年12月就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但数量有限，问题不少，至今没有发布“第二批异体字整理表”。从50年代到70年代，工作的重点始终落在简化字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搜集简体字，于1951年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经过多次反复修订，于1954年底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发出联合通知，印发30万份“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全国征求意见。1955年7月，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9月，根

据全国征求意见的结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订出“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审订委员会审议。后来又经过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最后由国务院于1956年1月通过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并作出决定：“简化字应该在全国印刷物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古籍和其他有特殊原因的以外，原来的繁体字应该在印刷上停止使用。”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对于扩大类推简化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因而简化字的数量也有了相应的增加。根据这一规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分三个表，共收简化字2236个。1977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报纸上发表，在全国征求意见，其中第一表的简化字在出版物上试用。1978年4月和7月，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通知，在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试用第一表的简化字。但是，这个草案并未废止。这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复征求意见，并对草案进行了多次修订。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对要不要正式公布、使用这批新简化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考虑到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已经使用多年，但有些字至今仍不能被人们准确使用，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巩固；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多部规模巨大的工具书已经或即将出版；电子计算机的汉字库已采用固定掩膜体芯片存储，再增加新简化字，将会造成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批准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为了便利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1988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并对表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共收简化字2235个。

1985年底，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迅速发展，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定了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任务，并把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明确汉字规范化工作重在巩固简化汉字成果，提高全社会文字应用的规范化水平；大力开展信息处理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组织进行汉字输入输出技术中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评审和鉴定工作。

参考文献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费锦昌）

字量统计研究（Stat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字量研究是汉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研究成果直接关系到对汉字性质特点的认定，并将提高识字教学、字词典收

字、教材和读物的编写、汉字汉语的机械处理和计算机处理以及作家作品的风格研究等工作的科学性，从而为汉字发展的理论问题和汉字的应用问题提供有用的基础数据和参考数据，促使汉语汉字的研究趋向精密化。

汉字的数量主要包括汉字的总字数和当代的实际使用字数。这些数字以前只能凭估计。历代的总字数靠的是历代字书收字量的曲折反映。因为这些字书收字主要不是以当时的实际用字为依据，而是从古今文献中把不同的字（包括很多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字）尽可能收集来，收字数量比各个时代实际使用的字数要多。其中还包括很多异体字，当代实际使用的字数，以前也只能从印刷厂的用字数量和电报局的用字数量来近似地反映。比如北京新华字模厂1974年编印的“字目表”收了6805字，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六七十年代的“印刷字表”收了9353字，邮电部1974年编印的“标准电码表”收了9317字。由此估计，现代的实际使用字数约在6000到9000之间。

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就开始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汉字使用频率的统计工作。为了研究语文教学问题，他对语文课本以及通俗书刊的用字作了统计分析。从55万多字的资料中选定4261个不同的汉字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1928)。这次字频统计对推广应用白话文起了很大的作用。1929年，敖弘德继续这项研究工作，发表了《语体文应用字汇研究报告》，字种数改定为4329字。1930年，王文新又发表《小学分级字汇研究》，确定小学应识字量为3799字。后来还有庄泽宜、李智根等综合各家应用字汇，选编出基本字汇。1949年出版的艾伟著《汉字问题》还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了很多有关汉字的统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多次汉字频率的统计工作。主要的有：

1965年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所收6196字，是以当时全国几家有代表性的印刷厂所用的汉字铸字量为依据的，入选的字都是这几家印刷厂使用频率较高的字。

1974年8月，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和新华通讯社联名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请示研究”。由于启动时间是1974年8月，故称为“748工程”。首先开展的是汉字频度的统计研究工作，先后组织10多个印刷单位，抽调了30多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和印刷工人，还组织了几所中学约15000多名学生参加人工统计工作。从包括工业、农业、军事、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和卫生等约三亿多字的出版物中选出86本书、104本期刊和7075篇论文，合计21，657，039字，作为统计研究的语料。于1976年初步完成统计工作。1977年10月，以新华印刷厂的名义编印《汉字频度表》一书，实收6335字，供内部参考使用。1988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贝贵琴、张学涛汇编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可看成这次统计工作的一份总结性资料。

1979年11月至1985年7月，北京语言学院教学研究所通过大量语料的统计，按词语单位和汉字出现频率、使用度以及在各类语料中的发布情况，编纂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他们用人工和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统计的语料总字数为180万字，从词语应用的角度作了较大规模的计量研究，兼及汉字字频和组词能力的统计与分析。该词典的“汉字频度表”反映，180万字的语料共使用4574个不同的汉字，出现245次以上的前1000个高频汉字，累计字次为1，

650,016，累计覆盖率达91.25619%。这1000个汉字中，出现万次以上的字有21个，出现千次以上的字有382个。日常最常用的字累计覆盖率高达99.00023%。

进入80年代，又进行了几次规模更大的统计工作。

为了获取现行汉字的笔画、部件和结构方式等方面的数据，为汉字的整理、简化和汉字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武汉大学合作，利用电子计算机对16，339字的结构及其构成成分进行分析统计，统计结果共分九个表：(1) 汉字笔画数统计表。其中12画的字最多。(2) 汉字起笔统计表。五种基本笔画形状依起笔频度由高到低排列的顺序是：横、撇、点、竖、折。(3) 汉字基本笔画使用频度表。五种基本笔画形状使用频度的排列顺序是：横、竖、折、点、撇。(4) 汉字部件分级统计表。对所收字采用分级切分的办法，即从整字一直切分到下限大于笔画为止。统计出每级切分出的部件总数以及这些部件在该级的总出现次数。(5) 汉字部件分级频度表。将每一级的每一个部件都标出其出现次数、占该级部件总出现次数的百分比，以及该部件在包含此部件的汉字中所出现的结构部位。(6) 汉字部件总组字及分组组字表。(7) 汉字末级部件组字频度表。组字频度最高的部件是"口"。(8) 汉字结构方式频度表。(9) 多音字表。

由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工程系计算机理论教研室，根据"现代汉语词频统计"的选材内容，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字频统计。统计语料是从1977～1982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1.38亿材料中抽样1108万字进行统计的。成果为13个字频统计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字频统计表（使用频度高的前15个字依次为："的、一、是、在、不、了、有、和、人、这、中、大、为、上、国"），社会科学综合字频统计表，社会科学分科字频统计表（5个），自然科学综合字频统计表，自然科学分科字频统计表（5个）。这次统计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的字频统计中统计科别最多的一次。

参考文献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陈原主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费锦昌）

汉字输入研究（Inpu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汉字输入是指如何使汉字进入计算机。汉字进入计算机主要有三条途径：语音识别，汉字识别，键盘输入。(1) 语音识别是用口语语音输入，使计算机"听懂"语音信号。方法是先在计算机里贮存相当数量的汉字的声学模式，用它来匹配输入的语音信号加以识别。(2) 汉字识别是用光电扫描输入，使纸上的汉字信息转换成离散的电信号，让计算机"看懂"，并且对它加以识别。汉字识别包括印刷体汉字的识别和手写体汉字的识别。(3) 键盘输入是给汉字规定一种代码，使每一个汉字和特定的符号串对应。通过键盘输入代码，计算机接受了代码，并进行各种加工处理。前两种输入法是无键盘输入，在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主要的输入方法是键盘输入。

近20多年来，汉字的键盘输入经过了三个阶段：大键盘输入，编码输入，拼音输入。大键盘输入是整字输入。把印有几千个

汉字的字表做成汉字输入盘，使用时用特制的电笔对盘面的汉字进行点触，即可输入汉字。这种输入需要有专用的设备，输入速度不高，操作容易疲劳，已经很少使用。当前实际使用的是编码输入和拼音输入。

编码输入是形码输入，根据汉字字形特征给汉字编码，把汉字转换成字母或阿拉伯数字输入计算机。据统计，目前已设计出的汉字编码有六七百种，真正在市场上流通并且有了一定影响的输入软件不过一二十种。汉字的形码设计分为两大类，就是字根码（部件码）和笔画码。字根码是根据汉字的字根（部件）来编码。先要把汉字拆分为各种字根，然后把字根转换为代码，再把代码定义到键位上。击特定的字符键输入字根，从而输入汉字。由于字根拆分的原则不同、归组不同、定义的键位不同，字根码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设计。(2) 笔画码是根据汉字的笔画——主要是笔形——编码，把笔画定义到数字键或字母键上，然后根据笔顺来编码。

拼音输入是无编码输入。用户输入汉语拼音，机器自动转换成汉字。拼音输入有全拼输入和双拼输入两类，都是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设计的。拼音输入要解决汉字的同音字问题，早期的办法是人工挑选，后来采用“高频先见”、“用过提前”的设计提高了效率，又发展为以词为单位，或以句为单位输入，同音字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再成为拼音输入的障碍。

汉语拼音输入法应该是首选的中文输入法，因为汉语拼音是我国小学生必备的语文知识，凡是读过小学的，都应该掌握汉语拼音。其次，拼音输入是无编码输入，不需要专门的编码培训，易于普及。另外，拼音输入容易建立词的观念，这对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语句处理也十分有利。有人认为拼音输入没有编码输入的速度快，其实一般使用汉字输入的人不同于专业录入员，使用电脑写作是边想边打，并不需要每分钟输入上百字的高速度。汉语拼音输入也有局限性。对不认识的字和读错的字就无法输入，还不能掌握普通话的人也难于使用。因此，还要有几种编码方案作为补充使用的中文输入法。

汉字键盘输入法当前的发展方向已经不是再继续增加输入法的种类，而是要提高输入法的质量。输入法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看其智能化的程度与水平。汉字键盘输入法的智能化，就是赋予计算机一定数量的汉语汉字知识，这些知识将取代原来要人来记忆的编码知识，同时还可以提高输入的正确率。

参考文献

张普：《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文集》，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7。

（苏培成）

注音字母 (Sound - notating Alphabet)

中国政府公布的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字母。1913 年 2 月 15 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审定国音，共审定了 6500 多字。第二项是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字母方案，争持不下。最后采纳了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周树人等的提议，把会上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改名为“注音字母”予以通过。读音统一会闭会后，注音字母方案并没有立即公布。直到 1918 年五四运动前夕，在文学革命兴起、汉字改革呼声高涨的形势下，教育部才于 1918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公布。下面是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表：

声母二十四

ㄍ（见一）古外切，与浍同，今读若格，发音务促。

ㄎ（溪一）苦浩切，气欲舒出有所碍也，读若克。

ㄫ B（疑）五忽切，兀高而上平也，读若愕。

ㄐ（见二）居尢尤切，延蔓也，读若基。

ㄑ（溪二）本姑泫切，今苦泫切，古甽字，读若欺。

ㄬ（娘）鱼俭切，因崖为屋也，读若腻。

ㄉ（端）都劳切，即刀字，读若德。

ㄊ（透）他骨切，义同突，读若特。

ㄋ（泥）奴亥切，即乃字，读若讷。

ㄅ（帮）布交切，义同包，读若薄。

ㄆ（滂）普本切，小击也，读若泼。

ㄇ（明）莫狄切，复也，读若墨。

ㄈ（敷）府良切，受物之器，读若弗。

ㄪ（微）无贩切，同万，读若物。

ㄗ（精）子结切，古节字，读若资。

ㄘ（清）亲吉切，即七字，读若疵。

ㄙ（心）相姿切，古私字，读私。

ㄓ（照）真而切，即之字，读之。

ㄔ（穿）丑亦切，小步也，读若痴。

ㄕ（审）式之切，读尸。

ㄏ（晓一）呼旰切，山侧之可居者，读若黑。

ㄒ（晓二）胡雅切，古下字，读若希。

ㄌ（来）林直切，即力字，读若勒。

ㄖ（日）人质切，读若人。

介母三

ㄧ於悉切，数之始之，读若衣。

ㄨ疑古切，古五字，读若乌。

ㄩ丘鱼切，饭器也，读若迂。

韵母十二

ㄚ於加切，物之岐头，读若阿。

ㄛ呵本字，读若痾。

ㄝ羊者切，即也字，读若也。

ㄟ余之切，流也，读若危。

ㄞ古亥字，读若哀。

ㄠ於尧切，小也，读若傲，平声。

ㄡ于救切，读若讴。

ㄢ乎感切，嘾也，读若安。

ㄤ乌光切，跛曲胫也，读若昂。

ㄣ古隐字，读若恩。

ㄥ古肱字，读若哼。

ㄦ而邻切，同人，读若儿。

浊音符号　于字母右上角作［'］。

四声点法　于字母四角作点，如左图：

上　去

阳□入（阴平无符号）

平

注音字母公布后，陆续进行了若干项重要的修正。

(1) 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原声母沿用了守温36字母的次序，与发音原理不合，改定的次序是：ㄅㄆㄇㄈㄪ　ㄉㄊㄋㄌ　ㄍㄎㄫㄏ　ㄐㄑㄬㄒ　ㄓㄔㄕㄖ　ㄗㄘㄙ　ㄧㄨㄩ　ㄚㄛㄝ　ㄞㄟㄠㄡ　ㄢㄣ　ㄤㄥ　ㄦ。1928年国语统一筹备会重印注音字母单张时，把介母ㄧㄨㄩ移到ㄦ的后面。后来用注音字母编制的各种辞书索引就都取这个顺序。

(2) 增加ㄜ母。1919年5月22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审音委员会认为，ㄛ兼表［o］［ɤ］不便，议决在ㄛ上加一圆点成为新的字母，表示［ɤ］。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ㄛ上的小点与字母相连，成为ㄜ。

(3) ㄦ兼作声母。1920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决议：ㄦ母亦得用为声母，其位置在声母之末。凡译日本文ラ行，西文R母，概用ㄦ。

（4）北京音没有浊音万、广、兀，但为了便于拼写方音，在字母表中并不取消。

（5）标调方法改变。1922 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规定新的声调表示法：阴平无号，阳平为ˊ，上声为ˇ，去声为ˋ，入声为˙。

（6）名称改为注音符号。1930 年 4 月 2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4 月 29 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中云：“教育部前颁注音字母，……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

（7）补充帀母。1932 年 1 月教育部编订《国音常用字汇》特组会议决定：增加帀母，作为ㄓㄔㄕㄖㄗㄘㄙ七个声母单独成音节时的韵母。注音时不用，仅在说明音理时用。

注音字母有以下几个特点：

（1）字母采用笔画简单的汉字。注音字母采用笔画简单的汉字，是受了日本假名的影响，也是延续了切音字运动的传统。那时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传入的还不多，拉丁字母的影响还较小。

（2）把反切的双拼改为声介韵三拼。注音字母采用的声介韵三拼，是由反切到音素制的过渡形式，它突破了传统反切的双拼，但是它还没有能采用音素制，例如，“恩”本读en，“因”本读 in，而注音字母注“恩”为ㄣ，注“因”为ㄧㄣ。其实，ㄧㄣ不是 in，而是 ien。

（3）继承切音字的成果，成为代替反切、给汉字注音的工具。但是作用也只限于此，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字，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门外文谈》）

参考文献

黎锦熙著：《论注音字母》，《中国文字与语言》（中），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苏培成）

国语罗马字（National Language Romanization）

全称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是中国政府公布的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23 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大会，钱玄同在会上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认为“26 个罗马字母，现在已成为世界通用的字母”，主张在用注音字母的同时兼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的第二式”。大会于 8 月 29 日议决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可是由于时局动荡，委员会无法进行工作。后来，语言学家刘复发起由在京的音韵学家组成“数人会”，从事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研究。参加者除刘复外，还有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这五个人都是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从 1925 年 9 月至 1926 年 9 月，用了一年时间，开会 22 次，议定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国语统一筹备会于 9 月 14 日召开会议通过了这份文件，于 20 日函请教育部公布，到了在 1928 年 9 月，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下面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声母

ㄅ　ㄆ　ㄇ　ㄈ　万*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兀*　ㄏ

ㄐ　ㄑ　广*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ㄙ'*

〰〰〰〰〰

ㄧ ㄨ ㄩ

b p m f v*

d t n l

g k ng* h

j ch gn sh

j ch sh r

tz ts s z*

〰〰〰〰〰

y w y (u)

2. 韵母（基本形式）

开ㄖㄙ'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ㄨㄥ ㄦ

齐 ㄧ ㄧㄚ ㄧㄛ ㄧㄝ ㄧㄞ* ㄧㄠ ㄧㄡ ㄧㄢ ㄧㄣ ㄧㄤ ㄧㄥ ㄩㄥ

合 ㄨ ㄨㄚ ㄨㄛ ㄨㄞ ㄨㄟ ㄨㄢ ㄨㄣ ㄨㄤ ㄨㄥ

撮 ㄩ ㄩㄝ ㄩㄢ ㄩㄣ

开 y a o e ê* ai ei au ou an en ang eng ong el

齐 i ia io ie iai* iau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合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ueng

撮 iu iue iuan iun

（注一）表有 * 号者系今音不用或罕用之音。

（注二）声母ㄐ、ㄑ、ㄒ仅有齐撮，ㄓ、ㄔ、ㄕ仅有开合，故可同用 j，ch，sh 三母而不混，以避字形过于繁细。

（注三）ㄧ、ㄨ、ㄩ本兼声韵两用，故国语罗马字亦列 y，w，y（u）。在上去齐撮韵字别无声母时须将第一字母改为 y 或 w，如 -iee，-uay 独用时作 yee 也、way 外。但如改后形与他韵混或全无元音时则在第一字母前加 y 或 w，如 -eu，-uh 独用时作 yeu 雨、wuh 雾（非 yu，wh）。

（注四）注音字母对于“知、痴、诗、日、兹、此、四”等字未制韵母，今以 y 表之。

（注五）“东、送”与“翁、瓮”等不同韵，故ㄨㄥ分为开口 ong 与合口 ueng 两韵。ㄩㄥ韵近齐齿，故亦归第二排。

3. 声调

阴平（1）用“基本形式”，如 hua 花、shan 山。本式包括轻声、象声字、助词，如 ma 吗，aia 阿呀。

（2）但声母为 m、n、l、r 者加 h，如 mhau 猫，lha 拉。

阳平：（3）开口韵在元音后加 r，如 char 茶，torng 同，parng 旁。

（4）韵母第一字母为 i、u 者，改为 y、w，如 chyn 琴、hwang 黄、yuan 元；但 i、u 两字母为全韵时改为 yi、wu，如 pyi 皮、hwu 胡、wu 吴。

（5）声母为 m、n、l、r 者用“基本形式”，如 ren 人、min 民、lian 连。

上声：（6）单元音双写，如 chii 起、faan 反、eel 耳。

（7）复韵母首末字母为 i、u 者改为 e、o，如 jea 假、goan 管、sheu 许、hae 海、hao 好；但既改头则不再改尾，如 neau 鸟、goai 拐。

（8）ei，ou，ie，uo 四韵准上声第（6）条，如 meei 美、koou 口、jiee 解、guoo 果。

去声：（9）韵尾为 -i、-u、-n、-ng、-l，或 -（无）者各改为 -y、-w、-nn、-nq、-ll、或 -h、如 tzay 在、yaw 要、bann 半、jenq 正、ell 二、chih 器。

附记

1. 在官话区域内仅长江下流有短促之

入声。如欲表入声时可用 - q 韵尾，如 tieq 铁，loq 洛。

2. 罗马字母之 v、x 二母，不作拼国音用，惟重字可用 x 代之，如 pianpian（偏偏）可作 pianx；隔一字重者可用 v 代，如 kann i kann（看一看）可写作 kann i v；重二字者可作 vx，例如 feyshin feyshin（费心费心）可作 feyshin vx。

3. 南京、杭州、北平新旧都城皆富于卷舌韵。国音也可采用，其拼法原则如下：

（1）韵尾之 i、n 音省去，例如"孩儿"(hair - erl) 作 harl，扇儿（shann - erl）作 shall，味儿（wey - er）作 well。(2)（y），i，iu 三韵加 el；其余加 l，如丝儿（sy - erl）作 sel，今儿（jin - erl）作 jiel，鱼儿（yu - erl）作 yuel；明儿（ming - erl）作 mingl，后儿（how - erl）作 howl。

4. 根据国语罗马字原则可拼各地之方音。如江浙间有 bh，dh，gh，dj，dz 等浊母，如 bhu 蒲，如 dji 其，dzy 慈。西安有 bf，pf 等声母，如 bfang 庄，pfu 初。广州有 m，p，t，k 韵尾，如 sam 三，lap 立，tzit 节，hork 学。

5. 如用西文次第读字母名称时，须依照国音读之如下：

a b c d e f g, h i
ㄚ ㄅㄜ ㄙㄜ ㄉㄜ ㄜ ㄈㄜ ㄍㄜ ㄏㄜ ㄧ
j k l m n, o p q, r s
ㄓ ㄎㄜ ㄌㄜ ㄇㄜ ㄋㄜ ㄛ ㄆㄜ ㄎㄨ ㄖ ㄙ
t, u v w, x y z.
ㄊㄜ ㄨ ㄪㄜ ㄨㄜ ㄎㄙ ㄧㄜ ㄙ'

（以下有"单字音全表"，即音节表，从略）

国语罗马字是一个接近成熟的拼音方案，它的产生是汉语拼音史上的一次飞跃。国语罗马字制定中的以下四点经验，应该重视。

（1）采用国际通用的 26 个罗马字母。不用新字母，不用附加符号，从此，字母形式从汉字笔画式转向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式，拉丁化成为汉字改革运动的主流。

（2）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字母和音素的配合，既要考虑到罗马字母在国际上的使用习惯，又要考虑到汉语的特点，例如，用 b，d，g 和 p，t，k 表示对应的不送气清塞音和送气清塞音。

（3）标写声调避免附加符号，改用字母标调，设计了完整的字母标调的拼法条例，但是比较烦琐，不易推行。

（4）注重词儿连写，规定了一些特殊的连写方式，提高了正词法技术。

国语罗马字公布后主要用作注音工具。1932 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注音。国语罗马字的传习主要在 30 年代，编纂出版了许多读物，但是它始终未能广泛推行。1940 年 10 月，民国政府把国语罗马字改名为"译音符号"，作为注音符号第二式。1984 年 5 月，台湾"教育部"宣布把"译音符号"改名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同时公布了经过修订的试用方案，开始试用。1986 年 1 月，又公布"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正式方案，正式使用。修订后的国语罗马字改字母标调为符号标调，和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接近。

（苏培成）

拉丁化新文字（Latinized new writing）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般简称为"新文字"。除了北方话方案外，还有若干种方言的方案，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是它的代表性方案，所以又简称为"北拉"。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汉语拼音

文字方案。它的一些特点被吸收到“汉语拼音方案”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了加速当时苏联远东地区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瞿秋白等在苏联汉学家的协助下拟订了中文拉丁化方案。在此基础上拟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于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它的语音标准接近“老国音”，区分尖团，但不标声调。方案通过以后就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中间传习。1933年介绍到国内。在1934年讨论提倡“大众语”时，被认为是书写大众语、普及群众科学文化知识的理想工具，很快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推行开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推行中心是上海、北平、广州、闽南等地，高潮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前后；抗日战争中，推行中心是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延安等地，高潮是1938年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实验和1940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推行中心是上海和香港，高潮是1947年民主运动前后。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推行中心在上海、广州、武汉、旅大等地，高潮是建国初期。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和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举行，标志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55年11月全国最后一个新文字团体——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宣布协会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结束协会工作。

（费锦昌）

汉语拼音方案（Chinese Phonetic System）

汉语拼音方案是使用拉丁字母、采用音素制音节结构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1958年2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成为拼写汉语的国家标准。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决议，确定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汉语拼音方案全文如下：

一　字母表

字母名称

Aa ㄚ	Bb ㄅㄝ	Cc ㄘㄝ	Dd ㄉㄝ	Ee ㄜ	Ff ㄝㄈ	Gg ㄍㄝ
Hh ㄏㄚ	Ii ㄧ	Jj ㄐㄧㄝ	Kk ㄎㄝ	Ll ㄝㄌ	Mm ㄝㄇ	Nn ㄋㄝ
Oo ㄛ	Pp ㄆㄝ	Qq ㄑㄧㄡ	Rr ㄚㄦ	Ss ㄝㄙ	Tt ㄊㄝ	
Uu ㄨ	Vv ㄪㄝ	Ww ㄨㄚ	Xx ㄒㄧ	Yy ㄧㄚ	Zz ㄗㄝ	

v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二　声母表

b ㄅ玻	p ㄆ坡	m ㄇ摸	f ㄈ佛	d ㄉ得	t ㄊ特	n ㄋ讷	l ㄌ勒
g ㄍ哥	k ㄎ科	h ㄏ喝		j ㄐ基	q ㄑ欺	x ㄒ希	
zh ㄓ知	ch ㄔ蚩	sh ㄕ诗	r ㄖ日	z ㄗ资	c ㄘ雌	s ㄙ思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zh ch sh可以省作ẑĉŝ。

三　韵母表

	i ㄧ　衣	u ㄨ　乌	ü ㄩ　迂
a ㄚ　啊	ia ㄧㄚ　呀	ua ㄨㄚ　蛙	
o ㄛ　喔		uo ㄨㄛ　窝	
e ㄜ　鹅	ie ㄧㄝ　耶		üe ㄩㄝ　约
ai ㄞ　哀		uai ㄨㄞ　歪	
ei ㄟ　欸		uei ㄨㄟ　威	
ao ㄠ　熬	iao ㄧㄠ　腰		
ou ㄡ　欧	iou ㄧㄡ　忧		

an ㄢ 安	ian ㄧㄢ 烟	uan ㄨㄢ 弯	üan ㄩㄢ 冤
en ㄣ 恩	in ㄧㄣ 因	uen ㄨㄣ 温	ün ㄩㄣ 晕
ang ㄤ 昂	iang ㄧㄤ 央	uang ㄨㄤ 汪	
eng ㄥ 亨的韵母	ing ㄧㄥ 英	ueng ㄨㄥ 翁	
ong （ㄨㄥ）轰的韵母	iong ㄩㄥ 雍		

（1）“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用 i。

（2）韵母儿写成 er，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 r。

（3）韵母ㄝ单用的时候写成 ê。

（4）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i（衣），ya（呀），ye（耶），yao（腰），you（忧），yan（烟），yin（因），yang（央），ying（英），yong（雍）。

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wu（乌），wa（蛙），wo（窝），wai（歪），wei（威），wan（弯），wen（温），wang（汪），weng（翁）。

ü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u（迂），yue（约），yuan（冤），yun（晕）。ü 上两点省略。

ü 行的韵母跟声母 j，q，x 拼的时候，写成 ju（居），qu（区），xu（虚），ü 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 l，n 拼的时候，仍然写成 lü（吕），nü（女）。

（5）iou，uei，uen 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 iu，ui，un，例如 niu（牛），gui（归），lun（论）。

（6）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ng 可以省作 ŋ。

四　声调符号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ˉ	ˊ	ˇ	ˋ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例如：

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吗 ma
（轻声）

五　隔音符号

a，o，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 pi'ao（皮袄）。

汉语拼音有广泛的用途，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拼写语言，另一类是技术应用。

（一）拼写语言，用于语文教学。

（1）给汉字注音。汉字本身没有完备的表音系统，从字形上看不出读音来，这给学习和使用带来许多不便。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最好工具。

（2）拼写普通话。学习普通话如果只靠口耳相传，效果较差。用汉语拼音编写学话读物，学习的人可以利用汉语拼音自学普通话。如果有老师传授，有了拼音就可以口耳眼手并用，提高学习效果。

（3）帮助识字。中国的语文教学，和拼音文字国家相比，学习汉字是首要的难题。有许多识字教学法，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中识字，特点是“先识字，后读书”。利用声旁，学一个带一串。另一种是注音识字，特点是“先读书，后识字”，利用拼音提前读写。这个办法解决了由于识字量不够，妨碍阅读和写作的困难，使儿童的智力得到开发。注音识字充分发挥了汉语拼音的作用。

（4）用于特殊语文教育。用汉语拼音来设计手指字母和盲文，供聋哑人和盲人使用。

（5）制定少数民族文字。中国有 56 个少数民族。有的民族有比较成熟的民族文字，有的民族虽然有民族文字，但是需要改进；有的民族原来没有文字，需要制定文

字。50年代以来，中国改进和创制了17种拉丁字母的民族新文字。为了便于交流，这些新创或改制的文字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在设计上尽量和汉语拼音取得一致。

（二）技术应用。在科技应用的许多方面，汉语拼音都有重要的作用。

（1）序列索引技术。汉字是一个无序系统，没有内在的序列。为了排列和检查的需要，人们设计了许多外加序列，使无序系统序列化。部首法、笔画法、四角号码法，都是形序法。汉字字形十分复杂，各种形序法规则繁复，而且无法避免二义性，难于掌握。古代韵书采用音序，但是因为没有字母，只得使用汉字，所以仍旧不便。有了汉语拼音，才有了真正的音序法。它的优点是字母反映自然语言，容易学，容易记，容易查，而且中外文顺序一致，中外文可以统一排列。目前，汉语拼音音序法正在成为序列法的主流。

（2）图书检索技术。图书检索以前大多用笔画法排列，使用不便。现在多数改为汉语拼音音序，不必考虑字形是繁体和简体，不必数笔画。有了电脑以后，出现了机读目录，可以实现图书馆网络化，汉语拼音是使中文图书资料进入图书检索网络的必备条件。

（3）人名地名拼写的标准化。用方块汉字书写的人名，不能直接进入国际社会，不能使用文字处理机械和信息处理设备。中国在80年代开始使用汉语拼音，实行人名拼写的标准化。1977年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通过中国的提议，决定以汉语拼音为拼写中国地名的标准。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通知，联合国文件中的中国地名和其他专名，一律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

（4）术语和代号的拼音化。科技发展，带动了术语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每年产生的新术语多达10万。中文翻译术语有三种方式：汉字意译、汉字音译、字母音译。例如LASER，汉字音译为莱塞，意译为激光，字母音译为laser。世界各国大都采用字母音译法，实现科技术语的国际化。为了便于国际科技交流，中国也应该逐步实行术语拼音化。为了方便过渡，可以采用拼音术语和汉字术语的“双文制”。字母代号使复杂的概念得到概括的表示，非语音的字母代号，如代数学用a，b，c代表已知数，用x，y，z代表未知数，用O，A，B，AB代表血型。语音的字母代号，有非汉语的字母代号，如H（氢），O（氧）。汉语的字母代号，如铁路系统P代表棚车，RW代表软卧。邮电地名，FJ（福建），JS（江苏）。工业代号，N代表农业机械，F代表纺织设备。

参考文献

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苏培成）

汉语拼音正词法（Chinese Pinyin Orthography）

正词法就是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话词语的规则。

正词法的核心是分词连写法。拼写普通话的时候，词和词之间要分开写，一个复音词内部的各个音节要连写，这就叫做“分词连写”。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在心中默默地分词。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别人听得懂。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别人听不懂，因为破坏了词的结构。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单

位，没有词的单位。但是在阅读时，要实行分词连读。用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话时，如果把音节作为书写单位，就不能反映语言的结构，不便于阅读，所以应该实行分词连写。

经验告诉我们，几个同样熟悉汉语拼音的人，把同一篇文章改写为汉语拼音，他们的分词连写有90%左右相同，可是有10%左右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有些语言结构的情况复杂，各人理解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汉语拼音正词法是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它提出了许多用汉字时感觉不到的问题，也存在许多矛盾，需要妥善解决。

（1）视觉和听觉的矛盾。由音节组成的“音节串”有长有短。听觉能接受较长的音节串，而视觉只能接受较短的音节串。视觉和听觉的矛盾，要服从视觉。常常要把一个听觉的音节串分成几个较短的视觉音节串，才便于阅读。试验证明，最适合阅读的长度是2~3个音节，也就是6~9个字母，这也是正词法最理想的长度。

（2）理论词和连写词的矛盾。理论词就是语法学中的词，连写词就是正词法里的词。后者要以前者为基础，两者基本一致，但是也要允许有若干不一致。例如“开会”，从理论说是两个词，可是正词法习惯要连写，才方便阅读。

（3）双音节化的矛盾。双音节化是汉语构词的重要规律，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况：①单音节和单音节相吸，“图书”要连写。②双音节和双音节相拒，“数学家”是由双音节和单音节组成的要连写，而“数学专家”是由两个双音节组成的，要分写。③一个单音节对另一个单音节相吸，对双音节相拒。“家里、分清”连写，“家里面、分清楚”要分写。④双音节和单音节组成的三音节结构，很容易失去一个音节，简缩为双音节。“电气”和“化”组成“电气化”，又简缩为“电化”；“飞机”和“场”组成“飞机场”，又简缩为“机场”。

（4）离合词的矛盾。离合词又名可分词，如“鞠躬、洗澡、作揖”。从语义看，每个离合词是个整体，应该连写；当中间插入了其他成分，被拆开时，就只能分写。有人建议加短横。如“鞠一个躬”写为 ju-yige-gong。

正词法除了分词连写法之外，还包括成语拼写法、外来词语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移行规则等。正词法要靠约定俗成，逐渐成为群众书写和阅读的习惯，一切矛盾都会解决。这是世界拼音文字的共同经验。

正词法以前也叫写法、拼写法、正写法、正字法、连写法、词类连书、分词连写法等。在切音字时期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1923年黎锦熙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讨论分词连书。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实行分词连写，积累了许多经验。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制订正词法规则本应该提上日程，可是受当时环境的影响没有能够实现。1982年3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着手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和各种专用规则。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讨论，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制定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于1984年10月发表。后来经过修改，成为《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7月1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后来提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编号是GB/T16159-1996，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年1月22日发布，1996年7月1日实施。

参考文献

《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选》编辑组编：《汉语拼

音正词法论文选》，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

（苏培成）

汉语修辞研究

（Chinese Rhetoric，Studies of）

修辞产生于人们为了更好地传情达意而对语言的运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意内容传达到对方，总是根据一定的现实需要，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运用的语文形式同所表达的情意内容能够完美统一，以求实现最佳的表达效果。这种运用语言传情达意的过程，就是修辞过程；发生和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语文表达现象，就是修辞现象。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一门学科，它以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求贯穿于修辞过程、制约修辞现象的修辞规律为研究任务。

中国的修辞研究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清末，有许多辉煌的成果，但是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汉语修辞研究独立成“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中国现代修辞学发轫于20世纪初，建立于30年代，经过逐步发展，于80～90年代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草创期　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草创时期。1905年汤振常所撰上海“南洋中学四年级国文讲本”《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所撰“中学文法教科书”《文字发凡·修辞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起步。汤著引进外国修辞理论（主要参考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来说明修辞学的定义、性质、范围等问题，并探讨篇章构造之法和论述“辞样”（即辞格）11种。所论虽较粗略，但它为中国现代修辞学提出了最早的学科概念。龙著全面模仿日本岛村抱月《新美辞学》的体系，把修辞现象分为“语彩”与“想彩”，又再分为“消极”与“积极”两类，并论及32种辞格。虽有生搬硬套之弊，但引进国外学说对当时修辞研究颇多推动。当时，修辞学科概念不甚明晰，常与文法学相混，如1908年刘金第《文法会通》甲编，实际上大部分论修辞；1913年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所撰“文法之大纲”，其实是修辞大纲。这时期的修辞研究从教学应用出发，引进外国修辞理论，与文法研究界域尚未划分明确。

建立期　“五四”运动以后至1932年是中国现代修辞学逐步建立时期。这一时期修辞论著约计十三、四种，可分为新旧两派。新派致力于引进欧美和日本修辞学，其中也有能适当注意汉语实际的。唐钺《修辞格》（1923）是其代表。唐著依照英国纳斯菲尔《高级英文作文法》的体系，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汉语辞格系统，标志着中国修辞学向现代化科学化方向迈进了一步。何爵三的论文《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1929）则明确提出了革新中国修辞学的理论见解和学科构想。其他如张弓《修辞学》（1926）和王易《修辞学通诠》（1930）等也都是新派中较有贡献者。旧派以中国古说作为修辞学的范本，来跟国外传入的修辞学相抗衡。郑奠《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北京大学20年代讲义，未公开出版，但流传甚广）是其代表。郑著依专题集录古说，并加“按语”提出自己见解，资料丰富而成系统，但并未论述修辞研究方法，而重在发掘传统。同时，也有力求糅合中外、兼融新旧的论著，如董鲁安《修辞学讲义》（1924，后更名《修辞学》）、薛祥绥《修辞学》（1931）、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1932）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的。而1932年陈

望道《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才真正结束了新旧两派的论争，实现了融合中外、贯通古今、创新理论、缔造体系的目标。陈著以语言为本位，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作出了科学阐述；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纲领；构建了以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为基点的修辞学体系；全面探讨了汉语文的修辞手法，完整地描写了汉语辞格系统。因此，《修辞学发凡》的刊行被公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发展期　自1932年《修辞学发凡》出版至1949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现代修辞学逐步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出版了20多种论著，开始了对汉语修辞的多方面的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郑业建《修辞学提要》(1932)和《修辞学》(1944)、徐梗生《修辞学教程》(1933)、章依萍《修辞学讲话》(1934)、曹冕《修辞学》(1934)、陈介白《新著修辞学》(1936)、夏宇众《修辞学大纲》(1947)等论著，其中陈著成就较大，在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方面具有新意。在单项研究方面，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1936)，是中国第一本探讨比喻和兴的专著，赵景深《修辞讲话》(1934)是辞格探源之作，都各有贡献。在白话文修辞研究方面，1935年出版的汪震《国语修辞学》和宋文翰《国语文修辞法》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白话文修辞问题。在实用修辞研究方面，郭步陶《实用修辞学》(1934)和田仲济《作文修辞讲话》(1947)等较有成绩。在文体风格研究方面，有宫廷璋《修辞学举例·风格篇》(1933)、施畸《中国文体论》(1933)和蒋伯潜、蒋祖怡《文体论纂要》(1942)等论著。其中宫著为中国第一本从语言角度较全面地论述风格的专著，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中风格研究迈出了新的一步。在社会修辞学研究方面，祝秀侠1937至1940年发表的《修辞之社会学的试探》、《各个社会中修辞现象》等颇具创见的系列论文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惜未有专著。在古汉语修辞研究方面，杨树达《中国修辞学》(1933，50年代重印，更名为《汉文文言修辞学》)、马叙伦《修辞九论》(1933)、张文治《古书修辞例》(1937)等论著对古汉语修辞作了深入研究，尤其是杨著在剔发汉语文修辞的民族特性方面颇有成就。

普及和深入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国现代修辞学逐步普及和不断深入的时期。这一时期现代汉语修辞学得到确立并向全社会普及，同时修辞研究也在多方面深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出版修辞论著达60种之多。其中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2)、张瓌一（志公）《修辞概要》(1953)和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等论著贡献与影响甚大。吕、朱所著立足于消极修辞，解决语言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且全书用语及语料全为现代汉语，所以广受欢迎。张瓌一所著由修辞理论、用词、造句、修饰（辞格）、篇章、风格等六部分构成体系，被认为是现代汉语修辞学全面确立的标志性著作。张弓所著则构建了一个修辞学的新体系，即由“语言三要素与修辞”、“修辞方式和寻常词语艺术化”、“语体与修辞”三大板块涵盖修辞学的整体内容，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了新的探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同时，这一时期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性质、功用、语体及其分类、修辞与语境等问题作了日益深入的探讨，甚至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陈望道、张志公、林裕文、张弓、周迟明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的研究也都有许多新进展、新成就：吕景先《修词学

习》(1958)对消极修辞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郑文贞、余纲《修辞格的客观基础》(1963)对辞格理论进行了创造性探讨；倪宝元、吴士文等人为创建新的辞格和对辞格的运用问题进行了很有成效的研究。另外，语言风格的研究也是这时期的一个热点，高名凯等学者对国外（主要是当时苏联）的语言风格研究作了引进和介绍，也开始结合汉语实际作出探讨，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1960)是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

停滞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修辞学的停滞时期。这一时期大陆的修辞研究可以说是完全归于沉寂，但在台湾地区出现修辞学渐兴的势头，有多本修辞著作刊行，其中黄永武《字句锻炼法》(1968；增订本，1986)和黄庆萱《修辞学》(1975)较有特色。

繁荣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修辞学在80年代和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修辞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修辞学的推广和普及成绩很大，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修辞读物，大学的修辞教学日益得到重视，编出教材不下10余种，其中倪宝元主编的《大学修辞》(1994)成就与影响较大。(2)为构建修辞学的新体系而努力探索，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1983)、《修辞学新论》(1993)和《修辞学通论》(1996)等论著，对修辞的深层机制和学科特性的阐析在理论上有创新，他提出的修辞学主要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观点，颇有影响；发展陈望道“零度修辞”思想而提出的“零度与偏离”的理论，对于修辞现象具有更强的阐释力；用新的方法研究和解析修辞格也颇为成功。吴士文《修辞语法学》(1985)、宗廷虎等《修辞新论》(1988)、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1989)、刘焕辉《修辞学纲要》(1991)、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等论著也都在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3)对于修辞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入，或是对修辞本体的性质，或是对修辞学科特性，或是对修辞研究方法的运用，或是对修辞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都常有讨论。童山东《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1991)、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1994)、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1995)等论著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4)拓展了学科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学科研究的内容。①口语修辞研究，这方面向来甚为薄弱，这一时期内发表了不少探讨口语修辞的文章和几本有关的论著，以夏中华《口语修辞学》(1993)的论述显得比较系统。②对同义选择和变异修辞的研究，这方面探讨的文章甚多，冯广艺《变异修辞学》(1992)较有特色。③修辞接受研究，从语言交际的全过程看，接受理解相当重要，这方面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谭学纯等著《接受修辞学》(1992)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汉语接受修辞的理论体系。④比较修辞研究，胡曙中《英汉修辞比较研究》(1993)对英汉修辞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指明了英汉修辞诸方面的差异，同时还对英汉修辞学的发展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这对于进一步开展汉语和其他语言的修辞比较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⑤文艺修辞研究，有骆小所《艺术语言学》(1992)、白春仁《文学修辞学》(1993)、郑颐寿等《文艺修辞学》(1993)、冯广艺等《文学语言学》(1994)等论著，其中郑著对文艺修辞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相当系统的阐述，很有特色。⑥篇章修辞研究，或者说是话语修辞研究。早些时候不少人认为修辞只研究到句子表达为止，现在形成了基本共识，修辞研究必须管到篇章。徐炳昌《篇章

的修辞》（1986）、郑文贞《篇章修辞学》（1991）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郑著对篇章修辞的基本理论作出了阐释，并初步建立了汉语篇章修辞学的理论框架。⑦作家作品修辞研究，这一时期相当发达，专著不下几十部。其中，倪宝元《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1992）成就较高。（5）至于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尤其是辞格研究，语体风格学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等方面也都有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均另有专条阐析，不再赘述。

趋向 20世纪汉语修辞研究发展相当快，成绩比较大。其发展趋向，将会是：（1）对修辞作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如可以从语用、心理、美学、文化、社会等方面来审察修辞现象；可以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观点来认识修辞活动，等等。这也就会开拓出修辞研究的诸多新领域。（2）注重修辞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这首先需要吸纳国外认知修辞学、行为主义修辞学、理解修辞学等理论，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的修辞思想。（3）逐步确立修辞学的方法论，提出修辞研究的特定方法；同时也要引进数学方法和采用有关的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加以更新。（4）注重从语言交际系统中作修辞的动态研究，那就是从交际实效出发来深化修辞对题旨情境适应规律的认识和修辞技巧的把握。（5）修辞应用研究的大发展，那就是充分注意社会生活不同领域里运用语言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特点，对各行各业如何应用修辞的问题作出研究，这将会受到社会的欢迎；同时，这也将有益于促进功能修辞学、语体风格学的发展。总之，根据中国现代社会语文生活的需要，从汉语的修辞实际出发，在汉语修辞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系统，这就是汉语修辞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宗廷虎、吴礼权：《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拾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陈光磊：《对汉语修辞学发展趋势的推想》，上海：《修辞学习》，1987.3。

（陈光磊）

汉语辞格研究（Figure of Speech in Chinese, Studies of）

“辞格”又称“修辞格”、“修辞方式”、“辞式”等，指积极修辞的各种特定的表达格式或模式，如比喻、借代、双关、顶真、夸张等。内容上的具体性、体验性和形式上对语言的形、音、义各种因素的利用，是辞格构成的基础。各种辞格的划界是相对的，在实际言语中常有交叉或融合。

唐钺《修辞格》（1923）提出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辞格系统，书中指出，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做修辞格（又称“语格”）。《修辞格》借鉴外国修辞学，特别是以英国纳斯菲《高级英文作文法》为蓝本，归纳出汉语27种辞格，分成五大类：（一）根于比较的辞格，包括（甲）根于类似的，有显比、隐比、寓言三种；（乙）根于差异的，包括相形、反言、阶升、趋下四种。（二）根于想象的辞格，包括拟人、呼告、想见、扬厉四种。（三）根于联想的辞格，包括伴名、类名、迁德三种。（四）根于曲折的修辞格，包括微辞、冷语、舛语、负辞、诘问、感叹、同辞、婉辞、纡辞九种。（五）

根于重复的辞格，包括反复、俪辞、排句、复字四种。这就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辞格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特色和贡献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辞格，开辟了汉语辞格研究的新途径。

陈望道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修辞研究成果，对汉语修辞现象和修辞方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把汉语辞格归纳为四类38格，每格又分成若干式；并且对辞格的构成、变化、分布、功能或同题旨情境的关联以及辞格间的交叉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成为辞格研究的典范。四类38格的具体内容是：（甲类）材料上的辞格——指就客观事象而行的修辞，包括譬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拈连、移就等九格；（乙类）意境上的辞格——指就主观心境而行的修辞，包括比拟、讽喻、示现、呼告、夸张、倒反、婉转、避讳、设问、感叹等10格；（丙类）词语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词语成素的辞格，包括析字、藏词、飞白、镶嵌、复叠、节缩、省略、警策、折绕、转类、回文等11格；（丁类）章句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结构的修辞，包括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错综、顶真、倒装、跳脱等八格。这种辞格分类体系的提出，标志着汉语辞格研究模仿期的结束，为中国修辞学建立了具有汉语特色的较为完备、科学的辞格系统。其中特别归纳和提出了汉语特有的一些辞格（如析字、回文、对偶），并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50年代与60年代，辞格研究成就最大的当推张弓。他所著《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将现代汉语辞式（即辞格）分为描绘式、布置式、表达式等三类24种。在阐析中，特别注意辞格的结构特征以及它们在各类语体中的运用，使辞格分析向定型化、形式化的目标前进了一步，而且还注意各个辞格对语言各因素的具体运动，使辞格研究与词汇、语法、语音各因素的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汉语辞格研究又一次呈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辞格研究成果最多的当推谭永祥。他所著《修辞新格》（1983）归纳出了15个新格，即闪避、别解、诡谐、旁逸、异称、巧缀、同异、舛互、序换、断取、返射、歧疑、谲辞、移时、列锦。在增订本（1996）中，又增补了15个新格，即双饰、双意、拟姓、稔意、新典、淡抹、牵带、设彀、留白、凝粹、影响、绝语、润色、趣辞、用歧。而他所著《汉语修辞美学》（1992）可谓这一时期汉语辞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收辞格60个，其中传统辞格24个，新建辞格36个，并注重在理论上阐释辞格的美学特征。

关于辞格的理论研究，相对于辞格本体的描写来说，显得较为薄弱，不过也得到了修辞学界的重视。郑文贞、余纲《修辞格的客观基础》（1963）从哲学角度系统分析了辞格赖以成立的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是一本从理论和应用结合上全面论述汉语辞格的专著，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比同类论著有所超越。关于辞格的地位和范围，吴士文认为，辞格只是"修辞方式"的一个方面；"修辞方式"包括一般性修辞（辞规、辞风）和特定性修辞（辞格、辞趣）两个大类。他明确规定，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构成一个辞格必须具有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并依照同类辞格的特定结构形式，把辞格分成四类：描述体描述对象体，如比喻、比拟、移就、夸张等；换借体换借本事体，如借代、引用、双关等；引导体引导随从体，如拈连、反复、对偶、排比

等；形变体形变原形体，如析字、镶嵌、仿拟、跳脱等。同时还用结构的转换来辨析不同类型的辞格，用结构公式来描写辞格的结构形式，使辞格研究更加科学化、精密化。

辞格的比较研究也于80年代逐渐兴起，郑远汉《辞格辨异》（1982）和濮侃《辞格比较》（1983）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对于深化辞格研究和为各个辞格予以科学界定提供依据是很有价值的。

辞格的微观研究，也逐渐引起了修辞学者的重视。有些论著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运用某种辞格作出精密的探讨，但还不很深入。而单项辞格的研究则以袁晖《比喻》（1982）和李济中《比喻论析》（1995）较有特色，即从多种角度论述比喻，涉及有关比喻的基本原理，比喻的类型，比喻方式，比喻的作用及运用，比喻和词汇、语法及其他辞格的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钱钟书《管锥编》（1986）关于比喻、异称、兼言、跳脱、反复、引用等修辞格的论述，亦多发前人之未发，颇具胜义。

今后辞格研究除了对辞格的本体结构、功能和分类作精深的阐释，将会在辞格的理论、辞格的比较、辞格的运用以及辞格的微观研究等方面更加深化和细化。

参考文献

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宋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陈光磊）

汉语语境研究（Linguistic Context in Chinese, Studies of）

语境，指使用语言的环境，包括语言内部的和语言外部的。修辞学注重语言运用的研究，所以，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对语境问题都给予相当的关注。比较系统的汉语语境理论由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1932）中创立。其语境理论有两大要义：（1）情境适应论，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凡成功的修辞，必定能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情境适应论是陈望道为修辞学所提出的总的理论原则。修辞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怎样适应题旨情境的方法和技巧。（2）情境构成论，阐明构成语境的元素有①语言内的上下文，即语言文字上下或左右的包孕关系；②语言外的情境项，包括（a）写说者与听读者的关系（如亲疏、上下、平等），（b）写说目的（或说明己见、或与人论辩等），（c）写说者个性特点（如天分、气质、性别、年龄、职业、学问、见解等），（d）写说者的心境，（e）写说的事项（或日常琐事、或学术讨论等），（f）写说的场合（时间、地点）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陈望道并将它们概括成“何故、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何”，作为“情境的分题”。这比50到6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 1890～1960）提出的语境理论有更明确的修辞目标和更丰富的内容。

60年代，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强调“修辞的原则是：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他所说的语境，“包括社会情境、自然环境及上下文”。王德春《使用语言的环境》（1964）一文提出，语境指使用语言的环境，由客观因素（时间、地点、对象等）和主观因素（使用语言者的身份、思想、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构成，并对分析言语环境的意义和功用作了相

当全面的阐释，其中关于“分析言语环境是建立修辞学的基础”的观点尤其受到修辞学界的注意。可以说这些都是对陈望道语境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同时也跟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社会语言学重视语境研究的思潮相吻合。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者对于语境问题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进展，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日本学者西槙光正所编的《语境研究论文集》（1992）和90年代所出版的几本语境研究的专著之中。这些论著，都从汉语运用的实际立论，对语境问题力求作出全面、系统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语境的性质、构成因素及其分类的研究。王占馥《语境学导论》（1993）认为：语境由情境与题旨构成。所谓“情境”，包括情感、审美情趣、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特征、地方习惯、交际现实情境（包括交际场合、交际双方关系及其个人修养等）、语用环境等。所谓“题旨”，包括主题思想、交际动机等。关于语境的性质，他提出具有传承性、渐变性、突变性、独特性、客观性、心理的主观性、地方习惯的特殊性、交际对象的多变性、语用环境的灵活性、语境的交叉性等见解。刘文义《语境学》（1996）详细论述了语内环境（包括语音、词语、句子、篇章、文体环境）、语外环境·情景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环境）、语外环境·背景环境（包括年龄、性别、身份等）、综合环境（包括语内综合环境、语外综合环境、语内语外综合环境）等语境的项目。一般说来，把语境分为语言内的上下文环境和语言外的情景环境两大部分，看法较为一致，但是对语境具体项目的确立和分类在认识上很不一致。

（2）关于使用语言如何适应语境的规律研究。刘焕辉《言语交际学》（1986）和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1989）各自分别从六个不同方面论述了适应语境的规律。王希杰《汉语修辞学》（1983）中关于“对象”、“自我”、“语境”、“前提”等论述，实际上也是适境规律的探讨。至于王占馥《语境与语言运用》（1995）更是专门阐明语境对言语交际中语音、词语、句法、修辞及标点符号使用的影响和制约，具体指出了各语言要素的一些适境规律。寸镇东《语境与修辞》（1996）则着重探讨了外部语境与内部语境制约修辞的规律。

（3）关于语境研究独立成“学”及其对相关学科的价值和功用。语境的研究正在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有人提出了建立语境学的构想。王德春在《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1983）一文中提出在修辞学内部建立一门语境学，作为修辞学的分科，并且在他和陈晨合著的《现代修辞学》（1989）一书中构建了一个以语境学为基础的修辞学体系。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和刘文义的《语境学》努力探求语境与语言关系中存在的各种规律。汉语的语境研究方兴未艾，关于语境的界说、分类，关于语境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关于语境学的学科性质，关于汉语语境本身的基本规律，等等，这些重要课题将会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日] 西槙光正：《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董达武：《语境源流论》，上海：《修辞学习》，1992.2。

（宗廷虎）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of）

修辞学史是以修辞思想、理论和修辞学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修辞学的一个分支。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20至40年代）。主要特点为：1. 出现了修辞学史论文及专章研究。最早的论文是胡光炜《中国修辞学史略》（1923）和《中国修辞学史》（1924），只论述了"春秋""战国"的修辞思想，最早的专章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第12编"结语"，简述了我国修辞研究概貌。继而有徐梗生《修辞学教程》（1933）、章衣萍《修辞学讲话》（1934）、陈介白《新著修辞学》（1936）均列有专章作史的阐述。2.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和西洋、日本修辞学史。如徐梗生论述了"西洋"和"东洋"的"修辞学演变之史实"，"东洋"包括中国和日本。章衣萍论及"欧洲修辞学思想之变迁"与"中国的修辞著作小史"。陈介白的"修辞学之变迁"则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洋。3. 观点主要模仿外国学说。这一时期关于西洋和日本修辞学史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主要采自日本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新文章讲话》等书。至于中国修辞学史研究，除胡光炜、陈望道立足于中国修辞研究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外，多数学者采用外国成说，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4. 研究不够深人，叙述简略，尚停留在著作简介阶段，未注意作规律的总结。严格说来，只能称为不完全的"中国修辞著作小史"，但填补了修辞学史研究的空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深入发展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主要特点表现为：1. 出现了一批通史和断代史的专著。"通史"自先秦写至现当代，80年代代表作有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史专著，此前作者撰有简史《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在日本出版。继而有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90年代代表作有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1990）；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1990，1997年修订再版）；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1998，共分五卷，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宋金元卷、明清卷、近现代卷、当代卷）。断代史方面有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1990），还有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1992）。2. 体例与分期多样化。体例主要有三种：以著作和作者为纲的，如《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通史》等；以作者为纲的，如《中国修辞学史》；以专题项目为纲的，如《汉语修辞学史纲》，此书体例还与文体相结合，如在文、诗、戏曲、小说等文体中列专题项目为纲。历史分期亦有多种：如郑子瑜分为中国修辞思想萌芽期（先秦）、成熟期（两汉）、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延续期（宋金元）、复古期（明清）、革新期（现代）。周振甫分为修辞学开创期（先秦、两汉）、成熟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唐、北宋）、成立和发展期（南宋、金、元明清、现代）。宗廷虎、李金苓分为古代修辞学萌芽期（先秦、两汉）、奠定基础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初步建立期（宋金元）、发展期（明清）和现代修辞学萌芽、建立与初步繁荣期（1905～1948）、普及与深入发展期（1949～1988）。三种分期各有特点。3. 注意探索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历史规律，重视史论、点面、纵横的有机结合。注重理论建设，对修辞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如研究对象、性质、范围、目的、方法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的联系，

修辞学史与修辞学、修辞学史及邻近学科的关系等，多有探讨。与此同时，还注重挖掘、整理第一手丰富的史料，力求做到史论结合。研究者们将整个修辞学史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而将每一历史阶段视为整个修辞学史长链中的一环，注意总结长链的纵线规律与每环的横面特点，以求纵横结合。每一历史阶段均设有重点章节，如魏晋南北朝以刘勰为重点、宋代以陈骙为重点、现代以陈望道等为重点，注意点面结合。4. 自觉地重视研究方法，采用了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方法，或数种方法综合运用，因而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与深度。其中《汉语修辞学史纲》尝试运用系统论方法，注意从整体性、历时性、层次性、结构性、相关性等观念出发，探索汉语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

汉语修辞学史是修辞学中发展较快、研究较为深入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学科具有巨大潜力，今后除进一步发掘丰富史料、加强理论研究外，还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如中西修辞学史的比较研究，各种不同文体的修辞学史，各种不同修辞手法的研究史等等，这些研究将会对当代和未来的修辞学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宗廷虎）

汉语语体风格研究 (Stylistics in Chinese, Studies of)

语体风格也称"语体"、"功能风格"，是以语言交际功能为依据而建立的语言表达类型，是适应不同社会领域的交际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功能变体，具体表现为由词语、句式、语音手段、辞章构造及符号、公式等语言和非语言手段所组成的表达特点系列。

学科的确立与进展　以语体风格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叫语体学。瑞士语言学家夏尔·巴依（Charles Belly 1865～1947）《法语语体学》（1907）的问世，被认为是本学科建立的标志。但语体研究的真正确立和发展是在50年代，兴起于前苏联，而后在欧美展开。汉语语体研究，开始于50年代中期。1956～1962年中国语言科学规划把语体问题提到了必要的地位，指出："这项研究对语言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必须逐步展开。"之后，汉语语体研究逐步得到发展。其进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956～1966年为初创期。主要是对语体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语体的性质、定义、分类等，作一般性的探讨。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1957）最早明确从交际功能和语言特点相结合的角度对语体进行定义和分类；周远明《汉语修辞学的体系》（1959）、唐松波《谈现代汉语语体》（1961）也从功能上对语体性质、定义作出论述，唐文并对几类语体的特点作了概略描写。宋振华等《语言学概论·文体》（1956）、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风格》（1959）、迩遥《文体与风格》（1961）从"文章功用上的差异"对语体的性质、定义作了阐释。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1960）就语体的构成要素、分类标准、研究任务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颇有影响。苏璇等翻译出版《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1960）一书，收集了前苏联50年代有关风

格、语体大讨论的主要论文，对汉语语体研究有借鉴作用。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现代汉语修辞和语体”一章，对构成语体基础的因素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并对现代汉语语体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作了描写研究；代表了这一阶段汉语语体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70年代末至今，为复兴发展期。汉语语体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长足的进展。1985年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中国第一次“语体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语体论》（1987）；1993年在澳门举行了“语言风格学与翻译写作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语言风格论集》（1994）。《修辞学习》杂志还就语体分类与形成等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近20年来，发表的语体论文近200篇。程祥徽《汉语风格论》（1979）是这一时期最早对语体风格进行探讨的文章；发表语体论文较多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有王德春、袁晖、李熙宗、郑远汉、黎运汉、唐松波、丁全国、张德明、郑颐寿等。这期间出版的修辞论著大都设立语体篇章，阐析有关语体问题。而程祥徽《语言风格初探》（1985）、张德明《言语风格学》（1990）、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1990）等专著相继出版，显示了汉语风格研究的长足进展。这时期高校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多增列了语体内容，如袁晖主编《现代汉语》以语体为纲来组织修辞教学，颇具新意。这期间出版了一些语体学专著，一种是概论性的，如王德春《语体略论》（1989）、黎运汉主编《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1989）；又一种是描写性的，如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1991）等，集中对某一语体作系统而深入的描写。同时，《辞海·语言学分册》和几部语言学专科辞书都列有语体学条目，这对明确语体概念和规范语体术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本理论的研究　（1）语体的性质、概念及所用名称问题。因探索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体定义：“语文体式”说，认为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是言语成品的格式类型；“特点综合”说，认为语体是由交际方式和活动领域的不同而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体系）；“功能变体”说，认为语体是全民语言的言语功能变体，是一种共体性的语言风格的不同功能变体；“语言风格”说，认为语体就是由于使用语言的交际范围、目的、内容不同等在历史上形成的某些主要的语言风格。其中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语体是交际功能（包括交际目的、场合、内容等方面）不同而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是民族语言的功能变体。对于“风格”、“语体”、“文体”名称的某些混乱，学者们主张加以规范：“语言风格”用以指最上层的风格概念，“语体”专用以指语言功能风格，“文体”则作为文章体裁而跟“语体”区别使用。

（2）语体的形成问题。大体从两方而探讨：一方而是从历史发展社会交际领域分化和语境制约来探讨语体形成的外部因素。认为语体首先是特定环境中社会交际需要的结果，同时又是与某一领域相应的具体交际目的、内容等功能因素对语言材料选择运用进行制导的产物。因此，超语言因素在语体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着重对语言内部因素在语体形成中作用的探讨。认为是否形成语体主要看是否形成了具有独特语言特点的体系；语体作为一种功能风格，是以语言材料、表达手段所组成的特点体系为物质体现的，因此研究语体形成应以语言内部因素为主。两种看法分歧较大。不过，也逐渐有所认同：在语体形成上既应重视对外部因素、又应重视对内部因素及两者关系的研

究。

(3) 语体研究的对象、任务问题。早期的讨论，大多把它包括在对修辞学对象、任务的论述之中，认为语体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修辞现象，从语体角度对修辞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是修辞学固有的任务。随着研究的深入，提出修辞学与语体学两门学科的性质有所不同，语体学有其自身的对象和任务：研究语体风格的形成、本质、分类原则，对各个层次的语体类型进行研究描写，建立现代汉语的语体风格体系，并据此确定语体风格规范，以指导语言实践。

(4) 语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五六十年代较注意分析、综合和比较等方法。逊遥《文体和风格》所谈"研究方法"认为语体风格是由语言手段的相互结合才得以显示的，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分析，是"对成篇材料里个别语言单位或语言单位类型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风格功能'"；综合，则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指出"某种文体的语言特点是什么样的，这些语言特点是怎样适应于一定的交际目的的"。80年代，注意多角度地探求研究方法：或者尝试把话语分析方法运用过来；或者以辩证法为指导提出贯穿无形分析与有形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原则；或者倡导数量统计方法，如钱锋、陈光磊等专就语体要素数量化分析作了有关数学模型的构拟，也有人在数量统计基础上对文艺与科技语体语言特点进行对比，对句式与语体适应关系进行考察；或者提出把系统论引进语体研究、等等。

语体分类及语体风格类型的描写　研究上是理论探讨和实际分类同步进行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1) 语体分类的标准。所论及的标准大致有文体（体裁）标准，语言形式标准，风格标准，交际功能标准等几种。而汉语语体分类讨论中主要论及的是文体和功能两种标准。文体标准是建立在文体即语体、文体与语体可一一对应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的，这一标准在国内外都有其渊源。如俄国罗蒙诺索夫时代俄语的三种语体风格，与散文、诗歌、戏剧体相符合，中国古代如曹丕、陆机时代语体风格特征一般也跟不同文体特征相应合，因此以文体为标准显得顺理成章，一直沿用下来。但从总的趋势看，现代语体学倾向于以社会交际功能作为分类的标准，即依据超语言因素（主要是交际功能因素）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因素（即语言运用本身的特点）来划分语体。但对这一标准的理解还不尽一致。这也就直接影响着实际分类的差异，归纳起来，可以有二分法，即分为谈话语体（口头语体）和文章语体（书面语体），文章语体再作下位区分；三分法，即分为口语语体、书面语体和文体语体，或分为实用体、边缘体和艺术体，又或分为科学体、艺术体和谈话体；四分法，即分为日常交谈语体、叙事语体、抒情语体和论证语体；五分法，即分为政论、科学、文艺、公文、口头语体五类；多分法，则分为政治、司法、财贸、科技、生活等类型。至今还没有为大家一致认同的分类方法和分类系统。目前比较通行的分法是先分口头体和书面体，书面体再分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这些语体分类只是一种工作分类。

(2) 语体风格类型特点的描写。对汉语基本语体类型语言特点的描写研究在70年代以后得到了广泛展开。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1979)、王希杰《汉语修辞学》(1983)、宗廷虎等《修辞新论》(1988)、王

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1989)、黎运汉主编《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1989)、倪宝元主编《大学修辞》(1994)等论著和教材都对汉语的口头语体和书面语变体的文艺、科技、公文、政论语体的特点作了大致描述，其中有的较成系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单篇论文，专门就某一语体类型的特点进行描写研究，颇具深度。如李熙宗《现代汉语科技语体述要》、陈光磊《简论汉语的科技语体》(1991)等文，集中对科技语体特点作出研究描写；其他如李熙宗、章熊、梁洁英等撰文集中对公文事务语体进行描写研究，王德春、杨达英等对政论语体加以描述，林文金、郑颐寿等对文艺语体展开研究，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基本语体再作下位区分并对各分语体进行描写研究也颇多进展。如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1991)对公文语体中法律语体的研究，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对新闻广播语体的描写，都是较有成就的。其他，如对文艺语体中韵文体、散文体、戏剧体等特点的探究，对科技语体中通俗科技语体的研究，对广告语体特点的讨论也正在深入。

(3) 语体的交叉渗透。这是指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用于某一交际目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别一交际目的，从而形成某一种语体含有其他语体的若干成分而兼具其他语体的一些特点。这种交叉渗透会产生一些新的语文体式，从而推动语体的发展变化。在对语体作分类研究的同时也研究其交叉渗透，才能更好地了解现代汉语语体体系的全貌。

汉语的语体风格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如语体的定义、形成、分类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还缺乏应有的共识；对汉语中各语体类型语言特点系列的描写研究更显薄弱，离建立汉语语体体系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加强对基本理论研究和对语体特点体系的描写研究，是汉语语体风格研究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

李熙宗：《建国以来语体研究述评》，杭州：《语文导报》，1986.10～11.

(李熙宗)

汉语积极修辞研究 (Active Rhetoric in Chinese, Studies of)

积极修辞是修辞的两大手法之一，与"消极修辞"相对。其表达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感情的，适应不同题旨情境需要，积极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写说的具体形象，呈现出动人的魅力，从而引起听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女子的美貌经过这样夸张的描写，令听读者为之动容。积极修辞所要追求的是表现上的艺术境界，所以它注重对辞格、辞趣的利用，注重寻常词语的艺术化。

龙伯纯在《文字发凡·修辞学》(1905)中，最早引进了"消极"、"积极"观念。他认为，所谓积极者，"乃修辞最高之准备也"。其后，王易、陈介白等人多承此说，而所论积极修辞大同小异。

陈望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积极修辞"的学者。所著《修辞学发凡》(1932)把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他说："所谓积极

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 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 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也称辞藻；一种是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浅淡的，叫做辞趣。”可以说，这是关于积极修辞的具有经典性的定义。

关于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研究，另见“汉语辞格研究”条。这里主要综述辞格之外的积极修辞，即“辞趣”和“寻常词语艺术化”两方面的研究成果。

陈望道认为，“辞趣”，大体只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他从“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三个方面（对应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声音、形体三方面）对辞趣加以探讨与总结。在他看来，“辞的意味”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历史或背景的衬托；二是由于语言文字的上下或左右的包孕；“辞的音调”，是指利用语言文字的声音以增饰语辞的情趣所形成的现象；“辞的形貌”主要指变动字形和插用图符两种。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对陈望道提出的“辞趣”外延作了修正，他把辞趣严格限制在“纯形式的东西”，即“形趣”与“音趣”两个方面，把“意趣”（辞的意味）划归到辞格中去。谭永祥在《汉语修辞美学》（1992）中，以极大的篇幅探讨了长期为修辞学界所未充分重视的“辞趣”现象。他不同意吴士文的看法，认为“意趣”不能划归到“辞格”或“辞规”中去，“意趣”具有一定的魅力，是趣格的初始状态。“意趣”的提出是陈望道的一大功劳，为研究辞格的产生和发展找到了一条新途径。谭永祥为“辞趣”下了这样的定义：富有表现力的亚辞格的言语现象，及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的词语的音调或字形图符、书写款式所体现出来的情趣。

关于“意趣”，谭永祥认为可以把它分成“有名趣”和“无名趣”。“有名趣”又可分为“指代趣”与“虚字趣”两类；“无名趣”很难加以归纳概括和进行下位分类。关于“音趣”，谭氏则分成“同音异义趣”、“异音同字趣”、“韵趣”、“拗趣”等四种加以研讨。关于“形趣”，谭氏则把它分成“字形趣”和“图符趣”两种。

“寻常词语艺术化”是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中明确提出的一种修辞范畴。它是对汉语传统修辞所谓“炼字”问题的现代阐释。“寻常词语”是指在修辞方式（辞格）之外的普通、平易、本色的词语，如果把这些词语组织在有形象表现力的上下文中，就能使之获得审美特质，从而具有艺术魅力。他通过实例对寻常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艺术化，逐项细致地作了分析，并总结出寻常词语艺术化的表达特点和表达效果：“由平易显神妙，凭朴素本色显美丽”，“或褒或贬，或鞭挞或赞扬，凭着自己朴素的本色，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起着一种特殊的美化作用。”

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专门探讨词语运用的专著，如石云孙《词语的选择》（1985）、刘焕辉《语言运用概说——用词造句》（1980）、倪宝元《词语的锤炼》（1981）、李嘉耀《选词》（1985）等。可以说，这是对“寻常词语艺术化”不断加深探讨而结出的硕果。其中倪宝元《词语的锤炼》成就较高。该书阐述了词语锤炼的一般原理、词语的照应和配合、词语的活用等问题，还分门

别类地论析了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量词、副词、连词等的锤炼。

积极修辞研究是修辞学的一个基本部门。作品的创作与鉴赏尤其重要；文学语言的研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就是积极修辞的研究。同时，积极修辞又正是人们运用语言的创造性的体现，所以，积极修辞（特别是辞格）研究将会依然是修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参考文献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李运富：《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杨林成）

汉语消极修辞研究（Passive Rhetoric in Chinese, Studies of）

消极修辞是修辞的两大手法之一，与"积极修辞"相对，其表达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以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为标准，是一切语文表达中普遍运用的手法，是构成各种修辞方式的基础。目的在于使人明理，而不在使人感动。主要用于科学、法令及其他诠释文中。

龙伯纯在《文字发凡·修辞学》（1905）中，最早引进了"消极"、"积极"观念。他认为，所谓消极者，"乃修辞最低标准，准备上必要者也"。其后，王易、陈介白等人多承此说，而所论消极修辞大同小异。

陈望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消极修辞"的学者。所著《修辞学发凡》（1932）把修辞手法分作两大分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注意使思想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方法。消极修辞的第一要义在能尽传达事理的责任。其价值如何，就要看写说的结果同事理的实际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如何而定。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四个标准是：明确、通顺、平匀、稳密。"明确"，要求说写者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努力的途径有二：第一力求内容上本身的明确；第二力求表达方式上的明确。"通顺"，要求言语表达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平匀"，是指选词造句以平易稳妥的达意为标的，审慎地使用方言词、古语、外来词。"稳密"，是指词句对于内容要贴切，既不冗赘，又不疏漏。同时，陈望道又提出了"零点修辞"说，认为所谓消极修辞，就是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就是不通的，零点就是普通的、通顺明白的，而积极修辞则要研究零点以上的东西。

宋文翰《国语文修辞法》（1935）和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两书贯彻了陈望道"两大分野"的修辞思想，书中消极修辞部分论述得较为具体。宋著概括出了关于句子的消极修辞四条规律：语意明显、含义纯一、措辞简洁、音节和谐；每一条规律下面还列出了若干细则。汪著总结出修辞规则共86条，其中多数是属于消极修辞的。

建国后，消极修辞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特色：重视修辞病例的剖析。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2）作为一本"匡谬正俗"的普及性读物，就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通过对大量病句的分析，来介绍语法修辞知识的。作者把"明确"和"简洁"作为消极修辞的两面旗帜，对"明确"的对立面——"费解"、"歧义"、"苟简"和"简洁"的对立面——"堆砌"、"重复"、"烦冗"等语病进行了具体而切实的剖析。

在消极修辞研究领域里开了大规模系统研究修辞病例的先河。

吕景先《修词学习》（1958）的出版，标志着消极修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书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专门探讨消极修辞，分“用词正确”、“语意明确”、“文理通顺”、“结构妥帖”、“繁简适当”、“语言平易”等六个方面加以讨论。每个部分又从不同角度，分几个层次加以论述。如在“结构妥帖”部分，即从“语言形式是否适切”、“词语次序是否妥当”、“上下语境是否衔接”、“条理是否清楚”、“重点是否分明”等角度进行论析。这是汉语修辞论著中前所未有的。

80年代以来，虽然有人对“两大分野”说提出异议，但对消极修辞的研究仍有了长足进展。首先，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修辞病例的专著。《词语评改五百例》（语文出版社，1984）和《病句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次，出现了一批从应用和写作角度来研究消极修辞的专著，如姚殿芳、潘兆明《实用汉语修辞》（1987）。再次，出现了研究消极修辞的第一部专著——华宏仪《汉语消极修辞》（1990）。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吴士文对消极修辞的研究，他继承陈望道“两大分野”的主张，对“一般性修辞”（即消极修辞）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所著《修辞讲话》（1982）将“一般性修辞”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通顺有条理”、“简洁无废词”；第二，“明确无歧义”、“贴切有所宜”。共归纳出消极修辞手法26种。所著《修辞格论析》（1986）明确提出了“一般性修辞”的两个下位概念：“辞规”与“辞风”。所谓“辞规”，对应于积极修辞的“辞格”，是指具有一般功能、一般结构、一般方法，符合一般类聚系统的模式。“一般功能”，即准确、明白、通顺、简洁；“一般结构”，即普通所说的语法结构；“一般方法”，即常规方法，如“列举分承”。而“辞风”则是与“辞趣”相对应的纯属语辞外形的修辞问题，没有魅力可言。总之，“辞规”、“辞风”是指不富于情趣的音和形。这样，整个修辞方式就能系列化起来，使消极修辞研究更为具体、实在。在吴士文的倡导下，出现了一批研究“辞规”的文章，主要集中发表在《营口师专学报》上。

消极修辞的研究，尽管受到许多修辞学家的重视，但也有相反的意见，如谭永祥等人一再否认消极修辞研究，认为它提不出自己的规则和术语，不能存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修辞两大分野的划分。这种看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吴士文《应该继承和完善“两大分野”的修辞学说》（1993）一文是讨论中很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文章认为，“两大分野”说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科学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在修辞方式研究中的成功运用。同时，对于消极修辞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也作出了比较切实的阐述。

事实上，消极修辞研究对于现代社会语文生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在讲求实用的言语交际领域，如法律文书的撰写，消极修辞始终是言语表达第一位的要求。消极修辞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将进一步突破词语和句子的范围，向篇章方面的消极修辞问题发展；其二，应用性将会越来越强，也就是更加注重与功能语体特别是公文事务语体和科技语体的研究相结合。

参考文献

吴士文：《应该继承和完善“两大分野”的修

辞学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6。

李运富等：《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杨林成）

汉语音韵学研究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Studies of）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20世纪初叶以前，它属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科即“小学”的一个重要部门，源于以反切出现的东汉末年，到清末已有1700余年的研究历史。

进入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汉语音韵学这门古老学科，与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也逐步走向现代化，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标志是：

1. 理论与观念的转变。传统音韵学重在实用，即用于“发蒙”、“通经”、“正音”，拘限在语文学的范畴之内，成为经学的附庸。现代音韵学运用西方的历史语言学理论，注重探讨语音发展的历史与演变规律，即把音韵学研究看成是语言史的一部分，并以现代语音学原理为手段，将传统音韵学中玄虚含混的内容都解释清楚了。

2. 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引进历史比较法、译音对勘法和内部拟测法等方法，采用国际音标，构拟古音的音值，这比过去用不拼音的汉字作记音工具要科学得多。同时用统计学的方法（包括概率统计法与数理统计法）以补充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

3. 研究对象扩大，材料更为丰富多样。除了韵书、韵图及字书、音义书的反切和韵文用韵，还利用新出土的文字、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对音以及现代活的汉语方言和亲属语言，因而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并拓并加强了近代音的研究；既进行断代音系的研究，又注意建立汉语语音史学科。

4. 在提高科学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普及性。现代音韵学的实用功能也发生了变革，即全面服务于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服务于汉语规范化，并服务于历史、哲学、文学等其他科学。同时还为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或参考。

在过去的百年中，汉语音韵学并非一直顺利发展，而是经历了几番曲折，几度起落。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前一时期的第一阶段，自本世纪初至1922年。国内的音韵学研究基本上走着传统的治学之路，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献中的中古音与上古音，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章、黄是清代乾、嘉以来“小学”的继承者和集成者，对古音研究有重要贡献，例如，章炳麟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古韵为23部，又提出上古“娘、日二母归泥说”；黄侃则将收—k的入声韵独立出来，定古韵为28部，影响都很大。钱玄同在北京大学讲授音韵学的讲义《文字学音篇》（1918）是我国现代第一部通论性音韵学教科书。除了介绍章、黄的上古音（19声纽和28韵部）与中古音系（《广韵》41声类与339韵类），还将《中原音韵》作为近代北音的上源列入教学内容，并用了较多篇幅讲解“注音字母”，又采用音标作为标音工具，开音韵学革新之先声。

在这一阶段，马伯乐（B.Maspero）、高本汉（B.Karlgren）等西方学者已开始了他们的汉语古音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高本

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15～1922)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分析比较现代方音与中外对音材料，全面、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系，即中古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高本汉后来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上古音的著作。

前一时期的第二阶段，自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发表俄国学者钢和泰(A.H.VonStel)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译)后，接着又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发一场古音研究方法亦即研究的方向性的新旧两派的争论，结果革新派胜利，标志着中国音韵学开始了现代化。

从20年代末开始高本汉的汉语中古音与上古音的构拟学说(包括方法与结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成为推动中国音韵学现代化的另一股动力。赵元任、林语堂、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张世禄、王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商务印书馆)。他们以及后来的董同龢、陆志韦、周法高等还大都在高氏构拟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修订、补充中古音与上古音的结论，并发表一些研究成果。如林语堂的《古有复辅音说》(1924)，李方桂的《切韵 â 的来源》(1931)、《东冬屋沃之上古音》，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钱玄同的《古韵二十八部之假定》，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1947)，陆志韦的《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古音说略》(1947)等。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文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开拓汉语音韵学现代化的三个主要阵地。

在这一阶段，中国音韵学家还继续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或同时采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发掘、整理丰富的文献材料，深入研究了上古的声纽、韵部和《切韵》系韵书的音系与宋元等韵以及有关专题(如“重纽”问题)。曾运乾、刘复、罗常培、王力、白涤洲、魏建功、黄淬伯以及他们的学生周祖谟、严学宭等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1927)，王力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白涤洲的《〈广韵〉声类韵类之统计》(1931)，黄淬伯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31)，周祖谟的《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1941)，严学宭《大徐本说文反切音系》(1936)等。又，敦煌文献中的《切韵》残卷、《唐韵》残卷、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的发现与整理有重要收获，如刘复、魏建功等的《十韵汇编》(1936)。黄侃、白涤洲等还开了研究《集韵》声类、韵类之先河。等韵学方面，罗常培的《释重轻》(1932)、《释内外转》(1933)，董同龢的《等韵门法通释》(1949)以及赵荫棠的《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1934)是有代表性的论文。赵荫棠、陆志韦、魏建功等在近代音研究方面也有所突破，并获得可观的成果。如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1936)，陆志韦40年代后期所写一系列近代音论文。此外，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1940)是现代第一部音韵学通史。

赵元任、刘复等运用音韵学及《广韵》音系编制“字表”，用科学的语音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东京仓石武四郎是日本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学生河野六郎、有坂秀世、藤堂明保和京都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都曾留学中国。他们的音韵学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

后一时期的两个阶段以“文化大革命”为界限。第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国

内学术发展受到压抑，海内外信息隔绝。音韵学的发展缓慢。

1955年后在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以及方言普查工作的推动下，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与《切韵》音系的研究受到关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办普通话语音研讨班，北大中文系请陆志韦讲《高本汉的音韵学说》、李荣讲《广韵》，中华书局等重印音韵学教材、专著和古籍，如王力《汉语音韵学》（1956）、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56）、李荣《切韵音系》（1956）、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1957）、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同时还编写出版一些音韵学普及读物，如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北大、南开、复旦等校相继开设"汉语史"课，建立起"汉语语音史"这门新学科。王力的《汉语史稿》（上册，1957）是其代表作。古音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断代研究有重要成果。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8）。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语文》杂志上先后开展的关于《切韵》和《中原音韵》的性质与它们的音系基础的讨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好景不长，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万马齐喑，音韵学与所有学术研究完全停顿。

在此阶段，海外特别是台湾及美国、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却取得长足的进步。董同龢、许世瑛、林尹、潘重规、周法高、高明等到台湾后继续从事音韵学研究与教学，并培养一些音韵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后又大都到美国深造，接受赵元任、李方桂、张琨等的影响，其中龙宇纯、薛凤生、梅祖麟、丁邦新、陈新雄等60年代后崭露头角。日本的有坂秀世、小川环树、藤堂明保、赖维勤等的音韵研究也进入创获时期，并培养了桥本万太郎、平山久雄和尾崎雄二郎等优秀学者。此外美国的包拟古（N.C.Bodman）、苏联的雅洪托夫（C.E.ЯХОНТОВ）、加拿大的蒲立本（E.G.Pulleyblank）、法国的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nt）等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音韵论著。上述海外的研究成果直到70年代末以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来。

后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后的20年，是汉语音韵学全面推进、繁荣发展的时期。国家政治局势的转变创造了有利学术研究的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也对音韵学产生更多的客观需求。这表现在：

1. 全国综合大学与师范院校中文系普遍开设音韵学课程，陆续招收以音韵学或语音史为攻读方向的汉语史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培养专门人才。同时，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曾举办四期音韵学高级研修班，每期3个月，开设语音学、切韵学、等韵学、古音学、北音学和方言学等系列课程，培训学员300多名。音韵学的教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出现了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

2.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于1980年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音韵学专业社团。每2年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至1998年已举行10次年会，5次汉语音韵学国际研讨会，出版《音韵学研究通讯》21期和不定期学刊《音韵学研究》等7集。

3. 与海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日见频繁。80年代初即与美国、日本的音韵学者有了交往。1990年起又与台湾地区的同行开始了交流，并翻译或翻印海外学者的音韵学论文和专著。如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丁邦新的《魏晋音研究》，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4. 研究材料更加拓宽，方法进一步改

进。如系统利用甲骨文金文及简帛文字中形声、假借来研究上古音；还有不少学者利用亲属语言即汉藏语系的研究成果，通过历史比较，重新审视以前的古音构拟，提出不少新见解。方言史的研究与音韵学的结合也愈紧密。同时又将古音研究范围推进到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阶段。

在本阶段，通过三代学者共同努力，研究成果丰硕，发表、出版的论著激增。截至1997年底，据不精确的统计，20年间已出版音韵学专著约190部，论文2323篇，远远超过前80年的总和（752篇）。

大致说来，〔一〕上古音的研究(550篇)。愈来愈深入。除了讨论声母的分合及复辅音和韵部的分类与构拟，并扩大到远古或原始汉语，但许多问题意见分歧，远未达到一致。重要论著有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2)，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1987)，白一平《上古汉语音韵手册》(1992)，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1994)，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95)，严学宭《周秦古音结构体系》(1984)，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984)，张琨《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87)，郑张尚芳《上古声母系统及演变规律》(1991)，林焘《日母音值考》(1995)等。〔二〕中古音的研究(468篇)亦向纵深发展。《切韵》《广韵》系韵书和《集韵》音系及其有关专题，魏晋至隋唐的诗文用韵以及字书、音义书和传注中的反切等材料得到广泛而系统的研究，但对《切韵》性质的看法仍有分歧。如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1983)，鲍明伟《唐代诗文韵部研究》(1990)，黄典诚《曹宪〈博雅音〉研究》(1986)，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等。〔三〕近代音和等韵研究(580篇)。《中原音韵》的研究成果突出，宋元词曲和诗文的用韵以及元明清的各种对音材料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充分的利用。诸如全浊音的清化、儿韵的演变、-m韵尾的转化和四声的消变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收获。宋《卢迈切韵法》的发现与整理，传统宋元五种等韵图的分析以及明清等韵的开拓与研究，也都有重要进展。有代表性的论著如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1982)，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1997)，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1986)，林焘《入派三声补释》(1992)，李新魁《韵镜校证》(1982)、《汉语等韵学》(1983)，耿振生《明清等韵学》(1992)，俞敏《等韵溯源》(1984)，唐作藩《四声等子研究》(1989)，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1979)、《卢宗迈切韵法述评》(1993)等。〔四〕音韵理论、方法和应用以及与方言、民族语的比较(670篇)，均有新的进展和许多成果。例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声韵结合的方法，杨耐思《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叶蜚声、徐通锵《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耿振生《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等。

参考文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89.4。

（唐作藩）

上古音研究 (Phon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Studies of)

上古音的研究在传统音韵学中称为"古音学"，清代已取得了辉煌成就。进入20世纪以后，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收了西方历

史语言学的成果，从而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语音一直是古音学的重心。清儒划分韵部历时200年才达到比较圆满的结果，即王念孙、江有诰所分出的22部。这一结果曾被王国维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0世纪初，章炳麟、王力又各有重要发现，使古韵分部更臻完善。章炳麟从脂部分出一个队部，定为23部。章的学生黄侃以这23部为基础，重新运用戴震的阴、阳、入三分方法，把收-k的入声韵划出，定古韵为28部。王力在1937年发表《上古韵部系统研究》，把清人的脂部分为脂、微两部，这一结论以后被普遍接受。王力早年定古韵为23部，50年代以后分《诗经》时代古韵为29部（并冬部于侵部），战国时代为30部，（冬、侵分立）。后来也有的学者主张分部更多，如罗常培、周祖谟分31部（从月部分出祭部），还有人创议分为36部或33部，但学术界较通行的是王力30部。董同龢、李方桂等人的著作在形式上仍以清人22部为纲，实际上把入声韵类与阴声韵类分别构拟，应看作30多个韵部。

古音音值的构拟是20世纪汉语音韵学的重大进步。上古音的构拟是从20年代开始的。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以佛经里的音译词、日译吴音和汉音为证，推论唐宋以前“歌”、“戈”韵的韵母为a，魏晋以前“鱼”“虞”“模”的韵母为a。汪氏的文章激起了一场辩论，辩论的客观效果是了解到音值构拟的可能性与译音对勘方法的重要性，促成了音韵学研究的转轨。差不多与此同时，瑞典学者高本汉(B.Karlgren）开始用“内部拟测法”构拟上古音的音值。高氏先后发表过《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诗经研究》（1932）、《汉语词族》（1933）、《汉文典》（1940）等，以他已经构拟出的中古《切韵》音值为根据，推测《诗经》韵部系统的读音。中国学者林语堂、李方桂、钱玄同继之而起，在上古音构拟方面发表了重要论著。林语堂对高本汉所构拟的阴声韵部浊塞音韵尾提出质疑；李方桂认为同一韵部应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反对高本汉为一个韵部构拟出几个不同的主要元音；钱玄同的《古韵廿八部之假定》(1934）为黄侃的上古28部拟测音值，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部构拟成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在高本汉的体系之外别立一家。到40年代，出现了另两部构拟上古音的重要著作，一是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一是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两书分别对高本汉的拟音有所批评修正，但构拟结果仍保留高氏的特色：同一韵部有不同的主要元音，阴声韵有浊塞音韵尾-b、-d、-g、-r等。

50年代出版的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系统地对上古音进行构拟，特点是更重视构拟的音值要合乎自然语言的常规，批评高本汉拟音的主观性；以“阴阳对转”解释阴声韵与入声韵的关系，而不为阴声韵拟测浊塞音韵尾；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王力在1964年发表《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70年代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在海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韵母系统的特点在于主要元音简单，有圆唇舌根音韵尾，二等韵母有r介音。这种构拟包含了外国学者如日本的赖惟勤、俄国的雅洪托夫(C.E.Яхонтов）等人的观点。

80年代以后的上古韵母构拟仍然十分活跃，不断有新颖观点出现。王力的《汉语语音史》对主元音的构拟又有所修订。喻世长、严学窘、黄典诚、郑张尚芳等各有独自

的见解，香港的余廼永、美国的白一平（W. H. Baxter）分别发表过专著。

上古声母的研究也包括“音类”和“音值”两方面。章炳麟定21纽，倡“娘日归泥”说；黄侃定19纽。这是本世纪早期上古声母的研究成果。20年代曾运乾发表《喻母古读考》，认为宋人36字母中的喻母有两个来源，三等字上古与匣母同类，四等字上古与定母同类，“喻三归匣”说基本成为定论。高本汉全面运用谐声系统决定声母类别，发挥了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观点。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更重视方言分音词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参证作用。董同龢为上古构拟了清鼻音声母，陆志韦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谐声系统，他们扩大了研究思路，增加了研究方法。

60年代，苏联的雅洪托夫、加拿大的蒲立本（E.G.Dulleyblank）都为上古声母构拟了塞音或鼻音前有［s］前缀之类的复辅音，这种构拟后来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80年代以后，上古声母的构拟仍然是百家争鸣。大的分歧在于有没有复辅音，肯定上古有复辅音者渐居主流。喻世长总结了较详尽的谐声规律，构拟了67个上古声母，既有单纯声母，也有复辅音声母。严学宭的拟音最复杂，有二合复辅音、三合复辅音、四合复辅音，数量多达200余个，还没有为人普遍接受。

关于上古声调体系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意见。一个问题是上古是否也有四个调类。主张有四个调类的占多数，持不同意见的一派有人说上古本无声调，有人说上古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如黄侃），有人说上古有五个声调（如王国维），有人说上古有六个声调（如黄典诚）。另一个问题是上古四声属何种语音性质。有人把上古四声等同于中古四声，即平、上、去是音高的区别，入声则以塞音韵尾区别于其他三声；王力赞成清人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认为中古入声来自上古的短入声，中古去声来自上古的长入声，即“去声归入”；虽然也与平、上共同构成四个类别，但语音性质不同于中古四声。此外，还有人探讨声调起源，以为去声由带-s后缀的音节变来，上声由带-ʔ后缀的音节变来。

两汉音系属上古汉语的后期，研究这一阶段汉语语音的重要著作是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8），该书全面考察两汉诗文用韵，总结出27个韵部，并对方音问题和个别用韵现象加以分辨。后来王显、邵荣芬在80年代发表文章，对罗、周的某些观点加以订正。近几10年来出土的汉代竹简和帛书中的语音资料受到足够重视，周祖谟等人曾著文探讨。专书有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对通假字和异文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其结论颇有坚实基础。此外有人利用《说文》、《释名》、《方言》及经师注音分析两汉音系，如美国柯蔚南（W.South Coblin）等，但此类材料情况复杂，处理起来并不容易。

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尚附属于古音学。商代语音资料缺乏，管燮初、郭锡良等利用甲骨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各家结论相互牴牾，可信度不够。原始汉语语音的研究分两条途径，一条是把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结合于构拟出的先秦音系，再往前追溯，如邢公畹、严学宭、龚煌城以及美国的包拟古（N.C.Bodman），其中有人所称的“上古汉语音韵”其实应归之于原始汉语；另一条是从构拟出的先秦音系中寻找“空档”，以内部拟测法上溯原始汉语，并结合中古汉语的方音比较来下结论，如美国的张琨。两条途径各有千秋，但可靠的成果也许等以后才可建立。

参考文献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学纲要》（中译本），济南：齐鲁书社，1987。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耿振生）

中古音研究（Phonology in Middle Chinese, Studies of）

中古音指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切韵》系韵书的研究　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1. 音系的外围研究　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之于世。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1955年，姜亮夫30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1974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有较大参考价值。1983年，周祖谟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代表了《切韵》整理的最高水平。

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一向重视《广韵》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校本。1938年，周祖谟以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为底本，全面校勘《广韵》，写成《广韵校勘记》，1951年又出版了《广韵校本》。葛信益利用《切韵》残卷及其增订本，比勘《广韵》的各种版本，校正《广韵》的误字和夺字，著有《〈广韵〉讹夺举正》（1984年）、《读〈广韵〉札记》（1988年）等。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1986年）详细考察了《广韵》版本的源流。

王国维是本世纪最早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魏建功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年）、《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年）、《〈十韵汇编〉魏序》（1935年）等一系列论文，基本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考释部分）多发前人所未发。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年）比较了《切韵》、《唐韵》、《王韵》和《广韵》的异同。

运用历史比较法重建起来的《切韵》音系，既要能解释《切韵》音类的区别，又要能说明从《切韵》到现代汉语方音的历史演变。一方面，要以《切韵》为参照，建立方音跟《切韵》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要利用方言透视《切韵》，为音系的构拟提供证据。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无法解释闽方

言的差异，因此，利用闽方言透视《切韵》所取得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如张光宇著有《〈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1984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三四等韵的对立》(1986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一二等韵的分合》(1989年)等。本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高本汉的现代汉语方音来自《切韵》母语的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几位学者主张先从现代各大方言的历史比较中拟设出原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湘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然后跟《切韵》比较，进而拟测原始汉语，代表人物有罗杰瑞、桥本万太郎、余霭芹、梅祖麟等。

20世纪在考求《切韵》音类的方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曾运乾运用审音法，白涤洲采用统计法，陆志韦运用数理法，修正了陈澧的结论。全面运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成功地构拟《切韵》的音值，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著，1940年汉译本)，是构拟《切韵》音系的奠基作，也是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后来的《切韵》研究都是它的延续、补苴和发展。围绕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音韵学界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切韵》研究的材料丰富了，方法多样了，视野开阔了。赵元任、罗常培、王力、陆志韦、李荣、邵荣芬等先后对高本汉所拟《切韵》音值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

1. 三等声母拟成〔j〕化没有根据，应该取消。2. 改全浊声母为不送气；改订一些韵母的主要元音。3. 高本汉没有重视的《切韵》重纽问题得到广泛的讨论。总的看法是，重纽代表两种音节的对立，大致可分为四派意见：(1) 主要元音区别说；(2) 介音区别说；(3) 声母区别说；(4) 韵尾区别说。4. 关于《切韵》的性质，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单一音系说认为《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综合音系说认为《切韵》是不同方言的音韵区别的综合体。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二、诗文韵系的研究　根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代诗文押韵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韵部分合，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研究　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1936年)收集两汉至六朝诗文押韵材料，讨论韵部分合状况。王力《南北朝诗文用韵考》(1936年)考察南北朝49家用韵，分为三个时期，归纳为54个韵部，特别注意不同时期、不同籍贯的诗人的方音差异。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1982年)、《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的分类》(1982年)和《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1983年)论述了魏晋宋时期和齐梁陈隋两个时期的韵部、声母、声调演变的格局。丁邦新《魏晋音研究》(1976年)是魏晋音研究的后出转精之作，重视方法论，在海外有较大的影响。

2. 隋唐诗文用韵研究　隋唐诗文的个人用韵的研究，较早的有张世禄的《杜甫诗的用韵》(1944年)和鲍明炜《李白诗的韵系》(1957年)和若凡的《寒山子诗韵》(1963年)。80年代以后，对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韦应物、刘禹锡、孟郊、杜牧以及王梵志的白话诗都有专文研究。

对于一个或几个时期的诗文用韵作宏观的总体考察也有不少成就。李荣的《隋韵谱》(1961～1962)排比讨论《全隋诗》、《全隋文》用韵情况。唐作藩连续20多年指导北大学生基本上把《全唐诗》作品较多的诗人用韵清理了一遍，以此为基础，把中古韵部分为前期(六朝至初唐)43部和后期(中晚唐)29部，拟测韵母系统。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列出初唐、盛唐作家

的诗文韵谱，整理出初唐韵系。关于敦煌变文诗文用韵，周祖谟有《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1980年），周大璞著有《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年），张金泉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6年）等。

三、音注材料的研究　运用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从众多的字书、音义书音切材料中整理出注音者的音系，构成中古音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

1.《经典释文》的研究　《经典释文》罗列汉魏晋南北朝经师异读。罗常培著有《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1937年）等多篇论文。吴承仕著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1984年）。陆志韦、林焘著有《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年）。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1980年）对《经典释文》作了全面的校勘。以《切韵》音系为参照，从陆德明音切中可以离析出六朝标准音系。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年）考证出语音系统。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从首音考证出陆德明的音系，主张陆氏音系是以金陵音为基础的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

2.顾野王《玉篇》音系的研究　周祖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年）依据日本沙门空海所作《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考订拟测出《玉篇》完整的音系。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系》（1995年）主张《玉篇》代表六世纪的金陵读书音。

3.曹宪《博雅音》研究　黄典诚的《曹宪〈博雅音〉研究》（1986年）得出"《博雅音》大体和《切韵》一样，都是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的反映"的结论。丁锋《〈博雅音〉音系研究》（1995年）指出《博雅音》记录了梁陈隋之际含有书音和口音的扬州音系。

4.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　周法高著有《玄应反切考》（1948年）、《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1948年）和《玄应反切再论》（1984年），采用反切系联法全面整理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的声韵系统，主张玄应音代表活的长安方音。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80年）也有相同的看法。

5.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31年）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订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认为反切取自元廷坚的《韵英》，反映了跟《切韵》音系不同的唐代关中方言的语音系统。黄氏后来又对此书加以补充修订，写成《唐代关中方言音系》（1998年出版）。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1990年）分40声类，讨论重纽问题，主张慧琳反切音是以当时首都长安为主的士大夫阶层的读书音。

6.颜师古的《汉书音义》音切的研究

近年研究颜师古音切的论文不少，结论共同点多。较有代表性的是钟兆华的《颜师古反切考略》（1982年），认为颜师古声韵系统和《切韵》大同小异，代表了以长安话为中心的关中方音。

7.朱翱反切的研究　朱翱反切反映了晚唐五代的时音。张世禄《朱翱反切考》（1944年）采用反切系联法、王力《朱翱反切考》（1982年）采用反切比较法分别考证朱翱反切的音系，结论颇有不同。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年）以朱翱反切作为构建晚唐五代音系的依据，分声母36个，韵部40个。张慧美《朱翱反切新考》（1988年）着重讨论了重纽问题。张渭毅《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1994年）揭示了朱翱反切在开口、合口韵类的分布和归字上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切韵》的特点。

8. 其他音注材料的研究　严学宭《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1936 年）指出大徐反切跟今传本《唐韵》残卷和《广韵》若干不同的语音特点。邵荣芬的《〈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1964 年）、《〈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1981 年）使用反切比较法，得出跟《切韵》音系大致相同的结论。

参考文献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唐作藩、耿振生：《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张渭毅）

《切韵》研究（"Qie Yun", Studies of）

本世纪的《切韵》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切韵》系韵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切韵》音系的考订和构拟。

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后，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1921 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之于世。1925 年，刘复从巴黎抄回伯希和掠去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卷，收入《敦煌掇琐》。1936 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 10 种《切韵》系韵书。魏建功先后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十韵汇编〉魏序》（1936）、《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1951）、《〈切韵〉韵目次第考源》（1957）、《〈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1958）等论文，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1942 年，姜亮夫把 30 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摹录的韵书总为一编，名为《瀛涯敦煌韵辑》，1955 年出版，并撰有《隋唐宋韵书体式变迁说略》（1943）、《普鲁士图书馆诸北宋刊本切韵跋》（1944）等论文。1968 年，龙宇纯著《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切韵》系韵书，细校详订，是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1974 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还所录韵书的真实面目，有较大参考价值。1983 年出版的周祖谟著《唐五代韵书集存》是唐五代韵书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 30 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代表了《切韵》韵书整理的最高水平。

《切韵》音系的研究分两阶段：考求音类，构拟音值。清陈澧的《切韵考》创造性地运用反切系联法，考证出 40 个声类、311 个韵类，奠定了音类划分的基础。本世纪在考求音类的方法上，又有了新的进展。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1927）运用审音法，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1931）采用统计法，陆志韦《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运用数理法，都弥补了陈澧的不足。全面运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成功地构拟《切韵》的音值，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 年著，1940 年汉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是《切韵》音系的奠基作，也是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后来的《切韵》研究都是它的延续、补苴和发展。围绕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音韵学界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探讨，《切韵》研究的材料丰富了，方法多样了，视野开阔了。相继出版了几部全面论述《切韵》的专著，有李荣的《切韵音系》

(1956)、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黄典诚的《切韵的综合研究》(1994)等。此外，还有多篇论文发表。讨论了音系内部构拟问题，主要有：(1) 高本汉的三等声母〔j〕化说应该取消，论著有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1941)、李荣《切韵音系》(1956)等。(2) 改全浊声母为不送气，论著有陆志韦《汉语的浊声母》(1940)、李荣(1956)等。(3) 修订高本汉的拟音。声母如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把知组声母拟为舌尖后塞音；陆志韦《古音说略》(1948)把照二组声母拟为舌叶音，船禅地位颠倒，船母是擦音，禅母是塞擦音；喻世长《〈世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1984)主张照三组声母读舌叶音。韵母如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1)拟鱼为 io，拟虞为 iu。龙果夫《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1928)、李方桂《切韵 a 的来源》(1932)认为重韵咍(灰)皆、覃、咸、山、耕主元音是 ə 类，泰、佳、谈、衔、删、庚主元音是 ɑ 类。介音没有强弱、辅音性和元音性的区别。马伯乐(1920)、陆志韦《古音说略》(1948)、李荣(1956)等指出，纯四等韵无 i 介音。(4) 重纽代表两种音节的对立，大致可分为四派意见：①主要元音区别说，代表作有陆志韦(1939)、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1945)、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5)等；②介音区别说，代表作有坂秀世《批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李荣《切韵音系》(1956)、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等；③声母区别说，代表作有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李新魁《重纽研究》(1984)、平山久雄《关于中古汉语重纽韵介音的音值》(1991)、竺家宁《试论重纽的语音》(1995)等；④韵尾区别说，有薛凤生的《试论〈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与重纽、重韵等现象》(1995)。此外，重纽跟声调也有瓜葛，平山久雄作有《中古重纽的语音表现与声调的关系》(1977)。总的看来，介音区别说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5) 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赵元任(1941)、纳盖勒(paul Nagel)《论陈澧〈切韵考〉所见〈切韵〉字音的构拟》(1943)、李荣(1956)、邵荣芬(1982)等主此说。(6) 元音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如王力《中国音韵学》(1935)有 18 个，邵荣芬(1982)有 13 个，李荣(1956)有 12 个，王力《汉语音韵》(1963)、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喻世长《〈切韵〉韵母拟音的新尝试》(1989)有 10 个，马丁(Samuel Matin)《古汉语音位》(1953)有 8 个，薛凤生(1995)只有 7 个。(7) 关于《切韵》的性质，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单一音系论者，如李荣《陆法言的〈切韵〉》(1957)认为，“《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2)和《再谈切韵的性质》(1963)，主张《切韵》音系是以洛阳方音为基础的、同时也吸收其他一些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方音)的活音系。黄典诚(1994)则认为，《切韵》音系是历史悠久的洛阳官音移植到金陵后，由文读系统和白读系统交相为用的河洛官音。综合音系论者，如王力《汉语史稿》(1957)认为《切韵》“只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2)进一步指出“《切韵》音系的基础，是公元六世纪南北通

用的雅言"。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认为《切韵》音系以读书音为基础，具有人为的杂凑性。张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5）、《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重申《切韵》是拥有宽广的地理基础的、包容不同方言的音韵区别的综合体。此外，关于《切韵》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张琨、李荣、丁邦新、罗杰瑞、张光宇、何大安等都有重要论著发表，限于篇幅，不再评述。

参考文献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李荣：《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

（张渭毅）

等韵研究 (Dengyun, Studies of)

等韵是传统音韵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它的特点是对音节结构进行精密分析，从聚合关系上为音素（音位）分类并加以描写，以表格形式展示音系组合规律，即等韵图。等韵图的体例颇为复杂，还有不少含混玄虚的术语，所以等韵历来被视为艰涩深奥的学问。到了20世纪现代学者对等韵内容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与阐释，并十分注重等韵图音系在语音史中的作用。

等韵学中术语的解释是一件繁难的工作。古代等韵学的术语概念常常牵扯到阴阳、五行、干支、节令、乐律、方位等，影响到人们对语音的正确理解。要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古音，首先要排除这些玄虚内容的干扰。现代音韵学者对等韵学中具有实质意义的名词进行科学分析。瑞典学者高本汉在构拟中古音系时把等韵学中的"四等"理解为主要元音和介音的区别，是一个重要突破。罗常培的《释重轻》（1932）和《释内外转》（1934）开等韵专题研究之先河。罗氏的《通志七音略研究》和赵荫棠的《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1934）及《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1931）是30年代等韵专书研究的力作。赵荫棠访寻一向不受重视的明清等韵系列著作加以宣扬，对近代音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40年代董同龢著《等韵门法通释》，专门分析等韵的门法。

50年代以后，音韵学教科书或普及读物都把等韵学列为重要内容，如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纲要》、王力的《汉语音韵》、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和《音韵学教程》，分别设专门章节解释等韵概念，介绍等韵理论。80年代由张世禄讲授、李行杰整理的《等韵学讲话》连载于《青岛师专学报》，讲解尤为详细。

1957年出版的赵荫棠的《等韵源流》，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等韵学通论兼通史型的专书。书中对等韵学的起源、发展、变革过程做了详尽阐述，谈到了宋元时代的《韵镜》、《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和明清时代的40种韵图，并且从"南派"、"北派"的角度审视其音系。赵氏擅长考据，多有精当见解；但对宋元韵图的派别划分略有失误，且把与等韵关系不大的《洪武正韵》著录在内也欠妥。台湾应裕康在70年代出版《清代韵图之研究》，内容也较丰富。

80年代以后研究等韵的论著较多。等韵专题研究和专书研究多以论文形式发表。专题研究如俞敏《等韵溯源》（1984）具体分析了韵图与佛门所传"悉昙章"的关系，指出了早期等韵家生搬硬套的弊病；薛凤生

《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1985)指出内转包含高、低两类元音，外转以低元音为主，比前人的解释胜出一筹。专书研究的范围很广，上自《韵镜》，下及清末劳乃宣的《等韵一得》，论文数量之多难于枚举。较重要的如李新魁、孔仲温分别有《韵镜研究》，唐作藩有《四声等子研究》，许绍早有《切韵指掌图研究》。唐作藩的文章不仅分析《四声等子》的音系，也重新论证了它的产生时代，对人们了解韵图沿革甚有启示作用。

这个时期有几种等韵学专书出版。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1983年)内容丰富，分类详细，但因范围广难于深入考究，故疏漏之处亦较多。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是一部断代的等韵学史论，除了从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等韵学的成绩、特点和源流因革，还注重结合现代方音来判别韵图音系的性质。潘文国的《韵图考》(1996)以早期韵图为对象，尝试复原最古老的韵图形态。1990年，鲁国尧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南宋卢宗迈《切韵法》一书的抄本，并对它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考证，了解到宋代除《韵镜》、《七音略》之外还有另一个派别的等韵图，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收获。

参考文献

赵荫棠：《等韵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耿振生)

近代音研究(Phonology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of)

吕叔湘曾经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就语音来说，一些比较重大的音变现象例如唇音的分化、知章庄的合流、以云的合流、浊音清化等也正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到了《中原音韵》时代，语音演变加剧。近代汉语语音起始于晚唐五代而成熟于元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近代汉语语音又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晚唐五代经北宋辽到南宋金为第一阶段，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始成期；蒙古、元代为第二阶段，是近代汉语语音的成熟期；明清为第三阶段，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发展期。

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过去在很长的时间是为读经识字服务的，分析字音，制定字母和等韵图，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等韵学。真正从音系方面来研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的。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王力《汉语音韵学》都堪称发轫之作。尔后，随着音韵学的全面发展，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不断地发掘出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课题，获取新的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热潮。

晚唐五代至宋金语音的研究，从30年代以来，有《敦煌写本守温韵残卷》和《归三十字母例》的刊布和研究(罗常培《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1931)，有利用藏汉对音研究汉语西北方言的(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近年又有对回鹘汉对音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1952；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1979)。藏汉、回鹘汉对音资料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一项重要依据，流传至今可以利

用的资料相当丰富，今后在这方面会有新的进展。

等韵和等韵图的研究，30年代有罗常培的系列文章《通志七音略研究》、《释重轻》、《释等呼》、《释内外转》、《释清浊》、《韵镜源流考》、《守温字母源流考》，40年代有赵荫棠《等韵源流》等。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例如李新魁《〈韵镜〉研究》（1981），唐作藩《〈四声等子〉研究》（1989），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1994）等。研究宋代语音取材于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学术成果不少，早期有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66），陆志韦《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1946）等。80年代以后，有谢·叶·雅洪托夫《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1980）、平田昌司《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与〈切韵指掌图〉》（1984）、竺家宁《论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韵母系统》（1994）等。考察宋词用韵是研究宋代语音的一项重要工作，前辈学者如罗常培早已留心于此，并搜集了不少资料，惜未能完成研究工作。鲁国尧从70年末开始致力于这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有《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1979），《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1981）。金代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和王文郁《新刊韵略》都是当时能反映时音的重要韵书，近年宁继福进行了研究，著有《校订五音集韵》（1992）、《平水韵考辨》等。

元代是近代汉语语音的成熟阶段，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被认为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典型代表，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中原音韵》。早期出版的论著有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陆志韦《释〈中原音韵〉》（1946）。近年来出版的专著不少，有陈新雄《中原音韵概要》（1976）、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周维培《论中原音韵》（1990）、国外有服部四郎、藤堂明保《中原音韵の的研究·校本编》（1958）、司徒修（Hugh M. Stimson）《中原音韵：早期官话发音指南》（英文1966）、薛凤生《早期官话的音韵》（英文1975）（1990年出版的中译本改名《中原音韵音位系统》）。探讨元代语音的另外一种依据就是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出版的专著有竺家宁《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1986）、宁继福《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1997）、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研究》（1997）等。

明清语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等韵学和专书音韵研究两个方面。早期关于明清等韵的研究主要是40年代赵荫棠完成的专著《等韵源流》。80年代以后有很大发展，出版的专著，有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1983）和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就明清时代某一种语音演变现象进行寻源探流的有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1986）。专书研究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点。40年代，陆志韦发表了系列文章《记兰茂韵略易通》、《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记毕拱宸韵略汇通》、《记五方元音》等。近年来有显著的进展，如曾晓渝《论〈西儒耳目资〉的音韵系统》（1995）、金薰镐《从利玛窦、金尼阁的汉语拼音看明代晚期的官话音系》（1994）、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1989）、王平《从〈五方元音〉和〈中原音韵〉的差异看近代汉语语音的发展》（1989）、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研究》（1992）、张玉来《韵略汇通音系研究》（1994）等。近年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对语音资料的运用和方法的更新都作

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杨耐思：《近代汉语音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蒋骥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武汉：湖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杨耐思）

《中原音韵》研究（"Zhongyuan Yinyun", Studies of）

《中原音韵》是元代周德清所编的一部北曲韵书，它从实际口语和杂剧散曲作品的用韵中归纳音系，如实地记录了元代的共同语语音，完全改变了唐宋以来因循于官韵的传统，成为汉语音韵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在传统"小学"里边几乎没有它的地位。《中原音韵》受到音韵学家的重视并从语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0年代之前，第二阶段是50到70年代，第三阶段是80和90年代。

第一阶段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钱玄同、罗常培、赵荫棠和陆志韦等人。早在1918年，钱玄同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的讲义《文字学音篇》就把《中原音韵》作为近600年"普通口语"的代表著作。1932年，罗常培发表《中原音韵声类考》一文，根据《中原音韵》一书的体例特点创立了一套基本的研究方法，并把它的声母考订为20个，这是对该书音系进行详细剖析的开端。1936年，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出版，此书在文献考证方面的成就十分可观，不仅仅是对《中原音韵》本身，而且对于元、明、清时代的重要北音韵书的源流因革、异同得失都有深人考察，这对推动近代北音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赵书在音系的分析和构拟方面较为粗疏，然而它是第一部全面分析《中原音韵》音系的专书，草创之功不可埋没。同年王力著《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专节介绍《中原音韵》，并指出："此书虽为词曲而作，但书中的韵部是以当时北方的语音为根据，可以在语音史上也很有价值。"1946年，陆志韦发表了《释中原音韵》一文，重点是在音值构拟上用力，音值的构拟很细致，此外又在音系性质、入声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如以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以及"《中原音韵》本有入声"等，都与往常的说法有异。

在五六十年代，杨耐思曾经发表几篇文章介绍《中原音韵》的音系，对前人关于音类和音值的主张都提出修订意见；赵遐秋、曾庆瑞、李新魁等人曾就《中原音韵》的基础方音和"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展开讨论；宁继福的《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一文总结了此前各家观点，提出了《中原音韵》有25声母的主张；廖珣英等人考察关汉卿等元曲名家的实际用韵，也是跟《中原音韵》音系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工作。海外的研究以日本人服部四郎和藤堂明保的《中原音韵的研究》（1958）、美国人司徒修（H.M.Stimson）的《中原音韵音系》（1962）和美籍华裔学者薛凤生的《中原音韵的音位系统》（1975）较为重要，其中服部和藤堂的书在校勘上很仔细；司徒修以赵荫棠的拟音作根据，不免根基脆弱；薛凤生立足于严格的音位学，论证周密，有独到的成绩。

80年代的《中原音韵》研究仍然是音韵学里的热门。在几年的时间内有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宁继福的《中原音

韵表稿》（1985）数种专书先后出版。杨耐思定《中原音韵》的声母为31个，韵母为46个，入声调还独立存在，认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是“通行于当时的中原广大地区，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的“共同语音”。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是河南方音，声调中还有入声。宁继福明确指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大都话，实际口语中已经不存在入声调。薛凤生的观点基本上和宁继福相同，此外还有刘静等人撰文重申同样的观点，而这一派的观点也正是王力等学者所一向持有的主流观点。1987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与江西省语言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江西高安召开纪念周德清诞辰71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编为《中原音韵新论》出版，其中仍然对上述问题有争议。1992年，林焘在《语言学论丛》（第十七辑）发表《“入派三声”补释》一文，从周德清编纂《中原音韵》的经过、周德清所处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唐宋以来官韵“平上去入”四声系统在中国文化和历代读书人中间的深远影响等种种因素，周详地论证了书面上的字音分类可以与口语有一定距离，尽管入声调在口语已经消失，而在书面上仍然可以把入声字分列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原音韵》的语言基础问题也基本上随之解决，入声分派于平、上、去是北京地区的语音特征，周德清的书是专为指导作曲而编纂的，他十分重视元曲四大家的作品，其音系必定跟元杂剧的中心大都关系密切，周德清所记录的实际方音应是大都音或其相近的方言语音。

《中原音韵》的研究经过，表明在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解决学术疑难问题往往需要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探索，而汉语史上的具体问题还需要结合社会文化、历史传统、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来全面考虑。

参考文献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耿振生）

明清北音研究（Northrn Speech Soun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udies of）

“明清北音研究”指明清时代共同语以及官话地区各方言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的形成过程、个别语音现象的历时变化和北方话韵书韵图音系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赵荫棠收集并介绍了不少等韵书，其中属于明清北音系统的有明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赵绍箕的《拙庵韵悟》、无名氏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等，使这些一向不受重视甚至湮没无闻的重要文献广为人知。白涤洲的《北音入声演变考》是当时专题研究明清北音的代表性文章，试图清理出北京话以及相关方言中入声字的声调演变过程和规律。40年代陆志韦就《韵略易通》、《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把北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以后，八九十年代的北音研究空前活跃，课题丰富，思路宽广，论文和专著不少。

关于普通话的形成，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1985～1987）具有代表性，对近代北京音各方面的变化过程都有所介绍。

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1984)、林焘《北京官话溯源》(1987)两篇文章主要谈北京音与外围方音的关系。郭力、曹正义、杨亦鸣从明清时代的韵图《等韵图经》、《李氏音鉴》中追寻北京旧音及演变，各有创获。此外，李新魁以为清中叶以前的共同语以汴洛语音为基础、鲁国尧以为明代共同语以南京音为基础，均为新颖见解。

北京话以外的官话系韵书数量多，其中的《韵略易通》、《青郊杂著》、《韵略汇通》、《五方元音》、《拙庵韵悟》等，都有人做过详尽研究。还有些新发现的北音韵图如清代璩万鉴的《等音新集》，也被介绍于世。

专题研究如声母中+ε、+ε'、ε的形成时代，+ε、+ε'、ε的形成过程，韵母中闭口韵尾的消失，ɑ［ǒ］韵母和儿化韵的产生，声调中清入字的分化条件等都有专题研究论文发表。李思敬的《汉语儿［ɚ］音史研究》(1986)，从丰富的文献中找到充足的证据，详细论证了“儿”类字的音变过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明清时代有不少对音资料与官话音系关系密切。明代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仍旧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朝鲜谚文标音的《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目前在中、韩、日三国有数十人在进行研究。清代西方传教士记音的官话书和琉球与汉语对音的官话课本，近年来也不断被发现和研究。

参考文献

赵荫棠：《等韵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陆志韦：《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耿振生）

汉语语音史研究（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Studies of）

汉语语音史是汉语史的一个分支，以上古（甚至远古）到现代的汉语语音发展历史以及语音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清代学者对汉语的语音历史，主要是上古时期的历史，作过阶段性的静态分析，但缺乏科学的语音史观念；现代学者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建立了汉语语音史这一学科。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钱玄同、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学者为建立汉语语音史这一学科体系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个时期的学者注重以先秦韵文和谐声字作为上古音研究的主要材料，以《切韵》音系作为中古音的代表和沟通上古音、现代方音的桥梁，以《中原音韵》音系作为近代北方语音的代表，从而探讨汉语语音变化的规律。董同龢于1954年在台湾出版《中国语音史》，后又修订为《汉语音韵学》于1968年出版。王力于1957年出版《汉语史稿》上册，正式把汉语语音史纳入汉语史这一上位学科中，也是第一部完整的汉语语音史论著，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多少年来，学者们不断尝试突破只以《切韵》音系作为中古音系，深入研究反映汉语各时期语音状况的史料。王力有《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等一系列论文；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有《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李荣有《隋韵谱》等论文；丁邦新有《魏晋音韵研究》等等。王力于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

代，宋代，元代，明清，现代等九个时期研究各期音系及其演变规律，是有意摆脱《切韵》音系的束缚，根据比较明确的史料来建立新的汉语语音史体系的第一部著作。

海外有一些学者试图完全脱离文献资料，凭借现代汉语方言，利用历史比较法建立早期或"原始"汉语方言的音系（如"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原始北方话"等等），进而建立"原始汉语"。这一派观点目前对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参考文献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孙玉文）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Lexic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20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训诂学的复兴和更新　在中国古代，词汇研究是属于训诂学范围的。清代是音韵、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训诂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进入20世纪以后，训诂学却渐趋衰微。这一方面有时代的原因，一方面也和训诂学本身的缺陷有关。20世纪中国的学术改变了以经学为主导的局面，而且受西方的影响，各学科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各有自己的范围、对象、体系、方法。音韵、文字、训诂原是小学的三个分支，都可以说是经学的附庸，进入20世纪后，音韵学、文字学成了独立的学科而继续发展，特别是音韵学，因为接受了西方的语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获得了新的活力。但训诂学却面临危机，这不能不说和训诂学本身的情况有关。因为传统训诂学的内容过于庞杂，和现代语言学的哪一个分支都难以完全对上，不要说20世纪初，就是到20世纪末，人们对"训诂学"的范围和性质的认识都还有分歧；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问题又过于零散，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时候，它的发展当然要落后于其他学科了。所以，除了原属于训诂学的语源学之外，在20世纪的前70年，训诂学的研究显得相当冷落。

当然，这不是说在这70年中在训诂学方面毫无成就可言。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在古代训诂名著的研究方面，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916）、黄侃的《尔雅略说》（1936）和由后人整理发表的《尔雅音训》（1983）、《广雅疏证笺识》（1981）、杨树达《释名新略例》（1925）、骆鸿凯《尔雅论略》（1934）、周祖谟《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1946）等，都有较大影响。在训诂学史和训诂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如下一些著作：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1937）对古代一些训诂专书及其条例作了简要的介绍。黄侃《训诂述略》（1935）对训诂学的范围以及训诂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训诂学界影响很大。齐佩瑢《训诂学概论》（1943）初步为训诂学建立了一个体系，而且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解释一些词汇现象，可以看作将训诂学内容更新的一种尝试。林尹《训诂学概要》（1972）对传统训诂学作了比较好的总结和介绍。

训诂学的复兴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

年代以来，在陆宗达、洪诚、徐复、殷孟伦、黄焯等老一辈学者的推动下，训诂学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大量的训诂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训诂学复兴的标志首先不在于发表论著的数量。80 年代训诂学的复兴，首先是在于训诂学的更新，开始使训诂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通过讨论，深化了对训诂学性质、任务的认识。在这方面，虽然各人的具体意见还不一致，但从大的方面讲，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即：训诂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郭在贻语），但"古代"不能限于先秦两汉，而要扩展到魏晋以下；"解释"不能仅仅停留于词语考释，而是要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探索词汇、词义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训诂学，就不同于古代的训诂学，而是一门现代科学。（二）一些学者致力于克服传统训诂学的缺点，使训诂学理论化、系统化。在这方面，王宁的思考是相当深人的。《训诂学原理》（1996）一书汇集了她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她一方面对传统训诂学的一些比较模糊的术语作了明确的界定或是分析、补充，一方面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来分析传统训诂学的材料，并对一些问题作了深人的理论探讨。其他的一些训诂学专著，如洪诚《训诂学》（1984）、张永言《训诂学简论》（1985）等，也都有新的内容。

80 年代以后对古代训诂名著的研究和整理主要有：徐朝华《尔雅今注》（1987）、张舜徽《郑学丛著》（1984）、李增杰《广雅逸文补辑并注》（1993）等。训诂学史有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1986）、赵振铎《训诂学史略》（1988）。这两部训诂学史和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相比，显然有了较大的进展。

二、语源学研究的进展　传统训诂学中的"声训"、"右文说"与语源的研究有一定的关系，清儒的"因声求义"、"声义同源"的论说也为语源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 20 世纪的汉语语源学的研究是受到西方语言理论特别是 etymology 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并且渐趋成熟的。

20 世纪汉语语源学的第一部著作是章太炎的《文始》（1910）。《文始》按上古韵部分为九卷，每卷中列出"初文"和"准初文"若干，全书初文、准初文共 460 条，这就是"语基"（即通常所说的"语根"）。由同一"语基"经过"变易"和"孳乳"，通过各种音转关系，演变出来的一组词就是同源词，全书共收同源字五六千字，为汉语同源词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文始》以《说文》中的独体字为"初文"、"准初文"，作为"语基"，实际上仍是"拘牵形体"。而且，《文始》的语音通转过宽，"旁转对转，音理多途，双声驰骤，其流无限"（《文始·叙例》），几乎无所不转；而"变易"、"孳乳"的方法有时也用得太滥，把一些毫无关系的字看作同源字，这也是一大缺陷。

在语源学的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还有杨树达和沈兼士。杨树达的语源学方面的论文多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和《积微居小学述林》（1954）。虽然他对语源的研究多以文字的声旁为依据，但也能从通假的角度打破文字形体的束缚，而且他熟悉古代文献资料，论说往往信而有征。沈兼士的力作是《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3）。这篇文章对宋代以来的"右文说"加以总结，对"右文"（音符）与文字所表示的意义的种种复杂关系加以分析归纳。他由音符求语根，认为语根不等于字源，这比章太炎的《文始》高明。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于 1934 年发表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张世禄译成中文，名为《汉语词类》，1935年出版。他研究汉语词族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基础作“印度支那(Sinitic)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此书按语音分为10大类，每类中又把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字归为一个词族。他的10大类只从起首辅音和韵尾辅音分类，介音、元音的转换过宽，意义相差甚远的字也勉强牵合，所以研究并不成功。

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汉字语源字典》(1965)共收3000多汉字，分为223个“单字家族”，按上古韵部系统排列。此书主要依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在字形上参照了甲骨文、金文，对汉语语源研究有参考价值。

王力《同源字典》(1982)一方面根据古代的训诂（互训、同训、通训、声训）来判断同源字，另一方面指出“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这样，就避免了音转过宽、勉强牵合的弊病。尽管此书还有不足之处，但在本世纪的语源学著作中可以称得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90年代的汉语语源学著作有廖海廷《转语》(1991)、任继昉《汉语语源学》(1992)、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1998)等。

三、古汉语词汇研究范围的扩大　这里说的“古汉语”，指的是从殷商至清代的汉语，包括现在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在这漫长的3000多年中，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个时期的汉语词汇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但20世纪以前，小学主要是为解经服务的，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先秦的典籍。“俗语词”的研究也有一些，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之类，但为数不多，也不受重视。由此出现了一种怪现象：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包括汉语的研究者）对先秦的词语还比较熟悉，对汉魏以下的俗词语反而陌生。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重视“近代语”的研究。黎锦熙连续发表了《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8)、《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29)等文章，呼吁加强对近代语（五代北宋、金元、明清时期的活语言）的研究。在5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著作有胡朴安《俗语典》(1922)、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但水平都不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初版)。这两部书都以十分丰富的语言资料作基础，释义精当，受到学术界高度的评价。特别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十几年间五次增订，增加了大量的材料，研究方法也比《诗词曲语辞汇释》更加科学，不仅仅是在排比归纳的基础上释义，而且进一步说明引申、通假、音转等关系，对虚词的语法功能的表述也比较准确。

经过20年的沉寂后，到80年代，“俗词语”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最先出版的一本俗词语研究的专著是王瑛的《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此书不但对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有所补充，方法上也有所前进。郭在贻在撰写大量俗语词考释的论文的同时，在《训诂学》(1986)一书中用专章（第九章）《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论述了俗语词研究的问题。书中明确提出，汉魏六朝以下的词汇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而且对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与现状、材料和方法以

及展望等作了详细论述。这和半个世纪以前黎锦熙的倡议遥相呼应，而且适逢80年代中国文化的复苏时期，所以对俗语词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一时期，俗词语的研究空前活跃。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明清，各个时期的汉语词汇都有人作了研究。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词语考释的文章，编纂了一批专书词典和断代语言词典。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词语考释的途径渐趋多样，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如郭在贻对六朝词语、唐宋词语的考释，项楚对敦煌变文、王梵志诗词语的考释，不但材料丰富，结论精当，而且其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方法都为研究者树立了榜样。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黎锦熙提倡近代语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阅读欣赏唐诗、宋词、戏曲、小说等作品，那么，80年代以后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除了这个直接的实用的目的以外，还多了一点汉语词汇史的眼光，即词语考释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特别是口语词汇）的面貌，以及各个时期之间的发展变化。所以研究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一切反映口语的材料都受到重视。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佛典，唐宋的禅宗语录，也能从中更多地看到了当时口语词汇的真实面貌（虽然其中的词语有其特殊性），同时，在吕叔湘关于“近代汉语”上限从晚唐五代起的说法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之后，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从“古代汉语”（主要指先秦汉语）到“近代汉语”不是突然的飞跃，因此提出了把东汉——六朝作为“中古汉语”加以研究的设想。佛典、禅宗语录的研究以及汉魏六朝语言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深入，但可以预言，这种“汉语史”的眼光对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的影响将会是十分巨大的。

20世纪在上古汉语（殷商、周代、西汉）的研究方面也有进展。主要表现为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对先秦典籍中的词语重新加以解释。于省吾以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深厚功力来研究先秦古籍，在先秦词汇研究方面有不少创获，他的成果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新证》中。丁声树《诗卷耳芣苢“采采”说》（1940）把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结合起来考定《诗经》中的词语，也显示出20世纪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新的途径。80年代以后，先秦典籍如《诗经》、《论语》、《左传》等专书词典的编纂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20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中不能不提到两部大型的字、词典：《汉语大字典》(1990出齐)、《汉语大词典》（1993出齐）。这两部书虽然还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毕竟宣告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编纂的大型汉语字典词典的时代的结束，功不可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两部字、词典在释义方面吸取了历来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也为数量极为巨大的汉语字、词提供了丰富的书证，对于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四、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　词语考释是词汇研究的基础工作，但不是词汇研究的全部。汉语历史词汇的主体工程是汉语历史词汇学，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1. 历史的研究。即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描写以及汉语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2. 理论的研究。即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两部分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应该是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但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947年，王力写过一篇《新训诂学》，文中说：“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即使不顾全部历史

而只做某一时代语义的描写（例如周代的语义或现代的语义），那就等于断代史，仍旧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到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文中又用很大篇幅谈到“研究语义的产生及其演变”以及演变的规律（如：扩大、缩小、转移、加重、减轻等）。虽然用的名称不同，王力所说的“新训诂学”实质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汉语历史词汇学”。可以说，“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主体工程的设计，早在40年代就有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在20世纪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说来，还有很多路程要走。

先说历史的研究。这是词语考释代替不了的，通过词语考释弄清楚各个时期的词汇的面貌，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但词语考释毕竟还构不成词汇史。这也是训诂学代替不了的，训诂学自有它自己的任务和方法，它和词汇史的研究相关，但不同于词汇史。到目前为止，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还很薄弱。王力《汉语词汇史》（1984完稿）、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1989）、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1989）为汉语词汇史的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向熹《简明汉语史》中的词汇部分也颇有新意。但和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相比，汉语词汇史显然是比较薄弱的。词典编纂方面，我们还没有一部《汉语历史大词典》，这样一部词典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材料汇集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再看理论的研究。这在20世纪有一些进展。如齐佩榕《训诂学概论》中谈了语义演变的方式，并对语源、语根、转语、反训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王力《汉语史稿》（1958）中的词汇的部分，对“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1981）等论著对一些词汇理论问题作了探讨。80年代以后，关于词汇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许嘉璐的“同步引申”、蒋绍愚的“相因生义”、孙雍长的“词义渗透”从不同角度观察到了词义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比以往只着眼于单个词语的词义发展变化前进了一步。另一个突出的进展是把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汉语词汇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一些问题，1989年出版的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和周光庆《古汉语词汇概要》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此外，作为词汇理论的核心问题，词义的问题在80年代以后讨论得比较深入，苏新春《汉语词义学》（1992）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了较好的总结。但是，总的说来，关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还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附带说一说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语言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从文化来研究词汇，以及从词汇来研究文化，都是大有可为的。王力《新训诂学》就谈到了语言与文化史的关系，举的例子都是词汇。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主要也是根据词汇谈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相当深入。80年代以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兴起，有不少学者就古汉语词汇和汉民族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为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新的领域。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两种倾向是要防止的。一是浮泛。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发表一些未加论证（有的是无法论证）的空论，这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无益的，有时是有害的。二是夸大。不恰当地夸大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认为一切词汇现象都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明，这非但会导致全盘否定从语言系统本身对古汉语词汇所作的研究，而且给文化语言学加上了无法完

成的任务。这也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正确的做法是把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用谨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这样才能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起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何九盈：《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许嘉璐、朱小健：《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黄永武：《六十年来之训诂学》，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湾：正中书局，1972。

（蒋绍愚）

训诂学研究（Chinese Etymology, Studies of）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主要以研究古代书面语言为内容的专门学问”，在古代是我国传统的“小学”门类之一。20 世纪的训诂学，走过了由衰落到复兴的艰难历程。

19 世纪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及文化制度的东渐，极大地动摇了“国学”的根基，使得一向作为经学附庸的训诂学成了无本之木，迅速衰落下去。这一时期的训诂学家首推章太炎、黄侃。章太炎于 1907 年在日本东京办国学讲习会，著《文始》（1910）等。《文始》是本世纪第一部语源学著作。它以声转为理论，以《说文》为根据，取《说文》之独体字、半独体字为初文、准初文，共 510 字，以此为纲，统摄五六千字，分析文字的变易与孳乳关系。其贡献是，“令人看见了词汇不是一盘散沙，词与词之间往往有某种联系，词汇也是有条理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其缺点是：初文、准初文的确定欠科学，把初文当词根，混淆了字与词的界限；释义全依《说文》，《说文》释义有误的，亦强为之解。章太炎的弟子黄侃 20 年代即在高校开设训诂学课，他的《训诂述略》，号称纲领性的文献。40 年代，出现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训诂论著，试图以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对传统训诂加以改造。王力在《理想的字典》（1945）中客观地评价了古代近代字书的优缺点之后，提出理想的字典应做到的三件事：（一）明字义孳乳；（二）分时代先后；（三）尽量以多字释一字（按即解释出语法功能来）。在《新训诂学》（1947）中，有对“旧训诂学的总清算”，也有建立“新训诂学”的主张，指出：“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到了那时，训诂学已经不复带有古是今非的教训意味，而是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了。”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是现有概论性质的训诂书中较好的一种。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学术界“左”的干扰不断，大批判的口号不绝，训诂学几成绝学。30 年间，只有殷孟伦的《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1957）、王力的《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等文章和陆宗达的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训诂浅谈》（1964）。

十年动乱结束后，百废待兴，而训诂学的复兴即始于斯时。1979 年秋，南京大学的洪诚受教育部委托举办训诂学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教学科研力量；1981 年成立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是较早的学术团体；1982 年召开了全国高校训诂学教材编写经验交流会，影响所至便是 80 年代出现的训诂教材热。

属于通论性质的训诂学著作，本世纪大

约出版了30多部，其中大部分是80年代以来应教学之需编写的。这对普及训诂知识，培养训诂学研究人才，无疑是有一定作用的。而几部或开风气之先、或在理论与实践上具独创性的著作，至今仍为人所乐道。如陆宗达的《训诂简论》（1980）以资料丰富、论述简明、深入浅出为特征；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1980）以注重基本知识的介绍见长；洪诚的《训诂学》（1984）是作者多年进行训诂教学与研究的结晶，该书的写作目的，是企图紧密结合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提出一些重点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前人经验，阐述训诂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内容侧重以实例进行方法上的启发，而避免单纯地引述前人的议论”。全书紧紧围绕“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这一核心展开论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同类著作中突出的一部。郭在贻在《训诂学》（1986）中提出了“独创性和实用性这两个性，作为自己力争达到的指标”。认为“居今日而讲训诂学，必须为今天的读者所乐于接受和易于掌握，必须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工作服务”。（见该书“后记”）作者在书中所举大量例证，大都是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真知灼见迭出，令人折服。而“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一章，冲破训诂学为经学服务的樊篱，扩大了训诂学的研究范围。这在概论性的著作中，更是首倡。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1985）将丰富的语言资料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论述“为什么需要训诂学”及“训诂学和方言学”、“训诂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关系，简明扼要，说理透彻。王宁的《训诂学原理》（1996）汇集了作者近十来年间有关训诂学的系列论文，经过整理，分门别类，各篇论文相互联系配合，形成一部有严密系统的理论专著。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该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放在训诂原理的探讨上，放在自觉的、可操作的训诂方法的完善上”。作者国学根基深厚，又熟悉语言学理论，且善于将训诂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而对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的转化，对训诂学在现代语言学科中的定位，都有重要作用。

古籍的整理研究，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本世纪50年代以前，虽然有些学者对某些古籍做过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都属零散的个人行为；从1958年成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开始，古籍整理才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之路；而取得丰硕成果，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1981年，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了部署。1983年，全国高校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建立。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间点、校、注、译的各类古籍有上千种。其中今注今译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用白话注古书，用语体文译文言，对古籍的普及，对提高国人的传统文化素质，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些精心用力之作，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王宁主编的《评析本白话十三经》《评析本白话诸子集成》、许嘉璐和梅季坤任主编的《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等，都受到好评。今注今译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选题重复，浪费人力财力。有些古籍，为之今注今译的不下十多种，其中多是“炒冷

饭"，有的甚至是抄袭；二是质量不高。真正做到注释准确无误、译文"信达雅"的微乎其微。不少缺乏训诂学常识的人，甚至学过几篇文言文的人也来赶时髦凑热闹，搞出的注译错误百出甚至千出，是难免的了。

对同源字的研究，继章太炎的《文始》之后，王力的《同源字典》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王力是现代语言学大师，在汉语史和语言学各领域都有开创性建树。《同源字典》书首的"同源字论"，是纲领性的文献，对何谓同源字、如何从语音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同源字的研究及其作用，都加以详尽论述。字典正文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古韵分为三类 29 部，各韵部之下依 33 声纽列出同源字组，字组之内大量引用古人的训诂，这样从音、义、故训等多方面证明其同源关系，令人信服。该书的不足之处，一是把一些本来存在同源关系的词排除在同源词之外，二是没能为所收各同源字组归纳出共同的核心义。

对近代汉语特有的词汇，主要是俗语词，以解经为主的传统训诂学很少予以关注。本世纪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话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俗语词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50 年代以前，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胡朴安的《俗语典》(1922)、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对俗语词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 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前者收集唐诗宋词金元戏曲中的特殊词语 600 余条，主要采用排比归纳法，旁征博引，诠释其意义，剖析其用法，结论大都比较可靠，影响很大，深受读者欢迎。其缺点是，有些语词的释义过细，缺乏语法观念，注意语音关系不够，致使有些解释不够恰切甚至出现错误。后者所释虽为敦煌变文中的词语，但所引材料不限于变文，而是广泛涉及唐宋诗词、笔记、小说、史书、佛经、语录等；研究方法也较前者更为科学，释义的概括性，通假、音转关系的阐释以及虚词语法功能的说明，使此书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俗语词的研究空前活跃，有见地的考释文章在刊物上时有所见；一些专著也陆续出版，如王锳的《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1～4)(1983～1990)，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1985)，江蓝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1988)，蔡镜浩的《魏晋南北朝词语汇释》(1990)，袁宾的《禅宗著作词语汇释》(1990)，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2)，李维琦的《佛经释词》(1993)，王贵元、叶桂刚主编的《诗词曲小说词语大典》(1993)。

参考文献

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黄侃：《训诂述略》(1928)，《制言》1935. 7，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陈　涛）

汉语词汇史研究 (Lexicological History in Chinese, Studies of)

中国古代语言学对词汇的历史研究只有个别的、零星的论述，缺乏系统的研究。王力 1946 年在《新训诂学》一文中首次倡导进行语言史的研究。1956 年王力《汉语史稿》(下册) 出版讲述汉语词汇史，是在总结前人和他本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

语词汇史著作。王力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构筑了汉语词史的框架和体系，在汉语词汇的几个重要方面理清了它的发展脉络，用新的语言学理论说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全书分为八节，前三节叙述汉语词汇发展的概况，后五节用历史的观点叙述语义学方面的几个问题。1983 年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的基础上完成了《汉语词汇史》。这部著作材料更加丰富，更注意词汇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书中用两章叙述汉语受外民族语言的影响，用三章叙述汉语对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的影响，更开阔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视野。王力这两部词汇史方面的著作，奠定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初步基础。

1989 年又有两部汉语词汇史方面的著作问世。一是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一是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这两部词汇史的框架与王力的书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主要不同有二：一、两书分期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词汇以及社会对词汇发展的影响，并展示其特点；二、两书都将构词法放在词汇史的范围之内。史氏的书特别注重社会发展对词汇发展的影响，在讨论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的特点时，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潘氏的书在论述各种语言现象的同时，注意捕捉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并进行充分的探讨和阐述。两部著作各具特色。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三书也有明显的区别。王力主张汉语必须分期，这样可以使汉语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清楚，分期的标准或根据应该是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史存直不主张分期，他认为语言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没有自然的 阶段。尽管理论上如此认识，但在具体作法上，王力的词汇史并没有按他所分的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去叙述，而史存直在分析社会发展与词汇的新陈代谢时却把词汇的发展分成了五个阶段，即甲骨文时代、周秦时代、汉魏六朝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潘允中的词汇史分期与王力基本相同，只是上古与中古的界限有些差异。

1993 年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出版。其中汉语词汇史部分是按照汉语分期分别叙述的。这与王、史、潘三家的书在框架上是不同的，向氏的汉语史分期与王力基本相同，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起讫时间也大体一致。向氏所阐述的汉语词汇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显然是受了上述三家的影响，但吸收了当时汉语词汇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成果，内容大大丰富了。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完善的、科学的词汇史体系的建立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对具体词汇的历史发展研究，对专书词汇的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对具体词汇历史发展研究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如郑奠的《汉语词汇史随笔》考释了 30 多个词的构成和意义演变，又如关于“闻”字、“脚”字意义演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汉语词汇极其丰富，这些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专书词汇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刚刚起步，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但我们相信，随着专书词汇研究及各个时期词汇历史发展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随着人们对汉语词汇理论理解的不断加深，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一定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王力：《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第 11 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张双棣）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Lexic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Studies of）

20世纪中叶以前，汉语历史词汇学还没有建立，上古汉语词汇研究隶属于训诂学，与文字学的界线也不甚清楚。1947年王力发表《新训诂学》一文，指出“从历史上观察语义的变迁”，“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历史词汇学的核心部分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1958年王力《汉语史稿》下册出版，初步勾勒出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轮廓。断代研究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历史词汇研究的主流。考释上古文献中难懂的语词、对前人故训给予重新解释或修订辩证以求确诂，一直是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方面。专题研究，专书研究则是本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特色。

语词考释 继承清人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并参证古文字材料，对个别字词或相关的一系列字词加以考释，是50年代以前上古汉语词汇研究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文章数量可观，其中很多都具有探讨语源的性质。郭沫若等古文字学家研究甲骨文、金文，识读古文字材料的同时，探明了不少语词的本来意义或最初用法。丁声树《诗卷耳芣苢“采采”说》（1940）是修订经传故训的代表作。该文通过对《诗经》没有动词重叠用例的考察，否定毛传陈说，认为“采采”是形容芣苢茂盛之词，已成不易之论。语词考释随着对传统训诂方法的超越以及词汇理论研究的深入，在解决经典文献中许多聚讼纷纭的故训问题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专题研究 1. 同源词研究。章太炎《文始》（1910）是本世纪探讨词源的发轫之作。章氏引进西方语根学说，把《说文解字》中象形指事的独体字制成初文、准初文表，再利用其9类23韵部的上古语音系统的音转关系系联由初文、准初文变易、孳乳而出的同源词。瑞典学者高本汉（B. Karlgran）为进行汉藏语比较研究，著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1934）一书，在国内外均颇有影响。三四十年代杨树达根据形声字声中有义、形声声类有假借等原则写了大量探讨词源的文章，多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二书中。沈兼士40年代推阐右文说，也写有一系列词源学文章。80年代王力在建立起11类29韵部、32声母的上古音系统之后，克服前人音转过宽、失于泛滥的缺点，严格按照同源词必须是语音相同或相通、语义相同或相关、有文献证明确系同出一源的原则，写出《同源字典》（1982），使汉语词汇聚族而居的系统性特征得以显现。严学窘七八十年代发表的研究同族词的文章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严氏所谓同族词就上古汉语而言实即同源词。2. 同义词研究。杨伯峻《从上古汉语几组同义词的考察试探在词汇方面古今分合现象的规律》（1956）一文，把同义词与词汇发展规律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不局限于同义词本身，拓展了同义词研究的视野。蒋绍愚（1989）利用上古文献资料，引入义位、义域等概念，解决了同义词研究中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使同义词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下去。3. 语词构形研究。联绵词在汉语语词构形发展中有着特殊意义。清人已有研究。本世纪初王国维所著《联绵字谱》是一部承上启下之作。其后许多文章对上古文献中的联绵词以及叠音词进行了考察。界

定过宽，是前期联绵字研究的通病。曹宝麟《诗骚联绵字辨议》（1989）认为先秦叠音词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联绵词，有些本为同义复合词，由于单字因假借而写法不一，使两单字之间失去语义联系而被误认作联绵词。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1980）认为先秦双音词经历了音变造词（如联绵词）、音变造词向语法造词过渡（如双声叠韵的同义合成词）、语法造词三个阶段。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内部原因是80年代以来语词构形研究的重点。减轻单音词语义负担，克服同音现象以增强交际效能是值得重视的观点之一。

4．甲骨卜辞词汇研究。王绍新《甲骨卜辞时代的词汇》（1980）综述了甲骨卜辞的词汇面貌。赵诚《甲骨文之词义系统探索》（1991）、《甲骨文动词探索》（1991）等一系列文章对商代词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赵诚把一些稳固性很强的基本词汇放到它们各自所属的不同时代（如商代和周秦时代）的语义系统中去分析比较，发现这些基本词汇在词义上存在着细微的古今差异。

专书研究　专书词汇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兴起的。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1989）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书不仅展现了《吕氏春秋》的词汇面貌，同时也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发展中的一些一般特征。向熹《诗经语言研究》（1987）、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1995）分别考察了《诗经》和《韩非子》中的词汇状况。编纂专书词典既是专书研究的基础，又是研究成果的具体反映。向熹、张双棣等分别编有《诗经词典》（1986）和《吕氏春秋词典》（1995）。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1989）、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1989）、向熹《简明汉语史》中编《汉语词汇史》（1993）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概貌，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无论是语词考释、专题研究，还是专书研究，注重资料的穷尽性调查和严格的定量分析是近年来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征。对现代语义学某些理论和概念的运用，使近年来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加强专书研究、常用词演变研究、不同阶段的词汇系统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张　雁）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Lexicology in Middle Chinese，Studies of）

所谓“中古汉语”，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认识。我们参考前辈时贤的意见，把它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

较早措意于汉魏六朝语词的，有历代关于这一时期作品的注释，唐宋以来的考据笔记，以及清代学者所编的《通俗编》、《恒言录》等资料性质的书。但就总体上看，还都算不上系统的研究。真正从汉语史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语言作研究的，严格地讲，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但早在三四十年代，吕叔湘就对《三国志》中的词语作过考释（见《语文杂记·读〈三国志〉》）；周一良也对六朝佛典中的词语作过研究（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论佛典翻译文学》等文），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50年代以后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前30年和后20年。在前30年中，有关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涉及的研究著作有两类：一类是从整个汉语史角度作研究的，这就是王力写于50年代的《汉语史稿》，《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在全面论述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时，对先秦及汉魏六朝、隋唐时期若干词语（主要是常用词）的演变、佛教借词和译词等作了垦荒式的研究。另一类是词语考释专著，即1954年初版的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1959年初版并屡经修订的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汇释》重在解释唐宋以来的诗词曲语词，少数条目征引了唐以前的例子。《通释》从纵横两方面对敦煌变文词语作了考释研究，溯源工作相当出色，许多唐宋口语词的源头都上溯到汉魏六朝。

本世纪最后30年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逐渐走向新天地的时期。1979年第4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了徐震堮《〈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对《世说新语》中许多“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作了解释。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古汉语词汇领域发表的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此后这方面的成果源源不断。

沿着《汉语史稿》的路子而有所建树的著作有：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全书分八章，对包括汉魏六朝词汇在内的许多词汇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全书共有五章，其中第二章社会发展和词汇的新陈代谢、第四章构词法的发展等章节都讨论了汉魏六朝的词汇问题。两书都出版于80年代末。向熹《简明汉语史》是90年代问世的，中编《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一节很见功力，不愧是后出转精之作。此外，程湘清主编的《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等一批单篇论文也值得重视。

从训诂学角度作研究的，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郭在贻《训诂丛稿》、《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等。周书看似和语言无关，实际上全书考释六朝词语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释允当；郭在贻的两本书中都有一些论文是专释汉魏六朝词语的，考释的难度较大，结论大抵可信。在郭著《训诂学》一书中，作者专辟“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一章，突破了传统训诂学的藩篱。

近10多年来，由于语言学界的重视，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队伍较以往更加壮大，研究也更为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成果的类型上看，有专以某一类文献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小说有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佛经有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李维琦《佛经释词》、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梁晓红《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教词汇研究》；史书有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诗歌有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等等。研究的门类已经比较齐全。

有以某一专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世说新语考释》、冯春田《〈文心雕龙〉语词通释》。专书词汇研究是断代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

也有通释这一时期语词或对语法问题作全面研究的：如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董志

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等。方一新、王云路还仿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之例，编著了《中古汉语读本》。专著之外，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著名而又有中译本的有：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汉语史通考》、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等，都是兼跨中古和近代的著作，给我国学者不少启迪。

本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对"中古汉语"的起讫分期、特点等还须结合语音、语法两方面的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有关常用词演变的研究相对薄弱；类似程湘清等《论衡索引》、日本学者辛嶋静志《〈正法华经〉词典》这样的语料建设书籍还太少，这些都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或改进。

参考文献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郭在贻：《郭在贻语言文字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方一新）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Lexicology in Modern Chinese，Studies of）

关于近代汉语的上下限，目前还有不同说法，这里把它暂定为晚唐五代到清初。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在20世纪以前的古代的字书、唐宋明清的笔记、杂著、《通俗编》、《恒言录》、《迩言》以及本世纪初的《俗说》（罗振玉）、《俗语典》（胡朴安）等著作中均有涉及，但大抵属于寻找出处、抄撮成义的资料汇编性质，不成系统。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平行而又互有交叉的发展道路。

一条是宏观研究之路，以综论性著作为代表。早期有王力《汉语史稿》等通论汉语发展的著作。向熹《简明汉语史》是继《汉语史稿》之后在汉语史通论方面的新成果。该书取材广泛，研究博洽深入，中编《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一章重视运用口语材料来说明词汇的发展，用力甚勤。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是国内第一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填补了空白。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系统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入门书；他的《古汉语词汇纲要》也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都对包括词汇在内的近代汉语研究的诸多方面作了论述，《纲要》所论尤详。此外，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等许多单篇论文也值得重视。

另一条是微观研究之路，以考释性著作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两部著作。1954年，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问世。全书取唐诗、宋词、元曲"字面生涩而义晦""字面普通而义别"两类特殊语词（口语词）作释，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1959年，蒋礼鸿出版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开辟了近代汉语研究新领域——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通释》初版仅57000千字，此后作者不断修订增补。最新一版（增补定本）凡412条，436000字。作者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变文中的疑难语词，因声求义，考释源流，进而把语词研究纳入词汇史的范畴，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的又一座丰碑。

与二书性质相近的还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等也都各具特点。此外，戴望舒著、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孙楷第《沧州集》、王季思《玉轮轩曲论》、钱南扬《汉上宧文存》、许政扬《许政扬文存》等著作也都有解释宋元明口语词的内容。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包括语言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事业的复苏，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也迎来了新时期，陆续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诗词曲、笔记小说、禅宗语录等方面，出版了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近代汉语释词丛稿》、段观宋《文言小说词语通释》等；王锳、曾明德还把散见在报刊上的单篇论文收集起来，编成《诗词曲语辞集释》出版。

敦煌文献语言文字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下面这些：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郭在贻《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黄征《敦煌语文丛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等。敦煌学的兴起、繁盛是20世纪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之一，而敦煌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专书词汇研究方面，出版了胡竹安《水浒词典》、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辞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等。

在个别词语研究的基础上，断代语言词典开始出现。较早有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虽有缺点，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90年代，由刘坚、江蓝生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鲁广顺）、《宋语言词典》（袁宾等）等系列断代语言词典相继问世，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收获，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在编纂断代语言词典、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纂高质量的《近代汉语词典》，做好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应当成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选录5世纪至16世纪内接近口语的早期白话作品，加上题解性的说明和注释，既是普及性的，更是研究性的。刘坚、蒋绍愚主编，分卷出版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不仅是研究语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词汇的可靠材料。

海外特别是日本学者中有关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著作不少，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发起成立了“日本禅籍俗语言研究会”，我国有许多学者参加。该组织除了交流信息和资料外，还创办了《俗语言研究》杂志，至今已经出版了四期。

（王云路）

古代专书词汇研究（The Lexical Old Chinese Monographs, Studies of）

对某一部古代典籍的词汇进行研究，肇始于本世纪50年代。像杨伯峻《论语译注》（1958）所附“论语词典”那样的专书词典的编撰，本身也包含着对词汇的研究，只是由于体例所限，专书词典对词汇的研究是零散的，难以进行系统的宏观的阐述。

向熹的《诗经语言研究》（1987）第四

章“诗经的词汇”首次对《诗经》词汇的几个重要方面作了客观的描写，讲到《诗经》的单义词和多义词，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同义词，复音词，还比较了《风》、《雅》、《颂》词汇运用的差别和特点，以及《诗经》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这是对古代专书词汇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描写。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1989）对《吕氏春秋》的词汇作了全面系统的描写，主要内容是对《吕氏春秋》的基本词汇、词的多义性、词类及其活用、词的书写形式等以及词的结构、意义系统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的探讨。《吕氏春秋》有单音词、复音词约5000个，作者对这5000词的语音形式、意义系统、语法特点都逐一进行过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具体数据。魏得胜的《韩非子语言研究》（1995）中也谈到《韩非子》词汇的一些问题，其中对新词新义作了讨论，尤其是分析了表现韩非核心思想的语义网络作了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对一部专书的某类词进行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是研究专书虚词的重要著作，受到学术界重视；她的《左传范围副词》（1994），在研究思想与方法原则上都有所创新，从语法、语用、语义三个方面对每个范围副词详加分析，是本书的最大特色。而计算机手段的采用，则标志着高新技术与传统内容的结合。此外，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1994），重点考释了《世说新语》一书中出现的新词及新词义，也有不少创见。

（陈　涛）

古代专书词典编纂（The Dictionary Compiling of the old Chinese Monographs, Studies of）

编撰古代专书词典，起步较晚。本世纪50年代，杨伯峻撰述《论语译注》之先，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1958年出版《论语译注》时，把“词典”未定稿加以整理，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及用例，附于“译注”之后。该词典的优点是简明扼要，词义频率的统计、词类的标注更是首创，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论语》的词汇面貌。不足之处是，《论语词典》因与《论语译注》“交相为用”而缺乏独立性，体例及内容也只是粗具轮廓。杨伯峻编著的《孟子译注》（1960）附有《孟子词典》，编写目的、体例等与《论语词典》相同。杨伯峻、徐提编的《春秋左传词典》（1985）也是与《春秋左传注》相辅相成的，不过已经独立成册了。该词典多义词义项的确立有的缺乏概括性，排列也缺乏系统性，而且缺少频率的统计，是主要缺点。

向熹《诗经词典》（1986）从内容到编排都很有特色。该词典收录《诗经》所有2826个单字为字头，复音词语近1000条排在相关单字字头后；且于义项下标明出现次数；单字字头除用汉语拼音字母注现代音外，还注明字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对了解《诗经》的语音全貌很有帮助。词典正文后附有《诗经》原文及用韵，便于核查。缺点是：“（一）罗列众说，不分良莠。”“（二）对一个词的解释，多至十几个义项。”（《诗经词典》王力序）

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1993）是在完成了《吕氏春秋译注》，编制了《吕氏春秋索引》的基础上撰写的。该词典收录《吕氏春秋》全部单音词2972个，复音词2102个，以及凝固格式91条；按上古韵部、上古声母编排，单音词条标有现代汉语拼音、中古音；按词性列义项，并标明该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采用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将音韵、词义、语法熔为一炉，是颇见功力的。

不足之处是，有些多义词的义项确定有过细的倾向。

《世说新语》在汉语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为之编著的词典有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的《世说新语词典》，都很有价值。

随着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兴起，几部重要的古白话小说的词典也陆续编出。如周汝昌主编的《红楼梦词典》(1987)、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辞典》(1988)、胡竹安的《水浒词典》(1989)、李法白与刘镜芙的《水浒语词词典》(1989)、白维国的《金瓶梅词典》(1991)，都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陈　涛）

《尔雅》研究（"Erya", Studies of)

《尔雅》是古代一部训诂名著，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存最早《尔雅》注本为晋郭璞注，清代研究《尔雅》的学者很多，以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最为通行。

本世纪比较全面研究《尔雅》的学者当首推黄侃。黄氏的《尔雅略说》(1936)总结了前代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门径，明确指出研究《尔雅》要以《说文》和古音学为基础，要正文字，明古音。黄氏还拟就郝懿行《尔雅义疏》作订补，已写就评语10余万言，强调要以声音通训诂，40年后由其侄黄焯辑取校语中有关音训者数百条辑成《尔雅音训》(1983)一书。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1913)在《尔雅》名物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王氏总结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名的若干具体条例，又通过事物名称之间在语音方面的联系进行考索，对人们认识草木虫鱼鸟兽命名的规律有不少帮助，对古汉语词汇研究也多所启发。

在《尔雅》校勘注释方面，清代学者阮元、邵晋涵、郝懿行等作了不少工作。本世纪不少学者在阮氏等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比较突出的有周祖谟的《尔雅校笺》，多所创获，发现很多《尔雅》及郭注脱衍讹误之处，为《尔雅》研读扫清不少障碍，又指出各版本及引书的诸多异文，不但对研究《尔雅》，就是对研究古汉语音韵、词汇也是很宝贵的。今天一般读者读郭注或郝疏均存在困难，徐朝华的《尔雅今注》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作，徐氏完全用现代语为《尔雅》作注，对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读懂《尔雅》很有帮助。

对于《尔雅》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性质，本世纪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黄侃同意汉郑玄的意见，他说："窃谓《尔雅》之名，起于中古，成书则自孔徒。"梁启超赞同宋欧阳修的主张，说：《尔雅》"是西汉人编的字典，刘歆又扩大些"。这两种说法在本世纪前半期占有统治地位。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尔雅》作于战国时代。洪诚在《训诂学》中说："《尔雅》作于战国《孟子》以前，流传到秦汉之间续有增补。"之后何九盈、赵振铎等认为《尔雅》产生于战国末年，为齐鲁儒生所作，而以何氏的论述最为详赡，大体令人信服。通过热烈的讨论，人们的意见渐趋一致，《尔雅》应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至秦汉之际儒生又有增补。目的是帮助人们辨识名物和解读古代典籍。

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清代《尔雅》研究的重要著作，对于其节本、足本的形成与优劣，清人已众说纷纭，本世纪又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是罗振玉发现了王念孙手批《尔雅义疏》写本，证明节本删削果真出自王念孙之手（见《尔雅郝注刊误》罗序）。此后王删郝疏似成定论。随后崔枢华发表《〈尔雅义疏〉王删说质疑》，他通过对《尔雅义疏》删节之处与《广雅疏证》行文特点

相比较，发现很多相对立的现象。所以他的结论是：罗氏所见是王批《义疏》写本，仅113条，而节本删去者约为足本的四分之一，节本为阮元编纂《清经解》时命人在王批基础上所删订。崔氏的意见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本世纪末《尔雅》整理研究取得进展，朱祖延主编了《尔雅诂林》，仿照丁福保《说文诂林》的形式，将历代《尔雅》笺释的成果尽量收集齐备，并增加叙录一卷，搜集历代《尔雅》著述的序跋和主要论文。这些对于《尔雅》的深人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

本世纪的《尔雅》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展开和深人。利用《尔雅》对上古汉语词汇作系统研究这个《尔雅》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作得还很不够。今后主要应该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古汉语同源词、同义词等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尔雅》研究今后一定会不断取得成绩，展现新的局面。

（张双棣）

《方言》研究（“fang-yan”, Studies of）

《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汉杨雄著。最早的《方言》注本为东晋郭璞注。清代研究《方言》的学者很多，以校勘为主，最通行的是戴震《方言疏证》。本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汉语方言学的全面兴起，《方言》研究在吸收清人疏证校笺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关于《方言》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南宋洪迈怀疑此书非杨雄所作，清人戴震对其理由作了批驳。本世纪50年代，周祖谟在《方言校笺》（1956）中对《方言》是否为杨雄所作未下断词，但根据《说文解字》有许多解释字义的方言词句与今本《方言》相同却甚至连《方言》书名也未提及一事认为，从杨雄卒年到许慎作《说文》时（A.D100）还没有叫做《方言》的一部完整的书，仅有一个最初的底本；从今本《方言》十二、十三两卷条目没有排列比较可以看出，杨雄卒时，该书实仍未完成。

2. 关于《方言》的内容和体例。杨雄给刘歆写信时，还没有将此书命名为《方言》，只说《殊言》十五卷，《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个题目不知是否为杨雄所定。《方言》既比较词汇的空间差异，也说明时间流变所造成的古今语汇。许多条目抽去方言词汇的比较，跟《尔雅》无异，因而现在学者多承认《方言》乃仿《尔雅》而作。今本《方言》十三卷，前十一卷体例基本一致，每一词条之下列举有关方言区的词相比较，用“通语”（即共同语）作释词。各卷所收词数量差不多。十二、十三卷则大多是一个单词释一个或两个单词，且所收词数量大大超过前面各卷，很可能只是一个写作提纲。

3. 关于《方言》的语言学意义。50年代以后，周祖谟、王力、何九盈、何耿镛等学者先后探讨了《方言》在语言学史及文化史上的价值。从语言学角度主要可归纳为四点：①《方言》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以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调查的成果。周秦时代輶轩使者所采集的方言材料，秦亡后逐渐丧失，杨雄虽然吸收了一些成果，但主要是靠他利用孝廉和士兵集中长安的方便进行实地调查，历27年逐渐积累而成。杨雄对方言区的划分依词而定，因而方言分界线很复杂，但只要稍加梳理，即可看出汉代方言分布的基本面貌。②通过《方言》可以了解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关系，《方言》所记词汇以秦晋语最多，语义说明最细，甚至用

秦晋语来解释四方方语，表明关西方言在汉代上升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先秦雅言是以山东六国为中心的）。③借助《方言》，可以认识上古汉语词汇中的一些特点。《方言》所记载的词汇表明汉代存在大量的纯粹双音词。与《尔雅》相比较，可看出上古许多同义词都是因方言不同而形成的。《方言》的训释还可解决一些经传训诂问题。④利用《方言》的标音字，可以了解汉代共同语以及方言的一些语音状况。杨雄当时不可能发明音标，他只能用汉字标音，这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时语音的实际面貌。但杨雄敏锐地觉察出某些方言词的区别只是不同方音造成的，他把这类情况称之为“转语”、“代语”。把这些具有语音联系的标音字加以排比归纳，即可大致地呈现出当时的实际语音面貌。

（张　雁）

《说文解字》研究（“Shuowen Jiezi”，Studies of）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之深远，使近2000年的文字学几乎成为《说文》学（或称“许学”）。有清一代，对《说文》的研究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有关《说文》的专著达300余种，《说文》专家多至数10人。作为清代朴学殿军的章太炎，1908年在东京设国学讲习会，曾逐字讲解《说文》，他的《文始》（1910）一书，结合音义探讨字形的变易和孳乳，把《说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墨守《说文》而不相信甲骨文，音转过于宽泛，是章氏《说文》研究的最大缺憾。

殷虚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文字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对《说文》的研究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文字学中分化出来的、以甲骨文金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文字学，必须以《说文》为桥梁；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又为《说文》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由单纯的文献研究到结合出土文字资料进行研究，是20世纪《说文》研究的重要特征。

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从战国到汉代广泛流传着仓颉造字的说法，经许慎在《说文·叙》中论定之后，直到清代，学者尊崇《说文》，大都接受仓颉造字说。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根据荀子的论述，加以发挥，认为“仓颉以前，已先有造书者”，“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1935）中，根据大量古文字资料，指出：“文字的起源是绘画”。文字由图画发展而来，现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汉字的形成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出土的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陶器上的刻画记号和象形符号。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中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对“六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六书”本是《周礼》规定的用来教学童的“六艺”科目之一，汉代学者附会为六种“造字之本”。许慎在《说文·叙》中分别给六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字，形成一套六书理论，一直统治了文字学界1000多年。清代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将六书的前四书称为“字之体”，后二书称为“字之用”，前者为造字之法，后者为用字之法。直到今天，一般讲六书的人还沿用这种分法。对六书进行全面彻底批判的，是唐兰。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指出：“六书说的缺点，第一是不精密，我们不能把它来分析一切文字，第二是不清晰，我们很难知

道它们确实的定义。这种学说是早应当废弃的。”并且提出了新的三书说：“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这两种是属于上古期的图绘文字。第三是形声文字，是属于近古期的声符文字。”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1956）中修正唐说，认为“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造原则下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1988）中，把陈氏的象形改为表意，阐述说：“在三书中，表意字是使用意符的，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是使用音符的，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既符合汉字的实际，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已为文字学界广泛采纳。

作为一部字典，《说文》的最基本内容是通过分析字形说解字的本义。对许氏的析形释义，清代的《说文》研究者往往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丁福保于1928年编成《说文解字诂林》，每一字下将诸家解释依次列出，这为寻检各家成说，比较诸说短长，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缺点是，材料虽多而仍有遗漏，罗列众说却不辨良莠。

考释甲骨文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直接推动了对《说文》析形释义的研究。《说文》所出字形的正与讹、说解的是与非，学者们借助古文字的研究，重新给予评价，这方面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1983)，可视为新注《说文》的代表性的著作，大致能择善而从，释语简明扼要，论双声通转多有创见，是本书的优点；守许说而强解，言通转而牵附，是其缺点。此外，古敬恒、刘利的《新编说文解字》(1991)，也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一些通论性的著述，大都能以新的高度，新的视角，对《说文》的内容加以概括介绍，对《说文》的条例进行系统归纳，对《说文》涉及的理论问题给予深入论述。30年代，马叙伦的《说文解字研究法》（1933）就是较好的一部著作。该书就《说文》的部首、字体、说解、引文等70余个问题展开研究，或以甲骨文金文为证，或以许证许，旁征博引，颇多新意，所论大多具有开创性质。对全面了解《说文》，深入研究《说文》，有很大帮助。陈晋的《说文研究法》(1934)，侧重在研究方法的介绍与探讨上，也是颇见功力的一部书。50年代周祖谟的《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一文（1956），除一般知识性介绍外，重点论述了《说文》在今天的价值。80年代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1983）出版，作为一部专著，介绍内容更加详尽，评价得失也很公允。80年代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当推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1981）。该书是作者多年研治《说文》的重要成果，对《说文》的内容和体例，如何运用《说文》解释古书，《说文》中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以及《说文》的局限性，都深入浅出地加以论述。材料详尽，论述简要，涉及的理论问题，力求证据翔实，是将知识的普及与理论的提高结合得较好的一本书。

《说文》研究的深度广度也有新的拓展。举凡《说文》的部首，六书的理论，《说文》中的会意字、形声字，声旁表意问题，省形、省声问题，《说文》中的古文、籀文以及《说文》所反映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并不断有专著专论问世，其中不乏精深之作，有些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　涛）

《释名》研究（“Shiming”, Studies of）

《释名》的作者是东汉的刘熙。刘熙试

图将各种事物名称的来源解释清楚；使用的方法则是汉代颇为流行的声训，即通过声音的线索探求事物命名的缘由。清代毕沅撰《释名疏证》及《释名补遗》《续释名》，王先谦撰《释名疏证补》，是清代研究《释名》集成之作。

《释名》以往一直被视为训诂的重要著作、考语源、言声训者必称引之。本世纪对《释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归纳其条例，二是论列其是非。杨树达的《释名新略例》(1925)，以声音为主，指出：“《释名》音训之大例有三：一曰同音，二曰双声，三曰叠韵。其凡则有九：一曰以本字为训，二曰以同音字为训，三曰以同音符之字为训，四曰以音符之字为训，五曰以本字所孳乳之字为训，六曰以双声字为训，七曰以近纽双声字为训，八曰以旁纽双声字为训，此属于双声者也。九曰以叠韵字为训，此属于叠韵者也。”并分别举例加以说明。30年代末，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第三章就《释名》的训释与经典、《尔雅》、《说文》、诸子、纬书、传注等相比较，指明其同异，既分析了《释名》在训诂学上的价值，同时又概括出《释名》的条例，较杨氏详尽。

现代一些学者对《释名》给予了客观评价。最全面深入的是周祖谟作于1946年的《书刘熙释名后》一文，除考证其作者确为刘熙外，指出：“释名一书非为通晓经传而作，旨在探寻事物命名之含义，故以当时日常习用之词为主。虽俚语俗言，亦所不避。”“欲考察汉代之词汇，释名与史游急就篇当同为重要之资料。”“至于书中所出之音训，以及当时之方音俗语，尤为后人考索汉代语音者所重视。”但同时也指出，“释名之声训可取者诚不多”，“其中说解词义，多出于臆测，诚未可信”。此外，近年来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如孙德宣的《刘熙和他的‘释名’》(1956)和一些训诂学史著作，对《释名》的评价也都比较客观、公允。

在其他一些专门的著述中，如王力的《同源字论》一文(1978)，谈到《释名》时，从语言学理论的高度加以评价：“他的释名，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的名称的用意解释清楚。这实际上是认为概念和语音有必然的联系，而不承认荀子约定俗成的原理。这样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概念语音天然结合论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字有同源，则是唯物主义的。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某词的语音分化或字形分化，但是词义相近，那就是同源。因此，释名有一小部分的解释还是正确的”。

《释名》所释名物，共1502条。将这些语言材料详加爬梳，客观地论列其得失，这对词汇史、语音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无疑都将是很有意义的。

(陈　涛)

声训研究 (Shengxun, Studies of)

声训是通过语词的读音线索来解释词义的训释形式，因为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必须有声音联系，故被称为“声训”。

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如《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到汉代，声训大为盛行，几乎所有典籍都有声训出现，其集大成者则是刘熙的《释名》。其后人们在注释和研究《释名》、《说文》等集中体现声训的著作时，对声训问题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多语焉不详。本世纪40年代初，沈兼士发表《声训注》一文(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首次较为全面地检讨了历代声训注说，并从理论和类例两方面系统地阐释了声训问题。其后声训研究很少进展。进入80年代以来，研究声训

的文章又逐渐增多。有对专书声训材料的深其中的研究《说文》声训的文章较多；有综合声训材料对声训理论问题的探讨，另外还有通过声训材料的分析探讨古音的文章。

目前，学术界对声训定义、音义原理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意见，但以下一些观点已渐趋一致：一是声训的目的不是解释一般词义，而是依据词音联系来推求语源，即说明被释词得名的由来。二是在语言产生初期，音与义的结合是偶然的，而在词汇发展过程中，新词往往是在旧词的基础上派生的，所以新词与旧词之间就有了声音与意义的联系，这就是声训存在的合理依据。

（王贵元）

反训研究 （Fanxun，Studies of）

反训是指一个词具有两种相反的意义。因为这种现象的语例都是在训诂材料中发现和择取的，后人便名之曰“反训”。

最早提出这一现象的是晋人郭璞，其后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一、李冶《敬斋古今注》卷二、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一、焦竑《笔乘》卷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四、朱骏声《小学识余》卷五、吴曾祺《涵芬楼文谭·杂说》、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潜研堂答问》、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三等对此皆有论述。本世纪40年代，张舜徽曾作《字义反训集证》一文（收人《旧学集存》中），集反训字例100余，共分40类，首次大量集聚了反训材料。1980年，徐世荣《反训探源》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全文广征博稽，搜求反训字例500余，分为10类，阐述了反训的10种成因。此文引起了学术界对反训问题的重视，其后研究论文纷然涌现。反训研究的早期主要是反训材料的举例、累集和分类，8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对所谓反训材料的辨析及反训存在的条件和原因的探究。目前，学术界的基本倾向是，前人所述反训例证，大多似是而非，所以必须依据真正符合反义同词现象的原则，确定反训的界域。其标准主要有三：一、必须是一词两义，而非一字两词；二、反义必须是共时语言现象；三、中性词在不同语境下显示的反义，不为反训。另外，真正的反训现象是否存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反义同词现象确实存在，但“反训”这一术语不科学，不可再用。

（王贵元）

同源词研究 〔Tongyuanci（word derived from the same root），Studies of〕

同源词研究属于语源学范畴。汉语语源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本世纪以来，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章太炎的《文始》是对汉语语源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该书以章氏古韵系统及其音转关系为经，以《说文》独体字即初文、准初文为纬，把意义相同相近的词组织起来，构成同源词族。章氏从词源学角度对转注作了新的诠释，认为转注是文字的孳乳，从而建立起自己语源学的理论体系。由于章氏迷信《说文》，把《说文》独体字作为语源的根据，违背了他自己所定的不拘牵形体的原则，没有摆脱字形的束缚。同时，章氏的音转过于宽泛，声音本不相近，左转右转，转成同源；意义相差很远，也勉强加以牵合。

章氏之后，刘师培、杨树达、沈兼士在词源学方面也都作过深人的研究。杨氏写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以及数10篇就具体字的语根进行考据的文章。沈氏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从形声字的声符即语根去

探求语源，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沈二氏的语源研究严格说是字源研究，因为他们主要是从文字角度出发，而不是由语言角度进行研究。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汉语语源研究的代表作是《汉语的词族》。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讨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同源关系，因此能够摆脱汉字字形的束缚。但由于他的语音转换法则较章氏的音转更宽泛，而且他的古代训诂根底不深，所以没有作出很大的成绩。

本世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语源学著作是王力的《同源字典》(1982)。王力对同源词的确定十分谨慎，他根据音义相同或相近，有古代训诂和文献依据等两个原则考求汉语词汇的语源关系，对每组同源词音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可靠的证据，找到了汉语词汇之间本质的内部联系。《同源字典》为汉语语源研究不断前进奠定了基础。《同源字典》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承学之士匡谬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这也是王力生前的希望。

（张双棣）

联绵字研究 [Lianmianci (disyllbic roots), Studies of]

“联（连）绵字”又称“联绵词”，旧称“谜（连）语”。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着历代学者对它的不同认识，其内涵和外延从古至今有了不小的变化。现代学者公认的联绵词的科学含义是：两个字连缀在一起，不能分开来解释的双音节词，即双音节的单纯词。传统意义上的联绵字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从最早对联绵字进行专门研究的宋代张有的《复古编》卷六之《联绵字》，到时代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清代的王念孙，以及本世纪朱起凤的《辞通》、王国维的《联绵字谱》、符定一的《联绵字典》，都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双音节单纯词”的联绵字，并举出大量例证，从形、音、义等方面进行考释；但除了联绵字，还收了大量的非联绵字，包括复合词、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甚至是词组。

本世纪上半叶，联绵字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姜亮夫、吴庭让、高亨、张寿林、甘大昕、孙德宣等人都著文探讨，虽然由于受传统概念的影响，所收的联绵字并非“双音节单纯词”，但他们已能用新的语言理论，从联绵字的生成、意义、分类、分化、音理、词性、文学上的价值以及与语言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开启了后代学者的 研究路径。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联绵字的研究逐步深入，虽然没有专书出版，但大多数的词汇学综合论著都将联绵字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武占坤、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张世禄的《古代汉语》、赵克勤的《古汉语词汇概要》和《古代汉语词汇学》，赵克勤在《古代汉语词汇学》中指出联绵词：一、必须由两个汉字组成；二、必须是单语素；三、两个汉字都只起表音作用，没有意义。

具有语音联系（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大量产生于先秦，《诗经》、《楚辞》中最为丰富，因此对两书的联绵字专书研究也是一个重点，本世纪上半叶姜亮夫、骆绍宾、张寿林都有专述，曹宝麟《诗骚联绵字辩议》（1982）利用其中的联绵字材料研究古音，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宿　娟）

通假字研究 (Tongjiazi, Studies of)

“通假”以前通称为“假借”。假借本是“六书”之一，一般称为造字的假借或无本字的假借；另有一种情况是，“其始书之也，

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语），本是古人写的别字，理应称为通假，但却被称为用字的假借或有本字的假借。对两种假借，清代学者王引之即已有了很好的认识。

本世纪语言学理论引进我国后，人们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使用了“古音通假”的名称并阐释说：“所谓古音通假，就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同音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汉语大词典》释“通假”说：“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严格说，与本无其字的假借不同，但习惯上也通称假借。”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1988）中把假借字分为无本字的假借字和有本字的假借字即通假字两类。学者们大都主张把无本字的假借与有本字的通假严格区分开来。

80年代以来，通假字研究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发表了上百篇有关通假字的文章，涉及许多重要问题。比如针对滥用通假的问题，张双棣在《论假借》（1980）中列举了三种不属于假借的情况，杨春霖在《古汉语通假新说》中列举了九种不是通假的情况，都能切中时弊。又比如关于通假字的读音，杨春霖主张，“为了减少读古书的困难，无须再提倡读本字音了，至于字典、词典里那些因通假而规定的字音，应该全部废除”。但多数人主张，通假字应该读本字之音；至于字典、词典是否为通假义另列音项，情况相当复杂，值得进一步讨论。二是对专书通假字进行研究，如丁忱的《〈诗经〉通假论》（1982）；钱宗武的《尚书通假研究》（1995）；张双棣在《吕氏春秋词汇研究》（1989）中对《吕氏春秋》全部179个通假字分四种类型加以分析，对了解一部书的词汇面貌，大有益处。三是通假字典的编纂，重要的有曹光摧的《通假字例释》（1985），高启沃的《古籍通假字选释》（1985），高亨、董治安的《古字通假会典》（1989）。

（陈　涛）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自《马氏文通》发表以来，古汉语语法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构建系统的时期（1898马建忠《马氏文通》发表——30年代后期）；二是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1936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发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是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80年代初——）。

一、构建系统的时期

1.《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构建了完整的古汉语语法体系　《文通》引进西方的语法学，第一次完整地构建了汉语的语法系统。《文通》的语法体系包括词类、句法、句类三个方面。词类，马建忠称字类。《文通》明确地主张汉语词有定类，“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

《文通》字分虚实，“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文通》把虚字分为四类（介、连、助、叹），其对虚字的分类是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出发的，这符合现代语言学的原则，也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文通》把实字分为五类（名、代、静、动、状），其中“代”和“状（副词，包括句法中的状语）”基本上是依据语法功能的标准划分出来的，“名”、“静（形容词、数词）”、“动”则是以词的意义和句法位置（充任的句法成分）作

为分类标准的。但是，马氏考察词的语法功能时只注意某类词常常充任某种句法成分，而没有注意到汉语词类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因而导致了对汉语词类的形式特点发掘不够。马氏在划分词类上以词在句中某一句法位置为依据，例如，他认为“止”字在主宾语、述语和定语位置上的意义不同（处理为三个词），因而“止”字分属名动静三类，从而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被后人演化为“离句无品、词无定类”，这并不符合马氏的初衷。《文通》把数词称为“滋静”，与“象静”同归形容词一类，是很有见地的，这一处理突出了古汉语数词的谓词性质。

在句法方面《文通》首先建立了“词”和“次”两套概念。“词”即句子成分，“词”分七种：起词（主语）、语词（动词谓语）、表词（名词/形容词谓语）、止词（动词的宾语）、司词（介词的宾语）、转词（主要指动词宾语中的非直接宾语，可以带介词也可以不带介词）、加词（主要指充任状语和补语的介词结构以及同位语）。“次”是专门用于分析名词和代词句法功能的一套概念，“次”即指名词、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和分布。“次”有六种，两两相关，构成三对：主次和宾次、偏次和正次、前次和同次。“次”的设立显然是受到西方语言名词、代词具有格语法范畴的影响，汉语不具有格语法范畴，因此“次”的设立是不必要的。从当代汉语语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词”和“次”都是指句法成分，是用于展开句法分析的概念。

《文通》还设立了“读”的概念，“凡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曰读”，从定义上看“读”是指主谓词组，但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很多。“读”是马氏受西方语法中不定式短语（infinitive phrase）、分词短语（participial phrase）和从句（clause）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启示而设立的汉语句法概念，“读”实际上指充任句法成分的各类谓词性词组。马氏抓住汉语谓词无形态变化的特点，深入研究了汉语谓词性成分可以较为自由地充任句法成分这一语言现象。“读”概念的建立对分析结构繁复的汉语句子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文通》对古汉语宾语前置的规律和各种被动句式等问题的论述也极为精当。

在句类方面，马氏把句子分为两类，他说：“句之为句，似可分为两类：一则与读相连者，一则舍读独立者”。“与读相联”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单句和主从复句；“舍读独立”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联合复句。在马氏的句类系统里没有主从复句的位置，马氏称所谓从属分句为“状读”，这种句子的分类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文通》的理论基础，以往一般认为仅仅是泰西各国的葛郎玛。但是，有迹象表明马建忠是了解欧洲语言学的，《文通》的理论基础是笛卡儿语言学，又称为普遍唯理语法，《文通》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葛郎玛，而且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文通》对于古汉语语法系统构建的贡献是全面的、系统的。

2. 对《文通》体系的完善与修正

《文通》出版后的30多年里，又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著作。其中一部分是《文通》的重复之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另一部分著作则是以英语语法为参照系，对《文通》的语法体系进行补充和修正，使《文通》的体系不断得到完善。

章士钊1907年出版了《中等国文典》，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划清了字和词的界限，对《文通》作出了重要的修正，指出“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此字与

词之区别。"书中把词分为两类，单字词和合字词。《文典》一书专讲词类，没有专门论述句法的章节，只是在《总略》中谈到了句子的构成。这种句法观显然不适合汉语，是英语语法的照搬。

陈承泽1922年发表了《国文法草创》，主要贡献在于古代汉语的词类研究，陈氏提出了汉语词类研究的两条原则："（甲）各字类在文位上不能辨别时，须另定一辨别标准；（乙）各字类全体之总界，须足以吸收一切之字而无所挂漏是也。"原则甲触及到了汉语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即词类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不能仅仅依据句法成分划分词类，这是对《文通》的重要修正。陈氏批评马氏把主宾语、述语、定语位置上的"止"看作三个词，分属于名、动、形三个词类的做法，指出："以余观之，马氏所举之三类，皆属止之活用。止之字类，应为自动字，即'绌然而止'之'止'，是也。"陈氏还指出："活用与变义异"。并把活用分为"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两类。"非本用的活用"还包括"致动"和"意动"，这两个概念的明确提出对古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陈氏的词类研究已经触及到了汉语里确定词的同一性的原则、陈述与指称的相互转化、谓词性成分的名词化同自指化与转指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汉语语法的深层理论问题。

金兆梓1922年出版了《国文法之研究》；刘复1920年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1932年出版了《中国文法讲话》（上）。金、刘二人反对所谓"马氏文通派"，以提倡文法革新著称，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从古汉语语法学的角度看，二人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但金氏的《国文法之研究》更有意义，金氏摒弃汉语实词一般名动形三分的处理，而改为体词（名词和代名词）、相词（形容词和动词）两分。金氏抓住了汉语形容词可以作谓语这一有别于西方语言的特点，对动词和形容词作出了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后世称之为谓词。此外，金氏对汉语的介词和连词也有十分精湛的论述。

胡以鲁1923年发表了《国语学草创》，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书中多处谈到古汉语语法问题。胡氏指出：句子必须由主语和谓语两部分构成的理论"或适用于印度日耳曼语族，在吾国则不用此理论为也。"这是对《文通》的重要修正和补充。针对汉语词类没有形态标记的特点，胡氏指出汉语语法研究应以句法为主，而不应像西方语法学那样以词法为主。胡氏不同意所谓"倒装"的说法，他认为古代汉语宾语前置的语言现象，是当时自然语言中正常的语序。这一看法是相当深刻的。

杨树达1930年出版了《高等国文法》，1931年出版了《马氏文通勘误》。杨氏精于小学，特别是训诂学，所以对《文通》语言材料方面的错误多所勘正；《高等国文法》模仿英语语法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文言语法体系，基本不讲句法和结构关系，词类划分很细，却很少谈到各词类的语法特征。杨氏在古汉语语法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虚词研究，于1928年出版了《词诠》，继承元代卢以纬《语助》、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吴昌莹《经词衍释》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可以说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裴学海1932年出版的《古书虚字集释》和《词诠》属同类著作，这两部书都是从训诂学的角度训释古代汉语的虚词，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建立古代汉语语法学的虚词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科学的虚词体系的建立仍有待后人的努力。

黎锦熙1924年发表了《新著国语文

法》，黎氏的语法体系以句本位理论和六大句子成分为特征，基本上是模仿英语语法构建的。黎氏的《新著国语文法》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领域。从此，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蓬勃发展，对汉语语法体系的探索从古汉语研究领域转向了现代汉语研究领域。黎锦熙 1933 年出版了《比较文法》，进行了中外语法之间的比较和汉语古今语法之间的比较，尤其重视后者。同类著作还有杨伯峻 1936 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语即是白话，文即是文言，重点在于古今虚词的对照和比较。

二、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

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既包括对语法演变的描写，也包括对某些共时语法现象的描写。

1.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开创与发展

胡适 1916～1919 年间写下了一组有关历史语法的文章，其中《国语文法概论》提出：研究文法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历史的研究法”。他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实践。胡小石 1928 年写下了《甲骨文例》，其中卷下·辞例篇谈到了甲骨文的一些语法现象。丁声树 1935 年发表了《释否定副词“弗”“不”》，材料极为丰富，从语法分布的角度分析了“弗”和“不”的区别，1948 年又发表了《诗经中的“何”“曷”“胡”》。上述这些论文可以看作以历史语法研究为主的时期的端倪。

王力 1936 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指出研究汉语语法要“按时代分为若干时期”，进行“文法史的研究”，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任务。1937 年又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这两篇文章标志着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不以构建完整的体系为目标，而以对历史语法的某些现象进行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王力 1943 年《中国现代语法》和 1944 年《中国语法理论》广泛吸收国外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注重发掘汉语语法的自身特点，如根据句子的表达功能和谓语的构成成分，把汉语的句子分为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对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及述补式等具有汉语本质性特征的句法结构进行了描写和分析。这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后来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拟订也打下了基础。王力 1958 年《汉语史稿》中册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史著作，是本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30 年后又以《汉语语法史》(1989) 为题重新发表，对原有的一些结论作了修正。吕叔湘 1942 年《中国文法要略》一书兼论古今中外，通过比较，发掘出了许多细致的古汉语语法规律；提出了谓词中心论的观点，为古今汉语的句法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论》(1955) 及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 开创了近代汉语描写语法的一代学风，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周法高 1959～1962 年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上》和《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汉语语法史巨著（计划中的《造句编下》和《虚词编》未能出版）。

此外，本时期还有刘世儒 1965 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郭锡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得字用法演变考》，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陈初生《早期处置式略论》等，都是

有代表性的语法演变描写研究论文。（参见汉语语法史研究）

2. 共时语法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历时演变研究已成为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之后，共时平面的研究仍继续发展，在新的时期里，共时平面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某一语法现象的断代研究和专书（包括同类文献的集合，如“甲骨刻辞”“西周金文”等）的语法研究。这种共时研究虽然不像系统构建时期那样具有宏阔的规模，却要深入得多，细致得多。

管燮初1953年出版了《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描写甲骨文语法的著作。作者对甲骨文的词类和句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一些方面还做了数量统计。1981年又出版了同类著作《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本书亦是对金文语法系统描写的第一部著作。这两部著作为汉语历史语法系统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杨伯峻1955年出版了《文言语法》，1963年在修改原作的基础上又出版了《文言文法》，这两部书比较重视句法分析，不过多涉及理论问题，重视实用，对于古代汉语的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类著作还有张贻惠的《古汉语语法》和刘景农的《汉语文言语法》。

许世瑛1973年出版了《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作者对论语的每个句子都进行了句法分析，概括出了八类古汉语的句式：1. 叙事简句与叙事繁句，2. 致使繁句，3. 意谓简句与意谓繁句，4. 有无简句与有无繁句，5. 表态简句与表态繁句，6. 判断简句与判断繁句，7. 准判断简句与准判断繁句，8. 递系复句。

詹秀惠1973年出版了《〈世说新语〉语法探究》，这是一部中古汉语描写语法的尝试之作，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称代词；第二编，语气词、关系词、限制词；第三编，构词法和造句法。

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等1979年出版了《文言虚词浅释》，后来经过修改充实，1985年更名为《古汉语虚词通释》（作者增加了王海棻）重新出版。古汉语虚词研究在我国有深厚的传统，40年代以前的虚词研究基本上是以训诂学的方法进行的，1944年吕叔湘出版了《文言虚字》，开创了虚词分组研究的方法，把功能相近的虚词归为一组，比较它们的异同，这种研究方法更具语法学的意义，遗憾的是只收入了20几个虚词。1965年杨伯峻出版了《古汉语虚词》，收录虚词100多个。《通释》一书收录虚词639个，数量远远超过当时的其他同类著作。《通释》以上古汉语里虚词的用法研究为主，也兼及后代文言文献中虚词的用法，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时平面研究，而是一种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共时研究。本书摆脱了训诂学的方法，着重于虚词语法功能的描述，《通释》的出版标志着古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此外，在本时期，周迟明《汉语连动性复式动词》，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黄景欣《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副词“弗”“不”研究》，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余若昭《列子语法研究》，戴连璋《诗经句法研究》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共时语法描写研究论文。

三、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

80年代以来，在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深厚积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国外新理论的迅速引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继续注重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并且同时注重理论，寻求解释。

1. *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本时期里，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继续发展，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新的时期里众多描写研究的论著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自己的理论色彩。

语法演变的研究，有潘允中、史存直、柳士镇、孙锡信、向熹等人的语法史著作，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等。（参看本书“汉语语法史研究”条）

郭锡良1990年发表了《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对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系词研究作出了总结。1994年发表了《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对殷商时代和周代的构词法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此外，本时期还有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岳俊发《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张万起《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王绍新《“得”的语义、语法作用衍变》，李平《〈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王洪君《汉语表自指的句词化标记“之”的消失》，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钱学烈《试论全唐诗中的把字句》，宋绍年《“所以”再认识》等一系列论文论及了汉语历史语法演变的诸多方面。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本时期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详见本书“近代汉语研究”条。

这个时期共时的、专书的语法研究收获颇丰，何乐士先后发表了《〈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左传虚词研究》、《左传范围副词》（论文集）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共50余篇，对左传的句法和虚词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何乐士的共时研究具有明确的语法史的观念。何乐士与杨伯峻合著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基本上是一部泛时的文言语法著作，正如作者所说“在研究和举例上我们以秦汉时期的古汉语为主；而在所谈问题需要联系历史发展时则或向上追及甲骨、金文，或向下推至唐宋以及明清”。

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是本时期有代表性的共时研究论文。《新探》对“什么是语气”、“语气的分类”、“语气的表达手段”、“语气词的起源”、“常用语气词所表示的语气”等汉语史研究难点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明确提出了“语气词的作用是单功能的”这一论点。

唐钰明《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与周锡馥合作）、《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唐至清的“被”字句》是共时静态研究与历时动态研究相结合的一组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马汉麟1978年发表了《古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曾在《中国语文》展开了讨论。1980年出版了《古汉语语法提要》。

管燮初1994年出版了《左传句法研究》，这是管氏继《殷虚甲骨刻辞语法研究》和《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断代语法研究著作。

王海棻1987年出版了《古汉语疑问词语》，这是一部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语法著作。

程湘清、何乐士、王绍新、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等编著的《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收录了一批古汉语断代研究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语法论文。

王克仲1988年出版了《助语辞集注》，解惠全1989年出版了《虚字说》，这两部著作都以前人的虚词著作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注释阐发了自己的虚词研究成果。

李佐丰1994年出版了《文言实词》，以穷尽式数量统计分析为依据，对先秦汉语的实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观点，是国内第一部贯彻现代描写语言学精神的古汉语词类著作。

殷国光1997年出版了《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这是一部专书词类研究著作，作者所用方法与《文言实词》基本相同，全书的结论建立在准确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2. 重视理论，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释 朱德熙1980年撰写了《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一文，对“者、所、之”的指称化功能作出了理论解释，这对于古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活用”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视古今汉语中的“名物化”问题，涉及了汉语的本质特征。1985年发表的《汉语方言里两种反复问句》是描写研究与理论解释密切结合的汉语语法史论文。梅祖麟1981年发表了《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提出了语法史研究必须重视“解释”的思想。1998年又发表了《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进一步探讨“解释”的原则。寻求理论解释的思想和实践是在描写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志着古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历史语法研究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参见*汉语语法史研究*）

郭锡良的《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和《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对用训诂学方法训释虚词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重视理论，在描写的基础上追求解释，已经成为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潮流，尽管以理论解释为主的理论性著作还不多见，但是描写同解释已经开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例如王克仲《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深入分析了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李佐丰《谈〈左传〉三类复合使动式》运用语义分析方法，分化了三类复合使动式，揭示了三类使动式的差别。姚振武《关于自指和转指》、《现代汉语的“N的V”与上古汉语的“N之V”》深入讨论了朱德熙提出的“自指和转指”的观点，并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补充和修正。唐钰明《上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章，是古汉语语法研究运用变换分析的有益的尝试。宋绍年《结果补语式起源再探讨》提出用相关组合的频率变化作为认定使成式产生的形式标志，从语义和语用入手才能够及时地把新产生的结构从旧有的形式中分离出来；《古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和名词化》提出了在汉语里指称化不应该等同于名词化，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要严格区分指称化和名词化这两个概念。董琨《〈墨子〉称代系统论隅》提出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对某些语法现象加以一定的解释。

参考文献

马建忠：《马氏文通》，上海：商务印书馆，1898（新一版1983）。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王力文集》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王力教育》十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海：商务印书

馆，1942（新一版 1982）。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陈　丽　宋绍年）

汉语语法史研究（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汉语语法史是研究汉语语法发展演变的学科，又称汉语历史语法。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发源于20纪30年代后期，1936年王力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指出：研究汉语语法要“按时代分为若干时期”，进行“文法史的研究”。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任务。1937年王力又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对汉语里系词从无到有的历史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课题的提出本身都已成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宝贵遗产。

1938年王力印行了他在西南联大的讲义《中国现代语法》，这部著作后来分为《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两部书，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从汉语语法史研究的角度观察，《中国语法理论》更引人瞩目，本书纵论古今中外，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多有涉及。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使成式，只能把不及物动词当使动词用”，“现代的使成式已经替代了古代的使动词了”，“使成式……大约最晚在唐代口语里已经有了……至于形容词做末品补语的，似乎较为后起”，“处置式是近代产生的语言形式”，“中国上古是没有处置式的，现代用处置式的地方，上古只用普通的主动句”，“也许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被动式（恰像古印欧语没有真正的被动式），就借主动式的结构来表示被动的观念。但是，到了近代，被动式就显然产生了”，“‘于、自、以’等字之变为‘在、从、拿’等字，都是由虚趋实（由关系词变为动词），因此它们所构成的末品也是大致由后置变为前置的。这是中国语法史上重要事实之一。”这些思想极为可贵，影响深远。

1940～1949年间吕叔湘发表了10多篇有关汉语语法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收入了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论》。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共时文献语法现象的描写研究，例如《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和《相字偏指释例》，前者详尽地描写了“在”“著”二助词的语法功能，后者把“相”字在上古汉语中互指的用法和偏指的用法进行了共时的比较，并说明了两种用法之间的联系。另一类是对历时文献中某一语法现象演变的描写研究，例如《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和《把字用法的研究》。1985年出版了同类著作，即吕叔湘著、江蓝生补的《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些论著材料非常丰富，描写十分细密，反映了吕氏一贯的学术风格，即不重理论的说明，而重规律的揭示；不重体系的构拟，而重事实的描述。吕叔湘开创了汉语描写语法的一代学风，影响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

1958年王力出版了《汉语史稿》中册，实现了自己早年提出的进行“文法史的研究”的任务。《汉语史稿》中册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史著作，王力认为语言史分期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语法的变化，他指出“动词形尾‘了’和‘着’的产生，是近代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根据这一思想王力把汉语史划分为上古期（公元3世纪以前），中古期（公元4世纪到12世纪），近代（公元13世纪到十九世纪），现代（20

世纪)。这部著作对汉语的构词法、词类和句法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其中“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句子的仂语化”、“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被动式的发展”、“递系式的发展”等至今仍被广泛引用。30年以后，王力改写了自己的著作，以《汉语语法史》为题重新发表，书中对原有的一些结论作了修正。王力认为要研究好汉语语法史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就包含着一个不断修正原有结论的过程。王力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贡献不仅仅是他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提出问题、审视问题的眼光。

1959~1962年周法高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上》和《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汉语语法史巨著(计划中的《造句编下》和《虚词编》未能出版)。周氏认为“要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语法，非要从事分期的研究不可。研究中国语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代语法和近代语法两部分。古代语法不妨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周，下探汉魏六朝的发展。……近代语法，可以现代国语为主，上溯唐宋以降的白话，特别注意语法之历史变迁。”《中国古代语法》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周氏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次总结。周氏把古代语法分为殷周、列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四个时期，描写了古代时期汉语语法的演变。《中国古代语法》构建了一个较为详尽的古汉语语法体系，这是本书的又一大贡献。作者自觉地吸收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特别是赵元任的汉语语法观点，采用层次分析法，全书一改传统古汉语语法著作的面貌，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周氏的研究表明，在汉语语法史研究已成为古汉语语法研究主流的时期，共时平面的研究同历时演变的研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1965年刘世儒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本书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主要量词的起源和演变逐个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指出汉代已有动量词，从而修正了以往认为动量词唐代以后才产生的说法。

1980年郭锡良发表了《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这篇论文采用了穷尽式数量分析的方法，在汉语史研究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研究刚刚恢复的时候，本文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982年潘允中出版了《汉语语法史概要》，1986年史存直出版了《汉语语法史纲要》，1992年柳士镇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年孙锡信出版了《汉语历史语法要略》，1993年向熹出版了《简明汉语史》下册。上述著作或是对王力先生的阐发和补充，或是在某一局部问题上提出对王力先生的修正。这些著作的出版表明：汉语语法史研究在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以后已经得到了恢复，并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1987年蒋绍愚、徐昌华翻译出版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91年江蓝生、白维国翻译出版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的《汉语史通考》，1995年又翻译出版了日本汉学家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这几部译作基本上涵盖了日本的汉语语法史研究现状。

80年代以来，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日趋繁荣。近代汉语是指唐代到清代初期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本书设有专条。其代表性著作有刘坚《近代汉语读本》、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即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自觉地寻求解释。在这方面，梅祖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1981年梅氏发表了《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指出“十世纪才出现‘动+了+宾’，这种新兴结构的形成过程需要解释”，“(了字)‘虚化’和‘挪前’是描写，是很正确的描写，但不是解释。所谓解释，一则是要把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其他的类似的现象连贯起来，二则是要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怎么会在那时产生”。针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偏重于虚词演变而对结构演变重视不够的倾向，梅氏还提出要同时注意词汇兴替和结构变化。他指出“现代完成貌的前身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着重‘了’字……答案是唐代。如果着重句式……答案是五世纪，或者更早”，“句法结构不变，词汇中的新陈代谢就像接力赛跑，一个运动员跑累了，另一个接棒跑下去，汉语语法史常有这样的现象”，“单靠词汇兴替，只能把演变史带到唐代”，重视结构演变才能追溯得更远。梅氏一系列有关汉语语法史的文章都贯穿了上述精神，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解释。1998年梅氏又发表了《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探求解释的原则，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解释”的思想。文章指出“(目前)历史语法学(还)不能提供什么管用的解释原则……值得尝试的是收集一些同类型的语法演变，或许可以归纳出来一些通则”，文章讨论了“正反两式的平衡”、“被、会、解、没等动词的虚化”、“虚化过程中的一和多”三类语法演变现象。寻求解释的思想是在描写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标志着汉语语法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参考文献

王　力：《汉语史稿》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61，1962。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宋绍年)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Archaic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一般是指对汉代以前汉语语法的研究，以先秦两汉时代的传世典籍和地下出土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有的学者将其中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语法的研究另立为远古汉语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肇始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马建忠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为主要语料，汉以后只引唐代韩愈文，事实上是对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他借鉴拉丁语法创建了第一个完整的古汉语语法系统，对上古汉语的构词法、词类系统、句法规则作了全面细致的描写分析。继《马氏文通》之后，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杨树达《高等国文法》(1930)等著作都主要以上古汉语语法为研究对象。同时还出现了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专题论文，如何定生《汉以前的文法研究》(1928)，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黎锦熙《三百篇之“之”》(1929)，丁声树《释否定词“弗”“不”》(1935)、《诗经“式”字说》(1936)、《诗经中的“何”“曷”“胡”》(1948)，沈春

晖《周金文中之“双宾语句式”》等。

1937年王力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7年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这两篇论文反对模仿西洋语法，强调从客观材料中概括出语言的结构规律，提出了语法研究中的历史观点，在方法论上对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44），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等著作在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语法时都对上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了描写分析，许多观点和结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以后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总体上可分为静态的平面描写和动态的历史研究两个方向。在平面描写方面，主要包括专书语法研究和专题研究。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断代语法体系的基础，几代学人对上古时期的重要典籍和出土文献进行了不懈的研究。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和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法》（1956）对甲骨卜辞的语法作了描写，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全面研究了金文语法，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1989）和《左传范围副词》（1994）对《左传》中的虚词作了深人探讨。另外还有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1973）、戴连璋《诗经句法研究》（1976）、廖序东《楚辞语法研究》等。专题研究集中在上古汉语的构词法（复音词）、代词、语气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词类活用、被动句、判断句（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双宾语、语序和动补式等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黄盛璋《两汉时代的量词》（1959）、《先秦古汉语提示词研究》（1983），洪诚《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1962），戴连璋《殷周构词法初探》（1974），郭锡良《先秦语气词初探》（1988）、《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苏）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词类》（1960）、《上占汉语的使动式》（1969），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王克仲《关于先秦“所”字词性的调查报告》（1982），陈克炯《左传复音词初探》，李佐丰《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1983）、《文言实词》（1994），祝敏彻《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补语》（1958），沈培《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4）等。动态的历史研究通过上古汉语在后代的发展变化说明上古汉语语法的特点，代表性的论著有王力《汉语史稿》（1958）、《汉语语法史》（1989），祝敏彻《使成式的产生和发展》（1963），周迟明《汉语双宾语句的语法现象和历史发展》，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1992），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1994）等；80年代以后学者关注到上古汉语内部语法事实的演变并作出描写与解释，如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1994）、《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敖镜浩《略论先秦时期“O/是/V”句式的演变》（1983），杨晓敏《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1986），唐钰明《论上古被动式的起源》（与周锡馥合作1985）、《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1985）等。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1959）、《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962）三部著作和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1992）是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专著。

在研究方法上，语法的系统性和时代性逐步得到重视，对语言材料进行定量的穷尽性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上古汉语的研究中占据了主流。比较研究包括上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比较研究、上古汉语语法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上古汉

语语法与亲属语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对于加深对上古汉语语法面貌的认识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俞敏《倒句探源》（1981），朱德熙《自指和转指》（1983），潘悟云《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1991）等。

自《马氏文通》刊布以来的百年中，前50年对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基本是以创建体系为目标，其中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论著当首推《马氏文通》。陈承泽《国文法之研究》、王力《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丁声树《释否定词“弗”“不”》等都是在理论方法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后五10年转向对具体语法事实的共时和历时描写，特别是80年代以后，深入细致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的研究模式成为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描写与解释的有机结合使研究结论更具有解释力。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总体趋向是，适当借鉴各种理论模型进行全面详实的专书语法研究，以此为基础，对上古汉语不同时代层面、不同地域范围的语法系统有深入细致的描写；对上古汉语内部语法的发展过程及其机制作出合理的描述和解释；通过上古汉语语法在后代的演变反观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特征。在对上古汉语的语法事实有充分可靠的认识的前提下，引入新属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将深化或修正上古汉语语法本体研究的结论。

参考文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方光焘：《六十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法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Middle Chinese Grammar，Studies of）

中古汉语的界定是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从语法面貌上考察，中古汉语的上限应定在东汉末年，下限为隋末唐初，以自东汉末到隋末约400年间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文献典籍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古代汉语发生质变的时期，上古汉语的一些语法形式逐渐衰亡，近代汉语的新兴语法形式陆续萌生，新旧交替的频繁发生使这一时期成为汉语语法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同时这一时期又是言文分离的时期，仿古是书面文献语言的主流，但是又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因此对语料中口语成分的辨析成为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前提。

王力《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提出古汉语本无系词，“是”在六朝时代演变为系词，并对该阶段系词“是”的用法作了探讨。本世纪40年代吕叔湘在《相字偏指释例》（1942）、《见字之指代作用》（1943）等论文中也有中古语法事实的描写。到50年代随着汉语历史语法学的兴起，对中古汉语的语法研究迅速展开。王力《汉语史稿》（中册，1958）以专题为纲，分构词法的发展、词序的发展、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等若干专题，勾画出汉语语法发展的轮廓，王力以公元四世纪起至12世纪为中古期，认为该期口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有：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处置式产生；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普遍应用等。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

法》(1958)则采取上溯法，从现代汉语出发，上推某一语法现象的源头及其演变过程，其中对不少语法现象在中古时期的情况作了描写。后来汉语语法史和近代汉语语法的专题研究都有对中古阶段某一语法事实的描述。

专题研究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对魏晋南北朝的量词作了断代描写。刘世儒《略论魏晋南北朝系动词"是"的用法》(1957)，董琨《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1985)，(日)太田辰夫《中古(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1987)，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1987)，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1990)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作了研究。

对中古时期的典籍文献进行专书语法研究集中于《世说新语》、《搜神记》、《百喻经》等，如詹秀慧《〈世说新语〉语法探究》(1973)，李平《〈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1980)，许威汉《从〈世说新语〉看中古语言现象》(1982)，孙锡信《〈世说新语〉虚词综述》(1990)，张振德、宋子然等《〈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程湘清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1992)收录了5篇语法方面的论文，其中程湘清《〈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何乐士《从〈史记〉和〈世说新语〉的比较看〈世说新语〉的语法特点》、杨克定《从〈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来"、"去"语义表达和语法功能的特点》、张鸿魁《〈世说新语〉并列结构的字序》均以《世说新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冯春田《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语法问题探究》对该时期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中古汉语的断代描写尚不多见，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1991)有"中古汉语概说"一章，对这一时期的语法特征作了概述。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1984)将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公元220年至905年)划为中古汉语，在充分把握这一时期语法史全貌的前提下，准确细致地描述了这数百年间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试图从动态的角度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先秦两汉语法的发展。

下一世纪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趋势是，加强专书语法研究，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佛经文献的语法研究；在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古汉语的语法概貌作出全面详尽的断代描写；同时通过观察比较中古语法对上古语法的继承发展和在后代的演变，说明中古汉语语法在整个汉语语法史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王　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是本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主要是吕叔湘的一系列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论文，如《释〈景德传灯录〉中

"在""著"二助词》(1940)、《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与动词后"得"与"不得"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把字用法的研究》(1948)、《说"们"》(1949)、《说代词词尾"家"》(1949)等。这些论文开拓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一新的领域，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此外还有高名凯《唐代禅家语录听见的语法成分》(1948)等文章也都涉及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内容。

五六十年代陆续有一些语法专著出版，如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论》(1955；1984增订本)汇集了吕40年代发表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王力《汉语史稿》(中册)(1958)对近代汉语中一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对近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作了简要的概括。此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如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1957)、戈弋《把字句的起源》(1958)、向熹《〈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1958)、刘世儒《被动式的起源》(1956)、许绍早《〈水浒传〉中的被字句》(1956)、王力《汉语被动式的发展》(1957)、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1957)、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1959)、祝敏彻《得字用法演变考》(1960)、陈治文《近代汉语"这"的来源》(1964)、胡竹安《宋元白话中的语气助词》(1958)等对近代汉语中的句法和虚词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也有国外学者致力于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如日本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就是一部颇为详尽的近代汉语语法专著。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对五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语法作过比较研究，卡尔根(G.Kallgren)则对《朱子全书》的语法作了全面的研究。

进入80年代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出版了一些近代汉语概论著作，这些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近代汉语语法问题进行讨论，如袁宾《近代汉语概论》(1992)，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1993)，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97)；编写了一些资料性质的著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做好基础工作，如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1985)，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共三卷)(1990～1995)等；一些汉语语法史著作也对近代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探讨，如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王力《汉语语法史》(1989)，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1992)、《汉语历史语法丛稿》(1997)，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等。近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专著也相继出版，如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对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作了细致、全面的描写。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著《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勾画出了近代汉语虚词系统的大致轮廓，注重考察近代汉语虚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共同的发展趋势。此外还有赵克诚《近代汉语语法》(1987)，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1991)，祝敏彻《朱子语类句法研究》(1991)、《近代汉语句法史稿》(1996)，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1995)，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等。对国外学者著作的翻译出版，也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如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1987)、《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1991)，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1996)。

除这些专著外，还有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发表，对近代汉语语法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虚词研究中突破单纯研究虚词的传统，将虚词研究和句法研究结合起来，如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1981)、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1990)、吴福祥《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1997)等。重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有对专书断代的考察，如赵金铭《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1979)、祝敏彻《〈朱子语类〉中的“地”“底”的语法作用》(1982)、袁宾《〈祖堂集〉被动句研究》(1989)；也有对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的探讨，如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1987)、《唐宋处置式的来源》(1990)、江蓝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1986)、贝罗贝《双宾结构从汉代到唐代的历史发展》(1986)、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1987)、《唐至清的被动句》(1988)、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1980)、岳俊发《得字句的产生和发展》(1984)、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1989)、江蓝生《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1984)等。将近代汉语语法现象和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如梅祖麟《现代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9)、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V-neg-VO和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1991)等。重视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如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1981)、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1986)、冯春田《试论结构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1990)、贝罗贝《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1989)、蒋绍愚《把字句略论》(1997)等都在解释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研究中更加注重语言的系统性，重视对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的探讨，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1995)，李讷、石毓智《论汉语体标记诞生的机制》(1997)，梅祖麟《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1997)等。

参考文献

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6。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陈　丽)

古汉语虚词研究 (Empty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古汉语虚词通常又称文言虚词，包括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作的作品中的各类虚词，概念与现代语法学中的“虚词”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感叹词等，有人还把助动词和一些不表示实在意义的语言单位如词头、词尾等归入其中。

20世纪的古汉语虚词研究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训诂式的，静态的，即把古汉语虚词放在一个静态的共时平面上来逐个地予以训释和分析。主要研究成果有杨树达的《词诠》(1928)、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1932)、吕叔湘《文言虚词》(1944)等几部专著。另外，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等一些文言语法著作也对大量的古汉语虚词研究作了训释和分析。其中，《词诠》以其收词多、举例丰富而影响最大，至今仍是研究古汉语虚词的重要参考著作和学

习古代汉语的重要工具书。《古书虚字集释》主要是收列到《词诠》为止的已有的虚词训释，并无多少创获。《文言虚词》篇幅不大，只收20几个最常用的虚词，但解说详明，特别注意分析各个虚词的语法特点。这一阶段的单篇论文不多，但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5)、《诗经"式"字说》(1936)、《诗经中的"何""曷""胡"》(1948)和吕叔湘的《论"毋"与"勿"》(1941)等论文都以论证扎实、见解精辟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古汉语虚词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有关著作和古汉语虚词研究工具书、虚词古籍整理等约30种，发表有关论文约700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著作如杨伯峻《古汉语虚词》(1981)、何乐士等《古汉语虚词通释》(1985)、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1989)；论文如马汉麟《古汉语"所"字的指代作用和"所"字词组的分析》(1962)、黄盛璋《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1963)、《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1983)、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并列连词"与、及"用法辨析》(1989)、朱德熙《自指和转指》(1982)、姜宝昌《卜辞虚词试析》(1982)、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1988)、《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等等。另外，数30种《古代汉语》教材和各种古汉语语法著作，也都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古汉语虚词作了论述、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进展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和逐渐科学化，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具理论深度和可信性。具体表现在：1. 把单个的虚词和句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注重对虚词的语法功能的分析，从而使虚词研究尽量摆脱传统训诂学的模式。2. 注重系统性研究，如对同类虚词的对比研究，对专书或断代的虚词的全面研究，对重点虚词的穷尽性研究。3. 加强历史观念，有意识地把虚词的研究纳人汉语史研究的轨道。50年代，王力《汉语史稿(中)》出版，对若干重要的古汉语虚词的来源和历史演变作了深人的论述。此后，随着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人，不再满足于泛时的、孤立的研究，而是更注重虚词的源流演变的历时研究。4. 不只偏重单音虚词，复合虚词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5. 不断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如通过汉藏系语言的比较来考察古汉语虚词，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被普遍使用，不少人以此方法对专书、断代虚词或某些重要虚词进行穷尽性的描写，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变换分析的方法也开始得到运用。6. 重视虚词工具书的编纂。仅80年代以来，就出版了古汉语虚词工具书约20部。这些工具书不仅给学习古汉语的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虚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世纪特别是后一阶段的古汉语虚词研究，对推动整个古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绩是巨大的。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最突出的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缺乏系统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还有一些问题，如虚词与实词的界限、虚词类别的划分、各个虚词类别的整体研究、实词虚化的机制、虚词与句型的关系等等，都有待继续深人的研究。

(杨荣祥)

古汉语词类研究 (Parts of Speech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古汉语词类研究包括对汉语发展史中某一共时平面上的词类系统的断代描写和对某一类词自古至今发展演变的历时研究。就共时平面上的词类系统描写而言，通常将古汉

语研究的时代层面划分为：（1）远古汉语，以甲骨刻辞和金文的语言材料为描写对象；（2）上古汉语，以先秦两汉传世典籍及地下出土为主要研究对象；（3）中古汉语，以六朝时期的口语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

上古汉语词类研究发端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借鉴西洋语法的词类系统，结合古汉语的语言事实，首先将上古汉语的词类系统划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然后把字分为名字、代字、动字、静字和状字五类，把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四类；部分词类内部又细分小类，如动字的小类有内动字、外动字、同动字、助动字等五个小类。马氏明确宣称：字有定类，划分字类的依据是字在句中的位置。正是坚持以字在“句中所处之位”为标准划分字类，马氏在古汉语词类的研究上多所创获，例如他对“华文所独”的助字作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不过马氏在解决划类单位问题之前没有首先确定单位的同一性原则，因而具体到语言材料的分析，他同时面临同一性问题和词的归类问题，于是把意义不同作为分化不同词（分类单位）的条件，又依据该义项所处句法位置规定其词类归属，由于确定词的同一性和给词分类同步进行，所以很多学者据此认为马氏纠缠于意义标准，最终导致“字无定类”。

马氏遇到的麻烦成为始终困扰古汉语词类研究的难题。后代学者提出了词类活用说、三品说等若干解决方案，得出了类或多或少的词类系统，甚或得出古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的结论，但是就其研究工作的实质而言，基本是在马氏的框架内进行修订，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是对《马氏文通》修订较好的著作，陈氏明确古汉语词有定类，分别本用与活用。应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古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特别是实词分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全面研究上古汉语词类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词类》（1960）讨论了上古汉语的词类划分标准并提出了一套词类模型。李佐丰《文言实词》（1994）是国内第一部贯彻现代描写语言精神的古汉语词类著作，以先秦汉语的主要典籍为语料，以功能标准包括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和与其他词的结合功能作为划类标准，引入变换功能作为辅助手段，对实词做了系统的分类，首先分为谓词和体词两大类，体词包括名词、时间词、方位词、序数词四类，谓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四类。注重从形式上发掘各类词的语法特征并对每一类词划分小类。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1997）对专书的词类进行全面的、量化的研究，分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共11类。

在对某一特定词类的研究方面，有不少成果，如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通过大量语言材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作了断代描写，赵金铭《〈诗经〉中的形容词研究》详细描述了《诗经》中单音形容词和复音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不同。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注意到古汉语中存在的词义构词以及假借字造成的一字多词等现象给确定词的同一性造成的困难。解决词的同一性问题本是古汉语词类划分的前提，因此依据同形同义的原则提取出概括词作为划分词类的对象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朱德熙《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札记》（1990）明确提出将同一词形代表两个意义联系密切又有词性区别的情况分解为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都不同的同音词。郭锡良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对《孟子》、《论

语》等专书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分类研究，以词的义位为分析的出发点，事实上是通过义位确定词的同一性，把具有同一性的概括词作为划类的基本单位，为解决古汉语的词类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

未来古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以对语言材料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为基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解决古汉语词的切分和同一性问题；澄清古汉语词类划分中的理论问题，诸如划类标准、划类的策略、分类模型、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的处理等；真正贯彻分类的语法功能标准，对古代典籍一部一部地作专书分类研究。从而对古代汉语各个不同时代平面上的词类系统有切合语言事实的描写。

参考文献

王　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方光焘：《六十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古汉语句型研究 (Sentence Patterns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句型，是指语言中归纳出的句子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得出不同的句子类型。如根据语气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根据结构类型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根据谓语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动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等。汉语有一些特殊的句型，如述补式、兼语式等。古汉语中又有一些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句型。

汉语的语法研究开始比较晚，对古代汉语句型作系统研究的更少。《马氏文通》(1898) 第一次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古汉语的句子，其句读论部分将句分为“与读相连之句”和“舍读独立之句”，可以看作是对古汉语句型所作的最早的分类。继《马氏文通》后出版的语法著作也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句型的问题，如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 将句子分为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四类，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 将句子分为简句和复句两种，简句又分普通句（主语、谓语齐全的句）、特别句（缺主语或谓语的句）和独字句，复句又有主从和衡分两种。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杨树达《高等国文法》(1930) 等都涉及到了古汉语句型的问题，但都没有超越《文通》的语法体系。这一时期黎锦熙的《比较文法》(1933)、杨伯峻《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 和陈承泽的论文《国文和国语的解剖》(1923)、《文章论大要》(1925) 等对句型问题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

40 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受到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有一些运用新的语言理论分析汉语事实、揭示汉语语法特点的著作问世。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在他们的著作里对汉语的句型（包括古汉语句型）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 根据主谓结构的关系，将句子分为三类：单句、繁句、复句，又将单句根据谓语的意义和词类性质分为四类：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要略》开创了对汉语句型的研究，分析了这些句型在结构形式上的特点，着重讨论了叙事句中的

几种特殊句式，并首次以“变换”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各种句式（句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句型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根据句子的结构方式，将句子分为简单句（单句）和复合句（复句）两大类型，又将简单句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三类。结合句子成分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三大句型结构方式上的特点，并以叙述句为重点，深入地揭示了汉语动词谓语句的复杂情况，分析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汉语特有的句式，对汉语的句型研究，尤其是古汉语句型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的古汉语句型研究在理论框架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一些虚词和句式的研究逐步深入。围绕虚词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如对判断句中系词“是”产生时代的讨论，有赵立哲《秦汉间的系词“是”》（1957）、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1957）、刘世儒《略论魏晋南北朝系动词“是”字的用法》（1957）、洪心衡《〈孟子〉里的“是”字研究》（1964）、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1990）等；关于主谓之间加“之”字的讨论，有宋祚胤《论古代汉语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之”字》（1964）、洪心衡《论〈离骚〉里的主语谓语之间插“之”字的问题》（1965）等；对连词“所以”产生时代的讨论，有刘冠群、杨伯峻、张万起、潘荣生等人的文章。通过对虚词的研究带动和加深了古汉语语法尤其是句型的研究。

句型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对一些语法结构（句式）的探讨，如对双宾语结构的讨论，早期的论文有沈春晖《周金文中之“双宾语句式”》（1936），后来有周迟明《汉语双宾语句的语法现象和历史发展》（1964）、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中的双宾语问题》（1986）、廖振佑《先秦书面语的双宾语初探》、刘宋川《先秦双宾语结构考察》（1996）、张世禄《论古汉语双宾式》（1996）等文；对“动·之·名”式的讨论，有何乐士《先秦“动·之·名”双宾式中的“之”是否等于“其”?》（1980）、刘百顺《也谈“动·之·名”结构中的“之”》（1981）、唐钰明《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1994）等；对使成式和补语式的探讨有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1957）、周迟明《汉语的使成性复合动词》（1958）、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1959）、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1980）、宋绍年《汉语结果补语式起源再探讨》（1994）、陈克炯《试论先秦汉语补语与动词的类：兼谈“动补句”的句法句型特点》（1997）等。此外，对古汉语中的被动式、宾语前置式的研究也比较集中和深入。

80年代的研究除了传统研究以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如变换的分析方法，这方面有董治国《古汉语句型大全》（1988）、《试论古代汉语句型转换》（1994），唐钰明《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1991）、《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1994）、《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问题》（1995）等。在语法研究中融入文化语言学思考的有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1988），将《左传》的句型分为三类：主题句、施事句、关系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古汉语句型进行考察和归纳，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认识。

参考文献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陈　丽）

古代专书语法研究（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Monographs，Studies of）

专书语法研究是以历代能够反映当时语言面貌的传世古籍和地下出土文献为特定研究对象，对某一部古籍或文献的语言材料进行语法分析。专书语法研究可以是对一部古籍或文献的语法系统作全面的描写分析，也可以是对一部古籍或文献的某一种语法现象作专题研究。研究范围的确定性保证了语料的均质性，因而专书语法研究能够提供确切时代平面上和特定地域内的语法系统的样例，以同一时代平面上所有古籍和文献的详实深人的专书语法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就可以建立起可靠的汉语断代语法系统并进而对汉语语法发展史作出描写和解释。

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有学者从事古代专书语法的研究，如何定生《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1928），黎锦熙《三百篇之“之”》（1929）。30年代至40年代丁声树《诗经“式”字说》（1936）、《诗经卷耳芣苢“采采”说》（1940）等，邢公畹《诗经“中”字说》（1944）、《论语中的对待指别词》（1949），都是专书专题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

1949年以后，专书语法研究的范围迅速展开，古代重要典籍文献如甲骨刻辞、金文、《尚书》、《左传》、《国语》、《诗经》、《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楚辞》、《吕氏春秋》、《史记》等等，都有论著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和《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法》（1956），戴连璋《尚书句首句中句末语气词》（1964）、《尚书介系词研究》（1967），廖序东《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1973），冯春田《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1984），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1989）和《左传范围副词》（1994），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1997）等等。

由于东汉以后言文分化，对汉语语法史研究具有语料价值的是历代典籍文献中的口语成分。40年代吕叔湘、高名凯等开始了对唐宋以后书面文献中的口语成分的研究。80年代以后口语成分比较丰富的重要文献资料的专书研究得到重视，有关论著逐年增多，其中研究成果较多的文献有《世说新语》、《百喻经》、《搜神记》、六朝佛经、《敦煌变文》、王梵志诗、《祖堂集》、《朱子语类》、《老乞大》、《朴通事》、《水浒传》、《金瓶梅》等，影响较大的学者有刘坚、祝敏彻、蒋绍愚、梅祖麟、太田辰夫、志村良治、冯春田、白维国、吴福祥等。

总体上说来，本世纪古代专书语法研究无论是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还是就其研究的深度而言，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对一部专书的语法系统作出全面详实的静态描写的论著尚不多见，一些试图对某一专书的语法面貌作整体研究的论著在对语言事实的发掘上，在体系的构建和方法论的指导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对同一时代平面上的所有典籍文献有完整细致的语法研究的成果更是下一步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因此新世纪的专书语法研究将仍是专题研究与专书描写有机结合，同时在对一

个时代层面上的专书的语法事实进行成系列的准确清晰的描写的基础上，比较同一时期不同专书之间和不同时期不同专书之间的语法差异并从理论上作出解释。

参考文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汉语古今语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mmar of Old and Modern Chinese）

古今语法比较研究是通过比较古汉语与白话在语法上的差异，认识古汉语的语法特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古今语法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是，白话语法由古汉语语法继承发展而来，因此二者的差异反映了古汉语语法的特征及其变化，比较研究的侧重点在认识古汉语语法。

本世纪20年代，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等明确提出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法的思想。刘复《中国文法讲话》（1932）、黎锦熙《比较文法》（1930）是早期古今语法比较研究著作，通过比较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揭示出文言语法特有的一些语法现象，例如黎氏在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上，从"位"的角度找出古今汉语语法的对应规律，从而突出古汉语语法疑否倒装、副位免介、宾足意使等八个重点，其中包括攻破"之"、"其"、"所"、"者"四个虚词的难点。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将古文法和今文法的差异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即代名词的人称与格，代名词的数和关系词的嬗变。后来在《中国语法理论》（1944）中讨论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经常联系古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分析，如叙述使成式时与古汉语中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相比较，分辨表完成貌的"了"与表决定语气的"了"时说明古汉语中只有表决定语气的"了"而无表完成貌的"了"等。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的例句也是文言和白话并举，而以文言居多。全书在对古今汉语的语法事实进行详细描写的同时，对文白语法的具体差异作了全面而精确的比较，由此揭示文言语法的规律，在古今语法比较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4年吕氏《文言虚字》收录20几个虚字，在对每一虚字详细解说的同时，与白话相应的语法形式进行比较。

杨伯峻《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采用语（白话语体）和文（文言）通解的形式，比较古今语法的变化，作者认为汉语几千年来最大变化是虚词，因此重点将古今虚词进行了分类排比。1955年作者出版《文言语法》，在叙述分析文言文常见的词法和句法现象的基础上，与现代汉语语法作了比较。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1958）以现代汉语为视点观察文言语法，从词法与句法两方面比较古今语法的共同点和特殊情形，显示古今语法的演变及各自的特点。张静、张桁合著《古今汉语比较语法》（1964）全面比较古今汉语语法的异同，在每小节后面附有小结性的比较表。以上著作对普通读者学习古汉语都有一定帮助。1979年以后发表的古今语法比较的论著有廖振佑《古代汉

语特殊语法》（1979），傅承德《“之”和“的”（地、得）的比较研究》（1985），李义琳《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人称代词比较》（1990）等。

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1983）提出自指、转指和句法成分的提取等新的观点和方法，并由此将现代汉语中的“的”与古代汉语“者、所、之”进行对比分析；《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将历史的纵向比较与方言间的横向比较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阐述汉语中两种反复问句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并在历史语料中得到证明，为古今语法的比较研究指出了方向。

古今语言的比较研究应以对古代汉语语法本体的详尽描写为基础，避免举例性的简单比附，而是以现代汉语语法为参照系，观察不同时代层面上汉语语法体系的基本特征；以某一时代层面上的汉语语法体系为参照点，通过比较说明其在现代汉语语法中的表现；同时注意古今汉语表达同一语法意义所使用的语法手段的差异。总之要重视从系统上和本质上把握对古今语法的共性和区别特征的规律性认识。

参考文献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描写汉语语法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客观评价各历史阶段代表性人物及重要论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记述语法研究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产生过影响的语法流派，总结汉语语法研究的经验教训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

汉语语法学史是伴随着上个世纪末对汉语的语法有系统的研究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8 年《马氏文通》刊行，不久即有研究论著问世，同时对《马氏文通》之前的语法研究作了初步探讨，如杨树达 1920 年在《高等国文法》中列“中国古代之文法学”一节，1930 年发表《我国古代之文法学》，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马氏文通》之前的语法研究。1931 年他又出版《马氏文通刊误》。此后对《马氏文通》以前的语法研究的探讨和对《马氏文通》的研究评述成为汉语语法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有刘景农《“马氏文通”以前的语法研究》（1962），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资料汇编》（1964），周钟灵《〈马氏文通〉述评》（1978），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4），张万起《马氏文通研究资料》（1987），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1986），王海棻《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等论著和资料。

何容《中国文法论》（1942）对《马氏文通》以来至 30 年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情况作了总结性的评述，梳理出这期间汉语语法研究发生发展的脉络。讨论了中国文法学发生较迟的原因，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诸问题，如词类区分、语句分析、词位等，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

解。这是第一部具有语法学专史性质的著作。1954年胡附、文炼《汉语语法学简史》首次使用"汉语语法学史"这一名称。其后陆续有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论著发表，如方光焘《六十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1959)，郭锡良、祝敏彻执笔的《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1960)，徐通锵、叶蜚声《"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孙玄常的《汉语语法学简史》(1983)，林玉山的《汉语语法学史》(1983)，马松亭《汉语语法学史》(1986)，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1987)，董杰锋《汉语语法学史概要》(1988)，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1990)，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1991)等。除汉语语法学史专论外，中国语言学通史的研究均有关于汉语语法研究史的讨论，如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1959)，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63)，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1980)，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1987)，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95)等。上述论著或长于史实的考察，或重于汉语语法研究发生发展的原因的探究，或详于语法论著、语法学家、语法学流派的评述，或着眼于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等等，应该说各有特色，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是，在继续加强通史研究的同时，注重对语法研究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充分评价总结本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正确认识本世纪汉语语法研究对西方语法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全面清理评述语法专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发挥学术史研究对学科本身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邵永海）

《马氏文通》研究（"Mashi Wentong", Studies of）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出版于1898年，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之前，梁启超就在《变法通议》(1896)中提到"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出版之后，梁启超又多次提到该书。较早对该书予以评论的还有章炳麟（《新方言》卷一）、孙中山（《建国方略》）。随着本世纪初汉语语法学的兴起，《文通》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普遍重视。最早对该书进行认真研究的当推陶奎的《文通要例》(1916)。至今，研究《文通》的专著，公开出版的主要有六部：陶奎《文通要例》、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1931)、章锡琛《马氏文通校注》(1954)、孙玄常著·吕叔湘校批《马氏文通札记》(1984)、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1986)、王海棻《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另外，何容的《中国文法论》(1942)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文通》。有关《文通》研究的论文，公开发表的约100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何容《读马氏文通》(1936)、麦梅翘《马氏文通与旧有讲虚字的书》(1957)、王维贤《马氏文通句法理论中的"词"和"次"的学说》

(1963)、周钟灵《马氏文通述评》(1978)、王海棻《马氏文通代字章述评》(1981)、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评述》(1984)、郭锡良《马建忠和马氏文通》(1989)等。另外，多种语言学史、语法学史著作，也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对《文通》进行了评介。

对《文通》的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引例问题；2. 理论体系及理论来源；3. 对后世语法研究的影响；4. 专题评论，如词法、句法、术语等；5. 作者问题、版本问题。从研究历史来看，可以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出《文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批判的眼光研究《文通》。又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最初的研究主要是质疑刊误，多着眼于具体问题、局部问题来揭示《文通》中存在的前后矛盾现象；30年代后，随着文法革新讨论的出现，不少学者开始从理论上、语法体系上着眼研究《文通》，并重点批判《文通》在理论上、语法体系上的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的缺点。后一阶段是语法学界对《文通》作出全面、公正评价的时期，不少学者开始运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文通》，既公允地批评它的缺陷和错误，又充分地肯定它的历史功绩和对汉语语法学的巨大贡献；既能从整体上对其理论方法、语法体系进行全面的评述，又注重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探讨。特别是80年代后，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文通》的论著，一些大学的中文系还开设了"《马氏文通》研究"课，这使得对《文通》的研究更加深入，在不少问题上，学术界也逐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综合学术界对《文通》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文通》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语法著作，是一部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富有创造性的语法书，对于汉语语法学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文通》的学术渊源不单是西方的语法学，同时还比较好地继承、吸收了我国传统小说的研究成果。《文通》首次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并有不少独到的发明，如重视词法的研究，词类中设助词一类，强调汉语中介词不同于西语中的介词的重要功能，揭示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规律等等。《文通》存在的大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生搬硬套西方语法；在不少理论问题上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缺乏历史主义观点，把不同时期的语料放在一个平面上研究；从意义出发研究语法。

（杨荣祥）

古文字学研究

(Graphology of Old Chinese, Studies of)

古文字学是以中国古代汉字及地下出土的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利用地下出土的隶书以前的各种古文字资料，研究汉字的起源、结构、形体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辨形释义，总结考释方法，探求释字条例，是中国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广义的古文字学，除研究汉字本身外，着重研究释读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并依据这些资料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奥秘，涉及中国古代史、考古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学科领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

古文字学渊源久远，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直到清末才初见端倪。早在汉代，古文字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传世籀文，出土于地下的铜器铭文和孔子壁中书所用古文，汉代学者都有所研究。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县）盗掘古墓而发现的大批战国古简，唐初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

的先秦石鼓文，都是古文字的重要资料。宋代金石学兴起，搜集和研究金石古物之铭文成为一时风尚，辨认古文字的水平也相应有了提高。清代小学与金石学复兴，古文字研究获得了发展契机。乾隆时期，敕编《西清古鉴》（1751）等四部著录宫廷藏器的巨著行世，私家著录金文、研究金石文字遂盛极一时。同光时期，吴大澂（1835～1902）、孙诒让（1848～1908）、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将以金文为主的古文字研究推向一个高峰。吴大澂有《愙斋集古录》（1918）、《说文古籀补》（1881）等重要著作。后者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陶文、玺印、货币等古文字，依《说文》分别部居，是一部反映当时及著者古文字考释成就，并具有重要影响的古文字字汇。孙诒让有《古籀拾遗》（1888）、《古籀馀论》（1929）等，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辨析文字，甚为精湛。方濬益有《缀遗斋彝器款识》（1935）一书，虽出版较晚，但同样反映他当时所达到的研究水平。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考辨文字甚见功力，时有卓见。清末学者的古文字研究，重在文字考证，释字辨形，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如孙诒让的“偏旁分析”法。他们能跳出《说文》藩篱，由古文字寻绎文字源流演变之迹，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孕育于金石学之中的古文字之学，经他们的研究已渐成分立之势。清人对古代玺印、封泥、货币等古文字资料的研究也有初步成果，如陈介祺（1813～1884）《十钟山房印举》就是一部重要的玺印研究著作。1899年殷虚甲骨文的发现，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1857～1909）的《铁云藏龟》问世，次年孙诒让据刘书撰成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契文举例》（1917），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撰《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了甲骨文出土的地点及所属时代。在古文字学从传统金石学走向分立的过程中，甲骨文的发现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20世纪，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并迅速发展。罗振玉继《殷商贞卜文字考》之后，又编纂了《殷虚书契》（1912）、《殷虚书契后编》（1916）等多种刊布甲骨文资料的著作，写成《殷虚书契考释》（1915），甲骨文研究因此而奠定基础。王国维（1877～1927）受罗振玉影响而研究古文字，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17）等论著，开创了文献与古文字互证，研究历史、地理和古代礼制的新途径。罗、王不仅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在金文和其他古文字研究方面也成果颇丰。罗振玉有《梦郼草堂吉金图》（1917）、《殷文存》（1917）、《贞松堂集古遗文》（1930）和《三代吉金文存》（1937）等金文著作数种。王国维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许多单篇论文，对古文、籀文、石经和玺印文字等都有独到见解，这些论文大多收入《观堂集林》（1921）。罗、王二人的贡献，在于他们一方面继承晚清学者古文字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对地下发现的新资料能进行开创性研究，并能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积极影响，在古文字资料的整理、文字的考释、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方法的总结等方面全面推进了古文字研究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古文字研究尽管还明显留有传统金石学和文字学的烙印，但是古文字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工作无疑是由他们完成的。

本世纪2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独立学科正式形成。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虚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出

土大批甲骨和古器物，使甲骨文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参加殷虚发掘并负责整理出土甲骨的董作宾（1895～1963）根据考古资料，首先提出甲骨文的断代问题，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述了殷虚甲骨分期断代的标准，使甲骨文研究的科学水平大为提高。郭沫若（1892～1978）发表了《甲骨文字研究》（1929）、《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29）、《卜辞通纂》（1933）、《殷契粹编》（1937）等释读和研究甲骨文的著作，还全面整理和研究青铜器铭文，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考释》（1935）、《金文丛考》（1932）等重要论著。郭沫若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古文字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对甲骨文、金文等研究有不少创造性贡献，他所创青铜器研究标准器断代法，至今仍是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基本方法。唐兰（1901～1979）始治《说文》，继而研究古文字。他有感于作为文字学的一部分，古文字研究“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遂于1935年写成《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欲“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为科学”。全书“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古文字学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是阐明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和规则”（引文均见该书《自序》）。唐兰非常明确地将古文字学作为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从学科基本要素出发，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文字学的对象、任务、原理、方法和规则等问题；同时，以古文字材料为据论述汉字源流演变及结构规律。这部著作是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30年代前后，古文字学作为独立学科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中名家辈出。于省吾（1896～1984）撰写《双剑誃殷契骈枝》（1940）及《续编》（1941）和《三编》（1943），以考证谨严、方法缜密著称。容庚（1894～1983）在金文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出版有《金文编》（1925年初版，1939年再版）及《续编》（1935）和《商周彝器通考》（1941）等重要的金文著作。商承祚（1902～1991）、王襄（1876～1965）、孙海波（1910～1972）、丁山（1901～1972）、丁佛言（1879～1930）、胡小石（1888～1962）、胡厚宣（1911～1995）等学者，也都从不同方面对古文字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5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形成了甲骨学、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和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等分支，古文字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甲骨学方面　1949年甲骨文发现50周年之际，胡厚宣编撰了《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对这门“刚有半世纪历史的新兴科学”作了一次清理总结，并预示着“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的新时代的开始（见该书《序言》）。50年代以来，西周甲骨的不断发现、小屯南地甲骨的出土和《小屯南地甲骨》（1980）的出版以及《甲骨文合集》（1979～1982）的编就和海外收藏的刊布，极大地推进了甲骨学研究。姚孝遂（1926～1996）、肖丁的《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1984）、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1987）等著作先后出版。继日人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1971）之后，整理甲骨资料的，有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虚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殷虚甲骨刻辞类纂》（1989）和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1989～1995）等。甲骨文字的考释也取得不少新成果，杨树达（1885～1956）的《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等著作，50年代初相继出版；于省吾晚年将考释甲骨文字的成果精选汇编，

成《甲骨文字释林》(1979)；裘锡圭考释甲骨文成就卓著，主要论文多收入《古文字论集》(1992)。《甲骨文编》修订本(1965)、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以及李孝定主编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和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1996)等，汇集了甲骨文字考释成果和各家之说。陈梦家(1911～1966)的《甲骨断代学》(1951)和李学勤、彭裕商的《殷虚甲骨分期研究》(1996)代表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的进展，"文武丁卜辞"、"历组卜辞"和殷虚甲骨两系说等断代新说，引起了热烈讨论并取得重要突破。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一直是甲骨学成果较丰的领域，甲骨文虚词、语序和句法研究也都有不少新成果。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6)、陈炜湛《甲骨文简论》(1987)、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都是对甲骨学总结性的通论之作。赵诚的《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李圃的《甲骨文文字学》(1995)则从文字学角度对甲骨文字进行了综合的研究。经过50年代以来的发展，甲骨学已成为古文字学中比较成熟的分支学科。

青铜铭文研究方面　50年代以来，商周青铜器铭文有许多重要发现，多次出土青铜器窖藏和成组群的青铜器，大量重要铭文的发现推进了金文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出版了《殷虚青铜器》(1985)、尹盛平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1992)、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5～1990)、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等，集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共收商周青铜器铭11,983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金文的考释也成果丰硕，唐兰、于省吾、李学勤等学者在金文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唐兰先生金文论集》(1995)、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等就是他们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反映金文释字成果的工具书，有容庚的新版《金文编》(1985)、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1995)和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1975)及其《附录》(1977)和《补》(1981)等。此外，金文的断代、族氏文字、金文语法及对金文记载若干史实、礼制的研究也都获得不少新的成绩。

战国文字研究方面　战国文字作为古文字学的分支形成于50年代之后。建国以来，战国文字多次大批量发现，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李学勤的《战国文字题铭概述》(1959)一文，对战国文字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朱德熙(1920～1992)、裘锡圭、李家浩等辨认出许多战国疑难字，使战国文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战国文字内容丰富而又庞杂，草率简省和地域异体为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尽管如此，近30年来，它仍是古文字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楚简研究方面，50年代以来已发现楚简20多批，近年整理出版的有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9)及《包山楚简》(1991)、《望山楚简》(1995)和《郭店楚墓竹简》(1998)等。滕壬生编撰的《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楚简文字研究的成果。战国铜器铭文的重要发现有中山王墓铜器群、曾侯乙墓钟磬铭文、蔡侯墓铜器群、鄂君启节、三晋兵器铭文等等。玺印文字是战国文字的大宗，罗福颐(1905～1981)主编的《古玺汇编》(1981)、《古玺文编》(1981)，为玺印文字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吴振武对其释文和分类的订补修正(1983)，推进了玺印文字考释水平的提高。《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1988)的出版，也有利于战国货币文字的研究。张颔编有《古币文编》(1988)，黄锡全、何琳仪等人在货币文字考

释方面也取得不少成果。属春秋晚期的晋国侯马盟书的发现及《侯马盟书》（1976）的出版，对战国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高明《古陶汇编》（1990）和《古陶文字征》（1991）是对战国陶文资料和考释成果的较为全面的整理总结。此外，30年代发现的战国长沙楚帛书的研究，经饶宗颐、李学勤、曾宪通等人努力也有较大突破。李零、曹锦炎等人对传世和新出鸟虫书的研究也都获得值得重视的进展。黄锡全的《汗简注释》（1990）是对传世古文字字书的一次再认识，重新发掘了这类字书的价值。汤余惠的《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6）是一篇研究战国文字构形特点和规律的力作。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1989）是第一部战国文字的通论性著作，有裨于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

简牍帛书研究方面　这是以简牍帛书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某些内容已超出了古文字学的范畴，与古文字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秦到西汉早期的有关资料的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等重大发现和整理出版，对秦代文字及汉字从古文字向隶书转变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这一领域也成为一门内涵十分丰富的古文字学新分支。

50年代以来，古文字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研究资料和成果的丰富积累，为汉字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集中反映了他在汉字形成与发展、形体演变和汉字结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姚孝遂特别关注古汉字理论研究，他就古汉字性质、符号化问题等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1979、1980、1983、1989）；赵平安的《隶变研究》（1993）、黄德宽的《古汉字形声结构论》（1995）、王蕴智的《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1996）等，也都是从古文字出发研究汉字构形与发展的论著。

古文字学学科建设近几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版了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陈世辉和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以及陈炜湛和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1988）等一批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对古文字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基本理论问题予以阐述，使古文字学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的性质更为明晰。许多高等学校不仅有关本科专业增设了古文字学课程，而且还设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古文字研究者。1978年成立了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古文字研究》等刊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文字学研究。作为一门有特色的新的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和研究水平的日益提高，21世纪的中国古文字学一定会呈现出一派更加繁荣的景象。

参考文献

裘锡圭：《古文字学史论集》，见《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黄德宽）

甲骨文研究 (Jiaguwen, Studies of)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刻（偶尔也有写的）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是记录占卜，也有少量与占卜无关的记事刻辞。1899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虚先后出土了15万片左右刻有文字的甲骨，都是商朝晚期（公

元前14至前11世纪）商王或王室成员的遗物，通常所说的甲骨文，即指殷虚甲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在洪洞坊堆村（1954）、长安张家坡（1956）、昌平白浮（1975）、岐山凤雏村（1977）、襄樊檀溪村（1988）、邢台南小汪（1991）、房山琉璃河遗址（1995～1996）等地先后发现了一些周代甲骨文。今天的甲骨文研究，主要是以研究殷虚甲骨文为主，也应包括殷虚以外出土的周代甲骨文，但数量总共不过数百片，对它的研究仅仅是开始。

先驱时期（1899～1909）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鉴定出甲骨上的文字是三代古文，甲骨文始为世人所知。王氏死后，他所藏的大部分甲骨归于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选拓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的出版，使甲骨由只供少数学者观赏摩挲的古董，变成了研究的资料，扩大了甲骨流传范围，意义巨大。第二年，孙诒让"穷两月之力"写出了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孙氏以印刷不精的《铁云藏龟》作为惟一根据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自然免不了有很多错误。但是，披荆斩棘之功不可抹煞。20世纪初，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收藏甲骨。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Rev.FranK H.Chalfant）在1903年开始收购甲骨。1906年发表的《中国原始文字考》被认为是西方甲骨文研究的开始。

奠基时期（1910～1928）　这时期，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的考释和通读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

为了牟取厚利，古董商故意对甲骨的出土地加以隐瞒，罗振玉经过多年留意探寻，1910年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安阳小屯，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这在甲骨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进步。罗氏在甲骨的搜集和传布上功绩卓著。他出版过《殷虚书契》（1913，后通称《前编》）、《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等甲骨著录书。其中以他在日本编印出版的《前编》选材最精，拓本的清晰精美远远胜过《铁云藏龟》。此书是殷虚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后来罗氏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初印，1927年增订），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王国维在甲骨文方面，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对通读卜辞有重要贡献。1917年，王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在甲骨卜辞考释书里是比较有影响的著作。王氏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等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他还根据甲骨文的缀合，纠正了《史记》的错误，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重要的外国学者有日本的林泰辅，他是日本搜集研究甲骨的第一人，编纂了《龟甲兽骨文字》（1921）一书。另一位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 Menzies），于1917年出版了《殷虚卜辞》，是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摹本著录书。由于外国在华人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甲骨很快地流散到欧美、日本等地，并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甲骨学也随之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

形成时期（1928～193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秋成立后，首先计划发掘殷虚，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之间，共发掘15次，先后编成《殷虚文字甲编》（1948）和《殷虚文字乙编》（1953）。

《甲编》、《乙编》和从前的甲骨著录书不同，它是科学发掘甲骨时期的产物，有出土记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20年代末，郭沫若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文等。他的《卜辞通纂》（1933）和《殷契粹编》（1937）在卜辞的通读方面有重要贡献。他的一系列古史著作里引用了甲骨文史料，大大提高了古代史研究的水平。郭氏以后，运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学者贡献较大者有胡厚宣、张政烺、徐中舒、吴其昌、丁山等人。董作宾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写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1933），根据称谓、贞人等10项标准把殷虚甲骨文分为五期，所创立的断代体系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基础，为海内外学者所普遍采用。当时有些人主要凭想象去考释古文字，甚至把释字比作"射覆"。唐兰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廓清这种不科学的学风，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上，而且亲身实践，考释出很多难识之字，他是继孙诒让、罗、王之后，在甲骨文释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主要著作有《殷虚文字记》（1934）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此外，容庚等人的《殷契卜辞释文》（1933）、商承祚的《殷契佚存考释》（1933）等书，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通过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学者的努力，把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标志着甲骨学正式形成。

低潮时期（1937～1949）　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甲骨学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处于低潮时期。抗战期间，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中，根据不同时期在历法、祭祀等制度上的特点，在分期之外又提出了分派学说。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武乙、文丁属于旧派，祖甲、廪辛、康丁、帝乙、帝辛属于新派。他又从"新派"卜辞中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即"周祭"）的制度。这些对于甲骨文研究都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于省吾在1940～1943年出版了三本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编、续编、三编，共新识或纠正过去的误释100余字。胡厚宣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二、三集1945），代表了这一时期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长期以来，甲骨学者普遍认为殷虚甲骨卜辞的主人都是商王，即所谓"王卜辞"。1938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发表《论殷代金文中所见图像文字𡦹》一文，首先提出殷虚卜辞里有不属于商王的所谓"子卜贞卜辞"。后来，他又进一步推阐这一见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高潮时期（1949～1966）　1949年以后，郑州二里岗（1953）、洪洞坊堆村（1954）、长安张家坡（1956）等地陆续发现一些商周时代甲骨文，扩大了人们对甲骨文出土地、时代等认识的眼界。

胡厚宣先后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这四部书共著录甲骨13814片，为甲骨文的传布作出了贡献。

陈梦家1951年发表了《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956年又出版了《殷虚卜辞综述》，这是一部总结前人、当代学者和作者自己关于殷虚卜辞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大型通论性著作，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已有的关于殷虚卜辞的通论性著作。

李学勤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他在《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7）一文中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

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这是很精辟的见解。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非王卜辞”这个名称，进一步论证了在殷虚卜辞里存在着一小部分“非王卜辞”。

停滞时期（1966～1976）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的甲骨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发表的论著很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裘锡圭的《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1972）、张政烺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1973）等。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发现刻辞甲骨5041片，这是建国以来殷虚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全部卜辞拓本汇编为《小屯南地甲骨》（1980～1983）一书，这是继《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1967年，日本学者岛邦男出版了《殷虚卜辞综类》，这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大型的甲骨卜辞辞例索引工具书，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极有实用价值。

繁荣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甲骨文的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名家辈出，论作如林。

1978至1982年，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的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13巨册陆续出齐，全书收录甲骨41956片，甲骨资料中有研究价值的部分大抵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书出版。其间比较重要的，发掘著录有《小屯南地甲骨》（1980），收藏著录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1987）、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和《甲骨续存补编》（1996）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此外，199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虚花园庄东地H3发现有字甲骨579片，这批内容重要的甲骨目前尚在整理之中。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全面整理殷虚甲骨准备了条件。1989年姚孝遂等主编的《殷虚甲骨刻辞类纂》出版，此书可弥补《殷虚卜辞综类》所收资料仅截至70年代以前、且无隶释等缺陷。结集各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为完备的是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1993年，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和高嶋谦一合作编纂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出版，收集了1988年以前中国、日本和西方甲骨学者所撰的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论述，按文字将有关考释著作列于其后，供学者检索。1996年于省吾主编、姚孝遂编撰的《甲骨文字诂林》全书四大册出版，这也是一部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进行整理工作的还有香港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现已出四册，即先公、先王、先妣、贞人（1989），地名（1992），天象（1993），田猎（1995）。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专题性研究极有裨益。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1939年的《甲骨叕存》，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

缀合编》。专就史语所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等《殷虚文字缀合》(1955)、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1959～1972)。70年代以后，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1975)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976)。近年，甲骨缀合专文发表不少，其中以蔡哲茂缀合成绩最大，他的缀合专书将于近期问世。

殷虚甲骨断代是甲骨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977年，李学勤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正式提出历组卜辞实际上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此说后来得到裘锡圭、林沄等的支持。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与方法的检讨。在讨论中，多数甲骨学者逐渐认识到必须把甲骨分类跟甲骨断代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这是甲骨断代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进展。关于甲骨断代新的进展，可参看黄天树《殷虚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1991)，李学勤、彭裕商《殷虚甲骨分期研究》(1996)。

释字是最主要的基础工作。1979年，于省吾总结了40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删订旧作《殷契骈枝》三编，与新释合为一编，题名《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出版。裘锡圭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创获尤多，其成果大多收入《古文字论集》等书中。

研究甲骨文语法的著作，早期有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和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法》(1956)等。80年代以后，国内有唐钰明《定量和变换——古文字资料词汇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沈培《殷虚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国外学者有司礼义(Paul L-M Serruys)、高岛谦一、倪德卫(David S.Nivison)等人，在甲骨语法方面都有所贡献。

通论性的专著有严一萍《甲骨学》(1978)、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1978)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出全面的总结。

参考文献

裘锡圭：《殷虚甲骨文研究概况》，《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

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

(黄天树)

金文研究 (Jinwen, Studies of)

"金文"主要指铸刻在商周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研究"就是研究商周两代青铜器铭文的学问。我国学者认识商周两代铜器铭文资料的价值并对它加以研究，是从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开始的。经历元、明几绝其绪，到了清代才重新振兴起来，出现不少金文研究的专家。进入20世纪后，金文研究全面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资料的整理和著录　刘心源1902年刊行《奇觚室吉金文述》，1937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出版，收商周器铭4800余，集当日金文拓本之大成。在这30几年间有10多种重要著录书问世，其中著录成就最卓著者当推罗氏。50年代后期，于省吾出版《商周金文录遗》，录补《三代》失收器铭616号。60年代，陈梦家出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铜器照片845号，铭文500多号。至此，金文资料的著录已大体完备。进入80年代，将诸书资料萃于一编的台湾有严一萍编《金文

总集》(1983)、邱德修编《商周金文集成》(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1984)的铭文集录部分共18册，1994年出齐，收录了至今所能见到的全部商周金文，资料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印刷之精美，均为其他著录书所不能及。

②工具书的编纂　1925年，容庚出版《金文编》，是我国本世纪编纂的专门收录金文形体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后来几次修订，1985年由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第四版，正编收2420文，重19357文；附录上610文，重866文；附录下1351文，重1132文。成为当时汇集金文形体最多，释字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1994年，陈汉平出版《金文编订补》，1995年，董莲池出版《金文编校补》，对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了匡正。二书是使用《金文编》时很有用的参考书。1995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所收字形均由拓片剪贴影印，下附铭句，并对构形做出说解。除此以外，重要的还有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张守中《中山王𰯼器文字编》等。

③铭文的考释和研究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先后刊行，这两部书在铭文的研究上，成就超越前人。此后把这一研究推向前进的是王国维。王氏的主要贡献在铭文训释方面。他的《生霸死霸考》，通过对金文中月相辞语的研究，创立了"一月四分说"，影响极为深远。他的《散氏盘铭考释》、《盂鼎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等等也都义据精深，创获颇多。他提出考释文字和通读铭辞的"六项原则"(见《毛公鼎考释序》)，对后人启发甚大。30年代初，郭沫若在日本印行《两周金文辞大系》，用他创立的标准器系联法断代，逐件考释研究，着重阐发与古代社会历史有关的材料。由于作了分期分域，遂使原先杂乱无章的器铭成为一套有科学价值的系统史料，把金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时代。郭沫若之后，到70年代，研究队伍扩大，取得的成果众多，仅论文就达七八百篇。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是唐兰、杨树达、于省吾。唐兰曾于30年代末著《古文字学导论》，建立起古文字学的科学体系，提出考释古文字的四个方法。以此为指导，唐兰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如论文《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永盂铭文解释》、《𣄰尊铭文解释》、《用青铜铭文来研究西周历史》等等，对金文研究有深刻影响。杨树达从40年代初才开始研究金文，他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字学、训诂学、古汉语语法学等功底，历10年而成《积微居金文说》七卷，后又成《积微居金文余说》二卷，共收论文381篇，解说314器，以跋语形式专讲那些争论最多、最难解的辞语，"析疑释滞"，成为代表世纪水平的金文考释与研究的成果之一。于省吾研究古文字，强调既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又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他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字形间的纵的关系，他的金文考释，从字形分析入手，字形落实之后才进而研究其他。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释蔑历》、《读金文札记五则》、《墙盘铭文十二解》等等。近年来李学勤的研究成果亦甚丰，著有《新出青铜器研究》，收考释研究性论文40余篇，还有一些论文收入《李学勤集》中。七八十年代，学者们对一些处于铭文中重要位置而又长期得不到确识或误释之字的考释，取得重大进展。裘锡圭释出见于《商周金文录遗》第85号小臣□鼎铭中的"建"，揭示出铭文记载"召公建燕"的史实。从字形、文义上

论证见于散盘中长期被误释为“眉”的字，从章太炎说释为“履”字，揭示出盘铭所载乃履田立封之事；同时还释出见于倗生簋中长期被误释为“遂”的字也是“履”字，则该铭所记也是履田之事，从而为研究西周土地转让关系提供了珍贵的例证，可谓一字千金。李学勤释出常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中一直被误释为“贮”的“贾”字，把见存于铭文之中的西周商贾活动的史实揭示了出来。读“衣”为“卒”，训终讫，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不少铭文文义的误解。于豪亮释出一直被误释为“弘”的“引”字；又释出“俎”字，纠正了“俎”、“宜”同字的误说。林沄详辨了“豊”、“豐”形体区别，纠正了以往某些被释为“豐”的字应为“豊”字。吴振武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把既见于卜辞又见于西周金文中被误释为“戋”、“诛”、“捷”等等的“戋”释定为“杀”字的初文，解决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悬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就西周金文的考释与研究来说，仍有不少疑难尚待下一个世纪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去解决，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和进一步考释的疑难字还有很多。

近几十年来，战国金文（包括春秋末金文）的考释与研究得到飞快发展，铭文研究的成果有张政烺、李家浩等对庚壶铭的考释，裘锡圭等对曾侯乙墓编钟铭的考释，张政烺、李学勤、朱德熙等对中山王器铭的考释。疑难字考释的成果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黄盛璋《新出信安君鼎、平安君鼎的国别年代与有关制度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分国、分类、分地域进行考释研究的一批成果，以及对两周铭文作出选注的成果，如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

④对族氏铭文的研究　这类铭文象形性强，据统计，有四千几百条。《金文编》将它们有选择地收在《附录上》。宋人当年曾猜测是族氏名，并进行过一些研究，本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提出图腾孑遗“族徽说”，产生广泛影响。郭氏之后，沈兼士、唐兰又提出“文字画”、“图形文字”说，把它们列为文字范畴。近些年来，学者大都赞成它们是文字。如李学勤认为是美术化了的汉字，裘锡圭认为它们相当于后世花押，林沄认为它们是图案化的记录族氏的文字。姚孝遂认为它们与文字有联系，但还不能算严格意义的文字，而是属于文字的前期阶段——表意文字阶段。张振林则认为其性质内涵比较复杂：有氏族图腾意义；有象形化美术化的表族氏的文字；有通用文字；还有一些是抽象的氏族或家族的标记，不属于文字。由于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文字，有不少学者尝试作了考释，如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裘锡圭《释“无终”》等，以裘释为最可信。

⑤断代研究　本世纪最早尝试给青铜器断代的是马衡，他在1927年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词中提出确定商器的两项标准，同时列举了七件商代标准器，开本世纪铜器断代之先。1929年，吴其昌提出以铭文中之历朔推断器物的时代。然而由于周代所用历法并不明确，所以这种方法实行起来困难太大。1932年，郭沫若创立“标准器系联法”断代，并在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具体运用，影响甚大。但由于铭文记载年代的器物数量极为有限，遂使诸家对标准器的年代看法难于统一。50年代，陈梦家发表《西周铜器断代》，认为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和形制的）在断代上最紧要，根据铭文内部的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以作为断代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贯起来。他从西周武王器断起，断到穆

王，共断考66器，断代体系与郭沫若相同。60年代初，唐兰发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采用的也是标准器系联法，但他确定标准器的标尺是铭文中的"康宫"。他认为"康宫"是康王的宗庙，铜器上有"康宫"记载的，就一定在康王之后。唐氏以此确定标准器，依据铭文系联了一大批青铜器，在很多器物的时代上和郭氏产生重大分歧。70年代末，又有人尝试发挥窖藏铜器群的作用来确定断代标尺。这方面的成果有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等。

⑥语法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汉语最可靠的资料，学者们利用它作了大量的语法研究，成果甚多。专著有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论文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资料中的语气词》，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式简论》等。

⑦有关社会历史的某些专题研究　这类研究皆就金文资料本身加以发掘，也是金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成果有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等。这些成果既对人们研究西周史有帮助，也对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董莲池）

战国文字研究〔Writing in Zhanguo Period (475－221 B.C.), Studies of〕

"战国文字"本指历史上"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文字。因为文字学上春秋与战国、战国与秦代之间的界线难以清楚地划分，所以所谓的"战国文字"还可包括春秋末和秦统一后的相关文字资料。总体上说，古文字学中的"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至秦统一前这段时间内齐、楚、燕、韩、赵、魏、秦诸国使用的文字。

战国文字是汉字发展史上形态最丰富，构造最复杂的文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显著的地域特征，在研究汉字发展史及汉字的构造和形成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战国文字研究是古文字学三大分支之一（另为"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是一门资料丰富、内涵广博，极具发展潜力的热点学科。

战国文字从字体看，包括篆书、古隶和一些美术字；从书写材料看，有金属、玉石器、陶器、木器、漆器和丝织品；从目前学术界对铭文的主要分类看，包括铜器文字、兵器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简牍帛书文字、玉石文字等。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孔子壁中书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现。孔安国对古文《尚书》的整理可视为战国文字研究的先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籀文"的收录和解释为后世充分认识战国文字保存了珍贵的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正始石经的刊立和汲冢竹书的发现及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两件大事。唐宋时期有石鼓文和诅楚文的发现及郭忠恕所著《汗简》，夏竦所著《古文四声韵》对传抄"古文"的整理。晚清时期王国维在战国文字研究上有相当大的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说法，是一个精辟的论断。

20世纪以来的战国文字研究，随着地下战国文字资料出土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地走向成熟。50年代末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一文，将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相结合，按地域分战国文字为"齐""楚""三晋""燕""秦"五系，标志着战国文字研究

有了长足进展。下面对20世纪以来的战国文字研究，按“金文研究”、“玺印文字研究”、“货币文字研究”、“简牍帛书文字研究”、“陶文研究”、“玉石文字研究”几个主要分类简略地加以介绍。

金文研究　20年代末发现的韩国标准器𩰫羌钟和东周的一些容器和金银器，曾有许多学者著文研究。30年代发现的安徽寿县楚墓铜器，为战国晚期楚文字确立了可靠的标尺。对这些器物，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等人都有考释。30年代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首次对东周的161器进行了分国考察，提出了标准器系联法。这是郭沫若对金文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建国以来有更多的战国重器出土，如50年代末发现的蔡侯器、鄂君启节，70年代发现的朝国兵器、中山王诸器、曾侯乙墓铜器以及近年成为研究热点的子犯编钟和晋侯器。对这些器物，学术界专家有许多精彩的研究。

玺印文字研究　明清以来著录古玺的专书不断出现。建国以来新出的著录书主要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故宫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湖南省博物馆藏印选》、《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新出历代玺印集录》、《印典》等。1981年出版的《古玺汇编》是目前收录古玺最多的结集。罗福颐著有概论性质的《印章概述》和《古玺印概论》等，王献唐著有《五灯精舍印话》，介绍有关古玺的各种知识。1981年出版的《古玺文编》是一部古玺文字字典。对于古玺文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有过大量正确的考释成果，王国维、吴大澂、丁佛言、强运开、黄宾虹及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等是其代表。

货币文字研究　30年代丁福保编辑的《古钱大辞典》是合著录、考订于一身的大型著作。近年马非海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部分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货币文字字典性质的著作有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合编的《先秦货币文编》和张颔编著的《古币文编》。有关货币文字考释的文章很多，如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㒼”和“比”》、《战国邙布考》、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

简牍帛书文字研究　目前已发现的战国简牍资料基本都是楚国和秦国的文字。建国以来共发现楚简近10批，其中包括数量较大的望山简，曾侯乙墓简，包山简和郭店简。这些简的内容包括遣策，卜筮祭祷记录、法律文书、儒、道诸家典籍等，极为丰富。学术界已有大量著作和论文加以分析考释，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解放后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从出土至今始终被学术界关注，专著文章，层出不穷。帛书文字主要指1942年出土的楚帛书。对帛书的研究考释随着文字资料的逐步完善不断加深，近几年发展很快。

陶文研究　最先鉴定并收藏陶文的是清代的陈介祺，而吴大澂则是考证陶文的第一人。王国维、黄宾虹、丁佛言、强运开都对陶文有过准确的考释。1936年出版的顾廷龙的《古陶文舂录》，是第一部古陶文字典。之后有台湾金祥恒的《陶文编》，高明的《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唐兰、张政烺、李学勤、朱德熙、裘锡圭都有专门或主要考释陶文的文章。

玉石文字研究　战国玉石文字包括石鼓文、诅楚文、盟书、守丘刻石、行气玉铭等。石鼓文和诅楚文从唐宋开始历代都有人进行研究，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与《诅楚文考释》是最重要的著作。近些年也偶见有关论著。60年代发现的侯马盟书是盟誓

记录，出土后有很多学者撰文讨论，《侯马盟书》一书是综合研究报告。守丘刻石是解放前在中山国墓葬区附近发现的一块刻石，李学勤、黄盛璋有专文讨论。行气玉铭是一件玉觚，上刻与行气有关的铭文45字，郭沫若、于省吾、陈邦怀等有过考释。

有关战国文字研究的著作还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1989）、汤余惠的《战国铭文选》（1993）等。

（刘　钊）

秦汉简帛文字研究〔Jianbo Wenzi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221 B.C. − 220 A.D.），Studies of〕

本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先后挖掘到一批两汉与魏晋的简牍和残纸文书，引起了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学者的重视。1930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汉代居延、肩水两都尉府所属烽燧遗址发掘，获得两汉简牍一万余枚。5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等地又发现了《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册和医药简牍。70年代以来，先后又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简牍、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居延新简、敦煌马圈湾及悬泉驿汉简、青川郝家坪秦墓木牍、龙岗秦墓竹简、天水放马滩秦墓简牍、江陵凤凰山与张家山多座汉墓的竹简、定县八角廊汉简和连云港尹湾汉墓竹简等简帛资料出土。秦汉简帛文字资料的研究，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古代典籍的发现与研究。一些久已亡佚的古籍被重新发现，如《孙膑兵法》、《仓颉篇》、《相马经》、《相狗》、《相宝刀剑》。一些过去被怀疑为伪书的古籍，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可以证明不伪，如传世的战国作品《鹖冠子》，有人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但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佚书》中有许多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可证明说此书为战国作品是基本可信的。大量的秦汉简帛本古书，如《易》、《诗》、《论语》、《孙子》、《文子》、《庄子》等同传世本有着各种差异，对于考订古籍文字义理，研究古籍的成书时代与过程，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秦汉简帛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数术类古书，如医经、医方、房中术、算数书、导引图以及天文星占、日书、阴阳五行等，对于研究古代医学与传统观念的发展演变和自然科学史，非常重要。在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发现了记载埋葬后的死人复活的志怪故事；尹湾汉简中发现的西汉赋《神乌傅（赋）》，以拟人手法讲述鸟的故事，风格与传世的出于上层文人学士之手的汉赋迥异，这些都是流传在民间的文学作品。

2. 秦汉法律的发现与研究。秦代法律，过去知之甚少，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青川郝家坪秦墓木牍、龙岗秦墓竹简的发现，填补了秦律资料与研究的空白。已知的秦律有《为田律》、《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司空律》、《置吏律》、《效律》、《行书律》、《属邦律》等内容。江陵张家山多座汉墓出土的竹简，不仅有大量的汉律律文，而且还有《奏谳书》等重要的司法文书。已知的汉律有《盗律》、《贼律》、《传食律》、《均输律》、《徭律》、《钱律》、《赐律》、《奴婢律》、《蛮夷律》、《告律》、《史律》、《杂律》等内容。《奏谳书》有春秋、秦、汉议罪案例22个，从中可了解汉代法制与社会情况以及汉代法制对秦制与前代制度的沿袭。在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中，也发现了许多汉代的法律文书，如诏书律令、爰书、劾状、品约及符、传凭证等，其

中"养老令"的资料较多，如《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令册》；也有一些完整的法律文书册，如《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等。这些简牍对于了解秦汉法律及当时的断案、谳狱过程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3. 大量的行政文书的发现与研究。尹湾汉简中的西汉晚期东海郡的行政档案文书。包括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下辖长吏名籍、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属员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等，可用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行政建制、吏员设置、官员迁除等。凤凰山10号汉墓所出简牍主要是乡里行政文书。有《郑里廪簿》，是政府贷粮食给郑里民户的记录；有郑里、市阳里等地算赋的收付记录；有市阳里民户交纳田租的记录；有管理服役者的服长与主管服役之事的服吏及有关机构签订的《中服共侍约》；还有乡里机构的收支账簿等。居延汉简中有上、下级或同级官府往来文书，有守边各种簿籍，如吏卒名籍、守御器簿、兵器出入簿、钱出入簿、吏奉赋名籍、出入关名籍等。敦煌悬泉驿汉简中，有邮驿管理与驿站交换往来文书，有汉朝出使西域和西域各国使节入朝在驿站食宿的记录等。这些简牍对于了解与研究当时国家的组织结构、行政运作、外交与经济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4. 天文历谱书的发现与研究。秦汉简牍上记有丰富的天文历朔资料，天文工作者已据以重新构拟了秦与汉初的朔闰表，订补史籍。如张培瑜已出版了《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

5. 古代地图的发现。主要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和马王堆帛书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7幅地图，绘于松木板上，记有地名28、山名2、溪名8、谷名4、关隘6，发掘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邽县的区域地图，范围东至今陕西宝鸡市西，西至天水秦城区，北至天水市清安、清水县，南至两当与微县北部。曹婉如认为，地图所绘是西汉陇西郡氐道地区，地图绘有三条水系，其中两水系，一为今放马滩所在的花庙河（嘉陵江上游河流之一的永宁河上段），一为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两水系当中的分水岭是番冢山；再一条是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水，为东柯河或永川河。地图内容有河流、分水岭（山脉）、居民点、道路、关隘，并在文字注记中写出了地名、山名、溪名、谷名、森林分布、道里数字和图的方位。

我国秦汉简帛的整理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与法学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甘肃省博物馆与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与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与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郑州大学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海大学等，从事简帛研究的学者近百人。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是中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中心，较多地参与简帛研究的学者约30余人。在欧美，英国剑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学校的秦汉简帛研究较为著名。

（胡　平）

文字学史研究（History of Chinese Graphology, Studies of）

文字学史以文字学的源流变迁为线索，研究其发展历史及规律。与中国文字学悠久的历史相比，文字学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显得较为迟缓。

本世纪30年代之后，文字学史的研究才逐渐为学者所重视。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1937），是这个领域的开启山林之作。全书由编首绪言及文字书时代、文字学前期时代、文字学后期时代和古文字学时代等四编构成，对秦汉至近现代中国文字学发展进行了清理爬梳，介绍了各个时期重要的著作，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文字学的源流变迁史。晚清以来的汉语拼音运动影响甚大，遂有总结汉语拼音运动史的专题著作问世，先后出版了罗常培的《国音字母演进史》（1934）、倪海曙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938）和《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59）。1899年甲骨文发现后，甲骨文研究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在甲骨文发现50周年之际，出版了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1）和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1955）。80年代又出版了王宇信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和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1985）。前者着重介绍了建国以来甲骨文新的发现、著录和研究进展；后者虽述及甲骨学的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通论性著作。此外，一些文字学史专题研究论文也零星刊载于各类书刊。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1983）、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和胡奇光的《中国小学史》（1987）等语言学史、字书史著作中，也包括了文字学史的部分内容，虽然不乏卓见，但是限于体例，均嫌简略。

90年代，文字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黄德宽、陈秉新的《汉语文字学史》（1990），是继胡朴安之后50多年以来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史研究著作。全书将文字学的发展分为创立、消沉、振兴和拓展等四个时期，论述了各个时期文字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和问题，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文字学2000余年发展演进的总体脉络和内在联系，并着重阐述了近代以来文字学的发展和成就。此后又出版了孙钧锡的《中国汉字学史》（1991），全书分绪论、创建时期、“说文学”时期和科学文字学时期等四章，比较全面、简略地介绍了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对现代汉字学的研究有较详细评述。姚孝遂主编、刘钊和董莲池、王蕴智、李玉洁等撰写的《中国文字学史》，1995年也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吸收了已出文字学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并具有自身特色，其分期更为细致，评述古文字学研究的有关章节较为详实。

（黄德宽）

应用语言学研究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of)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很晚。从世界上说，19世纪末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而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中国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和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

应用语言学分狭义、广义两种，中国一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包括范围和内部分类有几种意见。现在比较通行的主要指四大块：一是语言教学，二是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四是语言计划。

总况 20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在与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转了一圈。20世纪之前，粗说，

中国侧重应用语言学研究，但层次比较低，忽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另外一个侧面是结合汉语实际，忽视向外国的借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形成了一个弯度。重视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另外一个侧面，重视向外国借鉴，在结合汉语实际方面有些偏差。因为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受到限制。应用语言学研究虽然受到冷落，但是几千年来重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语言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应用语言学研究解决。应用语言学研究又受到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以积极成分为主的影响，有了或者孕育着进步。20世纪，可以说是这样的历史：应用语言学研究同语言本体研究、普通语言学研究苦苦地探求高层次的结合，在探求的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正在出现的高层次的结合，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新世纪的重要使命和重要标志。

分期和概况　20世纪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894～1912)。二是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12～1949)。三是建国后到实行改革开放（1949～1978)。四是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1978～　)。

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主要是围绕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可以概括为两个运动。第一个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要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取得成绩的主要条件和经验是：一、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有强有力的杂志《新青年》和强有力的主编陈独秀。四、有创作实绩。五、倡导者是一批有影响的学者。问题是：一、简单化。二、不很重视理论建设。三、行文半文半白，过于欧化。第二个是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因为半文半白，过于欧化，不好懂，给了复古派反对白话文的可乘之机。于是陈望道等提出大众语。积极方面是：一、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提出语言要浅显易懂，交际要看对象。二、开展建设普通话的讨论，认识有了进步。关于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提法也有进步。三、有陈望道等一批语言学家在倡导。问题是：一、批评白话文过了头。二、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第三个是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国语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国音常用字汇》，标志着北京语音的音系作为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事实已经基本确立。

建国后到实行改革开放　主要是围绕语文知识大普及开展的。语文知识大普及有这样一些社会背景：一是40年代延安整风，解放区重视语文学习，全国解放是原来解放区的扩展，全国重视语文学习。二是全国逐渐转入建设，语文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三是工作的需要，以及受苏联的影响，重视对干部的语文要求。四是新中国成立，在世界上要树立自尊的形象，语文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五是工农大众文化上翻身，大量使用语文，迫切需要普及语文知识。《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且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和这篇社论有很大的功绩，教育了一两代人。问题是：一、形成了规范化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二、对不少语言现象判断过严过早。三、不正确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

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解放后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阶段。推广普通话确定了标准和工作方针，现代汉语规范化确定了规范的涵义、态度和主要任务。语文教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试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5年经过试教，195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进入60年代之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很难开展，1966年进入了长达10年的停顿和遭受破坏的阶段。

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初期是恢复阶段，1986年1月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进入了再发展阶段。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中国制订语言规划的重要典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解决了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把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列为第一项任务，不再重申汉语拼音化方向，不把简化汉字单独列为一项任务，提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分三级的要求，理论上强调了语言的科学性和社会性，提出语文工作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

推广普通话研究　1993年决定以必修课的形式在全国的师范院校开设“教师口语”课程，语文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有关教材。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推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的成果。语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是普通话词汇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詹伯慧、于根元在推广普通话的理论研究方面有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姚佑椿、汪慧君、易洪川等分别对上海、合肥、武汉等地的地方普通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现代汉语规范研究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96年出版了修订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广大学者对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多次深入的讨论，陆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发表在《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学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研究》等杂志上，主要有：一、交际值是衡量规范的原则。二、规范就是服务。三、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四、语言中有大量的中介状态。五、不同风格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六、区分学习语言的过渡状态和语病。七、对待规范的态度刚柔相济。八、从语义、结构、色彩、节律、语用等多角度分析规范。九、色彩是个动态的系统。十、语言变化具有惯性。十一、规范具有层次性。十二、语言始终处在潜与显的过程中。十三、预测观是重要的规范观。十四、语言表达具有功力、思维、情趣三要素。十五、从规范评议失误中研究规范。

语文教育研究　总的成果是加强素质教育和语言应用的教育基本上成为共识。语言能力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和重点。北京市教育局组织了课题组，王培光出版了《语言能力与中文教学》(1995)。王建华的《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1993)是探索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1990)和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1990)都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的力作。李宇明的《儿童语言的发展》(1995)是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　计算语言学研究引起重视，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的词汇问题开始了集中的研究，冯志伟、陆汝占、黄昌宁等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贡献。社会语言学研究也赢得了显著的地位，陈原、王宗炎、陈

章太等在总论等方面有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学作品语言和语言风格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程祥徽、黎运汉主编的《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收录的这方面学者的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语现代风格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新词新语研究更成为这时期的热点，从呼吁、写札记、编词典到理论探索，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成为探讨规范观、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此外，广告语言、播音语言、法律语言、公安语言的研究也都有专著出版。

理论研究　有了重要的突破。1997年12月又一次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2年来的工作和主要经验，部署了跨世纪的工作任务，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语言与生活要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语言文字工作重在建设，语言文字工作特别要重视政策。这些都是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过去比较长的时期有两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本身是没有理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是中国本身是没有语言学理论的，都是从外国来的。这个时期提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学科”，应用语言学也总结规律，也有理论、原则、方法。这个认识调整了语言学内部的分类：语言学里分语言本体研究、应用语言学，两者都有理论，总的是语言学理论，属于前者的基础部分是普通语言学，属于后者的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其中又分应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技术理论等。过去的普通语言学里包含了一部分应用语言学理论，需要分出来，但是两者还是需要有交叉的部分。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语言生活实际。

经验和教训　中国20世纪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经验是语言工作和研究为了国家的富强，所以跟政治、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语言工作者和研究者有很强的责任感。主要教训是这方面的分寸没有掌握好，对语言内部的特点认识不够，简单化，语言工作和研究往往一定程度地淹没在政治等里面，有时候又单打一。因为简单化，急于求成，对队伍建设、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总是认识不够和投入不够。

展望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当前特别要重视理论研究。这方面同外国的差距，主要不在理论的高度，而在于细化、专题化、大量应用、便于操作。中国目前的不足是理论的创新、开拓同细化、专题化等的交接方面。这些工作需要一大批人来做，要有计划地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队伍。而队伍建设需要花时间，需要适度超前，又不容易很快产生独立的效应，因此容易被忽视。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徘徊不前和空前大发展的两种前途都是存在的。关键是看队伍建设和应用语言理论建设是否真正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仲哲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和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傅永和等：《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和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

（于根元）

自然语言理解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udies of)

自然语言理解是研究计算机如何“理解”人类语言的学问，更具体的是指计算机程序利用语言知识和真实世界知识对语言中的信息成分进行的提取、分析、处理、推理和判断。自然语言理解又称作语言信息处理。当将汉语作为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对象时，就产生了中文信息处理这门新的交叉学科。这里的中文信息处理仅狭义地指语言层次的课题，不包括诸如汉字集、编码、字形生成、存储、输入、输出、编辑、排版等文字层次的研究任务。

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看，自然语言理解的任务是实现一个建立在某种理论模型基础上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能够给出理解汉语、英语等自然语言的结果。由于自然语言固有的复杂性，人们对自己理解语言的机制也还是不甚了了，给“理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由于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因此，关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一般是根据实用的信息处理的观点进行评判的。如果计算机实现了人机会话或机器翻译或自动生成文摘等语言信息处理功能，则认为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理解自然语言的能力。

为了实现语言信息处理的种种功能，人们在开发自然语言的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境分析等技术，在积累诸如电子词典、语料库等语言数据资源。这些技术和资源有的已经独立形成产品，有的被集成到信息处理系统中以提高系统的智能水平。

由于语言与思维、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研究已成为西方现代哲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突破口。语言科学是人文科学中的领先科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具有与哲学、数学相当的地位。由于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引进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语言学本身也产生了飞跃，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指导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开发的计算语言学是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开展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可以带动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

智能的本质是当代科学难题之一。要实现自然语言理解，最终必须了解人是如何理解语言的以及儿童是如何学会母语的。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对人类的语言现象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各种争论之所以相持不下，是因为对大脑作为智能活动（包括语言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功能还未能透彻了解。在计算机上建立一个模拟语言理解过程的认知模型（现在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是这种模型的雏形），可以为观察大脑这个“黑匣子”的活动提供一个可以观察的“窗口”。利用计算机不仅成功地模拟了逻辑思维，而且也在模拟形象思维和灵感方面进行了探索。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可以为智能科学的突破贡献力量。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在计算语言学领域建立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使汉语理解研究同国际上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接轨。但由于汉语毕竟有不同于英语、日语等语言的特点，如果能很准确地把握汉语的特点，那么为中文信息处理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也会为自然语言理解的突破作出实际的贡献。

数字型计算机在非数值领域的应用最早是在语言信息处理领域内开始尝试的。电子计算机问世不久，就开始了机器翻译试验。但无论同计算机技术本身的发展相比较还是同它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技术的发展相比较，语言信息处理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道路是曲折的。

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及 60 年代前期美国

出现过机器翻译研究的第一次热潮。1964年美国科学院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发表的ALPAC报告给机器翻译泼了一瓢冷水，语言信息处理又有过一段沉寂期。自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进步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由于一些机器翻译系统和数据库自然语言界面进入实用，更由于社会需求的推动，语言信息处理研究重新进入繁荣期。然而发展并不顺利。原定90年代初完成的国际上两个大型机器翻译研究计划（一个是欧共体的，另一个是日本与4个邻国的）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90年代初形成热潮的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学方法同样碰到重重障碍。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自然语言理解至今尚未能跨越“语义障碍”。近年来，因特网迅速扩张，大量信息如潮水涌来，网上信息的主要载体还是自然语言，人们渴望发展文本自动分类、文献检索、信息提取、语言翻译、自动文摘、自动勘校等实用的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加速信息、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促进社会、经济、科学的进步，显然这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挑战。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机器翻译研究的国家之一，50年代中期就进行过机器翻译试验。不过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较大规模的、比较系统的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是比较晚的。鉴于国情，我国的多数学者又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实用系统的开发，理论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理论成果较少。尽管也开发出了一些有水平的系统，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与国际水平比较，还有一定差距。

汉语的“根”在中国大陆，这是我国在汉语信息处理领域的优势，不过对现有的优势也不能估计过高。在语义分析与语境分析的层次上存在于各种自然语言之间的主要是相似性。如果只看到书面汉语用形音义结合的汉字书写，则认为在语义分析方面汉语会超越其他语言而提前到达胜利的彼岸，可能是过于乐观了。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的外在特征是既缺乏形态变化，又缺乏作为句法标志的黏着成分，再加上各级语法单位之间的界限模糊，在句法的层次上，汉语分析却面临着特殊的困难，而句法分析在实际运行的大多数语言信息处理系统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正确认识汉语自动分析的问题与潜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我国，语言工程所需要的人力以及语言数据资源都是丰富的。我国学者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贡献。

建立大规模的综合型语言知识库是发展中文信息处理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这个知识库既包括词法、句法知识，也包括语义乃至语用知识；这个知识库中的基本语言单位既有词，也有语素和短语；这个知识库既包含原始的语料，也包含经过多级加工的语料，知识含量高、存储格式规范的机器词典更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机器翻译，这个知识库不仅包含汉语知识，还要包含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对译知识。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不过很分散，质量也参差不齐。现在既需要集成，也需要发展。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开发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可以成为这个综合型语言知识库的构造材料。

在建设综合型语言知识库的同时，也需要探索适合汉语的计算模型。基于复杂特征集和合一算法的多种计算语言学理论模型和语料库语言学都曾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探讨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的汉语语法体系仍是一项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机器加工与专家校对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自动加工又结合规则的方法与

统计的方法，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大规模的语料库实现多级加工。有了一个规模、加工深度与精度都满足要求的语料库，就有可能构造出概率语法，从而结束硬性的语言规则与模糊的语言现象总有抵触的局面。

利用现有的语言处理技术和语言数据资源可以开发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提高信息技术产品的智能水平。市场的收益反过来支持理论研究和基础工程，使理论、基础、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计算语言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我国缺乏这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加速语言信息处理领域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这对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刘开瑛、郭炳炎：《自然语言处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姚天顺等：《自然语言理解——一种让机器懂得人类语言的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冯志伟：《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俞士汶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俞士汶）

汉语字频和词频研究（Frequencies of the Occurrenc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Chinese，Studies of）

汉语字频和词频是汉语的字的使用频度和词的使用频度的简称。字频与词频的计算方法是：用特定的语言资料范围中某单字或单词的出现次数除以这个范围中的所有单字或单词的出现总次数，所得到的百分比就是该单字的字频或该单词的词频。

早期的字频词频统计是手工进行的，手工统计的语料范围有限并且难免有错。80年代以来的字频词频研究结果大都是计算机自动统计的，统计的语料范围大，精确度高。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有序的语言资料叫语言资料库，简称语料库（corpus）。中文不实行分词连写，也没有词间空格，词与字、词与词组的划分没有定论，计算机的词频统计受分词规范和计算机自动分词精度的限制，其结果不免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处。字频和词频研究总是与特定的语料有关的，语料范围不同，会得到不同的频度统计结果。目前多数汉语字频词频研究统计的对象是书面汉语语料，一些涉及口语的字频词频研究也是将录音语料转写为书面语料之后进行统计的，真正进行语音方式的字词频度研究的结果还不多见。

字频词频研究还必然涉及对不同范围的语料的科学抽样，选样原则和语料选取的“最优量”研究都是字频词频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字和词的“使用度”和“分布率”是考察常用字和常用词时提出的概念并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在筛选常用字和常用词时不仅要依据它们的频度，还要考虑到它们在语料中出现的文本篇数和语料类数，即它们在语料中的分布，或者叫做“散布系数”，依据散布系数和频度再计算出字或词的使用度。“覆盖率”是考察一批单字或单词的累计频度，即这批字或词的出现次数累计覆盖了语料总数的百分比。例如：《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汉字频率表”统计的语料总字数是1808114字，不同单字总数是4574字，前116个高频字覆盖50%，覆盖90%的是908字，覆盖95%的是1358字，覆盖99%的是2418字。不带频度的字和词是不存在的，死字和已经消亡的词也是有频度的，是历史上的频度，是历时语言学要研究的频度。

我国早期最有系统地进行字频研究的是

教育家陈鹤琴，他与助理员费时两三年，对于儿童用书、中小学课外著作、通俗报刊等六类语料554478字进行了手工统计，得到4261个不同单字的统计结果，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出现300次以上的单字有569个，出现100次以上的单字1193个。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国民识字教育。

最大规模的一次手工字频统计研究是1976年12月由北京新华印刷厂748工程查频组组织19个单位完成的，内部印行了《汉字频度表》，抽样统计了工业、农业、军事、科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方面的书刊、报纸192种，总字数21629372字，得到不同单字6374个，其中出现21次以上的常用字部分为4152字。这次字频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计算机用字，为748工程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确定汉字库的字量寻找科学依据。《汉字频度表》不仅成为当时汉字库、汉字编码等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依据，也是日后制定和颁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的重要基础。

1979年武汉大学的语言自动处理研究组开始使用计算机做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的逐字索引和字频统计，1980年完成《骆驼祥子》的自动编索和查频工作，其“单字频度表”、“部首索引表”、“逐字索引”作为《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的第一辑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版的第二至第五辑分别是《倪焕之》、《北京人·雷雨·日出》、《子夜》、《三里湾》的逐字索引，每辑都有“单字频度表”。这次编纂逐字索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给正在编纂的《汉语大字典》补充现代汉语例句，“单字频度表”是副产品。

1981年北京航空学院主办国家科委的“现代汉语词频统计”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10单位参加研究，这是最早的计算机词频统计研究，采用人工分词和计算机自动分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统计，从1919～1982年的约3亿字的语料中依随机和有规律（等距、分层）两种不同方法抽取了约2500万字的样本，分为四个时期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类10个子类。在此基础上北京航空学院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从1977～1982年的138000000字的语料中，抽取了11873029字的语料进行统计，得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汉字频度表》，有不同单字7745个，常用字部分3500个字覆盖率为99.49%。这次统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推动中文信息处理向词处理阶段推进，包括词库建设、词汇编码、分词规范与自动分词研究等。字频统计的目的是为了对现代汉字进行量化研究，为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研制提供依据。

1985年7月北京语言学院完成“汉字频率表”，选用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语料共4大类，179种，另将1978～1980年全国通用的10年制中小学语文课本按类列入。实际统计的字数是1808114字，约130万词次，不同单字4574字，不同单词31159条，一些词条带有词性和词义的说明。语料实行人工分词，计算机统计。本项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198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是首部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的频率词典。

1987年1月新华社技术研究所公布《1986年度新闻信息汉字流通频度》，计算机自动统计了198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华社国内通稿90627篇，40632472个字符，统计结果表明：1986年度新华社通稿使用不同汉字6001个，标点、阿拉伯数字、

外文字符96个。在此基础上对GB2312—80的6763汉字和一、二级汉字作出了分析。

字频和词频的研究促进了有关的标准和规范的颁布以及相关的工具书的出版。例如：1981年国家标准局颁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收有单字6763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3008个，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依据15种常用字统计资料和5种通用字资料拟订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语文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

随着汉语汉字的信息处理向多媒体光盘（CD－ROM）、因特网（Internet）和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发展，汉语字频和词频的研究将从现代向古代发展，从共时研究向历时研究发展；并且应有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定期公布每年的字频词频统计结果和新词表，与港台的字频词频和新词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还应对流行期刊、图书的字频词频进行年度追踪检测和研究。

参考文献

陈原主编：《现代汉语定量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陈原主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张　普）

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研究（Automatic Tagging of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Words and Segmentation of Words in Chinese，Studies of）

由计算机程序对文本中的词自动加上词性等标记的研究工作。这是计算机自动分析自然语言句子的必要步骤，即词法分析的主要内容，也是对语料库的最基本的加工。

词性自动标注研究工作最初是从英语开始的。虽然英语词典对每个词的词性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存在同形兼类现象，句子中的词又有屈折变化，英语的词性标注也是相当困难的。为提高自动标注的准确度，发展了基于规则的或基于统计的各种方法。正是由于基于统计的词性自动标注的成功推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进步。

中文文本是按句连写的，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实现中文词性标注的必要前提是将由汉字串构成的句子切分为词的序列。由于人们对汉语的“词”的朴素认识以及汉语语法学关于“词”的定义均欠缺可操作性，实现自动切分的基础是制订一个规范。我国于1992年颁布的国家标准GB－13245“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制订过程曾推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了切分规范，自动切分还会碰到歧义切分问题。如：

他将来北京旅游。（此句中“将来”是两个词）

他将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此句中“将来”是一个词）

白天鹅可以看家。（此句中“白天鹅”切分为“白天”和“鹅”）

白天鹅飞过来了。（此句中“白天鹅”切分为“白”和“天鹅”）

在中文句子实现正确切分之后，词性标注仍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最有影响的《现代汉语词典》除了少数虚词，并没有注明每个词的词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词类划分是汉语语法研究中长期争论而又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建立了一个词类体系，要将数以万计的词归类，确定其词性，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实用的汉语信息处理系统中通常会有一部带有词性的汉语机器词典，但为特定应用目标

建立的词典及其词类体系通常难以适合他人需要。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同北大中文系合作，积10多年之努力，开发了一部通用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这部词典收词5万余条，在依据语法功能完成词语分类的基础上，对分别属于各类的每一个词语都详细描述它的各种语法属性信息。这部机器词典在中文信息处理界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词典中词的词性是静态的，一个词可能兼属若干词类。如"把"至少兼属介词、量词和动词。词性标注则是要动态地决定句子中每个词的惟一的词性。如：

他把茶壶打碎了。（此句中"把"是介词）

他买了一把茶壶。（此句中"把"是量词）

今天由他把门。（此句中"把"是动词）

汉语的词缺乏形态变化，汉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又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自动标注时必须努力解决词的兼类歧义问题。

除了歧义之外，无论切分还是词性标注，还会遇到"未定义词"的问题。这是因为机器自动实现这些功能时依赖的是机器词典或者是已经处理过的语料。"未定义词"的一种含义指在文本中出现了词表中没有的词，另一种含义指词典中虽有某个词，但却未登录该词在实际文本中应该标注的词性。

现在能够实现中文词语切分的软件较多。多数词性自动标注软件以切分好的文本为加工对象。也有些软件可以同时完成词语切分和词性标注，这样做的好处是在词性标注时可以返回去校正切分时遗留下来的某些错误。这些软件虽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准确度，但要满足不同的实用要求时，可能还需要不同程度的人工校正。当正确地切分并标注了足够多的语料时，积累的语料、技术和经验又可被运用于进一步提高计算机消解歧义与处理未定义词的能力。

参考文献

黄昌宁：《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分词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7。

周强：《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汉语词类标注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95。

俞士汶等著：《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俞士汶）

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语料的时间限定在现代汉语（通常是1919年以来）范围之内的语料库是现代汉语语料库。目前国内的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语料库建设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并且首先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料库的建设。近年来一些语料库中的库存生语料已经从百万级发展到千万级和上亿级。

我国早期建立的语料库有1983年建成的武汉大学"中国文学名著语料库"，计划采集老舍、曹禺、茅盾、巴金、叶圣陶、赵树理等九人的作品527万字，完成250万字后停止。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建成"现代汉语语料库"，采集五四以来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作品4大类179种，另有部分中小学语文课本，共计180万字，131万词次的语料。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建成"中小学语文课本语料库"，采集国内中小学语文课本语料107万字。规模最大的早期语料库为北京航空学院1986年完成的"现代汉语词频统计语料库"，采集1919－1982年间的语料约3亿字，抽出样本约2500万字，实际统计字数21084616字。

早期建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多数是未经

加工的“生语料”，或者仅仅有分词标记的分词语料，“生语料”是没有加入任何语言学标记的无标记语料。有标记的语料是“熟语料”，“熟语料”的标记如：分词标记、词性标记、短语标记、语义标记、句型标记等。进入90年代，获取电子版语料的渠道越来越多，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相对越来越容易，语料库的建设向加工的深度发展。这一时期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主要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现代汉语语料库”，主要收录文学著作和科技文献，总库量超过1000万字，语料库系统可以自动分词并自动标注词性、短语、句型等。清华大学中文系“ZW大型通用汉语语料库系统”语料库到1994年6月已经采集2500万字，对100万字的语料进行了句型自动分析和分布统计。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1995～1998年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工具”，预计建立8000－1亿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拟订一系列的语言标记集，有分词、词性、句法关系等自动标注和辅助校对工具，完成200万字的标注和校对工作。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还在1992年建成“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库”，1995年完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料库”、“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和“现代汉语句型语料库”。1998年还与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建设了“现代汉语语料库”200万字，全部都有分词和词性标记，并有单句及主题标记。1990年新华社等单位完成“现代汉语新闻语料库”，采集新华社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共1亿2千万字，语料全部经过自动分词，统计出不同词条156434条，经审定后筛选70030条建立“新闻汉语词库”。1990年山东大学完成“当代汉语流通语料库”，采集1985—1989年的流通语料560万字，语料进行了分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建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拟收通用语料5000万字以上，选材自1919年至90年代。此外，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都有为不同目的建设的不同规模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上述语料库只有极少数进行商品化出售或提供公开的检索服务。

随着计算机硬软件环境的不断更新和语言学研究的进展，今后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将向流通语料、应用语料、双语语料、口语语料、多媒体语料等方向发展，将会从句法、语义、语用的角度加深对这些语料的加工和研究，特定学科、特定地域的语料库建设也会受到重视。语料库文本的自动获取、分类、过滤，语料的自动标注及自动进行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篇章分析，从语料库中自动获取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等一系列工作都将得到推动。由于生语料库的建设越来越容易、粗加工的语料越来越多，光盘版和网络版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将逐步上市。面向计算机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料库，面向语言教学、语言教师和语言学家的现代汉语语料库都将会逐步走向实用。

参考文献

吴立德等：《大规模中文文本处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俞士汶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张普：《近年来汉语信息处理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应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张　普）

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of Ancient Chinese）

收录古代汉语真实文本的语料库是古代

汉语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是一个封闭的范畴，最终可以建立全集，不用抽样建设，当然也可以在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全集中进行抽样研究。古代汉语语料库也要进行文本标注和把生语料加工为熟语料的语料标注，只是标记集可能不同，自动标注的实现方法也可能不一样。例如：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自动分词的实现更加方便。但是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也有其特殊的困难：首先，现有的汉字库和汉字输入输出系统均不适用于古代汉语文本的处理，信息处理用国家标准和ISO国际标准均只有20902个汉字，因此5万汉字以上的大汉字集和全汉字集的中文平台研究、古籍整理用的汉字字体与字形研究是建设古代汉语语料库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其次，先秦古文字的语料库如何建立也必须依赖于古文字字库及其输入输出系统，古文字要不要选形和怎样选形都要事先决定。再次，古籍的版本问题、注疏问题、标注问题等解决起来都是十分复杂的。

我国计算机与古籍的结合始于80年代初期，1983年“全国语言学学科六五规划会议”上讨论了计算机与古籍整理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并且首次将有关的三项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即用计算机编制《论衡》逐词索引、《儿女英雄传》虚词索引、《朱子语类辑略》虚词引得，这还谈不上是建立古代汉语语料库，只是专书的录入和处理。1986年深圳大学建立《红楼梦》语料库和多功能检索系统，1987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等3个单位将标点本《史记》输入计算机，建立《史记语料库》，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将500万字的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诗存入计算机，另外还存入了《论语》和《般若波罗蜜经》，同年，深圳大学又将《全唐诗》输入计算机。这以后古代汉语语料进入计算机的规模逐步扩大，四川大学处理了《全宋文》语料库，河北大学建立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库，陕西师范大学建立了《十三经》语料库、原文阮本字形库、全汉字信息库、研究工作信息库等一系列先秦资料库。上海博物馆建立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和中国碑刻信息的“多层次图文语料库”。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完成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资料库，开始建立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资料库，1994年又开始建立出土简牍帛书文献资料库，在资料库的基础上编纂了《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古籍全文资料库已经将二十五史、新清史、诸子、十三经、大正藏、台湾方志、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近亿字的古代汉语文本输入了计算机。

进入90年代，多媒体光盘（CD-ROM）技术、超文本技术、超媒体技术（Hypermedia）为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超大容量存储，多版本、经传注疏、研究考据、原物原形之间的关联都得以实现。有关中医针灸、经络腧穴和中国推拿按摩的全部古代文献、有关《孙子兵法》、《论语》的全部文献等首先进入光盘，1997年之后由于电子出版领域的大踏步推进，差不多所有的古文献都纳入各大电子出版机构的选题计划视野，1998年已经有两种扫描版《四库全书》光盘陆续上市，可全文检索的光盘也将随后推出。在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用字研究、词典研究、音韵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课题均有开展。1993年在北京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现代化技术研讨会”，1995年又和北京语言学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现代化国际会议”。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古

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研讨会" 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都是这些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今后，古代汉语语料库用的全汉字库、中文内码、中文平台、标记语言的研究，有关规范的研制和推行，超大规模重复劳动的协调，语料库的资源的深入开发利用，光盘版和网络版的发行将会是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张普、石定果：《计算机在古籍整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论古籍整理用全汉字字库的字体与字形》、《中国古籍语料库的建立与标准化》，见《汉语信息处理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谢清俊：《中央研究院（台北）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现代化国际会议报告论文集》，1995。

穗志方、俞士汶、罗凤珠：《宋代名家诗自动注音研究及系统实现》，北京：《中文信息学报》第12卷第2期，1998。

（张　普）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Studies of）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把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今天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接收东欧留学生开始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初创阶段　1950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正式开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该专修班调入北京大学，并改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同时，为了就近培养大批越南留学生的方便，先后于1952年在广西南宁创办一所育才学校、1953年在广西桂林又开办了"越南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两个单位于1956年、1957年停办后部分教师调入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语文专修班。为了接收大批非洲留学生来华，195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非洲留学生办公室"，专门负责对非洲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1961年，北大中国语文专修班和北外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至此，在我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及对外汉语教师基本上都集中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据统计，这10年间共接收来自60多个国家的3315名留学生。此外，在50年代我国也开始向国外派遣教师。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一支专职对外汉语教师队伍，但教学类型还比较单一，规模也比较小，主要是汉语预备教育。

二、发展阶段　1962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和出国留学生部合并，独立建校，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成为我国惟一一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校。1965年夏，全国又有20多所高校承担了对外汉语教学任务，1965年全国在校留学生总数达到3312人，为1961年在校生的七倍多。为了培养专职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适应派往国外任教，高教部从一部分重点大学的中文系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作为储备出国汉语师资，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分别进修三年外语，由此开始了我国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一种独特模式，从1961年至1964年共四届培养了100多人，成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三、恢复阶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中国建设》上的"中文月课"及少量向国外派遣汉语教师外，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基本上中断。70年代初，我国在外交上

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国内高校也已开始恢复招生，国外许多国家强烈要求向我国派遣留学生。1972 年 6 月北方交通大学成立汉语培训班，接收了 200 多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留学生，为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同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恢复北京语言学院，并于 1973 年接收了 42 个国家的 383 名留学生。同时，其他形式的对外汉语教学（如对外广播汉语讲座、对在京外国外交人员的汉教等）也陆续恢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机构。

四、成熟阶段　70 年代末以来至今。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 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大力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战略方针，这一切使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对外汉语教学规模迅速扩大，层次不断提高，门类更趋丰富。来华留学生及全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单位数量激增，1965 年全国只有 20 多所院校开设对外汉语教学，1998 年全国已有 300 多所学校和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除了国家正规的大专院校、北京外交人员汉语教学中心外，还有少数民办高等学校（如北京新亚研修学院）及专门指定的中小学（如北京五十五中学、芳草地小学），还有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北京外企人员国际汉语教学中心等。来华留学生人数在 1997 年一年即超过 4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以汉语为专业，并从过去主要是汉语预备教育及短期培训或进修向攻读汉语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发展，如 1996 年长期自费留学生中，学习本科以上的占 67.66%。这一发展使对外汉语教学开始了从过去经验型教学向科学型教育的转变，并逐步建设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对外汉语教学无论在教学实践或理论研究等各方面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任何一门其他学科所不能包括或替代的。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会后发表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简况》中明确提到：“要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培养专门的人才。”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开始启动，主要表现在：

1. 创办了专业刊物和专门出版社　专业学术研究必须有专业学术园地或阵地。1977 年 2 月北京语言学院创办《语言教学与研究》，先不定期内部试刊，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1979 年 9 月改为季刊，在国内外正式发行。1987 年夏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后，正式创办会刊《世界汉语教学》。1987 年 8 月，北京语言学院又创办了普及型月刊《学汉语》。《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等学术刊物也先后设有“第二语言汉语教学”专栏或经常发表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此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有的多次出版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成果的专刊或增刊，有的在学校的学报上开辟“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专栏，大大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研究。1985 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正式成立。翌年，国家外文局也成立了专门出版对外汉语教材及有关图书的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教育出版社、现代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了大量对外汉语教材（包括声像教材）、工具书、参考书、论著等，

有的出版社还成立了常设的“对外汉语教学编辑室”。

2. 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统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业务工作的领导机构

北京语言学院1984年首先成立了语言教学研究所，1987年又成立了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语委所属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也把对外汉语教学列为其重点研究任务之一。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正式成立，1988年经批准更名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成为独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截止到1998年6月30日，有会员787人。自学会成立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对外汉语教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选，还不定期举行小型专题或专家研讨会并出版有关论文集。为适应需要，1996年又成立了北京、华东、华北（包括西北）、东北、华南（包括西南）五个分会，有力地促进了地区性学术活动的开展。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还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积极展开活动。1983年7月受教育部委托，组织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师代表团与来访的美国汉语教师代表团举行学术讨论会，并商定了13个合作研究项目；从1984年起多次组团访问美国，参加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术年会；1986年组团访问联邦德国，参加德语区汉语教师协会的学术讨论会。1985年和1987年，与北京语言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期间，各国汉教界同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筹备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吕叔湘被聘为学会名誉会长，朱德熙、吕必松先后任会长。截止到1998年6月30日，有会员893人，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成立最早、会员人数最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最活跃的同类国际学术团体。每隔三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北京语言学院联合举办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并出版讨论会的论文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成立及历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召开，对加强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推动世界汉语教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也跟外交、侨务、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有关。经国务院批准，1987年7月成立了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及北京语言学院九个单位的有关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教委主任兼任，其常设机构为“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管理全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学术研究与交流、师资培训与评审、汉语水平考试等业务工作。1988年9月，国家教委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部分省市教委和侨务部门的负责人、部分高校院校长、部分驻外使领馆教育处或文化处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共120多人。会议确认了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此次会议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3. 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壮大，素质提高

我国现有专职对外汉语教师2500余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和研究生学历的已超过半数），兼职教师4000余人。为了保证对外汉语教师的业务水平，1990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并开始实施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至1997年底，专职教师中已有1464人取得了

资格证书，并从1996年起开始对兼职教师的资格考试。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对专职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经教育部批准，从1983年起，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四年制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本科专业。1986年，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校又相继开始培养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上种种措施使我国对外汉语教师队伍不仅有了稳定的来源，且师资素质亦得以保证和提高。

4. *成功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并在国内外布考* 测试是任何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中一个不可缺少并可能对教学产生巨大反响的重要环节，测试的科学、完善与否也是衡量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是否健全、成熟的标志。我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究工作始于1984年秋，于1989年5月编制出《汉语水平考试（HSK）考试大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及四套信度和效度均较高的试卷，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5546名在华外国人及国内49个少数民族的1665名大学生进行试测成功，1990年在国内正式设考，并于1991年推向海外。至1997年底，在国内（包括香港特区）设有32个考点，累计考生71603人，在国外16个国家和地区（澳门）设有28个考点，累计考生19976人，国内外累计考生91579人。汉语水平考试研究被国家教委定为博士基金项目，使其在理论探讨、试卷设计、试题编写、测试试用、统计分析以及分数等级的界定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论文集。汉语水平考试作为专门测量外国人、华侨和国内非汉族人汉语水平的一种标准化考试，其研制成功及在国内外对这项考试制度的建立和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经验及教学理论，使其成为汉语水平考试研制的依据；还标志着填补了我国语言测试方面的一项空白，对我国乃至世界汉语教学会产生积极的反馈作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进一步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5. *初步形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对外汉语教学有其特定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规律，是一门融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新型学科。从70年代末起，在国外语言教学理论的启发下，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结合自身特点，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包括教学理论和基础理论两个方面，并以前者为核心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教学实践出发，又以教学实践为归宿，形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的特色。从改革开放以来至1998年，发表的有关学科建设的各类论文近千篇，论文集和专著数10种。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及教学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50年代主要是受传统教学法束缚的翻译法及以语法为纲、词汇为中心并具有语言学倾向的演绎教学法；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注重强调培养语言技能的听说法；70年代提倡过句型教学法；80年代以来倾向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的，把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综合与分工相结合并正确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对外汉语教学新路子。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对外汉语教学终于形成了包括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语言测试四大教学环节的理论和实践，并臻于成熟。

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比较文化理论（或称跨文化交际理论）等方面。对外汉语教学的存

在和发展，首先得有语言学作基础，这方面取得的最突出的进展是在国家汉办组织下，集中了一批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完成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的编写（1995），使对外汉语教学摆脱了汉语语法学界的一些争论和分歧，有了一套比较统一、适用的汉语语法理论作为教学和教材编写的依据和参考。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是最有特色的，为我国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例如："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的引进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都能紧紧围绕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需要，从80年代起步到90年代上半叶形成研究热潮，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20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我国整个语言教学中一个新的重要分支学科，具有独自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教育部1998年出版的我国学科目录中，对外汉语教学定位在二级学科，形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教学体制；并已建立起完整的对外汉语教学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完成了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制，并在国内外推行，现已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报考人数最多、其权威性不断提高的一种汉语水平测试；一支数量可观、专业化素质不断提高的对外汉语教师专职队伍和科研力量已经形成，此外，还出版了数百种对外汉语教材、工具书、参考书、论文集及学科理论专著；作为母语国，跟世界汉语教学界建立了广泛、密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从而确立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和导航地位。

参考文献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世界汉语教学》，1995.10。

张德鑫：《中国语言文化漫议》，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张德鑫）

汉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 (Norm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Studies of)

1909年，我国成立了以严复为总纂的科学名词编定馆，负责编写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这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

辛亥革命后，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学和化学术语，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的术语。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术语14部，均为草案。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负责管理全国科学技术术语审定工作，聘请审定委员多人，召开过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的术语讨论会，1933年制定并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1934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草案和天文学名词草案，1935年出版了数学名词，1936年审定了矿物学名词草案，1939年完成了气象学名词草案；在生物科学方面，1949年以前已经完成的名词草案有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细胞学、组织学等多种。天文学名词从1934年出版后，于1937年进行了增订，1940年已增至7000条，又经1942年、1948年两次审定，为天文学术语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49年底，国立编译馆编成的名词术语草案还有岩石学、人文地理学、电机学、机械学等共五六十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于

1950年接管了国立编译馆拟订的各科术语草案。1950年4月6日，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医药卫生组、时事文学组、艺术组共五个组，中国科学院负责自然科学组，工作范围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农学等学科。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聘任的科学家有150人。1956年，文化教育委员会撤消，学术名词的规范化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下设置了名词室，负责统一和审定全国自然科学术语的工作，60年代初改称自然科学名词编定室。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委委员会，相继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的术语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主任为钱三强，委员约70人，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设立了理、工、医、农四个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49个，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名词审定工作。目前已经公布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海洋科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学、力学、自动化、电子学、农学、林学、医学等22个学科的术语，并出版了8个学科术语的海外版（繁体字本）。

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85年10月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术语的标准化工作，1986年成立了辞书编纂分技术委员会（二分会），1987年成立了术语学理论与应用分技术委员会（一分会），1990年成立了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分技术委员会（三分会）。1994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术语分技术委员会。现已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涉及术语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术语数据库、辞书编纂等各个方面，这些国家标准对于我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术语工作者在实际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国外术语学界还没有注意到研究术语结构的重要性，而我国术语工作者已经深入地研究了汉语术语的结构分类、汉语术语的结构歧义等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汉语术语理论—“潜在歧义论”、“术语形成的经济律”、“结构功能观”，并且在术语数据库中，用计算机检验了这些理论，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了这些理论。

（冯志伟）

中国语文现代化（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Modernization）

自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语文改革。20世纪上半叶的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简化字运动、拉丁化运动等，下半叶的文字改革、中文信息处理，都属于语文现代化。

在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生产力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现在还没有完结。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在启动之后的一个世纪内，步履维艰、收效甚微。直到1949年才出现了新的机遇，但是又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得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直到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才出现了转机。

预计要到下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现代化要求中国语文现代化。中国语文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语文不适应中国现代化要求的矛盾，为此就要进行一系列的语文改革。中国的语文改革自清末已经开始，不过那时没有语文现代化这个名称。到了80年代，我国的语言学者才提出了语文现代化的口号，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大潮。

中国语文现代化包括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人类的语言生活包括许多方面，例如，说方言还是共同语，使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等等。以上两个方面都要研究，但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研究汉语内部结构和发展的是现代汉语和汉语发展史等，研究汉语应用的是应用语言学。语文现代化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古老的汉字对现代化的中国，又适应又不适应。一方面它负载着灿烂的汉文化，我们还用它来记录汉语；另一方面，它比较难学难用，缺乏国际性，不完全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语文现代化包括汉字改革。

100年前的中国语文生活十分落后。使用的是方言加文言。汉字繁难，文盲众多，而且没有完备的注音工具。经过了100年的努力，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观。现在使用的是普通话加白话文。汉字经过简化和整理，降低了学习和使用的难度，还有了辅助汉字的汉语拼音。

百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①语言共同化。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20世纪前半叶叫国语，后半叶叫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克服方言造成的隔阂，增强民众的团结和国家意识。②文体口语化。用记录口语的白话文代替僵死的文言文。五四白话文运动被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文体的改革带来了思想的解放。③表音字母化。20世纪前半叶制定了注音字母，后半叶制定并推行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作为记音符号，帮助学习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还是辅助汉字的工具，用于汉字不便使用的地方。④文字简便化。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减轻了学习和使用的困难。70年代以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发展，用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信息，推动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

参考文献

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苏培成）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Studies of）

一、前半个世纪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20世纪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基本上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分界。解放前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仅有很少的学者，或对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或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某些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著，发表的文章总数不到200篇。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老一辈的民族语言学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如赵元任对广西壮语的调查，李方桂对贵州布依族语言以及广西壮语的调查，罗常培对云南独龙语、傣语、怒语、白语的调查，袁家骅、马学良、高华年等对云南彝语的调查，傅懋勣对云南纳西语的调查，邢公畹对云南傣语的调查，闻宥、傅懋勣、张琨等对四川

羌语的调查，金鹏对四川藏语、嘉绒语的调查，等等，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块从未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全面、深入调查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因此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本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 早在50年代初期，民族语文工作者就随同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为民族识别工作，为摸清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使用情况和一般特点，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基本上处在摸情况、搞试点、取得经验阶段，对于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全面情况，制定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1956年制定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12年远景规划和5年计划，组织了7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6、7月间，各工作队相继出发，到1959年共调查了42个民族的语言，收集了累计达1500个以上调查点的资料，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和使用状况。此外了解了各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对少数民族语言大规模普查结束后，小规模的田野调查和补充调查从未间断，例如，1960年组织了对独龙语和怒族语言的调查；1976年，组织了对喜马拉雅南麓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之后又组织了西藏阿里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东北朝鲜语方言调查和云南傣语的方言补充调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70年代末，国家民委提出民族识别任务，民族语言研究人员配合这一任务，陆续调查识别了不少新的语言，如川西民族走廊地区新发现羌语支语言7种；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新发现仡央语支的语言5种；海南岛新发现语言2种；新疆、青海发现3种语言；此外，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发现高山族至少使用15种以上的语言；等等。至1995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总数已经达到120多种。

在长期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实践中，还陆续发现了一些具有不同语系特征的混合型语言。例如青海同仁县部分地区的土族，使用的语言兼有汉语、藏语及部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特点，被称为“五屯话”。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有2万自称回族或东乡族的居民，使用一种东乡语和汉语混合的语言，被称为“唐汪话”。与此相类似的语言还有分布在广西的“五色话”、分布在新疆的“艾努话”、分布在甘肃的“河州话”等。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反映在社会的使用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学科第7个五年计划中，专门把少数民族语言（包括书面语）使用情况的调查作为重点课题列入计划并于80年代后期组织实施。共调查了700多个点，获得10多万人次的抽样和数10万个数据的资料。还获得了大量语言分布、语言文字使用、语言关系等方面第一手的文字资料。最终成果形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等专著出版。

在长期、广泛、深入地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正在从不同的侧面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后指导少数

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的实践，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已经积累了近2000个点的资料，为少数语言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三、少数民族描写语言学的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从描写语言的结构开始的。对少数民族语言结构的系统描写研究最初是用“语言概况”的形式出现的。60年代初，《中国语文》杂志开辟专栏刊登少数民族语言概况。至1965年底共刊登17种语言的概略介绍。《民族语文》杂志于1978年创刊。语言概况作为这个杂志的一个专栏，几乎每期一篇，持续刊登了10多年。据初步统计，包括在国内外刊物和地方刊物以及一些文集上刊登的概况，目前已经公开发表104篇。

从50年代末起，对每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详细描写的计划开始制定并陆续实施。这套书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最早开始于1958年，至1987年止共出版了57本，共介绍了59种少数民族语言。这套丛书对各语言结构特点进行较详细的描写。特别对语言结构中的语法，作了比语言概况详细得多的描述。语言简志的编写和出版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其他研究，特别是历史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一个语言更深入的描写研究则是以描写语法或某种语言研究的专著形式出现的，到9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一些。这些专著的篇幅一般都比较大，比语言简志更深入地揭示了该语言结构的特点。

从199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新发现语言的深入调查研究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对未列入语言简志丛书的语言，逐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编成《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出版，已经出版了临高语、巴哼语、佯黄语、回辉语、康家语、毕苏语、村语、图瓦语等8种，计划在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有约40种问世。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描写研究，一直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从本世纪初至90年代中期，国内各种刊物、文集共发表描写性研究论文4000多篇，几乎占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的一半左右。

本世纪初至60年代，专题描写偏重在语音方面，特别是一些语言里的特殊语音现象。例如复辅音、送气擦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等等。这种描写一般停留在直观观察和听觉所得。80年代以来，语音的描写面更加广泛，揭示出的特殊语音现象越来越多，如蒙古语中的吸气音、羌语中的长辅音、朝鲜语中的紧辅音、阿昌语中的清鼻音、白语中的声门混合挤擦音、蒙古语中的弱化辅音、弱化元音、裕固语中的带擦元音、拉珈语的鼻化元音、藏缅语中的卷舌元音、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的元音和谐、景颇语、独龙语中弱化音节、藏语中的音节减缩等等。这种描写一般停留在定性阶段，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进行描述。近年来由于实验语音学的兴起，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阶段。目前已经对有影响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个语音系统，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进行了实验分析。这些语言的总体分析研究报告将在今后陆续出版。此外还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些特殊语音现象进行了专题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专题描写80年代才被重视。进展很快，在描写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空前的，几乎涉及语法研究的所有方面，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少数民族语言中语法范畴的构成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的多样性。有相当多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语法形

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表达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丰富多彩，一般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形态比较丰富，黏附性前缀、后缀、中缀等比较发达，屈折形态也是重要的语法形式，还有重叠形式等等。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一般以虚词作为语法意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也有重叠形式。句法描写也是语法描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词汇和语义的描写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薄弱环节，发表的文章数量比较少。在词汇研究的文章中，一般描述词的结构和构词特点的文章比较多，也有分析由于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借用的一些文章。研究语义的文章比较少，在90年代才出现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全面描述某一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特点，最近也开始受到重视。

四、少数民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历史比较研究是近2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围绕以下3个领域进行：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谱系分类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从发生学角度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相互远近关系的谱系分类表，是这项研究主要目标。有讨论语系分类的，主要侧重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这方面的分歧意见比较大。阿尔泰语系分类也有不同意见，但国内全面讨论这方面的文章不多。有讨论语族分类的，这方面分歧最大的数藏缅语族，因为这个语族内部语言数量多，情况复杂。因此发表的文章相对也多一些。此外，也有讨论语支分类的，也有讨论某个语言在语系、语族、语支中的历史地位的。这方面的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也不乏有较高学术价值者。

（二）语系、语族、语支的构拟和特点研究 传统的谱系分类框架基本上是语系、语族、语支、语言，目前民族语言研究的学者们在讨论具体分类时，通常在语族与语支之间增加语群的层次，在语支和语言之间增加语组的层次，还有在语支下面用语团的。

对汉藏语系的总体研究，在国内始于80年代，由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大体介绍了汉藏语系各语族的特点，第一次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国境内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对汉藏语系中某个方面或某些特点的专题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研究阿尔泰语系的文章比汉藏语系少得多，仅有数篇。

语族范围的比较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已经有若干种语族的比较研究专著出版。语族范围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以藏缅语族最为明显。藏缅语族有数百种语言，分布在中国和相邻的南亚诸国，语言情况十分复杂，研究难度较大。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和语法两个方面。藏缅语语法方面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几乎涉及词类的许多语法范畴和形式。有的文章还从国内外现代藏缅语中存在复杂的、差别很大的语法形式中，梳理出它们历史演变的脉络，讨论了各类形式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从而把藏缅语语法演变规律建立在确凿可信的理论基础之上。

侗台语族语言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苗瑶语族专题研究的论文相对来说较少一些，而且大都偏重在语音方面。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研究，数突厥语族方面的文章多，研究深度也比较明显。蒙古语族总体研究的成果较突出的是喻世长的《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1983)，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研究蒙古语族的专著。内蒙古大学的师生在80年代初也发表了一批综合研究蒙古语族的论文。满通古斯语族综合研究起步较晚，发表的论文比

其他语族少，仅见数篇。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与印欧语系特点不同，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在这方面一些学者进行了尝试，发表了一些文章进行讨论。

（三）各语言的历史演变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文献的语言、方言差别比较大的语言、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和保存古老面貌比较多的语言，利用这些语言的资料讨论语族、语支和另一些语言的特点，加深了对这个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和认识。

以藏语为例，藏语有七世纪的古藏文，有分布在国内外差别较大的5个方言，50年代对藏语方言进行过较全面的调查，之后又进行过多次补充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藏语史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不仅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也发表了有相当水平的学术论文。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多数无文字和文献可考，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主要依据语言或方言的历史演变不平衡这一客观事实，从历史残存在各语言或方言中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复杂程度是其他语系所无法比拟的，借用传统的方法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目前正在寻找和探索新的适合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在开展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必须加以研究并取得共识。例如，就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如何构拟原始汉藏语？所谓远程构拟（从上到下）、基础构拟（从下到上）及专题构拟的理论基础如何？可行性又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原始汉藏语的语音系统是十分庞杂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声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汉藏语系一定要产生声调？在研究汉藏语系音系时能否跳出声、韵、调分析的圈子，采用元、辅音分析法？

在词汇比较中，如何确定亲属语言的同源词？区分早期借词和同源词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语言接触，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能否回避语言接触问题？如何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汉语不同方言中均有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底层理论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应如何估价？如何建立词族？如何分析语义网络？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词族研究的意义和地位如何？

在语法比较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原始汉藏语究竟是分析、粘着还是屈折语言？如何认识原始汉藏语的语法体系？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中，一些保留原始面貌较多的语言大多有丰富的粘着形态，这些形态成分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构拟它们的原始形式？与汉语的关系如何？被西方一些语言学家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的壮侗（侗台）、苗瑶两个语族的语言在语法类型上何以如此接近汉语？

以上这些一直困惑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的问题，虽然不断有人著文讨论，但离开彻底解决，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五、少数民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少数民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到重视并加以实施的。40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语言规划、语言教学、语言信息处理、语言翻译等方面的研究。现分述如下：

（一）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　近几十年来，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开展研究：

1. 为无文字的民族和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创制和改进民族文字。　经过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深入调查研究，到1959年底，为壮、

黎、布依、苗、侗、彝、纳西、傈僳、哈尼、佤等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为景颇、拉祜、傣等民族改进了文字。80年代又为土、白、独龙、土家、羌、瑶等民族设计了拼音文字方案或拼音方案。由于新创文字与口语接近，易学、易掌握，很受群众的欢迎。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据政府实施民族语言规划的需要，组织了课题组对新创和改进文字逐个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访问座谈、文献收集、实地调查、现场测试、社会问卷等综合方法，调查了解各文种实际的试行效果和本民族群众对文字的评价。每个文种都根据调查结果写出总结报告。目前，大多数文种已经完成总结报告，并按规定程序向国务院提出正式推行这些文字的申请报告。

2. *对原有文字进行规范，扩大它们的使用范围，使其在文化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字有的有悠久的历史，如藏文创制于七世纪，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蒙古文、傣文、彝文等也都有较长的历史，其中大部分已经有比较规范的习惯用法。过去这些文字主要用于宗教活动或上层社会，近几十年主要作普及工作，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上成年人扫盲，也兼顾提高，在新闻、出版、影视、广播等领域逐步扩大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对于原有文字中不通用或不规范的，则征得本民族的同意，进行规范或改进。例如，德宏傣文采用的是缅文字母，傣语和缅语是不同语族的语言，语音差别较大，民族语文工作者与本民族各界人士一起，经过3次修改，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最近已呈报国家批准为正式文字推广使用。凉山规范彝文是在原有彝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进行科学整理和规范，建立明确、固定、统一的标准，很受广大彝族干部、群众的欢迎，并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文字推广使用。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大致有3种类型，第一是母语教学，第二是双语教学，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双语教学，第三是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总体来说，上述3种类型的语言教学，除了第三种针对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外，基本上都涉及双语教学问题。由于居住情况、母语使用情况、文字的历史背景、师资力量、教学经费等多种复杂因素，各地、各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体制有很大的差别，一般都是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条件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双语教学方案。开展双语文教学以提高广大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已经引起各地的教育部门和科研单位的重视，几乎所有的民族地区教育部门都把双语教学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近10多年来，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关双语教学研究的课题有10多个，有不少地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开展双语对比教学、编写双语教材、制定双语教学体制等方面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初步统计，近10多年来，涉及有关双语教学和研究的专著、文集已经出版了20多种，讨论双语教学和研究的论文900多篇。从70年代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已经召开过7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推动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三）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复杂，文字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复杂情况给少数民族文字的信息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的信息处理研究工作近10来年才开始，目前汉文、西文与某一种少数民族文字混合编辑、排版系统已经比较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制的多文种少数民族文字与西文、

汉文的混合排字系统已经获得成功，目前除朝鲜文外，所有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均可与汉文、西文统一编码、共用字库，实现输入、储存、显示、混合排印等多种功能。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语料库研究。目前藏缅、苗瑶、侗台3个语族语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已经基本建立，带标记属性和结构规则的100多种语言或方言和数10万条词项的数据已经录入计算机，另一种类型的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也已经开始建立，目前藏语和蒙古语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根据这种语料库生成的语言词典库和知识库，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文献摘要、文本处理、知识获取、机器学习乃至机器翻译等自然语言理解工作提供基本的工具。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制的藏语拉萨话的文—语合成系统，是在建立了拉萨话的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共振峰参数合成的方式，完成了拉萨话语音系统全部733个有调音节（单字词）的合成，达到了比较自然、真实的较好效果。该研究所还开发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多媒体系统，设计了语音工作站和数字录音设备相连接的，能用于语音声学分析、建立声学参数数据库、进行语音合成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系统的工作平台。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刚刚起步，可以预料，将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互译工作，出版了大量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和出版机构逐步健全和完善，翻译工作者队伍得到充实，翻译成果越来越多。特别是文字历史比较悠久的语种，已经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翻译队伍，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著作和论文。内容涉及翻译学基础知识、翻译史、翻译理论和方法、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出版研究翻译问题的专著10多种，每年有近百篇文章发表。其中有讨论翻译理论问题的，有讨论翻译方法的，更多的是讨论各具体语言中的翻译问题。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问题研究的深入，一方面促进了翻译质量的提高，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平面比较研究，有利于双语教学。

六、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文字，历史悠久，如佉卢字在公元前已传入我国，粟特文有2世纪至3世纪的铭文，焉耆—龟兹文有5世纪的文献，藏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西夏文等均有千年以上或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余如彝文、4种傣文（傣仂文、傣绷文、傣哪文、傣端文）、察合台文、八思巴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朝鲜训民正音、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文、白文、满文、方块壮字、水书、汪忍波傈僳文等都有长短不等的历史。这些古文字大体可以分为：图书、文书、金石和题记四类。对于研究我国的历史、考古、语言、宗教、文学、天文、历法、医学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解放前，有不少学者对民族古文字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解放后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资

料的收集、文献的整理和解读、新文种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0 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正式展出了 16 种民族古文字的珍贵文献以及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较好的反映。之后，研究会召开了 10 多次学术讨论会，交流了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成果，推动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批有水平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编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文集，还组织编辑出版了全面介绍中国民族古文字的专著《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1990）。

中国民族古文字虽然已经形成一支数百人的研究队伍，但具体到每个文种，有的可有数 10 人；有的仅数人；少数文种仅有兼职人员从事研究，因此研究水平和成果参差不齐。近 20 年来，成果最突出的应该算西夏文，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专著 40 多种，发表论文 500 多篇。古藏文、突厥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纳西东巴文、老彝文、契丹文、满文等，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新发现的一些文种，如尔苏沙巴文、白文、汪忍波傈僳文、水书等，在解读和文献整理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新文种的发现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对于了解语言的历史演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取得的成绩还是十分初步的，一些文种的释读和文献的整理刚刚起步，有的文种研究目前还是空白，一些文种的重要文献还散失在国外，科研队伍的水平和素质还有待提高，研究、教学、文博、考古、图书等系统的协作，交流有待加强，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傅懋勣：《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民族语文》，1984。

黄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发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孙宏开：《大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与展望》，载台湾《民族研究会讯》，第 17 期。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有关各少数民族语言见"民族学"卷）

（孙宏开）

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

五四时期展开的文体革新运动。在封建时代，文言文占据统治地位，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一直到 19 世纪末，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主张"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早在1868 年就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并于 1898 年创办《无锡白话报》。由那时起，各地白话报风起云涌，相继刊行的有数 10 种。此外，也刊行了一些白话文教科书，用白话创作、翻译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读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白话文还未能取代文言文的地位。

民国的建立，帝制的废除，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体的改革，于是有了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它既是一场文学革命，又是汉语书面语的一次重大的变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是这场革命的中坚。1916 年 10 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提出作为文学革命写作要点的"八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语，

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胡适的主张得到了陈独秀的有力支持。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首倡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包含三个方面的改革：一、形式改革，从“文言”到“白话”。二、内容改革，“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三、观点改革，“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三纲五常，要求自由平常”。他们的文章在教育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继之而起的有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提出“言文一致”，主张“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刘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言文合一”。

1918年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鲁迅在1918年5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突破。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办《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于1919年1月创办《新潮》，以及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宣传、实践白话文的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白话文运动注入了活力。在1919年，全国所出的白话报不下400种之多，白话文学作品和其他著述也大量涌现。以白话为工具的书面语，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白话文运动获得初步成功。

当时反对白话文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林纾，他曾翻译外国小说170多种，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翻译完全用文言，不用白话。1919年3月，他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后来又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提出古文高于白话，不知古文就不能写白话等论点，以林纾为代表的对白话文的攻击并不能阻挡文学革命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文体改革，白话文战胜了文言文，但是白话文在实践上并没有达到言文一致的要求。当时的白话文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能和广大民众相结合。从文体说，它不同于文言文，可是夹杂许多文言成分，形成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此外，还夹杂不少方言成分和外语成分，这说明白话文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建设才能成为规范的书面语。

参考文献

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苏培成）

国语运动（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从清末到民国开展的以推行汉民族共同语为目的的语文改革运动。

清末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1902年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深受启发，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提议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推行国语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民国成立后，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当时理解的“国语”是“就国音而发的”的“近文之雅语”。读音统一会提出了《国音推行方法》，但是并没能付诸实施。

到了五四时期，推广国语的呼声日益高涨。1917年北京的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民间学术团体“国语研究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致力于推广国语。国语研究会确定的任务是：(1) 调查各省方言；(2) 选定标准语；(3) 编辑语法辞典等书；(4) 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5) 编辑国语杂志。1917年，国语研究会委托黎锦熙拟订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详尽地规定了音韵、词类、语法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计划。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于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结合起来。白话文运动要求“言文一致”，这里说的“言”就是共同语，而不是方言。国语运动的目标是推行标准语，克服方言造成的隔阂，谋求语言的统一。

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附属机构，主持国语统一工作。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1928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负责国语标准的审核和宣传推广，也进行学术研究。在国语运动中，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国语运动时期进行的主要的工作有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语的推行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在回归祖国的台湾省大力推行国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在台湾省基本上普及了国语。

国语是汉语的标准语，要有明确的标准音，也就是国音。1913年读音统一会确定的国音，不是以某一地点语音为标准的单一音系，而是杂糅汉语古今和方言的语音。和北京语音相比，主要有三点不同：(1) 有浊音，(2) 分尖团，(3) 有入声。对声调，它只规定了调类，没有规定调值。这实际是人造的混合音，全国没有一个人能说符合这样标准的“国音”，根本无法推广，被称作老国音。许多语文学家反对这样的国音，主张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从而引起了国音与京音的大辩论。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修改国音标准，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被称作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根据新国音注音，作为统一读音的标准。新国音已经不再拘泥旧时的韵书，而以实际口语为基础。并且明确了标准音是指音系而言，应该剔除北京方言土语中的方音成分。这一系列理论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1955年，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就是继承了国语运动的成果。

参考文献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苏培成）

大众语运动（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1934年在上海发生的主张白话文更加接近大众口语而展开的文体革新大讨论。

30年代又一次出现文言复古思潮。1934年5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提倡“尊孔读经”，诋毁“新文化运动”。接着许梦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告白话派青年》等

文，称赞文言为“治学之利器”。汪懋祖、许梦因的“文言复兴”论的发表，挑起了文言与白话的论争。

最先奋起反驳的是吴研因，到陈子展、陈望道提出“大众语”口号后，才在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报刊上掀起颇有声势的讨论，并得到鲁迅的支持。这场论争发生在1934年6至12月，持续的时间不长，辩论的焦点是：文言该不该复兴，怎么评价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大众语”的标准是什么。汪懋祖、许梦因的观点仍旧是五四时期反对白话文的老一套，但是适应了当时的复古思潮，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因此，进步的文化界首先从抵御“文言复兴”来立论，他们提出建设一种比白话文更加贴近口语的大众语，目的仍是继续推行“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在“大众语”论者的坚决反对下，不过三四个月，“文言复兴”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场斗争对文体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什么是“大众语”，陈子展说：“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陈望道认为：“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我想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总要不违背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胡愈之从文学作品内容方面提出对“大众语”的理解和要求。他说：“‘大众语’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和五四时代所谓‘白话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话文’不一定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而大众语文却决不容许没落的社会意识，混进了城门。”在讨论中，曾出现全盘否定白话文、主张无限制地取用方言的倾向，但这不是主流。主张大众语的人除了反对白话文学的一些“表现没落社会层意识”的内容外，在语言形式方面只是反对不文不白的“语录体”。当时有人指出：“在形式上，白话文的基本的语汇、语法，也是劳苦大众口语的基础的部分；在内容上，白话文现在创造了不少进步的作品，是理论翻译文的惟一工具。我们不能把和大众的生活需要结合着的白话文抛掉。”

在如何采用方言的问题上，由于取舍的标准不一，或强调口语化，或强调通用性，因而在实践上还一时难以统一。可是就方言和大众语的关系说，一般认为大众语是高于方言的具有普通性的公共语。

五四以来推行的白话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本来还需要发展和充实。由于它的基础方言缺少具体的标准，不仅存在文言、白话的混用，而且外来词的吸收、句式欧化也相当混乱，缺乏相应的规范。因此，“大众语”的提出并非偶然，虽然因为沿用“大众文艺”的“大众”之名，受到意识倾向和阶级背景的影响，未能突出语言本身的建设，但是本质仍是要建立普通的公共用语，使之能适应大众交际的需要。在那“文言”影响很大、“白话”发展停滞、文体改革受阻的时期，倡导大众语的人士坚持文体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性是很难能可贵的。大众语运动的结果，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当时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于是提出了文字拼音化，促进了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

参考文献

高天如著：《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苏培成）

现代汉语规范化（Normal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必须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只有交际双方都遵守这个标准，

交际才能顺利进行。建立并推广这样的标准，就是语言规范化。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供广大干部、工人、学生学习语法修辞之用。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全社会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注意，增强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规范化意识。

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这个会上，罗常培、吕叔湘作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对于汉语规范化的必要性、对于普通话的含义，以及进行规范化的方法和步骤，都取得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会议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若干建议。1956 年 2 月，国务院在《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了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新中国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自 1955 年到 1966 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的有：(1) 对普通话异读词进行了审音，先后分三次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2) 出版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一部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中型词典，具有很高的质量。(3) 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自 1956 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中学使用。(4) 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形成了新的正字法。1955 年 12 月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 年 1 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 年 5 月编印出版了《简化字总表》，1965 年 1 月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以上这几个字表的制定和公布施行，形成了新的汉字正字法，促进了汉字规范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汉语规范化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工作停顿甚至倒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汉语规范化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 年 1 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了中央确定的新时期语文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新时期语文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新时期语文工作任务第一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这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汉语规范化是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为了实现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必须尽快提高汉语规范化的程度，加速推广普通话。目前，汉语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异现象，需要加紧研究，正确引导。全社会的语文水平有所下降，语言文字使用中的不规范问题相当严重。在出版物上，用词不当、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标点错误的病例，俯拾皆是；口语交际中，重复啰嗦、含混模糊、支离破碎、言不及义，时有所闻。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大力推进汉语规范化，提高全民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意识，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各种不规范现象。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字规范化手册》，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苏培成）

推广普通话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Common Speech)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推广普通话就是要克服由于方言分歧而造成的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增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各民族的凝聚力。

195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普通话的内容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1956年1月28日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式开始。5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高潮。(1) 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自1956年到1960年共举办了九期，培养了推广普通话骨干1000多人。(2) 举办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从1958年到1979年共办了五次，为推广普通话进一步做了宣传和发动。(3) 进行方言调查。1957年开始，到1958年基本完成。一共调查了1800多个点，写成调查报告1200份。(4) 举办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和电视讲座。(5) 学校推广普通话。到1957年底，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师已经有72万多人受过普通话语音训练，全国中小学校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用普通话进行教学。(6) 社会推广普通话。福建大田县吴山乡首先推广了普通话，接着许多地区都开展了这项工作。例如，福建的许多县，广东的佛山、潮阳两个专区，安徽的歙县，江西的婺源，江苏的昆山、新沂，河北的保定、河间，山西的万荣，黑龙江的哈尔滨、拜泉等地都出现了许多推广普通话的先进个人和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受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逐渐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驱动下，推广普通话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紧迫要求。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通话在我国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86年1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国家语委又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从50年代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工作重心转移到普及和提高。1986年之后，推广普通话，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由重点在南方方言区推行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由重点抓学校发展到既抓学校又抓社会；由重点纠正语音发展到对词汇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与此同时，还对普通话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制定了《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对师范院校教师、广播电视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等专业人员以及师范院校毕业生提出了普通话等级要求，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在“九五”期间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率先初步普及普通话。第一，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普通话能力的训练，特别是注重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提高，使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并成为部分城镇学校的校园语言。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把普及普通话纳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纳入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普通话合格的教师才能上岗。第二，党政机关在推广普通话方面要率先垂范，在公务活动中自觉说普通话，并

不断提高普通话水平。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基本具备普通话能力作为公务员录用的必备条件之一，逐步实施。第三，有声传媒要以普通话为播音用语，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从1998年起，要逐步做到持普通话合格证书上岗。商业、旅游、邮电、交通、金融、司法等行业工作人员，要尽快提高普通话能力，并逐步做到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要以普通话为工作用语，并逐步提高普通话水平。第四，加强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提高普通话培训测试的科学水平。各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加强对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管理，适应社会对普通话培训测试的要求，使培训测试工作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第五，做好普通话词汇规范化工作，着手组织研制并分期分批发布有关外来词、异形词、缩略语、新词新语和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等方面的规范标准，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引导词汇应用更加规范化。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还提出：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行业的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的要求。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经过未来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的语文素质将大幅度地提高，普通话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

参考文献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2.6。

（苏培成）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for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研究文字改革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性工作会议。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一是推广普通话。会议讨论了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交的“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以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会议决议指出：（1）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审定公布实行。（2）要求各报刊和文化教育机关广泛宣传简化汉字；各级学校使用简化汉字；出版和印刷机关立即着手制作铜模，迅速采用简化汉字，并按照异体字整理表在出版物上废除异体字。（3）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简化汉字、整理异体字的工作，并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4）建议教育部首先对全国各地小学、中学、各级师范学校分别作出指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且指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分批调训各级学校语文教师学习普通话。关于部队推行普通话办法，建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5）建议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委员会，组织社会力量，特别是广播电台和文化馆（站），大力提倡学习和使用普通话。（6）建议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合作，进行全国方言普查，编写普通话的教材和参考书，以便利各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7）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件的横排、横写。(8) 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提交全国各界人士讨论并试用。

（费锦昌）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Symposium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50年代召开的有关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语言研究工作者、语文教学工作者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广播、新闻、出版、速记工作者共122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的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还听取了陆志韦的“关于北京话语音系统的一些问题”、陆宗达的“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郑奠的“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丁声树和李荣的“汉语方言调查”等学术发言。

会议认为：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更加顺利地进行，为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为了给汉语拼音文字的实施准备条件，以及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和团结，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的规范进一步明确起来。会议经过讨论，对于普通话和规范化的涵义都得到了一致的认识：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

会议决议中提出六条建议：(1) 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研究并确定普通话常用词汇的语音；(2) 组成词典计划委员会，拟定《现代汉语词典》的详细编纂计划；(3) 迅速拟订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4)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各高等学校以及各高等学校间加强语言研究工作上的联系；(5) 把各地的语言工作者和有志于语言研究的人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进行工作；(6) 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以及广播、戏剧、电影部门加强稿件在语言方面的审查工作，并广泛进行汉语规范化的宣传工作。

（费锦昌）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The conven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Working Conference Forum）

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语文工作，明确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1986年1月6日至13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单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280多人。

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语文工作，学习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明确的主要问题是：(1)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新的形势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为：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定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2) 语言文字工作必须积极而稳步地进行。30多年来，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工作有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前，需要充分消化、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性重要成果。在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同时，文字改革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任务还要继续完成。但是，文字改革必须稳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历史条件的改革，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要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今后对于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的态度，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社会应用。(3) 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继续抓紧抓好。推广普通话工作要有新的要求，重点应当放在大力推行和积极普及方面。(4) 各级各类学校要重视、加强语文教学和研究实验。(5) 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特别要抓好有应用前景的课题研究和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6) 培训干部，扩大语文工作者队伍。(7) 加强宣传出版工作。(8) 对语言文字的应用需要有一定的行政措施。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商标、广告、地名管理、户籍管理等方面，在制定具体法规和条例时，应当列入语言文字规范的条文。(9) 必须加强领导，建立和健全各级语言文字机构。

（费锦昌）

劳乃宣 (Lao Naixuan, 1843～1921)

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原籍浙江桐乡，生于河北广平。1878年后，历任河北临榆、南皮、完蠡、吴桥、清苑等县的知事。1900年，义和团起义军入京，南归主持浙江大学堂，后入两江总督幕中。1911年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辛亥革命后，退居涞水。1921年去世。

劳乃宣是著名的等韵学家，1883年出版的《等韵一得》是清代最重要的等韵学著作。1898年重订。他在1883年的自序中说：该书"专重人声而不尚考订，所以别乎古韵今韵也。专主时音而不悖旧法，所以通乎古韵今韵也。"这就是说，他既继承了传统等韵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了实际语音分析。《等韵一得》条理分明，审音精细，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前人。

劳乃宣是早期拼音文字的倡导者。1900年，王照在北方推行官话字母，一时声势颇为浩大。但是官话字母只能拼北方话，在南方不易推行。1905年，劳乃宣征得王照的同意，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声母和韵母，用来拼写南京音和苏州音，修订成"宁音谱"和"吴音谱"，后来又增加"闽广音谱"并把这三个谱连同京音官话字母合成一部《简字全谱》，在南京出版。1905年，他在江宁（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先教宁音，后教京音，四个月毕业。先后办了10期，有数百人毕业，转相传授，推行于江浙。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攻击合声简字随地增撰字母强南就北。他回答说："欲文字简易，不能遽求语言之统一；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之简易。"他的方案可不必"强南就北"，而能"引南归北"，"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

劳乃宣认为文字的难易，关系到教育的普及和国家的富强。1908年，他向清政府上书提出："今日欲救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他主张小

学一年级先学简字，二年级再学汉字。一般人民都强迫学简字一年，识简字的人同样有公民权。又建议出版简字报纸，官府的告示、批词都用简字。清政府下旨交学部议奏，但学部不议不奏。1910年资政院成立，劳乃宣为议员，经过种种努力，资政院通过决议将简字正名为音标，请旨饬下筹备施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简字运动就此中止。

劳乃宣推行简字，传播拼音知识，对注音字母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苏培成）

卢戆章（Lu Zhuangzhang，1854～1928）

字雪樵，福建同安人。21岁到新加坡谋生，兼学英文。25岁回厦门，教华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华语，同时参加《华英字典》的翻译。他受教会方言罗马字和民间方言韵书《十五音》的影响，从28岁开始专心研究拼音文字。经过10年苦心钻研，到39岁拟定出拼音文字方案，取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年自费出版课本《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地区传授，风行一时。

卢戆章十分重视文字的作用，认为“富强由文字”，并且认为文字是发展的，汉字的发展趋势是“趋易避难”，否定了“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的不变论。他还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在当时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卢戆章决心改革汉字为拼音文字。

卢戆章设计的“切音新字”共有字母57个，其中18个和拉丁字母的小写相同，6个和拉丁字母的大写相同，其余33个是拉丁字母的变形。他的方案采取声韵双拼制。拼写时，韵母在左，声母在右，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

1898年清政府实行维新变法，卢戆章趁机把他的方案呈交政府审查。不久，变法失败，卢戆章的方案被搁置。其后，他受日本假名的影响，放弃变体拉丁字母，改用汉字笔画式字母，设计“中国切音新字”。以京音切音字为主，同时也可以拼写泉州、漳州、厦门、福州等方言。1905年他到北京，将“中国切音新字”呈交学部，结果被驳回。1906年回厦门路过上海时，将他的“中国切音新字”加以修改，编成《北京切音教科书》首集和二集，由点石斋出版。1913年，他作为福建省代表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他不赞成会议议定的注音字母，坚持自己的双拼方案。回厦门后，修改原订切音字母，改名“国语字母”。1915年出版了使用国语字母的《中国新字》，这是他提出的第三个拼音方案。

卢戆章的汉字改革思想虽然还不成熟，但在当时，他的观念是进步的，对中国的语文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卢戆章是近代第一个设计拼音方案的中国人，《一目了然初阶》出版的1892年，被认为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年。

（苏培成）

王　照（Wan Zhao，1859－1933）

字小航，号芦中穷士，晚年又号水东，河北宁河人。年轻时有维新思想，广读时务书，热心教育。戊戌变法中上书言事，建议皇太后、皇帝出洋考察。变法失败，被革职拿办，逃往日本。在日本受到假名的影响，开始考虑文字改革问题。1900年潜回天津，创制“官话字母”，著《官话合声字母》。1901年，由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1903年，他不顾自己是被通缉的政治犯，冒险到北京创办“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任教员，自己躲在屏风后听课。义塾重印

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为教材，又出版注音的“字母书”多种，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1904 年，为避免被告密，自首人狱，三个月后获释。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允许推行官话字母，于是他去保定办“官话拼音书报社”，出版字母书《对兵说话》。1905 年重回北京，办官话字母义塾。1910 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了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禁。1913 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他被聘为副议长（议长为吴稚晖）。会上他竭力主张议行拼音字，为白话教育之用。

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拼写官话。声韵双拼，介母并入声母。声母（他叫“字母”，实际是声介合母）50 个，韵母（他叫“喉音”）12 个，一共是 62 个。拼写时，声母在左，韵母在右，声调按阴、阳、上、去，点在韵母的四角。王照主张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

从 1900 年到 1911 年，官话合声字母推行共 10 年，遍及 13 省，是切音字时期影响最大的方案。推行官话字母的官话字母义塾在北京一地就有几十所，天津、南京、沈阳等地都曾设立官办的“简字学堂”，传授合声字母。官话字母还编印各种印刷品，达 6 万多册，广为流传。

王照的官话字母以一般民众为推行的对象。他说：“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出一种沟通语文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他希望通过官话字母的传习，进而普及民众教育，以达到国家富强。

（苏培成）

罗振玉（Luo Zhenyu，1866～1940）

名宝钰，后更名振玉，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仇亭老人等。浙江上虞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青年时曾为秀才，光绪廿十二年（1896）起，与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创办《农学报》，又办东文学社。光绪卅三年（1907）后先后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并参预清廷的复辟活动。1932 年后积极参与伪“满洲国”活动，1940 年卒于旅顺市。

罗振玉少时即酷爱金石古物之学，后倾其毕生精力进行古文物的研究。他对殷虚甲骨、商周铜器、西陲简牍、古代石刻、玺印封泥等都作过广泛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掌握资料多，学术视野广阔，多有所创获。

罗振玉 1902 年于刘鹗处见到甲骨墨本，1906 年即开始收藏甲骨，所藏总数近 30 000 片，为早期收藏最富之甲骨藏家。在此期间，罗振玉择其所藏精品拓墨编辑，刊布之著录有：《殷虚书契前编》（1913）、《殷虚书契菁华》（1914）、《铁云藏龟之余》（1915）、《殷虚书契后编》（1916）、《殷虚书契续编》（1933），共著录甲骨 5457 片，是殷虚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的甲骨文的主要著录。1910 年，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为殷虚，并判明甲骨卜辞“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为后来甲骨卜辞时代的认识以至卜辞内容的研究，都奠定了基础。1915 年，罗振玉著《殷虚书契考释》，释字 485 个，1927 年又出增订本，释字 560 个。至此，许多卜辞已可粗略通读。罗氏在书中还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文字考释方法，在当时都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和传布方面，罗振玉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编辑的古金文著录有：《秦金石刻辞》（1914）、《贞松

堂集古遗文》（1931）、《贞松堂吉金图》（1935）等，较晚编成的《三代吉金文存》（1937）一书，资料丰富，去取谨严，精拓精印，历来为金文研究者所重。除此而外，罗氏对古代的玺印、封泥、古镜、瓦当、符牌、明器、货币等器物或拓墨也都广为搜集，编印为专集。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1914），分类考释，敦煌及新疆发现的汉晋简牍，开中国近代简牍研究的先河。此外还出版有《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遗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等。1908年和1922年，罗振玉还曾两度集资抢救内阁大库档案，使大批明清史料免致散灭。

罗振玉勤于述作，生平著作130余种，刊印书籍400余种。台北文华出版公司和大通书局于1968年至1976年先后出版《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至七编，共收罗氏著作及著录180种。

（张世超）

章太炎（Zhang Taiyan，1869～1936）

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参加了早期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章炳麟的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均有卓越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学术渊源上看，章炳麟师承清代学术中的皖派著名学者俞樾，对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等皖派大家广泛应用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有切实的把握，清末避地日本时又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观点，这使他有条件继承旧"小学"的优良传统并注入新的精神。章氏对汉语语言学的贡献之一是他在1906年明确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崭新的学科名称，明确宣布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字，提出了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重要理论课题，使"小学"摆脱了原来的经学附庸地位。章炳麟的语言学说主要见于他的《国故论衡》（上卷）、《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等著作。

草创汉语语源学是章氏的又一贡献。在对语源及词语孳生繁衍规律的探讨方面，他既继承了清儒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研究方法，而又有所创新。章氏在清儒研究基础上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角度明确提出了"语根"这一概念，在《国故论衡》中的"小学略说"、"语言缘起说"和"转注假借说"等章节里较为集中地阐发了他的语源学思想。他说："语言者，不凭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他认为，"语言之始，义相同者、义相近者和义相对相反者亦多从一声而变。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于是章氏"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

《文始》一书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实践。该书用孳乳和变易两大条例统括汉字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古音为枢纽，沟通汉字的形、音、义，用对转和旁转推求同源字之间声音变化的轨迹，用荀子的状所论囊括同源字之间的意义关系，从而建立了语根和字族，系统地阐发了五六千字的派生、分化和演变的过程。尽管《文始》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为后人所批评，但是其对汉语语源学的草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章氏精心审定古音系统，他在前人古韵分部研究基础上，又分出一个至部、一个队部，定为23部，并作《成均图》，提倡对转、旁转说。在古纽研究上，他提出"古音

娘、日二纽归泥说”，定古纽为5类21个，对汉语音韵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文曦）

王国维（Wang Guowei，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又号礼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幼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为清秀才，屡应乡试不中。1898年至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同年入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及理化等知识，深得罗振玉赏识。1901年赴日本留学，旋以病归。相继在南通师范学堂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讲授心理学、伦理学。1906年赴北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移居日本京都，转攻经学、小学、历史，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回国后在上海为英国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兼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年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6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王国维有拓荒、奠基之功。由王国维编纂，姬佛佗具名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一书，公布了哈同所藏的刘鹗旧藏甲骨，是早期甲骨著录中的重要一种。王氏为该书所作的文字考释，代表了甲骨学草创时期的最高水平。王氏首先将碎裂的甲骨缀合，从而获得重要的史料，又首先通过对殷王世系和卜辞称谓的研究，确定了某些卜辞的具体年代，发后人甲骨断代之端绪。此外，王国维还首先根据卜辞所记内容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机制。所撰《殷卜辞史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系统地考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勾勒出一个大体可信的商王世系，从而证明《史记》、《世本》所叙之商史并非虚构，并纠正了《史记》记载中的一些具体错误。

王国维对金石文字也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曾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对宋以来的金文著录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并且将金文资料用于周代历史及有关制度的讨论，如《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猃狁考》等，均是有影响之作。

王国维学识广博，在许多领域内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曾著《简牍检署考》，讨论古代的简册制度；《明堂庙寝通考》和《明服考》考证古代的建筑与服饰制度；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则考释西北所出汉晋简牍，考定汉代候官，烽燧次第等。

王国维早年曾从事文学研究，思想上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所著《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1904）、《红楼梦评论》（1904）均为有影响之作。《宋元戏曲史》（1912）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间词话》（1908）为王氏文艺批评的代表作，熔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于一炉，影响甚大。

王国维著作结集成书者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等。罗振玉选编其42种著作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后商务印书馆又辑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40），共43种，104卷，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重新影印，题《王国维遗书》。

（张世超）

杨树达（Yang Shuda，1885～1956）

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幼承家学，少年时即对声韵训诂之学产生极大的兴趣。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1911年回国，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中国大学国文教

授。1937年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杨树达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古汉语语法，文字学，兼及训诂、音韵、修辞、方言等，共写出学术论文300多篇，专著10余部。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作是《高等国文法》(1930)、《词诠》(1928)、《马氏文通刊误》(1931)。《高等国文法》是杨氏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时编著的讲义，重点研究古汉语词类，是30年代规模较大且有较大影响的古汉语语法著作，但由于主要是从“治国学”的角度来研究，对整个语法体系的考虑比较欠缺。《词诠》是一部仿效《经传释词》体例解释古汉语虚词用法的工具书。共收虚词500多个，每个虚词下条分不同用法，每种用法下标明词性和释义，再列举大量的书证，是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参考书，自出版后，备受推崇，该书的不足是对虚词缺乏综合的研究，对单个虚词的用法和意义分项太细，解说太简略。《马氏文通刊误》是专为纠正《马氏文通》的错误而作，其中对不少具体问题的刊正是正确的，但在理论上少有超过马氏之处。自1930年以后，杨树达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到了文字训诂方面，先后出版了《积微居文录》(1931)、《古声韵讨论集》(1934)、《古书句读释例》(1934)、《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积微居金文说》(1952)、《积微居小学述林》(1954)、《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等著作，发表了数10篇文字、音韵、训诂、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的论文。在文字学方面，杨氏认为，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造字之初已有通假现象；同义字往往同源；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等等。这些论点都是很有意义的。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面，杨氏特别注意联系经史思考问题，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另外，杨氏还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汉书窥管》、《中国修辞学》、《淮南子证闻》等著作。

（杨荣祥）

黄　侃（Huang Kan，1886～1935）

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早年曾东渡日本，师从章炳麟。回国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黄侃博学多闻，治学严谨，被认为是乾嘉学派的殿军。

黄侃的主要成就在于音韵学。他的古音19纽，古韵28部，影响甚大。黄侃敏锐地注意到钱大昕、章炳麟所谓古所无之非敷奉微知彻澄娘日喻及照穿床审禅等15纽只能与二、三等韵结合，群邪二母也只与三等韵结合，因此将只与二、三等韵结合的17纽称作变声，其余只与一、四等韵结合的19纽称作本声。并认为所谓本声，是自《诗经》而然的，所谓变声是后代从本声产生的。黄氏古音19纽中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照系一分为二，照二归精系，照三归端系。

黄氏又考察了《切韵》，得出只有古本纽的韵32个，其中戈韵是歌韵的合口，末韵是曷韵的合口，桓韵是寒韵的合口，魂韵是痕韵的合口。此四韵合并后，得28韵，即所谓古本韵28部。

黄侃对《尔雅》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尔雅略说》是本世纪阐述《尔雅》最全面的通论性著作。《尔雅音训》则是以声音证训诂。这种以声音求训诂的方法进一步解决了不少过去研究《尔雅》没有解决的问题。

黄侃对《说文》研究十分重视，对《说文》的释义原则及利用《说文》研究声母、韵部的异同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著述有《说文纲领》、《说文略说》、《说文笺识四种》

等。但黄氏过于迷信《说文》，使他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

（张双棣）

钱玄同 (Qian Xuantong，1887～1939)

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炳麟，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在音韵学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他的《文字学音篇》是现代音韵学史上第一本通论性的著作。此书博采新说，综合中外古今，是音韵学革新与科学化的开始。以后音韵学通论性著作多源于此书的间架与体制。钱氏在中国学者中最早运用国际音标全面拟测古韵音读。他拟测的最重要特点是相配的阴阳入三声都有相同的元音，一个韵部只有一个元音。钱玄同重视甲骨金文，认为甲骨金文订正不少《说文》的违失。并呼吁用新思想新观点研究《说文》。这是他较章炳麟和黄侃高明之处，但是钱氏认为《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文、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则失于过激和偏颇。钱氏用当时通行的注音字母给《说文》部首标出今读，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这是他的首创，对研读《说文》的人很有用。

钱氏积极鼓吹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文字拼音化。在文字拼音化前主张汉字简化。1920 年，钱氏发表《简化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 年草拟《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分析了简体汉字构成的八种方式。1935 年钱氏主持编定《简体字谱》，收字 2400 个。钱氏简化汉字的八种方式影响很大，是 1955 年拟定《汉字简化方案》的主要依据。

（张双棣）

沈兼士 (Shen Jianshi，1887～1947)

浙江吴兴人。文字训诂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炳麟。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

沈兼士在文字训诂学方面造诣很深，最重要的成就在汉语词源学的研究。沈氏在《声训论》中明确提出必须从汉语本身声训及右文说着手建设汉语字族学。《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是沈氏词源学的代表作，材料丰富，论证严密，对右文与声训的区别作了详细的论证。对宋以来所谓右文说进行了全面总结，判定各家是非，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右文说的凡例七条，建立了右文说的理论体系和原则，并明确提出一个字族中表现同一中心意义的声旁，就是语根。换言之，汉语语根的表现形式是右文。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受到普遍赞许。《鬼字原始意义试探》、《希、殺、祭古语同源考》等是沈氏考证词语语源的重要论文。沈氏还曾主编《广韵声系》，将《广韵》谐声字按四十一声类编排，是研究汉字谐声和汉语语源的重要参考书。

沈氏 20 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编有《文字形义学》讲义。沈氏的论文集有《段砚斋杂文》、《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张双棣）

黎锦熙 (Li Jinxi，1890～1978)

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 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20 年起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48 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黎锦熙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代表了一个时期内汉语语

言学的研究水平。他有论文300多篇，专著30余部。影响较大的有3个方面：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辞典编纂。

1916年起，黎锦熙就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1918年与人共同呈请公布注音字母。1923年与钱玄同、刘复、赵元任等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于1926年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此后发表《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1949年以后参加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等工作。

黎锦熙在“五四”运动以前就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20年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整理写成了《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4年）。这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一方面借鉴了J.C.纳斯菲尔德《英语语法》，另一方面继承和修改了《马氏文通》的体系。该书进行语法分析的主要标准是意义。认为词类与句子成分有对当关系，即所谓“依句辨品”。提出“句本位”思想，认为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采用“图解法”显示句子的主干和枝叶。1957年～1962年出版了《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合写），体系与《新著国语文法》一致，但取材更丰富。1933年还出版了《比较文法》，进行文言和白话语法比较。其中主要讲词位和句式。词位即实体词（名词、代名词）在句子中的7个位置，句式则用图解法说明各种句子结构和句中虚词的作用。

辞典编纂也是黎锦熙毕生从事的工作。1949年前主编了《国语辞典》、《中华新韵》等，对汉语规范化有重要作用。1949年后又主持编写了《汉语辞典》、《同音字典》、《学文化字典》等，及时适应了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的需要。

（沈　阳）

陈望道（Chen Wangdao，1891～1977）

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曾就读于之江大学。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夏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1920年起，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陈望道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60年，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面多有著译。他学术事业的基点和重心是对中国语文的研究，为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陈望道对民族语言的共同化、言文一致、汉语拼音、汉字简化和语文教育革新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和实践，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23年提出“把白话文完美化”的主张。1934年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讨论，提出建设“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公共语，对民族语言共同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939年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对明末以来中文拼音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要总结。

陈望道是“五四”后最早研究白话文语法的学者之一。1920年起连续发表《“的”字新用法》、《“和”字问题》、《评胡适论“除非”并说“又不”》等一系列探讨现代汉语虚字特点的文章。1935年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研究》，探索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途径。1938年在上海发动和组织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倡导语法研究要从汉语自身特

点出发，并借鉴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理论，提出了“功能”说，所撰《文法的研究》（1943）是中国语法学史上关于功能观念最早较完整的理论阐述。而后《试论助辞》（1947）、《漫谈〈马氏文通〉》（1958）、《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1961）等文章又对功能观点有所阐发，至《文法简论》（1978）一书，功能说更臻完备。依据功能说，陈望道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词类划分系统，对句子类型、谓语类型的划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望道的功能说，对于中国语法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探索，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陈望道始终关注和探讨语言的运用问题。1920 年就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作文法和修辞学。1922 年出版《作文法讲义》，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作了系统的阐释，是第一部讲解白话文写作法的专著。1924 年发表《修辞学在中国的使命》，提出了中国修辞学须要创新的任务。1932 年出版《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的修辞学书，全书以语言为本位，体现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原则，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作出了理论阐述，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体系，全面探讨汉语文的修辞手法，对汉语修辞格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描述。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陈望道的学术成果集中收入在《陈望道文集》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等著作中。1991 年由企业家姚美良提供基金设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

（陈光磊）

刘　复（Liu Fu，1891～1934）

字半农，江苏江阴人。1917 年起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1920 年赴欧洲留学，先入伦敦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专攻语音学，1925 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34 年 6 月赴平绥线（今京包线）调查方言时染上回归热，7 月不治而逝。

刘复对语言学的兴趣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是反对在汉语研究中照搬西方语法体系的“革新派”人物之一，主张建立有汉语特色的语法框架，著有《中国文法通论》（1920 年）和《中国文法讲话》（1932 年）。他积极参与国语运动，参加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他参与制定了编纂若干词典的计划，还发明了一套检字方法，可惜均因缺乏经费而未能付诸实施。

刘复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在语音学方面。在欧洲留学时他就结识了赵元任，并与之探讨研究汉语语音的实验方法。1923 年他发表了《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对汉语辅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进行了研究，得到了送气音比相对应的不送气音长等正确结论。1924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四声实验录》，以通俗浅显的语言介绍了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声调的物理属性和特点以及用实验的手段对声调进行分析的方法，并报告了对北京话等 12 种汉语方言的声调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在理论、概念和研究手段上为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展现了全新的天地。1929 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乐律语音实验室，该室曾记录了全国 70 多处地方的方音。他还致力于研制和改进各种语音实验仪器，设计制造了“刘氏音鼓”、“四声模拟器”等仪器，其中最著名的是“乙二声调推断尺”，在当时的实验条件下，这种便携式的尺子使

得测量和计算声调绝对音高的时间大大缩短，并且减小了结果的误差。他还对汉语语音实验研究的深入和其他一些实验仪器的制作提出了很好的构想，可惜尚未实现，就在英年殉职于他所致力的事业。

（王韫佳）

郭沫若 (Guo Moruo, 1892～1978)

字鼎堂，四川乐山人。1910 年入成都高等学堂，1913 年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同年底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1923 年毕业后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创作。1924 年回到上海。1926 年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于 1928 年东渡日本，开始进行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旅居日本的 10 年中完成的。他的《卜辞通纂》(1933) 和《殷契粹编》(1937) 无论是甲骨资料的甄选，还是编排体例，都为学界称道，至今仍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著录。他的甲骨文字考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屡创精辟之说，多见于《卜辞通纂考释》及《殷契粹编考释》中，《甲骨文字研究》(1931) 则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甲骨文字中所反映出的古代生产、计数、风俗、信仰、天文等文化现象，在文字考释著作中，尤为独树一帜。

郭沫若在青铜器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建树。旅日期间共完成六部有关金文的专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1)、《金文丛考》(1932)、《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4～1935)。他将传世的，著录的周代金文资料有序地组织排列起来，形成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勾勒周代历史的金文资料系统。为建立这一系统，他又创造了标准器断代法和彝器形象学，这种开创性的研究给学术界以深远的启迪。郭沫若的金文文字考释，不仅注意探讨字形结构的源流、声韵关系及字义在铭文通读中的作用，而且注重语源学方面的理据，这使他的考释往往精湛，准确而不可移易。

郭沫若研究殷周古文字，“其目的本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在早年的著作中，他就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作过深入的探讨，建国以后，他不断地修订自己的成说。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郭沫若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 1957 年至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陆续出版《沫若文集》17 卷，郭沫若逝世后，自 1982 年开始出版《郭沫若全集》，共 38 卷，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

（张世超）

赵元任 (Zhao Yuanren, 1892～1982)

江苏常州人。1892 年生于天津，1902 年开始在家里读私塾，1906 年在老家常州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907 年转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1910 年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 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修习哲学。1915 年转入哈佛大学，191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 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讲师。1920 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教。1921～1924 年赴美

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1925 年回国，1925～1929 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1938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8 年赴美，先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任教。1945 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 年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1982 年病逝于美国麻省剑桥。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言学研究长达 60 余年，在推行国语、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音位学理论研究和记音方法与记音工具的设计、汉语语法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共出版著作 10 余种，论文 60 余篇。

赵元任 1922 年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所依据的标准音是《国音字典》（1920）中兼顾古今南北的老国音。1935 年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所依据的标准音是《国音常用字汇》（1932）中紧靠北京话的新国音。他发扬中国传统语言学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在推行国语工作上起了示范作用。

赵元任 1926 年起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调查过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粤语、徽州话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方言，发表了很多调查报告和专题论著。比如，《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钟祥方言记》（1939）、《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山方言》（1948）、《台山语料》（1951）、《汉语常用植物词》（1953）、《汉语称呼词》（1956）等。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

赵元任 1930 年出版《方音调查表格》，选择常用的 3000 多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排列成表，形成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这是利用中国古代音韵学知识控制方言调查的成功实践。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记录和归纳，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这本表格后来被中国科学院言语研究所改编成《方言调查字表》（1957）。

赵元任 1934 年发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根据自己长期的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实践，说明从语音材料上归纳音位系统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惟一的。文章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结构主义的经典文献；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各国语言学家经常称引。他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汉语以及其他有声调的语言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

赵元任 1948 年出版《国语入门》，这是中国第一部尝试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在语法分析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上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65 年出版《中国话的文法》，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作为分析语法结构的主要方法，使语言结构的层次观念在汉语语法学界更加深入人心。他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语法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精到的分析，使得该书至今仍是国内外引用最多的汉语语法著作。

赵元任 1959 年出版《语言问题》，这是他系统地讲述语言学以及相关的问题的演讲记录。他用风趣的语言、丰富而生动的例子阐明深刻的见解，先后被改写和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日语。

1976 年，Anwar S. Dil 把赵元任六七十年代的论文或讲演稿编成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汉语社会语言学面面观——赵元任论文选），1985年，叶蜚声选择了其中的3篇，加上30年代的一篇，编成《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1992年，为了纪念赵元任诞辰100周年，袁毓林选了赵元任的12篇论文，编成《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袁毓林）

陆志韦（Lu Zhiwei，1894～1970）

浙江吴兴县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5年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2年到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汉语史研究组组长。1957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陆志韦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范围颇广，重点是汉语音韵学。他先从修订高本汉中古音学说入手，发表了《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中古汉语的浊声母》（1940）、《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1940）等长篇论文，否定了高本汉的"喻化"说，提出了浊音不送气、纯四等没有i介音等一系列创见，在音韵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专著《古音说略》（1947）用自己所创的体系，从《切韵》音上溯，运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系统，论证缜密细致，特别是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因而颇受学术界推重。1946年至1948年，陆志韦集中研究了《皇极经世·天声地音》、《中原音韵》等语音史资料，在《燕京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九篇有关古官话语音史的论文，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把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陆志韦在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1）一书，详细列举了北京话中的单音词（包括一部分单音词根），特别是首次提出了确定词的"同形替代"原则，并强调汉语分别词类的标准最重要的应当是一个词在句子里最普通的地位。该书对汉语词汇、语法以及文字改革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汉语的构词法》（1957，合作），是一部对构词法和分词标准研究得非常深入的专著，书中首次使用了结构分析方法——扩展法来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认为确定词"不能单凭意义的单纯性，紧凑性，抽象性等等来决定"，而应该"从分析语言结构人手，是注重形式的，可不是'无意义'的"。这些方法和理论，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荣祥）

容　庚（Rong Geng，1894～1983）

原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少年时就酷爱金石文字，1917年东莞中学毕业后，着手编纂《金文编》。1922年携所编《金文编》书稿北上，得到罗振玉的赏识。随即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1927年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1934年发起成立考古学社，出版《考古社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南下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逝世。

容庚在青铜器、甲骨学及书画碑帖等方面均有贡献，出版著作20余种，论文及其他述作近百篇。

容庚对古文字学的贡献，以青铜器方面为最多。金文字汇《金文编》初版于1925

年，以后一再增补重版，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商周金文大字典。由于内容详备和矜慎，深得学术界的推崇。还编有《金文续编》（1935），专收秦汉金文；又把所见秦汉金文汇编为《秦汉金文录》（1931），可与《金文续编》对读。

容庚精于青铜器鉴别，曾鉴定清宫旧藏器物，编印为《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西清彝器拾遗》（1940）等书，还选编流散海外的青铜器，出版《海外吉金图录》（1935），又选辑刘体智所藏青铜器为《善斋彝器图录》（1940）。自藏铜器则汇编为《颂斋吉金图录》（1933）及《续录》（1938）。

容庚1941年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这是第一部关于商周铜器的综合性论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通论”，综论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下编“各论”，按类系器，逐器辨析。此部巨著是对宋清两代金石学的科学总结，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新成果而集其大成者，在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有重大影响。后与张维持改编为《殷周青铜器通论》（1958）。

在甲骨学方面，容庚与瞿润缗合作的《殷契卜辞释文》（1933）等书，在甲骨卜辞考释书里是比较有影响的著作。

容庚晚年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方面，也有不少论著。

（黄天树）

董作宾（Dong Zuobin，1895～1963）

字彦堂，别署平庐。河南南阳人。1923～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后改任研究员，多次参加殷虚发掘工作。1947～1948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随史语所去往台湾。此后历任史语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和台湾大学教授。1963年在台北逝世。

董作宾在甲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甲骨断代学说，1931年发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第一个提出“贞人”说。1933年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断代研究的10个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盘庚迁殷至纣之灭”的甲骨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且讨论了分期的标准和各期卜辞的特征。五期分法是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基础的，为学术界沿用至今。但实践证明，五期分法也有其缺点，重要的缺点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类跟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单纯以王世来分期，实际上是认为一个王世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卜辞。一旦发现同一王世有不同种类的卜辞时，便很难纳人五期的框架。为了解释与五期分法不合的新现象，董氏后来又提出了分派的说法，作为五期学说的补充。他根据卜辞所反映的礼制，把祖庚以前诸王和武乙、文丁划入旧派，其他诸王划人新派。今天看来，分派的学说是难以成立的，但是揭示出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甲骨的断代研究等是起了推进作用的。

董作宾1945年出版了《殷历谱》，利用排谱方法，从“新派”的卜辞中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后来的研究者或称为“周祭”）的制度。这也是对甲骨学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但他研究殷代年历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承认。

董作宾在甲骨学等领域中论著甚丰。董氏去世后，他的弟子严一萍搜集其著述，编成《董作宾先生全集》，于1978年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共12册，是董氏甲骨学等

研究成果的总集。

（黄天树）

于省吾（Yu Xingwu，1896～1984）

字思泊，号双剑誃主人、泽螺居士、夙兴叟，辽宁海城人。1919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1928年任奉天萃升书院院监，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移居北平。自1929至1949年，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52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起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于省吾早年为学以词章为主，曾有《未兆庐文抄》行于世。后潜心从事于古文字学与古文献整理研究。他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上，强调考释古文字不仅应注意形、音、义三者的相互关系，还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他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字形之间的“纵的关系”。他在40年代出版了三本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即《双剑誃殷契骈枝》（1940）及其续编（1941）、三编（1943），解放后又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考释甲骨文的文章，后来将历年来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研究成果汇编为《甲骨文字释林》，于1979年出版。他主持编纂的大型工具书《甲骨文字诂林》于1996年出版。在金文研究方面，撰有《双剑誃吉金文选》（1933）、《双剑誃吉金图录》（1934）、《商周金文录遗》（1957）等专著及一系列研究文章。

于省吾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时，还致力于用古文字学知识及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校订先秦典籍，成绩斐然。撰有《双剑誃尚书新证》（1934）、《双剑誃易经新证》（1936）、《论语新证》（1941）、《双剑誃诸子新证》（1962）、《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1982）等，被称为“新证派”的代表。50年代以后，于省吾曾集中精力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商周时代的社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强调在研究上古历史时应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冯胜君）

方光焘（Fang Guangtao，1898～1964）

字曙先，浙江省衢县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国教书，1929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国，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任教。解放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方光焘还是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方光焘在留法期间专攻语言学和语法理论，对索绪尔和房德里耶斯等人的语言理论尤感兴趣。回国后，他着力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是我国语言学界全面系统介绍索绪尔语言学说的第一人。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语言研究中区分共时与历时的重要性，并强调语言的体系性，他1952年完成的《语言学引论》讲稿明确指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他还是我国语言学界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的发轫者之一。

方光焘是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在1938～1942年由陈望道发起的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先后发表了《体系与方法》、《再谈体系与方法》、《一点声明》和《建设与破坏》等六篇论文，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他反对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而只能根据词“在句中的职务”划分词类的意见，认为“词性却不必一定要在句中才能辨别得出来”，“从词与词的互相关系上，词与词的结

合上也可以认清词的性质"，这种"所谓'关系'，所谓'结合'，都无非是一种广义的形态"。"广义形态"的提出，是他对汉语语法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方光焘十分重视方法论、方法的研究。早在30年代的《体系与方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体系能否成立，以及经得起事实的验证与否，全看所用的方法如何而定。1963年，他在发表的《谈方法论、方法问题》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方法论、方法的重要文献。

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共汇集方光焘学术论文、报告、提纲和教材讲稿等共43篇，是方光焘解放后语言学、语法学研究成果的总集。

方光焘语言学功底深厚，眼光敏锐，勇于革新。独辟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西方理论与汉语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途径，为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　津）

罗常培（Luo Changpei，1899～1958）

字莘田，别号恬庵，曾用名心恬、恬厂等。北京人。满族。1913年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1919年毕业，接着又读了两年哲学系。1923年任西北大学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开始讲授汉语音韵学，从此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1927年至1944年，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秋至1948年7月，赴美国任耶鲁大学等校访问教授。回国后仍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6月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罗常培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著作宏富，创获很多，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家。他自觉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音韵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罗常培用力最勤。提出"审音、明变、旁证、袪妄"的研究法，使一向被认为玄奥难懂的"绝学"变为可以理解的语音科学。《释重轻》（1932）、《释内外转》（1933）等论文是"袪妄"的代表作，阐释了一些前人长期纠缠不清的关键术语。《汉语音韵学导论》（1949）凝聚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既是一部音韵学入门的教科书，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音韵学奠基之作。他借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善于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和标音方法，充分利用韵文、韵书、字书、音义书、韵图、梵汉对音、藏汉对音、现代方音等各种材料，对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音类加以科学的考订与构拟。代表作有《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1）、《梵文颚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1931）、《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1937）和《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8，合作）等。其中，《唐五代西北方音》是集中体现"审音、明变"研究方法的范本，又是我国第一部探讨古代方音的著作。《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全面考察两汉诗文用韵，填补了从先秦到两汉的语音史研究的空白。罗常培非常重视音韵史各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与刘复、魏建功合编的《十韵汇编》（1936）是研究《切韵》及《切韵》系韵书最直接的材

料，与蔡美彪合编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对探讨元代汉语语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挖掘各种音韵资料的同时，阐明其学术价值，代表作有《〈通志·七音略〉研究》（1935）《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1931）《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30）、《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与古官话〉》（遗著，1959）等论文。

继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之后，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是第二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描写一个方言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从语言学的高度研究厦门方音的专著。出版于 1936 年的《临川音系》是我国田野调查方言的开始，把临川音跟客家话、《广韵》音系进行比较，把客赣方言的亲属关系联系起来，并且找出临川音与北京音的对应规律，既有共时的分析，又有历时的比较。对于开展方言调查、推广普通话，具有先导和示范作用。

罗常培还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曾调查过傣、白、傈僳、纳西、景颇、独龙、苗、怒等语言，著有《莲山摆夷语文初探》（1950，合著）、《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1951）、《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1954，合作）等论著。

罗常培在语言学的其他方面也多有建树，《语言与文化》（1950）首次从语词涵义的角度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开辟了语言文化学的新领域。《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合作）应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语言的具体实际，普及了现代语音学知识，同时也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国音字母演进史》（1934）简述明末到民国 300 年间各种拼音方案的要点，是我国第一部拼音方案史。

（张渭毅）

王　力（Wang Li，1900－1986）

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24 年赴上海读书，两年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1927 年赴法国留学，专攻实验语音学，1932 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并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1954 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王力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世纪，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绩之大，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文字改革等方面出版著作近 40 种，论文近 200 篇。

王力 1936 年初发表了《中国文法初探》，批评了当时简单比附的研究方法，倡导着力研究汉语语法自身的特点。这篇文章的问世，标志着语法研究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次年，又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文章通过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发现在汉语中表明语和主体的关系可以由词的次序来表示，没有使用系词的必要，上古汉语没有系词。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新的语法学的基础”（朱自清语）。40 年代，王力又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两部著作，前者以说明语法规律为主，后者专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阐发。这两部著作用普通语言学理论作指导，直接研究一定范围的原始材料，完整地建立起自己新的语法体系。

王力 1936 年出版了《中国音韵学》（后改称《汉语音韵学》），用现代语音学知识逐条解释了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并介绍了传统的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以及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这本书和 1963 年出版的《汉语音韵》为汉语音韵学的普及和科学化

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在汉语音韵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声》《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韵拟测问题》《古无去声例证》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建立了自己的上古音体系。王力的上古音体系的特点有三：1. 脂微分部；2. 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是开音节，没有-b，-d，-g等浊音韵尾；3. 上古声调没有去声，入声分为长入、短入两大类。

王力对汉语词汇学也作过深入研究，曾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新字义的产生》《理想的字典》等论文，探讨了汉语词义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用历史观点研究汉语词义的见解。1947年发表的《新训诂学》对传统训诂学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清算，再次强调用历史观点研究语义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了研究语言史的新任务。1978年出版的《同源字典》通过语源关系的研究，找到了本来好像一盘散沙的词汇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是汉语词汇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王力1957年至1958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集中总结了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研究成果，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1979年以后，王力又修订重写这部著作，先后完成了《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三部著作。王力在1981年出版了《中国语言学史》，对传统语文研究和新的语言学研究作了初步总结，也具有草创之功。

王力还从语言角度研究古代诗歌，出版了《汉语诗律学》和《诗词格律》等著作，发表了《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略论语言形式美》等论文，引起了诗歌界的重视。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力文集》20卷是王力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总集，为研究王力语言学著作提供了最好的版本。王力将《王力文集》的稿费全部捐出，设立了王力语言学基金，用以奖励后学。

（张双棣）

唐　兰（Tang Lan，1901～1979）

字立厂（又作立庵），浙江嘉兴人。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后从事《说文解字》和古文字研究，深得罗振玉、王国维赏识。1932年开始为各大学所延聘，讲授古文字学等课程。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院长等职，直到1979年去世。

唐兰从事中国古文字学研究逾半个世纪，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绩之大，在古文字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他在文字学、古文字学、甲骨学、青铜器等方面均有建树，著述甚丰。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唐兰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重要的贡献。20年代至30年代，考释甲骨金文的文章很多，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胡猜，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力图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上，奠定了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基础，也使古文字的研究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1949年，唐兰又出版了《中国文字学》，主张文字学应该与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开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汉语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唐兰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最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殷虚文字记》（讲义本1934年，新版1981）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考释文字，屡有创获。

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唐兰也作出比较重要的贡献。他的代表作有未完成稿《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其他论文见故宫博物院所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1995）。青铜器断代对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唐兰考释作册令尊、彝的铭文，认定西周金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庙，结合其他论据，构筑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不同的西周铜器断代体系，推进了西周铜器断代的深入研究。

唐兰晚年参加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对侯马盟书主盟者的研究，也有可贵的贡献。

（黄天树）

魏建功（Wei Jiangong，1901～1980）

笔名天行、文里、山鬼。江苏海安县人。191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21年转入中文系，1925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1938年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赴台北主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兼台湾大学教授。1948年回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魏建功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规范化、汉字改革和辞书编纂等方面卓有成就。运用严谨的方法，充分占有材料，注重考据，是他研治音韵学的特色。《古音系研究》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音韵学史专著，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独到的见解，讨论古音系的分期和材料，提出审音、论变、探源的研究方法和20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方言学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与刘复、罗常培等编纂《十韵汇编》，所发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十韵汇编〉魏序》、《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论〈切韵〉系的韵书》、《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等，详密论证了《切韵》的体制、性质和源流。在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方面，重视历史和现状相结合，代表作有《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从汉字发展的情况看改革的条件》、《汉字简化的历史意义和汉字简化的历史基础》等。魏建功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小型语文字典《新华字典》，释义简要精确，影响广泛长远。他早年还热心于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方言的调查研究，代表作有《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吴歌声韵类》、《黟县方言调查录》（与刘复、白涤洲合著）等。

（张渭毅）

李方桂（Li Fanggui，1902～1987）

原籍山西昔阳县，出生于广州，1915年进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李方桂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曾得到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和伯克等人的指导，获取了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印欧语史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1929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9年后的八年时间里，李方桂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

侗台语、泰语及古藏语的研究。1937 年赴美国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两年，回国后继续任职于中央研究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1943 年在成都任燕京大学访问教授，1946 年再次赴美，先后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49 年任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至 1969 年退休。同年转任夏威夷大学教授，1974 年再次退休，被美国一些大学争聘为名誉教授。曾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担任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I-JAL）副主编。李方桂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李方桂一生对语言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汉语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古音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如：《切韵 â 的来源》（1931），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字，论证《切韵》“泰谈盍”等韵的［â］上古音也是［*â］，跟“咍覃合”等韵来自上古音［*ə］的［â］不同。《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32），认为中古的东、屋、冬、沃是从上古的 uong、uok、iuong、iuok 变来的。晚年所著《上古音研究》是作者上古音研究的总结性长篇论文，1971 年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新第九卷，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该文构拟了上古音的整个系统，比高本汉所构拟的系统前进一大步。

二是侗台（侗壮）语的调查与研究，尤其是古壮台语的构拟。李方桂从 1930 年至 1942 年亲自调查研究了中国境内的云南、广西、贵州各地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羊黄、莫等约 20 种语言（方言），还到泰国调查了泰语。后来整理出版了专著六种：《龙州土语》（1940）、《莫话记略》（1943）、《武鸣土语》（1956）、《羊黄语（绪论与音韵、语料、词汇）》（1966、1967、1968）、《水语研究》（1977）、《台语比较手册》（1977）；发表了有关研究论文几十篇，如《原始台语中系列先喉塞辅音的拟测》（1943）、《水语中声母和声调的分布》（1948）、《三种水家话的初步比较》（1951）、《台语声母和声调的关系》（1962），《台语支与侗水语支》（1965）等。在这个领域里，李方桂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不仅准确地调查、描写了多种语言（方言），还对这些语言（方言）进行对比研究，构拟其原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台语比较手册》被认为是台语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三是藏语的研究，包括藏汉对音和古代西藏碑刻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33）、《唐蕃会盟碑考》（1956）、《敦煌汉藏词汇》（1963）、《古藏语碑文研究》（1987，与柯蔚南合作）。其中，《唐蕃会盟碑考》最为重要，这篇文章复原了碑文残字，作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考证，特别是对碑文的汉藏对音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四是北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1927 年至 1929 年，李方桂多次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语进行调查，重点调查阿塔巴斯堪语族。自 1930 年发表《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萨耳西语的动词词干研究》后，至 70 年代，陆续出版了研究印第安语的八种论著，其中有四种是调查研究赤坡岩语的成果。这些论著已经成为印第安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

另外，李方桂还曾在《语言和方言》（1937）一文中最早提出中国语言系属分类的意见，至今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李方桂一生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李方桂是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语

言研究的开拓者，是台语研究方面的公认的权威。

（杨荣祥）

商承祚（Shang Chengzuo，1902～1991）

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1921年商承祚负笈北上，拜罗振玉为师学习古文字。后经马衡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1927年任中山大学教授。30年代，先后执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金陵大学南迁，后又在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1948年重新回到中山大学任教授，直到去世。

商承祚1923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类编》，是最早的甲骨文字典之一，此书深得王国维的赏识，并为之作序。1933年又相继出版《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二书。前书选拓37版，皆刘铁云、徐梧生故物，文字之末附以考释。后书集八家所藏甲骨及墨本千余版，在甲骨卜辞考释书里，是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在青铜器方面，商承祚于1935年汇集于省吾等12家藏器成《十二家吉金图录》，文字与图像花纹并重，印刷精良，文字说明和考释翔实精当。1936年出版《浑源彝器图》，为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资料之仅存者。1934年和1936年在《金陵学报》上发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及其《补编》，是很有创见的论文，与《秦权的使用与辨伪》同为铜器辨伪的重要著作。

在楚文化研究方面，抗战初期，商承祚随金陵大学南迁，路过长沙，获悉当地盗掘出土许多战国楚墓文物，就在长沙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到成都写成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于1939年刊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楚文物出土情况的专书；后来又在1955年出版《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两书对楚文化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商氏还编有《战国楚竹汇编》等。此外，商氏的专著还有《说文中之古文考》（1934）、《石刻篆文编》（1957）等多种。

（黄天树）

张世禄（Zhang Shilu，1902～1991）

字福崇，浙江浦江人。东南大学毕业，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多所大学任教。解放后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上海，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语言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张世禄研究兴趣广泛，富于探索精神，既注重吸收西方先进语法理论，又注重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汉语研究实际。从传统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到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诸方面，直至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都有较深的造诣，为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解放前，张世禄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上。在传统成就和西方理论之间，力图找到一条结合的道路。《中国音韵学史》（1938）是他在音韵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作者着重指出，中国音韵学的进步，曾受到两次外来文化的影响，一是印度文化的输入，产生了反切的注音方法、四声的名称以及字母等韵的建立和排比；二是西洋文化的输入，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这是30年代继王力《中国音韵学》（1936）以来又一部系统地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讲述的中国音韵学著作。

张世禄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为《广韵研究》（1931），书中对《广韵》的价值、名称、作述者、版本、反切注音的方法、韵

部、声部中的有关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讲述、考证，并对《广韵》以前及以后韵书的情况作了介绍，是学习音韵学的良好入门书之一。

在普通语言学方面，张世禄也一再有专著问世，从30年代开始，先后出版的有：《语言学原理》（1930）、《语言学概论》（1934）、和《语言学纲要》（1935）等。

解放后，张世禄的研究以汉语词汇为重点，出版多种词汇学著作以及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词汇学普及文章，不但为语言学领域，也为初、中等教育领域作出了贡献。

（王卓异）

岑麒祥（Cen Qixiang，1903～1989）

广西合浦人。1922年考入广州国立广东师范学校，1928年赴法留学。师从房德里耶斯、梅耶、傅舍等著名语言学家。1933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文学院副教授、教授。1954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岑麒祥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学史方面成果尤多，早在1936年，他就把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译为中文，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论著首次传入中国。其他重要论著有：《语音学概论》（1939，1958增订版）是我国的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系列文章《语法理论基本知识》（1954）主要介绍普通语法学的基本知识。《普通语言学》（1957）概要地论述了现代各语言学流派的理论要点和学术背景，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这本书是参照前苏联的教学大纲编写的，立场和观点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它系统性强、论证清晰，在当时起到了普及语言学知识和提高理论认识的作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1960）重点对比较语言学基本原理的讲解，材料丰富翔实。岑麒祥还翻译了许多现代语言学家的作品。1988年，他把自己的一些译著集为《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1992）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

语言学史是岑麒祥最重要、影响最为广泛的学术成就，《语言学史概要》（1954）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涉及了整个语言学研究史中的各种重要观点和流派，还从普通语言学史的角度论述了我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的成就。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语言学史的著作，填补了我国理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空白。

岑麒祥在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也成果颇多。1951年至1952年间，他陆续发表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和语文问题》、《关于华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广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纪略》等文章，讨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及华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1956年，为配合国内方言调查，他把1936年发表的《方言调查方法概论》整理出版，改名为《方言调查方法》，阐明了方言调查的基本理论，详细地说明了记音音标和记音方法。晚年，岑麒祥集多年搜集之功，编撰了《汉语外来词词典》。

岑麒祥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为中国理论语言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方　希）

袁家骅（Yuan Jiahua，1903～1980）

江苏沙洲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37年至194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英语、古日耳曼语和印欧语比较语言学。1940年回国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

1948年再赴牛津大学访问。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和中文系教授。

袁家骅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二是从事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40年代至50年代，袁家骅调查过窝尼语（即哈尼语，属彝语方言）、阿细语（属彝语方言）和壮语，并为壮语文字的创制进行工作。发表了《窝民语音系》（1947）、《峨山窝尼语初探》（1947）、《武鸣壮语词法初步研究》（合著，1958）、《壮语/r/的方音对应》（1963）、《论壮语的体词向心结构》（1979）等多篇论文，出版了专著《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53）。袁家骅的学术研究特点是在占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注意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对比。1955年起袁家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1960年，袁家骅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见《汉语方言概要》条）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专著，至今是高等院校汉语方言课程的重要参考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谢留文）

吕叔湘（Lü Shuxiang，1904～1998）

江苏丹阳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曾在丹阳县立中学、苏州中学任教。1936年赴英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和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研究员等职。1952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8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

60多年来，吕叔湘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写下了大量有高度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专著与论文，为我国语言科学和语文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吕叔湘研究的重点是汉语语法。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是他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语法著作。这部著作体现了吕叔湘的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反对机械模仿外语这一重要语法思想，是当时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惟一著作，也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

1952年出版了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这部著作以匡谬正俗为目的，将语法、修辞和逻辑结合起来，讲解当时文章中常见的一些语病，对普及语法修辞知识、提高文字表达水平起过积极作用。1979年出版了修订本，更换了少量不妥例句并删改了个别观点。

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的理论性著作，也是吕叔湘数10年来语法研究的深刻总结。吕叔湘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著。"80年代以来我国语法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与这部著作的启发与指引是分不开的。

吕叔湘另一部重要语法著作是由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书中选词以虚词为主，也酌收一小部分用法比较复杂或特殊的实词。这本书以大量的、详备的例句说明虚词的各种用法，分析细腻而深入，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词典。

数10年来，吕叔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如《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漫谈语法研究》、

《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等，这些论文分别收进了《汉语语法论文论》和《吕叔湘语文论集》。

吕叔湘还写过许多精悍而又极富启示作用的短文，大多收进《语文近考》、《语文杂记》和《未晚斋语文漫谈》。

吕叔湘另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近代汉语。作为这一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从大量古代文献中爬罗剔抉，搜集出有用材料，进行分析与归纳，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进了《汉语语法论文论》。80年代初，他出版了《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这本书运用现代语言学原理，从用法和音韵两方而深人考察时代不同的语词之间有没有语源关系，从而准确地勾画出指代词的演变轨迹。

吕叔湘十分重视汉外对比研究，他的《比较汉英词义》、《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等论文在方法上给人以重要启示。他撰写了《中国人学英文》、《中级英语语法》（陈芳译）等有关英语的著作。此外，他还有多种译著出版，在翻译界有一定影响。

为了鼓励青年语言学者作出更大成绩，吕叔湘1983年5月捐献了他多年积蓄的6万元，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

（徐　枢）

陆宗达（Lu Zongda，1905～1988）

字颖明，浙江慈溪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师从黄侃，1928年毕业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讲师。1949年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陆宗达早年致力于音韵学研究，著《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1932）、《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稿后记》两文，证实王念孙晚年分周秦古韵22部，为当时古音韵研究者所重视。陆宗达的主要成就在训诂学和《说文解字》研究。所著《训诂浅谈》（1964）是一本训诂学入门读物。陆氏认为训诂学是汉语言学中的语义学，语义离不开文字和音韵，因而训诂学必须与文字学和音韵学紧密结合。陆宗达在《训诂方法论》（合著）（1983）一书中继承黄侃的见解，把训诂内容概括为形与义、音与义、义与义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以形索义”（形训）、“因声求义”（声训）、“比较互证”（义训）的训诂方法。该书对训诂学的对象、材料、任务和目的作了科学的界定，促进了训诂学的复苏与发展。陆氏所著《说文解字通论》（1981），材料详尽，论述简要，本乎师说而不囿于成见，为《说文解字》的深人研究奠定了基础。陆氏另有《现代汉语语法》（1954）（与俞敏合著）一书，提出汉语实词的形态变化和重叠形式等问题，曾引起语法学界的重视。

（张　雁）

丁声树（Ding Shengshu，1909～1989）

字梧梓，河南邓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年赴美国考察，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部研究员，耶鲁大学研究院语言学部研究员。1949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丁声树的成名作是《释否定词“弗”“不”》（1934）。该文分析先秦古籍中“弗”和“不”用法上的异同，认为“弗”是“不之”的合音连续形式。以后发表的《论诗经中的“何”“曷”“胡”》、《诗经“式”字说》、《“早晚”与“何当”》、《诗卷耳芣苢

"采采"说》等论文都显示了丁声树剖析古汉语中盘根错节现象的深厚功力。

丁声树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先后参加过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四个省的方言调查，是《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1956年至1957年举办过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为汉语方言普查培养人才。1958年写成《方言调查词汇表》。1959年主持昌黎方言的调查工作，写成《昌黎方言志》(见《昌黎方言志》条)。

丁声树在音韵学方言的专著是《汉语音韵讲义》(与李荣合著)和《古今字音对应手册》。在语法研究方面，他强调"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不可从定义出发，不要简单拿另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硬套在汉语上。"他和吕叔湘、李荣等人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海外誉为大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语法书"。

1961年起，丁声树接替吕叔湘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该词典于1978年正式出版。词典释义准确，选例精当，是现代语言词典的典范之作。正是丁声树严谨的学风和渊博的学识，成为词典成功的基本保证之一。

(李　蓝)

陈梦家(Chen Mengjia，1911～1966)

浙江上虞人，年轻时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响的年轻诗人。1932年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同年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1934至1936年在燕京大学攻读容庚的古文字学研究生。1937年起，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194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迫害致死。

陈梦家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青铜器的研究、甲骨学、汉简、古代史和古文献等方面出版著作10余种，论文70余篇，此外尚有数量可观的遗稿。

陈梦家在青铜器方面著述最多，重点在青铜器的形态学研究及分期标准。1954年发表《殷代铜器》，1955至1956年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西周铜器断代》，连载六篇后因被错划为右派而中止，这6篇论文讨论了从武王时期到懿孝时期的重要铜器共98器，是陈氏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现在考古研究所已将已发表的6篇及未发表的后半部遗稿，全部整理为《西周铜器断代》一书出版。该书对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有进一步的发展，从不同角度把分散的铭文内容串连起来，探寻判断年代的根据，阐述重要史事和典章制度，并且比较深人地研讨了铜器的组合、形制和花纹问题。

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1956)总结前人和当代学者关于殷虚卜辞研究成果的大型著作，是他在甲骨学方面的代表作。陈氏在甲骨断代的研究中、意识到董作宾按王世来划分甲骨的五期分法是有缺陷的，为此他实际上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里使用了先分类后断代的方法。这在甲骨断代研究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60年代，陈梦家把研究重点转到汉简方面，参加了武威磨咀子出土东汉简的整理，研究成果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武威汉简》一书。他还写了有关敦煌、居延等地汉简的论文多篇，当时只发表了一部分，后辑集为《汉简缀述》(1980)一书印行。

陈梦家还有一些关于古代史和古文献的著作，如《尚书通论》(1957)、《西周年代

考》（初版 1945；重版 1955）、《六国纪年》（1955）等。《六国纪年》一书还利用了战国文字资料。

（黄天树）

董同龢（Dong Tonghe，1911～1963）

云南昆明人。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旋即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一直在该所任研究员，1949 年以后又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54 年至 1956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1956 年受聘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客座教授，1959 年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讲学一年，1963 年病逝。

董同龢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1944 年发表《上古音韵表稿》，全面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声韵系统，对高本汉的构拟提出不少批评和修正。他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与高本汉一致，即以清儒所划分的上古韵部为基础来构拟上古的韵母系统，以等韵图的开合四等作为区别各部内韵类的依据；以谐声字为主要材料来构拟上古的声母系统；声母和韵母的音值都主要以《切韵》拟音上推的方法来决定。他超出高氏之处是材料的选择和运用更为精当、严格，观察更深入，如谐声字只用《说文解字》所收字和见于先秦典籍的字，排除后造的字，发现并解决更多的问题。书中按照 22 韵部、36 声母的框架排列了上古音的字表，成为一个体系。1948 年发表《广韵重纽试释》，指出重纽三、四等的对立代表着两种不同韵母的对立，同韵的重纽往往有不同的上古来源，三等和四等的差别应该在于主要元音，引起了学术界对重纽问题的再度重视。1949 年发表的《等韵门法通释》分析了等韵书中“门法”的性质，指出这是等韵学家为了解释韵图列字与韵书反切上下字的关系而订，除了“音和”是通例，其余各条都针对某些字在韵图上的地位跟韵书的归类不一致的情形而设立名目。1954 年出版《中国语音史》后来修改增订改名《汉语音韵学》于 1968 年出版，该书先讲现代国语音系，随后依次讲近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对每个阶段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都尽量详细介绍，是台湾最有影响的音韵学教科书之一。

董同龢曾参加赵元任主持的湖北方言调查工作，并参与编写《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单独发表的论著有《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厦门方言的音韵》、《四个闽南方言》、《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等。他调查方言用的方法是收集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语言材料，从中归纳音系和语素（词），而不是用现成的方言调查字表记音，因为按照中古音编制的字表所求得的音韵系统是演绎式的而不是归纳式的，而且不便于观察词汇和语法。《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记录了西南官话区里一个客家话方言岛的调查结果，归纳出声韵调系统，编制了音节表，收了词语 3000 左右，是当时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成绩，在调查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耿振生）

高名凯（Gao Mingkai，1911～1965）

福建平潭人。1935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随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6 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改攻语言学。1940 年获博士学位。1941 年任燕京大学助教、讲师。1942 年任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 年起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名凯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后期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

高名凯在法国学习期间在著名汉学家马伯乐的指导下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毕业论文为《汉语介词之真价值》（1940）。回国后在汉语语法方面论著颇丰，《汉语语法论》（1948）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代表作。该书突破以往研究中的印欧语法体系，根据汉语特点而重点突出句法和虚词的描写。全书贯穿以中西语言差异的比较、汉语古今现象联系的探求和对汉语语法现象的语义解释，特点十分鲜明。有重要影响的独特观点还有：汉语的实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虚词体现汉语的语法范畴，是重要的外部形态；汉语没有"时"范畴，但有进行、完成、结果、起动、叠动、加强等"体"范畴。《汉语语法论》是4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1949年后高名凯逐渐转向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成为学界公认的语言学理论领域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

《普通语言学》（1954～1955，增订本1957）主要介绍普通语言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概念，兼收苏联语言学的一些观点，是解放后高校中文系必修课"语言学概论"第一本全国通用的教材。

《语法理论》（1960）全书贯穿以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的划分，以此作为观察语法结构的独特视角。把语法范畴、汉语的词类、主语、谓语纳入语法意义的范畴加以研究是该书的创见。当时语法学界的主流是结构主义形式化的线性分析法，《语法理论》能够独树一帜强调语法意义是很难能可贵的。

《语言论》（1963）是一部纯理论著作，特点是将音位理论中"位"与"素"的概念推广到语言系统的其他层面，使整个理论体系显得更加对称有序。

高名凯积极投入了五六十年代语言学领域的三次大讨论。在词类问题和语言/言语的两次讨论中，他主张汉语实词无词类和言语有阶级性，是论争一方的主要代表，不怕孤立与围攻，把讨论引向深入。

高名凯善于从大处着眼建立体系，长于理论论述。他一生勤奋论著，思想活跃，勇于探索，为中国理论语言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重要贡献。

（梁　源）

胡厚宣（Hu Houxuan，1911～1995）

河北望都人，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0至1946年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47年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直到1995年去世。

胡厚宣从事甲骨学研究逾半个世纪，勤于著述，勇于探索，撰有专著和论文130余种，在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上作出很大贡献。

胡厚宣于1934～1935年参加安阳殷虚发掘，并为《殷虚文字甲编》作了全部释文，还协助董作宾整理《殷虚文字乙编》的甲骨文字。他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解决了不少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他前期的论文基本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二、三集1945）。

胡厚宣在致力于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同时，还积极从事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工作，为甲骨文的流传作出了贡献。他先后刊布的甲骨片数已达15000片以上，约占存世15余万片甲骨的十分之一。他先后出版了8部甲骨文著录书：《甲骨六录》（1945）、《战后平

津新获甲骨集》(1946)、《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甲骨续存补编》(1996)。此外，由胡厚宣担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历时近20年，至1978年终于编讫，并于1982年全部出齐，对甲骨文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厚宣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1950)、《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1)、《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殷虚发掘》(1955)。

(黄天树)

周祖谟 (Zhou Zumo, 1914～1995)

字燕孙，原籍河北武清县。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任助理员。1939年至1946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1947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0年起任教授直至1995年逝世。

周祖谟从事语言文字学的科研和教学近60年，精通音韵学、训诂学、古籍目录学和校勘学，学识渊博，著述严谨，功力至勤，共完成了21部专著(13部已刊)，320余篇论文。《问学集》收录从1934年至1962年所写的论文、札记、书评和序跋44篇，内容涉及音韵、文字、训诂三方面，论述精审，创获很多，多为传世精品，代表作有《诗经韵字表》、《审母古读考》、《禅母古读考》、《四声别义释例》、《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宋代汴洛语音考》、《陈澧切韵考辨误》、《论段氏说文解字注》、《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徐锴的说文学》等。与罗常培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是填补两汉语音史研究空白的上乘之作。1995年逝世后，生前整理的书稿《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96年出版，完成了生前遗志。《广韵校本》(附校勘记)是研读《广韵》的必备参考工具书。《唐五代韵书集存》集中编印了30种唐五代韵书的写本、刻本以及关于等韵学的写本资料，分别异同，辨章源流，详加考释，是唐五代韵书整理的集大成的著作。

周祖谟在古籍整理和校勘方面也卓有建树。1956年出版的《方言校笺》是研究扬雄《方言》的主要依据。其他代表作有《尔雅校笺》、《洛阳伽蓝记校释》、《论校勘古书的方法》、《古籍校勘述例》等。现代汉语的代表作有《汉语词汇讲话》、《普通话的正音问题》、《划分词类的标准》、《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等。

(张渭毅)

周法高 (Zhou Fagao, 1915～1994)

字子范，江苏东台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获中国语言学硕士学位，同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教授。1948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去台湾，任“国立”台湾大学兼任教授。1953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至1957年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1962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为客座教授。196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为客座教授。196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香港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及文学部主任、中国语言

学研究中心主任。

周法高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所涉足，并都有专著出版。在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主张进行古代汉语语法的分期和断代研究，先后发表《上古语法札记》、《中国语法札记》等论文，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篇幅浩大的巨著《中国古代语法》。他根据自己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构拟了上古音系统，编成了《上古音韵表》。在古文字学方面，主持编纂了《金文诂林》，这是一部金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还有金文考释研究专著《金文零释》。周氏另有《颜氏家训汇释》、《中国语文研究》、《周秦名字解诂汇释》及补编、《中国语文论丛》、《汉学论集》、《玄应反切字表》、《说文通训定声目录周法高音》、《牧斋诗注校笺》等书。

（金克中）

蒋礼鸿（Jiang Lihong，1916～1995）

字云从，浙江嘉兴人。1938年毕业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任之江大学国文系助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助教，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文学院中文系助教、讲师。1949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

蒋礼鸿一生都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著述颇丰。40年代所著《商君书指锥》即曾获奖，1959年初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88年出版第4次增订本）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此外，还出版了《义府续貂》、《目录学与工具书》、《怀任斋文集》、《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文集》、《类编考索》、《古汉语通论》（与任铭善合著）等著作，并担任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主编、《辞海》编辑委员兼语词分册主编、《汉语大词典》副主编。

蒋礼鸿在学术上以训诂学见长，尤以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及唐五代俗语词汇饮誉学术界。其《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训释了大量的唐五代口语词汇，对研究唐五代民间文学和汉语词汇发展史大有帮助，在古籍校勘、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蒋礼鸿也取得了相当有影响的成就。

（杨荣祥）

俞　敏（YuMin，1916～1995）

字叔迟，天津市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后转入辅仁大学，19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此后到中学教书，又去“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任编辑。1946年赴台北做推行国语工作。1947年回北京任燕京大学兼哈佛燕京学社助理研究员。1948年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后调任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副教授。1953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教授，直至逝世。

俞敏一生治学范围很广，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法、汉藏语比较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音韵学研究中，利用汉藏词音比较与梵汉对音研究古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重要论文如《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现象》（1948）、《论古韵合怗屑没曷五部之通转》（1948）、《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979）等。在汉语语法方面，除著有《现代汉语语法（上册）》（1954，合著）外，还在《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1）一文中，提出了重叠式可以作为区分形容词和动词的界限的看法。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俞敏把比较的领域扩大到虚词和句法，从而使汉藏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和先秦典籍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得到了新的阐明。如《汉语的“其”和藏语的gi》（1949）、《汉藏语虚词比较研究》（1984）、《东汉以前的羌语和西羌

语》(1991)等，都很有影响。

（杨荣祥）

张志公（Zhang Zhigong，1918～1997）

河北南皮县人。1945年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曾先后在金陵大学和海南大学外语系任教。1950年后历任北京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等。

张志公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语法、修辞、语文教学、传统语文教育以及外语教学等，其中尤以汉语教学语法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956年，张志公主持制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并据此主编了初中《汉语》教科书的语法部分。这个系统不仅为中学语法教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体系，对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的语法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初，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这个《提要》修正了原系统的一些缺点，也吸收了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语法研究的水平。

1953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常识》是张志公的一部重要语法著作。这部著作吸收众家之长，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为一个语法体系。在写作风格上，他善于用简明易懂的方式说明一个复杂甚至深奥的道理，做到了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1962年出版的《语法学习讲话》写得更加通俗易懂，为语法、修辞、逻辑相互结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采用了层次分析法。

《修辞概要》是1953年用笔名张瓌一发表的，这本书在普及修辞知识、推动修辞研究和教学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996年出版的《汉语辞库学论集》是张志公的另一本重要著作，里面选编了8篇论文和给研究生讲授的15讲提要以及文章摘录等。他认为，汉语辞库学是一门桥梁性学科，他尝试将汉语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培养听说读写的应用能力密切结合起来。

此外，张志公还撰写了大量富于启示性的论文，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徐　枢）

朱德熙（Zhu Dexi，1920～1992）

江苏苏州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昆明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任教。1979年任教授。

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后因对古文字发生兴趣，于1940年转入中文系学习，师从文字学家唐兰，从事古文字研究。1951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与吕叔湘合作撰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又开始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朱德熙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写作、修辞、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多方面。但是成就最高的是汉语语法研究和古文字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朱德熙善于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更适合汉语的研究，因而常开风气之先，提出有关汉语语法研究的富有创建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我国近二三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引路人，被认为是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著名语法学家。朱德熙先后发表的有关语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与卢甲文、马真合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以及《变换分析中的平

行性原则》等论文均以崭新而又独特的理论观点、研究角度、分析方法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称赞。他的专著《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在这些论著中，朱德熙提出并建立了“词组本位语法理论”，首次有效地使用了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关于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特别是在战国文字研究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贡献。他先后撰写的有关古文字考释和研究的论文有30余篇，涉及的资料包括楚简、楚帛书、玺印、陶文、盟书和铜器铭文等，解决了不少悬疑已久的难题。他亲自参加了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望山楚墓竹简、平上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参与了《马王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简》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并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朱德熙在古文字考释上不仅要求在字形上站得住，而且要求在语法、语义上也站得住，因此他的考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朱德熙不仅把战国文字的考释研究水平，而且把整个古文字的考释研究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俭明）

《殷虚书契前编》 《殷虚书契后编》（《Yinxu shuqi qianbian》 《Yinxu shuai houbian》）

《殷虚书契前编》即《殷虚书契》，是罗振玉编纂的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罗氏早年将甲骨拓本分为20卷，1911年《国学丛刊》只刊出其中的3卷，共有甲骨292片，未出全，流传甚少。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罗氏流亡日本，于1913年重编影印的8卷本，共收甲骨2229片，前附罗氏自序，谈及搜求及整理甲骨的经过。1932年重印，甲骨编号略有改变，共收甲骨2221片。此书的优点是：资料丰富，选材较精，以珂罗版精印，拓本较清晰，是殷虚正式发掘前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甲骨文得以迅速传播，为世人所重，与此书的编印不无关系。此书缺点是有时为了迁就版面整齐，拓本经过剪裁，以致拓面或文辞不全。《殷虚书契后编》也是罗振玉编纂的，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会1916年影印出版。全书分上、下卷。书前有罗氏自序。共著录自藏及别家所藏殷虚出土甲骨1104片。日本学者池田末利撰有《殷虚书契后编释文》，在日本《甲骨学》杂志第4、5号（合刊，1956年10月）起至第10号（1964年7月）连续刊载，可供参考。

（黄天树）

《殷虚书契考释》（《Yinxu Shuqi Kaoshi》）

罗振玉撰写的一部考释和通读甲骨文的重要著作。1910年，罗氏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全书分四节：考史、正名、卜法、余论。1911年罗氏将搜求的甲骨拓印成《殷虚书契前编》出版，出版数年之后，学者们仍不能通读甲骨文。有鉴于此，1914年罗氏立志考释甲骨文，杜门谢客，历时40余日写成《殷虚书契考释》，于1915年正式出版，共考释并加以解说485字。1927年又出版增订本，考释之字增至560个。《殷虚书契考释》大部分是根据《殷商贞卜文字考》中考史、正名、卜法三节增补和改写，共八章：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

卜辞、礼制、卜法，把零碎杂乱的卜辞，爬梳成为有条理的史料。自《殷虚书契考释》出版后，甲骨文字基本可识，并可以通读整段文句。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为甲骨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一部甲骨学奠基之作。

（黄天树）

《辞源》（*The origin of words and phrases*）

由陆尔奎、傅运森、方毅等主编，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出版。1931 年出版续编，1939 年出版正续编增修合订本，1950 年出版改编本。《辞源》始编于 1908 年，是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而编纂的一部综合性词典、全书收单字 1 万多个，词目近 10 万条，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探求词义的源委，故名《辞源》。《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又吸收了现代辞书的特点，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编纂的规模较大的辞书；对于一般读者阅读书刊，曾有不小的帮助。编排体例也大体为后出的辞书所沿用。

1958 年开始修订《辞源》。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1964 年出版修订稿第一册。1976 年由国家统一规划，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协作担任修订工作，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编辑、审定。《辞源·修订本》1979～1983 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共 4 巨册；1988 年出版缩印合订本。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大型的古代汉语语文词典。全书 1131.3 万字，收录单字 12890 个，复词 84134 条。这次修订，根据本书的性质和任务，收录内容包括古书中的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删去旧版《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专门词语；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校正原书中注音、释义方面的错误；对书证文字都作了复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正文词目仍照旧版《辞源》按部首编排。单字条释文包括字头、汉语拼音、注音字母、《广韵》的反切与声纽（《广韵》不收的字，采用《集韵》或其他韵书、字书的反切）、释义和书证。复词条释文包括释义和书证。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为了给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资料，在有关词目之末略举参阅书目。《辞源·修订本》是阅读古籍和研究文史必备的工具书。

（邓宗荣）

《中华大字典》（《Zhonghua Dazidian》）

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1909 年开始编纂，1914 年编成，1915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字典是从传统的旧字书向现代新型字典过渡时期的代表作。

《中华大字典》有以下几个特点：(1) 收字多。全书收 48000 多字，其中包括方言字和科学新字，比《康熙字典》多 1000 多字。部首编排，沿用《康熙字典》的 214 部，但部首次序有改动。(2) 注音采用《集韵》的反切，并加直音。又加注《佩文韵府》的韵目，以资参证。书前附《切韵指掌图》以明反切声韵的类别。(3) 对形体相同而音义不同的字，都另列字头。例如：

假　举下切音贾马韵

（一）非真也。见《说文》。[段注] 又部曰。叚、借也。然则——与叚义略同。（下略）

假　何加切音霞麻韵

（一）已也。《礼记·曲礼》天王登——。（下略）

假　居迓切音价祃韵

（一）以物贷人也。亦作下。见《集韵》。（下略）

(4) 释义简明，并有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字下每一义都分行排列，眉目清楚，方便阅读。每一义只列出一条书证。

本书出版很早，其中许多内容现在已显得陈旧，但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苏培成）

《国文法草创》（《Guowenfa Caochuang》）

陈承泽著，原载1921年《学艺杂志》，经增删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重在探讨汉语语法理论建设问题。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研究法大纲"，第三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第四至十二章分别讨论各个词类，第十三章"活用之实例"。在语法研究的出发点问题上，作者针对"近日通西文者，乃承袭外国文法、施诸汉文之研究"的风气，提出研究语法的三项原则："其一，说明的非创造的；其二，独立的非模仿的；其三，实用的非装饰的。"这三条原则表明作者强烈反对语法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模仿主义，强调从现实的语法现象归纳语法规律，注重本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同时倡导语法的实用性，即"以近世普通文为中心，而发现最便说明之原理原则"而不要用语源的说明代替语法的说明，不把修辞特例当作语法通例，不以少数例外否定一般规律，不作无用的分类研究。在"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中作者讨论了词类划分中"字类系统"、"字类界划"、"本用活用"、"引伸顺序"四个问题。在"活用之实例"中作者为匡正滥用"活用"的做法而严格辨析了活用的类型，具有科学性。本书篇幅虽短，在理论思辨上却有许多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见地。

（张伯江）

《国文法之研究》（《Guowenfa Zhi Yanjiu》）

金兆梓著，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当时汉语语法多受《马氏文通》影响的情况下，兴起了一股"文法革新"的潮流，此书就是这方面代表作之一。作者明确反对"拿国文去迁就西文"，主张从名学（即逻辑）出发，去寻求不同民族形成各自语法的方式和途径。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导言"，论述作者基本的文法观；第二章"文法之研究法"，阐述了"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和"普通的研究"三个角度；第三章"名学的现象与文法的现象"，从词类的分别出发，讨论了词的组合和句子等问题。本书值得注意之处首先是提出了以逻辑为基础研究语法，他认为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整理思想的规则是逻辑，整理语言的规则是文法；逻辑的现象是理论的、科学的，文法的现象则是历史的、习惯的；对于语法来说，既要符合事理，又要符合社会习惯。其次，作者在第三章关于词类的讨论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作者在他的"实字"系统里把表示"动态、动相"的动词和表示"静态、静相"的形容词归并为"相词"一类，这可以说是汉语语法论著中最早注意到汉语形容词陈述性特征的；再如作者反对沿袭西方语法连词和介词的区分方法，主张以"主从连合与衡分连合的分别"来区分介词和连词。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了其后语法研究主流方向的观点。本书篇幅简约，内容略嫌单薄。

（张伯江）

《国语学草创》（《Guoyuxue Caochuang》）

中国最早的一本汉语概论性质的著作，同时也是最早的具有普通语言学色彩的著作之一。192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胡以鲁著。胡氏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博言科，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开设“国语学”，此书为教材。

本书涉及了近现代语言研究中关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性质、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语言类型学以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等许多方面。作者对欧洲语言学家洪堡特、葆朴、施莱格尔、施莱歇尔、缪勒、叶斯泊森等人的观点都比较熟悉，他十分推崇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对其后继者石坦达尔等人的心理主义语言观也持赞同态度，并基本上是从这一观念出发来阐述汉语的特性。

在语言起源上，作者同时采纳了感叹说和摹声说，并结合汉语提出了发语词阶段；词类上以概念别词品，提出实、用、状三品，源于印度“胜论说”的“实、德、业”，并主张德、业为先，与印度语言学中“名生于述”的思想相似。他还依据洪堡特的观点提出，“语言发生之始，因无先天之词品，为实、为用、为状，皆由后天之分化，分化而后，且犹有因位置而易其品者。”他认为汉语的特色是“简单、保守”，“以语言精神之观察点而不拘于表面形态”，并且认为不应从语言形态的多少评价语言类型的高低。

全书理论性较强，最为可贵的是主张研究汉语自身特征，反对套用西方名理语法，认为“借鉴他语族之法则作他山之石可也，欲据以为范律则蔽矣”。但他过于强调心理意会，否定形式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主张语词“位置关系亦形式之一也”，另一方面又认为把语词连接配置作为形式有穿凿附会之嫌，反映出作者理论上的局限性。

（李　娟）

《修辞格》（*Figures of Speech*）

唐钺著，1923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版，为我国第一本全面探讨修辞格的专著。全书4万多字，除“绪论”、“结论”外，列五章分类别论述修辞格。其主要贡献是：（一）吸收西方修辞学说，对辞格的定义、作用、运用原则等作出了理论说明。指出修辞格乃“凡语文中因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并从表达、认知、鉴赏的角度，指出辞格的作用为“帮助人们发展自表的能力”，“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和给人“一种美感的娱乐”。还提出运用辞格须注意与本题“贴切”的原则，不可运用过多或过于纤巧、怪僻、陈旧等。还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辞格并不神秘，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都在使用。（二）最早建立了汉语的修辞格系统。采用英国讷斯菲《高级英文作文法》（J.C.Nesfield, 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osition, 1910）的辞格分类法并加以斟酌损益，将辞格分为根于比较、联想、想象、曲折、重复等五大类，共27种。根于比较的辞格又细分为根于类似的（显比、隐比、寓言）与根于差异的（相形、反言、阶升、趋下）两小类；根于联想的辞格有伴名、类名、迁德三种；根于想象的辞格有拟人、呼告、想见、扬厉四种；根于曲折的辞格有微辞、舛辞、冷语、负辞等九种；根于重复的辞格有反复、俪辞、排句、复字等四种。为汉语修辞学创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辞格系统。其特点在于：一是将心理作为分类依据及分析视点，如从“根于联想”与“根于想象”的角度分类，具有创意；二是阐明每类辞格的定义、特点和运用规则；三是注意辞格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四是采用新的写作体例，先定义再举例并加分析，且用白话

文进行阐释。本书刊行后产生很大影响。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评价本书"对于当时修辞学最有贡献","是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对于当时的影响很大。从这本小书出版后,修辞学便又换了一个新局面,修辞学的成立已经没有人怀疑"。可以说,《修辞格》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先驱,同时又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修辞格奠定了基础。

(宗廷虎)

《四声实验录》(《Sisheng Shiyan Lu》)

刘复著,1924年群益书社出版,1950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这是一部以现代语音学的观点和实验的方法研究汉语声调的著作,以浅显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语音学的一些基本知识,阐述了声调的物理性质并指出与乐律中音高的不同,介绍了用浪纹计收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测量、计算,最后得到声调的绝对音高和作出音高曲线图的过程。作者用实验方法对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和腾越(今腾冲)12地的声调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最终得到的调型曲线和用五线谱表示的绝对音高,并给每一种调型都设计了标调符号。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对西方的现代语音学了解甚少,这本书所介绍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对于绝大部分读者来说是全新的。"四声"原指中古的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但实际上作者所研究的每一地的声调都不止四种。作者明确地指出,汉语声调的本质在于音高,音高的不同造成了声调的不同,语音的强弱和音质的变化与声调无关,揭开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声调之上的层层面纱,指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汉语声调的科学方法。作者所使用的仪器和计算方法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还发表了他的一些研究心得,认为声调的绝对音高和音高范围会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异,因此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应是所有人的共性而非个性;作者还发现声调有所谓"引音"和"余音",认为这不是声调的本质部分;此外还指出实验室中的发音和自然语言有相当的距离,最终的研究目标是千变万化的自然语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看法对于深入研究汉语的声调都是很有启发性的。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书中的一些实验结果在今天看来有一定偏差,对某些方言调类的划分也不完全正确。

(王韫佳)

《新著国语文法》(《Xinzhu Guoyu Wenfa》)

黎锦熙著。出版于1924年,截至1959年,已印行了24版。

《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讲述白话文语法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在普及语法知识和推动当时国语运动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这部著作在我国语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已被收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语法丛书》第四种。

《新著国语文法》全书共二十章。前三章是绪论、词类的区分和定义、单句的成分和图解法。这三章是主体部分,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语法思想和全书的框架,以后各章是前三章的详细描述和进一步的讲解、说明。

这部著作在内容上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首次提出了"句本位"思想。自《马氏文通》以来,语法著作大都是以词类为纲讲述语法,而黎锦熙认为"词类本身并无繁重的规律","通用的句法,于正式的组织外有很多变式,并且多是国语所特有的"因此把句法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一做法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把句子分为六大成分,即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附加语和副词性附加语。这种

析句法对后来的语法体系，特别是教学语法体系也有很大影响。第三，引进了图解法，并提出一套操作程序，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对语法教学和深化语法研究有一定好处。第四，重视语义。尽管当年黎氏不可能对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但书中很多地方已经涉及语义结构问题，这在当时也颇为难能可贵。

《新著国语文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纳氏英文法》的影响，因而模仿痕迹较为明显。在词类划分上，作者主张“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很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论。他的析句方法层次观念不够清楚，图解法也有欠简洁。不过，从历史主义观点看，我们应当高度肯定这部著作的巨大功绩和重要影响。

（徐　枢）

《金文编》《金文续编》（《Jinwen Bian》《Jinwen Xubian》）

《金文编》是容庚编著的一部专门收录商周金文字形的大型字汇。1925 年写定，由贻安堂印行。容庚 1917 年中学毕业后，与弟妹策划共同采集篆籀之见存者编为《商周秦汉文字》一书，《金文编》为其一部分。《金文编》1939 年补订之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再版。1959 年再次修订，由科学出版社出第三版。容庚晚年继续增补，1983 年去世后，由张振林继续完成，1985 年中华书局出第四版。新版本共收 2420 字，附录 1352 字。书中金文依照《说文》部首排列。书前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及容庚所作序言，书后附有引用书目表、引用器目表、检字表及张振林所写后记。此书体例严谨，摹写精确，释字谨慎，集金文研究之大成，深得学术界推崇。校订此书错误的专著有陈汉平《金文编订补》（1993）、董莲池《金文编校补》（1995）。容除《金文编》外，另撰有姊妹篇《金文续编》（二册）一书，专收秦汉金文的字汇，于 1935 年印行，体例与《金文编》大体相同，共收 951 字，附录 33 字，书后附采用秦汉器铭文，也有检字。

（黄天树）

《现代吴语的研究》（《Xiandai Wuyu De Yanjiu》）

赵元任著。1928 年出版；1935 年影印再版；1956 年科学出版社据 1928 年版影印出新一版，又用 1935 年的再版本作了校改。1927 年 10 月至 12 月，赵元任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两省调查了吴方言的 33 个方言点，后来将部分调查材料归纳整理成这部在汉语方言学上有开创之功的著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吴方言的语音，包括第一到第四章，分别为“吴语声母”、“吴语韵母”、“吴语声调”、“声韵调总讨论”。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附录。第五章列举 75 个词在所调查的 30 个方言点中的说法及 25 个方言点中的一些特别词。第六章列举 56 个语助词在 22 个方言点中的说法。附录分别用国际音标、方音罗马字、吴语音韵罗马字来标写苏州方言的“北风跟太阳的故事”。本书审音细致，分析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作者的调查方法和调查表格长期以来一直被汉语方言学界所采用，把今音保存古帮滂并母三分作为吴方言界定标准的提法也已成定论。但本书所调查的 33 个方言点偏重于吴语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吴语未能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反映。

（李　蓝）

《词诠》（《Ciquan》）

杨树达著，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出版，是诠释文言虚词的工具书。

杨树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高等国文法”时，不少学生要求他将讲义中所讲到的文言虚词编成索引，以便检索。《词诠》便是杨氏应此需求，将讲义中的有关虚词的论述部分抽出重新加工编排而成的。书中共收文言虚词540多个（字头484条，有的字头下包括二字或三字、四字），这些虚词包括古书中常用的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以及一部分代名词、内动词、副词。全书分十卷，以注音字母为序编排。书中的基本内容，作者在《序例》中交代得很清楚：“是书取古书中恒用之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及一部分之代名词、内动词、副词之用法，加以说明，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就整个体例来看，它是仿效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但“首别其词类”，却是首创。这一点，正说明《词诠》是试图从语法的角度来训释文言虚词的，这应是《词诠》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词诠》超过前人的地方。《词诠》的第二个特点是材料非常丰富，有些释义下，列举书证达数10个。第三个特点是释义精当，“对虚词的解释，一般地说是能取王氏父子之长而舍其短”（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四个特点是对常用虚词条分缕析，尽量收罗每个虚词各种意义和用法。该书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一、将一些实词看作虚词，如把很多用作状语的形容词看作副词；二、对单个虚词缺乏概括的综合的研究，分项太细，并且有些分项很不合理；三、释义太简略，甚至常常用“无义”代替释义。

《词诠》以其从文法的角度来分析文言虚词，把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训诂学提高到较为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而受到学术界颇高的评价；又以其收录了大量的常用文言虚词，列举了丰富的书证，便于检索，方便实用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自出版以来，多次再版，成为人们阅读古书的一部十分常用的工具书。

（杨荣祥）

《高等国文法》（《Gaodeng Guowenfa》）

杨树达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该书是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国语文法时所编的讲义，经过九年时间，10余次讲授，作者不断修改，最后写定成书。全书30余万字，分十章，主要研究古汉语词类，除第一章“总论”外，其余九章，分别论述作者所分定的古汉语的九个词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这是一部博采众说的著作，作者声称：“是书上采刘淇、王引之、俞樾所著之说，同时人著作，于总论中颇采胡君以鲁之说；词类各篇中颇采陈君慎侯、章君行严之说。”（《高等国文法·序例》）。

《高等国文法》是杨树达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在30年代有较大的影响。其特点是材料丰富，例句的选择、训释都很精当，并试图以划分材料为中心来分析汉语语法。在材料划分上，该书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将动词细分为“普通内动词”、“不完全内动词”、“关系内动词”、“普通外动词”、“不完全外动词”、“双宾语外动词”、“同动词”、“助动词”八类，并对“致动”、“意动”作了很好的分析。但该书只谈词类，不谈语法特征、不谈语言内部的结构关系，在语法体系的建立方面贡献不大。该书可以看作一部高水平的文言语法读本，其成就主要在训诂方面。

（杨荣祥）

《宋元以来俗字谱》（《Songyuan Yilai Suzipu》）

刘复、李家瑞编撰，1930年初版，1957

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再版。收录从《古列女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娇红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目莲记弹词》、《金瓶梅奇书前后部》、《岭南逸书》等12种善本古书中摘录的宋、元以来的俗字。全书按楷体部首编排，一字之下再依照俗字演变的系统分行排列。这是一部研究宋、元八九百年以来的俗字的演进变化及汉字简笔字的应用的工具书，为汉字简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胡平生）

《厦门音系》（*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罗常培著。1931年出版，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新一版。全书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叙论”介绍厦门方言的分布范围、语音特点、前人所作的研究及作者的调查经过。第二部分“厦门的语音”描写厦门方言的声韵调。第三部分“厦门的音韵”先比较六种“方音罗马字”标注的厦门方言音系，然后按舒声和人声分列厦门方言的单字音表，并在此基础上举例说明厦门方言文读音和白读音的语音差别，并归纳其类型，是对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首次详细描写。第四部分“厦门音与十五音的比较”对比厦门方言声母、韵母与漳州《十五音》一书中反映的明代漳州话声母、韵母的异同。第五部分“厦门音与广韵的比较”用14个表详细比较了厦门音与中古音。第六部分“标音举例”用国际音标和方音罗马字标注了故事“北风跟太阳”和“龙眼干歌”、“草蜢公歌”、“阿达子歌”、“老鼠干歌”等四首民间歌谣。第七部分“厦门音与《十五音》及《广韵》比较表”，共收4636个汉字。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用国际音标作语音描写工具的单地方言调查报告，对研究地点方言和编写地点方言的调查报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本书的不足是偏重语音，忽略了词汇和语法，此外表格也过于繁复。

（李　蓝）

《修辞学发凡》（*Essentials of Rhetoric*）

作者陈望道，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历年来，再版重印数10次。其中，1954年、1962年、1975年三个版本修订较多，最近一版于1997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刊行。台湾也以《修辞学释例》为书名加以翻印。《修辞学发凡》的主要学术功绩是在我国第一个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具体表现在：（一）阐明了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即为了传情达意调整适用语辞过程中所产生的语文现象。修辞学的任务是首先观察、分析、说明各体语言文字中的修辞现象，同时参考中外古今修辞学论著，从而探求修辞的规律；而修辞学应当对（1）修辞方式的构成，（2）修辞方式的变化，（3）修辞方式的分布，（4）修辞方式的功能或同题旨情境的关联，（5）各种方式的交互关系等作出有条理的说明。关于修辞学的功用，则认为首先在于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即有助于阅读、欣赏和评论，其次是有助于语言运用，即表达说写。（二）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主要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阐述了语言成素中抽象性与具体性、固有因素与临时因素等同修辞的关系，指明修辞是对语言的运用，它所能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这就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确立了“语言本位”的观念，指明了修辞的语言学性质。（三）创立了“题旨情境”说。指明修辞所须适应的是

题旨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是修辞的资料、凭籍，题旨情境是修辞的标准、依据；明确主张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并对修辞所须适应的题旨情境的构成要素，诸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写说者的心境和交际双方关系等作出了切要的阐释。可以说这是现代语言学中语境理论的先驱〔陈望道提出语境理论比弗斯（T·R·Firth）早好多年，而且内容也更完备〕。（四）建立了“两大分野”的修辞系统。全书把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部分，消极修辞的表达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力求意义明白易懂，它广涉语言使用的全领域，是最基本的修辞法；积极修辞的表达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感情的，力求生动感人，它往往造成超脱常规的新形式。积极修辞主要是对辞格和辞趣的探究。书中的辞格分为四大类38格：（甲类）材料上的辞格——指就客观事象而行的修辞，计有譬喻、借代等9格；（乙类）意境上的辞格——指就主观心境而行的修辞，计有比拟、夸张等10格；（丙类）词语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词语成素的修辞，计有析字、藏词等11格；（丁类）章句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结构的修辞，计有反复、对偶等8格。这是中国修辞研究史上第一次对汉语修辞方式作出的全面的总结归纳。堪称“见解精确，系统清楚。”（张弓评价语）《修辞学发凡》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开拓了路向。

（杨林成）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Liangzhou Jinwenci Daxi Tulu Laoshi》）

郭沫若著。初版为《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1月在日本印行。是对两周铜器铭文作的考释。1934年，作者汇集铭文拓本、摹本或刻本，并尽可能附入器形照片或图绘，编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图编”一册，辑收器形，以器制为类聚，以方便人们观察花纹形式之系统。“录编”辑收器铭，上下两卷各二册，上卷所收为宗周器铭，下卷所收为东周列国器铭。1935年，作者因初版“考释有未当意处，新出资料亦时有所获”，重新详加增订，又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考宗周王臣器铭162件，东周列国器铭161件，与“录编”相应。二书共八册，分别在日本印行。作者用自己创立的标准器系联法为所收录的铜器作了断代，把众多器铭一一放在一定的时代下面，不仅考释文字，而且着重阐发与古代社会历史有关的重要内容，使从前杂乱无绪的两周铭文成为一套有科学价值的系统史料，为金文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树立了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者对《图录》与《考释》作了修补，抽换并增补了一部分材料，“录编”收宗周器铭至250件，列国器铭至261件。将《图录》与《考释》合为一编，统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仍为八册，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本世纪金文研究划时代的成果，许多观点对古文字学界以及历史、考古学界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董莲池）

十韵汇编（《Shiyun Huibian》）

韵书总集。刘复、魏建功、罗常培编。1932年，刘复把三种唐写本《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两种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敦煌掇琐本、项子京跋本亦即王一、王二）、唐写本《唐韵》（吴县蒋斧藏）、五代本《切韵》（即P2014、P2015）和古逸丛书本《广韵》排比剪贴，定名为《八韵比》，后来改称《八韵

汇编》。1933年，魏建功提议加入西域考古图谱和德国普鲁士学院藏的《切韵》断片各一种，改名为《十韵汇编》。1934年，刘复去世，由罗常培、魏建功整理遗稿，补制凡例，重新抄写各种残本，每页按时代早晚从上往下排列，《广韵》用原书剪贴，排在最下面。1935年成书，由魏建功作序，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读者排比对照此书，可以看出唐宋韵书的体制、分韵、韵次和系统的演变，是研究中古音重要的参考资料。

（张渭毅）

《比较文法》（《Bijiao Wenfa》）

黎锦熙著，1933年北平著作书店初版，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版（新1版），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黎泽渝、张天佑整理本。古汉语语法著作。初版于书名下标明“词位与句式”，作者说这样“可知这一本只是《比较文法》的一部分，只是《国语文法》第四章‘七位’的扩张。”(1933年序)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七章，分别论述主位、呼位、宾位、副位、补位、领位、同位七种“词位”。作者把汉语的实体词的用法归纳为“七位”，再以“词位”纲纪句式。具体做法是：“先拿《马氏文通》改组；把他所举有关句法结构的例句，一一分配到《国语文法》第四章所谓‘七位’里头去，再把平日读书偶得的材料装进去。”（1933年序）“同时比较现代汉语，比较部分英语语法。”（1957年校订重版后记）书中不仅描述了古汉语中各种词位的正常语序，还分析了大量的“变式的”词位。作者力求“突破古汉语语法的八个重点（即“疑否倒装”、“‘副位’免介”、“‘足位’免谓”、“‘宾足’意使”、“形附标‘所’”、“主谓标‘之’”、“联代用‘者’”、“转化用‘其’)”，同时攻破‘之’‘其’‘所’‘者’四个虚词难点。(1963年后序)

该书开创了比较文法研究的先例，特别是从“位”的角度找出古、今汉语语法的对应规律，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外语在词位和句式的异同上做了比较精确的论述，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古今汉语语法比较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杨荣祥）

《国音常用字汇》（*National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of Common Chinese Characters*）

1930年编印出版的全面反映当时汉语汉字规范化成果的一本重要工具书。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先后编成《增修国音字典》和《国语同音字典》。在此基础上，“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改编成《国音常用字汇》。1930年春编出初稿，同年秋天修订，1931年秋改定，1933年5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参照“各教育家统计所得的‘常用字汇’等等，并酌增必要的若干字，定一范围较广的常用字数标准”，收正字9920字，别体重文（异体字）1179字，变音重文（异读字）1120字，共计12219字；确切指定了以北京语音（当时的“北平音系”）为标准的“新国音”，改正了“旧国音”“庞杂”的缺点；兼用“国音字母”第一式（注音符号）和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注音，“于是字有定音，音有定调”；加收了一些通用的简化字形；编排改传统的“据形系联”为“依音排列”，正文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从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规范。1949年8月出版增订本《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合计旧有新增之字共收12830字，增补读音529音。《国音常用字汇》的刊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我

国规范现代汉语、整理现代汉字的一块里程碑。

（费锦昌）

《卜辞通纂》（《Buci Tongzuan》）

郭沫若编著的一部甲骨卜辞通读方面的著作。1933 年在日本东京文求堂石印出版。1928 年，郭沫若东渡日本，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始搜集研究甲骨文等，1932 年，在日本访求公私各家所藏殷虚甲骨约 3000 片，但还有不少收藏家的藏品因种种关系，未得寓目。于是郭沫若改变了原先收集日本各家所藏甲骨编成一部书的打算，决定选释传世甲骨，编成此书。1958 年，经作者校注及编辑加工后，作为《考古学专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有作者所加部分校语和眉批，以及校阅者于省吾的校阅意见。初版本中有些拓片及照片不甚清晰，为之更换拓片或附摹本，并重编了索引。1983 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增补了校勘和注释，定为《考古编》第二卷出版。全书分正编、别录两部分。正编选录甲骨拓片和照片 800 片，别录收日本各家及国内公私所藏甲骨 129 片，均为精选珍品。正编按内容分为八类：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依次排比并作考释，每类之后，加有小结，是根据卜辞所得的殷代社会某一方面的结论。此书在甲骨卜辞的通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是初学者最好的入门书和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黄天树）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这是一篇早期音位学研究的经典论文，作者赵元任，1934 年用英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1957 年收入马丁·裘斯主编的《语言学读本》（*Readings in linguistics*）。

早期语音学一般只研究语音的自然属性，并未着意于区分语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日趋兴盛，并在音位学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者越来越感到音位不同于具体的音，强调音位学与语音学是不同的研究领域，认为人们在运用语言符号时往往忽略许多具体的语音特征，而只依靠那些有区别符号功能的特征来确定音的同一。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语言的音位系统是惟一的，而且，只有音位标音才能做到客观惟一性，而不像音质标音那样由于关注语音细节可能出现千差万别的结果。赵元任在这篇著名的论著中的客观、充分而严谨的论证却向人们揭示出在事实上音位标音的复杂性，并没有客观惟一的标准。

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了英国的琼斯（*Jones*）、帕默（*H.E.Palmer*）与美国的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对于音位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为音位作出新的定义：“音位是一种语言里全部音类中的一类，语言中的任何词都能体现为一个或若干个这样类的序列，被认为具有不同发音的两个词，其构成词的音类或音类的次序是不同的。”这个定义为音位的划分确定了一个原则，但并没有定义音位划分的具体方法。

第二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讨论了实际存在的影响音系的音位归并的种种因素，分为三节：1. 单位的尺寸问题，指出“一音一符号”在实际的音位标音中不可能完全实现；2. 组类问题，指出在音位归并中影响研究者答案的多种互相冲突的因素；3. 符号的选择，指出音标符号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结果。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了音质标音的重要性，强调纯粹语音学研究是音位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提。

赵元任的这篇论文对早期音位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他不囿于某一理论或成见，而是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语言事实和研究事实，使人充分认识到早期语音学研究与后来兴盛的音位学研究客观存在的密切关联，被裘斯称为“有非凡的天才和没有任何偏见”。他的这篇论著不仅提出了音位研究的一些基本指导性原则，也让人看到了面对同一语言事实，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结论之中的相通之处，展现了理论的单纯性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

（李　娟）

《辞通》（《Citong》）

初名《蠡测篇》，又名《读书通》、《新读书通》，1934 年出版，改名为《辞通》。朱起凤撰。

这是一本古汉语别体双音同义词辞典，是朱起凤积 30 年十易其稿才完成的。全书按平水韵 106 韵编排，以双音词中下字入韵，每个词条下列出别体形成一组，词条下有的用直音法注音，专名注出人名、地名、鸟名、草名等，一般则直接引用书证及旧注。每组词后一般都有按语，说明同音通假、声近义通、形近通用、正俗通用、形体讹变等情况。本辞典可供读书查检及研究声音通转、字形演变之用。

书中词条的联绵字不足五分之一，绝大部分不是联绵字，因此并不能看成是有关双音连语的辞典。而且有些联绵字别体也有非联绵字混杂，另外，按语中对字音字形的分析也有欠妥之处。

（张双亭）

《古音系研究》（《Guyinxi　Yanjiu》）

魏建功著，北京大学出版部 1935 年出版、中华书局 1996 年出版重排本。

此书的宗旨在讨论如何研究“古音系”，前五章详述古音系的分期、内容，研究的材料、方法、条件，末以“古音系研究的 20 个实际问题”结束。

现代音韵学自本世纪初出现，至 30 年代已成声势，此书表现了新音韵学的朝气蓬勃的特点。它将旧音韵学割裂开的“今音”、“古音”和“等韵”一以贯之；不仅细论“音韵”，且兼“形体”、“训诂”而通之；征引中外时贤的论著达数 10 种；讨论的范围及涉及的资料，上自甲骨金文，下迄婴儿学语的讹音，东自日语、朝鲜语汉字音，西至敦煌遗书，堪称博大，皆旧音韵学所远不及。

此书时代气息浓厚，推崇新引进的高本汉学说，重视域外译音，重视北京音系十三辙和各地方音，提倡应以时空观点分析资料。征引成说，必有按断，勇于争论，敢于批评，作者自述“综论古今通塞，尚论时贤得失”，这一精神的确贯穿全书。

此书胜义迭现，如对古音系 12 种材料，研究古音系的 10 条原则的论述，对《诗》《易》各组成部分的时、地分析以及对《鸡林类事》（研究 12 世纪的汉语和朝鲜语史的宝贵资料）的评价，等等，至今仍有余辉，启迪后学良多。

书中的“音轨原则”失之琐细，对汉藏语系的分类不确则是当时的学术界的水平所限制的缘故。

（鲁国尧）

《辞海》（*A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由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上、下册，1947

年出版合订本。《辞海》是一部以字带词、兼收普通语词和百科条目的大型的综合性词典，全书条目在10万以上，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齐名，而又各有特色，在中国文化教育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50年代，旧版《辞海》已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1958年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确定修订后的《辞海》将成为一部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学习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工具书。经过数年的努力，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分册；进一步修订后，于1965年又出版了《辞海·未定稿》两巨册。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辞海》上、中、下三卷本，1980年又出版缩印合订本。全书收单字14872个，词目91706条。从1984年开始，又对《辞海》（1979年版）进行修订，力求反映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文化水平。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版了《辞海》（1989年版）上、中、下三卷，1990年出版缩印合订本。全书单字增加到16534个，词目增加到12万余条。内容涉及120多个学科的名词术语，还有古今语词、成语典故，以及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等。1995年又出版了《辞海》（1989年版）的增补本1册，主要选录1989年版《辞海》出版后的新内容。《辞海》经过不断的修订，集字典、语文词典、专科和百科词典于一身，而且检索系统完备，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邓宗荣）

《国语辞典》（*Kuoyu Dictionary*）

黎锦熙主编，1936年初版，1947年重版。1957年经删节，改名为《汉语辞典》，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1917年黎锦熙提出《国语研究调查进行计划书》内设“国语辞典之编辑”一项起到1937年出版，历经20年，可谓精心编纂，历时长久。由于本辞典为新文化运动时少有的一部兼顾口语、文言的辞典，其编辑主旨又以北京音正音为重点，释义力求“简而不漏，浅而不陋”，重在引导大众识字、查音上，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一部兼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性的辞典。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本辞典对所有汉字用注音符号拼音，以求注音准确，利于规范。本辞典特点有：1. 以标准国音（北京音）正音为重点，不注重释义。2. 对字形力求统一，以通行习见为主，并注意到简体字。3. 收辞以流行的口语词为主，酌采部分成语和文言词。4. 对个别常用虚词注出词性，开始注意到词的语法特点。本辞典的用处主要是正音、定词、简略释义，以便于学生和民众识字、查字和外国人进修汉文。当然，作为一部早期辞典，用现今的眼光来观察，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如由于对释义的过于“简浅”，在词条中出现同义词互训现象。对单字释义尚全，而对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的释义则过于简单，有个别释义不很准确。收了大量北京方言的词语，但不标明方言。此外，用注音符号注音，显然已不符合于现今的词语注音方式。作为一部初期注音的辞典，有此不足在所难免。从总体上看，本辞典标音准确，举例严谨，为今天的词典编纂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邢　欣）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Zhongguo Wenfa Gexin Luncong》）

陈望道等著，汉语语法学术讨论论文集。共收入9位作者的35篇文章。

1938年10月，陈望道在上海《译报》

副刊《语文周刊》上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文，因讨论方言语法而涉及《马氏文通》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的缺点，从而引起了一场持续时间达四年半（1938，10～1943，3）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主要有陈望道、方光焘、傅东华、张世禄、金兆梓，此外还有许杰、廖庶谦、汪馥泉、陆高谊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语文周刊》、《东方杂志》、《学术杂志》、《文理月刊》、《理论与现实》、《复旦学报》、《读书通讯》等刊物上。

1940年上海学术社将这场语法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作为《学术》杂志第二辑发行，收论文26篇，书名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1943年，陈望道补收1940年以后发表的若干篇文章，重新编定，共收论文34篇，由重庆文聿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社根据文聿出版社印本，增收《论语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一文，共收论文35篇，编入《中国语文丛书》，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商务印书馆将该书编入《汉语语法丛书》第六种，重新出版，是该丛书中惟一的语法讨论论文集。

收入书中的论文内容较广，涉及与汉语语法体系有关的各个方面，还涉及三四十年代文化界关心的欧化国化问题。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一、一线制和双轴制。傅东华提出汉语词类与句子成分完全等同；陈望道、方光焘等较多的人主张要分开。二、词的分类。方光焘提出根据组合能力划分词类的广义形态说；傅东华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也没有广义形态；陈望道主张按结构功能来分词类。三、语法学的对象。方光焘主张以形态为研究对象，反对以意义为出发点；张世禄主张研究语序；陈望道提出研究表现关系。书中涉及的问题还有：语法研究的方法，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汉语是否单音节语，语法学同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的关系，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对《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的评价等。该书认为汉语语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的问题上，对汉语的句法特点讨论较少。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的作者们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这场文法革新大讨论开创了我国集体讨论语法学术问题的新风气，论文重视从实例的分析中引申出基本理论和原则问题，为改变语法研究中的机械模仿风气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为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作了有益的探索。

（戴耀晶）

《临川音系》（*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Linchuan Dialect*）

罗常培著。1940年出版，194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新一版。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叙论”简要说明临川的地理位置和研究临川方言的意义。第二章“语音的分析”仔细分析了临川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第三章“本地的音韵”包括“临川韵镜”（单字音表）、同音字汇、文白异读、临川境内四乡的语音差别等四个部分。第四章“比较的音韵”先比较临川音系与《广韵》音系，找出语音演变规律，指出例外；然后比较临川音系与北平音系，归纳两个音系的异同，总结了临川人学习北平话的规律。第五章“特殊词汇”记录了455个在意义上与北平话有差别的词语，按意义分为22类，有些还作了语源学上的解释。第六章“标音举例”用临川音标注了古诗“行行重行行”、童话故事“苍蝇与飞蛾”、寓言故

事“狐假虎威”和一段对话。本书记音准确，行文简洁，语音部分的体例完备，还首次专用一章来记录临川方言词汇，在记录方言词汇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本书对研究地点方言和编写地点方言的调查报告有重要参考作用，但缺少对临川方言语法的描写则是其不足。

（李　蓝）

《中国文法论》（《Zhongguo Wenfalun》）

何容著。该书的底本是作者1935～1936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的讲义，1937年加工改写成书，到1942年才由独立出版社出版，1949年改版由开明书店印行，1957年新知识出版社重印，1985年作为《汉语语法丛书》第七种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出版。

《中国文法论》是一部语法理论著作，其特点是以评为主，对《马氏文通》到30年代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学说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自己的某些见解，很有启发性，是我国第一部、也是1949年以前惟一的语法学评论著作。

全书共八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文法浅说”是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语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并阐述了作者对语法和语法学的看法。第二章“论中国文法学的研究”是第二个部分，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三章至第八章是第三部分，论述了词类区分、语句分析、词位、复句等专题，就这些专题作了一番检讨，对各家学说进行了评介。

该书中的某些观点颇具见识。在谈词类区分时指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应该根据每一类词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共同之点来说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没有进一步说明汉语如何根据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来区分词类。在“格”（位次）的问题上，认为“中国语言里名词根本无所谓格的分别（古代汉语里的代名词也许有），文法学里的三格（或三位）就是莫须有的类了”。“换语成位，是多此一‘举’”。不应该如此地“把欧洲语言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这是作者对30年代以前的语法学家硬套西洋语法的做法提出的中肯的批评。

作者在语法理论上深受著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在语法体系上完全接受了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的主张，建议作建立中国文法学新系统的尝试。这一系统“应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以方法——形（form）为主体，讲方法所表的意思；一部分以意（Meaning）为主体，讲表意所用的方法。”在析句中引进了叶斯柏森的词级说，认为用词级说进行分析，从复合词的构成，一直到构造极繁复的语句，都可以一贯地讲下去，又合理又方便。而且“词本身的性格，也就不致于老是和词与词的关系纠缠不清，而成为词类解说上的矛盾了。”这就过分地夸大了词级说的作用，其实词级说并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

总的来看，该书的主要贡献是作者对30年代以前的几部重要语法著作所做的分析与批评，书中“多有独到的见解，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参考书。”（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

（谭景春）

《中国文法要略》（《Zhongguo Wenfa Yaolüe》）

吕叔湘著。《中国文法要略》是受当时四川省教育部门的嘱托、作为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书撰写的。1942、1944年初版，分上、中、下三卷。1956年出修订本，合为

一册，只分上下两卷；主要是删除了一些枝节和例句。1982年新一版，收作《汉语语法丛书》之八，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卷词句论，以结构、语序、虚词等语法形式为纲，说明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下卷表达论，以范畴、关系等语法意义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语法形式。

词句论采用了叶斯柏森（O. Jespersen）“三品说”，但是，作者从汉语实际出发，严守理论来自事实的原则，运用多方位比较方法，探求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如说叙事句里“事情的中心是一个动作”（“猫捉老鼠”），把动作的起点称为起词（“猫”），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老鼠”）；一个动作还可以有各种补词，代表与此事有关的人和物，如受事补词、交与补词等等。这是从语义上归纳“动作中心”律。同时又点明“把主语和起词分成两件事”，主语是就句子结构说的，起词、止词是就与动作的关系说的。“主语不一定就是起词”，可以是动词后的止词或者前置于动词的止词。这是立意从句法上把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作为不同平面的东西加以区别。此外又立专章探讨句子与词组之间的种种转换关系，剖析能否转换的条件。如表面上结构相同的“有无句”，经过分析转换，分化为4小类句式。《要略》可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

表达论参考了勃吕诺（Ferdinand Brunot）关于语法格局的设想，但是，仍以汉语事实为依据，列举“范畴”“关系”的种种类别，逐一描写用以表达的语法手段。如“指称范畴”，先分有定和无定；无定指称又分疑问和非疑问；疑问又下分问人、问物、问情状等等，每类各举若干用来表达的词语、句式等手段，条分缕析，深入细致。

以意义为纲，搜集、排比各种表达方式的这种路子，既可以归总、发现新的语法形式，又可以对汉语句法进行总体的语义考察。

《要略》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的做法，实际是一种意义和形式两参照的研究途径，它为实现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为更好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领先迈出了极为宝贵的一步。

《要略》是作者重事实、重调查实验从事语法研究所得的早期重要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我国语法研究水平。

（饶长溶）

《联绵字典》（《Lianmian Zidian》）

符定一编著，1943年出版，此后曾多次重印。

这本字典是符定一辛苦经营，历时30年编成的，所收词条“起自经籍，以六朝为断”。词条按214部首编排，同部首字以笔画多少为序。每个词条先注出反切，然后分义项释义，每义项下举出大量书证及旧注。不少词条末尾，有作者按语，或说明字形的演化，或辨析字音的通转。亦间有驳正旧说的，这本字典资料丰富，又有索引，便于查考。

这本字典虽然名为联绵字典，但相当多的词条并非联绵字，而是一般的双音词或词组，未免名实不符，采用古音19纽和古韵22部确定联绵字双声叠韵的关系及字音的通转，也多有不当之处。

（张双亭）

《中国现代语法》（《Zhongguo Xiandai Yufa》）

王力著。原为作者1938年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研究”课程的讲义，后来将专讲语法规律的部分抽出写成

《中国现代语法》，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于 1943 年 1 月和 1944 年 8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 年中华书局曾据商务原纸型重印，1985 年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汉语语法丛书》第九种合为一册重排出版。

《中国现代语法》是一部描写性语法著作，在汉语语法学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从汉语的特点出发，对汉语的语法构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描写，创见颇多，对当时和以后的语法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全书以句法为纲，正文分为六章四十六节。第一、二章“造句法”；第三章“语法成分”；第四章“替代法和称数法”；第五章“特殊形式”；第六章“欧化的语言”。编排独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该书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一开卷便旗帜鲜明地表示：“本书的目的在于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作者从根本上舍弃了那种以某种印欧语的语法教科书为蓝本来套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是从方法论上着手，广泛汲取国外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尤其受叶斯泊森的“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背心结构”学说的影响最深。作者在运用这些理论研究汉语时，有所取舍和改造，注重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以建立比较完整、系统、简明的汉语语法新体系。《中国现代语法》在语法体系的拟构上，鉴于作者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大胆地冲破旧语法体系以“词法”为纲的束缚，另辟新径，以“句法”为纲，但这和黎锦熙的“句本位”又有所不同，而是以句法结构分析为主，“在句法结构的分析上有不少创见，对于后来的语法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

总的来说，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汉语的语法特点，总结了汉语的结构规则，建立了一个新的语法体系。书中作者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注重和以有代表性的现代北京话作为语料的研究思想，对后人如何研究汉语语法也有十分深刻的启迪作用。该书与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均出版于 40 年代，同工异曲，反映了 20 世纪前半叶汉语语法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1946 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根据《中国现代语法》缩写的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而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把它译成俄语，并写了评注和序，1954 年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新知识出版社于 1957 年重印此书，并把龙果夫的序和评注一一译出，改名为《汉语语法纲要》，此书在国内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国宪）

《中国语法理论》（《Zhongguo Yufa Lilun》）

王力著。该书的底本是作者 1938 年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研究”课程的讲义，后来接受闻一多的建议，“把它分为两部，一部专讲规律，一部专谈理论，相辅而行”（自序）。《中国语法理论》分上、下两册，分别于 1944 年 9 月和 1945 年 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 年中华书局重印。

《中国语法理论》是一部语法理论著作，同《中国现代语法》相辅而行。后者的任务是描写汉语语法现象，说明汉语的语法规律；而前者则是从理论上讨论语法研究的一些原则问题。全书正文分为六章四十七节。第一、二章“造句法”；第三章“语法成分”；第四章“替代法和称数法”；第五章“特殊形式”；第六章“欧化的语言”。除四

十七节之外，章目和顺序安排与《中国现代语法》完全相同。

作者在语法理论上深受叶斯泊森的“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背心结构”学说的影响，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语里的词，非但没有任何屈折形式，连词类的记号（如英语里的-al，-ic，-ze，-ness，-ly，-tion，-ive，-able）也是不一定有的。”由此，词类和句子成分不完全对应。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书在二者之间加入词品，作为桥梁，让词类和具体的词固定下来，用品来说明词的用途变化，孤立的词讲词类不讲词品，入句的词讲词品不讲词类，以方便地讲述具体的词、词类、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后人对王氏语法体系的“三品说”多有批评，作者自己也做了非常严厉的自责。80年代，朱德熙对这一问题有过十分公允地评判“叶氏的词品说并不见得比当时流行于汉语语法界的词类通转说和词无定类说更坏。……吕、王二氏的书只不过是用词品说代替了旧有的并不见得比词品说高明的词类理论。这两部书的价值和词品说的得失并没有多大关系。”（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

该书重视研究方法的探索，并颇有见地。例如，在确定复音词和仂语界限时，作者第一个提出在汉语中运用“插入法”和“转换法”。“若要辨认两个以上的相连接的字是否一个单词，有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试用另一个字把它们隔开，看它是否失掉或不符原来的意义。”“复音词是不能被隔开的，仂语则可以被隔开”。“仂语是可以转为连系式的，复音词则不能”。第一种方法后来被陆志韦等在《汉语构词法》中所吸收而融合成扩展法，后一种方法由于国外转换生成语法的勃起，则更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由于作者同时采用了叶斯泊森的“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背心结构”学说，以致两说互相矛盾，缺乏逻辑性。对此，作者亦有察觉，在1954年的《新版自序》中宣布放弃三品说，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总之，该书从理论上对《中国现代语法》的语法新体系做了很好的阐明，为建立中国的语法理论、推动中国的语法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国宪）

《上古音韵表稿》（《Shanggu Yinyunbiao Gao》）

董同龢著，1945年出版，1948年又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本，40年代上古音拟测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分为“叙论——上古音韵系统拟测的检讨”和“上古声韵配合表”两大部分。“叙论——上古音韵系统拟测的检讨”拟测了上古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声母系统，单声母有36个，凡跟明母有谐声关系的晓母字拟为清鼻音$\mathring{m}$；认为上古可能有pl-，kl，gd-，kz-，kt-，mp之类的复辅音声母。

韵母系统，除歌部外，都有辅音韵尾。阳声韵韵尾有-m，-n，-ng；入声韵韵尾有-p，-t，-g；阴声韵韵尾有（-b），-d，-g，脂微二部还有韵尾-r。主元音一共有20个。

“上古声韵配合表”以《说文》的9000多字为基础，加上先秦古籍所见而《说文》未收的字，基本上网罗了先秦所有的字。本书把上古韵部分为22部，阴声韵和入声韵并为一部。表以韵部为经，所拟的36个单声母为纬，把所收的先秦出现的汉字全部摆进音系的框架中去。

《上古音韵表稿》最大的价值在于按照音系的观点首次全面整理了东汉以前所出现的几乎所有汉字的音韵地位，为后来进一步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本书虽然对高本汉作了不少批评，但是受高氏上古音拟测系统的影响很大，例如把韵部看成韵摄，同一部可以有不同的主元音，结果同一韵部的字读音相差较远，而有的不同韵部的字读音反而很近。此外，把上古的阴声韵除歌部拟作开音尾，其余都拟成辅音尾，显然没有能摆脱高本汉的消极影响。

（孙玉文）

《广韵声系》（《Guangyun Shengxi》）

沈兼士主编。1945年初版，1962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再版，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本书把《广韵》所收之字按照谐声系统编纂，以41声类为纲，凡主谐字相同的谐声字归为一类，每类主谐字和被谐字依《广韵》韵次的先后排列，同一声符的字，主谐字排在最前面，每字之下，注出《广韵》声母、反切、韵、等、呼，标出高本汉所拟切韵音。根据此书，可以比较主谐字和被谐字读音的差异，确定谐声关系，探明谐声系列，进而推求谐声字的语根，达到建立字族系统，阐明文字的滋乳规律的目的。书中收人的《说文》的谐声字所显示的谐声关系也可以作为推测上古声母关系的依据。

（张渭毅）

《古音说略》（《Guyin Shuolüe》）

陆志韦著。1947年出版，1985年中华书局编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

本书由"卷首《切韵》的音值"和"《说文》音跟《诗》音"两大部分构成。《切韵》音系是沟通周秦音和现代方音的桥梁，"卷首"针对高本汉《切韵》音系拟测中的问题，对《切韵》音值作了重新构拟。"《说文》音跟《诗》音"是本书主体部分，下分十五章研究上古声韵调的音值。其特色是：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统计《说文》谐声字和《广韵》又读等材料，得出几遇关系，主张联系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拟测音值。认为上古可能有pl-，kl-；mp-，nd-；ns-之类的复辅音声母；阴声韵全部以辅音收尾。

《古音说略》首次运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了《说文》谐声字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发生关系的数据，得出不同音类之间读音远近的一些正确结论；对高本汉上古音构拟中的一些错误结论作出了科学批评，例如反对高氏对喻三的构拟，反对上古音拟成全浊送气和全浊不送气两套声母，反对拟一个-r尾，反对把主元音拟成长短松紧的分别，都很正确。

本书过分注重古今音类通转的大势，比较轻视上古音韵系统的拟测；过分看重统计法，对统计法的局限性有些忽视，例如音韵材料中反映音类相近或相远的数据太小时，统计法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孙玉文）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bei*）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合著，1948年出版。本书是1936年至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人调查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汉语方言的第一部正式报告。全书分三部分："总说明"详细交待了所使用的音标、术语、表格，以及调查点、调查人、调查方式和程序。"分地报告"描写了64个调查点的发音人履历、声韵调描写、与古音的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和会话（有的方言点无此项）。"综合报告"又分三项：1. 列表对照64个调查点的《总理遗嘱》、《狐假虎威》（文言文）、特字表和极常用词表的方言字音；2. 湖北特点及概说；3. 64幅方言地图。

本书首次全面调查研究了一个省内全部市县的汉语方言，并根据调查材料将湖北省的汉语方言划为四区，分归西南官话、楚语、赣语和湘语。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调查点选得不够平衡，42 个在农村，22 个在城镇，二者不在同一平面上，对分区结果难免会有影响。另外，根据《广韵》音系挑选的 678 个调查用字有一些比较生僻，难免导致发音人误读或乱读；有一些书面色彩较浓，对反映方音意义不大。

（李　蓝）

《汉语语法论》（《Hanyu　Yufalun》）

高名凯著，1948 年初版，1957 年修订版，后收入《汉语语法丛书》，1986 年商务印书馆出新一版。该书为中国 40 年代汉语语法代表性著作之一，与王力、吕叔湘的语法著作三足鼎立。全书除了绪论，分为“句法论”、“范畴论”和“句型论”（修订版增加“构词论”）。“句法论”主要讨论词和词的组合关系，分为“规定关系”、“引导关系”和“对注关系”、“并列关系”、“联络关系”；同时讨论与句子有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名句、形容句、动句，省略句、绝对句，复杂句、包孕句、复合句。“范畴论”主要讨论各种语法范畴以及相应的虚词，包括：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态词、欲词、愿词、“能”词和量词。“句型论”从命题出发，分别讨论“否定”、“询问”、“疑惑”、“命令”和“感叹”五大命题句型，这大致上相当于句子的语气类型。增补的“构词论”重点讨论汉语的词类划分和构词法。该书的特点是：1. 偏重理论探讨，多采用论辩手法，对汉语词类划分的理论问题尤为关注，提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观点。2. 努力建立一个汉语语法的新体系，尤其重视虚词与语序的作用，这在“范畴论”和“句法论”中有比较充分的论述。3. 运用历史比较法，一方面用古汉语和方言的材料，另一方面又用印欧语的材料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4. 特别注意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强调语法就是要研究到底有多少语法形式去表达多少语法范畴。本书的某些观点曾经引起过争议，例如关于汉语的实词到底能不能分类；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之处，例如认为汉族人民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子主义和表象主义的特点，还认为中国语是纯粹单音节的；此外，有的论证不够严密，有的分析比较粗疏和牵强。但是从总的来看，作者运用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在构拟汉语语法科学体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观点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之说，哲学气息浓厚，理论性和逻辑性都比较强，不失为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汉语语法专著，在汉语语法学史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邵敬敏）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Vocabulary of Monosyllabic Words in Pekingese*）

陆志韦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 年出版，科学出版社 1956 重印。作者从 1935 年起开始“收集单音词，并且想在单音词的用法上整理汉语的普通语法”（序），同时为研究汉语语法提供参考书。1938 年燕京大学曾印行本书《叙论》部分出版，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重视，1951 年全书出版时，《叙论》部分改称为《说明书》，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其中首先讨论汉语的词跟字的分别和词的定义，提出并运用了同形替代法，着重讨论同形替代式及其附带原则跟特种困难，形成了本书的特色。本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国内较早运用结构主义语法学方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令人耳目一新。这部著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口语调查，书中所列北京话单音词用例都是作者亲自调查得到的，又经过修订，材料比较可靠并且为每个词都标出了词性，是国内最早标明词性的用例词典。每个词条按义项和用法举出了例句。词的分类根据分布特征，运用同形替代法，把北京话单音词分为7个大类：1名词，2变化词，3形容词，23形容变化词，4指代词——4a代名词、4b数名词（数词）、4c助名词（量词），5副词——5a上加副词、5b下加副词，6作用词——6a引起词（介词）、6b联接词（连词）、6c语助词，7杂词——7a感叹词、7b问答词、7c象声词。作者从互相借用和联用方面讨论了三类基本词的相互关系，列出了名词加在名词上形成20几种语义关系的格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词的定义的困难，作为条目收入本书的不仅有词，也有语素，包括词根和词缀。这显然与结构主义的影响有关。作者关心文字改革任务和汉语单音词的关系，用当时传到北京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为北京话每个单音词注音，又用汉字标出四声。这样做的目的是“叫人留意在用拼音文字写北京话的时候，会遇见怎样的问题”；还可以把这本书“当做学北京话的补充材料”（凡例）。

（马庆株）

《语法修辞讲话》（*An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and Rhetoric*）

吕叔湘、朱德熙合著。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8月修订再版。出版前，先于《人民日报》发表，自1951年6月6日至12月5日连载46次，并由开明书店分六册出版。1953年又出版汇编全书练习答案的《语法修辞正误练习》，作为学习的辅导材料。本书以普及语法修辞知识，帮助纠正语言文字应用上的缺点为目的，意在匡谬正俗，着重分析解决语言运用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些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共分六讲：（1）语法的基本知识，（2）词汇，（3）虚字，（4）结构，（5）表达，（6）标点。第二讲到第六讲是主体，第一讲是绪论性的，讲述语法的基本知识，是后面五讲的导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语法修辞新著，它对普及语法修辞知识和提高大众语文素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语法修辞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着眼于从听读理解的角度对表达者的语文使用提出要求，分析病例也注意从接受对象的立场加以评议，为语法修辞的应用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向；（2）所讲内容和所用语料全为白话文，这在中国讲述修辞的著作中是第一次，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确立和发展建树了一个良好的开端；（3）把语法同修辞结合起来讲述而自成体系，讲述修辞则以“明确”和“简洁”为纲领，实际上是对消极修辞作出了相当系统而全面的研讨和讲解，丰富和充实了汉语消极修辞研究的内容。本书也略有不足，主要是有些说解较为拘泥，不免有约束太过之弊，同时对表达上极重要的段落和篇章问题讲解不够。

（李熙宗）

《新华字典》（《Xinhua Zidian》）

新华辞书社编，主编为语言学家魏建功，主要编写人员有萧家霖等人。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1954年出版部首本，对传统的部首做了改进，合并了一部分收字少的部首，分列一些变形部首，如“心、忄”“手、扌”，共立189部。1957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注音字母音序本，1959年出版汉语拼音字母音

序本。1962年出版修订重排本，修订工作由丁声树主持。之后，多次修订重排。最新的版本是1992年重排本。

《新华字典》是一部富有革新精神的普及性的小字典，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它为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服务。所收的字、词和意义，都是现代汉语的，古语和方言一般不收。在字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体现了规范化的精神。(2) 它改变旧的语文观念，不是从字出发而是从语言出发解释字义和用法。初版收单字8000多字（包括异体字），后来逐渐增加到11000多字（包括异体、繁体）。收带注解的复音词、词组3500条左右。(3) 字词的释义，简明、细致。努力阐明字义的孳乳关系，对引申、转变、比喻等用法都一一标明。(4) 重视对字、词用法的说明，对使用范围、搭配关系、描述对象、感情色彩、文体色彩等方面做了提示。

（苏培成）

《诗词曲语词汇释》（《Shiciqu Yuci Huishi》）

张相著，1953年出版。这是一本专门研究解释诗词曲中特殊词语的著作。书中解释的既有单音词，也有复音词及词组，计五六百条之多。解释词义之外，还推及语源的探讨和语法的分析。作者学殖广博，功底深厚，且严谨认真，每一释义，都大量考察诗词曲中的用例，反复推敲比较，最后归纳出确切的解释，释义精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例证丰富是又一特色。

本书所研究的诗词曲中的俗语词、方言词以及某些虚词的特殊用法，都是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过的，也是其他辞书没有解释过的。作者筚路蓝缕之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不但可以帮助人们阅读诗词曲，也可供研究汉语史的人参考。

（张双亭）

《汉语史稿》（《Hanyushi Gao》）

王力著，我国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讲述汉语历史发展的专著。1954年，王力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我国高等院校最早的汉语史课程，所编讲义经过修订后公开出版，全书共分三册，上册包括“绪论”和“语音的发展”，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修订重版；中册和下册分别是“语法的发展”和“词汇的发展”。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绪论”部分介绍了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中国古代的语文学研究、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汉语史的研究根据、汉语史的分期等内容。“语音的发展”部分首先介绍了代表中古音的《广韵》音系即《切韵》音系，“因为由此可以上推古音、下推现代方言”；随后分两大阶段叙述历代的语音发展，第一段是从上古音系到中古音的发展，第二段是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发展，详细地分析了音类分合和音值变迁，尤其是对音类变化的例证列举得很周密，使读者较容易具体把握住音变现象和变化规律。“语法的发展”主要包括“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分别介绍各种词类的历史发展，有名词、量词、数词、代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后一部分不仅仅涉及句型，还包括构词和语气词等范畴，如构词法的发展、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古代由“之”“所以”联结成的词组、语气词的更迭，句式方面重点讲使成式、外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的产生和发展。“词汇的发展”介绍了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汉语中的外来借词和译词，词义变化的规律等。

本书是汉语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体系严整，内容宏富，问世后数10年来一直深受

学术界高度重视，60年代和80年代多次重印，1996年中华书局又将三册合订重印。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力文集》将本书编为第九卷。

（耿振生）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Hanyu Yufa Lunwenji》）

吕叔湘著，初版收了1940年到1949年间写的11篇论文和12篇札记，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作者重行编订，加进建国以来写的15篇，补入写得最早的两篇，删去《说“们”》《说代词语尾“家”》两篇和札记12篇。增订本共有论文26篇，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论文集》新见多。既有发现的，又有补充、修正的，也有以提出、分析问题为主的。如《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从多方面展示现代汉语的发展有双音节化倾向，影响了汉语的词语结构。这个发现，作为汉语语法特点之一，被专家学者所称道，成为扩大研究成果的理论。《试论非谓形容词》，首次从形容词里分立非谓形容词这个特殊的小类。《“把”字用法的研究》，指出谓语动词结构上的非光杆性，才是近代汉语里发展“把”字句的推动力。这一归结，显露了“把”字句使用的关键所在。《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考证“您”“俺”“咱”分别是“你们”“我们”“咱们”的合音。这个结论，修正了“们”是从“您、俺、咱”的韵尾〔-m〕变来的说法。《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主要对当时几种划分词类标准的优缺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评析，说明汉语词类的划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慎重对待。

《论文集》努力贯彻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在传统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等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用以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如《说“自由”和“粘着”》，批评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关于“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概念不明确后，认为坚守“单说”这个标准，用剩余法能把汉语虚词游离出来，“自由”和“粘着”这两个概念，对了解语法问题是很有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就对朱德熙《说“的”》一文的讨论所引发的描写语法的一些理论方法及其在汉语中的运用加以深入的评论、细致的分析。该文实际上是对上述问题作了一次总结式的研讨。《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等6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组论文，大都可以看作是有选择地借鉴了描写语法理论方法的作品。

《论文集》，事例丰富，分类条理，辨析细腻，取证谨慎，论证严密，归结稳妥，这种实事求是的谨严学风，随处可见。

《论文集》可以说是作者数10年刻意创造的精品，将立于经典著作之林。

（饶长溶）

《语法和语法教学》（《Yufa he Yufa Jiaoxue》）

张志公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5月出版。这是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一本论文集。

1954年初，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汉语教科书。当时语法体系比较分歧，为了使中学语法教学有所遵循，人教社汉语编辑室着手拟订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原则：（1）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2）内容和术语是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比较熟悉的。为介绍、阐释这个系统，人教社约谈了许多位语法学者撰文，合

编为《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主要撰文者有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朱德熙、周祖谟等。后来以《暂拟系统》为依据，参考《语法和语法教学》，编写了《汉语》教科书的语法部分。

《语法和语法教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介绍中学语法系统的产生过程和内容梗概。第二部分是说明中学语法教学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三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这个系统在词法和句法方面的具体内容，如关于词类的划分、汉语构词法、句子的基本成分等。

这本书的撰文者大多是当时的著名语法学者，对所撰写的题目都有专门研究，因此这本论文集不仅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参考，对语法研究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许多位语法学者共同编写这本书，也充分表明语言学界对中学语法教学的重视与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位作者对系统中的每一项论点都是完全同意的”(见该书“序”)。

（徐　枢）

《殷虚卜辞综述》（《Yinxu Buci Zongshu》）

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是一部甲骨学的通论性大型著作，1988年中会书局再版。全书70余万字，分为20章：总论、文字、文法、断代上、断代下、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庙号上、庙号下、亲属、百官、农业及其他、宗教、身份、总结、附录。这是一部总结前人、当代学者和作者自己关于殷虚卜辞55年来的研究成果的大型著作。作者将地下所出的有关殷代的重要材料，与文献材料互作补充，提供了殷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和考古的学者，都有参考价值，广度和深度都超越已有的关于殷虚卜辞的通论性著作，至今仍是甲骨学的初学者所必读的入门书和研究者所必备的参考书。对本书的评论，有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7)、裘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1992)等。

（黄天树）

《切韵音系》（《Qieyun　Yinxi》）

李荣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台湾鼎文书局复印再版。全书9章。(1)单字音表。以故宫博物院影印宋濂跋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主，参校敦煌本、项跋本《王韵》和古逸丛书本《广韵》等韵书，每张表纵列36个声母，按摄横列韵目、等和开合，音韵地位取小韵代表字及其反切。(2)韵母的分类。比较《切韵》和《广韵》韵目分合的不同，列出各类韵母在韵图里的位置，说明声韵配合关系。(3)反切上字。说明反切上字系联的情形，分出俟母，分析合口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的开合关系。(4)反切下字。列出各类反切下字与被切字开合、等不同的统计表，说明被切字开合和等有时由反切上字决定。(5)高本汉构拟的切韵音。(6)〔j〕化问题、前颚介音、四等主要元音。否定高本汉的〔j〕化说，主张一二四等无〔i〕介音，三等介音是〔i〕，四等主元音是〔e〕。(7)声母的讨论。论证全浊声母不送气，列出《切韵》声母表，分36声母。(8)韵母的讨论。指出独韵和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重估了遇流两摄的元音。列出《切韵》韵母表。(9)声调的讨论。论证四声三调说，指出四声论调值只有三个调位，平声、上声各一类，去、入声是一类。书末有4种附录：圆明字轮译文表，根本字译文表，皇极经世十声十二音解，转与摄的关系。本书是现代研究《切

韵》音系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切韵》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书中许多结论都得到音韵学界的肯定。

（张渭毅）

《普通语音学纲要》（《Putong Yuyinxue Gangyao》）

罗常培、王均合作编著。1957 年出版，1981 年重印再版。这部语音学专著刊行 40 多年来，一直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大学中文系把它作为语音学课程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在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的语音调查、分析、研究过程中，这部专著更是学者们重要的参考书。《普通语音学纲要》一书在我国近几十年的语言研究和语言人才的培养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语言学基石作用。

全书共分七章，包括：一、导言；二、语音的基础（语音物理、生理、社会基础）；三、语音的分类；四、语音的结合（音节、复合着、音渡）；五、语音节律（声调、重音、语调）；六、语音的变化；七、音位和音位学。另有附录“介绍几种简单实验仪器”，“国际音标表”等。1981 年重印版新增附录：“音位区别特征和生成音系学”。全书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色：1. 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现代语音学的基础理论知识；2. 尤其突出的是大量结合汉语以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例证，联系实际，深人浅出；3. 广泛吸收国内外语音学的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我国 50 年代语言学界中，本书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一部普通语音学专著。显然，我们既不能用今天语音学的发展水平去苛求 40 年前的这部语音学专著，但又不能不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它。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过分地宣扬当时苏联语音学家的观点，在音位学一章中，还以大量笔墨批判所谓“西欧资产阶级语言学家”的音位观中的“唯心的，形而上学”错误。学术研究中不同观点可以争论，但似不宜上“阶级”的纲来进行批判。尤其是与政治无缘的语音学。这与当时学术界严重的“左”的思潮的影响分不开。这些不足是历史时代局限所造成的，并无损于这部现代普通语音学专著的历史贡献。

（郭锦桴）

《汉语的构词法》（*Word - Formation of Chinese*）

陆志韦等著，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本书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53 年至 1957 年现代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报告。报告对课题组搜集的三四万条意义紧凑的，像是“词”的，北京口语里能单说的例子进行了穷尽的分析。写作目的是描写现代北京话多音词的结构形式，总括构词规律，为汉语拼音文字确定词的连写法提供根据，为规范化词典的收词提供参考。第一章讨论汉语构词学的对象和分析手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前出版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提出同形替代法的基础上，根据描写语言学的分布理论，区分自由形式（*free form*）和约束形式（*bound form*），进一步提出并运用扩展法比较有效地划清词和词组之间的界线从而确定汉语的词的新方法。扩展法是同形替代法的特殊情形，扩展法已被汉语学界普遍接受。这种方法的运用贯串全书。这部专书的成就还在于详细描写了汉语复合词的构成规律，充分说明词的构成和词组的构成是一套规则。作者说：“汉语的构词法，与其说是‘形态学’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还不如说是‘结构学’的一部分。汉语里，造句的形式和构词的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第 2 页）第二章讨论虚字和构词法的关系。第三

至十八章主要讨论复合词，其中第三至五、七至九章详细讨论偏正格的名词；第六章讨论数词和数、量、名结构，特别说明长串数词和并列数词的写法；第十章讨论副词的范围及其作为语素构词的情况，说明了副词和助动词、形容词的区分；第十一至十三章依次讨论偏正格的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等；第十四至十八章分别讨论后补格、动宾格、主谓格、并列格、重叠格。第十九章讨论并列又重叠的格式。第二十章讨论派生词后置成分及前置成分。这部书以词类为纲淋漓尽致地运用扩展法研究复合词，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以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深入发掘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看作现代汉语构词学建立起来的标志，是这一领域最好的一本专书。然而毕竟是写于50年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语法研究整体水平的限制，当时有的词类如区别词还没有建立起来，词类划分标准普遍不清楚，造成少数词的词性定得不准，如副词“赶快”被当成形容词。个别的词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如书中说是主谓格的“夏至”应该理解为夏天的极点，分析为偏正格。这本书对派生词和词缀的讨论还远不是充分的。

（马庆株）

《等韵源流》（《Dengyun Yuanliu》）

赵荫棠著，是最早的汉语等韵学研究专著。初稿成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该书根据40种材料，推求反切学系由梵文的影响而产生；以悉昙家汉译梵文字母表，说明36字母也是依照梵文字母而创造。以反切为基础的字母的出现，说明等韵的酝酿已届成熟。该书的中心内容是分析韵图。作者以考证《切韵指掌图》为出发点，把系统地汇集起来的等韵材料，分为南派和北派，通过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早期韵图的体例、内容及特点。在分析宋元等韵著作的基础上，该书对元明清各代的几十部韵图进行了罗列和分析，并对能体现这一时期语音变化的代表性韵书《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该书最后的第四编，在对等韵源流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自清江永、戴震以来的小学家等韵研究理论，肯定了他们“直感的”正确研究方法；并高度评价了20世纪以来魏建功、罗常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王硕荃）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Hanweijinnanbeichao Yunbu Yanbian Yanjiu》）

罗常培、周祖谟合著。1958年第一分册（两汉部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要探讨自西汉至陈隋这820年间各时期的汉语韵部差别，反映出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之间的韵母变化过程；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诗歌韵文的押韵并参考字书、音义书的反切以及训诂书中有关语音的材料；归纳韵部的原则是“即异以求同，求出其中的共同性，定出当时语音分韵的大类”；在研究中首先注意材料中所反映的语言事实的普遍性，同时也注意到某些材料所反映出的特殊现象；800多年的韵部演变大体区分为三个时期，即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07年）、魏晋宋时期（公元208～478年）和齐梁陈隋时期（公元479～617年），作者计划每个时期写一分册，加上最后的“总论”共四个分册。1958年罗常培逝世后，以下各分册未能按原定计划出版，直到1996年才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将周祖谟整理的书稿合为一册出版，书名为《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所分析的两汉时期韵部仍然接近周秦音，从普遍的押

韵现象总结出27韵部，比《诗经》31韵部少了5个韵部：在西汉时期，阴声韵侯部与鱼部合并、脂部与微部合并，阳声韵真部与文部合并，入声韵质部与術部合并，此外之部的“牛丘龟”等字转移到幽部；到东汉时期，韵部数目没有增减，但韵字有转移：鱼部“家华”等字转入歌部，歌部“奇宜为”等字转入支部，蒸部“弓雄”等字转入东部，阳部“京明”等字转入耕部。书中还区别籍贯对不同地区的作品所反映的方音现象详细地作了考察，如刘安《淮南子》的江淮楚音，史游、班固、傅毅等人的关中音，司马相如、王褒、杨雄等人的蜀地音，崔篆《易林》的幽州音，张衡、蔡邕等人的中州音等。在“绪论”里所讨论的研究古音的方法，文献材料的运用等问题，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性意义。

（耿振生）

《中国古代语法》（《Zhongguo Gudai Yufa》）

周法高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全书原计划写四编，1959年出版了称代编，1961年出版了造句编上卷，1962年出版了构词编。造句编下卷和虚词编尚未出版。这是一部讲古代汉语语法的著作，它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周，下探汉魏六朝的发展，是同类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造句编在全书中最为重要，其中第一、二两章，为本书语法体系的骨干。已出的造句编上卷包括：第一章句型：一、主题和解释；二、句型，主要论述判断句和说明句。第二章词类，周氏按传统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下分名词和谓词，虚词又分为代词、数词、单位词、方位词、助谓词、状词、副词、联词、介词、单呼词、助词等11类。第三章句之成分，包括谓语、名语、副语、补语、外语。第四章复句，分复句为假设句、容忍句、因果句、时间句、转折句、平行句，并进行了复合句之分析。在未出版的造句编下卷里计划讨论语序、时间与方所词、疑问与否定、语气、节律等。构词编分四章：第一章音变，包括通论和字表。第二章重叠，分析了叠音形式、部分叠音形式和重叠形式（或与其他成分）的结合。第三章附加语，分为前附语、后附语、中附语。第四章复词，包括《诗经·国风》中二字组合的分析和《孟子》中复词的分析。称代编的内容包括：第一章通论，分别讨论了代词的转变、代词的地位、代词的序。第二章讨论第一身代词和第二身代词。第三章讨论第三身代词和指示代词。第四章询问代词。第五章讨论其他代词，包括无定代词、复指代词、偏指代词、否决代词。第六章称数。第七章代词性助词，分析了“所”、“攸”和“者”。第八章省略，虚词编中将以虚词为单位对以前各编中已经叙述到的现象，加以综合的叙述，如副词、助谓词、介词仂语、联词（特别是“之”和“而”）、系词、助词（特别是“也”字）等。周法高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语法的研究成果，而且吸收了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如受布龙菲尔德的影响，把称代编单独提出来讨论，采用了“直接成分”划分法；而“划分层次”则是受伦敦学派的影响；受赵元任和霍凯特的影响，把句子划分为“主题”和“解释”；有些地方提到“转换”的方法，是与转换学派相合。本书材料丰富，观察细致，研究全面、深入，许多方面有新颖独到的见解。

（金克中）

《汉语方言概要》（《Hanyu Fangyan Gaiyao》）

袁家骅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出版，1983 年第二版。本书的主旨是：从历史方言学的角度简述汉语方言发展的来龙去脉，从描写方言学的角度举例说明各大方言的重要特征。全书分 12 章。第 1～3 章为绪论，论述方言、汉语方言学和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第 4～11 章为分论，分别阐述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的形成历史、描写语音学、比较音韵以及词汇和语法特点。第 12 章为综论，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举例说明现代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新版除改错补漏和统一体例之外，还修订了个别章节，如吴方言一章改写了变调一节，第 10 章和第 11 章因将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合为闽方言而作了相应的调整补充。本书审音准确，材料丰富，论述全面。语音方面尤为细致，基本反映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词汇、语法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本书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和系统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汉语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项梦冰）

《昌黎方言志》（《Changli Fangyanzhi》）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著，主要执笔人员是丁声树和李荣。196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介昌黎县地理人口概况，并说明全书体例；第二章说明昌黎县方言南北两区的基本情况，以 11 幅方言地图描绘昌黎方言语音词汇的内部差别；第三章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说明昌黎方言的特点；第四、五、六章分别是“昌黎音的分析”、“昌黎同音字表”、“昌黎音同北京音的比较”；第七章用国际音标标注昌黎方言的语料和语法例句；第八章分 36 类描写昌黎方言词语，收词约 7000 条。

《昌黎方言志》在方言调查的全面、深入、细致方面超过了前此的同类著作。本书首次对一个县的方言作全面调查，调查点达 193 个，根据调查材料对全境方言作了分区，画出方言地图。本书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各方面调查都很深入，语音、词汇、语法并重，尤其重视活的语言材料。本书在方言地图中使用内加不同符号的小圆圈作为地图图例，简洁明确，成为以后的方言地图最常使用的方法。本书是在赵元任《钟祥方言记》、罗常培《厦门音系》和《临川音系》的基础上发展并有所创新的更为成熟的方言志样本，对以后众多的汉语方言调查著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　蓝）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Xiandai Hanyu Yufa Jianghua》）

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合著。该书初稿曾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1952.7～1953.11）上连载，名为《语法讲话》。后参考各方面意见进行修订，1961 年 12 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单行本，改名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署名为“丁声树等”。

该书创造性地引进、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从大量汉语事实出发，努力探索适合于汉语语法分析的新路子，形成了一套新颖的比较完整的汉语语法分析体系。全书以结构形式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按照性质和用法（即词的分布和功能）划分词类，分出了名词、代词等 10 类；明确宣布“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并以这个基本思想首次确立了汉语中五种基本句法

结构：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句子分析注重语序和位置，比如认为主语和宾语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主语是对谓语说的，宾语是对动词说的”，“在现代汉语里，主语总是在谓语的前边，宾语总是在动词的后边”，取消了主语挪后和宾语前置说；认为结构方式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骤，首次明确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句子时不仅讲切分，还讲定性（即不仅揭示句法结构的层次构造，还注明直接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后者是对结构主义的改造；根据谓语的性质把句子分成：体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口语、书面语并重、语料丰富，例句精当，往往让要说明的问题在同一个例子中出现，相互映衬，收到很好的效果；观察细微，分析精辟，描写概括了大量的语法现象，如对“的”、“有”的阐述。该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有对国外新方法的借鉴，又有对传统语法的继承，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当时它给人以一种清新的印象，曾被誉为“大陆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该书为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为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该书后来由实藤秀惠、北蒲藤郎合译为日语，书名改为《中国文法讲话》。

（应晨锦）

《汉语方音字汇》（《Hanyu Fangyin Zihui》）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出版。1980年起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1989年出第二版。新版分前言、凡例、方言音系简介、正文和中古音音序索引五部分。正文部分用表格形式收入2961个单字字目的20个方言点的对照字音。20个方言点是：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方言），苏州、温州（以上吴方言），长沙、双峰（以上湘方言），南昌（赣方言），梅县（客家方言），广州、阳江（以上粤方言），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方言），大体可以代表现代汉语各大方言。字目按普通话音序排列，并注明中古音音韵地位。各方言点的读音一律以城区中老年人的口音为依据，以国际音标作音位性记音，各方言标音的宽严也大致平衡。本书注意搜罗一字多音，并区别一般异读、文白异读、口语用音、新旧读和俗读等不同情况。本书为了解汉语各大方言语音之间的异同、开展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研究和古今语音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项梦冰）

《语言论》（*On Language*）

高名凯著、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本书是高名凯继《汉语语法论》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代表作者语言学观点的总结性著作。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本质”论述了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职能、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的变体等问题，阐述了作者对语言的总体认识。第二部分“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最有特点、也是作者用力最多的部分。作者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把语言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大部分的观点，实现了按照语言符号的两极分为语音和语义，又按照语言符号的两个层级分为词汇和语法的新布局，反映了作者强调“语义”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独到见解。作者把音位理论中音位与音素中“位”与“素”的概念推广到整个语言系统中，在语法、语义部分划分“义位、义素”、“词位、词素”、

"法位、法素"等单位，区分一般性的"位"与个别性的"素"，从理论上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系统的认识。作者强调语言是一个系统，其系统性贯穿于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论述了语言的起源、发展和分化，语言的统一和发展的前景。

作者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语言学界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例如语言与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语言的质变、语言的融合等问题，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对自由开展学术讨论、繁荣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语言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重大学术讨论的情况。总之，作者审查了当时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有关观点，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系统。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对待当时苏联语言理论学说和西方某些学术理论的态度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也有对之正确阐释的一面。因此无论是理论体系上还是具体的分析上，本书都不失为我国普通语言学领域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对推动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就是在语言学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该书也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80年代后期石安石对该书进行了校正，核对了引文及其出处，纠正了不少初版排校错漏，对个别词句作了删改，编制了《术语索引》，并作《重印〈语言论〉序》对该书作了全面公允的评介。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

（荣　晶）

《普通话发音图谱》（《Putonghua Fayin Tupu》）

周殿福、吴宗济编著，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分文字说明和图谱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5小节。第一节是总说，第二节详细介绍了人的发音器官，第三节简要说明图谱的绘制和编排情况，第四节对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图谱作总体说明，第五节结合图谱，逐一详细描写了普通话所有辅音、单元音和复合元音的发音特性。第二大部分按汉语拼音字母的辅音、元音及复合元音的顺序，给出图谱42幅。每幅包括一个音发音时的正面口形、侧面口形、口腔侧面透视图和正面颚位面积图。书后有两个附录，分别为X光照相原片和颚位照相原片。《普通话发音图谱》是我国第一部根据X光照相全面描述普通话辅音和元音生理特性的专著，是语音研究和普通话语音教学的重要参考用书。

（曹剑芬）

《现代汉语修辞学》（*Modern Chinese Rhetoric*）

张弓著，196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重版，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陈望道，1932）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代表性论著。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语言因素与修辞，二是修辞方式和寻常词语艺术化，三是修辞与语体。作者认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美化"是指各种交际场合下各类语体中的语言所要求的表达技巧，并不仅仅限于文艺语体。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的修辞原则。又指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跟语言学其他部门（词汇、语法、语音）密切关联，而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不是词汇学、语法学的附属物，而是从表达效果、表达方法、表达态度的角度来研究对语音、词汇、语法的运用。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它首先明确把语言三要素的运用作为修辞学的研究

对象，还突出了同义选择问题，并较系统、较充实地论述了“现代汉语词汇同义词和修辞手段”、“现代汉语语法同义形式和修辞手段”和“现代汉语语音现象和修辞手段”等问题，这是对《修辞学发凡》提出的修辞要“利用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观点的具体发展，同时又为汉语修辞研究拓展了新的路向。书中把“修辞方式”（作者称为“辞式”，即“辞格”）分成描绘、布置，表达3大类24式，对每一个辞格的现实基础、社会作用、在各类语体中的应用及其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同时，对“寻常词语艺术化”问题作了切实探求，通过实例，对寻常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艺术化，逐项细致地作了阐析，并总结出寻常词语艺术化的表达特点和表达效果：“由平易显神妙，凭朴素本色显美丽”。作者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的一个最新的最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全书用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现代汉语语体，研讨了三大问题：（1）现代汉语语体的类型；（2）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修辞各方式和书面上四类语体的关系；（3）现代汉语语体综述。作者的一些理论阐述特别关于语体的看法，明显是受苏联有关学术观点的影响。可以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是新中国建立后汉语修辞学研究在60年代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杨林成）

《汉语方言词汇》（《Hanyu Fangyan Cihui》）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年出版。1982年起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1995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第二版。新版分前言、凡例、方言音系简介、分类词目、正文和普通话音序索引六部分。正文部分用表格形式收入1230条普通话词目（其中包括少量词组）的20个方言点的对照词语。20个方言点是：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方言），苏州、温州（以上吴方言），长沙、双峰（以上湘方言），南昌（赣方言），梅县（客家方言），广州、阳江（以上粤方言），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方言），和《汉语方音字汇》一书所收方言相同，大体可以代表现代汉语各大方言。词目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排列，先词类，后词义。收入词语一律以城区中老年人现用口语为原则，用国际音标标音，通过处理使标音既能反映单字音又能反映连读音变，各方言标音的宽严也大致平衡。脚注说明本字考证和其他有关事项。搜集同一词目的方言对照词语时讲求词语间的准确对应。本书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开展汉语方言的词汇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项梦冰）

《甲骨文字集释》（《Jiagu Wenzi Jishi》）

李孝定编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一部集录各家对甲骨文考释的大型工具书，于1965年正式出版。此书汇集自《契文举例》（1904）至60年代初期各家对甲骨文的考释。字的排列按《说文解字》分部排列。每字之下，于眉端首列篆文，次举甲骨文各种异体，然后采录各家考释，并详注出处，最后加上案语，提出作者的结论性意见。此书正文共十四卷。另附卷首一卷，收序言、凡例、目录、索引、引书简表、后记等；补遗一卷，收正文未备之字；存疑一卷，收各家有考释而未能成为定论之字；待考一卷，收不可识之家。此书集50余年甲骨文字考释之大成，对学习和研究甲骨文字颇有参考价值，是一部较好的工

具书。但此书自1965年出版到现在又已过去近30年，在这30年间，有关研究成果数倍于前，有必要再一次加以总结。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已于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集录各家对甲骨文的考释，资料比《甲骨文字集释》更为丰富。

（黄天树）

《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赵元任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8年初版，1970年第二版。是采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描写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的一部著作。描写对象是北京方言的口语，这和过去注重古典汉语或书面语的传统很不一样，例句的收集也大多来自日常语言。基本出发点是："语法是研究一类一类的形式出现或不出现在由别的类构成的框架或槽之中的"，也就是按"分布"给词语分类。书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直接成分、可放的类和可列举的类、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内中心结构和外中心结构、结合面的宽和窄等等已成为汉语语法描写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词语分类上提出的一些标准，如跨类的只能是少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注意语法和语音、节律的关系，除开头专辟一节讲汉语语音外，随时论及停顿、轻重音、升降调等对语法的影响。经常拿汉语跟外语（英语、德语等）作比较，注重汉语语法的特点，提出的汉语主语和谓语是话题和说明的观点、可以有大主语和小主语的观点，动词可以作主语的观点，对后来的语法研究有重要影响。虽然注重的是形式分析，但"并不取消意义的用处"，在说明一个词语表达的意义时经常联系词语使用的实际环境。对一句话能说不能说，经常不作绝对的判断，而是注明在什么场合下什么样的人这么说，承认许多语法现象是个程度问题或频率问题。在寻找语法的系统性和对称性的同时又注意不对称的一面和扭曲关系，充分尊重语言事实。无论从涉及的语法事实的广度、分析的敏锐和细致，还是从理论和方法的建树上看，至今还没有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能全面超过它。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序论，第二章句子，第三章词和语素，第四章形态类型，第五章句法类型，第六章复合词，第七章词类：体词，第八章动词和其他词类。原书用英文撰写，现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吕叔湘的节译本，改书名为《汉语口语语法》，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是全译本，丁邦新译，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家煊）

《上古音研究》（《Shangguyin Yanjiu》）

李方桂著，是上古音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1971年台湾初版，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在对高本汉的中古音拟测系统作了若干重要修订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60年代以前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拟测了上古汉语的音韵系统。书中收《上古音研究》《几个上古声母问题》《中古上古音声母问题》三篇论文，其中《几个上古声母问题》一文对《上古音研究》的声母拟测又作了重要补订。

本书对上古声母的拟测提出两条谐声原则：一，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以此原则为基础，拟测出上古31个单声母，把舌根音及喉音构拟为圆唇与不圆唇两套，又拟了一套清鼻音和清通音；认为上古可能有pr-，dr-；bl-，gl-；st-，sk-之类的复辅音声母。

本书认为上古韵母介音只有-r-和-j-两个，没有合口介音。-r-有央化作用，-j-有颚化作用。一四等韵没有介音；二等都有-r-介音；三等除喻四外，都有-j-介音。阴声韵全拟成闭音节，认为上古的音节结构可能是"辅音＋元音＋辅音"这一形式；幽中宵三部各拟有一个圆唇舌根音韵尾，歌部是-r，微部少数字是-r，其他各部分别是（-b），-d，-g收尾。主元音的拟测精简为4个；复合元音有-iə-，-ia-，-ua-3个，借此解决分化的条件问题。

本书虽然把上声拟测为有-x尾，去声拟测为有-h尾，但认为还是应该看成调类的分别，倾向于上古有声调。

对比高本汉和董同龢的拟测，《上古音研究》的上古音系统有很大突破。本书对每一个韵部只拟一个主元音，这是对上古音拟测所作的重要贡献。此外，所定的谐声原则比较严格，并依此原则构拟上古声母系统，也是能够启迪后学的新尝试。

《上古音研究》把上古阴声韵全拟成辅音韵尾，主元音精简为4个，韵尾有圆唇与不圆唇的对立，还没有被音韵学界普遍接受，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

（孙玉文）

《现代汉语词典》（《Xiandai Hanyu Cidian》）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是一部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汉语词典。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先用两年的时间收集资料，1958年开始编写，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经修改定稿后于1965年印出试用本，后又经修改，于1978年正式出版发行。为适应汉语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贯彻国家的语文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原则，词典编辑室又于1993～1995年进一步进行修订，修订本于1996年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词所贯彻的原则是：全面反映普通话的词汇体系；正确体现词汇规范；兼收部分常见的专科词语、文言词语、方言词语以满足查考的需要。全书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成语和其他熟语共约5.6万条。1996年修订本增至6万余条。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词典释义准确详明，并有精当例句相配合，在解释词语意义的同时，还注意结合说明词语的用法，词典的释义达到了以前词典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体现了现代汉语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来，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1993年《现代汉语词典》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截至1996年底，词典发行总量已达Ⅰ2,700万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还有当地版本印行，印量之大，在中国辞书史上是罕见的。

（晁继周）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Hanyu Yufa Fenxi Wenti》）

吕叔湘著，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年出版。全书4章，99节，约6万字。这部著作凝聚了作者40年潜心研究的真知灼见，系统分析了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面

临的重要课题，对汉语语法中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

第一章“引言”作者着重讨论汉语语法分析的原则和方法：(1) 语法分析的主要依据是形态和功能，意义虽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2) 在处理难于“一刀切”的各种“中间状态”的时候，要注意把握类型与实例的关系，实例的多少往往可以为定性的结论提供依据。(3) 在同时采用几方面的标准定性和分类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主次。第二章“单位”讨论了汉语各级语法单位的特点及确定单位的时候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如语素的大小、异同，语素与汉字的对应问题，语素组合的问题，词的划界问题，小句与句子的关系问题等。把语法单位分作动态单位和静态单位。语素、词、短语（包括主谓短语是）是静态单位，其中语素是基本单位；小句、句子是动态单位，其中小句是基本单位。指出，讲汉语的语法，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第三章“分类”提出了“结构分类”与“功能分类”两个概念，讨论了语素、词、短语和句子的分类问题，不仅逐一讨论了词类划分中各类词的界定问题，还从结构类和功能类两方面对词、短语、句子分类进行了论述。第四章“结构”，讨论了结构层次、结构关系、句子的结构、句子成分和结构层次、句子成分和结构关系、主宾语问题、宾语与补语问题，以及“是”字句、连动式、兼语式、主谓短语作谓语等较为复杂的结构形式；比较了传统语法的分析框架和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在描写解释汉语中的得失。

这部著作的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著。”全书行文简洁，深入浅出，体现了作者朴素务实的学风。

（方　梅）

《甲骨文字释林》（《Jiaguwenzi shilin》）

于省吾著，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于氏考释甲骨文字成果的汇集，由《双剑誃殷契骈枝》(1940年)、《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1941年)、《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1943年)、《双剑誃殷契骈枝四编》(解放前稿本)，加上解放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增删改写而成。全书共收论文190篇，绝大多数是对某个或某几个甲骨文字以及某些词语的考释，书中许多成果，如释屯、释气、释小王为孝己、释羌甲为沃甲等，均确切不可易。对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示字则非专释一字、一词，而是对甲骨文字的某些构形所进行的综合性解释；也是对传统文字学理论“六书”说的发展与突破。论证简洁，文笔流畅。书前有自序，谈到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强调研究古文字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还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他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字形之间的“纵的关系”。台湾学者李宗焜撰有《〈甲骨文字释林〉研究》(1990年)，可供参考。

（白于蓝）

《现代汉语八百词》（《Xiandai Hanyu Babaici》）

吕叔湘主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一部以虚词为主的现代汉语语法详解词典。这部词典对每个词的意义和用法分项详加说明，尤其适合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使用，对一般语文工作者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也很有帮助。该书开头有一篇《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介绍汉语语法的特点、词类和句法知识，其中所列的“动词谓语句式

表"和"动趋式动词有关句式表"对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基本句式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正文中词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书后附有笔画索引。800 多个词条中主要是虚词，也包括用法比较复杂或比较特殊的名词、量词、数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量词收得不多，因为另附有《名词量词配合表》可供查阅。每个词标明词类（包括兼类），每个义项或用法下都有若干例句。因为主要是给初学汉语的人用的，所以例句所涉及的词汇量较小，一般不直接引自书报杂志。有些词条下有"比较"项，用以辨析用法相近或易于混淆的语词；有些词条下有"习用语"项，用以说明该词在熟语或固定格式中的意义和用法；有些词条下有"注意"项，对容易忽视的意义和用法加以提示。1998 年《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增订本，增订本除了对某些词条的释义有所修改补充外，主要是增收了 200 多条新编的词条。《现代汉语八百词》在现代汉语研究与教学中，在中文信息处理中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小荷）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Research in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出版，共收入著者 1956 年至 1979 年间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7 篇，附录与卢甲文、马真合写的论文 1 篇。由于本书、《语法讲义》、《语法答问》和《语法丛稿》的巨大影响，朱先生被认为是当代对汉语语法研究做出最大理论贡献的学者。他注意吸收国外语言学新的理论方法，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因而书中每篇文章都有很大的学术影响。例如《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北京）1956.1］把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在描写分布特征的同时，对两类形容词意义上的区别作了详细的描写，以崭新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结论引起国内外重视，赵元任先生认为这篇论文"对形容词的处理迄今为止是最好的"。60 年代初期语法研究深入发展，进步很快，朱德熙发表了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写的《说"的"》（《中国语文》1961.12）、《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4）、《句法结构》（《中国语文》1962.8～9）三篇论文，把汉语语法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说"的"》以研究的实例介绍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把"的"分化为副词的尾巴、状态形容词的尾巴和名词性成分后面的助词，曾引起热烈的讨论。批评"名物化"说的文章强调区分语法特点和语法性质，对于传统语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句法结构》把美国描写语言学方法用于汉语语法分析。《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方言》1979.2；《中国社会科学》1980.1）分析了表示给予、取得的动词小类与分布和变换的关系，引起了对动词分类研究的重视；还提出兼属给予类和非予取类的一部分动词（如"写"、"寄"）意义上有不确定性。《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2）提出"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语法结构和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用变换分析方法揭示了显性语法关系后面的隐性语法关系，为深入细致地分析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开辟了新路。《"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978.1～2）提出了动词的向（即后来一般所说的"动词的价"）和歧义指数的概念，向是动词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的个数，解决了由动词性结构加"的"形成的"的"字结构的歧义问题。"VP 的"即动词性成分加"的"的意义个数等于动词的向数减去已出现的名词性成分的个数。这就引起

了国内学者对配价语法研究的重视。

（马庆株）

《马王堆汉墓帛书》（《Mawangdui Hanmu Boshu》）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出土一批书写在竹简和缣帛上的古籍。帛书约29件，约12万字。整理后将全部帛书分编为六册出版，现已出版三卷，分别是：

1. 第一卷，《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卷后书。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老子》甲、乙本的篇序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正相反；章次上也与通行本不同。《老子》甲本卷后佚书原无篇题，整理时按内容分为四篇。《五行》和《德圣》，讲"五行"——仁、义、德、智、圣；《九主》，论九种君主之得失；《明君》论强兵。乙本卷前四篇佚书原有篇题，分别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内容为黄帝之言、刑名与阴阳刑德，其中《十六经》中的黄帝的大臣"力黑"，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阴阳家《力牧》。

2. 第三卷，《春秋事语》与《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原卷无篇题，整理时根据内容定名。《春秋事语》共十六章，记春秋历史故事。《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记战国纵横家言论，较多苏秦游说故事。

3. 第四卷，古医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原皆无篇题，整理时将主要的医方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记五十二种疾病的病名、病因、病状与治疗方剂、疗法。其他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两本，论述人体十一脉的循行、主病与灸法，同现存《黄帝内经·灵枢经·经脉篇》有关经脉内容部分相同，但少一条手厥阴脉，也有部分不同。《脉法》、《阴阳脉死候》，根据脉法判断疾病征候。《导引图》，绘有做导引时的各种姿势，并有说明文字：《却谷食气》，记行气之术。《杂疗方》、《养身方》，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房中类书。《胎产书》，论胎产宜忌，与传世的医书《诸病源候论·妊娠候》的一些内容相近。收入该卷的还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竹木简中的四种医书，即《杂禁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几种。第一篇是咒禁方术，后三篇是房中术一类的书，讲述男女交合的技巧与养生之方。

尚未出版的三卷，分别是：

4.《周易》及卷后佚书。《六十四卦》卦名用字与通行本有异，如乾用键、临用林等。帛书卦辞与爻辞与通行本内容基本相同，但排列次序与通行本不同，没有《彖辞》、《象辞》、《文言》等解说文字。《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定名为《二三子问》，是关于《易》的问答。帛书《系辞》比通行本少了若干内容，不分章节。《系辞》卷后佚书原有篇题并注明字数，分别是：《要》1648、《昭力》、《缪和》6000。

5.《阴阳五行》与《刑德》。《阴阳五行》有篆书、隶书两体，应是兵阴阳家的著作。《刑德》有甲、乙、丙三篇，其中乙篇较完整，主要有三个部分："刑德九宫图"、刑德运行表和对刑德运行规律的记述与对刑德九宫图的解释。

6. 天文气象杂占、地图、相马经等佚书。天文气象杂占书中，有木、金、水、火、土五星之占及五星行度，定名为《五星占》。书中记录的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246～177年）木、金、水、火、土五星在天空运行的位置及所推算的公转周期，已相当精确。佚书中另有一种绘有云、气、星、彗的图，记有占文，是"云气占"、

“星占”、“彗星占”的图绘本。地图共两幅。一为《长沙国南部图》（或称《地形图》），相当于今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即湘江的主要支流潇水流域、南岭及九嶷山邻近地区，比例约为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左右，绘有大小河流30余条，居民点80余处，县城8个。另一幅为《驻军图》，主区约为今湖南江华的潇水流域，应是《地形图》中的局部，比例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重点绘出居民点与军队驻地，所绘驻军地共九处。另有一幅建筑图，上下分别绘有城垣等建筑，或定名为《城邑图》（或称《园寝图》）。《相马经》，原无篇题，记良马体态与器官的各种特征，文辞古奥，现尚难以完全读通。

尚未出版的帛书，已有一部分内容在杂志、文集、图册中发表，如《文物》月刊刊登了《六十四卦》、《相马经》等；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公布了《刑德》乙篇；《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收录了《城邑图》等。

（胡平生）

《语法讲义》（*Lecture Notes of Grammar*）

朱德熙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这本书的底本是作者6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汉语语法”课程的讲义。这部书摆脱了印欧语传统观念的干扰和束缚，以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系统地建构了全新的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借鉴国外语法理论方法精细科学地分析汉语语法事实，概括出许多经得起推敲的规律，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语法讲义》以词组为基本单位，注意进行层次分析和分布特征的分析。作者认为词的语法功能是任何一种语言划分词类的本质依据，指出划分词类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书中根据语法功能把词分为17类，多个词类还分出了小类。例如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集合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动词中有体宾动词、谓宾动词、真谓宾动词、准谓宾动词、对称性动词。句法部分着重描写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连谓共6种基本句法结构。描写主谓结构时提出“可以从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扩大了语法研究的视野；讲宾语的时候把宾语分为指称性宾语和陈述性宾语，提出了指称和陈述一对范畴。这些都非常值得语法研究者注意。作者关于具体语法规律的描写体现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是一对多对应。在由实词和实词组合的句法结构中总是同时并存着两种结构关系：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对应关系。讲形式的时候要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也要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作者提出“把”字句与受事主语句关系最密切。由于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因而这部语法书的语法体系以词组为基点，体系十分简明。行文非常精炼，虽然仅有17.2万字，可是内容非常丰富，极有启发性。例如作者用粘合和组合的观点把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和偏正结构都分为粘合式的和组合式的两大类，合理地解释了许多问题，如定语的次序问题。再如语气词的不同小类按序号连用，给人以关于词的小类在连用时表现出有序性的启发，引发了对不同词类和同一大类下面不同小类共现时的有序性问题的系列研究。这部书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如语素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定位语素和不定位语素，定位语素又分为前置定位语素和后置定位语素。这本书有开创性，对于

语法研究者非常有启发性，是代表了8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的力作，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

（马庆株）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Xiandai Hanyu Xuci Lishi》）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集体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共收录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虚词790条。词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注明所属词类（包括兼类），归纳各种用法，并且用一定数量的例句来加以分析和说明。这部虚词词典的主要特色是：大多数例句选自典范的白话文著作或报纸杂志并注明出处；虚词的用法搜罗完备，语法意义解释准确；许多词条下有[辨异]项，对意义或用法相近的虚词加以辨析；一些词条下还有[病例]项，列举该虚词使用不当的常见病句，并加以纠正。该书1959年开始编写，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高名凯、朱德熙、林焘、姚殿芳、徐通锵审阅，拟于1962年印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1982年才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是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也是学习汉语语法的一部必备的工具书。

（陈小荷）

《甲骨文合集》（《Jiaguwen Heji》）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大型的殷虚甲骨文资料著录书。正式编辑工作从1961年开始进行，其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工作时作时辍，到1978年终于编讫，并在1982年全部出齐。此书珂罗版影印，精装八开本13巨册。前12册为拓本及少量照片，第13册为摹本。从189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80年间，殷虚先后出土甲骨约15万片。本书选录资料的标准是：凡甲骨刻辞，文句完整或比较完整，以及文句虽有残缺但内容较为少见者，一律选录；凡文句一般、常见而又残缺过甚者，则不予选录。据此标准，本书从15万片左右甲骨中筛选出41956片。

《合集》不仅取材范围较广，内容较精，而且经过校重、辨伪、缀合、换用精拓等处理，使此书成为一部经过科学整理的大型殷虚甲骨文资料集大成的著录书。70年代以前已著录的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抵已收入此书。本书编成之后，国内外甲骨尚有一部分未及选录或遗漏，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工作。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等，也将于近期出版。全书图版按董作宾五期断代顺序编排，有争议的附于第一期之后编为第七册。每一期中再按卜辞内容分为四大类，即：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产。三、思想文化。四、其他。《合集》的出版，给广大研究者创造了研究甲骨文的条件，大大推动甲骨学的发展。

（黄天树）

《唐五代韵书集存》（《Tangwudai Yunshu Jicun》）

周祖谟著。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总述、唐五代韵书30种、又韵字摘抄和有关字母及等韵的9种写本等内容。下编包括考释、辑佚和附表等内容。本书将唐五代韵书写本和五代、宋初的韵书刻本30种按体例和内容编排，凡体例和内容相近的归为一类，共分七类：（1）陆法言书的传写本。（2）笺注本《切韵》。（3）增字增训本《切韵》。（4）《刊谬补缺切韵》。（5）裴务齐正字本《切韵》。

(6)《唐韵》、(7) 五代和宋初刻本《切韵》。凡是有照片或底片的韵书都予以影印，并加以考释，说明各个写本的情况、时代的先后、原书的体例和特点，辨析异同，阐明有关韵书之间的关系。附录两部分资料，一类是敦煌所出的与音韵有关的一些写本，包括字母等韵和按韵摘记的一些材料，另一类是唐代诸家韵书的佚文。本书是作者30多年来从事唐五代韵书的搜集、整理和考订工作的总结，汇集的韵书资料是迄今国内外最齐全的，考释部分凝聚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为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和考察中古汉语字音、字义、字形演变提供可靠依据，在音韵学史和敦煌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渭毅）

《殷周金文集成》（《Yinzhou Jinwen Jiche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汇录殷商至秦统一以前铜器铭文、图像并附有释文、索引的大型工具书。1963年4月，着手进行编纂工作，开始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被迫陷于停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长时间筹划后于1979年初正式成立编辑组，1984年9月，本书第一册正式出版，内容以铭文为主体，尽可能地将器物的图像一并收入，全书附有释文和索引。1994年12月，本书的主体部分——铭文集录共18册已全部编成出版。所收殷商至秦统一前的铜器铭文，顺序编至12113号，减去若干器类之间的空号，实际收录器铭总数11983件，其中包含个别铅器、金银器和铁器的铭文。铭文的编辑体例采取传统的金文著录方式，即以器类为纲，按照字数从少到多编排。《殷周金文集成》是由国家规划并组织力量编纂的大型工具书，具有权威性，不仅是目前为止收器最多的金文总集，而且有2109件器铭为首次著录，8603件器铭采用原拓制版。本书对传世器物铭文进行了严格的甄别、辨伪，尽可能提供一切有用的相关参考资料，保证了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并深受考古学者和古文字学者的好评。

（冯胜君）

《近代汉语指代词》（《Jindai Hanyu Zhidaici》）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1985年出版。近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著作。

该书是吕叔湘40年代的旧稿，1983年由江蓝生补充整理，再经吕叔湘调整而成。全书共分十章：1. 三身代词；2. 们和家；3. 谁；4. 什么；5. 这、那；6. 哪；7. 这么、那么；8. 怎么；9. 几、多少、多(么)、大小、早晚；10. 些和点。作者认为，人们一般所说的代词，“称之为指代词，比较全面些”，疑问“这类词既有称代的作用，又有指示的作用。”（序）出于这种认识，书中对近代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名词性、定语性指代词、状语性指代词和数量指代词作了全面的论述。书中对每个指代词都举出大量的不同时代的用例，力求从句法位置和音韵关系上探求出这些指代词的语源关系，从功能上、书写形式上论证其发展演变，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描绘出了近代汉语指代词使用和发展的一个完整面貌。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书中提出的不少结论被汉语语法史学界普遍认同。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本书都可以认为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

（杨荣祥）

《动词用法词典》（《Dongci Yongfa Cidian》）

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编写，198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原收动词1328个，并按义项出条，共2117条。对动词的描写和考察有四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一般功能，主要描写动词作谓语时动词后面所能带的成分，如"名宾、双宾、动宾、形宾、小句宾、动时量、动介、了着过、动结宾"等，还包括"重叠、加'很'、兼语句、存现句"。第二个项目是名宾类，按照语义关系把名词宾语分为14种类型：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间、目的、原因、致使、施事、同源、等同、杂类。第三个项目是动结式，即动词和各个结果补语的搭配。第四个项目是动趋式，即动词和各个趋向词的搭配。

《动词用法词典》是我国第一部对动词进行比较全面描写的用法词典，不仅吸收了当时语法研究已有的成果，也反映了编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名宾类"就较全面、较深入地描写了动词与宾语的语义关系。

1999年该词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改名为《汉语动词用法词典》。趁改版的机会，作者对词典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保持了原有的框架与格局，但增加了100多条常用的动词，删减了原词典中的个别条目，并对某些词条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

该书描写与考察的动词项目很有系统，比较好地概括了动词的主要用法。不仅对学习汉语和教汉语的人很有用处，而且为研究汉语的学者提供了一份有系统的比较详细的资料，是研究汉语动词以及计算语言学的重要参考书目，对促进语法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谭景春）

《汉语音韵史论文集》（《Hanyu Yinyunshi Lunwenji》）

张琨著，张贤豹译。1987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分别出版。本书共收入有关古汉语音韵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四篇，反映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基本观点和重要研究成果。第一篇《切韵的综合性质》和第二篇《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讨论陆法言《切韵》一书的性质，认为《切韵》"是一部具有综合性质的韵书，它代表的是公元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既包括北方方言，也包括南方方言，不仅反映陆法言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汉语，也反映更早时期的汉语的语音现象，而且其中的某些语音区别仍然存在于现代南方方言如闽语当中。《切韵》所包含的方言差别不是《诗经》以后才分化出来，而是有更早的来源；它的宽广基础可以投射出原始汉语的语音系统，能够作为直接构拟原始汉语的根据。第三篇《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的方言曾在不同的时代占有优势地位并曾被用作文学语言"，如果把以北方音韵系统为基础的《诗经》押韵和取自于南方音韵系统的《切韵》以及属于北方音韵系统的《中原音韵》挤成一条发展直线，无异是"粗疏地扭曲了事实真相"，因此，在音韵史的研究中，"整个汉语史南北平行（局部是独立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第四篇《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古代方音的比较来构拟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作者称之为"用汉语内部证据投射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的主要手续是：根据"内部拟测"的原理，从《诗经》韵母系统中元音分布的不平衡状态推测出原始汉语里的圆唇元音分布更广泛。本文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于原始汉语音系的构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耿振生）

《实验语音学概要》（《Shiyan Yuyinxue Gaiyao》）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讨论了语音的一般性质，介绍了语音实验的主要原理和常用的技术、方法，吸取了国内外关于语音学、尤其是汉语普通话方面的近期实验研究成果。全书共分十二部分，包括正文十章和两个附录。第一章概述实验语音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和历程；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介绍语音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和机制；第五章至第十章分别介绍和讨论元音、辅音、声调、音节和音联、轻重音及区别特征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以普通话为例，详细阐述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特性、声调的产生和知觉机理以及分析方法、音节的一般结构、音联的基本概念、轻重音的声学特性和实验方法、区别特征的一般理论和汉语普通话的区别特征系统。两个附录分别为常用的语音实验仪器装置和使用方法的介绍以及计算机在语音学研究中的应用的介绍。该书相当全面地介绍了 90 年代以前国内外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供语言学、声学、语音信号处理、言语工程学及有关言语病理学等专业研究生的语音教学用，也可作为这些专业本科生的语音学参考书，对语言学工作者、言语工程学工作者及语音学爱好者也有参考价值。

（曹剑芬）

《汉语语法研究》（《Hanyu Yufa Yanjiu》）

张斌、胡裕树著，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出版。胡裕树，笔名胡附，1918 年生，安徽绩溪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斌，笔名文炼，1920 年生，湖南长沙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胡裕树、张斌从 1952 年开始学术合作，时间长达数 10 年，在汉语语法学界传为佳话。1955 年出版《现代汉语语法探索》（署名胡附、文炼，上海东方书店出版），1962 年出版高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语法部分合作，多次修订重印)。《汉语语法研究》一书收入二位作者 1954 年到 1986 年发表的语法文章 34 篇，附录 1 篇。

《汉语语法研究》反映了二位作者在现代汉语语法方面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发展了广义形态理论。“广义形态”的概念是方光焘 30 年代末提出来的，论述较为简略。胡裕树、张斌 50 年代初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汉语的词类划分有没有形态变化不是主要的问题，有没有结构关系才是关键的问题。广义形态指的是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狭义形态包括在广义形态之内。（8 页）书中提出了一些结合关系，作为划分汉语词类的标准，很有参考价值。(19 页)。

二、提倡三个平面的语法学说。80 年代初，胡裕树、张斌提出了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思想，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作者认为，分析句子找出了主语、谓语、宾语等句法成分，如果不能根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掌握句子的语义关系，不能算达到了析句的目的。（35 页）语法研究要分析句法结构、揭示语义关系、指出语用因素，三个平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句法是基础，语义和语用都要通过句法结构来表现。书中论述了三个平面思想在汉语的语序、虚词、句型、动词和名词之间的选择关系等方面的具体运用。

三、建立了现代汉语句型系统。作者认为句子的语法分析是要找出系统的、全面的句子结构的格局、模式，以及它们的变化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以揭示语法的规律。（47

页）从具体分析来说，句型是分层次确定的，不同平面的句型有不同的结构成分。（52页）书中建立了分层级的汉语基本句型系统。（69页）

四、开展了话题与主语的研究。作者针对汉语研究中主谓谓语句范围扩大的现象，认为要区分话题和主语。话题是语用成分，主语是句法成分。确定主语应该遵循形式化的原则。书中提出了汉语主语的三个主要特点是：不带介词；位置固定，一般不能移后；与VP的语义关系密切。（59页）

《汉语语法研究》还收入了《关于〈马氏文通〉》等几篇书评，书后附录了二位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汉语语法》。

（戴耀晶）

《中国语言地图集》（*Language Atlas of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著。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两次出版。

《中国语言地图集》共有36幅四开彩色地图，每幅图均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并提供人口统计、参考书目等资料。36幅图分为A、B、C三组。A组5幅图宏观地描绘了中国境内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域分布概貌，B组16幅图描绘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C组14幅图描绘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

《中国语言地图集》首次用大型彩色地图和详细文字说明相结合的方式绘制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文化、语言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的语言分布图，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提出了将汉语方言划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点等不同层次的五级划分法，使汉语方言的分区更为细密；提炼了“古入声字的演变”和“古全浊声母的演变”两条划分汉语方言大区和方言区的基本标准，大体上能反映汉语各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而且便于操作。

《中国语言地图集》发表10年来，经过学术界的反复讨论，一致认为“闽语大区”应改为“闽语区”（下属区片也应作相应调整）。《中国语言地图集》提出的十大方言说与以前的七大方言说是目前关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两种主要学术观点。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语言学范畴，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参考资料。

（李　蓝）

《语音探索集稿》（《Yuyin Tansuoji Gao》）

林焘著，北京语言学院1990年出版。这是一部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和语音教学的论文集，全书收录了作者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的12篇论文，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普通话轻音与句法和语义的关系、北京话的语音特征和语音变体、北京官话的历史来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语音的实验研究和对外汉语的语音教学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作者在这些领域开创性的成果和独到的见解。作者在50年代就注意到普通话的轻音现象与句法和语义的关系，指出研究轻音不能只停留在音节的层面上，而应该注意语流中不同层面上的各种轻音的特点，并从补语中的轻音现象入手来研究语音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北京话的儿化韵的读音差异的研究中，作者提出用“零变体”的音系分析方法来解决由于读音差异造成的儿化韵音系的分析困难；作者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北京话中去声连读的读音差异。在北京官话区的形成和划分方面，作者提出了“北京官话区”的概念，以丰富的方言资料论证了它的存在和地理分布、以翔实的历史材料分析了它的历史来源。在实验语音学方面，作者以语音的声学分析和合成的现代化手段研究了北京话轻音的声学性质，证明了北京话的轻音的本质在于音长的缩短而与音强的强弱无关。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方面，作者结合语音学研究、特别是普通话韵律特征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王韫佳）

《汉语大字典》（《Hanyu Dazidian》）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辑，徐中舒主编，李格非、赵振铎常务副主编。1975年开始工作，1986年10月出版第一卷，1990年10月全书八卷出齐。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这部大字典有以下几个特点：(1) 收字方面，它是古今楷书汉字单字的总汇，共收楷书单字54678字，比《康熙字典》还多出9000字左右，其中包括以往字书很少著录的俗字。(2) 字形方面，在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简要说明其结构的演变。在横的方面，对异体字作了整理。(3) 注音方面，采用三段标注。见于《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的字，标注上古韵部、中古反切和调韵声、现代读音。中古以后出现的字，只标中古音和现代音。近代和现代出现的字，只标现代音。(4) 释义方面，不仅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还收入一些复音词的词素义。做到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每个义项的建立，除了转录自古代字书、韵书的外，都有引证作为依据，而且尽可能引用时代最早的书证。

（苏培成）

《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八）（*Researches & Explan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这套由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写的“中国语文丛书”，是第一次到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是在老一辈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热心参与和指导下，以一批中年语言学家为骨干定期举行的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中所收的论文大都是在讨论会上宣读过，后又经作者修改过的。它们不仅着力描写和分析汉语事实，同时注意对研究方法的探索，而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又各具特色。《语法研究和探索》（一）（1983，北京大学出版社）是1981年5月第一次语法学术讨论会（密云）的论文集，共收论文14篇，内容上有的侧重理论、方法的探讨，有的侧重调查和分析语言事实。《语法研究和探索》（二）（1984，北京大学出版社）是1982年6月第二次语法学术讨论会（香山）的论文集，共收论文18篇，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关于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关于句子格式和短语的，关于个别词类和个别词语的。《语法研究和探索》（三）（1985，北京大学出版社）是1984年7月第三次语法学术讨论会（延吉）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3篇，内容涉及词汇、语义方面，但主要还是语法。《语法研究和探索》（四）（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是1986年10月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西山）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8篇，大都是围绕语法研究中如何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这个原则来探索的。

《语法研究和探索》（五）（1991，语文出版社）是1988年5月第五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丰台）的论文集，共收论文15篇，大都是围绕汉语的词类问题来展开讨论的。《语法研究和探索》（六）（1992，语文出版社）是1990年10月第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合肥）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2篇，内容涉及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语法研究和探索》（七）（1995，商务印书馆）是1992年10月第七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天津）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6篇，内容涉及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语法研究和探索》（八）（1997，商务印书馆）是1994年10月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的论文集，共收论文17篇，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汉语形容词问题，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及其他理论问题，通过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描写来揭示语言规律。

（刘　津）

《汉语大词典》（*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词典，由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第1卷，其余12卷（包含《索引·附录》1卷）改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1988年3月～1994年4月出版，1997年又出版缩印本上、中、下3巨册。编纂《汉语大词典》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该词典由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等43个单位共同编写。从1975年广州召开的全国辞书规划会议到最后一卷出版，前后经历了18年的时间。全书共收词语37.5万余条，约5000万字，插图2253幅。这部大词典按历史原则编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之大成。收词范围包括古今词语、熟语、成语、典故，以及古今著作中进入一般语词范围和比较常见的百科词。所收单字以有文献例证为限。条目按“以字带词”的原则，将多字条目列于单字条目之下。单字条目按200个部首归部。字体方面，由于本书的历史性质，故繁体字和简化字并用，正体字和异体字并用。注音方面，是在字头下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现代音，用反切标注古音（包括中古音与近古音，以中古音为主），并在《广韵》、《集韵》的反切后依次列声调、韵部与声类。本词典的释义，着重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全面阐述，力求义项完备，释义确切，文字简练，层次清楚，首列本义，后列引申义、假借义。所用例证（除少量现代通行语作的例证外）一般都标明时代、作者、书名、篇名或卷次章节，并按时代顺序排列。《汉语大词典》是对汉语词汇第一次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总结，是我国辞书史上的里程碑。该词典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未能给每个条目（语词）注音，二是所收近代汉语语词遗漏较多，三是检索系统不全。此外，有些词的释义有误，有些词的义项不全，各卷之间的照应也还不够。

（邓宗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李荣主编，自1991年起至1998年止，已完成各地分卷本41种，共2200万字，规模空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在近年内将分卷本改编成三卷综合本。

分卷本以单个方言为单位，每个方言一卷，按方言定书名，如《广州方言词典》、《上海方言词典》等。41种方言，包括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

宁、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武汉、成都、贵阳、柳州、南京、扬州、苏州、上海、崇明、丹阳、宁波、杭州、金华、温州、长沙、娄底、南昌、黎川、萍乡、梅县、于都、广州、东莞、厦门、雷州、海口、福州、建瓯、南宁（平话）。

各分卷本中，方言词汇按方言韵母、声母、声调的次序排列，用国际音标注音，分义项说明词义，并附该词的方言用例。词典正文前有引论，简要介绍该方言声韵调、音节表、方言特点和方言内部分歧，并列出词典凡例。正文后附有方言词语的义类索引和词目的笔画索引，以备查检。词典体例完整严谨，便于读者使用，是此前绝大多数同类著作没有能完全做到的。

本词典具有下列优点：一、方言覆盖面广。所选方言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虽然选点还有不够平衡处，个别地区还未能编写收入（如徽州地区和北京地区），但仍大致反映了现代汉语各大方言和重要次方言的词汇情况。二、内容丰富。每一个分卷本所收的词语都在七八千条以上，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内容。所收除词语外，例证中还引用了许多歌谣、谚语和歇后语，涉及方言文化的多个方面。释义除词语外，还兼及语法，所收虚词都有用法说明。三、材料可靠。编写者大多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而且都是当地人或在当地长期生活，能说当地方言，因而能做到发掘广面且深，释义准确细致。总起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收词丰富，总体质量高，又具有数量优势。它的出版，反映了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新的巨大进展。

（王福堂）

读音统一会（Committee for Standardizing Pronunciation）

辛亥革命后，以审定“国音”、确定拼写“国音”的字母和研究推行“国音”办法为主要议题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性工作会议。1912年民国成立，召开了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会议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议依据（清）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把经过修改的章太炎的纽韵文作为拼写国音的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俗称“老国音”），还审定了600多个俚俗及外来学术新字的国音。

会议议定了推行国音的七条办法，包括：由教育部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核定公布注音字母，把初等小学“国文”课改作“国语”课，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学必须用国音授课，小学课本、通告等一律标注国音等。

会议一直开到5月22日。会后，因袁世凯篡权，政局变动，会议议决的各项议案被长期悬置。

（费锦昌）

国语统一筹备会（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ing National Language）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教育部附设的推行“国语”的机构。北洋政府时期称“国语统一筹备会”，国民党政府时期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呼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9年4月21日成立推行“国语”的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会长张一麐，共有会员172名。筹备会下设“汉字省体委员会”、“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审音委员会”、“国语辞典委员会”和“国语辞典编纂处”等机构。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1928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吴敬恒为主席，钱玄同、黎锦熙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蔡元培、张一麐、李步青、胡适、刘复等 31 人为委员。这两个委员会先后做的工作主要有：（1）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和国音字母讲习所；（2）修订注音字母方案；（3）修改国音标准；（4）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5）规定注音字母单用和“词类连书”办法；（6）编辑出版《国音常用字汇》；（7）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进行大规模的辞典编辑工作；（8）出版《国语月刊》、《国语周刊》、《国语旬刊》等研究和宣传国语的刊物；（9）调查全国语言分布状况；（10）调查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国语教学状况，等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工作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其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继续出版注音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这一机构不复存在，其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一部分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部分并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费锦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28 年在广州成立。1929 年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任所长，下分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任组主任。1934 年因华北政局动荡不安，迁至南京鸡鸣寺路。语言学组在赵元任的领导下以调查汉语方言和建立语音实验室为工作重点，到 1937 年已经调查了广东、广西以及安徽、江西等地约 200 处方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研究工作停顿，经长沙、昆明于 1940 年内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始恢复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迁回南京原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汉语历史和现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1949 年南京解放前夕随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1997 年将原语言学组分出，成立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语言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原所名不作改动。历史语言研究所自 1928 年成立后逐年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每年四分册，现已出版至 70 本，此外还出版专刊和单刊多种，都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其中有关语言学的论文和专著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左　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于 1950 年 6 月，是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所之一。首任所长罗常培。1955 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所属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1977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是院属的研究所。

语言所的研究领域在 1956 年以前兼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1956 年，语言所原第四组独立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62 年与民族所合并为民族所），语言所始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

目前以研究汉语的历史和现状为主（包括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同时研究并介绍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编纂汉语辞书；开展语音分析、合成与识别的研究；开展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应地设置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应用语言学、国外语言

学等研究室，以及辞典编辑室、语音实验室。出版的期刊有《中国语文》、《方言》、《当代语言学》(原《国外语言学》)。

挂靠在语言所的学术团体有中国语言学会（出版《中国语言学报》）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语言研究所先后汇集了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如曾任学部委员的一级研究员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他们和所内其他优秀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语言所历任所长是：罗常培，吕叔湘，李荣，刘坚，江蓝生。现任所长沈家煊。

（刘　坚）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for Language Reform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机构，直属国务院。195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五人为常务委员，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准备工作。同年 12 月 16 日正式成立。

1980 年 3 月，由董纯才任主任委员，1984 年 8 月，又改由刘导生任主任委员，出版期刊《文字改革》，1986 年后改名为《语文建设》。1985 年 12 月，为了加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务院决定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下设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出版期刊《语言文字应用》。

从 1954 年到 1984 年这 30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 10 年左右。第一阶段做的工作最多：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 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6 年），编印《简化字总表》（1964 年），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4），用常用字代替生僻地名字；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与有关单位联合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配合语言研究所成立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56 年）工作，发表《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发挥“汉语拼音方案”在识字教学、推广普通话和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帮助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等方面的作用。第二阶段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逐步恢复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主要工作有：发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法”（1974 年），发布“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1977 年），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 年），利用计算机进行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分析统计；修订《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促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地名和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发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4 年）；利用汉语拼音进行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等。

（费锦昌）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Committee for Pronunciation Normalization）

负责审订普通话常用词汇读音的非常设性学术机构。根据国务院有关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普通话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研究、宣传。1956 年 1 月，语言研究所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

会，开始审订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1957年到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并于1963年辑录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公布出版，受到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广泛重视，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

过了20来年，随着语言的发展，《初稿》中原审的一些词语的读音需要重新审定；同时，作为语音规范化的标准，《初稿》也亟需定稿。1982年3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重建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初稿》进行修订工作。1982年6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条例（草案）》、《审音范围和审音原则（草案）》和《审音工作计划大纲（草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进行修订工作。1985年12月2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出《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正式发布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此表为准。

（黄锦昌）

中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中国语言科学工作者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80年10月21日，宗旨是团结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努力发展和繁荣我国语言科学，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学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会机构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秘书长一人、常务理事若干人组成。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会员举行会议或通讯选举产生。理事和常务理事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至多连任一次。第一届名誉会长王力、会长吕叔湘，第二届会长季羡林，第三届会长朱德熙，第四届会长刘坚，第五届会长侯精一。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自1981年至1995年共举办了八次，先后在成都、合肥、昆明、广州、杭州、厦门、北京和贵阳举行。学会刊物《中国语言学报》（学术专刊，16开本）已出版八期，《中国语言学会会刊》（资料专刊，大32开本）已出版两期。学会常设机构：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邮政编码：100732。

（蔡文兰）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原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11月16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1) 制定语言文字法规和各项规范、标准以及管理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进行检查、监督；(2) 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组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其应用范围，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组织指导培训普通话师资和地方语言文字工作人员；(3) 负责中文信息处理中语言文字标准的审定工作，对信息处理中语言文字标准应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4) 拟订语言文字研究和应用的中长期计划，组织和指导语言文字

应用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的研究；（5）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和人名、地名审音定字工作；（6）指导和推动地方语言文字工作。先后由刘导生、陈原、柳斌、许嘉璐任主任。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 10 多年的工作重点是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水平，近期特别关注开展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汉字应用基础研究、规范标准制定和基础工程建设。

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 推广普通话范围更加广泛，由重点在南方方言区推行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由重点抓学校发展到既抓学校又抓社会；由重点纠正语音发展到对词汇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并且制定了“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使普通话水平有了比较客观的可以操作的衡量尺度。1985 年 12 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作为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以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读音、标音的标准。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推广普通话的文件，1994 年 10 月起陆续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以加快普及进程，不断提高全社会普通话水平。

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汉字规范化 巩固汉字简化的成果，提高全社会应用汉字的规范化水平。加强了对现行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的研究整理。1986 年 10 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1988 年 1 月和 3 月先后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 字）、“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 字），1997 年 4 月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1997 年 12 月发布“信息处理用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还组织起草、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为全社会的文字应用提供了依据。针对一个时期曾经出现的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大力宣传推行汉字的规范标准，贯彻堵源截流、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积极、稳妥、逐步地开展社会用字管理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重点抓了出版物用字、影视屏幕用字、计算机用字、党政机关和学校用字的规范，同时对其他公共场所用字混乱状况进行了治理。

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其使用范围 重点放在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应用中的问题和消除乱拼乱写现象。1988 年 7 月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作为文教、出版、信息处理以及其他部门拼写现代汉语的规范。还发布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1987 年 4 月）、“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1992 年 7 月）以及“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1987 年 12 月）等。

除以上工作外，近年来特别重视开展信息处理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组织进行汉字输入输出技术中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评审和鉴定工作。加快了基础工程建设，建成了现代汉语核心语料库；加强了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研究的组织引导，在课题立项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语言文字工作宏观管理机制也得到加强，初步形成了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各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组织协调，各部门各行业相互配合的分工负责、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语言文字工作宏观管理运行机制。语言文字工作的宏观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费锦昌）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于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期间，由世界各国各地区学者同仁共同倡议，并得到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章程》规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是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宗旨是"促进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加强世界各地区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增进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章程还规定每三年举办一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同时进行学会换届选举。在中国北京举办了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后，1999年8月在德国汉诺威市成功举行了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每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后都出版近百万字的论文选，迄今已出版了五部，第六部正在编印之中。

学会已先后成立了五届理事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被聘为学会名誉会长，朱德熙曾任两届会长，瑞典马悦然、美国王士元、中国周有光、张志公、林焘等曾被聘为学会顾问。1999年8月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现任会长为吕必松（中国），副会长柯彼德（德国）、佟秉正（英国）、白乐桑（法国）、陈曼丽（美国），秘书长张德鑫（中国）。

学会有学术会刊《世界汉语教学》杂志及信息季刊《会员通讯》。截至1999年6月30日，有会员933人，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

（张德鑫）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简称《史语所集刊》，是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学术刊物，以发表该所成员的论文为主，兼收外来稿件。1928年在广州创刊，后曾迁至北平（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每年出版一"本"，每"本"最多可分为四"分"。另出版专刊或集刊外编。由于所址多次迁移，加之时局动荡等各方面因素，往往不能按时出版。至1949年出至第21本（其中第14本曾改称《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史语所集刊》主要刊载有关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的学术论文，倡导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材料的扩充，目的在于使历史学和语言学能够"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第一册）。在语言学方面，由于受到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对汉语方言、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以及对传统音韵学的整理研究，以求建立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同时也兼及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对中国语言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还重视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些翻译论文。《史语所集刊》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刊物，它的创办推动了我国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化，对这两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以后《史语所集刊》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仍为一年出版一本，每本最多分为四分。

（赵　彤）

《中国语文》（《Zhongguo　Yuwen》）

语言学专业学术刊物，双月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

版，向国内外发行。1952年7月20日在北京创刊，1956年以前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后由语言研究所独立承担。1952年7月至1962年12月为月刊，1966年6月起停刊，1978年5月复刊。

《中国语文》以刊载汉语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为主，兼及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以及语言学与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以务实与创新相结合为办刊宗旨，鼓励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提倡不同学术流派间的探讨与交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发扬汉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把握国际语言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反映汉语研究研究的高水平成果。《中国语文》还组织汉语研究分支学科及专题研究学术讨论会，已经出版"《中国语文》丛书"40余种。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主办的语言学专业学术刊物，《中国语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方　梅）

《文字改革》（*Language Reform*）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是指导和研讨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刊物。原名《拼音》，1956年8月创刊，宗旨是研究、实验汉语拼音文字。1957年改名为《文字改革》，扩大刊物的内容范围，进行有关文字改革各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包括汉字的整理、简化，普通话的审音、推广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应用等。刊期曾为月刊、半月刊、双月刊。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1982年7月复刊。1986年随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刊物改名为《语文建设》。

《文字改革》是我国一份重要的语文刊物，它在推进汉字改革工作，落实"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研究、讨论跟汉字改革有关的语言文字问题，普及语文知识，帮助语文教学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和复刊以后的80年代前半期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费锦昌）

《语言学论丛》（*Essays on Linguistics*）

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汉语专业各教研室联合编辑的不定期出版的语言学刊物，1957年创刊，至1999年出版到第21辑。

《语言学论丛》除少数特约稿件外，基本上不采用外稿，作为高校编辑的语言学刊物，《语言学论丛》以促进本系教学研究和活跃学界空气为目的，依托本系的教学和研究力量，刊登各类研究论文、读书札记、翻译和学术专题介绍，其中很多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言学论丛》还注重推介后学，选用一些立意新颖严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论文。

（方　希）

《国外语言学》（*Linguistics Abroad*）

《国外语言学》的前身是《语言学资料》和《语言学动态》。《语言学资料》于1961年创刊，1966年停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共出了32期，该刊主要刊登译文。1978年《语言学动态》出版，该刊是《语言学资料》的继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外语言学编辑部编，1979年停刊，共出12期。1980年，《语言学动态》改为《国外语言学》，内容开始由单纯"论文译介"向综述、专题介绍等多方面发展。栏目有：论文译介、书刊译介、专题介绍与研究、中国语文研究、人物介绍、研究机构、会议报导和资

料。随着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者不满足于单纯的介绍，因此《国外语言学》从1998年开始改为《当代语言学》，内容准备转为主要刊登研究性论文，1998年试刊，1999年正式出版。

（徐赳赳）

《方言》（*Dialect*）

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方言编辑部编辑。登载有关汉语方言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各种文章，包括专题论文、调查报告、调查表格，以及书评书目、资料介绍、情况报道。创刊于1979，办刊宗旨是：展示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引导汉语方言的学术发展方向，发现和培养方言研究人才。已出版的80期，共发表方言语音研究的文章约180篇，方言词汇研究、方言本字考、方言词典的文章约91篇，方言语法的文章约125篇，方言地图、方言分区的文章约60篇，方言文献、方言比较、方言综述、方言理论和方法、缅怀辞世的方言学家的文章约32篇。这些文章基本上可以展示出20年中汉语方言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基本成就。就各类文章的比例而言，研究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文章数量大致持平，避免了过去方言研究重语音、轻词汇和语法的问题。本杂志对有潜力的年轻学者重点扶持，许多方言学者就是从《方言》杂志开始发表文章，从而进入方言研究领域的。对平话、晋语等新方言区，湘南及粤北土话等方言特点突出而且过去研究较少的方言也适当扶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发表调查研究这类方言的文章。本杂志对方言语料的准确性把关较严，编辑风格也较为严谨规范，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

（李　蓝）

《语言教学与研究》（*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季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主办。既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报，又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1979年9月创刊。从1992年起人选为中国语言学/汉语类和常用外国语类中文核心期刊。

《语言教学与研究》着重发表汉语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内容有：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包括教材编写、水平考试研究，对港澳海外华人汉语教学研究，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研究（包括外语、儿童语言、残疾人语言等学习和教学研究）；语言与文化、汉语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包括汉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如新闻语言、外交语言、外贸语言、商务语言、法律语言和其他行业语言的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等等。

《语言教学与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学术期刊，对我国的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费锦昌）

《汉语学习》（双月刊）（*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延边大学主办。创刊于1980年，次年转为公开发行。自1984年起，《汉语学习》已经成为介绍国内外汉语学科研究新成果、提出现阶段汉语研究的新课题、交流国内外汉语新信息的现代汉语专业刊物。

《汉语学习》的编辑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不拘学

派，提倡争鸣，扶植新人"，追求清新活泼、雅俗共赏的刊物特色。18年来，《汉语学习》共出版105期，发表文章2000多篇，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语言学事业培养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汉语学习》自身也从边疆地区民族院校一个不知名的内部刊物成长为在海内外具有影响的语言学学术刊物之一。

（曹秀玲）

《语文研究》（《YuwenYanjiu》）

汉语言文字专业的学术性季刊，1980年创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发表的汉语言文字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涉及语言理论、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方言、文字、训诂，以及社会语言学、语言应用、中文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等各个方面，积极推动我国语言研究向着综合性、多向性方向发展。

《语文研究》的宗旨是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理论寓于语言事实的分析之中，而在语言事实的分析中又注意理论的运用和创新。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提倡在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方言之间、共时和历时之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以描写所考察对象的特点。

（靳　羽）

《语言研究》（华中）（《YuyanYanjiu》）

创刊于1981年，由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主办。半年刊。《语言研究》以中国境内各语言为研究对象，兼采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之长，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以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内容包括：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探索及新学说的评价；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的描写；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在语言研究中使用自然科学手段的理论和实践；语言的对比研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传统语言学；当前国内外重要语言学著作述评等。刊物要求所有的文章必须有新的观点或新的材料，并特别鼓励用新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的语言。

10余年来，该刊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几乎涉及语言学的所有领域，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许多论文一再被引用。论文作者包括国内绝大部分著名语言学家和海外许多从事中国语言研究的知名学者。

（汪　平）

《中国语言学报》（*Chinese Linguistics*）

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语言学学术性刊物，创刊于1982年4月，向国内外发行。主要选刊中国语言学会年会上报告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汉语共同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各主要方面，如语法、词汇、语音、文字、语言理论、语言调查和实验以及言语工程等边缘领域和应用领域的研究。

每期学报由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聘请3名编委组成《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负责论文的审定和编辑工作。学报现已出版8期，每期约30万字。1至6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7期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第8期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

（方　梅）

《语文建设》（《Yuwen　Jianshe》）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是指导和研讨我国语文工作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的前身是《文字改革》。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

任务。1986年起《文字改革》杂志改名为《语文建设》。

《语文建设》是带有机关刊物性质的综合性语文期刊。曾为双月刊，现为月刊。该刊宣传、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致力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以语文政策、语文规范和语文应用为中心内容，强调学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从1992年起入选为全国语言学/汉语类中文核心期刊。

（费锦昌）

《世界汉语教学》（*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季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刊。1987年第三季度创刊。1992年入选为我国语言学/汉语类中文核心期刊。

《世界汉语教学》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对外的具体代表，也是会长与秘书处常年工作的重心。本着指导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推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理想，全面、系统、迅速地反映跟汉语教学有关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经验，及时提供新的学术信息，努力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服务。对促进世界的汉语教学的发展和提高，对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这一新学科的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费锦昌）

《语言文字应用》（*Applied Linguistics*）

季刊。全国性语言文字应用学术刊物。1992年创刊。原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后改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报刊社主办。1996年入选全国语言学/汉语类中文核心期刊。

该刊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致力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集中发表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团结和发展国内研究队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促进语言文字应用学科的发展。集中发表语言文字应用领域如语言文字规划、语言文字规范、语言文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书评、资料等，近年来特别关注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工作。由于语言文字应用学科的地位日益重要，《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影响不断扩大。

（费锦昌）

条目汉语拼音索引

说明 一、本索引供读者按条目的汉语拼音查检条目。

二、条目标题按第一字的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并辅以汉字笔画、起笔笔形顺序排列。同音时按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按起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乙（折，包括亅𠃍𠃊㇛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按第二字，余类推。

B

白话文运动 …… 243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 299
《比较文法》 …… 289
《卜辞通纂》 …… 290

C

岑麒祥 …… 271
《昌黎方言志》 …… 307
陈梦家 …… 274
陈望道 …… 258
“词汇扩散”理论 …… 22
《词诠》 …… 285
《辞海》 …… 291
《辞通》 …… 291
《辞源》 …… 281

D

大众语运动 …… 245
等韵研究 …… 152
《等韵源流》 …… 305
丁声树 …… 273
董同龢 …… 275
董作宾 …… 263
《动词用法词典》 …… 319
读音统一会 …… 324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230

E

儿化韵研究 …… 40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 20
《尔雅》研究 …… 173

F

反训研究 …… 178
方光焘 …… 264
《方言》 …… 331
《方言》研究 …… 174

G

赣方言研究 …… 98
《高等国文法》 …… 286
高名凯 …… 273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 158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 180
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 228
古代专书词典编纂 …… 172
古代专书词汇研究 …… 171
古代专书语法研究 …… 199
古汉语词类研究 …… 195
古汉语句型研究 …… 197
古汉语虚词研究 …… 194
古文字学研究 …… 203
《古音说略》 …… 298
《古音系研究》 …… 291
官话研究 …… 95

《广韵声系》 ………………………… 298
郭沫若 ………………………… 260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327
《国外语言学》 ………………………… 330
《国文法草创》 ………………………… 282
《国文法之研究》 ………………………… 282
《国音常用字汇》 ………………………… 289
《国语辞典》 ………………………… 292
国语罗马字 ………………………… 119
国语统一筹备会 ………………………… 324
《国语学草创》 ………………………… 283
国语运动 ………………………… 244

H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 305
汉语词典编纂 ………………………… 54
汉语词汇规范研究 ………………………… 53
汉语词汇史研究 ………………………… 165
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 59
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 ………………………… 83
汉语词类研究 ………………………… 63
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研究 ………………………… 226
汉语词义研究 ………………………… 51
汉语辞格研究 ………………………… 129
《汉语大词典》 ………………………… 323
《汉语大字典》 ………………………… 322
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 ………………………… 85
《汉语的构词法》 ………………………… 304
汉语的话语分析 ………………………… 80
汉语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 ………………………… 76
《汉语方言词汇》 ………………………… 310
汉语方言分区研究 ………………………… 89
《汉语方言概要》 ………………………… 306
汉语方言普查 ………………………… 104
汉语方言研究 ………………………… 86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 92
《汉语方音字汇》 ………………………… 308
汉语复句研究 ………………………… 72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 79
汉语构词法研究 ………………………… 49
汉语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 200
汉语积极修辞研究 ………………………… 137
汉语简称和缩略语研究 ………………………… 55
汉语连读变调研究 ………………………… 39
汉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 ………………………… 234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 77
汉语拼音方案 ………………………… 122
汉语拼音正词法 ………………………… 124
汉语歧义研究 ………………………… 73
汉语轻音和重读研究 ………………………… 38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 ………………………… 80
《汉语史稿》 ………………………… 301
汉语外来词研究 ………………………… 57
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 ………………………… 85
汉语消极修辞研究 ………………………… 139
汉语新词新语研究 ………………………… 56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 ………………………… 133
汉语修辞研究 ………………………… 126
汉语虚词研究 ………………………… 71
《汉语学习》（双月刊） ………………………… 331
《汉语音韵史论文集》 ………………………… 319
汉语音韵学研究 ………………………… 141
汉语语调研究 ………………………… 41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发展 ………………………… 74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312
《汉语语法论》 ………………………… 299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 302
汉语语法史研究 ………………………… 187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 ………………………… 201
《汉语语法研究》 ………………………… 320
汉语语境研究 ………………………… 131
汉语语体风格研究 ………………………… 134
汉语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研究 ………………………… 43
汉语语音实验研究 ………………………… 36
汉语语音史研究 ………………………… 157
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 ………………………… 84
汉语字频和词频研究 ………………………… 224
汉字结构研究 ………………………… 109
汉字认知研究 ………………………… 24
汉字输入研究 ………………………… 116

汉字整理和汉字规范研究 …… 111
胡厚宣 …… 276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298
黄　侃 …… 256

J

《甲骨文合集》 …… 317
甲骨文研究 …… 207
《甲骨文字集释》 …… 310
《甲骨文字释林》 …… 313
蒋礼鸿 …… 278
节奏和韵律研究 …… 42
《金文编》《金文续编》 …… 285
金文研究 …… 211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 170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 192
《近代汉语指代词》 …… 318
近代音研究 …… 153
晋语研究 …… 103

K

客家方言研究 …… 100

L

拉丁化新文字 …… 121
劳乃宣 …… 251
黎锦熙 …… 257
李方桂 …… 268
理论语言学研究 …… 1
历史语言学研究 …… 6
《联绵字典》 …… 295
联绵字研究 …… 179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288
《临川音系》 …… 293
刘　复 …… 259
卢戆章 …… 252
陆志韦 …… 262
陆宗达 …… 273
吕叔湘 …… 272
罗常培 …… 265
罗振玉 …… 253

M

《马氏文通》研究 …… 202
《马王堆汉墓帛书》 …… 315
闽方言研究 …… 102
明清北音研究 …… 156

P

《普通话发音图谱》 …… 309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 326
普通话音位系统研究 …… 34
普通话语音规范研究 …… 32
《普通语音学纲要》 …… 304

Q

钱玄同 …… 257
《切韵》研究 …… 150
《切韵音系》 …… 303
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 216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 249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 250

R

容　庚 …… 262

S

商承祚 …… 270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7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 189
上古音研究 …… 144
《上古音研究》 …… 311
《上古音韵表稿》 …… 297
社会语言学研究 …… 10
沈兼士 …… 257
声训研究 …… 177
《诗词曲语词汇释》 …… 301
《十韵汇编》 …… 288
《实验语音学概要》 …… 320

《世界汉语教学》 …… 333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 329
《释名》研究 …… 176
双语研究 …… 25
《说文解字》研究 …… 175
《四声实验录》 …… 284
《宋元以来俗字谱》 …… 286

T

唐 兰 …… 267
《唐五代韵书集存》 …… 317
通假字研究 …… 179
同源词研究 …… 178
推广普通话 …… 248

W

王 力 …… 266
王 照 …… 252
王国维 …… 255
魏建功 …… 268
文法革新的讨论 …… 82
文化语言学研究 …… 11
《文字改革》 …… 330
文字改革和简化汉字 …… 113
文字学史研究 …… 217
吴方言研究 …… 96

X

《厦门音系》 …… 287
《现代汉语八百词》 …… 313
《现代汉语词典》 …… 312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 44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 323
现代汉语规范化 …… 245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 250
《现代汉语修辞学》 …… 309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 317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 30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59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314
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 227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 27
现代汉字研究 …… 105
《现代吴语的研究》 …… 285
湘方言研究 …… 98
心理语言学研究 …… 13
《新华字典》 …… 300
《新著国语文法》 …… 284
《修辞格》 …… 283
《修辞学发凡》 …… 287
训诂学研究 …… 163

Y

杨树达 …… 255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 290
音系学研究 …… 16
《殷虚卜辞综述》 …… 303
《殷虚书契考释》 …… 280
《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 …… 280
《殷周金文集成》 …… 318
应用语言学研究 …… 218
于省吾 …… 264
俞 敏 …… 278
《语法和语法教学》 …… 302
《语法讲义》 …… 316
《语法修辞讲话》 …… 300
《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八) …… 322
《语文建设》 …… 332
《语文研究》 …… 332
《语言教学与研究》 …… 331
《语言论》 …… 308
《语言文字应用》 …… 333
《语言学论丛》 …… 330
《语言研究》(华中) …… 332
语义学研究 …… 15
《语音探索集稿》 …… 321
语用学研究 …… 19
袁家骅 …… 271
粤方言研究 …… 99

Z

战国文字研究 …………………………………… 214
张世禄 ………………………………………………… 270
张志公 ………………………………………………… 279
章太炎 ………………………………………………… 254
赵元任 ………………………………………………… 260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8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 191
中古音研究 ………………………………………… 147
《中国古代语法》 ………………………………… 306
《中国话的文法》 ………………………………… 31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 2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325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 292
《中国文法论》 …………………………………… 294
《中国文法要略》 ………………………………… 294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 326
《中国现代语法》 ………………………………… 295
《中国语法理论》 ………………………………… 296
《中国语文》 ……………………………………… 329
中国语文现代化 …………………………………… 235
《中国语言地图集》 ……………………………… 321
《中国语言学报》 ………………………………… 332
中国语言学会 ……………………………………… 327
《中华大字典》 …………………………………… 28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32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29
《中原音韵》研究 ………………………………… 155
周法高 ………………………………………………… 277
周祖谟 ………………………………………………… 277
朱德熙 ………………………………………………… 279
注音字母 …………………………………………… 117
字量统计研究 ……………………………………… 114
自然语言理解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 222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说明　一、本索引供读者按条目的汉字笔画查检条目。

二、条目标题按第一字的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按起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乙（折，包括亅𠃌乚𡿨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依次按后面各字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顺序排列。

二画

《十韵汇编》 …… 288
丁声树 …… 273
《卜辞通纂》 …… 290
儿化韵研究 …… 40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 20

二画

于省吾 …… 264
大众语运动 …… 245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7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 189
上古音研究 …… 144
《上古音研究》 …… 311
《上古音韵表稿》 …… 297
《广韵声系》 …… 298
《马王堆汉墓帛书》 …… 315
《马氏文通》研究 …… 202

四画

《比较文法》 …… 289
《切韵》研究 …… 150
《切韵音系》 …… 303
王　力 …… 266
王　照 …… 252
王国维 …… 255
历史语言学研究 …… 6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 168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 191
中古音研究 …… 14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32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29
《中华大字典》 …… 28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 236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 326
《中国文法论》 …… 294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 292
《中国文法要略》 …… 294
《中国古代语法》 …… 3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325
《中国现代语法》 …… 295
《中国话的文法》 …… 311
《中国语文》 …… 329
中国语文现代化 …… 235
《中国语言地图集》 …… 321
中国语言学会 …… 327
《中国语言学报》 …… 332
《中国语法理论》 …… 296
《中原音韵》研究 …… 155
反训研究 …… 178
文化语言学研究 …… 11
《文字改革》 …… 330
文字改革和简化汉字 …… 113
文字学史研究 …… 217
文法革新的讨论 …… 82
方光焘 …… 264
《方言》 …… 331
《方言》研究 …… 174

心理语言学研究 …… 13
双语研究 …… 25

五画

节奏和韵律研究 …… 42
古文字学研究 …… 203
古代专书词汇研究 …… 171
古代专书词典编纂 …… 172
古代专书语法研究 …… 199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 158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 180
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 228
古汉语句型研究 …… 197
古汉语词类研究 …… 195
古汉语虚词研究 …… 194
《古音系研究》 …… 291
《古音说略》 …… 298
《世界汉语教学》 …… 333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 329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 299
卢戆章 …… 252
《甲骨文合集》 …… 317
《甲骨文字集释》 …… 310
《甲骨文字释林》 …… 313
甲骨文研究 …… 207
《四声实验录》 …… 284
《尔雅》研究 …… 173
白话文运动 …… 243
训诂学研究 …… 163
汉字认知研究 …… 24
汉字结构研究 …… 109
汉字输入研究 …… 116
汉字整理和汉字规范研究 …… 111
《汉语大字典》 …… 322
《汉语大词典》 …… 323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 …… 80
汉语方言分区研究 …… 89
《汉语方言词汇》 …… 310
汉语方言研究 …… 86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 92
汉语方言普查 …… 104
《汉语方言概要》 …… 306
《汉语方音字汇》 …… 308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 79
汉语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 200
《汉语史稿》 …… 301
汉语外来词研究 …… 57
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 …… 84
汉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 …… 234
汉语字频和词频研究 …… 224
汉语连读变调研究 …… 39
汉语词义研究 …… 51
汉语词汇史研究 …… 165
汉语词汇规范研究 …… 53
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 59
汉语词典编纂 …… 54
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研究 …… 226
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 …… 83
汉语词类研究 …… 65
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 …… 85
汉语构词法研究 …… 49
汉语歧义研究 …… 73
《汉语的构词法》 …… 304
汉语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 …… 76
汉语的话语分析 …… 80
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 …… 85
《汉语学习》(双月刊) …… 331
汉语拼音方案 …… 122
汉语拼音正词法 …… 124
汉语轻音和重读研究 …… 38
汉语复句研究 …… 72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 …… 133
汉语修辞研究 …… 126
《汉语音韵史论文集》 …… 319
汉语音韵学研究 …… 141
汉语语体风格研究 …… 134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发展 …… 74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312
汉语语法史研究 …… 187
《汉语语法论》 …… 299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 302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 ……………………………… 201
《汉语语法研究》 ……………………………… 320
汉语语音史研究 ………………………………… 157
汉语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研究 ………………… 43
汉语语音实验研究 ……………………………… 36
汉语语调研究 …………………………………… 41
汉语语境研究 …………………………………… 131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 77
汉语积极修辞研究 ……………………………… 137
汉语消极修辞研究 ……………………………… 139
汉语虚词研究 …………………………………… 71
汉语辞格研究 …………………………………… 129
汉语简称和缩略语研究 ………………………… 55
汉语新词新语研究 ……………………………… 56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 305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230

六画

《动词用法词典》 ……………………………… 319
吕叔湘 …………………………………………… 272
同源词研究 ……………………………………… 178
朱德熙 …………………………………………… 279
自然语言理解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 222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 249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 250
刘　复 …………………………………………… 259
字量统计研究 …………………………………… 114

七画

杨树达 …………………………………………… 255
声训研究 ………………………………………… 177
劳乃宣 …………………………………………… 251
李方桂 …………………………………………… 268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288
吴方言研究 ……………………………………… 96
岑麒祥 …………………………………………… 271
《国文法之研究》 ……………………………… 282
《国文法草创》 ………………………………… 282
《国外语言学》 ………………………………… 330
《国音常用字汇》 ……………………………… 289
国语运动 ………………………………………… 244
国语罗马字 ……………………………………… 119
《国语学草创》 ………………………………… 283
国语统一筹备会 ………………………………… 324
《国语辞典》 …………………………………… 29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327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 170
《近代汉语指代词》 …………………………… 318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 192
近代音研究 ……………………………………… 153
应用语言学研究 ………………………………… 218
沈兼士 …………………………………………… 257
《宋元以来俗字谱》 …………………………… 286
"词汇扩散"理论 ………………………………… 22
《词诠》 ………………………………………… 285
社会语言学研究 ………………………………… 10
张世禄 …………………………………………… 270
张志公 …………………………………………… 279
陆志韦 …………………………………………… 262
陆宗达 …………………………………………… 273
陈梦家 …………………………………………… 274
陈望道 …………………………………………… 258

八画

现代汉字研究 …………………………………… 105
《现代汉语八百词》 …………………………… 313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 323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 44
《现代汉语词典》 ……………………………… 312
现代汉语规范化 ………………………………… 24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 250
《现代汉语修辞学》 …………………………… 309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 30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59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314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 27
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 …………………………… 227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 317
《现代吴语的研究》 …………………………… 285

拉丁化新文字 …… 121
明清北音研究 …… 156
《昌黎方言志》 …… 307
罗振玉 …… 253
罗常培 …… 265
金文研究 …… 211
《金文编》《金文续编》 …… 285
周法高 …… 277
周祖谟 …… 277
注音字母 …… 117
官话研究 …… 95
《实验语音学概要》 …… 320
《诗词曲语词汇释》 …… 301

九画

胡厚宣 …… 276
赵元任 …… 260
战国文字研究 …… 214
《临川音系》 …… 293
《修辞学发凡》 …… 287
《修辞格》 …… 283
俞　敏 …… 278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 290
音系学研究 …… 16
闽方言研究 …… 102
客家方言研究 …… 100
语义学研究 …… 15
《语文建设》 …… 332
《语文研究》 …… 332
语用学研究 …… 19
《语言文字应用》 …… 333
《语言论》 …… 308
《语言学论丛》 …… 330
《语言研究》（华中） …… 332
《语言教学与研究》 …… 331
《语法讲义》 …… 316
《语法和语法教学》 …… 302
《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八） …… 322
《语法修辞讲话》 …… 300
《语音探索集稿》 …… 321
《说文解字》研究 …… 175

十画

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 216
袁家骅 …… 271
晋语研究 …… 103
钱玄同 …… 257
《殷周金文集成》 …… 318
《殷虚卜辞综述》 …… 303
《殷虚书契考释》 …… 280
《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 …… 280
郭沫若 …… 260
高名凯 …… 275
《高等国文法》 …… 286
唐　兰 …… 267
《唐五代韵书集存》 …… 317
容　庚 …… 262
读音统一会 …… 324
通假字研究 …… 179

十一画

理论语言学研究 …… 1
黄　侃 …… 256
推广普通话 …… 248
商承祚 …… 270
章太炎 …… 254

十二画

《联绵字典》 …… 295
联绵字研究 …… 179
董同龢 …… 275
董作宾 …… 263
蒋礼鸿 …… 278
《厦门音系》 …… 287
等韵研究 …… 152
《等韵源流》 …… 305
粤方言研究 …… 99
《释名》研究 …… 176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298
湘方言研究 …… 98

《普通话发音图谱》 …… 309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 326
普通话音位系统研究 …… 34
普通话语音规范研究 …… 32
《普通语音学纲要》 …… 304

十三画

《辞海》 …… 291
《辞通》 …… 291
《辞源》 …… 281
《新华字典》 …… 300
《新著国语文法》 …… 284

十五画

黎锦熙 …… 257

十七画

魏建功 …… 268

二十一画

赣方言研究 …… 98

Keyword Index of Entry

（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

说明 一、本索引是本卷部分条目的外文标题。

二、本索引按条目外文标题的拉丁字母顺序排列。中国人名的条目标题，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其他非拉丁文字国家的人名按各国法定的或惯用的拉丁字母拼法。

A

A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 29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 311

Active Rhetoric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37

Ambiguitie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73

An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and Rhetoric …… 300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180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f ……… 11

Applied Linguistics ……………………………… 333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of ……………… 218

Archaic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189

Automatic Tagging of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Words and Segmentation of Word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226

B

《Bijiao Wenfa》 ………………………………… 289

Bilingualism, Studies of ………………………… 25

《Buci Tongzuan》 ………………………………… 290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 329

C

Cen Qixiang, 1903～1989 ……………………… 271

《Changli Fangyanzhi》 ………………………… 307

Chen Mengjia, 1911～1966 …………………… 274

Chen Wangdao, 1891～1977 ………………… 258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of ……… 20

Chinese Abbreviation, Studies of …………… 55

Chinese Complex Sentenee, Studies of ……… 72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of ………………… 86

Chinese Empty Words, Studies of …………… 71

Chinese Etymology, Studies of ……………… 163

Chinese Experimental Phonetics …………… 36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Studies of …… 141

Chinese Intonation, Studies of ……………… 41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Modernization ……………………………………………… 235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 331

Chinese Lexical Meaning, Studies of ……… 51

Chinese Lexicography ……………………………… 54

Chinese Linguistics ……………………………… 332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Studies of …… 236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 122

Chinese Pinyin Orthography ………………… 124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of ………………… 126

Chinese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 Studies of ……………………………………… 43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 333

Chinese Word-formation, Studies of ………… 49

《Ciquan》 ………………………………………… 285

《Citong》 ………………………………………… 291

Cognitive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 80

Cogni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 24

Committee for Language Reform of China …… 326

Committee for Pronunciation Normalization …… ……………………………………………… 326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ing Pronunciation … 324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mmar of Old and Modern Chinese …………………………… 200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of Ancient Chinese …
……………………………………………… 228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 227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
……………………………………………… 105
Conven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Working
Conference Forum ………………………… 250

D

《Dengyun Yuanliu》 ………………………… 305
Dengyun, Studies of ………………………… 152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ology in Chinese
Grammatical Analysis …………………… 74
Dialect ……………………………………… 331
Dictionary Compiling of the Old Chinese
Monographs ……………………………… 172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
……………………………………………… 323
Ding Shengshu, 1909～1989 ………………… 273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ese ……………… 80
Discussions on the Methodology of Sentence
Analysis in Chinese ……………………… 85
Discussions on the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 82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 83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imple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Chinese ………… 85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Chinese …………………… 84
Division of Chinese Dialectal Districts, Studies of
……………………………………………… 89
Dong Tonghe, 1911～1963 …………………… 275
Dong Zuobin, 1895～1963 …………………… 263
《Dongciyongfa Cidian》 ……………………… 319

E

Empty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
……………………………………………… 194
"Erya", Studies of ………………………… 173
Essays on Linguistics ……………………… 330
Essentials of Rhetoric …………………… 287

F

Fang Guangtao, 1898～1964 ………………… 264
Fanxun, Studies of ………………………… 178
Figure of Speech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29
Figures of Speech ………………………… 283
Frequencies of the Occurrenc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224
Functional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 79

G

Gan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 98
Gao Mingkai, 1911～1965 …………………… 275
《Gaodeng Guowenfa》 ……………………… 286
General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 104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Monographs,
Studies of ……………………………… 199
Grammar of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of …… 92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
……………………………………………… 59
Graphology of Old Chinese, Studies of ……… 203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 323
《Guangyun Shengxi》 ……………………… 298
Guo Moruo, 1892～1978 …………………… 260
《Guowenfa Caochuang》 …………………… 282
《Guowenfa Zhi Yanjiu》 …………………… 282
《Guoyuxue Caochuang》 …………………… 283
《Guyin Shuolue》 ………………………… 298
《Guyinxi Yanjiu》 ………………………… 291

H

《Hanweijinnanbeichao Yunbu Yanbian Yanjiu》 …
……………………………………………… 305
《Hanyu Dazidian》 ………………………… 322
《Hanyu Fangyan Cihui》 …………………… 310
《Hanyu Fangyan Gaiyao》 ………………… 306

《Hanyu Fangyin Zihui》 ………………………… 308
《Hanyu Yinyunshi Lunwenji》 ………………… 319
《Hanyu Yufa Fenxi Wenti》 …………………… 312
《Hanyu Yufa Lunwenji》 ……………………… 302
《Hanyu Yufa Yanjiu》 ………………………… 320
《Hanyu Yufalun》 ……………………………… 299
《Hanyushi Gao》 ……………………………… 301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f ……………… 6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187
History of Chinese Graphology, Studies of … 217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logy, Studies of …… 59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Studies of …… 157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of …… 133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201
Hu Houxuan, 1911～1995 …………………… 276
Huang Kan, 1886～1935 ……………………… 256

I

Inpu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 116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325
Institute of Linguist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325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329

J

《Jiagu Wenzi Jishi》 …………………………… 310
《Jiaguwen Heji》 ……………………………… 317
Jiaguwen, Studies of ………………………… 207
《Jiaguwenzi Shilin》 ………………………… 313
Jianbo Wenzi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221 B.C. －220 A.D.), Studies of …………… 216
Jiang Lihong, 1916～1995 …………………… 278
Jin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03
《Jindai Hanyu Zhidaici》 ……………………… 318
《Jinwen Bian》《Jinwen Xubian》 …………… 285
Jinwen, Studies of …………………………… 211

K

Kejia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00
Kuoyu Dictionary …………………………………… 292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 321
Language Reform ………………………………… 330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 331
Lao Naixuan, 1843～1921 …………………… 251
Latinized New Writing ………………………… 121
Lecture Notes of Grammar ……………………… 316
Lexical Normal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of …… …………………………………………………… 53
Lexical Stu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 44
Lexical Study on Old Chinese Monographs … 171
Lexicological History in Chinese, Studies of …… …………………………………………………… 165
Lexic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Studies of … 167
Lexicology in Middle Chinese, Studies of …… 168
Lexicology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of … 170
Lexic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 158
Li Fanggui, 1902～1987 ……………………… 268
Li Jinxi, 1890～1978 ………………………… 257
《Liangzhou Jinwenci Daxi Tulu Kaoshi》 …… 288
《Lianmian Zidian》 …………………………… 295
Lianmianci (Disyllbic Roots), Studies of …… 179
Linguistic Context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31
Linguistic Rhythm and Prosody, Studies of … 42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 327
Linguistics Abroad …………………………… 330
Liu Fu, 1891～1934 ………………………… 259
Loan Word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57
Lu Shuxiang, 1904～1998 …………………… 272
Lu Zhiwei, 1894～1970 ……………………… 262
Lu Zhuangzhang, 1854～1928 ……………… 252
Lu Zongda, 1905～1988 ……………………… 273
Luo Changpei, 1899～1958 …………………… 265
Luo Zhenyu, 1866～1940 …………………… 253

M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of ………………… 95

"Mashi Wentong", Studies of …………………… 202
《Mawangdui Hanmu Boshu》 …………………… 315
Middle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191
Min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02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of ……… 192
Modern Chinese Rhetoric ……………………… 309

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form …… 249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 244
National Language Romanization …………… 119
National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of Common Chinese Characters …………………………… 289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udies of ………… 222
New Coined Expressions and Word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56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 290
Normal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 ……………………………………………… 246
Normalization of the Speech Sounds in Putonghua, Studies of ……………………… 32
Norm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Studies of ………………………… 234
Northrn Speech Soun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udies of ……………………… 156

O

On Language …………………………………… 308
Oret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of …………………… 1
Origin of Words and Phrases ………………… 281

P

Parts of Speech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 ……………………………………………… 195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Studies of ……… 65
Passive Rhetoric in Chinese, Studies of ……… 139
Phonetic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 27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Linchuan Dialect …… ……………………………………………… 293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 ……………………………………………… 287
Phonological System in Putonghua, Studies of … ……………………………………………… 34
Phon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Studies of …… 144
Phonology in Middle Chinese, Studies of …… 147
Phonology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of …… 153
Phonology, Studies of ………………………… 16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 245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Common Speech … 248
Pragmatics, Studies of ………………………… 19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ing National Language ………………………… 324
Psycho-linguistics, Studies of ………………… 13
《Putong Yuyinxue Gangyao》 ………………… 304
《Putonghua Fayin Tupu》 …………………… 309

Q

Qian Xuantong, 1887～1939 ………………… 257
"Qie Yun", Studies of ………………………… 150
《Qieyun Yinxi》 ……………………………… 303

R

Reform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 113
Regular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 111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bei …… ……………………………………………… 298
Research in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 ……………………………………………… 314
Researches & Explan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 ……………………………………………… 322
Retroflex Suffix—er, Studies of ……………… 40
Rong Geng, 1894～1983 ……………………… 262

S

Semantics, Studies of ………………………… 15

Sentence Patterns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of 197
Shang Chengzuo, 1902～1991 270
《Shanggu Yinyunbiao Gao》 297
《Shangguyin Yanjiu》 311
Shen Jianshi, 1887～1947 257
Shengxun, Studies of 177
《Shiciqu Yuci Huishi》 301
"Shiming", Studies of 176
《Shiyan Yuyinxue Gaiyao》 320
《Shiyun Huibian》 288
"Shuowen Jiezi", Studies of 175
《Sisheng Shiyan Lu》 284
Socio linguistics, Studies of 10
《Songyuan Yilai Suzipu》 286
Sound—notating Alphabet 117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27
Stat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114
Stress Pattern in Chinese, Studies of 38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109
Studies on "Fang-yan", Studies of 174
Stylistics in Chinese, Studies of 134
Symposium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250

T

Tang Lan, 1901～1979 267
《Tangwudai Yunshu Jicun》 317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of 230
The Writing in Zhanguo Period(475—221 B.C.), Studies of 214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22
Tone Sandhi in Chinese, Studies of 39
Tongjiazi, Studies of 179
Tongyuanci(Word Derived from the Same Root), Studies of 178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in Chinese, Studies of 76

V

Valent Gramma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77
Vernacular Movement 243
Vocabulary of Monosyllabic Words in Pekingese 299

W

Wan Zhao, 1859～1933 252
Wang Guowei, 1877～1927 255
Wang Li, 1900～1986 266
Wei Jiangong, 1901～1980 268
Word—formation of Chinese 304
Wu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96

X

《Xiandai Hanyu Babaici》 313
《Xiandai Hanyu Cidian》 312
《Xiandai Hanyu Xuci Lishi》 317
《Xiandai Hanyu Yufa Jianghua》 307
《Xiandai Wuyu de Yanjiu》 285
Xiang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98
《Xinhua Zidian》 300
《Xinzhu Guoyu Wenfa》 284

Y

Yang Shuda, 1885～1956 255
《Yinxu Buci Zongshu》 303
《Yinxu Shuqi Kaoshi》 280
《Yinxu Shuqi Qianbian》《Yinxu Shuai Houbian》 280
《Yinzhou Jinwen Jicheng》 318
Yu Min, 1916～1995 278
Yu Xingwu, 1896～1984 264
Yuan Jiahua, 1903～1980 271
Yue Dialect in Chinese, Studies of 99

《Yufa He Yufa Jiaoxue》 ………………………… 302
Yuwen Jianshe ………………………………………… 332
《Yuwen Yanjiu》 …………………………………… 332
《Yuyan Yanjiu》 …………………………………… 332
《Yuyin Tansuoji Gao》 ……………………………… 321

Z

Zhang Shilu, 1902～1991 …………………… 270
Zhang Taiyan, 1869～1936 …………………… 254
Zhang Zhigong, 1918～1997 ………………… 279
Zhao Yuanren, 1892～1982 …………………… 260
"Zhong Yuan Yinyun", Studies of …………… 155
《Zhongguo Gudai Yufa》 ……………………… 306
《Zhongguo Wenfa Gexin Luncong》 ………… 292
《Zhongguo Wenfa Lun》 ……………………… 294
《Zhongguo Wenfa Yaolue》 …………………… 294
《Zhongguo Xiandai Yufa》 …………………… 295
《Zhongguo Yufa Lilun》 ……………………… 296
《Zhongguo Yuwen》 …………………………… 329
《Zhonghua Dazidian》 ………………………… 281
Zhou Fagao, 1915～1994 ……………………… 277
Zhou Zumo, 1914～1995 ……………………… 277
Zhu Dexi, 1920～1992 ………………………… 279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语言学
作者＝
页数＝３４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